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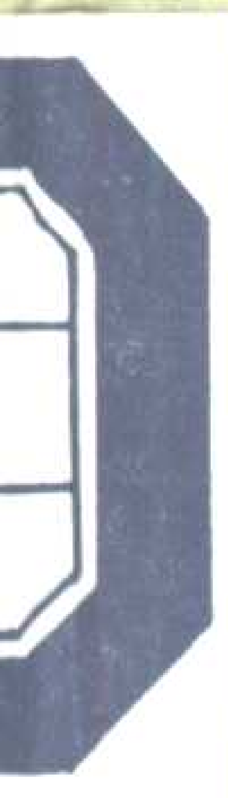
伪满文化

主编 孙邦

副主编 于海鹰 李少伯



吉林人民出版社



伪满史料丛书

伪满文化

吉林人民出版社

（吉）新登字01号

伪满史料丛书

伪满文化

*

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吉林省工商联印刷厂印刷

*

850×1168毫米32开本　24印张 插页4　576 000字

1992年11月第1版　1993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 000册

ISBN 7—206—01910—2

D·570　定价：平18.60元　精24.60元

编委会主任　刘云沼

副　主　任　方建宇　胡厚钧

孙　邦　许华应

编委　（按姓氏笔划为序）

于海鹰　方建宇　王承礼

孙　邦　刘云沼　朱建华

李中申　李少伯　李照武

许华应　胡厚钧　张本政

张秀枫　常　城　解学诗

主　　编　孙　邦

副 主 编　于海鹰　李少伯

本卷编者　刘海瑛

序

刘云沼

反映伪满洲国历史的十卷系列丛书，在久久期盼中终于同大家见面了。这是一项巨大工程，可喜可贺。

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从而揭开了日本帝国主义以武力侵略东北，扶持傀儡政权——伪满洲国的序幕。一部长达十四年之久的伪满洲国的历史，是我们祖国六分之一的领土沦为日本帝国主义殖民地的历史，是中华民族最危难的时刻，是中国现代史上最黑暗的一页。同时，也是中华儿女前仆后继、百折不挠、英勇斗争、抗日救亡的历史。回顾中华民族近百年来蒙受屈辱的历史，使我们懂得了一条千真万确的真理：在世界民族之林中，萎靡难以腾飞，落后必定挨打；不能崛起，必然陷入沉沦。今天，我们更加深刻地体会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坚持反腐败斗争，把经济建设搞上去，胜利完成四化的宏伟蓝图是何等的重要。

伪满洲国史料丛书是全国第一部有关伪满洲国史料的大型系列丛书，是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八五”计划的重点书目，具有重要的历史文献价值。它的出版发行，将进一步扩大文史资料的社会影响和利用价值，必将推

动和促进两个文明建设的发展。全书共十卷，选用了一千二百多篇文稿，共五百五十多万字。从“九·一八”事变写起，到殖民政权、伪满军事、经济掠夺、日伪暴行、伪满文化、伪满社会、伪满人物、抗日救亡、伪满覆亡等，各卷既是独立成卷，又有内在的联系，具有较强的可读性和史料价值。如此浩瀚的史料，涉及到东北沦陷后十四年的方方面面，十卷丛书既较为全面地反映了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殖民统治的概貌，又对重大的历史事件、历史人物有详尽记述。同时，这又是一部以口碑史料为主，首次披露的史料丛书，与所有有关伪满的学术研究专著、论文及档案资料既有不同之处，又有相辅相成的作用。作者大多是这段历史的见证人，他们以亲历亲见亲闻的具体史实为根据，深刻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的狰狞面目，充分证明了伪满洲国傀儡政权的实质。这套丛书可以说是整个伪满洲国内幕的实证，既然是史料，又限于作者个人的所见所闻，虽然它是真实的，也难免有疏漏，更不可能面面俱到，因为文字量过大，在编辑过程中必须有取有舍，有详有略。在取舍详略之间，考虑不周之处，在所难免。至于编辑上的疏漏和差错，也是少不了的。无论如何，构筑如此浩瀚的史料工程，又文出多人，几经易稿，都是费了心血的。如此巨篇，如果没有全国各级政协文史办公室的鼎力相助和广大学者、专家、文史工作者的辛劳，特别是我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多年来对伪满洲国史料的锐意搜求，是很难完成这样一个在我国现代史上具有重要历史文献价值

的史料工程的。只有经过他们的辛勤劳动，各方面专家的指导和参与，才使这套丛书更加专题化、系列化。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人民政协确实是一个人才荟萃的群体，在挖掘整理文史资料上有独特的优势。

江泽民总书记曾多次提出，要由浅入深，坚持不懈地进行中国近代史、现代史及国情教育，在全国各族人民特别是青少年中，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增强民族自尊、自信和自强精神。十卷伪满洲国历史丛书，就是这样一套回顾历史，启迪当代，教育后人的好教材。我们要改革开放，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很有必要研究在我国东北曾出现的最野蛮最残酷的殖民统治。因为今天的中国，五十岁以下的人，对于自己的国家、民族及家乡，在半个多世纪前遭受的那一段苦难已经没有什么印象，什么国仇家恨统统说不清楚。用这些生动、具体的历史资料，对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振奋民族精神，激励革命意志，很有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我们重温历史，并不仅仅是回顾历史，而是以史为镜，教育后人。中日两国是一衣带水的邻邦，伟大的日本人民也是那场战争的受害者，因此，搞这样一套历史丛书，对加强中日友好关系，促进世界和平，也将起到积极的作用。现在，日本仍有极少数军国主义分子，还在念念不忘过去他们一手制造的伪满洲国，一直留恋他们所谓的“大东亚共荣圈”，甚至为东条英机等战犯涂脂抹粉，企图篡改、歪曲历史的

本来面目，这是中日两国人民绝对不答应的。

斗转星移，历史毕竟早已翻开新的一页，耻辱的历史已经过去，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崛起在世界东方，让我们引古鉴今，奋发图强，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奋斗不息。

谨以此书告慰无辜殉难及为国捐躯的千万个英灵。

一九九三年九月三日

编辑说明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九·一八"事变，于1932年又炮制了傀儡政权——伪满洲国。从此，东北沦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长达十四年之久，这是中国现代史上浸透血泪的一页，永远记住它，具有特殊意义。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在战败时，销毁了他们在中国的大部分档案资料，战后，在日本又有别有用心的人不断撰文著书，歪曲历史，掩盖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及亚洲的罪行。因此，揭开历史迷雾，系统地揭露、批判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犯下的种种罪行，实事求是地说明历史真相，是深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之害的中国人民，尤其是东北人民义不容辞的责任。

吉林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经过多年来搜集、挖掘，征集了大量亲历者口述整理或撰写的有关伪满的稿件和资料，在此基础上开始编纂工作。编辑过程中坚持领导、学者和编辑人员密切合作，经过多次论证、修正及精选精编，终于完成了《伪满史料丛书》。全书共分十卷，约550万字。收入1200余篇文稿，基本囊括了有关伪满的方方面面。

一、丛书以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辽宁省、吉林省、黑龙江省、河北省、内蒙古自治区各级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办公室）的文史资料为主，辅以历史学者

的论著及有关的档案资料。

二、丛书按内容类别分卷，各卷内又分若干专题。由于某些文稿内容往往涉及到多种专题，为保持资料完整起见，采取了集中编排。如有关“细菌部队”的文稿，均收入《日伪暴行》卷中，其它卷、专题不再收入。另外，某类稿件稿源丰富，又涉及到多方面，则根据稿件内容，分别收入所侧重反映的专题内。如有关“劳工”类的稿件，主要反映“劳工苦难”的稿件收入《伪满社会》卷中；关于“人力掠夺”收入《经济掠夺》卷中；有关修筑军事工程后劳工被残杀的稿件收入《日伪暴行》卷中。

三、丛书由吉林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辑，各卷均有专人负责编辑。

四、丛书选用部分日本战犯、伪满汉奸及日本历史学者等的供词或文稿，但其中某些观点是错误的，甚至是反动的。选用时作了适当的删节，保留史实部分，或加编者按、注释予以批驳。故请读者批判地阅读。

五、编辑体例

1. 丛书框架结构视内容而定，各卷分别采取列一层题、二层题，一、二层题并存的三种形式。

2. 对入选文稿或资料，基本保持原文格调。如需对原文改动，主要是采取删节或压缩。

3. 丛书的数字、年代的使用，以1986年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公布的《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为准，不定数使用汉字。

4. 丛书注释分三种形式：作者简历注为*；凡属作

者或编者加在行文中间的解释性文字，均加（ ）；其它注释一般采用脚注圈码，不用文后集中注释。

5. 凡属繁体字、古体字和异体字，除有特殊含义（如姓名）外，均改为通行简体字。

6. 文稿出处置于该文稿之后，一律注明“摘自”某某刊物或书籍。

六、丛书的编辑出版，得到了各方面的支持和指导。全国政协文史办公室为此书的编辑出版给予了指导并做了大量工作；辽宁省、黑龙江省、河北省及内蒙古自治区等兄弟省、市、县（区）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办公室）给以了热情协助，在此，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

望读者对丛书的缺点和不足之处给予批评和指正。

卷首语

东北沦陷时期，日本帝国主义者对东北人民不仅在政治上实行残酷统治，在经济上进行疯狂掠夺，而且深谙要想长期占领这块土地，还要牢牢控制住文化、教育及科技领域。于是，“建国”伊始，便依照其“建国思想”，采取了一系列的控制渗透措施。

日伪时期的思想文化统治，最初是以资政局弘法处为中枢的，它负责宣传“建国精神”，普及“自治”思想，鼓吹建立“王道乐土的新国家”。1933年，日伪当局强化了这一机构，取消资政局弘法处，在总务厅内设了情报处。到了1937年，日本殖民主义者再一次加强了思想文化领域的控制措施，情报处被改为弘报处，其权力也进一步扩大，对于舆论宣传、新闻报导、广播出版、文学艺术等方面，实行了更严密的领导、监督、控制措施。这种思想文化的专制随着1941年《文艺指导纲要》的出笼而被推向更高阶段。在这一系列的专制措施下，许多爱国知识分子被逮捕、遭杀害，民族文化被扼杀，充斥文化市场的是为侵略者树碑立传的“国策文艺”。本卷第一至三部分中，作者或以其亲身经历，或以其多年的潜心研究，用铁的事实揭露了这一时期日本帝国主义者对思想文化领域进行法西斯殖民统治的实况。

“九·一八”事变后，教育的衰微达到极点，许多学

校被关闭，三分之一的学生被迫失学，教师失业者逾万。面对教育景象的惨淡，日伪当局深知，这对于他们政权的巩固是不利的，于是采取了“恩”威并施的手段，一方面仍然对爱国师生进行残酷的迫害，制造了一起起惨案，如仅在安东教育惨案中，受害者就达300余人。另一方面则着手整顿恢复教育。1932年成立了教科书编审委员会，并由日本人担任首席编审官，对教科书的编发进行严格的控制。1937年《新学制》颁布。其教育方针是：“各民族必须扬弃狭隘之民族主义，振兴统一之大同协和之国民精神。”把教育目标“首先放在发扬和实践建国精神方面”。按照这个教育方针制定的在全满进一步实行奴化教育的措施更加完备。对此，本卷在第四至八部分中作了翔实记述。

第九部分中搜纳的是科技与医疗方面的史料，虽然对伪满时期的科技医疗情况有所揭露，但这部分史料明显不足。原因是当时日本侵略者对科技领域是实行高度垄断的，重要岗位几乎全由日本人把持，我们也曾征集到一些日本人撰写的回忆录，但由于多是简单的表面现象的叙述，最后只好舍弃。

在搜集本卷史料过程中，深感缺少当时在日伪政权中地位较高者撰写的直接揭露伪满文化、教育、科技方面统治专制内幕的史料，其原因一方面是日本殖民主义者垄断之甚，另一方面由则于编者水平所限，在史料搜集中定有遗漏现象，因此，卷中必有不当之处，尚俟读者批评指正。

此卷的编成，曾得到许多专家学者的帮助，东北师范大学日本所教授吕元明、吉林省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副研究员冯为群、副研究员李春燕三位老师都曾审阅本书并提出很多很好的意见，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编　　者

目　录

一　沦陷时期的思想文化统治

二　伪满电影、音乐与戏剧

三　日伪控制下的新闻、广播与出版

四　鼓吹"神道"为殖民统治服务

五　加紧奴化教育　推行愚民政策

六　摧残教育　迫害知识分子

七　安东教育惨案

八　建立各类学校　为巩固伪政权服务

九　伪满统治下的科技与医疗

一

沦陷时期的思想文化统治

沦陷时期的思想文化统治

吕元明

思想文化统治中枢——总务厅弘报处

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东北的文化专制统治，是和“九·一八”事变的枪炮声同时开始的。

1932年，当伪满洲国刚刚出世的时候，日本帝国主义便在伪政府中设立了思想统治机构，即资政局弘法处。这个资政局是由积极煽动满蒙独立、大造侵华舆论的法西斯分子笠木良明策划组织和具体领导的。它一成立，就忠实积极地为这个傀儡新“国家”效劳。这从弘法处承担的三项任务中看得很清楚：第一项，所谓“宣传建国并施政之精神”，这是替伪国家涂脂抹粉，把傀儡政权说成是“独立的新国家”，把法西斯统治说成是“王道乐土”；第二项，所谓“涵养民力，善导民心”，实际上是妄图用“文治”征服民心，镇压中国人民的反抗；第三项，所谓“普及自治思想”，目的是强行灌输“独立”思想，把东北从整个中国分割开来。

弘法处的活动，是一方面围绕上述三项任务为巩固伪政权大肆张扬反动舆论，进行欺骗宣传；一方面采取组织措施，培训人材，以加速推进侵吞全东北的步伐。为此，资政局弘法处曾办了一个训练所，招的全是日本人。

1933年，日本侵略者为了强化思想统治机构，废资政局，在伪国务院总务厅内设立情报处。当时，东北人民的抗日武装斗

争正风起云涌，情报处便把打击和瓦解抗日力量作为主要任务之一。它派出大量“宣抚人员”，充当关东军的别动队。关东军“讨伐”到什么地方，什么地方也会同时出现这种从事思想宣传的“宣抚”队员。

总务厅情报处还统管伪国家的新闻、出版、广播等宣传舆论阵地。

1937 年，日本侵略者为进一步控制伪满洲国，由日本人统揽国务院全权，情报处扩大为弘报处。根据伪法令，弘报处的任务扩大为九项：（一）控制舆论；（二）控制文艺；（三）主管“主要政策之发表”；（四）领导和监督报道新闻机关；（五）控制宣传资料；（六）管理出版物、影片及其它宣传品；（七）管理和控制广播及通讯机关；（八）掌管情报；（九）除上述诸项外一切对内对外的宣传。总之，它统辖包揽了文化宣传的一切方面。

为了完成上述各项任务，弘报处设立了三个科：监理科，主要是监督管理文化宣传机构，以及从事文化宣传方面的调查；情报科，主要是从事情报搜集、整理和通报，以及加强情报联系和控制；宣传科，掌管宣传计划和宣传联络工作，以及对内对外重要文化宣传的开展。

从这九项任务和三科的分工范围，可以清楚地看出伪满文化机构的殖民统治和军事侵略特征。新闻、出版、文艺、电影、宣传资料等，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一般不置于官方的直接控制下，只有实行法西斯统治和进行帝国主义战争的时候，才会出现这种情况。而伪满洲国则从一开始就由日伪政权直接控制，特别是在1937 年后更是实行全面统治。这是军事法西斯殖民统治体制的明显表现。

1939 年，伪国务院总务厅为了适应侵华战争的需要，弘报

处实行体制机构改革，调司法官吏出身的武藤富男任弘报处处长。伪满协和会和农事合作社等，也是从事刺探中国人民思想动向的机构。为了协调这些机构同弘报处的分工，当涉及到搜集情报和地方性宣传工作时，弘报处主动加强同这些机构地方组织的联系。同时，在各级伪政府中设立和增加“弘报”人员，以调查和掌握中国人民反对日本殖民统治的思想行为，以便进一步进行镇压。

1941年，弘报处的职能再次扩大。伪治安部对于电影、新闻、出版的审查；伪交通部对广播、新闻通讯的审查，以及监听国外短波；伪民生部对文艺、美术、音乐、戏剧等文化行政工作的领导；伪外交部外务局的对外宣传等，都转归弘报处统一管辖。为了进一步控制中国东北的新闻和通讯，于1941年8月25日公布了《通讯社法》、《新闻社法》、《记者法》，全面垄断了新闻和通讯。为加强对文学艺术的法西斯统治，同年3月23日还发布了《文艺指导纲要》。在太平洋战争期间，弘报处同关东军紧密配合，鼓吹大东亚战争，催逼东北人民为日本提供钢铁、煤炭、粮食等，并动员日本百姓过“战时生活”，节衣缩食，卖命出力。

伪满时期，思想、文化、宣传方面的统治机构并不只是一个伪国务院总务厅弘报处，还有伪治安部警务司，伪民生部教育司、厚生司，伪司法部民事司、刑事司，以及协和会等等，在进行法西斯思想文化统治和镇压中国人民反抗方面，都起了很坏的作用。当时，从伪新京到各级地方组织，都设有名目繁多的宣传和思想检查组织。伪满的警察机构里，就有文化警察，还有种种特务，抓“思想犯”大都是他们干的。

在伪满的最高主宰者——关东军司令部内，设有报道部和调查部，也是从事战争宣传和殖民思想统治的机构。特别是在

战争日趋紧张的时刻，关东军报道部和伪弘报处成了伪满文化宣传的统治核心。

“官制文化”

伪满文化具有高度集中、垄断的特征。一切文化宣传事业都操纵在日伪统治者所统辖的文化机构手中。日本侵略者给这种文化专制概括了一个恰如其分的名字，叫“官制文化”。很显然，所谓“官制文化”，就是殖民地文化专制、法西斯文化专制。

新闻、广播在现代思想文化宣传活动中，占有重要地位。因此，日本帝国主义在侵占我国东北的第二年，便建立了“满洲国通讯社”，着手垄断东北新闻通讯机构与事业，排斥和取消中国人民的新闻、通讯自由。1935年10月末，日本侵略者又以“一个国家一个通讯社”的殖民政策，建立了严格管辖我国东北新闻、通讯的机构——“弘报协会”，把报道、言论、经营三方面统一起来，实行所谓“官制统治”。

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之后，再次强化其新闻通讯机构，使之为侵华战争政策服务。1941年根据《国通社法》、《新闻法》、《记者法》，建立起改组的新的“满洲国通讯社”，由日本侵略者全部垄断新闻通讯事业。在报纸的出刊与发行上，建立起三个大新闻社，垄断了整个东北报纸的发行。这就是《康德新闻》社，用汉文出版，合并了18家报社；《满洲日日新闻》社，用日文出版，合并了3家报社；《满洲新闻》社，用日文出版，合并了6家报社。1944年5月，随着战局的发展，《满洲新闻》和《满洲日日新闻》又合并为《满洲日报》。

“九·一八”事变前，刚刚着手建立的东北广播事业，在炮火中遭到日本帝国主义的摧残。“九·一八”事变后，全东北的广播均由日本帝国主义者所垄断，建立起满洲电信电话股份公

司。截至1941年，伪满有18个广播台。

"九·一八"事变前，东北十分薄弱的出版事业，同样也在一开始遭到日本帝国主义践踏。日伪很重视对出版事业的"统制"。"九·一八"事变后在打击中华民族出版事业的同时，加紧建立由日伪直接控制的出版机构。1937年3月29日，伪满洲国建立了满洲图书股份公司，其任务主要是出版发行和销售伪满学校课本、所谓"国策"图书和其他有利于宣扬建国精神之书籍。1939年，建立伪书籍发行股份公司，进一步把东北图书发行、图书进出口工作垄断起来，同时，也协助伪政府有关文化统治机构从事图书出版审查工作。1943年建立了伪"出版协会"，这一组织把整个东北的出版事业都控制起来，其中的出版计划委员会，负责全东北图书审查和批准出版事宜；生产发行委员会，统辖全东北图书出版发行工作。在这种集中"统制"之下，就连稍与战争空气不协调的娱乐性出版物，也都被禁绝了。

日本帝国主义对电影的作用也极为重视。"九·一八"事变后，日伪抵制中国抗日、排日影片进入东北，同时大量放映日本反动影片，宣传殖民侵略政策。日本侵略者组织了"满洲国电影国策研究会"，聚结了关东军、满铁、伪政府、协和会等各方面的文化宣传力量，着手控制东北的电影事业。1937年8月21日，建立了由满铁和伪政府共同投资的"满洲电影股份公司"（简称"满映"），垄断了我国东北的电影事业，包括摄制、发行、管理进出口影片等方面。1942年，伪满政府又决定把各地电影院的建立和管理工作交给满映。满映的权势更加扩大，完全独霸了全东北的电影事业。

文艺部门的文学、戏剧、音乐、美术、舞蹈等，在东北有较长的发展历史，并受"五·四"新思潮的影响较深。因此，日本侵略者在控制这个部门上，颇费周折。最主要的一项措施，是

1941年3月23日由伪国务院弘报处提出的《文艺指导纲要》，它成了日本法西斯对东北文艺实行专制统治的反动纲领。《纲要》第一条就毫不隐讳地道出了其反动实质："我国艺文以建国精神为基调。故从事八纮一宇之伟大精神的美的显现。并且以移植于这一国土的日本艺文为经，以原住诸民族固有的艺文为纬，吸取世界艺文的精华，织成浑然独自的艺文。"从中，我们不难看出，日本帝国主义控制下的伪满文艺，乃是日本殖民主义、法西斯主义的东西。

如果说，1933年《满洲经济建设纲要》的制订，是日本帝国主义从经济上实行全面"统制"的开始，那么《文艺指导纲要》的发布，则标志着日伪统治者在把全东北实行思想文化专制政策推进到了一个新阶段。根据这个"纲要"，日本侵略者一方面拼凑适应侵略战争需要的文艺组织，一方面加紧限制言论自由。在伪弘报处的领导下，伪满的文艺组织普遍进行了改组，先后建立起伪"文艺家协会"、"剧团协会"、"美术家协会"、"乐团协会"等团体。在太平洋战争之后，又拼凑了伪"工艺家协会"、"摄影家协会"、"作曲家协会"、"书法家协会"、"舞蹈家协会"、"徘句[①]家协会"等团体。这些团体都是由日本侵略者所主持，为侵略战争服务的。在弘报处的指挥下，各地各种名目繁多的文艺团体纷纷出笼。在侵略战争日趋失败的情况下，这些团体充满着浓厚的杀气腾腾的战争气氛。"牡丹江文艺家协会"，会长是牡丹江省副省长（日本人）；副会长有一个是日本人，另一个是中国人；顾问共5人，全是日本人，其中包括日本驻牡丹江领事、铁道局长、宪兵队长、特务机关长和商工会会长。齐齐哈尔"艺文报国会"领导机构有31人，全部由日本人

① 徘句，日本诗体一种，由5、7、5共17字组成。

组成。顾问是伪黑龙江省日本人副省长、日本人铁道局长、日本人副市长。至于伪满的文化宣传机构，更是由军国主义分子中的骨干所把持。如日本战败前夕，“满映”理事长和“满洲艺文协会”会长，就是在“九·一八”事变中扮演主要角色的甘粕正彦；“满洲弘报协会”理事长高柳保太郎，原是日本陆军中将、满铁顾问。在日本帝国主义垮台前夕，这种军事管辖文艺的组织，到处出现。那时文艺作者的创作计划都要送到弘报处去审查，或存档备案。

1942年，日本在东京召开所谓“大东亚文学者大会”，东条英机特地跑到会上打气，日本情报局次长、陆军省部长、海军省报道部科长等人都在大会上发言，极力鼓吹军国主义舆论，煽动战争狂热。伪满政府日本殖民当权者也参加了大会，为“大东亚圣战”摇旗呐喊。1943年，伪满政府召开“决战文艺家大会”，贯彻“东京会议”的精神，动员日伪作家行动起来，为侵略战争服务。关东军报道部部长长谷川宇一在大会上作了《战争与文艺》的报告，号召文艺家彻底为侵略战争而写作，提出什么文艺要“先行”，作战争机器的“润滑油”。这个期间，有不少日籍伪满作家，被征召到关东军报道部，充当“报道队员”，到前线或兵营去采访，为日益败退无望的侵略战争做最后的鼓噪。

对中国民族文化的摧残

“九·一八”事变不久，关东军为了炮制傀儡政权，曾经拼凑了所谓“自治指导部”，拉了一批汉奸、卖国贼，搞“自治”、“独立”运动。在这个组织中的日本人手里，传递着一个秘密文件：《自治指导员服务心得》。其中特别提到：“对各种言论机关及集会等内部情况应特加注意，以绝灭排日思想”，“排

日教材要断然铲除”。这一事实表明，“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是文武两手交替使用，在大搞武力侵占的同时，也开始了对中国人民思想文化的镇压。

1932年，溥仪一就任伪执政，则立即发出“通令”，强令全东北不得悬挂中国地图，不得使用“中华”字样，不得使用中国教材，不经日伪当局批准不许集会、结社、游行、摄影、出版，等等。

1932年10月24日抛出的伪《出版法》，规定如要变革日伪“国家组织的大纲”，危及伪“国家存在的基础”，泄露伪“外交及军事机密”，对伪“国交”产生“重大影响”之破坏行为，“煽动”对伪国家“犯罪”、“公开诉讼辩论”、“惑乱民心及扰乱财界”、妨碍伪“法官和警察执行职务”以及其它，都禁止出版。同年9月发布的《治安警察法》，针对当时人民抗日组织纷起，更具体规定了禁止人民集会的自由。规定要求，“屋外集会或公众运动”的发起者必须在开会十二小时前到管辖的警察署去登记。在街道及公众场所贴标语、传单、图画，或散布、朗读其它东西，警察可以“扰乱秩序”等罪名，加以禁止或扣留。

与此同时，日伪当局对带有民族意识的书刊，一律禁绝，并强行输入日本法西斯书刊。根据伪文教部记载，1932年3月至7月，就在东北焚书650余万册。沈阳市一家书店，存有我国关内出版的书未交出焚毁，因此，书店被查封，经理也被投进牢狱。1934年6月29日，伪民政部一次就通令禁止36种报刊输入东北，其中主要是我国关内的报刊，计有：《大公报》、《申报》、《时报》、《新闻报》、《北平晨报》、《华北日报》、《京报》、《平报》、《世界日报》、《社会日报》、《北京日报》、《上海民报》、《广东市民日报》、《豫北日报》、《徽州日报》、《益世报》和《良友》、《循环》杂志等18种，占禁止输入报刊的一半。此外还有

当时的苏联《真理报》、《消息报》等也均在禁止之列。此后查禁书刊种类年年增加，查禁极为严格。

十四年的殖民统治期间，中国革命的、抗日的、具有民主思想的书籍、报刊，禁止在东北出版，也不得从关内向东北运入。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以及与中国共产党有关的书籍，更是日伪严禁的对象。据《满洲年鉴》记载，1935年到1938年的四年间，伪满禁止发行的报纸为7 445份，扣押5.6091万份；禁止发行的杂志为2 315份，扣押1.3664万份；禁止普通出版物3 508册，扣押92.4852万册。1939年，输入的出版物仅以"公安"为由一项，禁止发行共743种（不包括被删削的数目），其中关内的出版物为488种，占全部查禁输入出版物的64%，居第一位。《满洲年鉴》声称："其中最多的是中国对日军诽谤的记事，关于诺门坎事件对日满军进行诽谤的记事，以及排日、侮日、抗日的记事和共产主义思想宣传的记事。"

这些事实充分说明，日本帝国主义的镇压矛头主要是指向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当时正值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时刻。1937年以后，中国关内运往东北的出版物更是锐减。相反地，日本国内宣扬军事法西斯思想的出版物却源源不断而来，年年增加，后来竟达到占东北当时进口出版物之80%乃至90%以上。1936年，日本向伪满出口书籍58.7万余册，1937年就增至380万册，1938年再增至1 000余万册，1939年达1 440余万册，1940年高达2 230万册，1941年突破3 000万册大关，达3 440万册。1939年伪满进口日本报纸是5 494万余份，杂志827万余册，书籍1 440余万册。这个数字是当年中国关内进入东北报纸数的10倍，杂志数的487倍，书籍数的14倍。伪满时期，平均每天有15万余份日本报纸、2.2万余份日本杂志、4.9万多册日本书籍涌进东北。

伪满十四年，做为形象化宣传的主要工具——电影，同样也受到日本殖民统治者的严酷控制。伪检查机关规定，有损于日本帝国主义和伪满政权的，有损于日本侵略军的，有损于所谓“皇室”的，有损于日伪官吏统治的，特别是有关反战思想的，有关于共产主义思想的，均被禁演。据日伪有关当局透露，1936 年，禁演影片 178 部，其中涉及共产主义思想及所谓危及伪政权而禁演的 36 部。1939 年，列为禁演的 43 部，其中中国影片占第一位，有 18 部被禁。同时，日本统治者以“公安”为由，还剪截影片，1936 年为 2 600 余米，1937 年增至 2 万余米，到了 1939 年又增至 20 余万米。但是，宣扬武士道精神的日本电影却充斥伪满各影院，可以说，伪满的影坛是日本电影的天下。1936 年日本输入东北的影片是 154 部，1937 年升至 232 部，1938 年一跃而至 1 352 部，1939 年再跃为 1 630 部。

伪满时期，以“思想犯”、“政治犯”之名，逮捕、监禁乃至杀害中国人民，也是日本帝国主义摧残中国民族意识的一个重要方面。“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者不仅关闭了东北的各大学和某些中学，并对具有抗日思想的教师、职工、学生进行严格的审查和野蛮的镇压，甚至连嫌疑者也遭逮捕与清洗。1932 年我国东北尚有中小学教师 2.4 万多人，而 1933 年减少到只剩 1.6 万人，其中的几千人被清洗或被迫改变行业。在沈阳、吉林、安东等地接连发生逮捕、屠杀抗日爱国教师和学生的事件。日本宪兵特务机关在沈阳市第三中学制造的镇压事件，一次就捕杀爱国师生 35 人。日本帝国主义对共产党员的镇压则更为残酷。

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学生到关内学习的正当要求，也百般加以限制和阻挠。伪滨江省公署曾为此向各县发布通令，内称：“各县现在仍有多数在中国留学生，殊深遗憾。”通令规定以后

东北人不得到关内去学习，而在关内毕业的东北学生，回东北后，各单位“一律禁止采用”。日本殖民统治者为割断中国关内、关外的联系，采取了形形色色的限禁手段。

在日本法西斯的残酷压制下，中国东北一部分爱国的文化人和知识分子同敌人进行了英勇的斗争，他们有些人参加了抗日武装队伍，也有一部分人被迫逃亡关内。

（摘自《伪满洲国史》）

《文艺指导纲要》出笼以后

冯为群

制定反动纲领摧残文艺

伪满洲国建立以后，日本侵略者虽然通过伪政权逐步加强了对文艺的统治，先后公布了《出版法》、《新闻法》、《记者法》、《通讯社法》、《电影法》等，但是这些有关文艺的法令都比较单一，只能就某一方面实行专制统治，还不足以囊括整个文艺统治的内容，更不能从理论上把当时的文艺纳入殖民主义的轨道。所以为了使“殖民文艺”统治能够达到奴化思想、征服民心、改造“满洲”、使东北的文艺失去中国民族文化固有的特色，以尽早变成日本文艺的一个组成部分的目的，他们经过精心策划和周密研究，终于1941年3月23日由伪国务院弘报处制定并发布了《文艺指导纲要》，把殖民文艺统治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文艺指导纲要》共分五大部分，其中一、二两个部分是重

点，是关键。在第一部分“趣旨”中，主要讲了两个问题：一是确立了艺文的概念，把文艺、美术、音乐、演艺、映画、写真等从文化的大概念中抽出来，称之为“艺文”，避免由于统称文化而造成混淆；二是明确了艺文的指导方针，即施行育成指导，并要求艺文“与其他诸部门互相协调和进而普及于全国，以期精神的建设与物质的建设工作相辅而行。”过去，日本对文艺的统治“较诸产业、经济、交通等其他部门”薄弱，为了改变这种状况，把施行育成指导作为指导方针，这就使文艺统治和政治、经济等其他部门的统治相互协调和配合。在第二部分“艺文特质”中，日本侵略者毫不隐讳地写道：“我国艺文，乃以建国精神为基础，是为八纮一宇精神之美的显现。故须以移植我国土之日本艺文为经，原住民族固有之艺文为纬，取世界艺文之粹，而造成浑然独特之艺文为目标焉。”这段话十分明确地道出了殖民文艺的侵略实质。

关于《文艺指导纲要》，伪国务院弘报处处长武藤富男曾在一次文化人大会上作了长达两万言的“解说”，从艺文的意义和特质，讲到艺文教育及活动，连篇累牍，但都不离殖民文艺统治这个宗旨。比如：“日本的艺文达到世界最高的水准线，大概可以算作世界第一等，今后能指导世界艺文的，鄙人确信就是日本的艺文了……把世界最高的日本艺文移到满洲来，同时满洲也有满洲古来诸民族的艺文，把这两项混合起来去建设满洲艺文……而造成最崇高的大精神，就是八纮一宇大精神。”从这里不难看出，武藤的“解说”实际是重弹“种族优劣”的老调，因而也就更加暴露了《文艺指导纲要》的反动本质。众所周知，中国是一个具有五千多年历史的文明古国，文化之发达举世公认，文艺之兴盛也是世界最早的国家之一。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等，不仅光耀过中国文坛，而且也丰富

了世界文学的宝库。对于这样一个享有世界声誉的国家的文学，怎么会以“日本艺文为经”，接受日本艺文的指导呢？他们置历史事实于不顾，硬把自己说成是世界上艺文“第一等”的国家，其目的就是要以欺骗的手段和强权政治加强殖民文艺统治。

《文艺指导纲要》出笼以后，使东北沦陷时期的文艺受到了严重的摧残。当时比较明显的表现有如下几个方面：一是破坏了民间进步文艺社团的发展，施行了清一色的“国策文艺”。“五·四”以来就形成了的促进东北新文艺发展的结社风气被取消，有些群众性的文艺团体被改组，同时还新建了一些文艺团体，并且把它们都放在伪弘报处的直接控制之下，这样就便于日伪全面地统管艺文了。二是鼓吹圣战，把文艺变成为战争服务的工具。两次在东京、一次在南京召开的“大东亚文学者大会”就是鼓吹文艺为圣战服务的最好说明。日本首相东条英机、情报局总裁、陆军省部长、海军报道课长、“文艺报国会”事务局长等文武官员，都分别地在东京的两次大会上发言，号召文学者要搞所谓的“决战文艺”。伪满洲国为贯彻大会精神，改组了“满洲文艺家协会”，在机构中新设了“审查”、“联络”、“企业”三个部，以与建设大东亚文学的心愿更相符合。并且由伪政府组织召开了“满洲决战文艺家大会”，日本关东军报道部长谷川宇一在会上作了《战争与文艺》的报告，号召作家行动起来，为侵略战争创作出所谓的雄浑无比的伟大的大东亚文学，为鼓动作家为战争写作。还设立了大东亚文学赏，同时有些报刊也举办了“悬赏征文”，以引诱广大文学青年参与“决战文艺”。三是加强了对文艺书籍的出版审查。不但禁止出版一切有进步思想的书籍，就是有违战争意愿的也在禁止之列。对已经装订成册的书刊，如被指责为有问题，就勒令销毁或扯页加盖“削除剂”印章，以示该书有较严重的问题。

从以上这三点就可以看出，《文艺指导纲要》出笼以后，日本对进步文艺的摧残更进一步了。所以有人说，东北沦陷时期的文艺是在岩石的缝隙中生长起来的，这话很形象地说明了日本对当时文艺的严酷统治。

迫害爱国进步作家企图消灭文艺

日本对东北沦陷时期的殖民文艺统治，是在政治上实行白色恐怖和对爱国进步作家残酷迫害两个方面进行的。如果把1937年全国抗日战争爆发作为一个分界线的话，那么在这之前，总的看日伪对爱国进步作家的迫害还不十分突出。这期间虽然有舒群、萧军、萧红、罗烽和白朗等从事左翼文学活动的作家先后流亡关内；也有“星星剧团”、“哈尔滨口琴社”等文艺团体遭到破坏；还有“黑龙江民报事件”等文化人士被逮捕杀害，但他们还没有形成一个较完备的文艺统治体系，更多的是从政治统治的角度去对待文艺问题。也就是说，日伪的文艺统治还没有特别的注意到文艺的自身，往往只偏重于文艺人的政治活动上。可是到了抗战爆发以后，日伪对文艺的统治就逐渐地形成系统，并且把审查文艺创作和监视文艺家活动紧密的结合起来。

（一）*严格的审查文艺创作*。每月对定期或不定期的出版物都要进行审查，并根据审查的结果认真研究，从中找出左翼作家的创作方向和描写方法，以及左翼文学创作将会导致的严重后果。可见日伪对文艺创作的审查是殚精竭虑煞费苦心的。伪首都警察厅的敌伪秘件中是这样分析当时左翼作家创作方向的：“满洲左翼文学在它诞生之初，就已经注意到了政治上的形势，采取了抽象的、表面含糊其辞的形式开始创作的。因此，对于一个对这种文学缺乏认识的另外一个民族来说，要想掌握其

中心思想就更具有一番困难。特别在大东亚战争爆发后，政府对反满抗日运动的检举、镇压以及对他们采取的措施，日益引起左翼作家的警惕，因而，他们较之过去更加抽象化暧昧化了。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具有左翼文学理论的作家们，不可能因为形势的急剧变化而完全放弃他们的本质上的内容，因此，今后的满洲文学所走的道路，可能只有依靠新浪漫主义一途了。"根据这一分析，他们把当时的创作分成激发群众不满的"反政府的作品"、向人民灌输阶级斗争意识的"反资产阶级的作品"、象征未来建设新国家新社会的"反现实的作品"、假借反对英美实则鼓动反满抗日的"反侵略的作品"等几种复杂的状况，甚至认为左翼作家将不使用理论上的术语，而专门用具有满洲文化人情感的语言，以图欺骗审查人员。所有这些，都充分地说明了日本对东北沦陷时期的文艺统治，已经由外部转入到文艺自身，由现象转入到本质了。假如我们再看一下他们对左翼作家的作品分析，就会更清楚其严密的文艺统治了。

1943 年，伪首都警察厅指派特务审查发现 9 篇左翼作品，有山丁的诗《拓荒者》、也丽的诗《黄昏的诗篇》、吴郎的诗《千里食客》、杨光政的诗《铁窗生活记实》、石军的小说《混血儿》、吴郎的散文《绿荫随想》、爵青的论文《每月评论》、吴瑛的小说《鸣》、但娣的小说《戒》。对这 9 篇作品的审查，一般地说都包括介绍梗概、归纳主题、分析要点、指出问题四个部分。如对山丁的长诗《拓荒者》的审查，先是简要地叙述了诗的梗概，接着确认它的主题是"反日"的，然后列举了两段原文进行分析，认为该诗"借老者对其子的教导，用以鼓吹民族意识和爱国土的思想"，"用野狐、山鼠和豺狼象征日本，即日本掠夺了满洲的宝藏，意思是说，爱国爱土的满洲人民必须毫不犹豫地站起来，驱逐日本，重建满洲。"他们就是通过这样地审查，

对作家进行监视和迫害的。同时他们认为，1943年的文艺创作“左翼的色彩几乎隐蔽起来了，相反的民族意识却正在高涨”，并且会“自然转向民族抗战的阵地”。根据这个分析，日伪便更加注重对文艺自身的统治，企图消灭滋生左翼文学的土壤。

（二）*严密监视作家的活动*。日伪对爱国进步文化人士和左翼作家的特务监视，从东北沦陷初期就已经进行，不过那时多注重于带有政治色彩的活动，而对正常交往和有关文艺方面的问题，一般不予过问。可是后来，特别是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就不行了。1942年伪首都警察厅签发了治安秘件，授命特务“对管内对象实行侧面侦察”，并设立专门机构“文艺侦察部”，及时向警务总局长山田俊介报告文艺侦察情况。现从“文艺侦察部”打给山田的一份报告中了解到，当时日伪把“满映”作为文艺侦察的重点，对编剧、导演和演员都进行严密的监视，并不断地报告被监视对象的活动。仅半年多时间，送交山田的报告就有12件，报告中列举的被监视对象有：王则、安犀、山丁、辛实、李映、刘国权、徐聪、张敏、张我权、张静、蒲克、冯禄丹、王芳兰、王度、王瑛、张英华、郑晓君、张奕、威廉等20余人。除“满映”外，他们还把书店、广播、中国大使馆、协和会等，也作为重点监视范围，经常向特务部门报告情况，被牵连的侦察对象有40余人。

日伪对爱国进步文化人士和左翼作家的监视，“原只限于作家季风、涞南、光逖等范围极小的左翼分子”，后扩大到整个文艺界，而其中又把王则、安犀、山丁作为重点。如对山丁，把他视为“继承过去在满左翼作家萧军以来的传统农民文学”的干将，“满映文艺科骨干科员”，因而对他的大事小事一举一动都要进行严格监视。

在进行特务监视中，他们把被监视对象分成重点和一般两

种，重点称“要视察人”，一般称“视察人”，分别列入特务掌握的黑名单，并且形成监视网，跟踪盯梢。如果发现问题，轻则搜宅抄家或拘留审查，重则被逮捕入狱或遭杀害。他们就是利用这种办法监视和迫害进步作家的。

（三）**大肆进行逮捕和屠杀**。日本对东北沦陷时期的文艺统治，从来都是采取文武两手进行的。文的主要是用其创作鼓噪宣传，或是收买和利用汉奸文人监视左翼文艺家的活动；武的则是逮捕和屠杀，以此镇压反满抗日作家。1935年罗烽被捕入狱仅仅是个前奏，1936年“黑龙江民报事件”就进行屠杀了。在被逮捕的90余人中，有5人被杀害，其中著名作家金剑啸、《黑龙江民报》社长王甄海、记者阎达生就是在这次事件中惨死在日伪的屠刀之下的。1937年“哈尔滨口琴社”的主要成员侯小古、王家文、陈笑岩、柳峤、沈玉贤（女）、李范哲、聂其瑙、孔繁绪、陆怀章、金真淑（女）、崔昌林（女）、聂宜慈（女）等12人被捕入狱，其中王家文判刑5年，侯小古判死刑，英勇牺牲，这就是闻名全哈尔滨市的“口琴社事件”。上述这两次事件虽然是发生在黑龙江一省，但它却使整个东北文艺界笼罩上一股越来越紧张的白色恐怖空气，最后终于酿成震惊东北的“左翼文学事件”。

为了扩大侵略的太平洋战争，维持和巩固大东亚新秩序，把文艺尽快地引向战争轨道，日本侵略者于1941年12月30日，在全东北实行大逮捕，次日半夜又进行了一次，这就是所谓的“左翼文学事件”。在这个事件中遭到逮捕的有：关沫南、陈隄、王光逖（司马桑敦）、刘丹华、李季风、高德生（杲杳）、牢罕、赵文选、李默、问流（刘鸿云）、温成钧（艾循）、驼子、张烈、刘荣久、马成龙、陈东升、孙海峰、王德麟等。他们在狱中被严刑拷打，摧残折磨，这之中温成钧遭虐待病危，保释出狱后

死于长春悦来客栈，问流也因受尽折磨保释后死去，刘荣久被判徒刑绞死，马成龙被判无期徒刑惨死在狱中，陈东升在押解途中自己撞车身亡，孙海峰为保护战友跳楼殉难，王德麟被放在日本犯人一起折磨致死。这是日本进行法西斯文艺统治欠下的又一笔血债。此后虽然没有进行大的逮捕和屠杀，但是迫害爱国进步文化人士和左翼作家的事仍时有发生。1943年田琳被捕入狱，1944年田贲、铁汉、鲁琪、王天穆等也被投进监牢，就是在北京的李克异，也于1942年被关进日本的监狱之中。日本侵略者就是想通过大肆的逮捕和屠杀，企图消灭反满抗日的爱国文艺。

但是，继承了“五·四”新文学革命光荣传统的东北文艺，是消灭不掉的。它虽然由于日本的殖民文艺统治而一时显得景色萧条，但同时在高压之中也孕育着一种更大的反抗力量，这力量必将促进东北新文艺时代的早日诞生。果然，日伪垮台后，东北沦陷时期的文艺挣脱了枷锁，重新回到了祖国的怀抱之中，并以新的姿态走向发展和繁荣。

（摘自《社会科学战线》1990年第二期）

东北沦陷时期的文学概观

冯为群

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45年“八·一五”光复，东北被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和蹂躏了整整十四年，人们通常把这段时间，称为东北沦陷时期；而反映这一时期生活的文学，就被称作是东北沦陷时期的文学了。

那么，究竟怎样正确认识东北沦陷时期的文学呢？下边谈谈我的一些不成熟的看法。

东北沦陷时期的文学是
“五·四”新文学的继续和发展

东北新文学的兴起虽然来得较晚，但在“五·四”新文化、新思想的影响下，却也逐渐地成长和发展起来。早在1921年左右，有些人就提倡和宣传新文化运动，到了1923年以后，随着革命形势在东北的不断发展，鼓动新文学的人越来越多。有的相继组织起一些比较进步的文学社团；有的不仅提出了较为鲜明的革命文学的主张，而且还创作出了一些具有清新思想内容的作品，使得东北这块文学的沃土，在“五·四”新文学浪潮的波及下，颇有点旧貌换新颜之势。

然而，这种局面没有维持多久。1931年“九·一八”事变的炮火，不仅摧毁了东北大地，也摧毁了正在发展着的东北新文学。报馆倒闭，期刊停办，人员逃亡，刚刚发展起来的新文学，一时处于死寂状态。但自1932年起，日本帝国主义出于扩大对中国的侵略、向人民灌输奴化思想、宣传所谓“王道乐土”、“日满协和”、“共存共荣”的政治需要，很快就让一些报纸恢复出版，这在客观上，使东北沦陷时期的文学得以利用这个条件复苏起来。本来，东北的新文学在继承“五·四”文学传统上，于事变之前就有了一定的社会基础，发表在报纸副刊上的文学作品，因具有新的生活气息而在广大读者中产生了一定的积极影响，于是，复刊后的报纸又在日寇不大注意的角落办起了文艺副刊，这就为东北新文学的恢复和发展，提供了一块阵地。

勿庸讳言，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和法西斯的文化统治，

使东北新文学的发展受到了很大的影响，呈现出了一种特殊的形态，在某种程度上，带有一定的殖民地文艺的色彩。但文艺的殖民主义化却远较那些海盗式的抢劫、资本的输出、商品的倾销、原料的掠夺等等，要困难得多。因为，一个国家的领土有可能被殖民主义者所霸占，但是，一个民族的文化和人心是永远也不会被征服的。正因如此，所以沦陷后的东北新文学，其主流仍然继承了“五·四”新文学的光荣传统。其主要表现是：

（一）反帝反封建是当时文学的基本倾向。如果说沦陷前的东北新文学还是以反封建为主要内容的话，那么在日本帝国主义入侵以后，由于民族矛盾的加剧，所以反帝的主题已经成为许多作家十分关注的问题了。但迫于日伪逐步加强的残酷的文化统治，一些作家不敢公开暴露自己的思想，只得在反封建的内容中渗透出反帝爱国的斗争精神；加之在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已经勾结在一起，共同对付反满抗日力量的情况下，所以反封建的本身就具有了反帝的重要内容。仅以小说为例，“九·一八”事变之前的创作，虽然也大多取材于被剥削被压迫的劳动人民的生活和男女青年的爱情故事，但它所反映的却是封建主义的剥削形式和个性解放的要求，可是事变之后就显然不同了，由于作家把国土沦丧作为大背景来展现，并调动一切艺术手段，无情地暴露当时的社会黑暗与丑恶，所以无论是描写农民的悲惨遭遇，还是反映工人的痛苦生活，抑或是表现男女情爱的悲剧，无不打上那个时代特有的印记，带有一种忧国忧民的情怀。比如山丁、秋萤、袁犀等人的作品，表面看，作家所描写的无非是封建统治下生活在底层人们的悲苦命运，但其锋芒所指，却是日本帝国主义这个比封建势力更为凶残的敌人。这种反帝反封建的文学倾向，正是“五·四”文学革命的一种反映。

（二）沦陷后的东北新文学推进了文学革命的进程。在这方面，表现最为明显的，首先是由文言到白话的急剧过渡。早在1919年，东北的报刊由于受“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有的就已经采用了白话文，但迟迟没有推开。可是到了1932年事变后复刊的报纸，几乎普遍使用了白话，摒弃了文言。这种由文言到白话的急剧过渡，充分地体现了适应大众反帝反封建需要的文学革命的精神。其次是由报纸副刊向文艺期刊的发展。寄附于报纸副刊是东北沦陷时期文学的一个特点，这一特点在沦陷前期表现得尤其明显。如大连的《满洲报》、《泰东日报》、《关东报》；沈阳的《盛京时报》、《民报》、《大亚公报》、《奉天公报》、《奉天日报》；哈尔滨的《国际协报》、《哈尔滨公报》、《哈尔滨新报》；长春的《大同报》等，都先后创办了文艺副刊，其中有些文艺副刊成为当时坚持中国新文学传统的一些文学社团的社刊。这些社团，以此活跃文学创作，介绍和引进外国的新文学思想和文学作品，宣传他们的文学主张，有力地推动了沦陷时期东北新文学的发展。可是到了1937年以后，一些新的文艺刊物，如《明明》、《斯民》、《麒麟》、《艺文志》、《文选》等先后问世，才使新文学基本上摆脱了对报纸副刊的寄附关系。作为发展新文学的园地，文艺期刊对推进文学革命的进程，显然是报纸文艺副刊所无法比拟的。

（三）文艺论争促进了沦陷时期东北新文学的发展。“九·一八”事变之前，许多热衷于东北新文学发展的人，虽然也提出过一些文学主张，但却始终没有因某些文艺观点的不同而展开什么大的争论。可是到了“九·一八”事变之后，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和斗争的需要，文艺论争也相继展开。规模较大、而且对沦陷时期东北文学的发展确实有很大影响的主要有三次：

一是1935年由王孟素发起的关于建设东北文坛的论争。这场论争，是在东北的抗日斗争进入了更加艰苦的阶段，文艺界的一些爱国进步的作家，如舒群、萧军、萧红、罗烽、白朗等人先后流亡关内，有些报刊的文艺版面充斥着低级下流和歌功颂德的文学，许多文学青年虽然不满于当时出现的言情和歌功之作，但他们自己所写的一些作品却往往趋于感伤和颓废，在黑暗的社会现实面前，表现出了一种悲观失望的心理和逃避现实的情绪，在对人生感到渺茫，对前途失去了信心的情况下展开的。王孟素针对这种不良倾向，发出了建设文坛的呼声。他从唯物史观出发，辩证地论述了文学与生活、文学与社会的关系，提出了文学必须描写现实、反映人民生活的要求，这在当时来说，是很有现实意义的。但由于他的文章涉及到了"响涛社"成员石军的创作，所以引起了该社成员的反对，导致了长达一年之久的论争。尽管幼弱的东北文坛缺乏正确思想的指导和进步理论的培植，使论争不免肤浅甚或出现无谓的纠纷，但它的实际意义是不可低估的。因为就其实质看，这是一场坚持文学的现实主义原则、反对歌颂"王道乐土"、"日满协和"、宣泄"感伤颓废"的文学，提倡振奋的、爱国的、反抗的文学的大论争。通过这场论争，使大家提高了对文学使命感的认识，明确了文学创作的任务。

二是1937年由山丁的《乡土文艺与〈山丁花〉》一文引起的关于"乡土文艺"的论争。山丁在评论疑迟的短篇小说《山丁花》时指出：它是"一篇代表乡土文艺的作品"，并且强调"满洲需要的是乡土文艺，乡土文艺是现实的"。他的这一观点，遭到了以《明明》为阵地的一些成员的反对。他们认为，提倡"乡土文艺"，无非是"大豆高粱的唾余"，一句"漂亮的口号"，没有多大的实际意义。吴郎等人支持山丁的观点，认为"乡土

文艺”所倡导的面向“现实”的主张，是适应当前社会意识需要的，它比那种脱离现实的唯美主义要有价值得多。双方意见针锋相对，论争持续一年多尚未停息。这场论争的实际意义，远远超出了对一篇小说的评价范围；不管论者是有心还是无意，从客观上看，“乡土文艺”的论争对殖民主义文艺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多年来，日本帝国主义一直卖力地宣扬和制造所谓的日本民族“种族优越”的荒谬文艺理论，企图泯灭东北文学的民族意识。而“乡土文艺”的提出，把反映社会现实、把握时代意识、创作具有民族和乡土特色的作品作为重点，其锋芒所指是不言而喻的。此外，“乡土文艺”的提出，对风花雪月和色情文艺以及文学的复古倾向也是一个不小的打击。当然，这场论争由于染上了宗派主义色彩和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没有充分地争论下去。

三是1938年以古丁为首的“写与印”和以山丁为首的“热与力”的论争，在《明明》杂志创刊之始，古丁等人就打出了“写印主义”的旗帜，待到这个刊物的影响继续扩大之后，他们就有点目空一切了，好像文坛的振奋就是他们的功劳。这引起了山丁等人的反感，认为文坛的一度勃兴并不是几个人的努力，而是共同创造的结果，古丁等人能够比较大量地出版作品，也不是因为他们的创作就高于别人的水平，而是依靠日人的权势和资助。于是，在这种不满情绪的激愤下，他们针对盲目性的“没有方向的方向”、只顾多写多印的“写印主义”，提出了“描写真实”、“暴露真实”的“热与力”的主张，展开了持续三年之久的论争。从总的倾向看，文艺界的更多的人士越来越认清了“写印主义”脱离现实、靠近官府的发展趋势，而“热与力”所提出的“描写真实”、“暴露真实”，才是时代赋予沦陷时期东北文学的真正使命。

对于当时文坛的论争，有些人认为是意见不和、口角之争；无谓的论战，没有真正的批评；分裂文坛，文化的罪人；阻碍文艺的发展，毁灭新文学的前程。其实，沦陷时期东北文学的几次论争，使文学由几度衰微转向了复苏、发展和振兴。1935年文坛建设的论争之前，文学还只能是依附于报纸副刊而存在，可是论争以后，由于大量期刊的问世，发表文艺作品的园地也扩大了；接着便出现了由短篇进入中篇、再进入长篇的创作；出版文艺作品的数量也大大地超过了从前；至于创作质量和文艺理论水平的提高，特别是论争拨正了文学的航向，启发和引导了一些作家及文学青年，注意在自己的创作中反映人民所普遍关心的现实问题。所有这些，都使我们充分地看到了东北沦陷时期的文学，确实是坚持和发扬了“五·四”新文学的传统。

爱国抗日的主题是东北
沦陷时期文学的突出内容

自从东北沦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以后，东北人民就没有停止过反抗和斗争，这中间虽然有国民党奉行的不抵抗政策的干扰，但广大人民还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文学既然是现实生活的反映，那么，它就不能不对这段生活的历史有所描述。从日本强占东北的那天起，徒然、绿波、铁章、曼平等人，就以通讯报道的形式写了不少文章，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法西斯罪行，痛斥了伪国汉奸的无耻行径，反映了东北人民爱国抗日的强烈愿望和要求。不过，真正以爱国抗日斗争为主题的文艺作品，还是在1933年以后才陆续出现的。

当时，反映东北人民爱国抗日斗争生活最为鲜明的，是《大同报》的文艺副刊《夜哨》和《国际协报》的文艺副刊《文

艺》上发表的作品。《夜哨》创办于1933年8月，由共产党员作家金剑啸和罗烽等同志根据党的指示进行筹划，通过萧军同志组稿和出面与编者陈华联系，有组织有计划地撰写反满抗日的文学作品。这样，《夜哨》便成了党领导文艺进行抗日斗争的重要阵地了。为该刊撰稿的主要作者有：洛虹（罗烽）、剑啸（金剑啸）、黑人（舒群）、三郎（萧军）、悄吟（萧红）、梁倩（邓立）、文光（署名“星”）、刘莉（白朗）、权（陈华）等。从所发表的作品看，《夜哨》不愧为进军的号角。它有时发表以描写广大农民被剥削、被压迫的悲惨遭遇为内容的作品，揭露统治阶级的凶狠和残暴，暗谕封建势力和当时的黑暗政权在荼毒人民方面狼狈为奸的情景；有时也发表以反映效忠敌伪、甘做鹰犬的民族败类为题材的作品，揭示那些卖身投靠者的丑恶灵魂；有时甚至发表直接借人物之口高呼《国际歌》中“起来，全世界的奴隶，起来，全世界的罪人”这样的《国际歌》词中非常具有鼓动性的词句，以表现人民的强烈爱国热情和誓死抗日到底的决心。但由于《夜哨》的锋芒太露，所以引起了敌伪的注意，特别是以抗日斗争为题材的文光的《路》连载以后，就更加引起了敌人仇视。迫于这种严重的形势，刊物很难再继续的办下去，因此编者陈华以“权”为笔名，发表了题为《夜哨的绝响》一文，结束了这个只出21期就于同年12月停办的、被人称为“抗战文艺先锋”的报纸文艺副刊。

但是，时隔不久，以萧军、萧红、罗烽、白朗、金剑啸、山丁等这些曾经围绕着《夜哨》创作反满抗日文学作品为首的同志，又于1934年1月，在哈尔滨的《国际协报》上，开辟了新的文艺阵地——《文艺》周刊，由白朗担任主编。该刊仍然保持着《夜哨》的战斗风格，它所发表的作品有很强的现实性和战斗性。如对当时农村的动乱、城市的破产、经济的萧条、阶

级的对立、民族的危亡等方面内容的描写，以及对宣扬“日满协和”、“王道乐土”的粉饰文学的批判，都在该刊发表的作品中有所反映。后来，由于日伪对文艺统治的加强，不少进步作家先后离开了哈尔滨奔赴祖国内地，所以使得《文艺》周刊也只出了48期，就于年底停刊了。

进步作家的出走，《文艺》周刊的停办，虽然使当时的文学界较前沉寂了一些，无论是组织活动还是文学创作，都缺乏从前那种活跃的气氛了，但是，留在东北的作家，如金剑啸、山丁等人，仍然团结一些进步的文学青年，在更为艰苦更为危险的条件下，继续从事着文学斗争。

金剑啸是30年代革命文艺的传播者，1931年他从上海回到哈尔滨以后，就把党所领导的新生的革命文艺气息带到了这个北方美丽的名城；并且以他能歌、善画、酷爱诗文的多方面艺术才能，传播着革命文艺的新风新雨。“九·一八”事变后，他利用绘画、诗歌、小说、戏剧、音乐等艺术形式，进行反满抗日的宣传和斗争。他在《夜哨》和《文艺》两个副刊上发表的小说《星期日》、《夏娃的四个儿子》、《云姑的母亲》，诗歌《白云飞了》，剧作《穷教员》、《艺术家与洋车夫》、《黄昏》、《母与子》等，都对当时黑暗的社会进行了无情地揭露和抨击，表现了作家对祖国的热爱和对敌人的义愤。正因如此，他为反动的日伪当局所不容，迫于白色恐怖的客观形势，他不得不于1935年离开了哈尔滨到齐齐哈尔去了，担任了《黑龙江民报》的文艺编辑工作。不久，他在自己主编的文艺副刊《芜田》上，发表了以歌颂东北抗日联军斗争生活为主题的著名长篇叙事诗《兴安岭的风雪》的部分章节，显示了沦陷时期东北文学抗日爱国的革命精神（这首诗曾于1938年8月，在上海由白朗、金人主编的“夜哨丛书”出版单行本）。后来他又回到了哈尔滨，担

任《大北新报》画刊的主编。由于他在该刊上刊登了苏联的伟大作家高尔基的照片和病重的消息，而被日寇驻哈尔滨总领事馆高等系特务逮捕，于1936年8月15日，在齐齐哈尔被敌人杀害，时年27岁。

山丁是“乡土文艺”的倡导者。早在1934年，他就和萧军在哈尔滨研究过“乡土文艺”的问题，决定“先从暴露乡土现实做起”，振兴和发展沦陷时期的东北文学；而后，在他为“满洲新文学大系小说上卷”写的“导言”中，借陈华文章里的话进一步表达了对“乡土文艺”的看法，认为“越是质朴坚实的土壤中才会生出硬花果，满洲确是这样的在作品中嗅不出舶来的香水油，却有着浓烈的沃土高粱气息，活动着的人物也是质朴的，而且有着强韧的忍苦耐劳的大陆性。当时他们是不太完美的，然而那是完美的开始”。同时，他还在《斯民》上，发表了专门论述“乡土文艺”的文章——《乡土与乡土文学》，表达了他致力于“乡土文艺”的决心和愿望。他主张创作具有地方特色和乡土风情的作品，要求要把着眼点放在“暴露乡土现实”上。当时的现实是什么？是日本帝国主义的血腥统治和镇压，使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因此，描写真实、暴露真实就成了“乡土文学”主张的真实含义了。因为在国土沦丧的东北大地，破坏地方特色和乡土风情的罪魁祸首是日本侵略者，文学不描写和暴露这个真实就没有办法去实现自己的“乡土”愿望。在这个意义上，山丁提倡的“乡土文学”，实际上就是反抗侵略的爱国主义文学。尽管由于当时有些人很不理解并由此展开了一场较大规模的论争，但是，包括那些反对“乡土文学”主张的人在内，也自觉或不自觉地写出了一些具有反抗意识的作品，把“乡土”的概念扩大到“民族”的范畴。而山丁本人则以自己的创作实绩，实践着他的文学主张。他的短篇小说集

《山风》中的九篇小说，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侧面，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下的东北人民的悲惨遭遇，表达了作家对乡土对祖国无比怀恋和热爱的深厚感情。如果说《山风》、《织机》、《狭街》、《臭雾中》、《北极圈》和《壕》等小说，只是通过对不同职业不同阶层的人们悲苦命运的描写，透视出日伪统治者的凶残面目的话，那么《孪生》中所表现的对于故土乡情的热爱，分明是对日本帝国主义所施行的归村并屯、制造无人区的烧光、杀光和抢光的“三光政策”的一种强烈的反抗。总之，山丁的短篇小说，包括1942年出版的短篇小说集《乡愁》在内，把描写乡土风情和揭露日伪的残酷统治紧密地结合起来，充分地暴露了那个黑暗社会的真实情景，表现了作家敢于和反动的社会现实进行搏斗的顽强抗争精神。他的长篇小说《绿色的谷》，以东北的广漠农园山村为背景，描写了一个叫做“狼沟”的边远山村的变化，展示出了那里的一些小人物的不幸的命运。作品虽然把背景放在了“九·一八”事变之前，但是所描写的内容则完全是事变以后所发生的事情。也许就是因为这样，这部小说曾遭到了扯页，并加盖“削除剂”印章，以示小说有较严重的思想问题。从这里也可以看出这部作品所具有的反满抗日的进步内容。

此外，像王秋萤、袁犀、李季风、疑迟、关沫南、陈隄、田琳、金音、冷歌、杲杳、梅娘、韩护等作家的作品，也都不同程度地反映了东北人民的苦难历程和反满抗日的斗争生活。特别值得提到的是：在东北沦陷的十四年中，王秋萤创作和发表了几十篇作品，从未以伪“大同”或“康德”的年号在文末标明，更没有在作品中对所谓的“日满亲善”、“共存共荣”之类的侵略宣传表示过阿谀奉承。绝大多数作家也都保持了民族气节，并把爱国抗日的思想感情倾注在自己的作品之中。

当然，也有一些人在东北沦陷时期写了些歌功颂德、粉饰太平的作品，对人民起了麻痹的作用；不过这些人并不都是死心塌地要做汉奸的，因此不能轻易就说谁是汉奸文人。公开在诗词文章中美化日伪、歌颂侵略的民族败类，毕竟是极个别的。所以说，就其总的倾向看，爱国抗日的主题始终是东北沦陷时期文学的主流。

抗联文学是东北沦陷时期文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在东北沦陷时期的文学中，反映抗日联军斗争生活的文学作品，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人们通常把它称之为“抗联文学”。

日本帝国主义的野蛮侵略，激起了东北人民的无比愤慨，从日本出兵强占了沈阳的那天起，东北人民就采取各种形式进行反抗和斗争。由游击队、义勇军、救国军和山林队等，直到东北人民革命军、反日联合军和抗日同盟军等各种抗日武装发展而成的东北抗日联军，在中国共产党的直接领导下，根据“八·一”宣言的精神，坚决执行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团结各抗日力量，采取游击战术，灵活机动地打击敌人。尽管后来敌人集中了大批的优势兵力进行讨伐、扫荡，致使抗日联军处于极端困难时期，但是抗联战士仍然坚持不屈不挠的斗争。反映抗联生活的文学作品，对这场为争取民族独立、自由和解放的伟大斗争做了真实的反映。

在抗联文学中，抗日诗词最为突出，影响也最大。一些抗联将领不仅领导部队同敌人做殊死的搏斗，而且创作了大量的诗词，以文艺为武器教育战士，打击敌人。杨靖宇的《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歌》和《中朝民族联合抗日歌》，气势蓬勃豪迈，是鼓舞战士英勇杀敌、唤醒中朝民族团结抗日的战歌。李兆麟

的《第三路军成立纪念歌》和《露营之歌》，反映了抗联的艰苦生活，成为号召战士肩负起救国重任、完成民族解放战争光荣使命的号角。李延平的《游击队》，表现了游击战士在党的领导下，克服困难，坚持把抗日游击战争进行到底的决心和勇气。宋占祥的《跃进啊，中国！》，激励战士冲破阴霾黑暗的社会，向日本法西斯和他的爪牙冲杀。冯志刚的《浪潮歌》，描绘出使敌伪难以逃脱的革命战争的滚滚洪流。吕大千的《狱中遗诗》，抒写了蕴藏在人们心中的怒火中烧般的反满抗日的心情。李斗文的《告伪军兄弟书》，规劝伪军反正，共同投入挽救中华民族危亡的正义斗争。这些诗词，以其鲜明的战斗性、广泛的群众性和强烈的宣传鼓动性，博得了广大人民、特别是抗联战士的热爱，同时也有力地打击了敌人。因为创作这些诗词的抗联将领，既是指挥员又是战斗员，他们不但同战士们同甘苦共患难，而且和人民群众也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所以他们所写的诗词，最有针对性、鼓动性和战斗性，也最能反映斗争的真实情况，代表人民的意愿和要求。又由于这些诗词文字比较浅显易懂，语言也很朴素单纯，韵律又铿锵和谐，读起来朗朗上口，所以被群众广泛地传诵。如李兆麟的《露营之歌》，不少战士和群众能够背诵，诗中的"围火齐团结，普照满天红"、"烟火冲空起，蚊吮血透衫"、"草枯金风急，霜晨火不燃"、"火烤胸前暖，风吹背后寒"等诗句，已经成为脍炙人口的佳句被传诵着。杨靖宇的《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歌》，不仅当时激起过无数东北人民"杀敌救国复河山"的铁血意志，而且至今还被当代青年所演唱，成为教育人民、特别是青年的很好教材。

抗日歌谣，作为大众化的一种文学形式，也在人民群众中广泛地流传着。它先是由抗日游击战士作为传单油印散发，后来逐步地普及到广大群众之中。这些无论是出于抗日游击战士

之手，还是出自抗日群众之口的歌谣，都无情地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热情地歌颂了抗日战士和人民群众抗日救国的英雄事迹，深刻地反映了抗日斗争的艰苦生活，充分地表现了人民群众抗敌御侮的爱国主义精神。就其内容看，在抗日歌谣中，首先是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和反映人民群众奋起抗战的歌谣占绝大部分。日军侵占东北以后，蒋介石下令不准抵抗，但是，东三省的人民和一部分爱国军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协助之下，不执行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组织起义勇军和游击队，同日本侵略者进行英勇的斗争。当时在东北义勇军中流传的一首歌谣《上起刺刀来》，就充分地表达了这一点。还有，《国耻纪念歌》、《长白山歌》、《归屯歌》、《四季歌》、《骂老廉》、《上前线》、《奋斗曲》、《抗敌》、《从军行》、《组织起来去冲锋》等，也都在不同的时期随着斗争的需要应运而生，并在抗日队伍和人民群众中广泛传播，显示了中国人民同仇敌忾的爱国热情和不甘屈服的抗敌精神。其次是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歌谣占有重要的地位。《全国抗战歌》、《民族解放歌》、《统一战线歌》、《劝亲日士兵反正》等，都旗帜鲜明地宣传了我党联合抗日一致对外的政治主张。这些歌谣，对争取和联合一切抗日的力量，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因而深受广大群众的热烈拥护。再次是歌颂党的领导和反映抗日战士斗争生活的歌谣也为数不少。《共产党有主张》、《革命十二月》、《贫农四季歌》等，都从不同的方面，以真挚动人的感情，歌颂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斗争；《满洲游击队歌》、《义勇军四季游击歌》、《西征胜利歌》、《莲花泡战斗》、《囚牢吼声》、《追悼歌》等，比较全面地反映了抗日战士的生活和斗争，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侧面表现了他们的革命英雄主义气概，显示了人民群众对战士们的热爱之情。最后是对少年儿童参加抗日斗争的情况，也

在抗日歌谣中有所反映。《儿童抗日歌》、《少年先锋队歌》等，反映了少年儿童对东北抗日联军由衷的热爱，表现了那些幼小的心灵对侵略者的仇恨，也和成年人一样武装起来，同敌人进行顽强的斗争。尽管这方面的歌谣不多，但作为男女老少一齐动员的全民抗战，少年儿童毕竟也是一支不可缺少的抗日力量。

此外，在抗日的歌谣中，也有一些是反对封建婚姻和揭露尖锐阶级矛盾的，不过，反映这方面内容的歌谣，都是与抗日战争的总主题联系在一起的。因为号召人民起来反抗封建的买卖婚姻和地主阶级的残酷压迫，也是为了动员人民起来进行抗日斗争，所以这些歌谣也自然地深受广大群众的喜爱和欢迎。

革命的戏剧和小说、散文的创作，在抗联文学中也很活跃。在创作和演出的戏剧中，主要的是话剧和歌剧这两种艺术形式，特别是话剧，它以其深刻的思想内容和生动感人的情节冲突，受到了广大群众的喜爱。当时影响较大的是杨靖宇将军创作的话剧《王二小放牛》和朝鲜族抗日战士创作的多幕剧《血海之唱》，这两部剧作，以较为深刻的思想和广阔的生活画面，形象地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讴歌了汉、朝两个民族之间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小说和散文的创作，主要是由党直接领导的革命作家写的。如萧军的《八月的乡村》和骆宾基的《边陲线上》等作品，虽然不是在东北写成出版的，但对东北的抗日斗争和沦陷时期的东北文学，却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总之，东北抗联文学是伴随着抗日的烽火诞生，在艰苦的斗争中发展，在日伪的高压统治下成长壮大起来的，虽然它没有什么宏篇巨著，但是作为党所领导的不可缺少的一条文艺战线，却记载和反映了东北人民抗日斗争的真实生活。如果说东北沦陷时期的文学继承和发扬了“五·四”新文学反帝反封建的光荣传统的话，那么，在这之中的抗联文学则起到了积极的

模范作用。正因如此，抗联文学不但具有极其宝贵的史料价值，而且至今仍有着深刻的现实教育意义。

描写真实，暴露黑暗，隐喻光明，是东北沦陷时期文学的基本特征

在东北沦陷初期，因为日本帝国主义忙于扩大对中国关内的侵略。所以一时还来不及对文艺统治得那么严格，可是到后来，由于阶级矛盾的日益加深和民族矛盾的逐渐尖锐，法西斯的文化统治也就相应的加强起来。但尽管这样，广大的爱国作家和一些文学青年，还是通过自己的创作实践，表明了对黑暗社会的强烈不满和对被奴役被压迫的劳苦大众的深切同情。不过，当时的许多作家，由于缺乏一种正确的革命思想的指导，加之自身处境的艰难，所以在日伪高压的文化统治面前，感到孤立无援，空虚寂寞，甚至对抗日的前途失去了信心。带着这种思想情绪进行创作，就自然地把悲观和失望的情调反映在作品之中；虽然他们也描写了真实、暴露了黑暗，但却没有预示出光明。正如当时较有影响的文艺批评家王孟素指出的那样："尽给作品的人物以绝望，正如那些尽给作品的人物以出路，同样是空虚的感情。"可是，在那个血雨腥风的年代，作家能够不回避社会的矛盾，敢于面对现实生活，抒写郁闷在广大群众中的思想感情，这自然地就形成了当时的作品以暴露社会黑暗为主的倾向。对于这种倾向，早在1937年左右，在东北的日人文艺评论家就有所发觉，到了1939年以后，在出版的许多作品中表现的更为突出，所以日人文艺评论家不仅对这种"暗"的趋势和倾向进行指责，而且配合《文艺指导纲要》的宣传，规定不许在作品中描写黑暗面，不许在作品中流露出悲观和失望的情绪。但是，陷入水深火热的东北人民，他们面对着沦丧的国土，

整个生活充满着剥削、压榨、欺凌和掠夺，这叫那些有良心、有爱国热情的作家们，怎能不去真实地反映他们的生活，暴露当时社会的黑暗，揭露日本帝国主义所造成的民不聊生的苦难情景呢？作家山丁针对日人文艺评论家的指责，在《〈去故集〉的作者》一文中写道："'暗'——这是在满日系批评家一致对满系作品的观念批评，我们读了人家的评文仿佛有许多话要辩驳，其实辩驳也无益处。八不主义（即不许写黑暗面、不许写悲观和失望等——笔者）不是明晃的颁在那里吗？有时也自己解剖自己问自己，我们为什么不明朗起来呢？我们是活在以写穷人为可耻的土地吗？秋萤的作品是刻画暗的。这暗则是'明'的希求，是'明'的征候。我们的作家仿佛是一辞送葬的歌手，倘能唤出新的，相信也会奏出健康的明朗的声调的。"最后，他通过对秋萤作品的具体分析进一步指出："由这里也可以看出作者的暗的源泉，这暗该是如何隐藏着一束向上的灵魂的痛苦。"作品所以描写黑暗，并不是作者的"消沉与颓靡"，而是"时代的形成时代的写照"。山丁的话，充分地揭示出了当时文艺创作的"暗"的特征、"暗"的根源和"暗"的意义。

统观东北沦陷时期的文学创作，就可以看出描写社会黑暗已经成为绝大多数作品的主要内容了。山丁的《山风》、《乡愁》、《绿色的谷》等小说和诗集《季季草》；秋萤的短篇小说集《去故集》、《小工车》和长篇小说《河流的底层》；袁犀的《泥沼》（短篇小说集）、吴瑛的《两极》（短篇小说集）、梅娘的《第二代》和《小姐集》（均为短篇小说集）、疑迟的《花月集》、《风雪集》和《天云集》（均为短篇小说集）、田琅的《大地的波动》（长篇小说）、小松的《北归》（长篇小说）、田琳的《安获和马华》（中篇小说）、关沫南的《蹉跎》（短篇小说集）、成弦的诗集《青色诗抄》、金音的诗集《塞外梦》、冷歌的诗集《船

厂》、杲杳的诗集《日笛》、外文的诗集《刀丛集》、古丁的诗集《浮沉》和杂文集《一知半解》、季风的杂文集《杂感之感》、石军的《沃土》（长篇小说）、励行建的《风夜》（短篇小说集）、百灵的诗集《未名集》、徐放的诗集《南城草》、柯大的《燕》（短篇小说集）、柯矩的《乡怀》（短篇小说集）等，都程度不同地暴露了社会的黑暗，暗示出日本帝国主义的野蛮和凶残，反映了在黑暗深渊里进行挣扎的劳动人民的痛苦生活。

这些作品，暴露社会的黑暗主要是通过人物形象的塑造和凄苦命运的揭示来完成的。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作者所描写的几乎都是一些被侮辱、被损害、被践踏的社会最底层的人们。这里尤以山丁、秋萤的小说最为突出。山丁的《织机》里的林师傅、《狭街》里的刘大哥、《北极圈》里的大青嫂、《孪生》里的铁柱，等等，都是在死亡线上挣扎的一群苦难者的形象。他们生活在阶级压迫和民族灾难深重的年代里，在走投无路中挣扎着求生，悲惨的死去。秋萤的一些小说，无论是长篇还是短篇，在对人物命运的刻画上，基本上都是以被社会所吞噬的一群最底层的人们为主要内容。作者以现实生活为依据，把那些苦难的形象放在最典型的环境之中，让他们几经折磨，最后不得不以悲惨的结局而告终——不是在饥寒中、在监牢里死去，就是在惶恐中、在绝望里逃走；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情景，真是令人不忍目睹。不过，他的作品和山丁的一样，给人的感觉不是绝望而是仇恨，是对那使人走向痛苦、走向死亡的黑暗社会的不满、抗议和斗争；有些作品，还隐约地使人在黑暗中看到了一线光明。袁犀的《泥沼》中的一些小说，不仅反映了东北沦陷时期劳动群众所遭受的劫难，而且也尽量地让他的形象显现出社会的原因。比如，他的《一只眼齐宗和他的朋友》，不但没有因揭露社会的黑暗而使人颓丧，相反，它通过真实而生动

的形象，使人看到了一个敢于在黑暗中追求光明的崇高灵魂。总之，在当时文网杀人的情况下，不少作家能够做到暴露黑暗（尽管不是十分露骨的）就已经是难能可贵的了，那么，在暴露黑暗的同时，还能够为人们指出一条生路，那就更不容易了。

日伪对文艺的统治和摧残是东北沦陷时期的文学不能健康发展的根本原因

文学是现实生活的反映。日寇的侵略，国土的沦丧，人民的痛苦，民族的灾难，以及反满抗日的斗争等等，这些自然都是文学反映的对象，当然也能成为文学作品的主题，变成培育文学成长的土壤。但是，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实行了殖民主义的文化统治，所以使得文学反映生活的功能受到了种种的限制，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如果说东北沦陷初期日伪的文化统治还不是那么严密的话，那么，随着抗日斗争的发展和日本侵略范围的扩大，对文化的统治也就随之加强了。

弘报处，是日伪进行思想文化统治的中心机构。这个机构在伪满洲国初期，围绕着建设所谓的"独立的新国家"进行分割中国的反动宣传；打击和镇压东北人民的抗日力量；统管伪国的新闻、出版等文化宣传事业。到了1937年，弘报处就成为控制舆论、控制文艺、管理出版等一切方面的总统辖机关了；待到日伪末期，伪弘报处的职能再次扩大，它把伪治安部、伪交通部、伪民生部、伪外交部等对文化宣传事业的职权，统一纳入了自己的管辖之中，并且与日本关东军紧密配合，成为伪满国文化宣传的统治核心。伪国公布的《出版法》、《通讯法》、《新闻法》、《记者法》、《文艺指导纲要》等，统由伪弘报处制定，同时还通过各地的弘报机构，加强法西斯的文化统治。当时领导文艺创作的部门所作的计划和作家写出的作品，都要送到弘

报处去审查、备案；对于带有民族意识和反满抗日倾向的文艺作品，一律禁绝出版；对于革命的爱国进步的作家严密进行监视，有的被投进监狱关押，甚至惨遭杀害。舒群、萧军、萧红、罗烽、白朗等作家之逃往关内；田琳、李季风、关沫南、陈隄、田贲等作家之被监禁；金剑啸等作家之被残杀，都是伪国务院总务厅弘报处配合日本宪兵队对进步作家和爱国文学进行迫害、摧残的罪证。特别是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日本侵略者大肆鼓吹"决战文艺"、"圣战文学"，极力把文学纳入战争的轨道。并且在贯彻有日伪代表参加的"大东亚文学者大会"精神的"决战文艺家大会"上，日本关东军报道部部长长谷川宇一作了《战争与文艺》的报告，号召日伪作家行动起来，为侵略战争而写作。于是，一大批日伪作家被组织起来，分别到兵营、到前线、到工农业等各部门去做"报道员"，为败退无望的侵略战争大肆鼓噪。从而使文艺完全成为侵略战争的附庸。这时，一些有爱国思想的进步作家，在日伪文化统治的白色恐怖中，有的含恨停笔，有的在大逮捕中被抓进监牢。因此，在东北沦陷的最后几年，可以说几乎没有什么真正的文艺可言了。

但文学的沉默，是当时社会黑暗的一种反映，也是日伪的反动统治即将垮台的征候。果然，没过多久，日本帝国主义就投降了。当结束了十四年殖民主义统治的炮声在东北大地一声巨响之后，社会摆脱了黑暗，人民重见了天日，文艺也从死寂开始走向了新生，一向具有爱国主义传统的东北文学，又复苏在解放战争的隆隆炮声之中了。

（原载《社会科学战线》1987年第二期）

抗战时期的东北作家群

沙金城

东北作家群是30年代初期开始出现、抗日战争爆发后基本形成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文学现象。

这里说东北作家群是一种"文学现象"而不称之为流派，是由于它并不是一个文艺社团，列入其中的作家风格不同，也没有划一的主义，甚至有的人并非东北生人。他们的共同之点是：都受到了东北大地的哺育，都曾在荒凉的东北文坛上抛洒过汗水，都以抗日为自己作品的主题。

东北作家群形成的基因是"九·一八"事变。从1931年9月18日起，日本帝国主义很快地吞并了东北大好河山，于是三省变色，三千万人民沦入水深火热之中。一些在东北文坛拓荒的作家不甘做日伪的顺民，面对敌人的大炮刺刀，进行了英勇的抵抗。他们或投笔从戎，参加义勇军，与敌人周旋在深山密林；或以笔为武器，饱蘸血泪写下诗文，去激励沦陷区人民起来斗争，赶走倭鬼，解放家园。

到了1937年"七·七"事变前后，部分东北作家都随着日伪制造的白色恐怖的加剧，先后逃出了伪满洲国，进入关内。他们跋涉在流亡的旅途上，唱着流亡三部曲，写出了许多令人泣下的作品。在抗日战争期间，他们活跃在上海、武汉、重庆、桂林等地，成了抗战文艺队伍中最有生力的一支劲旅，受到了人们广泛注意。尽管他们分散各地，天各一方，但在人们的心目中却形成了一个特殊的集合体。东北作家群一词，即从那时开

始叫响。

据笔者掌握的资料，东北作家群包括：穆木天、马加、李辉英、萧军、萧红、端木蕻良、舒群、罗烽、白朗、骆宾基、高兰、孟十还、杨朔、黑丁、罗荪、纪仪、孙陵、铁弦、塞克、齐同、辛劳、杨晦、李满红、李曼霜、姚奔、金人、马上、师田手、刘黑枷、宇飞、石光、丘琴、李葳、李雷、王语今、林咏泉、蓬麦哲、张郁廉、赵洵、礼长林、李白凤、洪遒、林珏、雷加、终一……这些东北作家，背井离乡，流落他方，大都没有固定的职业，仅靠微薄的稿费维持生计。他们含辛茹苦，在战火中到处飘泊，为民族的解放奔走呼号，谱写了一曲曲悲壮的抗日战歌。为取得伟大的抗日胜利呐喊战斗。他们用血泪写下的那些作品，不仅鼓舞了人民的斗志，也成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宝贵财富。其中名篇有穆木天的《新的旅途》、李辉英的《万宝山》、萧军的《八月的乡村》、萧红的《生死场》、端木蕻良的《科尔沁旗草原》、舒群的《没有祖国的孩子》……他们中很多人都成了当之无愧的名作家，蜚声中外文坛。

遗憾的是，在东北作家群中，有的人未能看到抗战胜利，重返热恋的家园，就含恨逝去，如萧红、李满红；有的人没有迎接到光明的新中国，就匆匆与世长辞了，如辛劳、终一；有的在战火中走过来了，却惨死在林彪、“四人帮”之手，如穆木天、金人等。值得欣喜的是，大部分东北作家至今仍然健在，他们以其顽强的生命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同甘苦、共患难，迎来了文艺界的春天。这些文坛老将，宝刀不老，正在为繁荣社会主义文艺做出新的贡献。端木蕻良写出了长篇小说《曹雪芹》，马加写了长篇小说《北国风云录》，舒群、骆宾基也有短篇新作问世。

东北作家群如灿烂的群星，照耀在中国现代文坛之上，配

合着民族解放战争，出色地完成了文艺工作者的历史使命，他们的光辉业绩将永彪青史！

（摘自《东北新文学初探》）

伪满时期盖县《星火》社活动的回忆

门文东口述　门熙鼎整理

我们《星火》社的同人，虽然没能毅然走向武装抗日的道路，但也同样有一颗不愿做“亡国奴”的爱国之心。我那时在盖县天台街的馥馨香铺当会计，渐渐地接触认识了一些爱国青年。于家麟和我住在一个院，他家是馥馨的股东，我俩接触机会较多。他于1933年从盖县西关中学毕业后，由于对日伪不满，就没有参加任何公职，闲居在家进行自学和从事文学创作活动。他经常给《大同报》、《新麒麟》和《营口新报》等刊物写稿，流露出反满抗日的情绪。那时我们天台街还住着几个爱国青年：王克范和我住对面屋，他是盖县永安屯小学教员，后来搬走了；我们的对门住着一个青年叫张克恩，他是伪盖县兴农合作社的仓库保管员；在我们后街还有一个青年叫王锡成，他是营口一家汉药店的学徒。他们都是爱国的热血青年。由于居住邻近，我们就经常往来。接触多了思想就有了沟通。于家麟常向我们讲些日本帝国主义和伪满汉奸的罪行，讲当时的社会形势，讲青年人的抱负等等。并经常借给我们一些进步的书看。如巴金的《灭亡》，高尔基的《母亲》，还有鲁迅的小说、杂文等。这样，在盖县天台街就形成了一个以于家麟为核心的小团体，经常地

有目的地聚集在一起，议论时事，揭露日伪的罪恶，抒发我们的愤怒心情，表达我们的反抗情绪。并且传看进步书刊，写文章，进行反满抗日的活动。

与此同时，盖县熊岳镇孤家子村的爱国知识青年花喜露，从省立海城第三师范毕业，回到盖县熊岳镇归州小学教书。他经常在课堂上向学生们讲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的罪行，传播爱国思想。在花喜露的启发教育下，高年级的学生成立了读书会，办起了《春潮》、《飞浪》等进步校刊，开始宣传反满抗日的爱国思想。这样，在花喜露的培养下，一批爱国学生成长起来了。如孔庆举、刘永良、王凤云、段树贵、崔殿久等，后来都成了《星火》社的骨干。

1936年夏天，花喜露（笔名田责）和于家麟（笔名驼子）等由于经常在报上发表文章而相识了。在花喜露、于家麟的倡议下，有一天我们聚集在天台街东边的双顶山上，召开了一个同人会。当时聚在一起的人有花喜露、于家麟、王克范、李光海、王锡成和我。大家坐在山岗上，毫无顾忌地开怀畅谈起来。大家都很激动，发表议论，交流思想，各抒己见。从青年人的责任谈到今后应该怎样活动，从日本帝国主义和伪满汉奸特务的种种罪行谈到沦陷区被压迫被奴役的同胞的苦难。个个慷慨激昂，争先恐后地列举了各自耳闻目睹的日寇和汉奸的种种罪状。现在回想起来，尽管记不清当时谁说了些什么具体言语和具体事例，但那种热烈的场面和大家的激动情绪，却是不能忘怀的。最后我们研究了下一步活动的打算。大家一致认为，今后应该联系更多的社会进步青年和各校的进步学生，要团结起来共同进行反满抗日活动。当时我们决定：首先要有组织地传递借阅进步书刊，以提高我们的思想认识水平，并联系更多的进步青年；还要加紧进行文艺创作，宣传反满抗日思想，鼓动人们的

反满抗日情绪；并且决定大家要分别寻找抗日的地下组织，以便进行有组织有领导的斗争。就在这次集会上，我们决定成立一个同人性质的社团，油印秘密的刊物，发表一些在敌伪报刊上不能发表的更犀利更明朗的反满抗日的文艺作品。我们就以这个同人社团和这个同人刊物作为联系更多的同人、进行更广泛的活动的基地。大家一致推举花喜露作主编，利用他们学校有油印工具的方便条件，定期出版刊物。这第一个刊物的名字，经过大家反复议论，最后确定叫《行行》，取《古诗十九首》中"行行复行行"的诗句，意思是号召人们行动起来。这个刊名很不好确定，即不能锋芒毕露让敌伪特务嗅出革命气味，也还要有深刻的意义，所以最后才定下了这个刊名。当我们几个人惬意地走下山岗时，已经是黄昏过后了。

《行行》这个同人刊物，我们办了二年之后，扩大了影响面，联系了更多的爱国同人。如当时的盖县一高学生张吉宽、刘永良，辽阳一高学生石岱宗，奉天第三女中学生王丹群，营口商科学校学生孔庆举，盖县女高学生穆玉琪等等，都成了《行行》社的同人。这时花喜露、于家麟又提议，为了能更多地发表一些《行行》同人和青年学生的进步作品，再印行一本刊物，起名叫《星火》，表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意思。以喻我们的反满抗日活动虽然力量很微弱，但终将发展成为燎原之势，取得最后胜利。从此《行行》同人社就改为《星火》同人社了。

这个时期，我们《星火》社同人虽然还没找到地下组织，但已能从间接的途径得到些中国共产党印行的刊物和材料，受到了党的影响。当时营口地区也有国民党左派人物在进行地下抗日活动，他们的思想也影响到《星火》社的同人。以花喜露为一方的一些《星火》社同人认为：抗战胜利后中国要走苏联的道路，实行社会主义。以于家麟为一方的一些《星火》社同人

则认为：抗战胜利后中国要走三民主义道路，因为中国经济还不发达，比不得苏联，只有先走三民主义然后才能进入社会主义。我们碰到一起也常常由议论发展到争论，甚至有时争论得很激烈。但是最后的结论，又总是归结到反满抗日这个统一的目标上来。所以我们《星火》社同人始终是团结的。

1937年“七·七”事变以后，日本帝国主义者一面疯狂地向我国关内大举进攻，一面在东北地区强化殖民统治。实行并村并屯，保甲连座；又征兵抓人，实行白色恐怖的法西斯统治。我们《星火》社同人，并没有被日本帝国主义的凶恶所吓倒，相反地活动更积极了，组织也不断地发展扩大。花喜露、于家麟等好多《星火》社同人，除了在我们自己办的《星火》油印刊物上发表文章，还经常地在一些日伪刊物上发表文章。当时的《大同报》、《盛京时报》、《大北新报》、《新满洲》、《地平线》和华文《大阪每日》等，都经常有我们《星火》社的联系人。花喜露的《孙二祖宗上西天》、《幽静的山谷》、《荒城的故事》；于家麟的《寂寞的城》、《小驿》、《我底歌》；我（笔名铁键）的《卖草妇人》、《贼》；王锡成（笔名夕澄）的《缝穷的姑娘》、《马路上的落叶》；郁其文（笔名铁汉）的《生之牧鞭》、《青春难驻》；疆匹的《年代》；舒啸的《雷雨》；臧品的《孩子们别了》；华青的《出走》等等都是这个时期发表在上述刊物上的进步文章。这个时期我们看到的进步作品就更多了。鲁迅的作品、茅盾的作品、巴金、老舍的作品以及更多的苏联作品，在我们《星火》社同人中广为流传。这时花喜露、于家麟、王克范（笔名矜人）、李光海（笔名铁励）和我们研究，把《星火》同人社作为“鲁迅文学研究社”，对内自称“LS文学研究社”。进一步研究革命文学作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斗争事迹，我们知道得更多了，我们的斗争热情受到了鼓舞。有时于家麟、王锡

成、张克恩和我晚上聚在香铺的柜房里，一唠就唠多半夜。另一些《星火》社同人李光海、王克范等也经常到香铺来和我们会面，传递书刊、传播新消息。

1939年秋天，花喜露、于家麟等《星火》社同人，通过写文章结识了《营口新报》的副刊编辑王觉（后来知道他是国民党员）。由花喜露、于家麟和王觉联系，就把我们的油印《星火》刊物，公开移到《营口新报》副刊上。由花喜露和于家麟组稿和主编，每期出刊之前，把编好的稿件交给在营口的王锡成带给王觉，再由王觉出版。开始《星火》在《营口新报》副刊上每月出一期，由于影响逐渐扩大，根据读者的要求和反满抗日形势的需要，后来就改为半月出一期，一年多时间里，出了二十多期。这是我们活动很有成效的时期。这个时期我们《星火》社同人更多了，分布在好多地区：有哈尔滨的、双城的、奉天的、本溪的、海城的、营口的、复州湾的。以我们盖县人为最多，以盖县为活动中心。我记得名的就有40余人。还有不少《星火》社同人的亲戚、朋友、同学及学生同情支持我们的活动。《星火》这个刊物的读者，虽不能确知多少，但也可以想见是很可观的。

这时，《星火》社同人的活动，已经对敌伪构成了威胁，所以也必然引起敌人的注意和敌视。我们的活动必须更加谨慎和秘密了。为了蒙蔽敌伪特务，有的同人来找于家麟时，就先到香铺找我，以“做买卖谈生意”的身份出现在香铺里，再由我晚间找于家麟到香铺来会面。有时必须几个人集会时，也是以游山玩水的形式，坐在一起摆谈天说地的样子来迷惑敌人。这样，我们在凶恶的敌人的眼皮底下照样活动着。

1941年，花喜露突然被伪盖县教育局宣布为赤色嫌疑分子，勒令离开黄旗堡小学。以后他就不知去向了。后来我们才

知道，他和葛雷一起到了奉天（沈阳），在党组织的帮助下找到了新的工作，在奉天大东区公所做办事员。在共产党的直接领导下，继续进行反满抗日活动。

这时以于家麟为首的一些《星火》社同人，接受了国民党地下组织的领导，并在1941年秋经王觉和任复州湾盐务局长的李光海介绍，于家麟和我加入了国民党。那时是国共合作时期，我们《星火》社的同人不分党派，积极合作，进行反满抗日斗争。1941年以后，日伪特务活动更加猖獗，他们的魔掌已伸向《星火》社同人。除了花喜露被迫离开盖县以外，王觉也被敌特注意上了，他也不得不离开营口，与《星火》社另一同人李光海一起跑到了伪新京（现在的长春市）。从此《星火》停办了。但《星火》社同人的活动并没有停止。不久，一个坏消息传来，在伪新京的王觉和那里的《大同报》副刊编辑李季风一起被捕了。在伪新京的李光海、石岱宗等逃亡流落到关内。李光海在全国解放以后，到过沈阳我的家里，我对他的情况才有所了解：他逃到关内后，先辗转到重庆，后来又到了延安，继续进行抗日斗争。北京和平解放后他到了北京，在卫生部工作，文革中去世。

1942年夏天，于家麟去伪新京联系同人，了解到日伪特务大肆逮捕爱国人士的情况。回来后向我们讲述了当时的形势，日本帝国主义穷兵黩武，在做垂死挣扎，它的魔爪由中国伸到了东南亚，又由东南亚伸向太平洋，制造了“珍珠港事件”，挑起了太平洋战争，进一步激起全世界人民的反对。所以它已走上了穷途末路。可是它还要做最后的挣扎，对占领区进一步实行法西斯恐怖统治，所以在东北已经开始了大逮捕。于家麟告诉我们：“今后的活动要更加谨慎，更加秘密。但是决不能停止活动，敌人越疯狂，越说明了它的虚弱。”所以当时我们研究了，

在《营口新报》的《星火》副刊不能出版的情况下，要另辟蹊径，建立新的阵地。我们《星火》社同人就深入盖县一高和二高联系进步学生，在这两个学校里创办新刊物。在盖县一高以李昌毓为首的同学们创办了《大地》，在二高以臧永昌为首的同学们创办了《辰星》，继续发表反满抗日的爱国文章。

1943年秋天，为了扩大活动阵地，于家麟就找到了邻近的几个《星火》社同人研究，打算成立一个书店，暗中传递革命进步书刊，更多地联系同人，推动反满抗日斗争的发展。就在中秋节的夜晚，于家麟、王锡成、张克恩、李昌毓、臧永昌和我，聚集在王克范所在的盖县永安屯小学校，以中秋赏月为名，蒙蔽敌伪特务的耳目，讨论了成立书店和以后如何活动的问题。我们一直议论到深夜，最后决定在盖县城内大堆子，开设一个租书卖书的书店。我们租了"道德会"旁边的一间门市，请退职老商人李勤甫出面经营。取名叫"秋灯书店"，意寓在黑暗的社会里给人们以光明。表面上出卖出租《三侠剑》、《七侠五义》、《金粉世家》等书，暗地里收集、传递革命进步书刊。比如鲁迅的《呐喊》、茅盾的《子夜》、巴金的《灭亡》、萧军的《八月的乡村》、高尔基的《母亲》、萧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法捷耶夫的《毁灭》等等。又把《星火》社同人和一些进步青年组织到"鲁迅文学研究会"进行活动。于家麟和我研究了"读书研究会"分工：由于家麟总负责，王锡成作采购书刊和对外联系工作，李昌毓作一高的负责联系人，臧永昌作二高的负责联系人，侯庚芝作三高（女高）的负责联系人，我为社会青年的负责联系人。以"秋灯书店"为据点开展活动。这个时期馥馨香铺是一个秘密联系和活动的据点。因为我是香铺的会计，于家麟是香铺的股东，我们在香铺研究事，谁也不会怀疑。外地和其他《星火》社同人，要找于家麟，就扮成商人的模样，以

做买卖的名义到香铺来，使敌伪特务很难看出破绽。所以这个时期活动比较频繁，也比较顺利。当时香铺的大掌柜胡乾一老先生（他是盖县现任人大常委会主任胡秉元的祖父），是一个同情和支持反满抗日爱国活动的开明人士。他知道我们的一些活动，不但不阻拦，还提供了许多方便。后来《星火》社同人被捕，胡乾一老先生也受到了敌伪特务的刁难和摧残。

1943年深秋的一天夜里，两年前在伪新京被捕的《大同报》副刊编辑李季风，突然来到盖县，到香铺找到了我，说要见于家麟。当天晚上我把于家麟找到香铺。李季风告诉我们：他是从伪新京的日本监狱里逃出来的，要求我们设法掩护他。他向我们讲述了日本帝国主义监狱里如何惨无人道，如何迫害革命人士。和他一起被捕的王觉，已经被折磨死在敌人监狱里了。又告诉我们：他从敌人的审问中知道，日伪特务已经注意到盖县反满抗日的《星火》社组织，并把于家麟、花喜露、门文东等列入了黑名单，要我们严加防范。于家麟和我们几个《星火》社同人，就把李季风掩护起来，让他住在我们对门的张克恩家里，因为张克恩的家属没搬来，比较方便。我们又为他拔掉了有面貌特征的大包牙，使他改变脸型，让别人不易认出他来。可是事不凑巧，没到一个月，张克恩工作的伪兴农合作社仓库被盗，张克恩本人被伪警察局监禁起来。日伪特务要到天台街张克恩家里来搜查。我们得到消息后，怕暴露李季风，就赶紧把他送到海城曲舒两家，最后由王锡成把他送到沈阳花喜露家里，求花喜露设法掩护他，花喜露当时就答应帮助解决这个问题。花喜露这时已经是地下共产党的积极分子，他在共产党地下组织的帮助下，把李季风转移到一个矿山上隐蔽起来。当时花喜露对王锡成说："你们把李季风交给我吧，不过为了防止意外，希望你们今后就不要再和他接触了，以免暴露。"后来李

季风又出来活动，再次被日伪特务抓进了监狱，直到日本投降后他才和我们一起被营救出狱。出狱后我们和他见面时，他经常骂国民党内部的腐败。当年的8月他在沈阳小河沿被国民党特务暗杀了。

1944年4月28日，花喜露在沈阳被捕入狱了，关押在伪“奉天第一监狱”。就在这个时候中国共产党组织来函，批准他加入中国共产党（这件事是日本投降后我才知道的)。他在日伪的监狱里经受了8个多月的审讯，被敌人酷刑折磨得昏死过去十多次。但他始终坚贞不屈，保守了党的机密。花喜露被捕时，我们在盖县的《星火》社同人并不知道，事先也没得到消息。不过从当时敌特活动频繁的迹象中，我们感觉到空气的紧张。所以在5月初，让王锡成到沈阳去探听一下消息。王锡成一到沈阳花喜露的家里，就感到气氛不对劲。他没看到花喜露，而花喜露的爱人王丹群刚刚分娩六七天没人照顾。还没等王锡成问，王丹群就急忙告诉他说：“你赶快离开这里，田贲被捕了，我家的周围有特务监视着，你赶紧回盖县通知《星火》社同人快隐蔽起来。田贲临走时说：‘争取捕到我为止。’”王锡成急忙回盖县通知我们，可是已经来不及了。1944年5月初，日伪特务在盖县对《星火》社同人开始了大逮捕。有不少人因为我们还没来得及通知到，没等隐蔽就被捉去了。于家麟和我虽然得到王锡成带来的消息，但还没等离开天台街，当天傍晚日伪特务就到了天台街，把于家麟院子的大门堵住。多亏了于家麟从后墙翻出去，跑到香铺告诉了我，我们才分头逃离天台街。日伪特务当时没有捉到我们，就把我们的家属抓进了伪满盖平县警察署关押起来。于家麟的母亲、姐姐、爱人和一个吃奶孩子和我的家里人都被抓去了。王锡成的老岳母也被特务打伤。这就是日伪反动派使用的株连九族的残酷手段。我跑到城东门屯，后来

被特务抓到，于家麟跑到东山冯连仲家里，也被特务抓到。就这样没出一个月，在盖县的《星火》社同人大都被捕了。我清楚地记得，在于家麟、王克范被捕后，当天就用布袋子套住了他俩的头，从警察署的院子押出去，送到伪“奉天第一监狱”去了。而我和张吉宽、王锡成、张克恩等30多个《星火》社同人及一些家属，就被关押在伪“盖平县警察署警务科留置场”里审讯。这时于家麟和我的家属被放回家了，日伪特务这是在耍阴谋诡计，因为他们了解到，有些外地《星火》社同人到盖县来，多半是找到于家麟或我的家，特务想用我们的家属作诱饵，来抓其他人。

这次在盖县被捕的《星火》社同人，还有下列人员：孔庆举、许默语、许庆春、李勤甫、鲁启智、李昌毓、臧永昌、郁其文、杨世绵、李吉升、李吉恒、赵廷魁、张文廷、高玉元、门恩义、王盛伦、于恩惠、周建涛、王德祥、赵怀范、迟金镇、穆玉琪（女）、侯庚芝（女）、姜竞芳（女）、赵俊芬（女）等。还有一些受牵连的人。

经过一段残酷的刑讯之后，剩下的一些家属和受牵连的人也都被放出去了。我们这些《星火》社同人就被送到伪“奉天第一监狱”关押起来，继续刑讯。在将近一年的匪刑拷打逼供中，很多人坚强不屈，在审讯中和敌人进行了面对面的斗争。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的罪行，痛斥他们残害中国人民，抓劳工，抓“经济犯”，抓“政治犯”，抓“思想犯”等种种罪恶。在伪“奉天第一监狱”里，审讯我的是日本上田警佐和翻译金朝太以及一些打手。他们穷凶极恶到了顶点。有一些刑法现在回想起来，仍感到毛骨悚然，可当时都挺了过来。压杠子把迎面骨都要压裂了，直到昏过去才放开。我先后三次被拴着大拇指吊起来，只有脚尖点地，还用皮鞭子抽。我的大拇指因此残废

了，关节长死不能活动。每个《星火》社同人都受到了非人的折磨。有一些同人被折磨死在敌人的监狱里，每当想起他们我心里总是非常难过的。在日伪“奉天第一监狱”里，先后有王克范、许默语、许庆春、门恩义、王盛伦、李勤甫、杨伯甫被折磨死去。最后敌伪以“治安法违反，出版物违反”的罪名，对《星火》社同人中的11人定罪判刑。其余的人以假释的名义放出来监督。被判刑的11人有：于家麟、张吉宽、花喜露、王锡成、张克恩、鲁启智、郁其文、李昌毓、迟金镇、臧永昌和我。每个人判多少年徒刑，事先都分别地通知了个人。后来从敌伪的档案材料中看到：于家麟被判处死刑，张吉宽20年，花喜露、王锡成15年，其余的10年到5年不等，我被判了无期徒刑。就在1945年8月16那天，一早看守警就把我们叫出去，叫我们到候审室去。那个伪警奸笑着说：“你们的案子出头了，高等法院今天对你们宣判。”我们11个人第一次在敌人的监狱里碰到一起，每个人的脸上即没有笑容，也没有愁容，更没有害怕的样子。只是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伪警不准我们说话。当时其他人判什么样的刑，互相都不知道。但我知道自己被判无期，估计其他人也轻不了。特别是于家麟，我们都替他担心。他离我较远，我们无法言谈，我看到他的面容消瘦、焦黄，本来就矮小的个头显得更小了。可他的眼睛很有神，多次注目地看着我，似有很多话要说。就这样，我们一直等到中午过后，快到下午一点多了，也没叫我们去听判决。我们心里都感到奇怪，也有些紧张，不知敌人要耍什么新花样。这时一个伪警走进候审室，又似讨好，又似无可奈何地说：“你们拣着了。”这个消息尽管在我们的心里早就期望着，并且确信终有一天会到来的，但是没想到来得这么突然。所以刚一听到，都有点惊愕了。可是在我们惊愕片刻之后，大家全明白了，一下子跳起来，喊起来，互相拥

抱起来。这时的伪警也夹着尾巴只是说好听的话。有的人当时就想往外走了，那个伪警就再三地表示歉意地说："还得委屈大家一下，请先回监房，可能需要办些手续才能放。"我们又被送回了监狱。

1945年8月19日，我们11位《星火》社同人和其他一些"政治犯"被营救出狱了。这个胜利是全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坚持抗日统一战线，与日本帝国主义浴血奋战八年、在东北则是奋战十四年而后取得的。我现在还记得那时爱唱的一支歌："五月的鲜花，开遍了田野，鲜花掩盖着志士的鲜血。为了挽救这垂危的民族，他们曾顽强的奋战不息！"花喜露同志出狱时，被敌人折磨得都难以行走了，是《星火》社同人把他背送回家的。由于伤势过重，回家后虽多方求医治疗，终因无效而于1946年6月13日不幸逝世，终年34岁。我们失去了一个好同志；盖县的家乡父老失去了一个好儿子；中国共产党失去了一个好党员。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1981年12月份，由国务院民政部委托辽宁省人民政府，追认花喜露同志为革命烈士。1985年，辽宁省人民政府又追认王克范为革命烈士，尽管他不是共产党员而是国民党员。光明磊落的共产党，对为革命而牺牲的人士，不论是共产党人、国民党人、其他民主党派和无党派爱国人士，只要为人民做了好事，都承认他们的功绩，这使我深受感动。这对九泉之下的花喜露、王克范以及其他死在日本帝国主义手里的《星火》社同人，都是一个慰藉。对我们活着的人以及我们的后代也是一个鼓舞。

（摘自《营口文史资料》第七辑）

关沫南与“左翼文艺事件”

于　堤

闲谈中泄露了机密

关沫南，笔名关雁，当年28岁，是哈尔滨《大北新报》的记者。他具有浓厚的民族意识和坚定的爱国志向。关沫南利用文艺宣传阵地，联合起进步作家和一批爱好文艺又颇具爱国心的青年知识分子，经常在伪满各报刊、杂志上，发表许多暗示反对日伪统治政权性质的作品，宣传鼓动东北青年要振奋起来，同日本侵略强盗作针锋相对地斗争。

关的文艺作品，尖刻泼辣，针对性强，且能联系斗争实际，因此受到广大青年读者的普遍赞扬和拥戴。由于他联系了一些进步作家和业余文艺工作者，又拥有一批与他息息相通的热情读者，就自然地形成了一个以他为首的左翼文艺团体，秘密进行着反满抗日的宣传活动。

1941年6月，一天，哈尔滨公共交通公司女售票员潘素兰与宋敏闲谈家常时说：“道里石头街有个摆书摊的山东人叫王忠生，与《大北新报》记者关沫南往来密切，关常到他那里买书，他们还可能有秘密工作关系。”这些无意中的闲谈，却被站在她们身旁的李蕴伟听到了，并有意地把这件事记在心里。下班回家后，李就把这个情况告诉了她的丈夫左立元。左是当时伪哈尔滨市警察厅特务科特务宋一夫和金丽珠利用的“密侦”。左立元遂将这一重要情报密报给警特宋一夫和金丽珠。

在此之前，伪哈市警察厅特务科，在文艺书刊检查中，就发现了在哈尔滨的文艺刊物上，有一些左倾作品，其内容带有影射攻击现实的东西。他们发现在这些作品的作者中，有人还去过华北游击区，因此引起了敌特的注意。于是决定将关沫南纳入侦察视线，对关的行动以及和他交往的关系人，暗中进行跟踪监视并布置“密侦”进行秘密侦察活动。

伪警特接到“密侦”左立元的情报后，觉得“案情”有了突破，随之对这个摆书摊的人进行了调查。

原来这个在道里石头街摆书摊的人叫王忠生，原籍山东人，他通过老乡回关内探亲的机会，从关内书店给他购买一些书籍带回，其中有些进步书籍在当时的哈尔滨是买不到的。关沫南常到这个书摊看书、买书，久而久之，他与王忠生就混熟了。此后，王凡是购进新书，就通知关来买，两个人的关系也越来越密切。

伪哈尔滨市警察厅特务科，为了从王的身上打开缺口，获得“证据”，扩大线索，决定将王忠生逮捕。经过对王的严刑拷打和突击审讯，从王的口供中获取了有关关沫南的活动情况，并得知与关密切往来的王光逖（笔名金明）、刘国兴（笔名陈隄）和温成钧（笔名艾循）等人的思想动向。

王光逖被捕

敌特机关经过一番侦察后得知，与关沫南交往密切的王光逖“嫌疑”重大，将其列为重点，以掌握他的全部情况。

王光逖，男，当年28岁，黑龙江省人。早年在哈尔滨《大北新报》当记者时，结识一个朋友，那个朋友思想很进步。在彼此交往过程中，启发王光逖说：“写文章不要写风花雪月派的无聊作品，这样做，不能鼓舞人的斗志。应当描写社会现实，暴

露社会的各种矛盾，这样你的作品才有价值，有份量。”王在这位朋友的启发下，写作态度开始倾向于左翼作品了。经过一段时间，那个朋友又鼓励他投笔从戎，直接参加抗日活动。王接受了他的动员，毅然离家出走，到了河北省枣强县，参加了群众抗日工作。他从事编写群众识字课本，教群众读书识字，宣传抗日等活动。

王光逖在华北参加抗日期间，适值日本军队开始大扫荡，斗争环境相当艰苦，再加上生活困难，缺吃少穿，王有些克服不了，开始动摇了。最后他竟然离开火热的抗敌战场，只身返回东北家乡。在家中闲呆了一个时期，发现敌人监视他，怕遭逮捕，又跑到了上海。在上海组织一个杂志社，发行文艺半月刊。

王在上海期间，曾打算去四川抗战基地，访问巴金、茅盾等名作家，想要拜师求教，学习写作，锻炼斗争本领，但因日军封锁很严，交通阻塞难以通过，没能如愿以偿。此时又接到家中来信，说妻子将要临产，催其火速回家照料。当时在上海生活艰难，靠稿费的微薄收入，日子也不好混，他从上海又返回哈尔滨家中。在家闲呆期间，常与关沫南往来，他们在一起谈论形势，研究文艺作品的发展方向，蛰居在家，等待时机。

王光逖得知摆书摊的王忠生被捕消息后，自感事机不妙，自己有被捕的危险。正当准备行装，欲动身逃往关内的前一天夜里，他的行动被伪哈市警察局特务科察觉，被立即逮捕。关押在哈市道里中央大街松花塾，这是一座专为政治犯设立的临时监狱。

关沫南等人被捕

1941年12月30日深夜，由伪哈尔滨市警察厅特务科特高股长泉屋寅吉率领，警特蔡金声、金丽珠（朝鲜族、原系中共

党员，叛变后当了伪警尉）和王蕴璞等人闯入关家，将关沫南逮捕。“罪名”是“哈尔滨左翼文艺事件”。在哈市关押几个月后，押送长春市伪首都警察厅特务科监狱，与李季风并案侦审，同时对关采取了“怀柔政策”，直至“八·一五”光复后获释。这天遭到逮捕的还有：

刘国兴（笔名陈隄），当时是哈尔滨南岗小学教员。受进步思想影响，曾写过不少爱国倾向的作品，暴露现实社会各种矛盾。与关沫南有往来关系。他还去过山西潞安县探望姐姐，为此受到敌特的监视。被捕后在哈市政治犯监狱关押了一段时间，后与关沫南一起解送长春市伪首都警察厅关押审讯。被送敌伪新京高等法院判刑。

刘鸿云（笔名问流、血流），黑龙江双城县人，系哈市道里伪税捐局职员。经常投稿，抨击现实，阅读进步书籍，与关沫南有往来关系。

温成钧（笔名艾循），哈尔滨市《大北新报》记者，经常发表文艺作品，抨击影射现实，关押审讯期间，受重刑折磨致死。

韩道城（笔名牢罕），山东省人，回族，哈尔滨市《大北新报》记者，被捕后关押在伪哈市警察厅特务科特设的政治犯监狱，受尽了酷刑摧残。

王孝慈（笔名李默），哈尔滨市伪《康德新闻社》编辑。常写带有左倾的文艺作品，与关沫南有往来关系。被捕后关押在伪哈市警察厅特务科监狱，受到了严刑审讯。

潘素兰（又名潘步伟），女，哈尔滨市公共汽车公司售票员。因她认识关沫南，在与宋敏唠家常时，无意中透露关常到摆书摊的王忠生处买书等情况，被敌特所知觉，为避免她将此事泄露出去，并想从她口中得到更多线索，将她逮捕关押，突击审讯，施以严刑拷打。

宋敏，女，哈市公共汽车公司售票员。与潘素兰同样原因，被捕入狱。

（摘自《长春文史资料》第三十一辑）

追忆金剑啸同志在齐齐哈尔的战斗生活

田　琳

《芜　田》

在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下的齐齐哈尔，是一个贫穷落后、偏僻的塞北小城。人民被蹂躏，在痛苦中呻吟……

1934年，无产阶级文艺战士金剑啸同志，冒着狂风暴雨，来到了齐齐哈尔。他在《黑龙江民报》扎下了营，主编副刊《芜田》，面对着敌人的刀丛，勇敢地坚强地开始了战斗。

《芜田》是黑龙江省第一个文艺副刊，也是第一个无产阶级红色副刊。

那时，我还在黑龙江省女子师范读书。我们几个爱好文艺的同志在图书馆，肩靠肩抢读着《芜田》，刊头是金剑啸同志刻画的：一块荒芜了的田地，一个青年高举着一把铁镐在耕耘。我们为这《芜田》的诞生高兴、激动，这是我们像沙漠一样干枯的生活中的一块绿洲，是我们像沙漠一样干枯生活中的一股泉水。

从此，我们常常到图书馆去读《芜田》。

在《芜田》中我们可以读到金剑啸同志介绍的进步文学，例

如，苏联高尔基的作品。我们也读过金剑啸同志写下的火焰一般的诗篇：《布谷鸟》、《兴安岭的风雪》和话剧《黄昏》等，他那充满战斗激情的诗句，一下子把我们青年一代的心照亮。

《芜田》也是一块绿色的园地，培养爱好文学的青年写作。各校的爱好文学的学生纷纷向《芜田》投稿。我的第一篇用晓希笔名发表的《招魂》，就是金剑啸同志亲手定稿，在《芜田》刊出的。除我而外还有一些人，其中“努力”（白拓方）、“关山”、“兰玲”（牛坤青）等同志都是在金剑啸同志培养下成长起来的。

发动青年学生读进步书籍

金剑啸同志不畏惧日本帝国主义者的刺刀和镣铐，他到各校校刊编委会去发动青年学生读进步的书籍。

我们女子师范学校是金剑啸同志通过教我们语文的徐老师发动读进步书籍的。徐老师在他的课堂上，让学生读自己借来的书。我们从图书馆借来的进步书，课堂里读课外也读，已经形成了热潮。

后来大逮捕时，黑龙江省男子师范学生大傻（他的真名不清楚，这是他的笔名）被捕，当时他的裤袋里还揣着一本金剑啸同志借给他的高尔基的《母亲》。

这进步的书籍，就是火种，是金剑啸同志撒下的火种，在青年们心中燃起了仇恨日本帝国主义，向往自由理想世界的熊熊烈火……

“白光剧团”和演出

北风在呼啸，大雪在飘落，金剑啸同志在齐齐哈尔大街小巷奔走，他到一些进步的文学爱好者家去组织“白光剧团”。

那是1935年初冬的一天，飘飘扬扬落着鹅毛大雪，金剑啸同志披了一身雪来到广来小学校找我。他高高的个子，穿一件黑呢子大衣，系一条雪白的围巾，披着长发，戴一副黑色宽边眼镜，样子十分潇洒。他从大衣袋中掏出一张名片递过来，我一看上面写着“金剑啸字巴来”，官衔上写着“黑龙江省民报副刊《芜田》主编”。这是我第一次和他见面（虽然我的一些幼稚的诗是由他修定发表的，他也曾给我打过电话商量稿子，但我们还没有见过面）。我高兴地把他让进会客室（会议室），在一条长桌子旁，我们坐下谈着。他很文雅也很严肃，悄声地和我说：“我来找你参加我们的白光剧团。”我不太愿意去演戏，但又怎能拒绝这位我尊敬的文学上的老师？我思考着，斗争着，犹豫不定，他等着我肯定的回答。那时我很幼稚，哪里知道他是一位地下工作者、共产党员，更哪里知道“白光剧团”是个革命的宣传队，终于我作了使他失望的回答：“我考虑考虑，和父亲商量商量！”

他虽然没有说什么，但我看得出他不太满意。我把他送出门外，看他的身影在迷漫的雪雾中消失了。

听说金剑啸同志很快就把“白光剧团”组织起来了。团员是一些进步的青年。金剑啸同志又编剧又导演又是舞台设计，他可能也是演员。他们排练了好几个剧目：《钱》、秋田雨雀的《喜门冬》、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大雷雨》和他自己写的《母与子》、《黄昏》。

一天，金剑啸同志又来到我们广来小学校，他高兴地告诉我：他们的“白光剧团”要演出了。他来给我送张票，并再三叮咛我：“你一定去看我们演的剧！”

那天夜晚，我冒着北风，踏着积雪，去黑龙江民报社礼堂看剧，进去时，剧场已经坐满了人。那夜观众很多，大部分是

些学生和工人，窗台上、过道上都挤满了人。

记得那晚上演出的剧目是《钱》、《母与子》（也许是《黄昏》）。导演、舞台设计都是金剑啸同志。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动人的演出，从舞台设计、化装到人物表演都极逼真生动，给我的印象也极深，至今还记得很清楚。

一个剧的内容是：在一个黄昏，母亲病得垂危，儿子焦急万分，想给母亲抓药治病，但手中没有一文钱，一阵叮叮当当的敲门声，接着几个警察破门而入，把儿子双手上了铁铐带走了。母亲疯狂地张着双手，在床上喊叫着儿子，听到一阵犬吠声，接着响起一阵枪声，那是打死儿子的枪声。母亲悲痛地在枪声中死去了。

另一个剧是《钱》，内容是：在一个贫民窟里，挤住了一帮颠沛流离的人们，都贫穷得一文钱没有，睡在地下。一个人（记得是修鞋匠）的远方的母亲死了，他借到一笔钱，想给母亲买棺材。可是这笔钱却被人偷去了。一帮睡着的穷伙伴们惊醒起来帮他找钱。谁偷去了这买棺材的钱呢？就是同屋的那个小偷偷去了（记得大致是这样，也许有出入）。

看完了剧观众都很感动，一面往出走一面纷纷议论："什么世道，富人极富，穷人极穷！"

北风呼啸着，夜漆黑。我在回家的路上还为剧情所激动，在思索着：

"为什么人这般的穷？为什么？"

金剑啸的画展和他的一幅画

金剑啸不仅写诗、写剧，他还是个画家。他虽没有成名的画，但他的画有很强的战斗作用。在哈尔滨他在抗敌传单上画许多打倒日本侵略者的画和漫画。他的画，幅幅都是摧毁日本

帝国主义、摧毁旧世界的重型炮弹。他在齐齐哈尔画了许多思想性战斗性很强的画，并举行了一次画展。

1935 年下半年，我已经辞去了广来小学校的职务，也停止了往《芜田》投稿，在家埋头准备功课考大学。我不知道他举行画展，只是后来从他给朋友蕴璧的一封信里才知道。他在信中写道：我的美术展览，已经准备虎皮斑斑，还有几幅即将完成，定于×月×日公开展出。我也没去看他的画展，但听他对他的朋友说过："我要画使人胆裂的画。"猜得出他的画一定像柯勒惠支一样，在他的画里没有山水，也没有花鸟，一定都是描绘无产阶级的痛苦和失望，一定都是鼓动人民起来推翻旧世界和日本帝国主义的画。

我曾看见他的一幅画：

那是一片波浪汹涌的大海，天空上挂着被乌云遮去半边的苍白无力的小太阳。大海上飞翔着一群海燕，那海燕嘴中衔着利剑。在海浪上飘荡着一叶小舟，在船头上，有一位被狂风吹乱了头发的射手，正拉弓射那乌云遮去半面的太阳。我一下子认出这幅画的主题是："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从监狱中带来的消息

1936 年春，齐齐哈尔充满了日本帝国主义血腥镇压的恐怖气氛，抓人的电驴子（那时电驴子是日本鬼子抓人用的）突突地响着。齐齐哈尔乌云滚滚，人心惶惶。金剑啸同志离开了齐齐哈尔，又转移到哈尔滨。他在哈尔滨又开始了战斗。1936 年 6 月，由于在《大北新报画刊》上登了一条伟大的无产阶级作家高尔基病重的消息，因此在哈尔滨被捕了。酷刑之后被押回了齐齐哈尔，关在齐齐哈尔的铁牢里。

这时齐齐哈尔也在大逮捕。一天在我们院的门前停了一辆

抓人的电驴子，抓走了我院的黑龙江省民报社社长和一位体育教员。

过了些日子，听母亲说被捕的那位体育教员从监狱放出来了。我跑到他家去打听金剑啸同志的消息，他高兴地讲给我：

金剑啸很好，他很乐观，也很坚强。

金剑啸虽然戴着镣铐，带着敌人鞭打的伤痛，他还在监牢里教难友们唱海燕之歌，教难友们普希金的诗。

我问："监狱里有普希金的诗集吗？"

他说："没有，是金剑啸背下来的，他能背不少普希金的诗，他一句一句地背，一句一句地教，他一首一首地背，一首一首地教。"

我问："你也学了吗？"

他说：我在隔壁听不清，也背不会，只听到这样的句子：

我们飞去了吧，是时候了，
我们原是自由的鸟儿，飞去吧，
飞到那乌云的后面明媚的山峦，
飞到那里，到那蓝色的海岛，
只有风在欢舞，还有我在作伴。

这是普希金的《囚徒》诗。

金剑啸同志不是在教诗，他是在战斗，在监狱中，还在继续战斗，那是宣传鼓动"囚徒"们为自由而斗争的号角。

金剑啸同志光荣就义

"金剑啸同志光荣地就义了。"一个不幸的消息在齐齐哈尔传开！

那是1936年8月15日，万恶的日本帝国主义刽子手，把金剑啸同志从铁牢里提出来，他戴着镣铐被押上囚车，驶向齐齐

哈尔北城门外的刑场。他牺牲时年仅27岁。

（摘自《齐齐哈尔文史资料》1986年第二期）

地下文艺哨兵——白朗

老　残

白朗[①] 说："我这粒革命种子，是萌芽在哈尔滨的土地上，松花江是我的奶娘，抚育我成人的是党……"

的确，白朗虽然出生在沈阳，生长在齐齐哈尔，可是哈尔滨却给她留下了永远也磨灭不掉的印象。她在这里接受了马列主义，走上了革命道路，同罗烽一起战斗在抗日反满的第一线上，为民族独立，为祖国解放，贡献出一定力量。同时也把她从一个软弱的知识青年陶冶成坚强的共产党人，无产阶级文艺战士。

白朗本姓刘，原名东兰，1912年8月2日出生在沈阳一个知识分子家庭里。祖父叫刘子扬，是当时沈阳城里一位有名的老中医。因为他医术高明，被黑龙江省督军吴大舌头（俊升）聘请去当了几年军医处长。全家也随同祖父从沈阳搬到了齐齐哈尔。

白朗11岁时，不幸父亲故去，未几，祖父又被辞退，不久就逝世了。从此，家庭生活一落千丈，陷于困境。这在白朗的心灵上造成很大创伤。由于家庭突遭变故，生活越来越困难，使

① 白朗同志曾任全国文联委员、中国作家协会理事，从事专业创作，现已离休。

她深深感受到人世的炎凉和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制度的黑暗，逐渐产生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主义思想。

白朗18岁时，和表兄罗烽结婚并随罗烽从齐齐哈尔来到哈尔滨。当时罗烽在呼海铁路局任职，已秘密地加入了共产党，担任北满成立的一个产业支部——中共呼海铁路特别支部宣传委员。工作非常忙，日夜不着家。后来白朗在罗烽的引导下，开始帮助罗烽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如刻写钢板，油印传单，传递宣传品，保管党内的文件和材料等。

“九·一八”事变后，地下党的活动更加隐密和频繁了。白朗竭尽全力地掩护罗烽的工作，为他们开会站岗放哨，印刷抗日反满宣传小册子。1932年初，中共满洲省委从沈阳迁到哈尔滨。罗烽担任满洲省委候补委员，中共哈尔滨市东区（道外）区委宣传委员，直接在杨靖宇等同志领导下开展抗日反满宣传工作。主要负责复印中共中央文件、印刷宣传品、传单、出版油印的抗日反满小报。印刷机关就设在罗烽家中，白朗自觉自愿参加党的地下工作。

同年夏天，国联派以英国李顿为首的五人“国联调查团”来哈尔滨，调查日本侵略东北的问题。这个“国联调查团”是帝国主义的侵略工具，名义上是来调查日本侵略东北的罪行，事实上是为日本侵略东北开脱罪责，使日本帝国主义扶植的伪满洲国傀儡政权合法化。为了揭露“国联调查团”的阴谋，打掉部分群众对国际联盟这个帝国主义御用工具所抱的幻想，中共哈尔滨市委书记杨靖宇同志亲自到东区区委（道外七或八道街一间修鞋的小屋子）召开会议，发动群众示威游行，散发传单，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东北的罪行和“国联调查团”的政治阴谋，并决定扩大发行罗烽主编的秘密地下小报。白朗积极热情地参加了这个活动，日夜刻写钢板，印刷宣传品，在反对“国

联调查团”的群众运动中成为地下党的可靠帮手。

在党的培养教育下，白朗的阶级觉悟和民族意识提高得很快。1932 年秋，她参加了党所领导的抗日反满外围组织“反日同盟”，成为哈尔滨妇女界最早出现的抗日反满女战士中的一员。

1933 年初，中共满洲省委与哈尔滨市委鉴于当时的斗争需要，为了配合抗日反满的武装斗争，决定加强抗日反满的政治宣传工作，扩大党的文艺宣传队伍，采用各种文艺形式和方法对群众进行宣传，启发广大东北人民的阶级觉悟和民族意识，并指示利用敌伪的报纸创办党的文艺宣传阵地。杨靖宇同志决定由罗烽、金剑啸共同完成这项任务。

不久，白朗在党组织的授意下，考入哈尔滨《国际协报》当记者。4 月间，《国际协报》副刊主编林郎（即方曦）被党派到苏联去学习，由白朗接任。白朗接任《国际协报》副刊之后，除每天出半版文艺副刊《国际公园》之外，还出版《体育》、《妇女》、《儿童》等周刊。白朗把各地寄来的稿件携带回家去，晚上同罗烽一起审阅编排稿件。这不仅为东北抗日爱国进步作者开拓了一块园地，同时也培养发展了党的文艺队伍。萧红就是在白朗主编的《国际协报》副刊上，发表她的第一篇小说《王阿嫂的死》，从此开始踏上文坛，从事革命文学创作活动的。

白朗除了主编《国际协报》副刊以外，还积极参加了罗烽和金剑啸组织并领导的“星星剧团”。这个剧团属于党领导的半秘密性质的左翼文艺团体，它以中共地下党员和左翼文艺作者为基础，适当地吸收一些爱国进步知识青年。罗烽负责组织和领导工作，金剑啸负责导演兼与白涛搞舞台设计。萧军还为剧团写了“团歌”（金剑啸谱曲）。他们以高度的责任感，先后排练了三个话剧，有美国进步作家辛克莱的《居住二楼的人》（又

名《小偷》)、著名女剧作家白薇的《姨娘》、白涛的《一代不如一代》(又名《工程师之子》),白朗扮演第一剧组的女主角。大家演出的目的非常明确,就是要像黑夜中的星星那样,以自己"微弱的光辉"给沉闷"枯寂要死的哈尔滨"带来一点生气,并"为全哈尔滨的戏剧界开辟一条荒棘的素无人迹的前路",使正在日伪黑暗统治下的哈尔滨人民得到一些"益处和美感"(洛虹《从星星剧团的出现说到哈尔滨戏剧的将来》——作者注)。他们从政治教育出发,不计较个人的成功或失败、别人的议论或攻击,风雨不误,按时到道里炮队街的民众教育馆去进行排练。

在创建星星剧团的同时,即1933年8月,在伪满新京黑夜沉沉秋风飒飒的上空,出现了另一颗"星星"。它就是以党为领导,以哈尔滨一批革命的文学艺术工作者为核心,通力合作所创办的《大同报》文艺周刊《夜哨》。《夜哨》周刊在同年12月24日被迫停刊,总共出了21期。萧红和白朗是《夜哨》周刊的主要撰稿人,几乎每期都有她俩的文章。白朗在《夜哨》周刊上发表的作品有小说《祗是一条路》、《叛逆的儿子》、《悚栗的光圈》等。只《叛逆的儿子》这一篇小说,就连载了11期,在读者中留下很深的印象。从此她和萧红同时成为东北文坛上著名的青年女作家。

《夜哨》周刊被查禁以后,经党的安排,白朗用主编《国际协报》副刊的便利条件,又在该报上创办了《文艺》周刊的每期一整版,约8 000字。为了不引起日伪文化特务机关的注意,决定原来在《大同报》、《夜哨》周刊上经常供稿者,一律更换新笔名。《文艺》周刊自1934年1月18日问世,至同年12月27日被迫停刊,总共出48期。白朗用新笔名"弋白"写的中篇小说《四年间》,在《文艺》上按期连载。这一时期北满的左翼革命文艺创作,得以空前的发展。

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东北全境之后，开始腾出手来抓人的思想意识。他们利用伪满洲国傀儡政权，一面强化奴化教育，一面加紧实行法西斯统治，颁布了所谓《康德新闻法》，实行“思想取缔”政策，严格控制东北人民的言论和作家的创作。如有违犯，轻者被逮捕入狱判刑或送往“思想矫正院”长期监禁；重者被送上绞刑架或断头台。在日伪反动当局的高压政策和白色恐怖下，东北作家队伍纷纷瓦解。有的变节投敌，充当日伪文艺汉奸或特务，为日伪的反动统治歌功颂德；有的被敌人的反动气焰所吓倒，胆怯弃笔，改从他业，从此再不敢沾文艺的边；有的改变手法，坚持抗日反满斗争，即使实在坚持不下去了，也不肯失掉民族气节和背叛革命，想方设法逃出东北，流亡到关里去，坚持从事抗日反满文学活动。萧红、白朗等都属于后一类的革命作家。

1934年春，罗烽在白朗主编的《文艺》周刊上发表了一首讽刺伪满洲国建国的诗歌《晒黑了你的脸》。哈尔滨伪警察局长便几次打电话给白朗，向她提出警告和威胁。6月18日，罗烽终因叛徒告密被日本特务机关逮捕，白朗也被日伪特务监视起来。

可是，白朗毫不胆怯。她一边到处奔走，积极设法营救罗烽，一边坚持自己的工作，每天按时编发《国际协报》的副刊和各个周刊。后来终因劳累过度流了产。就是这样，她也没放弃党所领导的这块文艺阵地。她让别人把稿子送回家来，躺在床上审阅、编排。

1935年初，经过党组织的多方营救和呼海铁路同人募捐，买通特务机关的上下人员，罗烽才被定为共产党嫌疑犯，经保释出狱。为了不再落入敌人的魔掌，同年5月间，在朋友们的掩护下，白朗和罗烽秘密离开哈尔滨到了上海。

白朗在哈尔滨期间，始终在党的领导下，从事秘密的或公开的文艺宣传工作，她不愧是一个地下文艺女哨兵。她以自己的行动，为哈尔滨妇女运动写下了光荣的一页。

（摘自《哈尔滨文史资料》第七辑）

李季风越狱记

于本厚

度蜜月，夫妻双被捕

1941年12月31日深夜11点多，住在长春市西三马路福丰旅社二楼的新婚夫妻李季风和他的妻子李坤影刚刚入睡，被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惊醒。刚要起身问个究竟，由伪首都警察厅特务科监督警尉田中贞夫率领的吉田、新保及关忠显、张德等5个日伪特务已经闯进屋内。他们不容分说，将李季风捺在床上，带上手铐。接着便是翻箱倒柜，进行“家宅搜查”。凡属进步书籍，如《共产党宣言》、《大众哲学》和鲁迅、巴金、茅盾及苏联文学作品等均装入李家的皮箱或用床单包起来，然后将李季风用黑布蒙眼，推上三轮摩托车拉走。接着又进行第二遍搜查。最后，连李坤影也推上小汽车押走。李季风夫妇被关押在伪首都警察厅后院小红楼（现长春市公安局后院的办公楼）上。这是一座专门拘押“政治犯”的秘密监狱，高大的围墙上，架设着电网，戒备森严。

反满抗日，用笔作刀

李季风原名李福禹，笔名季风、季疯、方进等。1917年生

于辽宁省辽阳市郊窦双树村的农民家庭。他幼年丧父，兄弟4人，排行老三，因性格倔犟，家人送他绰号“三倔子”。

1926年入窦双树村小学念书，1929年入辽阳市西关新民小学念高小，1931年因学习成绩优秀，越级以第一名成绩考入沈阳市第二中学。同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侵略者侵占东北，被迫停学回家。1932年去察哈尔省寄宿大哥家中读中学。此间，在《大公报》副刊发表了他的处女作《自由的小鸟》，崭露头角，显出了他的文学才华。后因忍受不了大嫂的虐待，当年秋天辍学返回辽阳家中。在辽阳县立一中插班读中学三年级，因家境贫寒，交不起学费，再度辍学。

1933年秋，当地伪村公所要录用他当主事，他不愿给日本人干事，绝然放弃这个“美差”，遂去辽阳县城老东市，以摆卦摊收入糊口。此间，常书：“读史易发感慨泪，吟诗徒有奈何情。”藉以抒发其爱国有志，救国无门的忧愤。1935年春返回乡里，给本村老中医杨绍伯先生拉药匣子（中药调剂员）。此间，与杨老医生的亲戚李荫余相识后，彼此关系密切，李是爱国青年，民族意识浓厚，不甘心留在东北当亡国奴，遂约李季风去北平谋职，藉机寻找政治出路。

他们抵达北平后，不巧，要投靠的那个人，因党派之争不久前被捕，扑个空。从此，李季风便流落于北平。政治上的失望，生活上的困窘，逼得他走头无路，曾两次想自杀均被人相救而未遂。他为了活下去，在北平街头靠卖字画维生，艰难度日。

1937年春，考入北平警官学校，入学不久，“七·七”事变发生，李季风毅然参加了抗日救国军，在北平城郊打了几个月游击，由于敌众我寡，队伍被打散，他决定返回辽阳老家。

当时山海关为“国境口岸”，把守甚严，凡出入关者，必须

持“出国证”方得放行。李季风既无“出国证”，又无钱购买火车票，遂冒险用“挂钩”的办法，偷乘货车夜渡山海关。因时值寒冬，在敞车上将右耳朵边冻掉一圈，留下了疤痕。

1938年初，李季风回辽阳后便到同学开的虹光电业社当店员。两个月后，经人介绍到长春市《民生报》社当校对员。

1939年，李季风第一部长篇章回小说《昙花一现》在伪《大同报》副刊连载；继在《新满洲》月刊第一卷8——12月各期，以磊磊生笔名发表了《贫穷与犯罪》等6篇作品。李季风的这些作品，博得伪《大同报》编辑孙鹏飞的赏识，推荐他任该报副刊编辑兼《消闲版》主编。

通俗小说《昙花一现》出版后，震动了东北文坛，受到读者的喜爱，畅销各地。

李季风依靠文艺阵地，以笔作刀枪，在作品中，仿效鲁迅的手法，用词泼辣、尖刻，敢于揭露、抨击现实，字里行间蕴藏着宣传反满抗日的民族意识和思想启蒙的内容，因此深受东北爱国青年的钦佩和赞颂。

李季风针对社会现实，自1939—1941年间，以季风、季疯、李宜生、磊磊生、亦醉、方进等笔名，在伪《大同报》副刊、《麒麟》、《新满洲》和华文《大阪每日》等报刊杂志上，连续发表了《婚姻之路》、《独语——写给〈婚姻之路〉一读者》、《路》、《结婚前后》、《青春之献》、《没落》、《夜》、《别》、《在牧场上》、《杂感之感》、《生活的一课》以及《愿她为人群献身》等长短篇小说、散文、杂谈等十部（篇）和广播剧《在地下室中》。李季风喜爱旧诗，此间，还以磊磊生笔名，发表了旧体诗多首。

在《杂感之感》中写道：

“……他们永远不盲从，不阿谀，不苟合，他们有绝对的信

心，可不是臆度的武断，他们有固执的理念，可不是虚无的梦想。虽然是周遭的鬼域，虽然有着进路的坎坷，他们决不恐怖，决不犹豫。”

在《生活中的一课》中写道：

“一个文学者的伟大的生命，全在于那把自己的血肉与身心交给那广大的群众。”

在华文《大阪每日》发表的短篇小说《在牧场上》，指责汉代苏武留胡受辱19年之久，没有奋起反抗，无所作为，虚度了青春年华。告诫读者：“苏武不可法，不要忍辱负重。勇敢地站出来，同顽敌拼搏。”他还在《不以成败论英雄》和《有志者事竟成》的杂文中，向读者介绍马、恩、列的事迹。

李季风的散文汇编成集，名为《杂感之感》，由长春益智书局出版，深受读者喜爱，畅销一时。

到了1941年春天，李季风的声誉和他的作品，风靡一时，素有“东北小鲁迅”之称。当时他仅24岁。

同年8月，李季风被聘任伪军事部《干城》杂志（伪军权威性杂志）名誉嘱托，月薪伪币250元。但他没因受此高薪厚禄而动摇自己的抗日意志。

当时在长春市活动的中共地下党负责人夏航同志（原名荆玉珩，解放后任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已离休）也在关心他，争取他。据夏航同志介绍说：“1939年到1944年，我是长春的《新满洲》杂志编辑，那是我的掩护职业。我从来稿中发现李季风不仅有爱国主义思想，还有一定的左倾思想，看来他读过不少马列主义的书。”

“季风写了《三部曲》，1940年上半年发表于《新满洲》，因为明显有反满抗日情绪，我担心被汉奸发现。”

“为了争取季风参加地下党，我与季风彻夜同榻深谈三次。

我劝他：你既信仰马列主义，要革命。干革命道路很多，并不都得明干。明干，就拿枪。否则，你在人家天下，明干，白送命。”

“季风答：‘我能写，这就是武器！’我再次要求季风从此不要再写东西，隐蔽起来，干革命，季风不同意。他说：‘我一定要拿笔进行战斗，我认可血洒在东北大地上，也要让革命开花！’”

讲到上述这段话时（1984年7月31日于北京——笔者注），夏航同志意味深长地说：“时过半个世纪，但仍记得一个字不差。”足见李季风此言留给夏航同志印象之深。

李季风与夏航当时互换书看，夏给季风的书有《政治经济学大纲》、《大众哲学》等；季风给夏的有《列宁》等书。夏航同志处于秘密情况下，未向季风公开身份。

建立“青年读书会”

李季风巧妙地利用伪《大同报》副刊这块阵地，通过他的作品，联系了一大批青年读者，激发了他们的抗日热情，近者来访面谈，远者来信鼓励，要求以他为中心，组织起来。在主客观形势影响下，李季风觉得时机已经成熟，应由呐喊进而为行动起来。

《大同报》编辑张景浩（张纳亭，原在长春市水泵厂工作，已病故）与李季风在一起工作相处很熟。季风开始借给他一些进步书籍，启发他的思想觉悟。当借给张《铁流》一书时半开玩笑地说：“以后每读完一本书，必须写一篇《读后感》给我，否则就不借了。”张果然按他的意见办了。后来张还如期地利用夜间或假日完成了李季风交给的抄写“禁书”的任务。

1940年6月的某一天，李季风把张景浩找到一个僻静地

方，悄声地问："你是否愿参加革命小组?"并介绍了情况。张答："参加革命小组进行抗日，我衷心拥护，但我要到关内去直接参加抗战，不想在东北。"李劝导说："内地革命大有人在，唯独东北更需要人才，你还是留下来好。"经过一番商量后，张欣然地同意参加"青年读书会"。

"青年读书会"又称"社会主义革命小组"，是自发地以左翼文艺工作者为主体的秘密抗日组织。它下辖若干基层小组，每个组3～5人，个别吸收组员，小组间不发生横的联系，实行垂直领导。此间，李季风先后发展了张景浩、于长春（于海春，伪新京邮政局职员）、李作东、韩文达（伪新京海关职员）、段式斌（伪新京税捐局职员）、贾永芝（伪中央银行职员）和伪新京医大学生张国忱（现江西省南昌医学院教授）、高守义、白光飞及社会青年周云霞（女）等人。

李季风为壮大抗日阵容，交流经验，与哈尔滨《大北新报》记者关沫南（笔名关雁，中共党员现黑龙江省作协副主席）建立起革命友谊。他们遥相呼应，向青年读者指导与回答有关文艺创作方向和进行实际抗日斗争等问题。关沫南曾两次来长春与李磋商机宜、研究斗争策略，李也去哈尔滨回访了关。关在哈尔滨曾酝酿成立左翼文艺团体，因机密泄露，在"一二·三0事件"中被捕而未遂。

1941年夏，李季风与长春的秘密抗日组织"铁血同盟"（前身为"读书会"）的领导人刘荣久、马成龙接触商讨组织合并的事，因刘荣久提出要搞爆破、纵火等破坏行动，李认为风险太大，又容易暴露，为此未取得一致，而把组织合并一事便搁置起来。

1941年12月21日，刘荣久、杨文阁（伪奉天农大学生）被骗去哈尔滨接受所谓"入延安抗日大学前的培训"时，向由敌

特扮演的“中共中央特派员”刘玉廷汇报说：“除了我们的组织外，我还知道有一个反日组织，就是季风（指李季风）和一个姓易的。他们在新京秘密成立了反日组织，实行单线联络，进行反日活动。将来有可能与我们合并。”

不久，在1941年12月30日，敌特以召开“东北联络会”为名，将“铁血同盟”的负责人及各地代表骗至哈尔滨，在会上将他们全部逮捕，于是爆发了震惊东北的“一二·三〇”事件。

结婚要准备牺牲

1941年，李季风24岁了，住在一家旅馆里，过着单身汉的生活。

有位姑娘叫周云霞，平素爱读报纸、杂志和现代小说。李季风的文艺作品深深地吸引了她。从爱读季风的文艺作品，进而萌发对他本人的爱慕之情。

少女心事多，她默默地思念着、遐想着，总要寻得机会与李季风见上一面，以解相思之苦。遂贸然提笔给季风写了信。信中说自己是他的热心读者，因家境贫寒，父亲年老体衰，受继母的冷漠，处境艰难。因交不起学费，中途辍学，闲呆家中，自感前途渺茫，不知何日能有所终。祈盼季风先生忙中抽暇，给以赐教。她还提出想去英文学堂补习英语，因交不起学费，恐愿望难以实现，恳请季风能否解囊相助，则不胜感激涕零等语。

几天后，她出乎意料地收到了回信。季风在信中对周身处逆境表示同情。对她好学上进的精神给以鼓励，并答应可资助她学费，以解燃眉之急，还邀请她有空前来面叙。

周云霞见信后，又惊又喜，不知所措，心中充满着矛盾。她终于想出个办法，她请同学李坤影结伴赴约，以避可畏之人言，见见季风，看个究竟，也了却自己的心愿。

她们来到了长春市西三马路福丰旅社，李季风热情地接待了她们。

寒暄后，周云霞像遇到久别重逢的好友，滔滔不绝地诉说着自己的遭遇。李季风静静地听着，不时频频点头，表示同情。

当话题转到讨论人生价值时，季风问："你们今后要做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周、李异口同声地说："当然要做好人，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这还用问吗？"季风风趣地笑着说："那可不一定！很难保证你们一生中，不做坏人，不干坏事，好、坏人的标准太笼统，不好截然分开。一生中，做纯粹的好人，总办好事也不太可能，绝对的好人，人世间是没有的。"

李季风的话，触动了沉默寡言的李坤影，她站起来反驳说："你说的不对！人世间好人是大多数。比如我爸爸、妈妈和我都是完完全全的好人。我可保证，我们一辈子不干坏事，堂堂正正地做好人。能说我们不是好人吗？"周支持李的观点，在旁"添油加醋"，站脚助威。双方各不相让，争论得面红耳赤。

李季风为了缓和一下"紧张气氛"，才故意岔开话题。

李季风的朴素品格，潇洒风度和渊博的学识，深深地感染了周云霞，爱情的碧波在心中荡漾。此后，周时常独自与李季风约会，彼此相爱。李季风不失时机地启发周的民族觉悟，不久介绍她参加了"青年读书会"。

令周云霞苦恼的是：幼年受父母之命，与一鄢姓男子订了婚。父命难违，她没有勇气冲破封建礼教的束缚，只能将这种痛苦埋在心中。她惋惜的是：怎能甘心让如此品貌端庄、才华横溢，有抗日报国之心的热血青年，在自己的身旁悄然而过！终日里搅得她夜不能寐，食不甘味，默默地苦思苦想。最后她终于忍痛割爱，采取"爱情转让"，以求自慰。由她作媒，把她的知心好友李坤影介绍给李季风。

他们相处几个月后，就谈起结婚条件来。李季风提出："你若嫁给我，必须答应三个条件，而且要身体力行。第一是共同工作；第二是不怕吃苦；第三是准备牺牲。"李坤影对前两条是无可非议的，表示赞同，但对"准备牺牲"的这一条，却迷惑不解。她反问李季风："年轻轻的，为什么结婚还要准备牺牲呢？"李季风激动地说："我们的结合，不是为了建立美满的小家庭，生儿育女，碌碌无为。当今国难当头，同胞受苦受难。我们的结合是为了革命，共赴国难，需要你助我一臂之力，因此必须有准备牺牲的信念，望你三思而行。"李坤影流着热泪，表示同意这个条件。李季风安抚她说："劝人家牺牲是不尽人情的。但是，我要置身于牺牲的行列之中，而且要站在前头！"

1941年11月3日，在《大同报》登一条《结婚启事》，新婚夫妇回辽阳老家拜见了老母和兄嫂，住上几天，就算完成了终身大事。

周云霞看着他们结婚，心中充满着喜悦、羡慕和痛苦。事先周许诺他们离长春回辽阳老家结婚时，要来到火车站送行。可是到了开车的时刻，仍未见周的踪影。李坤影从辽阳归来后，有人告诉她："那天，周云霞没出家门，独自关在房子里，躺在炕上头上蒙着被，抽抽泣泣地痛哭一场。"

此时，周云霞、李坤影和魏秀贤都是"青年读书会"妇女小组的会员了，担负保管图书、抄稿和秘密从事反满抗日的宣传工作。"一二·三0"事件爆发后，她们被逮捕入狱，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第一次越狱

李季风被捕消息很快传播开来，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恐怖气氛笼罩着整个东北文坛。有的进步作家，感到自身安全受

威胁，终日里担惊受怕，不愿提笔写文章，有的躲避起来。

李季风被捕后，遭受严刑拷问，但他咬紧牙关，坚决不承认成立什么秘密组织和进行反满抗日活动。

敌人见动硬的不行，就来软的。决定对李季风采取“怀柔政策”，图谋以“软化”手段，争取和感化他，使之彻底归顺，为他们推行文化专制和镇压中国人民的反满抗日活动服务。

担任主审的日特田中，狡诈多端，采用迂回审讯方法，让李季风讲出谁是共产党或国民党。李季风将计就计，说他认识共产党与国民党在长春的主要负责人和若干人员，如果相信他，他可以领着去捉。因为他讲的活灵活现，敌特田中信以为真，令季风把这些人的名字和地址说出来。季风说：“这些人的住址不固定，使用化名，他们也不告诉我真实情况，但我认识他们，我可领你们到街上去认。”田中高兴地说：“好！那你就领我们去吧。”季风指着自己的穿着和蓬头垢面的模样说：“这副样子到外边去，怎么行，人家很机警，见我囚犯模样，远远地就躲起来了。而且，我也不能从警察厅出出入入，叫人家盯上了，我们的计划就破产了。”

1942年1月，李季风被转移到长春市头道沟中央通中村旅馆（特务据点）二楼住下，给他理发、洗澡，还换了新衣裳，伙食上也给以“优待”，允许有一定范围的行动自由。房间里有两名特务“陪伴”他，楼梯口也有特务守着，监视他的行动。

1月13日早晨，空中飘着雪花，西北风刮个不停。李季风起床后，到二楼盥漱室洗脸、刷牙。环顾四周，发现监视他的特务不在身边。立刻出现一个念头：这不是逃脱魔窟的极好机会吗！于是，他毫不犹豫地用力推开窗户，纵身跳下去。碰巧跌落在下面的棚厦顶上，棚盖踏成个大窟窿，堕落在地上，脚骨摔伤，手、脸也划出血来。他忍着伤痛，一瘸一拐地顺一条

小胡同向前跑去。恰在此时，从身后驶来一辆人力三轮车。李季风坦率地对车夫说："警察抓我，我脱逃了。后边有警察追捕，我要坐你车，请你救救我。"车夫同情他的遭遇，说了声"我也是中国人"，叫他快上车，车子疾速地向前奔驰。

跑了一段路，人力车夫拦了一辆马车，对李季风说：你赶快换一辆车，以免警察发现。并嘱咐马车夫一定把客人送到家。李季风在两位车夫的热情帮助下，逃出了虎口。下车后，他踉踉跄跄地来到了住在伪皇宫附近太平街的于长春家。

于长春（现名于海春，住哈尔滨市道里友谊路39号）当年20岁，伪新京市邮政局职员。思想进步，有民族正义感，他喜爱文艺，常写作品向报社投稿，因此与李季风相识。彼此相处甚密，后经李季风介绍参加了"青年读书会"。于的家庭生活贫苦，靠微薄工薪度日，老少三辈挤在一间狭小的房子里。

李季风的突然出现，一时把于长春惊呆了。他紧握李的手问道："你什么时候出来的？怎么又到了我家？"李季风简要地把脱逃经过述说了一遍。对于说："我求你帮助我离开这个地方，我要投奔抗联去。"

于听后，激动地说："你放心，我想尽一切办法帮助你。不过现在不能走，他们正在追捕你。你先在我家吃点饭，休息一下，我们再想办法。"

李季风在于家躲藏了一天。当天晚上，于从柜中拿出他祖父穿过的棉袍子，还找出棉裤和棉帽给李换上，并亲自给李剃了光点（原留分头）。又找出一根扁担和两只挑筐，准备化装成小贩。

李季风的英勇行为，深深地感动了于长春。他想：我也是个中国青年，有血、有肉。李季风要走的路，我为什么不能走呢！他毅然决定，跟随他一块走，投奔抗联，杀敌报国。开始，

李季风不同意带他走。对于说："你拉家带口的，生活挺困难。你走了，抛下父母和弟妹们，有谁来照顾他们呢！"但因见于决心坚定，李季风只好答应下来。

1月14日，天刚蒙蒙亮，李、于二人吃过饭，伪装成收购破烂的小贩，肩上挑着筐，手里拎着秤，边走边吆喝着，就这样混出了长春城。

长春到吉林120公里。可是，他们冒着凛冽刺骨的寒风，踏着冰雪覆盖的乡路，绕过一道道堵截的关卡，混过一次次卡哨的盘查；饿了找个僻静人家讨口饭吃，黑夜投宿农家，走了4天，才到吉林市。

第二天，他们去市里寻找一位中共地下党员，打算通过他指明投奔抗日联军的路线。不巧，此人早已离开吉林，不知去向。无奈，他们到一家过去认识的书店住下。书店主人说：抗联已撤到苏联境内，你们投奔谁呀？往苏联跑，国境线又过不去。李季风猛然想起从前李作东跟他讲过：天津东南有八路军的游击区，看来，只有进关投奔共产党这一条路了。到关里去，路途遥远，没有路费怎么成？眼下身上携带的有限的几个钱，也快花光了。他们商量先让李季风暂在书店后屋躲藏，于长春返回长春筹集路费。

1月21日，于长春乘火车抵达长春时已是万家灯火，他在候车室停留了很长时间。待人迹逐渐稀少时，才朝家中走去。刚踏进家门口，突然窜上来两个在那里守候多时的特务，将他逮捕了。

1月22日上午，日特田中和关忠显、张德，将于长春从监号中提出来，领到押在另一监号的李坤影面前，当面对质，辨别人像。他们互相表示认识后，于被带走审讯。离开时，他扔在地上一个纸条。李坤影拾起打开，上写："季风在吉林书店，

请你放心。”得知李季风安然无恙，心中无比喜悦和安慰。她怕被敌特发现，将纸条撕碎后放入口中嚼咽下去，瞒过敌人。

同一天，日特田中经过调查便率关忠显和张德，去吉林市那家书店又逮捕了李季风。

第二次越狱

李季风越狱被捕后，敌特并未刑讯。他们故作姿态，装成“宽宏大量”的样子，将李关押在伪首都警察厅后院小红楼特设的监房里，继续作“怀柔工作”。监房内备有床、桌、椅和壶、碗等生活用品。白天允许他到监房外走动，可看报纸、杂志和阅读规定范围的书籍，伙食上也“特别优待”。

日特田中贞夫每天与李季风接触。这时他因镇压中国人民反满抗日活动“有功”，晋升为特务科特高股长和警佐。田中整天用甜言蜜语和以特殊生活待遇来“开导、感化”他，还封官许愿。田中说：“你要彻底归顺，好好给我们干活，可给你一个警尉的官当。”对田中提出的“优厚待遇”，李季风当面不加可否，一笑置之，采取敷衍态度。在生活上，也不拒绝田中的“帮忙和照顾”。

1942年7月，李坤影被关押7个月后，因要临产，取保释放回娘家居住。此后，她常去探监或送食品、杂物给李季风。李坤影回忆说：“有一次我去探监时，季风暗中悄声对我说：‘你放心，哪管是一口唾沫，若是对敌人有利的话，我也要把它咽到肚子里。’”果然，李季风用他的实际行动，履行了他的诺言。

据伪首都警察厅警察副总监兼首都地方保安局长三田正夫供述：“《镇压作家李季风共产主义活动之罪行补充》，使其记述理论，但李季风未答应。”

1943年初夏，关沫南、王光逖因“左翼文艺事件”于1941

年“一二·三0事件”中在哈尔滨被捕。数月后，解来伪首都警察厅与李季风关押在一个监房里。像对待李季风那样，对关、王也采取“怀柔政策”。特务科长平岗修治指派日特新保广和警长赵洪升负责看管他们三个人。每天叫他们翻阅报纸、杂志等作品，从中分析哪些文章含有反满抗日的内容，或属于左翼文艺作品。然后写出书面报告或心得材料交给新保，由他送到特务科检阅。

1943年（伪康德10年）11月5日。从早晨开始，降了入冬以来的头场大雪，纷纷扬扬的雪花漫天飞舞，大地换上了银装。

李季风起床后，透过玻璃窗看了一阵雪景，不禁触景生情，感慨万千。他想到一年零四个月的铁窗生活，虚度年华；想起了备受苦难的妻子和尚未见面的女儿；想起了共赴国难的战友；想起了国耻未雪，倭寇未除，家仇未报……这些都使李季风陷入极大的痛苦之中。

李季风打扫完监房和走廊后，手提大水壶，准备去水房打水，只见王光逊用日语与日本看守新保聊天。王为了逗趣，竟使用诙谐和下流语言，还用手比划着，逗得新保哈哈大笑，放松了对李季风的监视。

李季风见此情景，觉得这正是脱逃的好机会。他急忙来到水房旁，见通向院外的小便门没上锁，半掩着。遂即扔下水壶，转身挤出小便门，穿越大同大街（现斯大林大街），急忙向东南方向走去。

天公作美，踏过的脚印，随即被大雪覆盖。他大摇大摆地进了“满洲国协和会中央本部”大楼。

伪满协和会中央本部《青年文化》杂志主编王天穆见李季风的突然出现甚为惊讶，因为他知道李季风被捕的一切详情。王是位热血青年，有强烈的民族正义感。他与李季风在文艺战线

上，具有相同的立场和观点，因此结下了深厚的革命友情。王天穆毫不迟疑地答应掩护李季风逃脱虎口。

为躲避一下敌人追捕的锋芒，王天穆让李季风先藏在楼下一间厕所里，然后把门钉上，再贴上一张纸条，上写："便所坏了，禁止使用。"每天夜间他送饭给李吃，还随时告诉外边追捕的风声。李季风在又脏又臭，不足4平方米的便所里，度过了6天6夜。

11月11日凌晨，李季风穿上王天穆给准备的大衣，棉裤和棉鞋、帽，打扮成商人模样，带着王给弄到的伪协和会某人的名片，让他去抚顺市躲藏。在王的掩护下，他走出伪协和会本部大楼，避开盘查森严的长春车站，绕道 直奔孟家屯，登上南行的火车，离开了长春。

四海漂泊的传奇人物

李季风第二次越狱，搅得敌人慌乱一团。特务们受到主子的斥责和痛骂。长春市内出动了大批警察，还动员日伪宪兵队（团）秘密警察——伪首都地方保安局的特务们也参加了大搜捕。

伪警务总局（直属伪国务院）向全满发了《通缉令》，并出重金悬赏缉拿。动员"全满10万警员"和地方衙署的乡丁，在东北城乡集镇、交通要道、车站、码头和繁华场所，设岗立哨盘查过往行人。

在伪首都警察厅特务科长平岗修治指挥下，以该厅特务科、外事科为主体，吸收市内各警察署特务系人员参加，成立若干搜捕小组，到邻近各县城镇搜捕堵截。同时，派特务去大、中、小学手持李季风照片，发动师生协助检举。为追查李的下落，还逮捕了与李季风有交往的50余人。李越狱当天，其妻李坤影也

被逮捕，关押7天后才获释，但每天都有特务跟踪、监视。

李季风到抚顺市找到张烈（解放后曾任抚顺市郊区文化局长，已离休）后，说明王天穆介绍的来意，并掏出伪协和会某人的名片，张便收留了他。张烈（笔名冰旅）是抚顺市文艺界的青年作家，他对季风素怀敬仰之情，虽知他是“通缉犯”，也宁愿冒风险来掩护。

李季风在张家隐藏了20余天，经常与张烈研究抗日文艺发展方向等问题。有时讨论很激烈，张的父母察觉后，怕受牵连，不愿再留李住下去。李季风不顾张烈恳切挽留，毅然辞别张家，登车到了盖县。

李季风到盖县，投奔到于家麟（笔名驼子，诗人、作家）处。于与李季风是早年结交的朋友，他愿意掩护李，把他安置在张克恩家住下。不久，张在工作单位出了事，怕受检查，又将李转移到夕澄（作家）家中。

在接触中，李季风发现于倾向三民主义，而他却信仰共产主义，在讨论问题时，经常各抒己见。李季风觉得，虽是朋友，但政治观点不一致，很难达到感情上的融洽，因此不能久留。根据李的要求，于让夕澄去沈阳找花喜露（笔名田贲）。花这时已放弃写作，以小职员身份为掩护，在沈阳从事中共地下党工作，搜集敌伪情报。

花同意掩护李季风，但对夕澄提出三个条件：1. 季风送来后，于家麟等人不得过问他的去向；2. 不许于等人再和季风联系；3. 一切绝对保密。花和夕澄达成协议。1944年2月初（春节前）李季风经过化妆由夕澄陪同，到了花喜露家中。

李季风与花畅谈几日，便要求参加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花请示上级后，认为李正受敌人通缉追捕，不宜参加工作。随后花又将他送到本溪市找一个隐蔽地点住下，学习党的文献和书

籍。

4月间，花喜露因“文艺事件”在沈阳被日本宪兵队逮捕，李季风担心暴露，离开本溪，又回到沈阳。

李季风两次越狱，轰动了全东北。社会上传播着神话般的传奇故事，把他描绘得活灵活现。

有人说：“李季风不但文章写得好，还练就一身好武艺。”说他会飞檐走壁，攀越高墙，如履平地，从高楼跳下，像棉团一样，柔软无声；说他长一双飞毛腿，夜行一千，昼跑八百；还说他会“破牢术”，吹一口气，牢门便自动启开；李会“定身法”，用手一指，能使警察动弹不得。还有说他会什么“分身法”、“遁身法”等等。这些神话般的传说，不胫而走，添枝加叶，把李季风形容得活象孙悟空一般。

敌特机关将这些民间传说，当作“流言蜚语”，下令禁止传播，并追查、逮捕了“谣言制造者”。但敌人的“禁令”和恫吓，老百姓只当耳旁风，茶余饭后照样悄悄地议论着。

巧施“调虎离山计”

李季风第二次越狱5个多月了，与家人断绝了联系，家人不知他的去向。

1944年5月，一天早晨，李坤影正同她家人吃早饭。突然见到李季风出现在面前，顿时引起全家人的惊讶。

李坤影撂下饭碗，诧异地问：“你从什么地方回来的？太冒险了！现在警察到处抓你。”李季风微笑着说：“没关系，我在四平打电话，把他们调开了。”随后要求李坤影马上收拾一下跟他走。李坤影问：“到什么地方去？到关内去吗？”李季风答：“不去关内。”李坤影接着说：“为什么不去关内？如果去关内，我可跟你走，若是留在东北，太危险了！不是自投罗网吗？”李

季风板起面孔，满带自信地说"东北也不全是日本鬼子的天下，好多地方可容我们安身。"李坤影说："不去关内，我不跟你走，太冒险啦，若跟你走，我们全家人都完啦！"李季风又说了几句恳求的话。李坤影怕时间呆长了，被特务发现，催促说："对门煎饼铺里，有特务监视，你要赶快离开！"老人让他吃饭，他没吃。李季风见妻子执意不走，就急匆匆地离开了家。怕被特务发觉，李坤影和他的父母没敢送出门来。

李季风走后，全家人紧张起来，饭也吃不下去了。老母眼含热泪自言自语地叨咕："人家冒着危险回家来，也没吃口饭，就给撵走了，太过意不去了。"日后，老人每想到这里，总是追悔莫及，成为一大憾事。

李季风这次秘密回家，为转移特务的视线，巧施了"调虎离山计"。

他在四平下车，给伪首都警察厅值班室打电话说："有人在四平发现李季风了，你们马上派人来捉，我在这里等你们。"

敌特信以为真。由特高股长田中带领日特工藤、池田、藤田和清水等，驱车赶来。到四平后，到处找不到这个打电话的人，方恍然大悟，知道上了当。气得日特们暴跳如雷，哇啦哇啦地乱叫一通，连夜返回长春。

李季风的"调虎离山计"虽然暂时避开了敌人，但是暴露了目标。敌人判断：打电话的人，可能是李季风在戏弄他们。于是，他们把追捕的重点放在去四平、沈阳和南满的一些城市，并派遣日特长期驻守巡查。

"身在曹营心在汉"

李季风从本溪回到沈阳后，有家难奔，有亲难投，囊中一贫如洗，食宿相当艰难，并且时时受到敌人通缉追捕的威胁。由

于走投无路，他决定投靠地下国民党东北党务专员罗大愚。一可栖身，二可借助他的力量，继续从事反满抗日活动。

李季风早在伪《大同报》工作时，在长春曾结识《新时代》社经理王觉（王存厚、吴仲元）。伪康德8年（1941年）端午节前后，他同王觉一块去沈阳会见过罗大愚。罗拨出伪币7千元资助创办《新时代》社。这次会见，罗指示："开展运动，不能单纯追求数量，必须注意质量。要通过交朋友，努力发展优秀同志。"他们还讨论了其它问题。同年7月，王觉因健康情况，曾委托李季风代表《新时代》社参加了伪治安部召开的北满及西南地区的宣抚工作会议，这是李季风认识罗大愚的原因。

1944年5月，某日，罗大愚来到韩庭桂（韩又新，沈阳市委党校工作，1988年病故）家。对韩说："李季风越狱啦，你掩护一下。此人左倾，虚无主义。我们国民党的人和工作，都不要对他讲，你要看着他。"不久，李季风被安排在地下国民党员董国材（伪军汽车连连长。解放后被长春市人民法院判刑10年）家隐蔽。

李季风接受了罗大愚让他编辑《东北公论》（油印）的任务。《东北公论》是国民党东北党务专员办事处的"东北通讯社"地下刊物，负责人为高士嘉。接着韩庭桂也奉命住到董国材家，负责编辑《时事月刊》；李季风当时编《黑白丛刊》。

此间，李季风以笔名文起，写了中篇小说《三姊妹》，内容直接宣传反满抗日；还写了《血的教训》，总结他自己建立的"青年读书会"、王觉的《新时代》社和刘荣久的"铁血同盟"的失败教训。

李季风此时虽然在食宿方面得到了安置，并可继续从事反满抗日活动，但他心情不畅，不愿委曲求全，颇有"身在曹营心在汉"之感。

一天黑夜，李季风跳墙出去找到了高曼侠（现名高瞻）家。高见是李季风，感到很惊讶。李季风安慰高说："不要怕，有两条路你可选择：我的头值钱，日本人用上千元悬赏，你把我送到特高课，可得一大笔赏金；或者做我的朋友，把我掩护起来。"

高曼侠说："我也是中国人，我也爱国，有志于反满抗日，怎能为得赏钱出卖朋友！"

"你不怕受连累吗？"季风问。

"我不怕。你就在我家住下吧。"高说。

这次见面，李季风向高透露了他和国民党的关系问题。他们最后得出这样的结论："这属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只要真心抗日爱国，就可以合作。"

1944年6月，罗大愚下令改组地下国民党。对凡参加"东北抗战机构"者，一律发展为国民党员。在研究是否吸收李季风入党时，罗曾说："李季风思想左倾，他所以接近我们，是因为没有地方隐蔽。"罗又说："不分信仰，左的也吸收进来，搞抗日统一战线。"

1944年7月9日——8月19日，李季风参加"东北党专"开办的第二期党务干部训练班，被编在第三组，地点在沈阳市大什字街。同组受训的有韩庭桂、董国材和董海兰（真名赵文波，系董国材之妻，现住北京），指导员张宝慈（"镇反"时被沈阳市人民法院判处死刑）。训练班结束时，李季风与韩、董等人一同宣誓参加了国民党。监誓人张宝慈，是"东北党专"第二负责人。不久，李季风被安排住在博文书店肇如一家的楼上。

同年9月，李季风担任"东北通讯社"第一通讯部（沈阳）主任。该部的编审员是董海兰（赵文波）、干事杨承教。此间，出版的刊物有《公理》半月刊（共出4期）、《拓光》半月刊（共出7期），还编印了各种刊物15种之多。

“东北党专”为纪念在“一二·三0事件”中殉难的英烈，表彰4位同志的革命精神，于沈阳秘密设立博远（贾桂林）图书馆，于长春设立硕强（张辅三）图书馆、于齐齐哈尔设立富衡图书馆，于营口设立吴仲元（汪觉）图书馆。

1944年9月18日，为纪念“国耻日”，博远图书馆正式开馆，李季风任馆长，赵文波为干事。地点在沈阳市小南门里，藏书500册。

李季风加入国民党后，专心致志地从事抗日的宣传工作，作出了突出贡献，李季风与韩庭桂一起，于1945年春节，还利用印制贺年片的形式，把爱国抗日的宣传口号印在背面，投寄各地。但张宝慈要求他把力量放在发展组织上。他对此很苦恼，感到左右为难。后经高曼侠介绍，认识了关岳，又把关也拉进了国民党。

1945年初，李季风与张宝慈产生了矛盾。主要是因李季风偷看了蒋介石的一份秘密手谕。内中严饬国民党机构，今后要“三分抗日，七分反共”。他醒悟到国民党原来抗日是假，反共是真。李季风信仰共产主义，怎能与国民党合作反共呢！他悔恨自己政治上无知，走错了路。

李季风为了保持政治上的清白，向张宝慈提出了“退出国民党”的申请，并要求给书面批准手续。开始时，张不批准，李又强烈要求。此时，关岳从“东北党专”上层得知消息，再三劝阻李季风说：“你不干国民党，讲完就算了，何必非要什么批准手续呢！这样，对你不利呀！”李季风不听劝告，他满不在乎地说：“张宝慈能把我咋的！现在是日本人的天下，他敢搞暗杀。”

由于李季风要求退党强烈，张宝慈答应：“你在后天午前来吧，我们给你办手续。”

我是李季风

李季风第二次越狱后，在外流浪、隐蔽已1年零5个多月。虽然战争形势日趋紧张，但日特并未放松追捕活动。

1945年4月中旬，某日，李季风为领取“书面退党手续”朝张宝慈的秘密据点走去。

行至沈阳市中街西华门附近，突然碰上了在那里巡查的伪首都警察厅特高股长田中贞夫和日特西田。他们是“老相识”了，李季风躲藏不及。日特上来捉捕时，他奋力反抗，撕打起来。田中身材矮小，被李季风挥拳打翻在地。欲脱身时，西田吹笛报警，立刻召来几个伪警察。李身单势孤，终于被捕。

沈阳中街是商业闹市。李季风拒捕时，围观的人挤满了闹市。他为制造声势，向同志们报警，当众放声高喊：“我是李季风！李季风被捕啦！我反满抗日，我要爱国！”连喊数声，气贯长虹。围观的人，知他是李季风，对凶残的日寇，无不怒目而视；对他为爱国抗日身遭不测流下了眼泪。

李季风被关押在沈阳市北陵秘密监狱，警戒森严，对外封锁一切消息。敌人准备随时杀害他。

他倒在血泊中

1945年“八·一五”日本投降，举国欢腾，庆祝胜利。

8月17日李季风出狱，恢复了自由。此时，张宝慈等因“五·二三事件”被捕，也相继出狱。

李季风出狱后找到张宝慈，坚持要求批准他退出国民党，还坚持要“书面手续”。开始时，张以“好言相劝”，后见李态度坚决，答应待讨论后给他答复。

8月21日，李季风来到花喜露（田贲，8月19日与铁汉同

志从沈阳市第一监狱出狱）家，谈到要求退党问题。花说："你在东北青年中，有那么大的影响，你退出国民党，投奔共产党，他们能容你吗？东北青年被你号召过去，那还了得！"

李季风说："我就是号召青年不上国民党的当。"

花说："不要天真，人家不会答应的。依我之见，你赶紧离开沈阳，到别的地方去，最好到解放区去。"

李季风仍然坚持。认为只有在这里和国民党争夺东北青年才有意义。

8月23日，张宝慈终于答应办理退党手续。由杨春和到高曼侠家（李当时住高家）来领李季风。他们走到沈阳市大东关什字街时（离高家不远），张宝慈手下的"铁血锄奸团"团长齐觉生突然出现。李季风意识到不妙，与杨春和急速拐向一家大门口，刚走到门洞，罪恶的枪声响了，子弹穿透他的右腹，李季风倒在血泊中。

杨春和知道是齐觉生开的枪，他吓得扔掉自行车，越墙跑到城内图书馆找关岳。关又找到高曼侠一块去抢救。他们很快赶到出事地点，用门板把他送到小河沿盛京施医院。这时李季风还清醒。高曼侠问他："谁打的？"李季风说："我知道。"高又问："告诉我，是谁？"李季风环视在场的人，摇头不答。因为张宝慈布置的国民党特务分子在左右监视，医护人员不敢抢救，流了6个小时的血，当天下午3点多，眼睁睁地看着李季风气断身亡。时年仅28岁。李季风牺牲后，由高曼侠等人出钱买了棺材，浮厝于沈阳小东边山的珠林寺。

"李季风过早地牺牲了，但他的业绩是伟大的，他是无名英雄。"笔者用夏航同志的话，作为本文的结束语，永远纪念他的革命精神。

（摘自《长春史志》1990年第5、6期）

罗烽在沦陷区的活动

沙金城

罗烽，原名傅乃奇，1909年出生于辽宁省沈阳市郊苏家屯。由于家境贫寒，他自幼备尝生活艰辛，因此走上社会后，对腐朽的统治阶级深恶痛绝，对依稀看到的光明充满憧憬。他如饥似渴地阅读了大量的普罗文学作品，接受了进步思想的熏陶，并开始尝试动笔写作。1929年，罗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踏上了革命的文学之路。最初，他用"洛虹"笔名在《哈尔滨晨报》副刊发表了一些诗歌，内容多为反映下层人民的苦难，带有明显的左翼倾向。

"九·一八"事变后，杨靖宇同志担任北满省委书记兼哈尔滨市委书记，当时在铁路工作的罗烽被任命为铁路特别支部书记，后因文化宣传工作需要，他又调任哈尔滨东区（道外）区委宣传委员。他的家就是地下印刷所，秘密出版不定期的抗日救亡小报。不久，经杨靖宇介绍，他与共产党员诗人金剑啸相识。小报的插图、漫画等美编工作均由金剑啸负责。1932年，哈尔滨松花江堤由于多年失修决口，大水冲入市区。罗烽的家正当决口处，一切东西都来不及搬走，就举家奔赴南岗避难。这样，印刷所的工作被迫停止。

为了开辟新的宣传阵地，党指示罗烽等人到社会报纸上去找地盘。这样，1933年就有了创办一个进步文艺刊物的动议。罗烽与金剑啸商量后，通过作家萧军与长春《大同报》副刊编辑陈华的朋友关系，在该报创办了《夜哨》文艺周刊。《夜哨》于

1933年8月6日创刊，这是我党领导下的东北最早的公开文艺阵地。《大同报》是伪满官办报纸，在敌人报纸上办刊物，一方面要反映反满抗日内容，一方面又防备敌人察觉，在当时是冒着一定风险的。罗烽积极为《夜哨》撰稿，在创刊号上，用“洛虹”笔名发表了独幕话剧《两个阵营的对峙》，以一个疯人院为背景，描写一个精神病患者的不幸遭遇和愤怒，巧妙地表现了存在于当时社会的阶级矛盾和斗争。在第一期上，罗烽发表了《哈市文坛消息》，报道了他与金剑啸在哈尔滨组织星星剧团的情况，使沦陷区人民在这里看到了一片星光。罗烽在《夜哨》上发表的作品还有《口供》、《胜利》，诗歌《说什么胜似天堂》、《从黑暗中鉴别你的路吧》等。从这些富有战斗性的标题，便可使明眼人感受到一股催人奋起的力量。

《夜哨》创刊还不到半年，由于刊登了一篇抗日小说《路》，被敌伪强制停刊，罗烽便和其他进步作家转移到哈尔滨《国际协报》，新创办一个名为《文艺》的副刊，继续沿着《夜哨》的方向前进。罗烽此时改用笔名“彭勃”。

1934年6月18日，由于叛徒徐乃健出卖，罗烽被驻哈尔滨南岗日本领事馆特高系以共产党嫌疑犯罪名逮捕，关在地下室达8个月之久，后被引渡到伪满警察厅拘留。在狱中，他受尽敌人的残酷折磨，家中送衣服亦不准许，冬季仍然穿着单薄的衣服。面对着严刑拷打，罗烽始终坚强不屈，拒不招认。1935年5月下旬，敌人一无所获，最后只得无可奈何地将他释放。分析当时被释原因，罗烽认为有三：一、他被捕时，距满洲省委被破坏已有4个多月，敌人搜捕有所放松；二、除了叛徒口供外，敌人拿不出任何证据；三、党组织铁路工人积极营救，大家捐款买通了日本领事馆高等系副主任高柳。

罗烽出狱不久，便在1935年9月与白朗一道，秘密地逃离

了哈尔滨。经过艰难的旅程，取道大连走海路到达了上海，住到了萧军、萧红的家中。他们两家在一所房子里住了2个多月。后来，二萧作品发表多起来，经济上有了好转，同时也因为两家住在一起影响写作，二萧便另找房子搬走了。

在上海安顿下来后，罗烽通过先期到达的东北作家舒群结识了周扬同志并接上了党的关系，同时加入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做“左联”工作的同时，罗烽开始了他文学创作的新时期。

（摘自《东北新文学初探》1989年版）

萧红与《夜哨》

沙金城

《夜哨》是1933年8月6日创刊的文艺周刊，为伪满傀儡政府官办的长春《大同报》的副刊。《大同报》原有一副刊《大同俱乐部》，其宗旨在该刊“征文启事”中可以得知：

盖闻大同要义，在畛域无分，俱乐精神，贵雅賞。本部爰本斯旨，并蓄兼收，以期体王道与民同乐之心，为国家歌舞升平之助……

其目的显然在于替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行径涂脂抹粉，欺骗群众。1933年，东北各地军民尚有多处在英勇抵抗日军，日伪当局由于军事上的牵扯，虽然也设立了“弘报处”、“情报处”等专门机构监督文艺宣传，不过由于他们在东北站脚未稳，自顾不暇，对于文艺的控制还是不甚严密的。所以，一些健康进步的作品有时也能在《大同俱乐部》上发表，如萧军的《杀鱼》，

萧红的《弃儿》、《腿上的绷带》、《太太与西瓜》等。然而，这毕竟不是我们自己的刊物，登载的好作品是极其有限的。为了扩大党的宣传阵地，教育广大群众，打击汉奸文艺，共产党员作家罗烽与金剑啸等同志商量，决定通过进步作家萧军与《大同报》编辑陈华的朋友关系，在该报创办《夜哨》周刊。经过大家一番努力，《夜哨》以崭新的面貌出现在读者面前了。

《夜哨》的刊名是萧红起的，表示“夜里值岗”之意，即警惕敌人。刊头是金剑啸设计的：上半部是茫茫黑夜，象征敌寇的黑暗统治；中间是一片大地，象征着东北国土；底部是一道道铁丝网，象征着法西斯的暴行。这蕴藏悲愤的画面，与《大同俱乐部》的裸体女人刊头形成了强烈的对照，激励着人民奋起反抗。在创刊号上，陈华用“权”笔名发表了《生命的力》一文代发刊词。文章针对青年们的“彷徨、踌躇，甚至随波逐流的盲从”，强调看重“自己生命的力”。刊于同期署名“涔涔”的诗《解放》，可以说是号召人民起来斗争的震聋发聩的呐喊：

> 你们像是牢狱里的罪犯，
> 紧缠着笨重的铁链。
> 如今，一团烈火燃烧着——
> 铁锁链就要被毁，
> 打开牢狱之门前进，
> 光明就在你眼前出现！
>
> 再也不能安分地期待，
> 期待只是受那重重的割宰。
> 如今，奴隶们只有一条路——
> 钢铁一般团结起来，
> 伟人一般看重自己，

把铁锁链毁断，

去欢迎那光明的出现！

这首诗，代表了《夜哨》作品的基本倾向，也概括了萧红《夜哨》阶段创作的基本主题。

《夜哨》发刊还不到半年，就在1933年12月24日被迫停刊了。有的文章说，《夜哨》停刊的原因是由于“萧军在一篇文章中，描写了日本军队在农村强奸妇女的事实”。这是不确切的。萧军在《夜哨》上共发表了五首诗、一篇散文。这篇散文还是由于陈华责备他写作不勤而作的。陈华在给萧军的信中开玩笑说，再不寄稿来，就停办《夜哨》，并登个启事，写上“三郎始勤终惰，半路抽条，文艺同仁，其声共讨”。查这篇散文中并无抗日内容。事实上是李文光以“星”笔名发表在《夜哨》上的中篇小说《路》（连载十三期），揭露了日本兵在农村的暴行，由于过于明显，引起了敌人的注意。陈华立刻给萧军写了一封告急信，请他“将家中所有不妥报纸及书物速烧掉，不日宪兵或要到你处搜查”。在这样险恶的情况下，《夜哨》只好停刊了。《夜哨》的作者大部分转移到哈尔滨《国际协报》的副刊《文艺》。

《夜哨》的终刊号为第十八期，实际出了二十一期，其中创刊号另为一期，第六期、第十四期重复。在这二十一期中，有十四期刊载了萧红的作品，计有：《两个青蛙》、《小黑狗》、《八月天》（诗）、《哑老人》、《夜风》、《叶子》、《中秋节》（署名“玲玲”）、《清晨的马路上》、《渺茫中》、《烦扰的一日》10篇。在《夜哨》的作者中，萧红是最勤奋的。从篇目来说，她仅次于山丁（梁倩），就篇幅而言，萧红则居第一。

萧红在《夜哨》上发表的作品表现的思想内容，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对旧世界血泪斑斑的控诉

这些作品所反映的背景是“九·一八”事变后不久敌伪统治下的中国东北城乡。在日本帝国主义的血腥侵略，封建地主、买办资产阶级的残酷压榨双重压迫之下，东北人民已经无法生存下去，他们饥寒交迫，日夜挣扎在死亡线上。萧红，这个封建地主家庭的叛逆者，由于坎坷的经历，困厄的生活，使她亲身体验到了黑暗社会的压迫，亲眼目睹了下层人民的苦难，从而把自己的命运与广大人民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所以，她一执笔，就站在被压迫阶级的立场上对那万恶的旧世界进行了血泪斑斑的控诉。

在《哑老人》中，作者对罪恶社会的产物——乞丐的生活作了这样的描写：

破落的家屋，地板有洞，三张草帘仍在地板上，可是都是空的。窗户用麻袋或是破衣塞着。有阴风在屋里飘走，终年没有阳光。

但是，就是这样的生活也难以持久。老乞丐唯一的希望和安慰——孙女小岚因为回家探望有病的爷爷，竟被女工头毒打而死。在无依无靠的情况下，老人只好挣扎着在大雪中爬着去讨饭，但是“什么也没讨到”。最后，“又哑又聋又患病”的老乞丐在失火时活活被烧死了。小说描绘的这幅悲惨图景，令人目不忍睹。

在《清晨的马路上》一文里，描写的乞丐是一个“残废没有小腿把鞋子穿到手上用胳膊来帮助行走”去讨饭的人。他过马路时，差点被汽车轧死。在《烦扰的一日》里，也有一个年老而昏聋的乞丐，“在锐利的风中站立”。可以想见，在伪满洲国，他们的归宿也必然同哑老人一样，是死路一条。

作者笔下出现这么多的乞丐，是有深刻意义的。用乞丐来

反映当时社会经济崩溃、人民破产的黑暗现实，是十分有说服力的。

穷人平时就吃不饱穿不暖，要是得了病，更是雪上加霜了。在《清晨的马路上》，“小林的爸爸患着咳嗽病，终年不能停息”，明知道西药铺有止咳药，可是没钱买，只好在病魔的折磨下，过着度日如年的生活。

在《小黑狗》中作者描写了一群小狗的死。这些小狗下生后不久，房东太太就对它们做了判决：

这一大群什么用也没有，一个好看的也没有，过几天把它们远远地送到马路上去。

作者写小狗之死的用意，借文中人物的口说了出来：

一个小狗死在这没有阳光的地方，你觉得可怜么？年老的叫化子不能寻食，死在阴沟里，或是黑暗的街道上。女人，孩子，就是年轻人失了业的时候也是一样。

萧红是满怀同情之心，流着泪去描写这些不能掌握自己命运的下层人民的悲惨遭遇，愤怒地控诉了反动统治阶级给人民造成的深重灾难，戳穿了所谓“天下大同”、“王道乐土”、“歌舞升平”的谎言。这不但在当时起到了教育人民的作用，就是今天对我们认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也是很生动的教科书。

（二）为妇女不幸的命运呼号

毛泽东同志指出，在中国封建社会，妇女除了同男人一样，要受政权、族权、神权支配以外，“还受男子的支配（夫权）”。萧红早年深受封建家庭包办的婚姻之害，加上那个所谓未婚夫的欺骗，是对“男子的支配”，有着本能的仇视的。在逝世前几天，她曾对人说：“我最大的悲哀和苦痛，便是做了女人。”她亲自尝受了旧制度下妇女的“悲哀和苦痛”，所以，她的一支笔，

始终没有忘记在作品中表现“男女平等，妇女解放”的主题，在《夜哨》中的几篇也是同样。

萧红通过描写这些妇女的悲剧，强烈地表达了她对妇女不幸命运的深切同情，以及要解除封建夫权的热切愿望。

（三）对劳动人民高贵品质的讴歌

萧红满怀深情地在作品中刻划了下层人民身上的高贵品质，热情地歌颂了劳动人民的善良、无私与强烈的阶级同情心。萧军在《跋涉·书后》中指出的：“唯有你同一阶级的人们，才能真的援助和同情你。”这是两萧当时共同的认识。这样的认识也体现在萧红的诗《八月天》中：

听说你的父亲是死在工厂里，

我的父亲也是死在工厂里。

我们两个不都是一样孤独么，

为什么不出来会见？

……

我不是谁家的小姐，

我穿着和你同样褴褛的衣裳！

“九·一八”事变后的东北诗坛，“旧的诗已变成了骷髅的跳舞，而新的却又是一些花呀，月呀的堆集”。萧红这首诗，犹如一阵清新的风，吹进了诗坛，一扫乌烟瘴气，给新诗创作开辟了一条新路，即：描写人民，表现人民。

（四）揭示了人民群众的觉醒与反抗

在《两个青蛙》中的青年学生秦铮面对“猩红热、虎列拉……各样的传染病都有，只有传染病，没有医生”的丑恶现实，“真希望死了”。这是很能代表当时相当一部分青年的苦闷精神状态的。在平野的帮助下，她认识到“想要死的人，那是自私或是个人主义的变态”。她看到了自己的责任，勇敢地投入到与

现实的斗争中去。作者没有交代这对青年的政治面貌，但我们从“秦铮的父亲处死刑了。第二天秦铮被捕了，接着就是平野”，在这简单的叙述中可以知道，他们是在反抗敌伪的斗争中被杀头与坐牢的革命者。《清晨的马路上》里的大林及王老头的儿子北钟“常常不归家”，受到敌人的追捕，显然是在进行着抗日活动。

《夜风》形象地告诉读者：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只要人民群众和党所领导的革命军队团结作战，就一定能推翻貌似强大的统治阶级。萧红在《夜风》中为生活在暗无天日的伪满洲国的广大贫苦农民指出了一条求解放的光明大道，这一方面固然是与党的帮助分不开的，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她坚持了现实主义创作的原则。《夜风》是早期东北文学现实主义作品中最优秀的篇章之一。

萧红在《夜哨》上的创作，不但具有很强的思想性，而且在艺术上也取得了初步成就。

首先，语言朴素，真实地反映了当时东北城乡的社会生活。作者取材于当时社会中常见的生活现象，给予艺术地再现。那些生活现象，如乞丐站立街头、女人受男人的压迫，十分平凡，毫无传奇色彩，一般人往往熟视无睹，意识不到其中所包含的社会意义。萧红却以她那女性特有的细致入微的洞察力，捕捉住这些社会中的人情世故，使用朴素无华的语言，使之像丰富的生活本身那样，真实地再现在读者面前，让人们认识到，这些生活现象的产生，正是社会制度造成的。由于语言朴素，更接近于生活真实；由于其真实，更增加了作品的感染力。

正如大多数作家一样，萧红在创作初期，也还存在着一定的缺点。《夜哨》阶段是萧红文学创作的起步阶段，在思想上，她还没有升华到自觉阶段，对待人民群众，还仅局限于同情。除

《夜风》之外，其余几篇都过多地笼罩着无可奈何的阴云。在艺术上，文笔还显得幼稚；体裁划分不够严谨，有些作品很难说是小说还是散文。不过，这些都是她在现实主义道路上前进中的不足，是璧玉中之微瑕。

萧红在《夜哨》上发表的作品，在东北现代文学史上曾产生很大影响。早在38年前，有人在总结东北沦陷时期文学时就指出，萧红的那些作品，“不单是哈尔滨，就是整个东北文坛也都为之轰动，博得一致的好评。”还有人说，由于“在她的犀利的笔致下，写出了小市民的悲哀和东北农村的破产，实给予了沉闷中的东北文学者以极大的冲动。”

（摘自《东北新文学初探》1989年版）

暗夜里燃烧的火花
——谈王秋萤在东北沦陷时期的小说创作

李春燕

一

在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践踏祖国东北大地的时候，以文艺为武器进行反抗和斗争的有萧军、萧红、舒群、罗烽、白朗、金剑啸等进步作家，而当他们之中大都先后离开东北进关以后，一批新起的文学青年，继承和发扬了“五·四”新文学的革命传统和战斗精神，以民族的自决心理和爱国的责任感，在文艺战线上，继续坚持着反抗和斗争。王秋萤就是其中的一个代表。

早在中学读书时代，王秋萤就喜爱文学。鲁迅的杂文，巴金和蒋光慈等作家的作品都给了他一定的影响。于是他练习写

小诗，写儿歌，也写散文，特别是当一首小诗在沈阳《新民晚报》的副刊上发表以后，就更增强了他写作的信心。“九·一八”事变的炮火毁坏了他的学业，使他避居家乡山村，然而战火并没有毁灭他那颗热爱文学的心。他经常写些文章寄到报纸发表，并由通信结识了一些文学青年。1933年和同学陈因组织“飘零社”(为纪念旧日同学经过战乱分散离别而取名的文学社团)，在《抚顺民报》出刊《飘零》文艺周刊，后因生活所迫，于1935年考入沈阳《民声晚报》当记者，不到一年就告失业。1937年到长春《大同报》，自此开始了报纸副刊和文艺期刊的编辑工作。他先后编辑的报纸副刊有《大同报》的市内新闻版和《盛京时报》的《文学》；还与陈因等人组成“文选刊行会”，创办大型文学同人刊物《文选》，出刊了“文选丛书”，并编辑《文最》、《文颖》，作为《文选》的姊妹刊。文艺编辑工作和文学社团的组织活动，虽然使他涉足于文学领域，但作为创作基础的，毕竟还是他亲身所经历的生活。

王秋萤出生在辽宁省抚顺县的一个名为新屯的小村子里，正好邻近日寇盘踞的矿区。他的父亲开过小杂货铺，但因不善经营而很快倒闭。后来买了一小块地，却被当地劣绅盗卖给日本煤矿，虽然多年告状，但终因无权无势而几次被投入狱中。因此，在王秋萤的童年时代，留给他印象最深的便是那高大的狱墙、阴森的狱门和狱卒凶恶冷酷的面容了。穷困的生活，使他到处颠沛流离，始终没有得到过安宁。为了寻找工作维持家庭生活，他由抚顺迁居沈阳，又由沈阳搬到长春，不久又返回沈阳谋生。除了生活的动荡，还有政治上的迫害，敌特的监视，乃至逮捕刑讯，使得他这个具有爱国热情和民族意识的文学青年，逐渐成熟，在创作中表现出了忧国忧民的情怀和对民族敌人无比愤恨的思想感情。

王秋萤真正从事文学创作始于1932年。那时，他尝试写剧本，但都不成功。后来，他涉足小说创作，开始并没有引起文坛的注意，可是当《雪地的嫩芽》于1937年在《新青年》月刊发表以后，受到读者的好评，于是他便被称为“小说家”了。自此，他的创作一发而不可收，连续写出了《丧逝》、《三秋草》、《离散》、《羔羊》、《农家女》、《中间层》、《小工车》、《血债》、《矿坑》等几十篇小说。1939年，经过挑选，先后出版了两个短篇小说集，取名《去故集》和《小工车》。1941年，他创作了长篇小说《河流的底层》。

十几年间，在日伪法西斯的高压统治下，他总是通过各种形式，隐晦曲折地反映出被奴役被压迫人民的心声。如果我们把东北沦陷的十四年比作长长的黑夜，那么，王秋萤的小说就是这暗夜里燃烧的火花，透过这火花使人们看到了希望和光明。

二

王秋萤的小说是时代的产物，也是社会生活的真实写照。他的作品最突出的特点，就是描写现实，暴露黑暗。这是他创作的出发点，也是贯穿他全部作品的基调。对此，当时一些在东北沦陷区的日本文化人曾经指责所谓“满系”文学中“暗”的倾向，这当然包括王秋萤的作品在内。可以想见，面对日伪的反动统治，只要是具有民族意识和爱国思想的作家，又怎能抛开亡国之痛和人民之苦而使作品“明朗”起来呢？王秋萤的小说具有阴暗色彩，正是那个特定的黑暗时代所赋予的，也是东北人民救亡图存的真实反映。

收入《去故集》中的9篇小说，大约写于1936年至1939年。这时的东北沦陷区，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交织在一起，并且由于民族矛盾的不断加剧而使人们的生活更加痛苦。王秋萤的小

说虽然没有从正面去反映日益加深的民族矛盾，但他所描绘的人民苦难生活却也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社会的情景。这个短篇集所描写的都是底层人们的生活，他们在黑暗的深渊里，不管怎样地出力、流汗、卖命，到头来终不免被生活所吞噬。一对要好的朋友，因生活的煎熬，一个丧志求生，充任了村公所的小"助理员"，一个虽矢志不移，但也难于在黑暗的社会里求生（《暮景》）；春雨和南风本来是会给人们带来暖意的，可是，春雨滋润不了爱情的嫩芽，穷人有爱而不敢爱（《春雨》）；春风也吹融不了沿街乞讨儿的冰冷的心，因为等待他的是"没有阳光，没有温暖"的阴森恐怖的监狱（《南风》）；人们有家不能归，爱国遭屠杀（《嫩芽》）；生活就像一个大铁笼子一样，禁锢着人们的肉体和精神，"每天铁门的巨响，受刑者的喊叫，监视者的残酷打骂……这一切都震碎每一个人的心"（《羔羊》）；母女两代人，女儿的命运也和母亲的一样不幸，尽管她"不惧怕人世间诡诈与凶险，不惧怕社会上的黑暗与悲惨"，但生活的压迫，经济的拮据，终于使她逃脱不了被有钱有势者欺骗与玩弄的厄运（《两代》）；煤矿工人的生活，更是悲惨与凄楚，整天"出卖劳力与血汗"，却得不到温饱，养不了家口，矿山的生活简直比监狱还痛苦（《矿坑》）。

如果说在描写现实，暴露黑暗上，《去故集》中的小说表现的作家的创作意识还有些模糊的话，那么，收入《小工车》里的8篇作品，却使人看清了作家明确的创作意图。从小说的题目上，就可以窥见作家的良苦用心：《离散》、《农家女》、《丧逝》、《血债》、《三秋草》等等，显然是描写穷人的生活和衰败的景象的。从题材上看，作家的眼界扩大了，不仅写了农村的破产，矿山的重压，而且还描绘了生活在所谓"中间层"的小职员的烦闷和苦恼（《中间层》）。从内容上看，虽然写的大都是穷苦人

们生活的悲剧，但却不是《去故集》的简单重复，而是比较深广地揭示出了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比如《血债》，写的是东北移民的情况，由于日本帝国主义采取武装移民的政策，所以不仅使当地的"一些地主，已经完全变成佃农"，土地全被剥夺了，而且还要镇压人民的反抗，特别是镇压东北抗日联军的反日力量。从这个意义上讲，《血债》所描写的是《去故集》中所没有的。再比如《小工车》，内容虽仍然取材于矿区，写的也是矿工一家人的悲惨遭遇，与《矿坑》有些相似，可以说是它的姊妹篇，但是作家所反映的生活远比《矿坑》复杂得多。这里有赌场，有妓院；有工人的酗酒，有的还到妓院去嫖女人；有矿山的更为严酷的统治，有"把头"的变相剥削和克扣工人的工资，一句话，就是工人的生活更苦了，命运更悲惨了。作家就是通过这些，揭露了日伪统治者对矿山凶残的剥削。

王秋萤的小说主要是描写"暗"的。但是，一个作家如果只是暴露黑暗，从他的作品里看不到一点光明的影子，那么，他的作品就会给人们带来消极的影响。王秋萤的小说之所以博得当时文坛的好评，被称为荒芜文坛上"一种可喜的景象"，"是我们所最需要的食料"，就是因为他在暴露黑暗的同时，投给人们一线光明和希望。对此，老作家山丁在《〈去故集〉的作者》一文中曾经指出：

"秋萤的作品是刻画暗的。这暗则是'明'的希求，是'明'的征候，我们的作家仿佛是一辞送葬的歌手，倘能换出新的，相信也会奏出健康的明朗的声调来。"

是的，王秋萤正是凭借他对祖国的热爱和对人民的同情，以一个作家的崇高责任感，怀着一腔悲愤写下了那个屈辱时代的葬歌。

这里，需要特别提到的是王秋萤的大胆创作的精神。在当

时，描写真实，暴露黑暗，是需要胆量的。王秋萤不畏惧日伪反动文化统治的重压，不服膺于《文艺指导纲要》明令规定之不许，在那“精神的不聋而聋，不哑而哑，同时爱而不能爱，憎又不能憎（王秋萤语）”的畸形生活里，在被特务跟踪监视的险境中，仍然写着以揭露黑暗为主题的小说，真是难能可贵的了。

三

王秋萤的创作，开始是比较幼稚的。这主要表现在他不大注意形象的塑造，而把笔力过多地放在讲述故事上。结果由于人物和故事存在隔离不切的毛病，而使作品失去了感人的力量。例如《春雨》，写的是一对男女青年恋爱的故事，男青年澄因为是穷人家的子弟，所以有爱而不敢爱，最后只好留书出走；而姑娘虽是富有人家的女儿，但却不顾父亲的反对，一心爱上了澄。女儿和父亲的矛盾，颇有些“五·四”以来新女性的特征；女儿的一些话，也是很有进步意义的。只可惜，小说忙于交待故事而忽视了在矛盾中刻划性格，因此，除了干巴巴的几句新的言辞之外，使人看不到形象所应体现的生活内容。后来作者创作日益成熟，便把笔触放在人物上，让人物牵动故事，以故事丰满人物，使小说比较生动感人。这在《小工车》这本短篇小说集里表现的很是明显，主题的鲜明，人物形象和性格的突出，要比《去故集》中的小说好得多。从这里，我们会看到秋萤小说创作的成长过程，也会看到形象的创造确实是一个作家成长的标志。

在秋萤的小说中，写了各式各样的人物，但成为秋萤创造形象系列的，却是那些生活在底层的人们。对这些人，作家倾注了同情，倾注了爱，并且以写实的笔触把他们的生活原原本本地告知人们：究竟为什么他们的生活那样贫困？穷竟为什么

受剥削、受奴役、受压迫，不把他们当成人？启发人们从现实、从社会寻找答案，寻找原因。《羔羊》写的是流浪儿的生活，作家通过“我”也被逮入狱的所见所闻，比较详尽地写出了日伪监狱对失去父母、生活无依无靠的一些流浪儿的虐待，反映出失去祖国的孩子命运的悲惨和日本法西斯的凶狠。再看《离散》，这篇小说写的是一个小家庭的破灭。萍是一个堂堂的男子汉，可是到处找不到职业，不得不靠妻子媛养活自己和女儿。他感到对不起孩子，对不起妻子，面对着“破旧的墙壁，破旧的杂物”，于是一种烦躁的心绪狠狠地咬着他的心。起先，他把烦闷和焦躁发泄到孩子身上，后来，便转移到妻子头上，从漫骂到动手打起来。他学会了喝酒，酒后更容易使他恶骂和毒打女人。对他这暴躁的性格，妻子是原谅的，从来不反抗一句，这更使他为“自己不但没有能力养活女人，同时还无耻地折磨女人”而撕肝裂心。可是，失业的痛苦，日子的穷窘，这生活的重负促其在变态心理的驱使下，终于赶走了女人，那个畏缩惧怕整天躲在角落里的小女儿也因饿病丧身。就这样，一个家庭活活破散了。在这里，作者塑造出一个人性被摧残被蹂躏的失业者形象，更为有力地揭示出了现实社会的黑暗。

注重人物命运的刻划，激起人们复仇的火焰，这是秋萤小说塑造形象的另一个显著特点。秋萤小说中的人物，几乎都是悲剧性的结局。有沿街乞讨的流浪儿；有一辈子娶不起老婆的单身汉；有被地主、官吏霸占侮辱后赶出家门的妇女；也有活活被累死、饿死的老人；有因生活所逼偷盗、抢劫而蹲监坐牢的囚犯；也有丧家离走的失业者……所有这些人物，在秋萤的笔下，命运都是悲惨的。《矿坑》中的张斌一家的遭遇，就是一个代表。张斌凭着自己粗壮的身体整日在煤矿做工，但仍然也娶不起老婆，后来他的朋友周连山在一次煤洞倒塌时被压死，他

才与其遗孀同居，并且“仰望着明天，希冀着未来”，乞求着“到了老年可以过一点温饱的日子”。可是整整十年的光阴过去了，“除了生了两个孩子以外”，不但没有实现他们的幻想，反而一天天堕入贫困的深渊里。当女儿招弟被干子把脑袋打伤住进了医院时，拿不起住院费，这一切逼得张斌走上了偷盗的路，被抓进监狱不久便被折磨死在狱中。这本来就够悲惨了，可是作者为了深入揭示人物的命运，更进一步描写了张斌老婆的生活。张斌死后，她完全失去了依靠，不得不过着乞讨的生活。她甚至产生了死的念头，但一想到孩子还小，便把求生的欲望寄托在孩子身上。后来，由于孙富的死缠、引诱，就又和孙富同居，并且生了孩子。孙富也因穷困下来而经常打骂张斌的遗子，这就使得做母亲的张斌妻子内心十分痛苦，沉重的家务负担，整天压在心头的郁闷，真使她有些喘不过气来，特别是小二的死，更使她感到难于和孙富同居下去了，于是她领着女儿离开了这充满创伤的家庭。有谁看了这人生悲苦的命运和凄惨离散的情景而不产生同情之心呢？

秋萤描写人物的命运从不采取自然主义的态度，哪怕是一些日常生活的小事，也总是把它引到与现实、与社会有关的问题上来。《两代》里可以说没有写什么重大的事件，母亲只求过上平安温饱的生活；女儿芸芳虽然是一个有着理想的少女，但也只不过是一个小学教员，她们所做的一切，既没有什么英雄的壮举，也没有什么引人震惊之处，但是作者把她们放在被侮辱被损害的环境里，于是她们的平常生活就带上了明显的社会色彩。尤其是母女俩最终都成为同一个官僚父子的玩物，这就更使人想见到当时社会的黑暗情形了。小说的结尾发出的“我终久是要活的，我倒要看看社会会把我们这一些不幸者迫害到什么地步”的呼喊，正是黑暗社会所激起的人们的反抗之声，也

是即将燃烧起来的复仇的火焰喷射。这样，就使人物形象和性格的塑造，跳出了家庭和职业的小圈子，而赋予她们以社会和时代的意义。

给人以强烈求生的欲望，鼓舞人们斗争的勇气，这也是秋萤小说塑造形象的一个特点。秋萤小说中的人物都是在死亡线上挣扎的一群，即或是那些“中间层”的小职员，也是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忧郁哀愁的命运笼罩着他们的生路，饥饿死亡的威胁时时向他们袭来，但是他们没有失去求生的欲望，在黑暗中挣扎，在苦难中斗争。《南风》中的小秃，《羔羊》里的流浪儿，《两代》里的少女，《矿坑》里的张斌的妻子，《离散》里的萍，《丧逝》里的李辛芝，《血债》里的黄金生，他们都是饱尝人间的苦难而在顽强求生的人们。

对于作者给他的人物以求生的欲望，当时曾引起一些评论者的责难。有的认为不真实，有的认为不典型，至于究竟应不应该给人物一条生路，这倒是论者所没有谈到的。对此，作者曾在《去故集·序》中说：

当我又重读了我的每一篇文章以后，使我深深的感到了自己的残忍，为什么我要把这些男女们放在万难忍受的炼狱里煎熬他们呢？可是客观的现实也同样煎熬着我的良心，使我又如何能用粉饰的笔来抹掉他们的血与泪呢？这问题是不断的折磨着我的灵魂，所以时时使我陷入与故事里的人物一样痛苦的境界。

也许是正因为这种原因吧，使我往往不忍把每一个人爽利的处死，而且使他们另走上一条生路。其实我也知道生路即是死路，但是我总不愿再残忍的明示出来。

我认为，这些话既道出了作者的苦衷，也谈出了作者的理想。所谓“不忍把每一个人爽利的处死”，那是因为现实毕竟还

有挣扎着求生的人们；既然作者不愿粉饰现实，那他就不能把所有的人物都送上绝路。另外，从当时的社会情况来看，在那个血雨腥风的年月，有多少人特别是青年一代，因国土沦陷和日伪的蹂躏，对生活失去了信心，对前途失去了希望，在他们苦闷徘徊悲痛欲绝的时候，作者能够用他所塑造的苦苦挣扎求生的形象指出渺茫的希望，不也是当时的人们所最需要的吗?李乔（东北沦陷时期剧作家）所说的“秋萤的小说一向是充溢着热、力与生命”，恐怕就是指的形象的展示出来的坚韧的求生的精神。勿须否认，秋萤的小说所塑造的形象有不真实、不典型之处，他笔下的人物无论是出走还是反抗和斗争，意识比较模糊，生路也是渺茫的，但是，在那黑暗的社会里，在文网杀人的统治下，作者能够用他所塑造的形象在暗夜里燃烧着火花，也确实是值得称道、值得钦佩的。

（摘自《学术研究丛刊》1986年第2期）

《满洲评论》周刊

于泾

日伪战争之后，许多日本知识界和具有不同政治背景的各派人物，出于各种各样的动机，在他们的国内和殖民地办起报刊来，但都是旋起旋落。当时的日本知识界有“三期月刊、七期周刊、半年日报”的流行谚语，意即报刊多数短寿，难于持久。《满洲评论》则与之不同，它创办于1931年“九·一八”事变的前夕，停刊于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临近结束的时候，发行时间基本上与日本帝国主义对东北的殖民统治相始终。

《满洲评论》的出版

它创刊于1931年8月15日，每周末发行。最后一期的发行时间是1945年7月7日。14年间，共刊行29卷687期：其中1931年17期为第一卷，自1932年起每半年（25期）为一卷，至1944年末止共出版27卷。在此期间发行相当准时，几无脱期。进入1945年之后，刊期混乱，间隔时间长短互异，是周刊还是旬刊、半月刊，已经无从说起；上半年出18期为第28卷，下半年则仅出2期，归入第29卷。每期印数为5 000—7 000册。

通常每期32页（含封面、封底），凡纪念、庆祝、特辑专号俱增加至40～50页，个别的达80页。以每页按千字计算，则每期约为32 000字，全部字数合计约为2 200万字左右。

《满洲评论》创刊当时，正是日本军国主义势力准备发动直接的军事入侵前夕。当时日本的朝野人士热衷于中国问题的研究，所以报刊载文皆偏重于此。日本军方，也在极力搜罗各界对东北问题的看法，尤其是专家学者的见解。《满洲评论》就是在这种历史条件下应运而生的。

从编者看《满洲评论》

据这个刊物一些主持人自述，拟议出版这个刊物是在1931年的春天，原定刊名是《支那评论》。为了筹措经费，他们找到了“亚细亚学会”。这个“学会”是由日本的菊池和石光两将军为首，还有一些与中国有关的名流组成的，所以是一个与日本军方有关联的团体。虽然有同人的捐助，实际还是以这个“学会”的出资为主。

这个刊物的代表人小山贞知，曾长期在中国大陆从事秘密活动。早在一二十年代之交，他就投身于日本著名的国际间谍

坂西利八郎（中国化名班志远，日本陆军中将）主持的设在北平的特务机关——“坂西公馆”。坂西的主要助手是著名战犯土肥原贤二（1915—1928 年任坂西的辅佐官），小山则是坂西的首要文职助手，故有“文数小山，武数土肥原”之说。因此，他与土肥原之间关系甚深。20 余年间，小山一直在从事拉拢北洋军阀，策动中国军阀混战的活动。卢沟桥事变前后则致力于物色汉奸，是华北傀儡政权以及新民会一类伪组织的重要幕后策划人。当时他奔走于关内外各地，从事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各个领域的侵略阴谋活动。同时，他是满铁的嘱托，“满洲青年联盟”[①] 的理事、大连事务所所长。他撰写的稿件，以数量而论，可以说是数一数二的。而且这个人与刊物相始终，直到停刊前夕，还在继续撰稿。政治上他是“九·一八”事变的狂热支持者，与关东军和华北日军中的少壮派军官之间来往密切，是典型的右翼人物。1946 年 5 月小山企图混入遣返日侨之中，不料自天津登船时，被中国当局查获。被判刑后又转送东京巢鸭监狱。1954 年出狱后，旋即死去。小山是这个刊物的代表人，后来任《满洲评论》社的社长。

《满洲评论》最初的主要创办人应是橘朴和野田兰藏这两个人。不过，当这个刊物正式出版时，野田已离开大连回国。

橘朴是《满洲评论》的编辑，1906 年来华，曾任大连《辽东新报》记者，与《满洲日日新闻》的田原天南合办过《支那研究资料》月刊。其间对中国农村、道教以及财政、税收和土地制度进行过调查与研究，并有许多著述：《支那社会研究》、《支那思想研究》、《中华民国三十年》、《支那建设论》等书；《道教与神话传说——中国的民间信仰》、《中国革命史论》以及

① 满洲青年联盟：“九·一八”事变时旅居东北的日本人的右翼法西斯团体。

《橘朴著作集》三卷等。

橘朴，还和鲁迅先生有过交往以及相互间的评价。鲁迅的1923年1月7日的日记记下了“下午丸山君来，并介绍一记者橘君名朴。”这里所记的“丸山君”，即当时日本在华报纸《京津日日新闻》的主笔丸山昏迷，橘朴是该报的记者。他们的会面虽然是仅有的一次，但后来彼此都有过相互的评价。橘朴称道鲁迅先生是中国当代的第一流作家和“日本通”。1927年以后，鲁迅对橘朴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开始重视他的文章。据鲁迅先生的日本朋友和学生增田涉的回忆，鲁迅称赞橘朴“比他自己更知道中国的事情”。当橘朴在1934年回顾这个刊物创刊三周年的时候说：“我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但是后来他又说：“和自由主义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诀别，开始走上劳动者民主主义，尤其为了建立满洲国而接受农民民主主义，并且对于培养和鼓吹这种精神，感到极大的兴趣。这就是，虽然和军官团[①]的现行指导精神基调不同，但在某些方面则是可以信赖的同路人，从而对此新势力寄以深厚的期望。因此，我从改变政治方向的三年以来，作为本刊的记者，一切言行悉本于此。”这个自白并未隐讳他从自由主义者转向日本军国主义的怀抱。这样改变政治立场，在当时的日本知识分子中屡见不鲜，这不能不说是日本知识阶层的一幕历史悲剧。橘朴是一个经历和思想都非常复杂的人，任何试图简单地加以概括并作出结论，都将是无益的。他是一个有个性的学者，也是一个充满矛盾的人物。

橘朴和小山一样，都是满铁的嘱托，另外几名主要成员，如早期的编务主持人大冢令三、山口慎一（该刊的重要撰稿

---

① 军官团：泛指日本陆军军官中起主导作用的右翼集团，在此尤指关东军中的此类集团。

人），以及小林英一、田中武夫、贯志英夫（本名岸田英治）等都是满铁嘱托或情报与调查部门的研究人员，其中的山口慎一，同时还是《满铁调查月报》的编辑。1934年，橘朴已经是“满洲国协和会中央本部”的理事。但他又并未在伪满政权中担任过公职，由此也可看出他的特殊地位。应当指出的是，这个刊物曾经刊载过相当数量的日本关东军军人（如板垣征四郎、东条英机、片仓衷等人）的文章，其中常以“伏卧居士”为笔名发表文章的，就是著名的“九·一八”事变策划者之一的片仓衷。

尽管《满洲评论》有着相当复杂的政治与社会背景，但它在30年代仍不完全属于官方的御用刊物。橘朴等人在编辑方针上，大体采取了兼容并包的路线。本世纪的头三十年，是日本社会主义思潮高涨的年代，其各种流派都在这个刊物中略有反映，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也偶有出现。例如九卷十一期的《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工人阶级的历史地位》（作者：杉坂洋）一文，就相当明确地指出了中国国民党的反动和腐朽，中国工人苦难状况，并且相信中国共产党将领导中国人民创造新的历史局面。许多文章，流露了对于中国工农红军的反围剿与长征寄予期望，详细报道了红军在军事上的胜利。在日本国内问题上，一些文章怀疑军方的反动措施；不赞成各种产业都纳入军事经济统制之下；每每暗示大资产阶级与军人统治集团的专政，是日本知识阶层失去言论自由的主要原因，等等。直至1935年意大利法西斯进攻埃塞俄比亚时，这个刊物还发表过文章表示：“日本人民对埃塞俄比亚人民寄以无限的同情。”特别值得提到的一个撰稿人是大上末广。这个人曾是满铁调查人员，研究中国农业问题的专家。他极力主张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分析中国东北的农业经济与农村的阶级关系，甚至提出过改变这种阶

级关系的论点，当然这是日本军方所不能接受的。还有一个1936年进入《满洲评论》编辑部的佐藤大四郎，研究过中国农村问题。他认为把中农和贫农组织起来，他们不但可以自救互助，还有利于建设农村的共同社会。这和日本统治当局以殖民地的地主、富农阶级为社会基础的思想完全相反，当然也被斥为异端。大上、佐藤一类知识分子，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都先后被逮捕，大上还死在了狱中。当然，更多的文章是站在日本军国主义的立场上观察中日关系和国际关系，鼓吹扩张侵略的。但是，相当一部分文章、消息报道和文献资料，还是相当客观和真实的。甚至对于中国共产党、中华苏维埃政府、第三国际执委会，直至斯大林对记者的谈话等种种文献，也没有加以歪曲。这说明《满洲评论》的版面虽然不大，但还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保持了大刊物的风度。正因为如此，这个刊物的一些文稿也通不过日本警察机关的出版检查，以致多次"开天窗"，甚至出现过整版的空白。

《满洲评论》不是一个大众读物，而是以日本的知识界为对象的，因此文字并不通俗，也缺少一些趣味性。有的文章中的引文，往往原文（主要是英文）照排，不附译文。介绍西方的书刊，也是照此办理。这也是它的另一个特点。

《满洲评论》的主要内容及其参考价值

这个刊物是个包括政治、经济、社会和国际关系的综合性刊物，内容很庞杂，但属于有关经济问题的评论文章居第一位。如果从包括的范围来看，主要是中国，尤以东北问题比重较大，其次是苏联，再次是英美，也有评述日本与全球范围的国际关系问题的。

这个刊物的栏目，10余年间先后有过很大变动，但就主要

的栏目设置而论，大约有如下几种：

1. 时事评论，编排在各期之首，都是一些当时最引人注目的问题的评论，多由该刊的主要撰稿人执笔。文章简短精悍，一般在2000字左右，反映了当时日本流行的看法。

2. 某些专门问题的论文，内容广泛，可以说是时事评论的伸延，但以中国问题为中心的专题居多。这一类文章篇幅较大，个别的长达数万言，需连载多期才刊完全文。文章的观点则彼此互异，有各种不同的观点。但是不论文章的内容如何，都包含许多有用的资料。

3. “情报”是这个刊物比较经常设置的专栏，相当于我们常说的“时事”或“消息”。它的特点是文字简炼（每条几十字至千余字不等）、条目较多（每期数条，有的多至20条）。这个栏目的篇幅仅占每期的1/10左右，但内容比较充实、系统，是编写编年史或大事记的参考资料。

4. 在这个刊物中还有一类文章叫“杂论”，有时不设栏目，其实也是一些专题论文，与前述的专论不同，内容与时事的关系较远。这部分文章与专论相比，资料价值并不逊色。

5. 为介绍一些新闻人物的生平和社会团体的背景与活动，有时辟有“个人、团体”或“人物月旦”的专栏，这也是相当有用的资料。

6. 常有一个图书介绍和报刊评论的专栏，虽然评介的角度各有不同，但是对于当年日本出版界，也包括个别的西方著作，特别是对于研究中国问题的书刊常有各种评介。这对了解三四十年代日本各界舆论和出版界的状况，是非常有益的。

7. 每期的最后，常有“编后记”，有的在这之外，有一个叫作“壁报”或“隅灯”之类的栏目，文字简短细碎。它常常反映日本知识界与编辑人员的苦闷和牢骚，又有时是正文的补充。

8. 除上述内容之外，日本报刊有一种习惯，常在纪念日、节日或创刊纪念的专号上，刊登祝贺的名单（其实是一种广告）。在《满洲评论》上，经常有当时日本的权贵人物、军政机关、大企业，以及各界名流，伪满洲国的机关和伪官员的名单也夹杂其间。这对于研究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东北和殖民统治的历史，也是有参考价值的。

就这本刊物的14年的历程来说，先后变化是很大的。大约可以分为三个阶段。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1937年以前，日本当局对言论的控制尚未十分严厉，《满洲评论》可以发表各种文章，消息报道也比较注重真实。抗日战争爆发以后，日本当局加强对出版界的控制，有限的自由大幅度缩减，刊物的风格发生了变化。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军国主义进入了孤注一掷的阶段，疯狂地镇压一切非军国主义的思想。就是日本知识界中的左翼人士、反战的人、有民主思想的人，甚至仅在某些细节上持不同见解的人，也都遭到了各种形式的迫害，大批政治犯被投入监狱。到这个时期，只剩下那些最右翼的反动文人，声嘶力竭地为“圣战”呐喊了。这个刊物的最后几年，除反映日本军国主义的垂死挣扎之外，已经丧失了真实的史料价值。

不论当时的日本刊物有多大的时代、民族和阶级的局限性，但它还是保存了一些对于我们有用的资料。在殖民统治下的“满洲国”，东北各地的工人曾经进行过种种斗争。这个刊物对此都略有反映。

它还有一个特色，就是几乎每期都有中国共产党、中国工农红军或中华苏维埃区（解放区或抗日根据地）的报道或评论；甚至还有一般不易想像得到的有关苏区生产、合作运动等方面的研究文字。尽管这些文章中大部分不是公正与客观的，但对我们现在研究中共党史、军史和抗日斗争史，仍不失为有用的

参考资料。

（摘自《长春史志》1990年第3期）

伪满洲国国立中央博物馆

尹承俊　关忠祥

伪满洲国国立中央博物馆在伪康德6年（1939年）7月15日正式成立开放。它的筹备办事处于康德5年5月1日在奉天（沈阳）成立，同年11月移至伪新京大经路。当时正值伪满洲国第一期“五年计划”已经结束，第二期建设开始的时候。伪首都的基本建设在大规模地进行，在这种情况下，由伪政府支持，南满铁道株式会社的援助，筹备完成了陈列。

一

1. 关于建馆目的

馆长、伪民生部次长日人宫泽惟重有过介绍，他说，在“满洲建国”6年后，在基本建设进入第二期的时候，“吾人所应深察者为勿困于眼前小利害，树立百年大计。”而“对满洲之大自然无正确理解，绝难图民众之向上，对人文缺乏深刻认识则此共存共荣国家之理想必不能达到。况对外宣示我国文化机关之整备，乃发扬日满两国不屈不挠的决心之事也”。“政府”有鉴于此而设立了“中央博物馆”。他为博物馆提出三项任务，“一是古今内外之自然人文两种科学资料之汇集、整理、保存、陈列；二是研究所调查来的资料，刊行学术论文，举行平易之讲演；三是与国内外各学术机关联络”。

按“中央博物馆”官制（敕令第327号）规定博物馆要“为政府各机关的政务提供咨询，并为一般学术研究及社会教育作出献供”。总之，要为日本帝国主义的长期占领和殖民统治服务。

设在伪新京的“国立中央博物馆”，汇集陈列了自然科学方面的标本资料，也有部分社会科学资料，主要是民俗文物资料。它在奉天的分馆主要陈列历史考古及美术工艺品。

2. 馆舍的选定

馆舍选中长春大经路一个建筑面积只有690平方米的楼房，属临时租用。用副馆长藤山一雄的话说，这个馆“规模虽小，但对文化设施相当贫乏的新京来说，具有相当大的意义”，“是在首都新京建立博物馆的一个开端”。

在大经路的馆舍原是伪满建国后，一个中国资本家为开设商店而建的。当时他预料这个地方会很快繁荣起来，就选择大经路和长春大街交叉点南角，建了L字型四层大楼。但这里并未很快繁荣起来，于是他把此楼出租。经两三次借主易手，于伪康德6年3月趁借主“劳工协会”迁移之机会，借其三分之二，充作博物馆的筹备办事处和标本资料库。尔后不久，原借单位全部迁移，标本资料库也于4月搬进中央大街蓬莱大楼。这样才得到全部陈列场地，并于7月15日正式开馆。

但是，正如上述，其位置偏居旧长春中国人市街，又脱离交通网，对观众很不方便，特别是难以吸引日本人。举行开馆仪式那一天，向朝野名人发了约850张招待票，但实际来的仅仅52名，实在很可怜。从中可以看到当时的伪满洲国上层阶级对博物馆不认识、不重视；同时也能想象到博物馆的发展有多么大的困难。

但是开馆后，购票参观的人数却出乎意料地相当多。截止8月14日，也就是开馆头一个月，观众就达5 000人，其中满系

人（中国人）占多数，日系人居少数，比例是8∶2。日本观众所以少其原因如上述，位置距日本人居街远，又脱离公共汽车的路线，还受市内日满人比例的制约，再加上宣传不够。

博物馆的馆舍问题，尽管作了相当的努力，要求政府当局合理地予以解决，但当时侧重抓产业、交通和军事，博物馆、图书馆及其它文化事业还没引起重视，最后不得不选用了这个位置偏、面积小的建筑物。

3. 博物馆的官制、职责

关于“国立中央博物馆”的官制，康德5年（1938年）12月24日傀儡皇帝溥仪签发了一个第327号敕令。敕令第二条规定设置馆长1人，特任级（相当于上将）；副馆长1人，简任级（相当于中、少将）；学艺官6人，荐任级（相当于校级，其中1人可以是简任级）；事务官1人，荐任级；学艺官佐5人，委任级（相当于尉官）；属官2人，委任级。

第三条规定馆长在“民生部大臣”的指挥监督之下，掌握馆务并指挥和监督所属职员，就其进退赏罚，向“民生部大臣”提出书面建议。第四条规定副馆长辅佐馆长，在馆长因故不在时代理其职务。实际上馆长是名誉的，主持经常工作的是副馆长。第五条规定学艺官受馆长之命负责文物标本的汇集、保存、陈列及研究工作。学艺官佐辅佐学艺官从事工作，事务官掌管事务，属官具体办理事务。

伪康德6年（1939年）8月5日又就“分科规程”公布了第74号训令。训令第一条规定，“国立中央博物馆”设总务科和自然科学、人文科学两部。第二条规定总务科掌管官印，同时负责文书、人事、会计、用度及营缮、财产管理、刊物发行、观众接待、文物资料的寄赠、出借等工作。第三、四条规定自然科学部、人文科学部分别掌管文物资料的汇集、整理、保存、调

查研究、展品陈列、学术指导、介绍及普及等事项。第五条规定馆长为分头掌管业务部工作，可以设分馆。博物馆馆长由民生部次长宫泽惟重兼任，副馆长藤山一雄。

4. 博物馆的“外延扩张”

“国立中央博物馆”馆舍狭小，只靠馆内活动实在受限制。于是，博物馆领导者打破了博物馆的传统观念，开创“没有馆舍的博物馆”，加强博物馆作为大众学习机关的本质属性。他们认定博物馆的目标在于真正成为教育机关、实习场地和研究所。为此，首先全力投入到“博物馆的外延扩张”活动中去，加强社会教育。他们的“外延扩张”活动形式有如下一些：

①面向中小学。携带电影及标本到市内各中小学进行巡回展出，并举行通俗的自然科学讲演。

②为了振兴科学教育，指导中小学数理科教师的教学研究工作，帮助他们克服关门教数理、不注重深入实际的弊病，吸引他们到博物馆来进行研究活动，或对他们进行短期科学训练。

③为了激发成年人对科学的兴趣，促使他们学习科学，每月利用“满铁福利会馆”及其它公共会场，举行一次“博物馆之夜”活动，进行讲演或放音乐和电影，以启发人们的智慧，陶冶人的情操。

④组织“科学同好会”。每月举行一次科学爱好者的集会，进行专门的课题探讨。还曾举行过地质学标本采集会、植物学标本采集指导会等，这些活动都由学艺员官（博士）担任指导。

⑤为了提高人们对动物、植物、地质、矿物的认识，使城市人热爱大自然，还举办几次科学旅行，一般到离城50公里以外的地方去。

⑥借房舍举办展览会。他们认为，在馆舍狭小的情况下，这也是一个有效而灵活的办法。只要抓住时机就会引起社会的注

意，收到效果。如在日本关东军挑起“诺门罕事件”的两个月前，做为日本侵略工具的“中央博物馆”鉴于有必要启发人们对北边的兴趣和研究，于康德6年（1939年）元月在三中井（商店）举办了“西伯利亚展览会”并发出“国防紧急的警告”。还举办过飞鸟、奈良朝文化等展览会。

⑦印发刊物。这个馆隔月发行《国立博物馆时报》（小册子），其内容尽量选择一般的科学启蒙方面的文章，同时做为博物馆工作指南，促使内外博物馆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除了《时报》之外，还连续出版了《博物馆论丛》和《满洲民俗图集》之类的刊物，借以发表博物馆学和专业学科的研究成果。

⑧博物馆还尽可能加强同各学会之间的联系，把“满洲科学同好会”作为馆的外围机关，“满洲生物学会”也把办事处设到馆里，相互保持着密切的关系。还努力同“民生部”所属有关机关、“大同科学院”、各大学、“兴农部”及其他机关保持联系和交流。

5. 新馆的建筑计划

1940年，伪新京特别市公署决定，为“国立中央博物馆”新馆址划定地号，地点在中央大街（即现斯大林大街）南端建国广场（现人民广场）东北角，面积为6万坪（每坪合3.3057平方米）；民俗博物馆也将获得南湖南岸10万坪用地，从而揭开了将来建立宏大博物馆的前景。

在民俗博物馆中居于核心地位的“北满农家”，于1940年8月20日开工，年底建成。按计划除“汉民族的大农家”外，还要建“白俄移民之家”、“蒙古包”、“鄂伦春族的帐篷”、“朝鲜族住宅”、“日本开拓团民生活实态”等。民俗博物馆决定以瑞典斯德哥尔摩市北方博物馆斯坎森为样板来建馆。斯坎森地形多样，有石山、有湖水、有森林，博物馆在这种环境中展现了

各民族习惯、衣食住、生产方式、劳动组织、部落的各种仪式、舞蹈及游戏等生态。民俗博物馆也计划在南湖南岸为鄂伦春族种植密林，为蒙古族建造草场等等。观众可以通过参观了解各民族朴素的原始的和自然的生活方式，然后理智地做出判断，进一步提高自己的生活水平和文化水平。

民俗博物馆由“国立中央博物馆”负责筹建。

按批准的地号，在建国广场东北角，从靠近广场的地方开始，建立美术馆、自然科学博物馆和人文科学博物馆。它们都是“国立中央博物馆”的分馆。在这三个馆背后，用1.2万坪土地首先盖起宏大的综合仓库。该工程在1940年5月28日动工，计划五年左右全部竣工。

关于文物标本库房的建筑及设备，副馆长藤山一雄认为大英博物馆只想扩大陈列面积，不怎么讲究收藏设备；波斯顿美术博物馆及纽约大都会博物馆虽允许馆外研究人员入馆阅览，但是没有足以参观的地方。他认为这是由于没有摆脱博物馆即陈列馆的传统观念，他要避免这些缺陷，计划盖三座拥有院落和地下室的方型四层大楼，约占地1万坪。作为第一期工程，先建其中的四分之一，约2 500坪（每层楼建筑面积为500坪），以后逐年完成。全部竣工以后，先将第一楼和第二楼用作展览厅，以全力收藏和展出实物标本。因为没有标本实物，博物馆就是个空架子。藤山一雄认为展览厅并不需要搞大规模的，将最有代表性的实物标本合理地陈列，让参观者能够保持入场时的健康状态，有效而轻松愉快地参观，从中解决他们自己的课题，或者找到新的课题，待日后加以研究，保证让观众参观完毕能健康地退场，这是最重要的。对那些需要进行特别研究的人员，允许他们进入文物标本库房，以及图书室、研究室和实验室。因此博物馆不单是一个陈列馆，而是学术研究的一个窗口，而窗

口后面的纵深应该是无限的。他主张为适应“国策”也就是为“科学的振兴”作出贡献，首先应把自然科学馆建成。德国前总统在德国博物馆奠基日，曾经抡起铁锤高叫“德国的新文化要从这块基石兴起”，后来经过三十年的科学振兴，大大地推动了德国的强盛。这个例子说明博物馆在振兴科学上的重要作用。

新馆建筑按计划刚开了个头，日本就发动了太平洋战争，因财力关系不得不停建。

6. 奉天分馆

“国立中央博物馆”奉天分馆于伪康德元年（1934年）6月1日正式开馆，原名“国立博物馆”，伪康德6年（1939年）3月编入“国立中央博物馆”。分馆设置总务、学艺两个股，这两股的职责分别与“中央博物馆”相应的科和部相同。分馆长由馆长从“国立中央博物馆”高等官员中挑选任命。

这个馆属于历史艺术博物馆，它收集陈列历史、考古、美术品及工艺品。伪康德元年在奉天商埠地八纬路原王松岩官邸设立筹备办事处，不久迁入经过维修的十纬路原汤玉麟公馆，6月1日举行开馆仪式。分馆最初的藏品大部分是罗振玉捐赠的，还有政府拨交以及日本外务省寄赠的，共有书画、佛像、铜器、陶器等1 285件。其中佛像、佛器主要是原来存放在承德离宫及外八庙，由汤玉麟等军阀搬到奉天宅邸的；书画类几乎都是张学良的，精品不少。

二

“国立中央博物馆”长春大经路展厅由大小两个房间组成。大房间面积约有460平方米，小房间面积为230平方米，无论怎样经济地利用也是困难的。结果安排了大中心柜4个、小中心柜15个、壁柜10个、展桌10个、展台6个，共计45个；另外还

有无盖陈列台24个。将这些东西适当排列组合起来就占满了空间，因而在已汇集到的6万个标本资料中只展出了1 200件。

整个陈列分成动物、地理、矿物、地质和物理五大部分，每部分陈列并不都自成系统。这五部分中的重点是矿物和地质两部分。

第一为动物部分。是一进门的左侧，在一排大中心展柜里展出了“满洲”产的鸟类。第一展柜以鸣禽类为主，再加上野鸡、鸽、野雁、鹌鹑等。其中有在日本看不到的高丽黄莺、红嘴乌鸦、山火鸡、山鹌鹑、北满野鸡等。第二展柜陈列的是脚趾之间的蹼发达的野鸭、雁等所谓游禽类。第三柜陈列的是腿比较长而涉水的鹤、鹭鸶、鹬等涉禽类。第四展柜陈列的是雕、隼等猛禽类。

还展有哺乳类动物，如食肉类的西伯利亚虎、满洲彪、野猫、黄鼠狼、獾、狐狸、砂狐狸、狼等；有蹄类、啮齿和食虫类以及象、蒙古马、野猪、驯鹿等动物的骨骼标本。

第二为地理部分。放在陈列室的中心部位和右边南侧，仅仅局限于人文地理方面，并以鄂伦春族的民俗品为主。这部分陈列品逐次更换，开馆当时陈列有：

满洲地貌模型。这里展示出地理学基础的地图识读法，并以放射的光及其阴影鲜明地描画出地貌及其中孕育着的文化。通过参观，如果深入地思考地貌和文化之间的关系，就可以理解到“满洲”在民族、政治和经济方面都是一个重要的地区。

皇舆全景图原版。这是在奉天故宫里秘藏多年的国宝，清康熙皇帝曾述怀称：“朕倾注三十年的心血而成就之。”共有41张，是意大利人里巴（汉名马国贤）刻画的。

原始民俗品。主要有鄂伦春、驯鹿鄂伦春、赫哲、蒙古、白俄移民等民族创造的纯朴的民族工艺品。

第三、四部分是全馆陈列的核心部分，为使观众关注矿石，他们下了很大功夫。在“中央博物馆”收藏的数万件化石标本中，选择出色的约100件标本，按照自然分类法进行了陈列。

在展桌上放置的本溪湖产珊瑚礁化石、海拉尔及克山产的“马弁莫斯”的头骨组合标本，可称为珍宝中的珍宝。

有关层位学的标本陈列有130件，从“满洲国”内最古的地层到最新的新生代冲积世的砂、碎石等岩石、矿物、化石的标本，严格地按时间顺序从古到今地陈列着。

当时由于日本以武力独占东北，日“满”同美国之间的关系处在恶化状态中，唯独在科学领域，美国首都华盛顿国立博物馆于伪满“国立中央博物馆”开馆之际，为了表示祝贺，寄赠了300多册文献和极为珍贵的矿物及化石标本约50件。在这一批标本中选择最有意义的30件陈列在第二十至二十一展柜里，以示对美国国立博物馆的谢意。

另外在第二十六号展柜里展出了侵华分子沃尔奥科特博士生前的笔记本和他的巨著《在中国的调查研究》亲笔校正稿，日本人认为这是一个“骄傲”；另外还将在东北的山野地质调查中手握着锤子“殉职”的外山四郎、园田逸木两个理学士的遗物陈列在第二十六展柜里。

这一部分还陈列着东北有名的矿产如金、银、铅，亚铅、铜、菱苦土矿、滑石、萤石、煤、油页岩等各种各样的标本，并且说明了这些资源的原矿石是在怎样的状况下开采出来的。从“安东省”芙蓉矿山里开采的表面显露出金粒的金矿石、在“奉天省”分水出有40立方公分大的金矿石标本、“锦州省”杨家杖子及“安东省”青城子矿山的大型好看的铅矿石等都公开陈列了。

为了说明沙金的开采过程，这里展出了“北满”沙金产地

的一个典型——“桦山县”小石头矿业所附近的断面图，并将各含金层的标本和放射出灿然光泽的大量沙金粒陈列在第十九号展柜里。另外还展出了“淘金船”。

第五为物理部分。把主要着眼点放在怎样使人容易理解有关电的知识上。于是从简单的装置开始，逐渐深入到精巧的电气器械的结构，力求使人们对现代机械装置能够理解和发生兴趣。如静电引发实验装置、静电感应的实验装置、电磁作用的实验装置、电磁感应的实验装置、变压器说明装置、有线电话说明装置、无线电话说明装置、手摇发电机、水中导电实验装置等。此外还有真空管作用说明装置、放电实验装置、紫外线鉴别装置、万能光学实验器、光线反射曲折实验器、滑车实验器、霓虹灯管实验装置等等。

还陈列有合成橡胶、合成树脂制造工艺及其制品、各种电表、高压玻璃、干电池、光学机械等。

这部分陈列因为能表演，甚至可以让观众亲手操作，所以最吸引人，尤其中学生最感兴趣。

（摘自《吉林省艺术集成/文化艺术志资料汇编》）

日伪统治时期吉林省的图书馆事业

徐光复

日本帝国主义在侵占东北的十四年里（1931年9月——1945年8月），是文武两手交替使用——在大搞武力侵占和经济掠夺的同时，也进行了对中国人民固有思想文化的镇压。

日本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

1932年（伪大同元年）溥仪建立伪政权后，立即通令全东北不准悬挂中国地图，不得使用“中华”字样，学校不得使用中国教材，不经批准不许集会、结社、游行、出版等。并于1932年9月发布伪《治安警察法》，同年10月24日又抛出伪《出版法》，对中国人民的自由严加控制。

日伪政权对带有民族意识的书刊一律禁绝，并强行输入日本法西斯书刊。1932年3月至7月这短短4个月，就在东北禁书650余万册；1934年1月29日，一次就通令禁止36种报刊输入东北，其中主要是我国关内报刊，还有苏联的《真理报》、《消息报》等。以后查禁书刊种类逐年增加，并极为严格。

这期间，革命的、抗日的和具有民主思想的书刊禁止在东北出版，关内也不得向东北运入；马、恩、列、斯、毛及中国共产党的有关书籍更是严禁的对象。据《满洲年鉴》记载，1935年到1938年4年间，日伪统治者禁止发行的报纸为7 445份；扣押56 091份；禁止发行的杂志为2 315份，扣押13 664份；禁止普通出版物3 508册，扣押924 852册。1939年输入的出版物仅以“公安”为由一项，禁止发行共743种（不包括被删削的数目），其中关内的出版物为488种。1937年以后，中国关内运往东北的出版物更是锐减。相反，日本国内宣扬军事法西斯思想的出版物却源源不断进入东北，后来竟达到占东北当时进口出版物的80%～90%以上。

日本军国主义还以“思想犯”、“政治犯”之名，以逮捕、监禁乃至杀害等手段，来摧残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

在此期间，做为社会文化教育机构的图书馆数量上虽略有增加，但却被用来作为日本帝国主义在文化上奴役东北人民的

工具。

吉林省立图书馆

吉林省立图书馆在伪满洲国前期仍沿用前名，1938年（伪康德5年）改名为吉林市图书馆，当时占地面积为950平方丈，房屋占地面积为95平方丈，共28间，其中有办公室3间，妇女阅览室1间，儿童阅览室1间，阅报室2间，书库10间。伪康德4年（1937年）5月奉伪省公署教育厅谕令，馆址由蒙古族胡同迁至通天街145番地3号。该馆从一开始就被纳入日本侵略者建立其所谓“王道乐土”的轨道，为宣传殖民主义的侵略政策服务，带有浓厚的殖民主义色彩。

（1）组织及机构设置。该馆在人员安排上，表面上由一名中国人任馆长，实权却操纵在担任司书主任、代理馆长的日本人手中，从而在组织和业务上对图书馆严加控制。当时该馆共有工作人员12人，分为二部包括五系，有庶务部（庶务系、企代系）和司书部（藏书系、目录系、阅览系）。

（2）办馆经费。主要依靠伪政府国库拨款，伪康德4年17.64万元；康德6年14.665万元；7年13.958万元；8年75.45万元。此外还接收了民国时期在官银号的存款基金397.4832万元。

（3）藏书建设。伪政府直接干涉图书馆藏书建设，入藏图书大多是为封建的、殖民主义的、为侵略目的服务的图书，如《大东亚圣战记》、《日本精神》、《满洲的国政》等反动书刊。在日伪统治的十四年里，平均每年入藏图书2 515册。伪大同元年（1932年）藏书量为5.4442万册；伪大同2年（1933年）由于日寇焚毁及收缴进步书刊，藏书量下降为4.1369万册；伪康德4年（1937年）藏书量为6.0788万册；伪满洲国末期藏书量增至6.3424万册。

(4) 图书流通情况及借阅办法。该馆的读者以学生居多，在成年人读者中官吏占多数，工农读者仅占读者总数的2%稍强；全年接待读者人数平均为1000人左右，全年图书流通册次是逐年增长的。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吉林省立图书馆在借阅制度上采用机关保、铺保、押金等办法，无保的读者须缴纳所借书价两倍的押金。这种借阅办法很明显是把广大劳动人民拒之于图书馆大门之外的，反映了资本主义的办馆方式，图书馆是为少数官僚资产阶级服务的。

总之，日伪统治时期的吉林省立图书馆是为日本侵略者所把持，日本的宪兵、特务、领事馆、伪政府都可以直接干涉图书馆，使图书馆充满了殖民化气息。

伪新京特别市立图书馆（即现长春市图书馆的前身）

在长春市，原"满铁"所属长春图书馆于1932年（伪大同元年）改名为"满铁新京图书馆"，1933年（伪大同2年）又更名为新京特别市图书馆；原长春市公立图书馆于1933年（伪大同2年）改名为新京特别市立图书馆。1938年（伪康德5年）5月，将上述两馆合并，统称新京特别市立图书馆。前者为总馆，后者为分馆。总馆馆长位置仍由日本人占据，分馆的经费、组织机构、人员设置等皆由总馆负责，后来分馆也派进了日本人做工作人员，该馆权为实际上全部操纵在日本人手里。

为了适应长期霸占我国东北和侵略全中国的需要，日本帝国主义不断强化"满铁"图书馆的职能。首先，对"满铁"下属各馆的图书资料收集范围做了分工，因地制宜，各有侧重。如规定位于水陆交通要道的大连馆既收集普通图书，也收集官方的重要档案，以至军事机密材料；设在沈阳的图书馆主要收集中国古籍珍善本书和关内的重要地方志；设在长春的图书馆主

要是收集东北地区的地方文献；设在哈尔滨的图书馆着重收集有关满蒙的俄文文献资料以及有关苏联的经济、政治、军事方面的文献，特别是远东地区的文献、情报。

"满铁"图书馆在东北经营近四十年，通过各种渠道，采取多种方式，扩充馆藏，使各馆总藏书达70余万册。

"满铁"图书馆还以召开会议、研究业务、编印出版物等方式，加强对我国东北文化的控制。"满铁"图书馆业务研究会是其所属图书馆直接主办的一个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组织。1916年在沈阳召开过会议；1927年沈阳（时称奉天）、铁岭、开原、四平街、长春几个图书馆馆长一起制定了这几个图书馆之间研究会的联合协约；1929年，"满铁"图书馆业务研究会正式建立会则，设置机构，连续召开三次会议，出版了《满铁图书馆业务研究会年报》。1937年随着治外法权的撤消，"满铁"形式上将沿线附属地的权力移交给伪满洲国，多数"满铁"图书馆与伪满洲国所属图书馆合并，"业务研究会"解散。于1939年成立了另一个受日本人役使的傀儡组织——"满洲国图书馆协会"。该协会出版了许多刊物。其中包括：由当时伪新京图书馆以"新京资料联合会"名义出版的《新京资料要览》；伪新京图书馆编的《新京图书馆月报》（1940—1944年）；伪国立中央图书馆筹备处编的《资料战线》等。这些出版物文字基本上以日文为主，内容主要是介绍各图书馆的动态，贯彻日本奴役东北人民的侵略意图。

伪国立图书馆

伪满洲国政府曾决定在伪都新京建立一所"国立图书馆"。1937年（伪康德4年）在长春成立了"国立中央图书馆筹备处"，由伪总务厅厅长涩谷（日本人）任处长兼馆长，归伪国务

院直接管辖。但该馆一直处于筹备状态，直到日本投降也未开馆。

吉林省的县级图书馆

伪满洲国期间，在吉林省仍保留有个别县图书馆（更多的县则在民众教育馆内附设阅报所、识字处，陈列一般书籍及报刊）。伪政府为适应日本侵略者的需要，曾三令五申催促地方兴办和扩大图书馆事业。伪大同2年（1933年），伪吉林省公署发出训令，督促各地开办图书馆。伪康德9年（1942年）还在长春成立了“国家图书馆学会”，目的是进一步在学术和组织上控制图书馆。伪教育部对图书馆事业直接干涉，于伪康德4年（1937年）5月15日对图书馆的图书分类、保管方法发布了命令。要求各省图书馆长、各县县长将各馆的图书分类、保管方法、目录编制等项上报给伪教育部。

县级图书馆看起来比以前有所发展，但在政治上沦为日本殖民主义者宣扬其侵略中国的“王道主义”的工具，在规模上因“财政困窘、经费艰难”，一直处在奄奄一息的状态。

日伪统治的十四年间，吉林省的图书馆事业完全殖民主义化了，这是我省图书馆事业史上极不光彩的一页。

（摘自《吉林省艺术集成/文化艺术志资料汇编》第7辑）

伪满时期的沈阳金石书画

侯维翰　白文韶

我国的金石书画艺术有悠久历史。金石又称印学，或称篆刻，是我国优秀的传统艺术之一。它和书法、绘画，都具有独特的艺术风格。清光绪中期以后，沈阳的金石书画家亓丹山、邵开鼎诸前辈，开始提倡并授徒传法，培养出一批优秀的艺术人才，使中华民族的传统艺术，在沈阳放出曙光。嗣经伪满和国民党统治时期，曾一度消沉；沈阳解放，在中国共产党“双百方针”的光辉照耀下，金石书画也获得广泛地发展，并取得很大成就。笔者二人自幼就老一辈金石书画家学习，对伪满时期沈阳金石书画所受到的控制，身经目睹，知道一些情况，兹择要记录于下，供参考。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世转时移，艺苑老辈与世沉浮，沧桑变幻，书画名家邱壑、莲浦以及缪东麟、锡钧、尚雅久、谈国桓、李西、邱健鹏等人，相继谢世。同仁们为纪念邱壑在沈提倡艺术之功，特在小东边门外珠林寺，为邱树碑以志。金梁、三多二老以及黄侃、章士钊、杨云史、于鸳寿、袁子春、宁腐陈、寿玺等都避居他地。谈国恒、白永贞深居简出，很少以笔墨应世。葛月潭方丈年逾古稀，笔墨应酬多由监院邢真彻代之。而继续致力于金石书画者，仍以王光烈、郭德陈、白文韶为核心，共同钻研，以求上进；孙玉泉办的“辽海金石书画社”也培养了不少新秀，争露头角；一鸣惊人的于莲客，以淡雅清丽之笔，摹唐六如的山水人物，意境超脱，题画诗句，惹

人注目；老年人物画家关子衡之徒杨晶坡以及画虎的廖经世、画人物的张晏平、画山水的邢焕文和齐子祥都锋芒崭出。但是作者相轻，却是通病，王光烈的金石篆隶成就很高，而周德舆自从学习齐白石的篆刻后，对王的作品渐有微词，同时也贬斥别的作者：对孙玉良的画，以"匠气"批之，对齐子祥、邢焕文俨然以指导者自居。于莲客对孙玉泉的山水画，认为有"匠气"，人物画也近俗，唯临摹钱慧安较好，尤其独擅"传真"（国画画像），堪称妙技。于认为：书画者不读书，难免俗气，不会吟诗题画，更为疵点。他对周德舆所学齐白石的作品，指为"粗、狂、野、霸"、胡题乱写，没有艺术感。而别人（除周德舆以外）皆称赞于的诗、书、画，叹为三高，笔下功夫虽不及邱壑，而意境气韵及题画都超出邱很多，确属东北新秀。于乃业余作家，作画不索润格，亦不轻为人画。此时，崇华笔润已提到（山水）每尺四元，孙玉泉（山水人物）每尺两元。崇孙之间或孙周之间也互有微词。与此同时，徐延年在小河沿创办了"私立美专"，聘孙玉泉、崇华教中国画，也培养了一些人才。沈水艺苑，吐故纳新，也算活跃。

1934年正月，为筹备伪帝溥仪登基，镌治御玺，郑孝胥认为非王光烈莫属，王藉故未允。后乃用半金石半匠人的陈古陶、沈向宸两人镌治。陈、沈二人及时北上至长春（当时改称新京），在伪满国务院内斋戒沐浴，择吉施工。陈古陶经制六寸方白玉玺一颗，沈向宸镌刻溥仪自用二寸方白玉印两颗：一为"无逸斋宝"，一为"康德御笔"。镌治毕，二人各受溥仪"赏金"一封，即行返沈。及至3月1日，溥仪登基，启用御玺，降下诏书；又在"冲气以为和"的屏幅上启用了"无逸斋宝"、"康德御笔"两颗御印。此时，日本侵略者制造的伪满政权，日臻就范，对国人之统治日益加深，金石书画当然也逃不脱被统

治的命运，成立了伪满洲国美术协会，以“国展”和“省展”来引导和控制作者的思想和作品。从康德2年（1935年）至康德10年（1943年），每年或隔年在伪满首都新京（长春）举办一次“国展”，共展出6次。展品有：书法（包括篆刻）、国画（包括日本画）、西画三类。作品来自伪满十省及各市作者，作品鉴定分为①无鉴查；②特选；③佳作；④入选；⑤落选。鉴定者由伪满美协会长荣厚（伪中银总裁，名藏书家）、副会长宝熙（海内书法名家、古书画鉴定家）、吕荣寰（伪大臣）、罗振玉、王光烈诸人及伪国务院与美协共同出名礼聘来伪满的日本著名画伯主持鉴选工作，当时应聘来满的日本画伯有：中村不折、渡边晨亩、小宝翠云……诸名家，担当鉴选书画工作。西画则另有鉴定者。综观六次伪国展，每次都是以国画作品较为突出，书法金石次之，西画居后。沈阳作者在六次展中的出品情况如下：

国画部分：

1. 于莲客：出品六次。前三次特选山水画：第一次是以唐六如笔法画四尺山水人物中堂“猎貂图”，第二次是以唐六如笔法画四尺山水中堂“长白佳气图”，第三次以唐六如笔法画四尺山水“灵峰济胜图”。后三次出品无鉴查（因后三次被聘为鉴定者，故出品无鉴查）。六次所画皆进呈伪帝康德御览，并皆由溥仪购买，每幅给100元或120元伪满币。他的画被评为伪满第一代表作。

2. 厉纯朴：出品六次，一次仿恽南田花卉为特选，五次山水花卉入选。山水仿其师孙玉泉笔法，有所改变。

3. 吴英奇（现改名无畏，在辽宁出版社工作）：出山水六次，一次“风鸢图”佳作，五次入选。笔法仿其师孙玉泉而有所改变。

4. 周德舆：出品六次，两次佳作仿郎世宁“虎”及“海东

青”，四次入选，仿萧谦中山水及写意花卉。

5. 邢焕文（解放后改名邢洞川，在沈阳书画研究会工作）：六次入选，山水出品仿王石谷。

6. 王家鼎（当时伪奉天税务监督署署长）：出山水三次，二次佳作，一次入选。笔下功夫不大，惟以笔墨气韵得胜。

7. 关子衡：六回人物入选，画无专宗。

8. 杨晶坡（伪满警察）：四次人物入选，画学其师关子衡。

9. 张常海：画人物学费小楼，数次皆落选。

10. 马千里：一次花卉入选。画无专宗，笔意有江湖气。

11. 孙齐贤、孙效贤姊妹：山水人物画各六回入选，学其父孙玉泉。

12. 廖经世（解放后沈阳市新城子区政协委员，已故）：两次入选，画虎学张善孖。

13. 白文韶（笔者之一）：山水一次入选，仿王石谷。

14. 丁羽南：入选两次，一次画佛，一次画虎。

15. 孙玉泉：出品六次，一次山水入选，五次落选。

金石书法部分：

1. 白文韶：金石出品六次，一次篆刻特选，进呈伪帝御览，五次入选。

2. 郭德陈：金石入选六次。

3. 周德舆：金石入选六次。

4. 田锡坤临魏碑、张风翔大篆、依艮藩石鼓、陈柏桥大草、董逸安行书、于莲客小楷等先后皆入选。

伪满美协对特选作品赠给奖状一份，伪币20元。对佳作赠奖状一份，纪念章一枚。对入选赠奖状一份，纪念章一枚。纪念章以合金制成，当中一奖字，下铸美术协会字样。王光烈的作品无鉴查当然展览。沈阳山水画者齐子祥（名瑞麟，现沈阳

书画研究会理事）的水墨画，在当地虽居于莲客之下，却超乎其他作者之上。书法仿摹名家，皆见形似。时因忙于作假画卖钱，一直未参加“国展”。惟孙玉泉老先生，资格既老又桃李满城，竟而五次落选，不仅招致书画界很多烦言，更使其本人感觉不够面子。按落选者除孙玉泉、张常海之外，沈阳其他作者落选的也大有人在。上述这些参加伪国展的作者另外又都参加了伪奉天省美术展览。省展也是从康德2年起至康德10年，每年或隔年的12月在沈阳展出一次。共展了六次。伪奉天省展由省美术协会的前后会长韦焕章（伪奉天省教育厅长）、金荣桂（伪奉天省长）、副会长王允卿（伪奉天省民政厅长）及王贤沣（伪奉天市长）等人的主持下举办的。伪省展鉴定人以沈阳南满站日本学校的教员“首藤”为首，另外还有于莲客、白文韶及孙玉泉。该展览除于莲客、齐子祥未出作品外，其他沈阳作者差不多都出了作品。例如：邢焕文山水特选一次，入选五次；周德舆花鸟佳作六次；白文韶、郭德陈、周德舆金石佳作各五六次；其他如孙齐贤、孙效贤、吴英奇、厉纯朴、廖经世、孙玉泉、关子衡、杨晶坡、张常海、马千里、陈柏桥、依艮藩、张风翔……诸人皆曾入选。出品中最突出者是一次展出郑挥（郑孝胥孙女、郑禹之女）浅绛山水镜心一幅，笔力古劲，上拟宋元，评为佳作。这幅画吸引了广大观众，交口称赞。省展对特选赠给银盾一架，对佳作赠予纪念章一枚，对入选也赠纪念章一枚。从“国展”“省展”的选定作品看来，得知伪文化统治者为引导并控制金石书画作者的思想，在鉴查上专重歌颂伪满的题材。这种题材能以典雅笔法出之者定为上品，如于莲客的“长白佳气图”及“猎貂图”等作品是标准作。其次是描写壮丽河山及鲜艳的花卉作品以洒落或写实之笔出之的也得入选。金石书法以宗古为上，以书卷气为胜。至若健康生动为劳动人民

所欢迎的作品，尽在落选之例。当然，题材不适于日伪统治者的口味和水平不够的东西也在不选之例。以上所说“国展”“省展”是日伪以行政手段控制艺术，另外还用警察司法手段对付作者，因而制造了“孙齐被捕事件”，这一事件的经过是这样的：

“九·一八”事变后的大同元2年间（1932—1933年），沈阳初受日本侵略者统治，社会上人心不定，当然没有欣赏金石书画的兴趣。这样就使依靠卖画为生的齐子祥（住小南城门内）、邢焕文（小南门脸）、马千里（小南门脸）……等人的生活陷于窘境。独孙玉泉（住大南城门里路西辽海金石书画社）扩大招生，尚可维持温饱。及至康德元年（1934年）以后，日伪统治加强，大批日籍的军、政、经济、工业人员由日本渡海来到东北。尤其是沈阳的各机关、企业（日本叫会社）、工厂里面增加了大量的日籍人员，操纵一切。这些日籍人员，享受高薪待遇，生活富裕。钱多思奇，多有寄情于收买古今名人书画作为消遣的。经常三三两两手拿着古人画谱和当代画刊趋步游览于大、小南门脸（南砖城外侧城根）的一些古玩铺之间。他等看到了古玩铺悬挂的古人仇十洲、沈石田、文征明、恽南田、沈南苹落款的山水花鸟画或是近代吴昌硕、任伯年、王一亭、萧谦中、郑孝胥……等名家的书画，便拿出书谱或画刊来对照。只要是书画的形式和画谱或画刊上一样，就不惜出钱几十元或百元以上买回收藏。有的携带到日本国内再高价出卖。其实这些画真品极少，甚至一幅真的也没有，都是上海北京制造的赝品，仿摹染旧的假书画。各古玩铺假书画的生意兴隆，刺激了孙玉泉及幼泉父子的好财欲望。经过策划，幼泉在小南城门里大街路东开设“文艺舫书画店”，经制假书画出卖并带有裱画作坊。幼泉开设文艺舫，开辟了沈阳制造假片子（假书画，内行叫片子，以前沈阳尽从上海和北京来货）的行道。他们制造假画的

程序是首先用单六吉宣或单贡宣，按照古人画谱或当代画刊照样仿摹出山水人物花卉翎毛种种画面。搞这些画面，孙幼泉主要是雇用善于仿摹的书画者齐子祥为之。使齐仿造明沈石田山水、文征明山水以及当代北京画家萧谦中山水和伪满盛行的郑孝胥字画。另外又雇用邢焕文仿造清王石谷的山水。齐、邢每画一幅（三四尺的中堂），幼泉只给他俩工钱四五元，而幼泉经过染旧（假造古人画由文艺舫裱画工人用颜色将画面染成旧的样子。染纸染黄、染绢染的比较红一些，表现出挂旧了的样子。假造当代名人书画，不须染或稍染一染。）装裱后，以高价卖给日本人以假充真。例如四幅齐子祥伪造的萧谦中四尺山水屏幅，孙幼泉只给齐16元钱，而幼泉装裱后以126元的高价卖给日本人，幼泉的文艺舫比光宣时山房老板更严重地剥削书画作者。幼泉除了雇用齐、邢以外，并由他父玉泉也假造明仇十洲的人物画。假造的方法一是临摹，一是所谓玻璃拓（把北京或上海的片子放在玻璃上，在片子上铺一张宣纸，玻璃下安一个百度的电灯泡，把灯打开，光透玻璃之上，用笔照描）。此外孙幼泉还画春册卖钱。文艺舫的生意随之兴隆起来，大为有利可图。尤其日本人多欲求得郑孝胥的字画，齐子祥伪造郑字形似逼真，再打上假印章，足使不懂书法的人难辩真伪。搞出来的假郑字，每幅齐子祥得2元。裱后或稍加染旧，每幅就卖10元至20元（对书画贩串行每幅10元，对顾客则卖20元）。文艺舫如此搞了一时之后，使几个依靠书画为生的作者得以维持生活。伪康德6年春3月某日，文艺舫来了3个人，声称是书画贩，愿以高价订写假郑孝胥字画四幅，希望当时写。幼泉闻言，即将齐子祥找来，当面写了四幅郑字，落上了郑孝胥的款，并从幼泉桌里取出木刻郑孝胥的假印章加盖在郑字上。搞完之后，齐孙二人等候付钱，不料该三人掏出手铐子两副，将孙、齐扣上，带到市警察

局（今市公安局址）司法科收押入狱。押了40多天，方释出。

大约是伪满康德3、4年时，曾经出现过一幕书法怪剧。一个四川老人“杨草仙”，自称年90，行走于各伪满机关之间，公开表演独特的草书。写字时，案上铺好宣纸，设好笔砚。杨老人在众人围观之下，先开始打拳，打着打着突然用右手抓起笔来，在纸上先写“日满一德”四个字，然后右手将笔一扔，左手接笔，继续写“一心”两字，下面再落上杨草仙的下款。他写的“日满一德一心”的草书，连写带画笔道间现出鸡冠子或鹤首或鸟眼的形象。他所写的都是宣传日满协和的标语。每写一幅索价4元。各机关的伪科长以上的日伪官员，在日本侵略者动员下争买之。杨草仙就这样在伪满各地骗取了巨额笔润，此事一时曾传为笑料。及至康德10年后，时局日趋紧张，百业凋敝，金石书画也随之消沉。

（摘自《沈阳文史资料》第四辑）

辑印东北旧文史资料的有关追记

卞宗孟

在“九·一八”事变以前的二三年间，在沈阳曾有“东北学社”的组织，从事于东北文史的研究和东北文献资料的搜集和辑印的工作。事变以后，留在沈阳的部分社员，仍能继续事变前未竟的工作，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不惜假借某些伪组织的名义，先后辑印出不少有关东北地方的旧文史资料，工作亦颇艰苦。在当时，这种工作为了掩蔽敌伪耳目，不能不更易原定书名，有所迁就。为原定《东北丛书》改称了《辽海丛书》，

原定《通宁通志》改称为《奉天通志》。辑印各书的纪年，由于不能写民国年次和西历纪元，但又必须避用伪组织年号，于是不得不改用干支作为代替。为了解决印资来源和印刷方便起见，即又利用了伪国立图书馆或伪奉天省公署的名义刊印，而实际上是由变相的东北学社的辽海书社负责编辑发行。计从1932年到1937年的五年间，先后辑印出丛书实录之类卷帙较多的类书达十数种之多，这不能不说是在东北沦陷期间、在暴力蹂躏摧残之余，对于保卫祖国文化遗产的一件难能可贵之事。而且这一工作在当时不但未引起敌伪文化统治者的注意，且反促动了敌伪影印4 500多卷1 200多册的"清朝实录"。

兹就记忆所及，把当时辑印有关旧文史资料的主要部分写出书录十种，以见一斑。

《辽海丛书》 10集10函，100册，计书83种，附图1册，铅印。

"九·一八"事变前，东北学社出版的刊物，除了"东北丛刊"（1930年创刊至事变停刊共刊行20期）外，有辑印"东北丛书"的计划，书目已大体拟就，未及时印，而事变发。事变后，由留沈社员金毓黻等改用辽海书社的名义继续主持编印，丛书亦改名"辽海"（辽海一词是自唐以来概指东北地区的旧称，实即东北的别名）。丛书的辑印，从1933年10月开始，先后分集印行，历时三载，直到1936年4月始行完成。这部10集百册的丛书内所收各书类，皆有关东北地方的文史资料，包括文献掌故、舆地图说、诗文游记，网罗颇为广泛，取材亦极谨严。其中有出于东北人士的著作，而内容又不尽有关东北文史资料范围的，亦行辑入。全部共集刊83种377卷。实为东北有丛书的一大创举。

《奉天通志》 10函，100册260卷，卷首1卷，铅印。

清代几次修盛京通志，均系统括东北三省。其后吉林、黑龙江均各有志，唯辽宁一省尚无专志，有之，自此志始。辽宁修志，远在1921年即有倡议，直到1927年始正式成立辽宁通志馆，由白永贞、袁金铠任馆长，延聘吴廷燮等为纂修。在纂修开始，曾经编就“辽宁通志总章拟目商例”，以为编撰标准。当时所拟志目，仍仿吉林通志新疆图志的体例，统名以志。志目凡二十有一，即大事、沿革、疆域、山川、建置、礼俗、户籍、田亩、物产、实业、官制、民治、财政、教育、选举、交涉、交通、军备、人物、艺文、金石。志目参酌旧志，有因有创，在各省省志中较为后出。在事变发生时，全书各目底稿，成缺参半，诸待梳理，幸未散失。事变后，金毓黻担任馆长，经过了两年多的清理纂辑，大体完稿。为符合敌伪的要求，只能改称《奉天通志》并取消了交涉一目，并将原目的户籍、官制，改为民族、职官。到了1937年由伪奉天省公署印行。全书260卷，10函100册。惜因顾忌，漏略之处颇多，因印刷仓促，内容鲁豕讹误亦不胜枚举。

《热河志》，4函24册，清乾隆四十六年官修，120卷，铅印。

沈阳故宫旧存有武英殿本，系清乾隆四十六年官修，外间流传极少。1934年由辽海书社重付排印，中有影印插图160余帧。

《辽陵石刻集录》　1函2册，精装6卷。

1930年冬，辽宁省立图书馆长卞宗孟，由东北当局派同北平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梁思永，去热河林西发掘新石器时代遗物。归来携有林西白塔子出土的契丹辽陵图书哀册及汉字钦爱皇后哀册篆盖拓片，并撰文述梗概（载东北丛刊第十四期），国人知有辽陵石刻，实自此始。自后颇引起金石学

者对于契丹文字的研究。事变以后，在沈阳汤玉麟（热河省主席）私邸，发现全部辽陵刻石俱在，乃系汤玉麟在前一年私自盗掘辽陵，运来沈阳者。辽陵历代墓志石刻，均系契丹文与汉文对照各为一石，因为出土较近，文字完整，不失本真，对于研究契丹文字是头等资料。集录为金毓黻所作，就原石拓本缩印，并撰叙内容。书凡六卷，一为绪言，二为石刻正本，三为哀册考证，四为国书哀册考证，五为国书旁证，六为论著。全书考证颇详，印制亦精。

《永乐别录》 1卷，**《宣德别录》** 2卷，各2册。

两书均系旧史学家吴廷燮（向之）从明实录抄书有关辽东史实部分的稿本，由辽海书社据以付印者，时在1933年。吴廷燮事变前在沈阳萃升书院主讲有年，手抄明代各帝制录稿本多种，均赠予辽宁省立图书馆保管。

《满洲实录》 8类，4册，清代官修。

此书官修本旧藏沈阳故宫，图说并载，久无传本。事变前，辽宁通志馆曾取付影印。1933年辽海书社取其图付影印，改其说为排印。

《宣统政纪》 43卷，2函16册。

清代各帝皆有实录，均系官修，外间不传。清太祖讫穆宗十帝的实录，沈阳故宫崇谟阁旧藏全部。辛亥革命后，清室续修了德宗实录，后又续修了宣统政纪，体制亦同实录。历代实录均系帝王记事，历史价值不大，但亦可作为历史资料的一部分。宣统政纪的内容与近代变革亦可供参考。1934年辽海书社把这一抄本排印2函16册。

《四库全书原本提要》 140卷，4函32册。

当1930年沈阳文溯阁四库全书保管委员会曾提议撰印文溯阁藏书，未果，行而事变发。这一原本提要系就文溯阁本抄

录而成，甄叙各书，极为简明，颇便检阅。提要经辽海出版社编整，首系金毓黻撰写解题，末附书名索引、文溯阁四库全书提要与总目异同表及聚珍版本提要与四库全书提要异同表。1935年排印成140卷4函32册。

《渤海国志长编》 20卷，1函10册。

唐代渤海在东北建国达229年，其历史见之于新旧唐书及辽史，向无专载。金毓黻依别史体载，撰为长编，综叙渤海史事，详略谨严，颇足补史载的不足。辽海书社于1932年据稿本付印，书凡20卷，1函10册。

《清朝实录》 4416卷，122函，1220册，影印。

在辽海书社先后印出《满洲实录》和《宣统政纪》之后，敌伪于1935年，倡议影印清代全部实录，交由所谓日满文化协会主其事。影印原书，包括《满洲实录》及十二帝实录，所以命名曰《清朝实录》。由日本东京大藏出版株式会社承印，历时一年印就。全书共装为1220册，其第1到第10为全书总目，11至18册为满洲实录，以下为12朝实录。书中由于避忌，多所纂改，如倭字及不利于日本纪事，悉被删改。

（全国政协文史办供稿）

二

伪满电影、音乐与戏剧

伪满的国策电影

胡昶

伪满洲国从建立那天起，为了维护其傀儡政权，在思想文化上，实行了严酷的法西斯统治政策，他们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宣传工具，向民众灌输殖民主义思想和殖民主义文化。伪满的国策电影，就是日伪统治者特别注意利用的宣传工具之一。

电影国策案的提出

作为现代艺术的电影，本来是文化范畴的事，电影的建立和发展，是文化建设的重要标志之一。可在伪满洲国，电影首先不是作为文化建设由文化艺术部门酝酿发起的，而是由日本关东军和伪满警察部门，出于其对民众的思想统治的需要搞起来的。伪满洲国的电影，在它胚胎的时候，就成为一个畸形儿。

伪满洲国建立后，出于对内对外宣传的需要，伪满国务院各部门如伪总务厅情报处、军政部、国都建设局、马政局及协和会等部门，都利用电影进行宣传，委托满铁和日本电影公司拍摄了《新兴满洲全貌》、《满洲国军全貌》、《国都介绍》、《雄健的马蹄》和《结成协和》等纪录片。伪满民政部警务司还研究并制定了电影管理细则，实施管理办法。

1933年（伪大同2年）5月，日本关东军参谋小林少佐最早提出建立满洲国营电影机构的意向，得到了关东军和伪满警察部门的支持，于同年8月28日由伪满国务院总务厅情报处召开了满洲国策电影研究会第一次会议。参加会议的人员有：关东

军司令部第四课参谋小林、志村；伪民政部警务司嘱托吉崎民之助；伪国务院总务厅情报处处长川崎、事务官龟谷利一；伪文教部社会教育课课员冈田七郎；伪军政部顾问室顾问冈田；伪国都电影研究会井本幸一、樱井重义、山宗正守。会议观看了日本大阪每日新闻社拍摄的二部纪录片，讨论了电影研究会的任务，选定了研究会的人员。会议确定由伪满实业部总长张燕卿任会长，日本关东军司令部副参谋长冈村少将和伪文教部次长许汝棻为副会长，关东军司令部参谋小林为委员长，伪国务院情报处长川崎和关东军参谋小林、志村等为委员。并分配军警宪等有关部门委员的名额。同年9月14日，伪满首都警察总监向伪民政部警务司长提出了有关设立满洲电影研究会的文件。该文内称："去年以来，曾多次向日本人及关东军提出对制片及电影摄制活动给予援助的请求，由于他们之间有许多权益上的分歧，各怀私心，因而以为时尚早为由而加以拒绝。根据目前国内状况，通过电影来使国民了解国情，并通过教育性的影片提高满洲国民的文化水平，乃是当务之急。因此，应在关东军的援助下，尽快建立一个能促进满洲电影健康发展的指导机构。"并将电影国策研究会第一次会议讨论的有关建立满洲电影机构及电影进出口减免税的条例等作为附件同时送上。

电影国策研究会每月进行一次活动，讨论电影的政策问题和建立电影机构问题。后由于委员长小林调转了工作，该会活动一度中止。直到1934年（伪康德元年）10月，伪满电影国策研究会再度组织起来，成员由原来的10人，扩大到25人。这时参加的人员有：伪国务院总务厅情报处龟谷利一、小秋元隆邦；伪外交部宣化司伊藤初太郎；伪民政部警务司井川胜一、吉崎民之助、木津安五、中根退助、稻叶百三、石崎芳夫、陈宝林、祖田友吉、吉谷俊平；伪总务厅统计处井本幸一；伪首都警察

厅秋田春友；伪军政部宣传部小岛钊、杉谷义藏、长岛信义；伪文教部社会教育司冈田七郎；伪实业部权度局港满雄、仁科忠之；伪兴安总署折田美佐村、山本利雄；伪国都建设局森谷初二郎；伪协和会中央本部大槻忠夫；伪满洲国防空协会中央本部小玉定雄。并由龟谷、吉崎、冈田、长岛、大槻等担任常务理事。他们通过每月一次的“恳谈会”和不定期的“电影放映技术讲习会”，普及电影知识，扩大影响，介绍世界各国电影概况。1933年（伪大同2年）11月举办的“电影放映技术讲习会”，就是一次介绍世界各国电影概况的活动。在这次“讲习会”上，共有四人进行了专题讲座，其中只有一人讲述了“电影技术状况”，其他三人则分别讲述了“各国电影教育运动及电影政策”、“电影与文化”、“电影教育概况”。从中可以看出，在这时期，他们特别注意研究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电影政策。他们在研究了美、英、德、意等国家的电影政策后，认为这些国家电影政策的主要特点是：一、防止外国电影占领本国市场；二、扶植本国电影的发展；三、促进本国影片的输出。为能实现上述三项目标，促进本国电影事业的发展，要由国家投资兴建国营电影机构。国家要对优秀影片予以奖励，并对制片企业减免税收。至此，伪满洲国的电影国策思想已基本酝酿成熟。在这种形势下，伪满洲国政府于1937年（伪康德4年）8月14日颁布了“株式会社满洲映画协会法”，并于8月21日召开了“株式会社满洲映画协会创立总会”，正式成立了“满映”。

从伪满电影国策案的产生过程，我们可以看到，伪满电影国策的制定，一直是由日本人操纵的。在参与活动的35人中，只有3名是中国人，其余都是日伪机构中的日本人。在这些日本人中，日本关东军和伪满警察又占着核心的地位，伪满电影在它胚胎的时候，就同日本关东军和伪满警察结下了不解之缘。我

们从中还可看到，他们建立电影的基本出发点，主要不是想通过电影给民众以娱乐，而是想利用电影这种易于为群众所接受的形式，向民众灌输殖民主义思想和殖民主义文化。换句话说，他们主要不是把电影作为艺术的一种形式而是把电影作为宣传工具来利用。他们主要不是把电影作为文化建设，而是作为强化统治的一种手段来加强。因此，伪满电影从其诞生那天起，就带着强烈的殖民地政治色彩。

国策电影的主旨

"满映"一经成立，就成为一个特殊会社。它的特殊地位是由它担负的使命所决定的。那么，"满映"的主要使命是什么呢？我们可先看看"满映"自身的理解：

"满洲映画协会，是满洲国的国策会社，根据日满一德一心的正义，本着东亚和平理想的真精神，在平常无事的时候，对于满洲国的精神建国，有重大的责任，对于日本与中国等国家，应当将满洲国的实在情形，充分介绍，使他们充分的认识，而且对于其他满洲国内一般文化的提高供献资料，到了一旦有事的时候呢？他的责任更大了，就是与日本打成一气，借着电影这种东西，实行对内对外的思想战！宣传战！"

这里本来说得非常明白露骨了。可能生怕有人不理解，文件又接着说：

"再将上项所说的意思重复一下，就是：

一、对国民方面呢？满洲国建国精神的普及、彻底、并进行以建国精神为基础的国民精神、国民思想的建设。

二、对国外呢？介绍满洲国的实际国情。

三、根据日满一体的国策，介绍、输入日本的文化。

四、对于学术技艺等的提高做出贡献。

五、一旦有事的时候，借着映画，用整个的力量，实行对内对外的思想战！宣传战！以协力于国策的贯彻。”

文件又说：“本着映画来贯彻以上所说的各项目的，就是协会的使命，协会的生命。”

从“满映”的这个自身理解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伪满国策电影的根本精神，就是在平时向民众宣传殖民主义思想和殖民主义文化，在战时，使电影成为思想战、宣传战的一种有力武器。总之，是把电影作为日本帝国主义推行殖民主义，奴化我国人民的一种政治工具。

在阐述“满映”使命的另一篇文章中说：

“满洲国电影之指导精神

一、教育人民有王道乐土的世界观。

二、打破向来之陋习，并使人民具有积极参加五族协和新兴国家建设之心理。

三、施与建设新国家所需要的勇敢及豪强之精神。

此项指导精神，深信为满洲国电影国策之根本精神也。”这也是首先从政治需要来看待电影的。在这里，电影也是作为巩固其法西斯统治的一种手段而被重视的。

电影作为文化的一种构成因素，怎么会被日本关东军和伪满警察等日伪统治者用来强化法西斯统治的工具呢？这一方面是伪满傀儡政权为强化其统治所需要，同时也同日本帝国主义在30年代逐步加强了对电影的统治有关。

在30年代初期，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对中国的侵略战争。这时日本政界就有人提出要对电影进行统治，使之成为为战争服务的有力工具。

1933年（昭和8年）3月，日本国会议员岩濑亮向第64次国会众议院提出了“关于确定电影国策的议案”，提出要“尽快

设立一个适当的机构来调整和统制电影。”同年4月1日，纳粹德国成立了以戈培尔为头目的宣传部，实行纳粹式的电影统制。1934年（昭和9年）3月，日本内阁为“调查和审议对电影的统制及其他有关电影的重要事项”，成立了受内阁总理大臣监督的电影统制委员会，由内务大臣担任会长，文部省次官、警保局长和社会教育局长等高级官吏为委员。1935年（昭和10年）11月，成立了一个半官半民的财团法人“大日本电影协会”，由海军大将、子爵斋藤实任会长。斋藤实在“二·二六”事件中被刺杀后，由前内务大臣、子爵山本达雄接任会长，有军界和电影界的要人担任委员，该会在一篇声明中谈到它成立目的时说：

“本电影协会为了改进和发展我国电影事业，促使出现健康的娱乐影片，使电影对充实与提高国民生活，维持和革新社会风化作出贡献，并进而使电影实现大日本帝国的国策，不消说一朝有事之际，即使在平时，电影也要在政治上和外交上充分发挥它所特有的宣传教育作用，以收电影报国之效……”我们从伪满电影国策案的提出，到“满映”的建立，同日本“电影统制委员会”的设立到“大日本电影协会”的出笼，所走的道路和所唱的调子看出，有充分理由认为，“满映”的建立，就是“大日本电影协会”的翻版。

日本电影评论家岩崎昶针对日本电影的这种现象说，这是法西斯的魔掌伸进了日本电影界。我们可以说，在伪满，电影从一开始就被法西斯的魔爪所操纵，伪满电影浸透着殖民主义的毒汁。

国策电影的实施情况

“满映”是伪满洲国电影制作、输出、输入、发行、上映的专门统制机构。它不仅是个生产多种影片，洗印拷贝的综合

性制片公司，而且兼有影片输出输入，发行放映管理的职能。

“满映”生产的影片，当时分为“娱民”、“启民”和时事三种影片。“娱民”影片，就是故事片；时事影片，就是新闻片；“启民”影片，又称文化影片，则包括宣传片、教育片和纪录片。“满映”从成立到垮台的八年时间里，共拍摄故事片108部，教育片、宣传片和纪录片189部，编辑发行《满史通讯》（日语版）、《满映时报》（汉语版）近300期，输入和发行外国各类影片数千部，其业务活动是广泛而大量的。

“启民”影片是直接体现国策电影思想的最有力的片种，因此受到特别重视。“满映”利用这个片种迅速、方便的特点，多方面反映伪满各方面的面貌和介绍日本，以供向国外进行宣传和向国内民众教育之用。“满映”初期拍摄的《北支事变》、《黎明的华北》、《战斗的关东军》、《向北满进展的国道》、《铁都鞍山》、《进展的国都》、《农业满洲》、《跃进满洲》、《协和青年》、《日满一如》、《森林满洲》、《幸福之路》、《跃进电业》、《光明的大地》等影片，就是纪录日本关东军侵略和屠杀中国人民的所谓“武功”和日本伪满的统治、掠夺、奴化的“新貌”以及反映日满一体精神的。

为了利用电影这种易于为群众接受的形式进行宣传，1938年10月到1939年2月，“满映”会同日本关东军、伪满政府各部和伪协和会等部门，制定了一个庞大的文化影片拍摄计划——《满洲帝国映画大观》。《大观》中把拍摄目的规定为“使国外正确了解满洲国的政治、经济、产业、文化等全面发展的情况”，拍摄的篇目分为建国、国政、产业、交通、社会、文化、对外宣传等40多个篇目。在日本关东军、伪满各部及伪协和会等部门协同下，这个计划很快付诸实施。“满映”中后期拍摄的《我们的军队》、《乐土新蒙古》、《黎明日本海》、《光辉日本》、

《国兵法解说》、《满洲建国史》、《本溪湖全貌》、《关东军》、《满洲中央银行》、《大松花江》、《满苏国境设定》、《满洲的特殊会社》、《建国十年》、《日本产业》等影片，就是依《大观》所规定的拍摄目的而制成的具有典型性的影片，这类是伪满国策电影的重要构成部分。

在故事片制作方面，“满映”也一直以“国策影片”为主导，每个时期以至每年都要拍摄一些体现“国策思想”的影片。在1938年拍摄的九部影片中，《壮志烛天》、《大陆长虹》、《田园春光》、《国法无私》就是典型的国策片。《壮志烛天》宣扬伪满国兵的“业绩”；《大陆长虹》宣传伪满警察的“功德”；《国法无私》宣传青年检查官为法而不殉私情的“精神”；《田园春光》则是美化伪满的农村生活的。这些影片都是直接为殖民统治服务的。1939年拍摄了《国境之花》，描写青年军官保卫边疆的“功绩”和在作战中的“勇敢精神”。1940年根据伪国务院总理大臣张景惠的指定，并由日本关东军、伪治安部和伪协和会协助，拍摄了《黎明曙光》。影片描写伪满政府内的日本参事官同伪满国军、警察，为了“讨伐”安东省境内山区的抗日武装，在作战时被打死的故事。片头的字幕上就写明是为悼念日伪军亡灵而拍摄的。1942年伪“满映”又推出国策片另一部代表作《黄河》。这是日本华北派遣军委托，由汪伪协助拍摄的。影片描写正同日军作战的国民党军队，为阻止日军前进，遂将黄河决堤，致使四县地面惨遭黄水灾害，数十万人流离失所。着重宣扬汪伪的皇协军和日本侵略军修复了决口的河堤，使民众从水害中解救出来。影片把侵略魔鬼描写成了救人的菩萨。1943年拍摄了惊险影片《碧血艳影》，描写伪满警察打入土匪集团内部，最后擒拿住匪首的故事。影片拍摄了不少惊险场面，因此被鼓吹为是一次成功的创作。1945年拍摄的《大地逢春》，内容更加反

动露骨。影片描写承德地区一对农民夫妇，本来生活得美满，由于土匪常来袭扰，男的投降了八路军。他在八路军中看到，士兵常常逃跑，抓回来被枪毙，心里产生恐惧，从此忧心忡忡。一次在同伪满国军作战后，进入一个村子，这正是他的家乡，他站完岗回家去看妻子，临近家门，突听有人喊“救命”，他闯入家里一看，是他的连长正在污辱他的妻子，盛怒之下，打死了这个连长，带妻子逃走，后来伪满国军打退了八路军，肃清了土匪，他们夫妻才重新过上美好的日子。

仅从以上所例举的这几部影片中，我们可以看到伪满国策电影的一般面貌。在这里，电影完全用于政治宣传和政治说教，远远抛开了电影的艺术属性。

伪满的国策电影，遭到了东北沦陷区人民理所当然的冷落，这些影片很少有人去看，“满映”为了能维持其生产并保证市场上的上映节目，在这种形势下，不得不放宽题材，拍摄了一些情节性较强、宣传性较淡的娱乐影片，如《七巧图》、《知心曲》、《如花美眷》、《情海航程》等。也还拍摄了一些反映婚姻、家庭及社会底层人物生活的影片，如《她的秘密》、《雨暴花残》、《风潮》、《艺苑情侣》、《流浪歌女》、《歌女恨》、《劫后鸳鸯》、《白雪芳踪》等。为了增加影片的品种，在中后期也还拍摄了喜剧及古装片，如喜剧《运转时来》、《一顺百顺》、《雁南飞》、《皆大欢喜》、《荒唐英雄》，古装片《龙争虎斗》、《花和尚鲁智深》、《豹子头林冲》、《黑脸贼》、《璎珞公主》、《燕青和李师师》等。这些影片没有那么强烈的宣传色彩，主要通过娱乐性取悦于观众，这和那些带有强烈宣传色彩的国策片是有所不同的。

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满映”也进入了战时体制，不少摄影师先后被派到前线，随军拍摄纪录片。1945 年日本临近垮台

时有的导演也被应征入伍。为配合日本发动的太平洋战争，“满映”及时制作了反映日本进军的纪录片如《日本舰队堂堂出师》等，并在伪满上映日本拍摄的反映日军进攻的纪录片《夏威夷、马来海战》、《南海之花束》、《马来战记》、《空之神兵》等。做到了“一旦有事，全力以赴”。

“满映”建立之前，伪满全国只有影院76座，数量较少，主要分布在大中城市。“满映”建立以后，采取多种途径发展县城影院，到1943年11月末伪满全国影院增加到213座，“满映”很快地建立起自己的发行网。“满映”建立前，市场放映的影片主要是美英影片和上海片，“满映”建立后，逐步减少了美英影片的进口，以大量的日本影片而代之，同时极力拓展自己影片市场，以此同上海片相竞争。这样，到伪满后期，日本影片和“满映”自己生产的影片占领了伪满的电影市场。“满映”在影片输入和发行上，也处处体现着国策电影的精神。

（摘自《东北沦陷十四年史研究》第1辑）

我所知道的“满映”

张　奕

株式会社满洲映画协会，又名满洲电影股份公司，简称“满映”。它成立于1937年（伪康德4年）8月21日。成立时的厂址在大同大街伪新京市政府北侧“日毛”百货店的楼上（现址为吉林省建筑设计院）。

“满映”是伪满洲国唯一的电影股份公司。企业投资为伪币500万元，由伪满政府和“满铁”共同分担，各为一半，所以

“满映”的理事中有一名是“满铁”的代理人（渡濑成美，满洲通）。

“满映”建立初期内部组织机构还不甚健全，只有制作部和发行部这两个部门。总负责人是林理事（日人）；名誉理事是金璧东（伪新京市长，清朝皇族）；制作部长是龟谷（日人）。当时“满映”的技术人员、业务人员，除演员外，诸如脚本员（编剧）、导演、摄影等都是日本人。

“满映”的业务领导是伪国务院弘报处。“满映”先期生产的影片由伪治安部电影检阅股检查；1941 年弘报处职能再次扩大又归弘报处检查；1942 年后，也就是甘粕正彦来“满映”以后，这项检查就由“满映”自己负责，情报处派人参与。检查时，对上海、香港片，主要看其是否有损于伪满政权，是否有损于日伪统治，如有反满抗日内容，轻者局部剪掉，不好剪掉者禁演。对“满映”自己拍的片主要是看其内容是否符合“国情国策”，有无有损于“日满协和”、“王道乐土”等方面的内容。

“满映”是在伪满“建国大纲”的指导下拍片的。

“满映”制作部分为两部分，一为娱民映画处，专拍故事片；一为启民映画处，负责拍新闻记录片。我是娱民映画处的，对启民映画处的情况不详，只知道启民映画处分为文化片课和时事片课。当时，启民映画处处长是冈田。文化片课主要是从事记录影片的摄制，叫文化电影，如《跃进的满洲》、《北方的部队》、《我是满洲国民》、《开拓团之春》等。时事片课，主要是拍新闻片，报道时事新闻，日语的叫《满映通讯》，汉语的叫《满映时报》，每十天出一画，就是一次，编成顺序号、配合形势，进行时事新闻的形象报道。拍一般的新闻片由编导和摄影师到现场去直接拍摄。特殊重要的报道，如日本天皇和伪满皇帝出巡、日本上层人物来东北，以及有关军事方面的报道，拍

摄人员都佩戴关东军报道班的袖标，一般人禁止进入现场。启民映画处的导演和摄影师都是日本人；后期只有两个中国人导演：刘艺夫和沈照征。当时关于外国新闻的报道，均由日本输入，编入《满映时报》，加上解说词放映。

"满映"在1938年开始拍故事片。但1939年和1940年所拍的影片，因为除演员外，脚本（编剧）、导演、摄影均为日本人，他们对中国的风土人情、生活不够熟悉，镜头的运用日本片的痕迹大，死板，尤其影片一映出，除演员外，字幕上的人员，清一色是日本名字，"满洲片日本化"的色彩特别浓厚，再加上质量低，甚是不得人心，上座率不高。观众都喜爱上海片和香港片。当时伪满政府和投资者"满铁"，对于这种情况很不满意。认为它既起不到宣传的作用，也不能扩大经济效益。因此，在1940年冬季对"满映"进行了一次机构改革和人员变动。由协和会中央本部调来了甘粕正彦任理事长。

甘粕的到来给"满映"带来巨大的变化。关于甘粕其人我们将在另一章中专门记述。

在发行方面，开初，由发行部从上海和日本引进一部分故事片，连同"满映"自拍的片子，向日本人和"满洲人"经营的电影院发行放映。也是甘粕来了以后，伪满政府又把各地电影院的管理权移交给"满映"。此后，"满映"又在东北各地新建了一些直营的"映画馆"。这样"满映"就从制作、发行、放映等各方面完全垄断了全东北的电影事业。

"满映"成立于1937年8月21日，9月间就在《康德新闻》和《大同报》刊登"满映演员养成所"招生广告，抓演员队伍的培训。我的"满映"电影演员生涯从此开始，直到1945年伪满垮台。

一九四0年前后的“满映”

1938年秋季，“满映”开始拍故事片。摄影棚是火车机头库改建的，录音室是西长春大街原第一期演员宿舍改建的。那时拍片是后期录音。“满映”第一部故事片是《壮志烛天》，主要演员有王福春、郑晓君、张敏等。该片写的是伪满国兵的故事。

1939年末，南长春新厂房落成，整个“满映”全迁入新厂。办公楼、摄影棚和车间建筑规模宏伟，设备先进，堪称东亚第一流电影厂。由玄关门走进去，是宽敞的大办公厅，磁砖地，连续三个大摄影棚，楼西侧是大礼堂，也是连续三个大摄影棚。院中心有制作部办公楼、演员厅和洗印间等，后面是制作间。

随后，又陆续修建了家属宿舍。男女演员独身宿舍建好后，我们都搬进去，两人一室，室内设备简单，只有一张大床、一张桌、两个椅子。宿舍附近设有食堂，上班很近，就在厂房东侧。

随着新厂的建成，一些机械设备也都装备完善。这时拍故事片，内景拍摄均为同时录音。大录音室设备先进。机器大部是来自日本、德国、英国；胶片有日本富士、德国的阿格发、美国的“イストマソ”。制片工作，逐渐步入正规。

随着拍摄业务的扩大，“满映”相继又从日本国内调进了一批电影专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导演大酋俊夫、山内英三、水江龙一、坪井与藤广濑、笠井、高原以及摄影师谷本、藤井、气鹤、池田等，大致都是在这一时期先后来到“满映”的。

“满映”开初没有乐团，只有几名作曲（神原是其中之一），在影片后期合成时，音乐及演奏由新京音乐院担任，新京音乐院院长是大冢（日人）。

1940年秋季开始的“满映”在组织和人事上的大改组，除

调甘粕正彦为理事长，把原来负责的林理事（日本人）调走，还把满洲新闻社的理事长和田日出吉调入，任专管生产的理事；“满铁”又新派来在“满映”的资方代理人渡濑成美任负责经营的理事；调走原制作部长牧野满男，新从日本调来一些电影作家，任命电影工作者八木保太郎任制作部长。

甘粕上任后，首先调整充实了制作部，特别是任用了一些中国人。

1941年春，调进了参事级的满人姜学潜，任娱民处长；调陈承翰、李连仲任副处长。姜学潜是日本国立大学广岛高师文理科毕业生。他的妻子是日本人。姜调进“满映”前是伪协和会青少年团中央统监部文化课长。

1942年姜升任“满映”制作部次长。陈承翰过去在开滦煤矿工作过，精通英语。伪满成立后来东北，在伪国务总理郑孝胥主办的王道书院任教。李连仲调进前在伪治安部工作，是个旧军人。1941年末“满映”养成所成立，陈承翰又调去任所长，李连仲调去任副所长。

脚本是故事片之本。过去“满映”脚本员（编剧）全部是日本人，他们对“满洲人”的生活和风土人情不熟悉，写出的脚本不合中国人的口味，所以改组后的“满映”先后把“满洲”各地一些有名的作家调来充实了脚本课，改变了日本人独占脚本课的局面。调进的作家名人有山丁（梁梦庚）、小松（赵孟原）、辛实（张英华）、王度、安犀、韩护、张我权等人。

在导演方面，也开始培养“满洲人”当导演。采取由日本人导演带徒弟的方式，让日本人同“满洲人”一起拍片，但在片头字幕上写满人导演名字；摄影虽是日本人，有时也用上满人名字。这样，没多久就培养出了一批“满人”导演，如周晓波、张天赐、朱文顺、刘国权、王心斋、王则，都能独立导演

拍片了。

由于拍片任务扩大，为便于各摄制组调动演员，又加强了演技课演员系。由伪协和会调进了中国人刘秉欧任演员系主任。演员系的主要任务是和制片组副导演密切联系，根据各片组的提名安排演员和群众演员，并办理有关演员方面的一些事务。

在演员方面，除养成所三期毕业的演员外，又从“满洲”各地及北平等地，招进一批演员，其中有：徐聪、白玫、李明、顾萍、白珊、白地、张冰琳、莽依萍、风眠、陆园、于景霖等人，充实了演员阵容。又从“满洲”四大城市各考选一名拔尖演员，名为小姐演员，她们是新京小姐马黛娟、哈尔滨小姐陶滋心、奉天小姐娜娜、大连小姐于小红。这时演员的人数已达到了110人之多。

“满映”比较出名的女演员有张静、孟虹、白玫、张敏、赵爱苹、陶滋心、马黛娟、郑晓君、李香兰、李明；男演员有王宇培、戴剑秋、周凋、张奕、浦克、隋尹辅、李显廷、徐聪、杜撰、刘恩甲、赵成巽、李林。这些人都是干部演员。

由于机构扩大、所需人员光靠从日本调入，难以满足需要，因此“满映”上层领导决定，于1941年成立了“满映养成所”。这个养成所与1937年的演员养成所不同，1937年的养成所，主要是培养演员，只办了三期；这个养成所是综合性的，学科齐全，有导演、演员、美术、摄影、录音、放映等等，学习期按不同学科的性质，分为二年或三年，毕业后分配到“满映”各部门工作。养成所的所长有日人和“满洲人”，“满洲人”所长是陈承翰，副所长是李连仲。教师大部分是日本人，“满洲人”当翻释，协助教课。

在摄影方面，现在长影的摄影师王启民（王福春）、包杰，北影的聂晶等三人也是从“满映”出来 的，都给日本摄影师当

过助手。王启民在“满映”时原是一名很好的演员，主演了多部影片，后来由于患有严重的鼻病，经两次手术，他的鼻音仍适应不了同时录音，为此就改行去学摄影。学摄影是相当艰苦的，有时要扛着沉重的机器爬山涉水去拍外景。一个已经有了名望的演员改学摄影，证明王启民很有毅力。他的爱人白玫也大力支持他。当时，他一直给日本人摄影师谷本精一和气鹤当助手。这两名日人摄影师耐心地教他，他也尽心刻苦地学，由第三助手、第二助手到第一助手，最后日人摄影师就放手让他独立操作。包杰一直是藤井摄影师的助手。聂晶给池田当助手，后来跟池田去了华北。现在，王启民和包杰都是长影的摄影大师，聂晶是北影的摄影大师。

通过改组、整顿，“满映”故事片生产不仅数量多，质量也提高了。“满映”的片子在群众中有了市场。在两年多的时间里拍出的片子计有：古装片《花和尚鲁智深》、《燕青与李师师》、《黑脸贼》、《白马剑客》、《娘娘庙》、《百花亭》等；喜剧片《人马平安》、《一顺百顺》、《乞丐与千金》、《荒唐英雄》等；侦探片《碧血艳影》、《夜袭风》；国策宣传片《田园春光》、《黎明曙光》、《大地逢春》、《白兰之歌》等。

这时的“满映”不但垄断了整个满洲的电影事业，连日本和上海的电影企业也都向它靠近，因为他们生产的片子，要通过“满映”进口后才能发行。再加上“满映”厂规模大，设备先进，日本以及上海电影界，每年都派人来参观和交流。日本“日活”电影株式会社以导演内田吐梦和明星小杉勇为首的代表团来过满映。日本东宝映画和“满映”合拍了故事片《白兰之歌》。日本商事株式会社（新闻片厂）也多次和“满映”合作，拍摄新闻片。上海先后来“满映”参观的有汤洁剧团、尤光照演出小组、马陋芬歌舞团、白云剧团、上官云珠剧团、顾兰君

剧团等。他们参观后，都称赞“满映”厂规模之大是上海各电影厂所不能比拟的。

华北电影厂的学员演员毕业后，首先要来“满映”参观学习，他们称“满映”为兄弟厂。当时满映确是东亚一流的电影企业公司。全厂人员达1 300 人。1940 年“满映”在其厂址南端200 米处新建一座俱乐部，专为招待外来客人。俱乐部楼下有餐厅、茶座、游艺室。住厂附近的人员，下班后可到那里吃茶、游玩。

1941 年“满映”又在厂东南角，专为甘粕个人修建了一座豪华的湖西会馆。

在这里说说华北电影厂和“满映”的关系。

华东电影厂（华北电影公司）在北平。它的前身是私人经营的燕京电影公司。力量薄弱，需要大量技术人员，所以从“满映”调去了一部分人。摄影师池田等人，就是在这一情况下去那里的。后来聂晶也投奔池田而去。第一期演员侯志昂，因山东口音严重，做演员有些困难，他去到那里当了副导演。解放后，他回到长影改名侯健夫，又当了演员，后因车祸死去。场记王惠仁因为工资低，去北平华北电影公司，也当了副导演。

还有，演员王文涛、曹敏、孙晶、索维民、萧大昌、于廷海、赵爱苹等人，也因不同情由，去了华北。

“满映”先后由华北方面也进来些演员，如徐聪、张冰琳、白珊、白地、李雪娜。呼玉林是因感到在“满映”派不到角色，没什么戏演，有些怀才不遇，才去华北的。据说他到华北后投在华北映画检查班工作。

甘粕正彦其人

我至今还记得甘粕到任后，在全体人员大会上的讲话。大

概意思是“满映”是满洲唯一的电影企业，要按满洲国策和国民的意见拍好电影。他说“满映”的主要成员是日人和满人，要本着日满协和、同心同德的精神，尽全力工作，拍出好的影片、上座率高的影片、国民都喜欢看的影片。他在会上还宣布了几条纪律，他说：要按时出勤，遵守纪律。他特别强调：日人和满人不许打架，不许争吵；如发现日人和满人打架，我首先处分日人（对于这点当时所谓的满人听了，都很振奋）。

过了几天，他分别举行了两次招待宴会，一次是在大和旅馆招待“满映”厂的所有“满人”，吃的是西餐；另一次是在国都饭店招待全厂的日本人，吃的是中餐。以上是对甘粕初到“满映”时的印象。

不久，大家感到甘粕是“满映”的总负责人，是个文化人，但却有一身军人气质。他平时非常严肃，很少笑容。留一个似平头又非平头比光头又高一点的头型。他理发时不准理发员摸他的脸。他的脸总是刮得光光的，据说他的脸要两天刮一次。他爱人住在大连，他单身一人住在大和旅馆（现春谊宾馆），经常往返于新京（长春）至大连之间。他平时穿一身黄将校呢军服和一双擦得亮亮的半靴短皮靴。一有什么典礼日，胸前便佩戴一排大勋章。这个人上下级的观念非常重，就连日本人理事、部长们对他也都是绝对服从，表现出下级对上级那种毕恭毕敬的样子。到他办公室，无论开会也好，办事也好，他不发话，就是理事、部长也不敢坐下。凡是在“满映”的，无论是日本人和中国人都怕他，主要是因为他对工作要求得非常严格。听说有一次经理部长向他汇报全厂收入以及预决算等情况，数字有出入，他当即把经理部长严厉地训斥了一番。一次他发现出勤情况不好，迟到现象严重，于是就搞了突然袭击：一天上班前他站在机关大楼的平台上，叫守卫通知全厂人员在操场集合，上

班铃响后，立即关闭厂门，把迟到者一律拒之门外，然后命令他们列成一队走进操场，站在全体人员的前边，由甘粕逐个询问迟到理由并加以训斥，对部长课长级的迟到者申斥得更为严厉。从那以后，又加强了考勤制度，迟到或无故不上班的现象杜绝了。又一次他发现厂内卫生不好，就把课长以上的人员召集起来，由他领着在场内各处查看，发现问题，立即质问，对管理课长荒木严加训斥。查到厕所时，发现小便池不洁净，臭味很大，他叫理事带头逐人都闻一下。从那以后，厂内卫生面貌大为改观，就连院内物品也都堆放得整整齐齐，厕所也保持了经常卫生。

他到“满映”后，特别是1942年以后，“满映”拍片多了，收入也大大增加了，所以每年年末，他对主演片多的演员，特发给500元至1 000元不等的“赏与金”。发“赏与金”的“仪式”也颇隆重，地点就在他的办公室，有理事和部长参加，由他直接发给。这时，他一改常态，笑容满面，谈笑风生。在伪满末期，物资供给非常紧张，有一天渡濑理事、姜学潜次长和我想喝酒，怎么也弄不到。渡濑理事说，甘粕有好酒，都是外国进口的，叫我去要，并说他能给面子。我去了，向甘粕说我们想酒喝了。甘粕一听就笑了，很慷慨地叫秘书课长天岗，给拿了两瓶德国酒。后来才知道，只要你和他要东西，他是很高兴的，总是很大方地满足你。

1944年华北电影公司的影艺学院演员毕业，来“满映”参观。他招待了两次，一次在南岭公园内野餐吃成吉思汗烤肉；一次在他的湖西会馆。他都亲自出席，并叫男女干部演员作陪。他还赠送这些客人每人一件纪念品。后来才知道，他所以对北平的这批学员如此招待，原来华北电影公司有“满映”的投资，也等于是“满映”的一个附属电影厂。

时间长了，大家也感到奇怪：甘粕仅仅是“满映”的理事长，但却经常参加“满洲国”的一些高级会议；而且在会议期间或会后，他都要在他的湖西会馆或者他住的大和旅馆宴请与会者。湖西会馆位于“满映”厂东南角100米处，是1941年甘粕来厂后为甘粕个人修建的。馆内有会客厅、餐厅、放映厅、休息厅等，室内均有地毯、高级沙发、精制桌椅、电扇、金丝绒窗帘等。甘粕利用这个会馆，招待与他个人有关系的人员。“满映”的重要会议和对日伪上层人物的招待会餐也都在这个会馆。“满映”能到该会馆去的，只有部长级以上人员。

又听说甘粕可以随便出入“宫内府”。在一次参拜“忠灵塔”之前，我们还亲眼看到关东军司令官山田乙三大将同他打招呼。感到此人来头不小！

1943年10月，我刚拍完《燕青和李师师》，还没后期合成，一天中午一个戴眼镜的人，到我家找我，说他是厂人事课的找我有事。我正在王宇培家聊天（同一住宅），我爱人把我找回来。这个人说厂人事课长在俱乐部有事等我，我就同他出来。一出门，上来两个人（其中一个戴眼镜），不容分说就把我架上下坎停着的一辆黑汽车，上车后，车上的一个人用军毯把我的头蒙上，车就开走了。当车停下后，他们把我架到一处步步是下楼梯的一个房间。揭下军毯，我才看清几个穿着军服光头的日本人坐在那里。一个人过来对我说，要好好的交代问题。然后，那个戴眼镜的，领我去换衣服（给我一套没有扣、没有裤带的棉军衣和一双木拖鞋）。随后把我送进一间拘留室（这屋就我一个人），关上大铁门，上了锁，他就走了。

第二天审讯，上午叫我写家中和“满映”情况以及认识哪些人，下午拿出来一些反日的标语和漫画，问哪些是我写的、画的。我说，都不是我写画的（实际也不是我写画的）。标语写的

是："我们要长期抗战到底"，"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等；漫画画的是一支狗的肚子上有一面日本太阳旗，一把刺刀刺在太阳旗的太阳上。还有一些漫画也都是反日内容。在我否认之后，审讯人拿出了我在"满映"填写的履历表，问我，这张表是你写的吧。我说是。他就把表上"张奕"中的张字拆开，让我看我写的偏旁"长"字和标语中长期的长字一样不一样。我说一样，因为我的履历表是用电影上常用的魏碑体写的，确实和标语上的长字一模一样。他又问：这你还有什么说的？我说，标语确实不是我写的。另一个日人，很厉害，打我，又要给我用刑。那个戴眼镜的又缓和了一下，没让用刑。他转了话题，问我在吉林毓文中学念过书吧。我说念过。他又问，吉林毓文学校被查封，校长和部分教师、学生被捕，你知道吧？我说知道。这时已经是晚饭时间了。戴眼镜的叫我仔细想想，说，你在毓文中学时的活动和现在的一切活动，都通通的好好想想。就这样把我又送进了拘留室。第三天上午10时，一个拿木枪的日本人看守来叫我。我问，过堂吗？那个日本人不像昨天那么凶了。他说，你们会社来人了，你今天的回去。他把我领到来时的换衣室，换上了我自己的衣服，又来到那个屋。屋内除了那几个秃头日本军人，"满映"厂的人事课长高桥勇、制作部总务课长上原笃也坐在哪里。还是去时对我说话的那个秃头日本人对我说，你的问题没有完，我们还要调查，因为你们厂工作等你，先叫你回去，以后要随叫随到。你现在可以回去了。我就和高桥、上原一同出来。出来后，我一看吓了一大跳，原来这里是日本宪兵总司令部。进到这里是九死一生的。回厂后，制作部长八木保太郎，问了一下情况后说，那个地方不要说你们，就是我们也怕呀。八木叫我好好休息几天，好进行工作。在我被捕走后，我爱人就去厂报告，但当时谁也不知道是那里抓的，不好联系，

当第二天到家里来搜查，才知道是日本宪兵队，我爱人又去厂报告。制作部长八木向理事长甘粕请示，甘粕写了条，就把我要出来了。由此可见甘粕地位之显赫。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甘粕仍有一系列活动。8月17日，甘粕召开全厂大会。在会上他宣布：日本天皇下诏，宣布了日本投降。现在日本是战败国，中国是战胜国。现在中国人站起来了，一切都是属于你们的。“满映”是属于中国的财产。但在你们中央没来接收之前，我还是“满映”的负责人，负责保管好“满映”，直到你们中国政府接收为止。由现在起，要组成“满映”保管机构。中国人由姜学潜、陈承翰负责。各部课室由原负责的日本人和你们派出的中国人共同负责保管。在此期间，如果发现日本人不很好移交和中国人不认真尽职，我还是要管。

就这样，中国人选出了人选和原日本人负责人，共同清理物资造册，等待中央来人接收。

接着，又给厂所有人员，发下退职金。宣布了“满映”解体。

从此，厂内有责任的，每天上班；无责任者，有时到厂看看；多数人都是在家等待。

这时，甘粕由大陆科学院要来一千包“氰酸钾铝”，准备苏军进长春前，叫所有在“满映”的日本人服用，集体自杀。听说由于甘粕的亲信和一部分人的劝解，甘粕才放弃了这一主张。当把“氰酸钾铝”送回大陆科学院时，发现少了一包，大家明白这是被甘粕自己留下了。此间甘粕的作为是，他叫中国人和日本人组织了一场野球赛，他看完，决定给胜队和败队都发了奖（可能他以为日本战败了也是值得表彰的）。又组织了一场文艺联欢演出，在演出完了，甘粕到台上，对大家说，现在为中

国的和日本的在战争中牺牲的亡灵祈祷，一起唱“ウミエカベ”歌，唱完后，他又说请大家为我アヌカス（甘粕）也唱一遍。唱后他说了声“アリガトウ”（谢谢），就走了。

散会后，大家在议论，甘粕让大家为他唱祈祷亡灵歌，他可能不想活了。

此后，他在湖西会馆，先后举行了一次品烟会、一次品酒会，邀请的都是他的好友和“满映”部长级以上的日本人。

他又叫“满映”日人木工做了一只木船。一天夜里他把船划到南湖湖心处，边钓鱼、边喝酒，整整闹腾了一夜。

甘粕的妻子一直住在大连，甘粕一人住在“满映”或大和旅馆，在他任职期间，每月回大连度一次假。日本投降后，他就一直住在“满映”二楼他的办公室里。当发现少了一包“氰酸钾铝”后，他的亲信如上映部长野崎、秘书课长天岗等人，每天都守在他身边。在他酒醉的时候，翻遍他的全身，也未发现那包“氰酸钾铝”。即或在他晚上入睡后，野崎、天岗也每隔一二小时去他办公室探望，怕他自杀。就在8月20日过夜3时许，天岗去他办公室，发现他穿着整齐（连半截小马靴也穿着），躺在长皮沙发上，已经死去。在他办公桌上的一张纸上写着“ミナサン、サヨウナラ。アヌカス。”（诸位、再见。甘粕。）在纸条旁，发现一个烟盒，一支纸烟破开，散落有少许烟丝。大家这才知道甘粕把那包药藏在一支纸烟内。

关于甘粕死时的情况，我再把自己的亲身经历、亲眼所见详细介绍一下。因为在这方面，有些议论，有的说甘粕并没有死，又说当时埋在地下的棺材，后来挖出来，发现里面没人，甘粕去向不明等等。总之，把甘粕说得神乎其神。

1945年8月20日一早，“满映”制作部次长姜学潜，叫演员系主任刘秉欧告诉我们：甘粕死了，叫导演和干部演员去一下。

我记得当时去的有导演周晓波，干部演员有我、王宇培、周凋、浦克，还有几个人（名字记不清了）。当时姜学潜对我们说，甘粕自杀了，在他任理事长期间，对你们都不错，你们代表导演和演员去祭祀一下。又说，虽然日本投降了，我们念在过去旧关系，还是应以礼相待。就这样，我们到了甘粕的办公室。甘粕还是穿他那身黄将校呢装，半腰皮靴，停放在室内的长皮沙发上面，头上盖一块白布。头前点着两支蜡烛，香炉里点燃着几炷香。旁边有一位日本和尚在照应。"满映"的上层日本人和田理事、渡濑理事、上映部长野崎、制作部长八木、秘书课长天岗等都在那里。我们也都一一点上一炷香，祭祀一下。日本和尚揭开甘粕头上的白布，我们看了一下，甘粕的脸已经是青白色了。祭礼后，我们离开前，秘书课长天岗对我们表示感谢，并说下午3时将理事长下葬，请来参加。我当时问日本人，为什么不火葬呢？天岗说，火葬得等他夫人来才能办，现在大连方面情况不知是什么样子。天岗指着甘粕办公桌说，他死前只留下"ミナサソ、サヨウナラ。アヌカス。"这张纸条（我还走近跟前往甘粕的办公桌上看了一下）。天岗又说，我们知道他要死，一直在暗中注意他的行动，没想到他把他留下的那包"氰酸钾铝"放在烟卷里啦。我看到在那张纸条旁边，有一支剥开的纸烟，还散落些烟丝在那里。天岗接着说，他对他的家属也没留下什么言语，只好在他夫人来之前，先埋葬，等他夫人来了之后，看如何处理。

我们走后，经过制景间，看见日本木工正在忙着做棺材。

到下午3时，我们去了。他的亲信日本人，把他抬到制景间，装进棺材。因为棺材做得短了些，尸体装进棺材后腿还稍弯曲一下。安置完毕，盖上棺盖，用钉子钉好后，装上车拉到湖西会馆。在湖西会馆东侧已挖好坑，就下葬了。在下葬时，天岗

等人还在棺材前面放了几瓶酒，天岗说，理事长生前喜欢酒，就这样表示表示吧。我们一直等待埋好后才离去。后来听说他老婆由大连来了，把棺材起出火葬了。这就是我亲眼所见的情况。

甘粕为什么选择这天死呢？原来，他知道8月21日苏联红军开进长春，所以，他选择苏军来长春前一天自杀。死前他尽情地玩，把他生前所喜好的都做到了，如打野球、抽烟、喝酒、钓鱼……他为什么要死呢？他对他自己的身份是最清楚的。

甘粕究竟是个什么人呢？

最近，看过一些资料，联想到他在“满映”时的一些情况，才对其人有了清楚的认识。

甘粕正彦不单单是个文化人，他早年是日本一个宪兵大尉，和东条英机同时任职。在日本大地震时，日本军部趁震灾造成的混乱，迫害日本进步人士。当时日本无政府主义者大杉荣夫妇一家人（包括他们的7岁的孩子）就是被甘粕杀害的。日本军方对甘粕大加赞许，此事也就成了甘粕起家的本钱。震灾后，这个惨案被人揭发。在社会舆论的压力下，军方不得不把甘粕充当替罪羊，交军事法庭，处以无期徒刑，平息了舆论。过了不久，他就获得了假释，被送往法国学习美术和音乐。据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出版的一本书上说，作为“九·一八”事变信号的柳条沟事件，就是甘粕的杰作。日本关东军首脑本庄繁策划建立满洲傀儡政权，由天津秘密挟持溥仪到东北。当溥仪到达营口码头时，关东军特派甘粕正彦（当时他化名内藤维一）前去迎接。溥仪就在甘粕等人陪同下，先到汤岗子温泉疗养区的对翠阁旅馆暂住。由甘粕在溥仪身边负责所谓的照护。后来，甘粕又陪同溥仪到长春。溥仪就任伪满“执政”后，办的第一件“公事”也是与甘粕大有关系的。一天，郑孝胥到“执政”办公室，送上一件“公事”说：“本庄司令官已经推荐我出任国务总

理，组织内阁。这是特任状和各部总长名单，请签上御名。”当时溥仪就说这事日本人甘粕正彦早已跟我说好。于是他默默拿起笔，办了就职后的第一件公事。从此可以看出甘粕其人的地位！在“满映”时，甘粕随便出入宫内府当然也是顺理成章的。

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实行法西斯高压统治的标志之一是伪满洲国拥有庞大的警察队伍和警察机构。而这个警察机构和队伍就是在关东军的支持下，由甘粕正彦一手拼凑起来的。伪民政部警务司是伪满初期的警察总部。1932年3月1日，甘粕正彦出任警务司长，成了伪满第一任警察头子。

1937年4月，伪满协和会曾进行一次改组，调甘粕正彦任协和会总务部长兼规划部长。当时协和会的指导部长是古海忠之。协和会通过甘粕的规划、古海的指导，在“国民组织化”的施政方针下，日甚一日地加紧了对东北人民进行法西斯式的控制和奴役。

古海忠之证实：甘粕正彦于1937年任过天津大东公司理事长（可能是在他对协和会的策划之后）。该公司专门收由华北进入满洲的劳工、苦力的入境税。这笔收入是很可观的，都由甘粕使用。当时甘粕在华中做排英的特务活动，他把大东公司的收入，都用在排英的特务活动上。为甘粕提供特务活动经费的，还有伪总务厅次长岸信介、关东军参谋长东条英机、“满业”总裁鲇川义介。古海忠之说，甘粕和东条英机、岸信介关系非常密切，他俩也都非常欣赏甘粕。古海又说他们当时有个独特会的组织，成员有岸信介、甘粕、椎名、鲇川、青木实、饭泽重一、古海忠之等十来个人，以岸信介、甘粕为核心。这些人经常在一起议论关于亚洲政策如何制定，情报和宣传活动如何进行等等。不但口头谈，还有行动，如争取报刊阵地，声援甘粕的排英活动。在上海夺取了《大陆新闻》（日本报纸），由福家

俊一任社长。不仅为甘粕的排英活动做宣传，也为日华事变造舆论准备。福家俊一对甘粕的评语是："由关东军河本大作大佐炸死了张作霖到建立满洲国，以及日华事变一系列阴谋活动，甘粕正彦都有份，就等于说甘粕是躲在一意孤行的关东军背后，充当了使日本奔向战争的点火脚色。"记者小板正则说，岸信介由满洲国回到日本后，仍继续给一个与关东军有密切关系的实力人物提供资金，这个实力人物就是甘粕。当时甘粕不但是"满映"的理事长，还担任伪满洲国顾问。

由此看来，把甘粕正彦作为伪满洲国的功臣，由伪满洲国皇帝溥仪授予甘粕最高勋章，是有道理的。无怪在"满映"时，一有什么庆典，甘粕总要佩戴那枚大勋章。他为什么能参加伪满的高级会议，现在更加明白了，因为他是伪满洲国的顾问。当年甘粕作为伪满洲国访欧使节团成员，随使节团出访欧洲，在到达英国时，英国政府指令，唯独不准许甘粕正彦这个人登上英国国土。英国怎能叫一个排英的人上岸呢。甘粕只得留在船上。

作为"满映"理事长，甘粕实际又是在为日本在满洲的统治出谋划策。看来，他和关东军宪兵司令官、关东军参谋长东条英机、满洲产业部次长岸信介、总务厅长官星野直树，"满铁"总裁松岗洋右、"满业"总裁鲇川义介这五个掌握满洲实力的五条汉子，不仅是关系密切，而且是同谋。他当上"满映"理事长，不仅把满洲这块主要的文化宣传阵地抓在手里，而且又在表面上打起了个文化人的头衔（他这个头衔在当时确是蒙蔽了"满映"的很多中国人）。应该说在后期他那个伪满洲国顾问的头衔是更为主要的。他既是搞伪满统治的政治要人，又是抓伪满文化宣传的要人。

1942年甘粕回日本一次，当时有人说他是去找东条首相活

动，因为他不甘心“满映”理事长的职位，实际他是去参加日本在东京召开的所谓“大东亚文学者大会”的。东条英机特地跑到那个会上为“大东亚圣战”打气。日本情报局、陆军省、海军报道部等单位的头子也都到会鼓吹军国主义舆论，煽动战争狂热。

接着在1943年，伪满政府召开了“决战文艺家大会”，贯彻东京会议精神，动员日伪作家行动起来，为侵略战争服务。看来当时伪满的文化统治大权是操在甘粕正彦手中。日本战败，甘粕正彦的自杀，绝不是什么大和魂和武士道精神的表现；仅仅是一个“满映”理事长，也绝不会促使他死去。人贵有自知之明，甘粕的罪恶，莫过于他的自知，衡量他的罪行大小，他自已的那把尺子是最准确的，所以他才选定了在苏军进驻长春前夕死去。他的死是罪有应得。他并没有逃脱人类正义对他的审判。

在“满映”工作的其他日本人

和田理事原是满洲新闻社的理事长，在“满映”是专管生产的理事。该人有学者风度，态度和蔼，当他见到他熟识的演员时，总是先打招呼，问问工作情况。有什么宴会时，他也是经常和演员们在一起吃吃酒。平时我同他接触不多。

濵濑成美理事是“满铁”在“满映”的代理人，负责“满映”的经营管理。他平时无事可做。长得胖胖的，像个大少爷。说一口中国话。他喜欢玩，还经常和演员接近，尤其和我、周凋、浦克等人接近时间比较多，没事就找我到他办公室去，说说笑笑的。他和制作部次长姜学潜很要好。他喜欢吃中国菜，我们经常到回族饭店泰来庆、天津狗不理包子铺、中央饭店去吃饭。

因为经常吃，我们定一个规矩：谁也不请谁，吃完平摊。他常请我们去他家吃日本饭菜，如四喜和鸡素烧。他的老婆也很好客，吃饭时总是跪在桌旁斟酒盛饭。在伪满后期，酒紧张了，我们喝酒大部由他供应，因为他在“满铁”有来酒之道。我们有时在烧锅弄出酒也给他。1944 年日本东宝益田隆歌舞团来东北演出，要找一名比较有点名气的演员去为他们报幕，当时正好我没戏，我就去为东宝歌舞团报幕。在哈尔滨演出时，渡濑正去哈尔滨出差，知道我在那里，就去找我一同去哈尔滨马迭尔餐馆吃饭。由于相处久了，彼此成为朋友之交。

光复后，“满映”一部分日本人，因为没收入，生活比较困难，遣送他们回国尚无日期，渡濑就拿出些钱来，在站前开了一个茶花舞厅和一个永大号副食店。当时日本人不能出面，他就请导演王心斋帮忙出面任舞厅经理，请演员系主任刘秉欧任永大号经理。一些操作服务工作都由日本人担当。渡濑开这两个店直到日本人被遣送回国才停业。渡濑回国时，我们去送他。他在东京是很有钱的，他来东北时，据说仅生活用品就带来很多，但回国时老婆孩子四个人，就一个旅行袋，别无他物。当时他对我们去送他表示非常感激，掉了眼泪，一再表示说：“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对中国人民犯了罪。”我感到他的话是诚恳的，感情也是真实的。

制作部长八木保太郎、制作课长伊东弘，我和这两个人接触比较多，每拍完一部片子他俩总要找我们去谈谈。他们是负责这方面工作的，也是内行。除鼓励外，更多的是谈在创造上的成功和失败，总结经验教训。我们在他俩身上受到很多教益。我记忆最深的是，我刚拍完《燕青和李师师》，片子后期还没合成，我就被日本宪兵司令部捉去了。他们知道后，便向甘粕做了汇报，甘粕当即派人事课长高桥勇、制作部总务课长尚元度

去把我要出来。这件事前面已说过。我从宪兵队回来后，八木和伊东向我问候时，特别强调说，那个地方（指宪兵队）我们都害怕。八木说在日本我也坐过牢，深知牢中之苦。我们搞艺术工作的是他们经常注意的对象，他们对我们总是不放心。由那以后，我对搞艺术的日本人产生了好感。在“满映”的一些日本人导演和摄影师，他们的作风也都是平易近人的，他们同日本军国主义分子不一样。

我这里谈一下两位日本导演：一是水江龙一，另一位是高原富次郎。

水江龙一导演了《龙争虎斗》、《花和尚鲁智深》等多部影片，是一个很出色的导演。但他谦虚得有些过份，见面时总先打招呼，不笑不说话，无论是拍戏或私下办事时，总张サソ（张君）、李サソ（李君）的称呼。后来他担任了演技课课长，这样和演员们接触的就更多了。他不以课长自居，凡事和大家商量。如拍《人马平安》时群众演员安排不了，他就问干部演员怎么办，在拍戏时，也是和演员共同研究如何创造角色，尽量听演员的意见；向演员讲戏时，非常细致耐心。大家称他为老好人。

高原富次郎是个典型的不修边幅的人。他多拍喜剧片，《人马平安》、《一顺百顺》、《乞丐与千金》等，都是他拍的。平时，他走路或者坐在那里，总好像在和谁讲话，要么就表现出喜怒等等的神情。不知者以为他在犯神经病，实际他是随时随地都在琢磨、体会人物。有时你和他走对面，他好像不知对面有人，当你和他打招呼时，他才“啊！啊！”几声，作为回答，然后用手指指头部，意思是他在想东西，并表示歉意。他经常是这样。所以有人有时和他走对面，就不去和他打招呼了。其次，他所注意的，就是他身上的三件东西：眼镜、金笔、照像机。他的

眼镜很考究，他总是买高档的。金笔，可以说是他的一件宝，也不惜用高价买。谁和他借钱可以，借笔不行。他解释说："我经常用它，当别人用了后万一弄坏，我自己使用就不方便了。"他有一架德国的照像机。拍片时他把一些比较关键的场面和人物造型都照下来。有时他也给别人照，照完他就说"不给"，意思是说，照是照了，但不给洗片。大家都知道他这个脾气，有时他要给人照时，对方也说"不给"，意思是，你不给洗片，也不叫你照。彼此哈哈大笑。他对这三件物品特别注重，但在穿戴方面却太不讲究了。一套西装从一上身穿起，直到脏得实在不能再穿了，裤角磨开花了，他就再做一套。一双皮鞋上脚后，从不打油，直到把皮鞋后跟踩平变成拖鞋了，才买一双新的换上。吸烟是一支接一支。他叼烟还和别人不同，把烟放在嘴唇正中，让烟卷直直的向着前方。他的长相不难看，但也不算好看，身材瘦瘦的，长头发，再配上一副眼镜。大家都叫他怪人艺术家。

李香兰这个满洲名字的日本女演员，原名叫山口淑子。她父亲是日本商人，她从小随其父亲到奉天（沈阳）上学，学一口流利中国话。她嗓子好，幼年跟日本音乐家神原学歌，成为一名好歌手。《蜜月快车》的主题歌就是她本人唱的、录的。后经神原和有关日本人的介绍，于1939年到"满映"。她的第一部故事片是《蜜月快车》，第二部是《铁血慧心》，以后又在满日合拍的《白兰之歌》中和日本演员长谷川一夫分别担任男女主角。在1943年去上海拍了《万世流芳》和《春江遗恨》。从那以后，李香兰没回"满映"。接近光复前，她到南洋一带作歌唱演出，一直到日本投降她才回到日本。

摄影师藤井和张天赐导演是老搭档。张天赐导演的片子，多数是由我担任主要角色，所以我们合作次数最多。藤井这个人平时很少言语，但他跟谁都合得来，主要是他为人和气、谦虚。

有时我们交谈时，他经常说，在我们之间，不要说什么满洲人、日本人，我们搞艺术的是不分国界的，艺术无国界，都是为艺术而艺术。他对工作非常认真，有时为了拍一个镜头，跟张天赐争论得很厉害，这种争论都是艺术见解的不同。正因为藤井对工作认真负责，所以他对当时的助手包杰的要求是很严格的。现在王启民、包杰都是长影的摄影大师了，这除了个人的钻研和努力，与藤井的培养也是分不开的。

摄影师池田据说是在美国学完摄影，回国后转来"满映"的。该人好吃酒，裤子后面的口袋上总装一扁瓶酒。就是在工作中，有时也搁两口。他有西洋人的风度，可能是在美国养成的。他对人诚恳。聂晶给他当助手，他俩却处成了朋友。1941年后，池田去北平"华北电影公司"。不久，聂晶也去了，去时听说无住处，就住在池田那里。现在，聂晶是北影的摄影大师。长影的总录音师陈文渊、北影的录音师吕宪昌早年都是在"满映"学的录音。总的来看，在"满映"工作的一些日本人，无论是导演、摄影、录音等一些技术专业人员，他们不保守，没架子，和中国人都处得来，也培养了一些技术人员，可能这就是搞艺术的人的个性吧。

日伪对"满映"人员的迫害

日伪统治时期，军警宪特大肆逮捕反满抗日分子。1942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在"满映"也发生了几起逮捕事件。1943年3月，"满映"制作部次长姜学潜被首都警察厅逮捕。被捕后，大家在议论，他是日本留学生，又有日本老婆，地位也很高，是日本人的亲信，他还能反满抗日吗？又有人议论，这个人在"协和青少年中央统监部"工作时，就很敢说话，当时一些进步青少年都很拥护他，敬重他。他到"满映"后平时寡言少语，不

多说话，但在拍片工作讨论会上，他和日人争论得很激烈。他主张影片要有多种形式、多种内容，要拍出“满洲人”爱看的电影，一味宣传国策，观众就不买你的帐，不给你看，你能宣传什么。制作部长八木保太郎也赞同他的主张。部长、次长意见一致，其他日人、创作人员等也只好顺从。这些是在我们私下谈话时，他透露的。当时，每天上班后、工作前，各课室人员都要“遥拜”皇宫（指日本天皇居住的地方）和帝宫（指伪皇帝溥仪居住的地方）。对这套把戏，演员们并不认真实行，就是实行，也是说说笑笑。有的日本人向姜学潜打小报告，姜就在演员会上进行批评。他说：“你们这些蠢货，在遥拜时，你心中去想蒋介石打回来了，谁知道？非得说闹，净给我找事。”演员们听他这样敢说话，都很佩服。大家分析，姜的被捕，可能有依据，不然不会逮捕他。半年后，他被放出来了，他更是寡言了。当我们问他究竟为什么被捕，他说，在审讯时说他是危险分子，但又没什么凭证，只好释放。

“九·三”胜利后苏军进驻长春，姜学潜亮出了国民党的牌子。

1943年后，“满映”住宅区经常有些陌生人活动。大家都在忐忑不安中过日子。脚本员安犀可能知道自己处境危险，他就跑了。就在他出走的第二天晚上，特务到他家去抓他。光复后，他回来了，才知道他跑到关内，参加了演剧二队。总算躲过了那场大祸。

那时候，“满映”到华北汪伪统治区的可以说是大有人在。原制作部长龟谷（日人）是在1940年“满映”改组时，调任北平汪伪政府新民会武德报社社长的。据说这个人在日本是搞新闻工作的，搞电影他并不内行，可能是由于业务对口和工作需要去的。

不久，导演王则去华北投奔了龟谷。王则是他自己感到在东北时被特务侦察过，去华北比在东北安全些。他在华北龟谷领导的武德报任编辑。他去后，曾回来两次，看望她的女友张敏（即现在北影的凌元）。他俩已订了婚约。王则想接张敏去北平工作，但张敏因有老父老母不便离去。王则第二次回东北是在1944年夏季。当时，华北是汪精卫的伪政权，东北是伪满洲国，来往需要办理所谓出入国证。就在王则回北平前在长逗留期间，伪首都警察厅特高王治华，经常来看王则，还经常聚一些人在张敏家打牌。当时一些人就感到：王治华是来者不善的，名为看望王则和打牌，实为探听情况和监视王则。王则回北平时，王治华等人又同去送站。王则上火车后，在中途就被带下车关进伪首都警察厅，惨死在看守所里。

刘国权是"满映"中国人导演中的姣姣者，他为什么也去了华北电影公司呢？刘国权在"满映"之前，曾在齐齐哈尔因所谓思想犯坐过牢。他总是心有余悸。因为当时华北在抓思想犯方面不像东北那么凶，他考虑还是离开这个危险的地方为好，才去华北电影公司当导演的。新中国成立后，他又重返东北，在长影导演了《青松岭》、《女跳水员》等多部优秀影片，后患病故去。刘国权是一位难得的好导演。

日本宪兵（"满洲人"只配当宪补）、警察、特务横行霸道。我们拍完《夜袭风》后，因该片是写侦破美国间谍的侦探片，所以上映部宣传课决定该片在各地上映前，让片中主要演员和观众见面。该片主要有我、隋尹辅、李显廷、张敏、王影英。在吉林国泰影院首场放映前，宣传课的邵功勋和我们五个人特地赶到吉林，我上台向观众讲了几句话，在讲话中夹进了一句日话（アイサツ）向观众表示问候，讲完又把每个演员在片中扮演的角色一一作了介绍。当我们回到影院休息室后，进来三个

人，问我，你用日本话骂吉林人哪！我说“アイサツ”不是什么坏话，是问候的意思。他不容分说，就打了我两嘴巴。接着又找到宣传课的邵功勋，把他也打了，并把邵领到经理室，叫邵写了始末书。随后吉林国泰电影院的王经理陪同我们回到住处——吉林俱乐部。王经理说，这三个人是日本宪兵队的宪补，一个姓陈、一个姓王、一个姓葛。又说，上海白云剧团来吉林演出时，也被他们打了。他们认为打了一些有名的人是威风，大家都很气愤。隋尹辅说：“难道就没人能管管他们？”这句话提醒了我，我说给日本宪兵队长挂电话告他们，我知道“满映”的牌子是很硬的。我挂了电话，向日本宪兵队长说明了情况，并说，我们在吉林原定演三场，这样就不能再演下去了，明天一早就回新京向厂方报告（这时邵功勋已经去车站买票去了），宪兵队长在电话里说，他了解一下。这时已经是夜10点了，已买好明晨3时的车票，我们就休息了。在过夜1点钟时，宪兵队长和一个日军带着那三个宪补，来到俱乐部找我们。宪兵队长对我们说，他们了解的情况和我们说的一样，特带领他们三人前来道歉。还说，请你们别走，明天继续演，我们一定负责保护你们。我们说车票已买好，明天一定回去。就这样，队长让那三个人向我们道歉后，又对我们客套一番走了，第二天，我们坐早车回到厂时，上映部长野崎，正在门口等我们。他说吉林宪兵队已打来电报，说明了情况。你们好好休息，以后绝对不会再发生类似的事情。这件事，能得到这样结果，主要说明“满映”在当时的地位。而白云剧团和一些私人剧团，遭到类似迫害，那就只好忍受。

1945年8月美国在日本广岛、长崎投下了原子弹，苏联也于8月9日出兵东北。这时，“满映”也处于临战状态，日本在乡军人整装待发，只是还没有发下武器。8月10日制作部次长

妻学潜召集干部演员，他说，现在日本人已决定决一死战，洪熙街（现名红旗街）是新京的一道防线，“满映”地处前沿。他让大家通知所有演员：市内有亲属的要把家属疏散到市内；女演员家在外地的，可先回家去躲避一时；男演员都要做护厂工作。当时是人心惶惶，比较紧张。但待命几天，却无啥动静。8月15日，日本天皇颁发诏书，下了投降令。紧张局面解除了。厂内的中国人心情振奋，振臂欢呼。而日本人则垂头丧气，呈现出失魂落魄之状。

“满映”随着日本的战败，也到了它自己的末日！

（摘自《长春文史资料》第十二辑）

忆伪“满映”养成所二三事

刘大光

1943年10月，伪“满映”养成所在全东北各地国民高等学校应届毕业生中招收学员。招考的方法，是由“满映养成所”派出一名日本人和一名中国人翻译来到学校进行考试。考试的主要科目，是通过日语口头回答及面试。我是在1944年4月正式到达伪新京（长春）“满映养成所”的。

这届学员（是第四期）不同于一、二、三期。前几期学生中有演员、导演、摄影、洗印等科，本届主要是放映技术科。学习期限为二年，第一年主要是放映技术理论、光学、化学、发电机等应用理论的学习和放映机“罗拉”、“罗牙鲁”、“也内鲁满”（德国座机）的机器性能、构造、线路图的绘制和操纵方法。每周还安排日本专家讲授胶片制造、日本50年代电影发展史等

各种有关电影技术和艺术理论。后一年主要是实习，实习期间轮流到洗印、录音、照明和试写室（放映室）做实地见习。学员毕业后分配到上映部。职称是上映技术科技士。当时伪“满映”的组织机构分为两大部，一个是制作部，一个是上映部。制作部属于拍摄制作，经费支出单位；上映部直辖各地直映馆（即电影院）巡回放映队，亦称“特殊工作队”，属于经费收入单位。

对学员的待遇，一般是入所之后，每人发给一套“协和服”、一套“劳动服”和“日本战斗帽”、“腿绑”。伙食由养成所食堂免费供应，每天主食以高粱米饭为主，副食是“米素汤”（即大酱汤）和“大根”（白萝卜做咸菜）。一日三餐，每餐均由当值人员到厨房领取，主食要通过秤称之后，拿回宿舍按份分配均匀，方能就餐。有时一两个星期能吃上一顿大米饭和炒菜之类的伙食，大家叫它“改善生活”。学员中的日本人多吃大米饭。

除此而外，每月每人发给20元生活补贴费。如果生病，要到“满赤”病院（“满赤”病院是当时长春最大的治疗中心）医治，并由患者办理“后付”手续，所花费的医疗开支，均由养成所负担报销。

记得在1944年，养成所中发生一起三期生殴打四期生的流血事件。其起因是，在食堂称饭时，上级生给下级生分饭称量不足，还打了当值领饭同学的耳光。这还不算，趁晚自习完了，将要熄灯就寝之时，上级生强逼下级生站队点名，按排队顺序，每人打两记耳光。其中有的不但挨了耳光，连眼睛都被打得什么也看不清楚了！宿舍的门窗玻璃、桌椅被砸坏了……顿时，一场撕打开始了，其中一名学导演的三期生，腿部受伤流血过多，死在了医院。最后的结果，是按照日本《六法全书》及自动防

卫无罪为理由，对死者只发给一点抚恤津贴，就草草完结了。如果当时死伤的是日本人，那事态就闹大了，不治个“反满抗日”罪才怪呢！

记得1944年的5、6月间，学员们排队进入“满映”大门时，碰上理事长甘粕正彦。谁也不认识他，也就没给他敬礼，这可成了一条“罪状”。他把所有监议、理事级的（即名签下边带红杠的日本人）都找到养成所，训斥了一番，才算了事。

甘粕正彦是何许人也？他是日本军国主义侵华的罪犯，伪“弘报”机关（严密封锁、控制、检查、扼杀文化艺术、出版、新闻的部门）进行奴化宣传、兜售“大东亚共荣圈”黑货的文化特务。在东北光复前夕他受到了历史的惩罚。

（摘自《吉林省艺术集成/文化艺术志资料汇编》第2辑）

记“满映”女明星张静

郭燕平

她叫张静。据说父母给她取这个名字是希望她一生顺利平静。然而在她人生的航程中所寻到的却不尽是平静的港湾。

说来这也是她“命里注定”——

一岁多的时候，她安安静静地躺在一只箩筐中，由她的父亲从山东挑到了内蒙，一路上她是靠什么活过来的，她已毫无记忆了。在归绥（即今呼和浩特市），她父亲一连敲了三家的门，都没人愿意接纳她这个未来的大明星。当又一家的门打开时，父亲还未曾开口便双膝跪在一位看上去很和善的汉子面前：“大

哥，行行好！这孩子快饿死了。求求你收下她吧，她挺好养活的，给口饭就中……”

“不！这、这……”汉子惊慌失措，连连后退。

“大哥，俺求求你了！俺带着她从山东逃荒过来，到现在还没个落脚的地方。俺还得再接着赶路，这孩子不能再跟着俺遭罪，她太小、若是有个好歹的……”

一位和这汉子年龄相仿的女人从里间走出来，从箩筐里抱出了婴儿。是女人特有的气息和温柔使孩子想起了母亲的怀抱？她突然张开小嘴，笑了。这一笑，碎了父亲的心，却醉了善良的蒙古族妇人。她双眸放出光彩，兴奋地在这漂亮的小女孩的面颊上亲了一下，用无可商量的语气对汉子说："这孩子我们留下了！"

于是，小姑娘就成了这个半汉半蒙家庭中的新成员。养父姓张，至于她原本姓什么，不得而知。生父只告诉她的养父母她生于1923年8月9日，乳名小静子，她刚一出生，母亲就去世了。还有，她的生父说，如果她将来知道了自己的身世，请千万别恨父亲，他是万般无奈才这样做的。别的，养父母就一概不知了。

养父张维清是火车上的烧煤工，为人正直善良。养母苏日娜是位蒙古族妇女，与丈夫婚后四年没有生育。虽然他们都很想要一个儿子，可当这个可爱的小女孩来到时，他们还是收养了她，并待如亲生。

张静长到13岁时，养父去世了。养母带着她回了娘家。她那时候已经是个聪颖美丽的大姑娘了，她很懂事，姥姥很快就喜欢上了她，但舅舅和舅母却难容这个外来的孩子。尽管几年后当人们盛赞这颗影坛明星时，他们非常骄傲地说她是他们的亲外甥女，还特意向她要来电影剧照，放大了挂在屋内最醒目

的地方。但当时，他们却待她凶狠极了。养母受不了，又带着她千里迢迢到奉天投奔她养父的二叔。当二爷爷看完侄儿临终嘱托的亲笔信后，他哭了，收留了这苦命的母女俩。一年后，养母接到姥姥病重的信，便留下她独自上路了。母亲答应哭着要同她一起走的女儿一定尽快回来，可她们谁也没有想到，这次分离竟是母女的永别。

养母走后，虽然二爷爷、二奶奶待她很好，可她仍旧日夜思念着蒙古妈妈。这时，她并不知道自己是妈妈收养的孩子。

中学二年级的时候，她16岁，出落得如花似玉，走到哪里都会引得无数男女羡慕的目光。也不知是从哪一天起，人们又发现了她那美妙的歌喉。开始，她为家人和同学们唱歌，后来她被放送局请去通过广播为听众们唱歌。渐渐地，她的名字越来越为更多的人所知晓、所喜爱，直到有一天她才惊异地发现：自己已经是个家喻户晓的红歌星了！

1941年，她正值18妙龄，奉天一家私人剧社特邀她担任新编大型歌舞剧的主演。她从未演过戏，却欣然接受了邀请。她想试试，她觉得排戏一定很有意思，仅此而已。可她万万没有想到，这一试竟改变了她的命运，使她由一名“满洲国”红歌星一跃为当时东亚第一流的电影厂“满映”的第一流女明星。

她在歌舞剧中极为出色的表演，不仅赢得了剧社及观众的称赞，更引起一个人——一个对她今后命运起了决定性作用的人的高度重视。演出一结束，他就访问了张静小姐，几乎近于专制地请她立即同他一道前往新京（长春）。

她被带到明亮的灯光和摄影机前，按照那几位陌生人的要求唱歌、作小品。她对这里感到神秘莫测，却唯独没有恐惧，这也许是由于她已经走过的艺术道路过于顺利的缘故吧？她总是成功，总是赢得鲜花和笑脸。她不信自己会失败。可是当几位

陌生人带着掩饰不住的欣喜之情问她是否愿意留下做演员时，她的心还是忍不住狂跳起来！做电影演员？她对电影艺术爱之入迷，尤其是那些电影明星，她更崇拜得五体投地。她常想：他们都是些什么样的人呢？也和我们一样吗？

她从来也没有想过自己会跨入他们的行列。可她还是走来了，带着微笑，怀着神秘，也带着憧憬。就这么偶然，就这么简单。

张静步入影坛的消息不胫而走，记者闻风而动，立即前来采访。一见面，年轻的记者便对她大加赞赏："呀，过去我对您只是闻其声未见其人，今日一见，方知胜似天仙呀！"记者笑了，她却红了脸，宛如一个初见生人的小姑娘。当记者问她有什么打算时，她想了一下说："对于演电影，我还丝毫没有入门，我希望我能胜任。我没有什么更多的要求，今后干起来看吧。"

语言平淡无奇，没有一点闪光的地方。可她就是这样一个人，没有把握的话她是绝对不说的。

"满映"，这个成立于1937年的电影厂，到这会儿已经有5年的历史了。它的规模和设备不要说是国内电影厂无与伦比，就在整个东亚也属一流。"满映"的全称是"株式会社满洲映画协会"。成立的当年，就招收了第一期"演员养成所"学员，第二年又招收了第二期、第三期，加之后来从东北各地及北平招进的演员，到张静来厂时，演员剧团已有演员130多人，可谓人才济济阵容庞大了。毕业于本厂演员养成所的演员，都是历次考试中成千上万的考生中的佼佼者。他们在养成所经过了整一年的严格而又系统的专业训练。厂里请来国内及日本的文学艺术界名家为他们讲课，这些演员的基础还是比较雄厚的。此外从各地招收的其他演员，也大都早已小有名气，演起电影来是毫不费力的。

在这个环境中，要想站住脚并不难，只要能演戏，一部电影中需要各种各样的人物，有的在整个影片中也说不上几句话，露不了几次面，但同样不可缺少。可是要有所建树，就不那么容易了，尤其是新人。

然而幸运之神似乎对张静小姐有些偏爱，她刚一到厂就上戏，居然一炮而红，当年就主演了两部片子，第二年主演5部……当她主演的那些影片获得了极大的成功和广泛的赞誉时，她无可非议地被捧上了明星的宝座，而且是公认的第一流女明星。有些同事羡慕得有些嫉妒她了。说她尽遇上好导演、好影片。

此话也不能说毫无道理：

“满映”成立初期，编剧、导演、摄影由日本人一统包揽，拍出的影片日本化，不符合中国人的口味，生硬干瘪，很不吸引人。加之多为宣传“国情国策”、“日满协和”、“王道乐土”的政治性影片，影片的艺术性不高，观众不喜欢，毫无竞争力。相反，上海片和香港片却久演不衰。

为了扭转这种局面，1940年，一个神秘的人物——甘粕正彦，来到了“满映”担任理事长。

甘粕一上任，就采取了一些新的行动：起用中国导演、编剧，充实演员力量，组织拍摄一批高质量、高水平的影片，增强“满映”影片的竞争力，提高上座率。

甘粕的这一系列行动，给“满映”带来了很大变化。两年内，影片便“打”出去了，在观众中有了市场。张静正是在“满映”调整后进厂的，在这一阶段最叫得响的几部影片中，她主演了侦探片《碧血艳影》，历史片《燕青与李师师》、《娘娘庙》、《花和尚鲁智深》等。《碧》剧描写的是警察侦破土匪集团的故事。由张奕和她分别扮演男女主角，张奕扮匪首，张静演

一个女土匪。此剧上演后，在上海、华东、华北等地都引起了极大的轰动，观众反映异常强烈。“满洲画报社”还专门邀请了文化界名人、观众代表和本片导演、主要演员等举行座谈会。大家对此片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在满映的出品中，可以算是很优秀的一部。”“这部片子在满映有着它独特的成功。普通的满映片子算做五成的时候，这部片子是七成……”

对女主角张静小姐又是如何评价的呢？“演员中张静小姐的演技很不错，对白很好，反派是相当的有成绩，虽然是初次演反派。”

“上海明星有魅力，观众可以为一个明星而去看电影……目前满映明星没有魅力是一个大缺点，在《碧》剧中的张静小姐已经有了吸引观众的魅力，真是可喜的事。以后如能永远如此下去，张静小姐前途将是颇为乐观的……”

《燕》剧取材于《水浒》，写的是梁山头领们为了接受朝廷招安，在正月十五花灯之夜，潜入东京城去求助李师师的故事。张奕饰燕青，张静饰李师师。出场的其他梁山好汉还有宋江、李逵、武松、鲁智深、吴用等等。东京城的场面很壮观，是花费了巨额在电影厂外搭起来的。等到东京大火那场戏时，这长达百米的街道和一切景物都随之化为灰烬。

此剧是“满映”厂成立以来拍摄得最成功的历史片之一，又取材于众所周知的传统题材，加之影片投入了较强的演员阵容和壮阔的场面，使观众感到耳目一新，因此也受到了空前的欢迎。

随着张静主演的那些影片风靡各地，她本人也成了“满映”最受欢迎的女演员之一。她赋予角色的照人风采和丰满血肉，使她不仅赢得了观众的赞誉和崇拜，也得到了厂内外专家同行们的充分肯定和好评。很快，她便被提升为干部演员。这

是演员的一项荣誉，在整个剧团的130多演员中，干部演员仅有十几名。他们比一般演员的待遇要高：除拿基本工资外，还有演技津贴，金额由100元到500元不等，一般演员每天要自己到厂里去“看牌”，看看今天拍什么戏、拍哪场戏，要是有自己的角色，就去等候。干部演员则不然，他们可以等在家里，有他们的戏时，专门有人来叫，不必自己挂心。

成为干部演员，当主演做明星，可以说是所有演员们的愿望和奋斗目标，然而成功者毕竟是少数。张静在短期内取得了如此令人瞩目的成就，秘密何在？是她出众的美貌？的确，她很美。她在影片中的扮相羞花闭月，楚楚动人，为角色增色不少。在她主演的影片《璎珞公主》中，她扮演的公主是这样出场的：影片一开始，整个画面是一把张开的扇子，然后扇子慢慢闭合，渐渐露出扇后的公主。当扇子全部闭合，画面上出现公主面部特写时，观众席中立即发出一片惊叹声！

生活中，她可没有银幕上那样华丽。那身淡蓝色的布旗袍使她在那些华服美饰千娇百媚的女演员之中显得过于质朴、素淡，然而她们却遮不住她天生的丽质，反倒透出一种优雅飘逸的美。像蓝天上的一朵白云，平常而又诱人。

美貌无疑是她成功的一个条件，但是每个角色都有自己的内心世界，独特的环境和经历，自己的思维方式……这些东西会赋予不同的角色以不同的个性。以一个固定的形象去应付众多的角色，显然远远不够。

她真正的优势在于艰难生活的磨练赋予她百折不挠的坚强性格、深沉的内心世界、敏锐的观察和思考能力以及对复杂人生的切身体验。

导演愿意起用她，把一些重要的角色交给她。是因为她能把各种人物演“活”，赋予她们鲜明的个性和丰富的血肉。她每

接受一个角色时，首先去捕捉人物的内心世界。寻找她们在说话做事时的心态和表现方法。这样，她塑造的人物就有“根”，让人觉得生动自然，个性鲜明，人物在整个戏中的发展变化也很有层次，合情合理。她戏路子很宽。演古典美人，既有端庄的公主，又能塑造风流名妓；演现代作品，从贤淑雅静的大家闺秀到打家劫舍的女匪，样样演得活灵活现，总能给人留下很深的印象。当时最走红的男明星张奕，后来曾在一篇文章中这样 评价她：“张静是‘满映’出色的女演员，她在‘满映’拍了不少影片。张静无论是演时装片还是古装片，对角色的创造、表演都有独到之处，当时博得了厂内外的好评……”

在不长的时间里取得了这样的成绩，她兴奋而又激动，同时，对着那些新的片约，她踌躇满志。就在这时，她突然得到了妈妈病重的消息。她急急忙忙去请假，可却没能如愿，原因是她正在拍摄的影片不能停下来，新的影片也很快就要上马。她给妈妈寄去一封信，说影片一拍完就立即回去探望。

她心急火燎地盼望着影片快点拍完，日子快点过去。等影片的拍摄接近尾声时，她收到了寄自绥远的一封信和一个小包裹。她迫不急待地撕开了信，刚看了几眼就被泪水遮住了视线……信的开头这样写道：

“小静子：

你妈妈在病重的时候托我帮她写了这封信，要我在她去世后寄给你。你妈妈已经在昨天去世了……”

再下面是妈妈的话，向女儿倾诉了自己的思念之情和即将与她永别时的无限挂念，还把她真实的身世告诉了她。包裹中那件小红兜兜，是她亲生母亲留给她的唯一遗物。那枚戒指，是妈妈用女儿工作后寄给她的钱买下的，当她知道自己已经不久人世时，就买了戒指寄给女儿，要她结婚时戴在手上，就算是

妈妈的祝福。

张静差一点儿病倒，一连几天吃不下睡不着，日夜想念着妈妈。虽然她已经知道她亲爱的蒙古族妈妈不是自己的生身母亲，却丝毫没有削减对妈妈的怀念之情，相反更加强烈了。她恨自己没能在妈妈最需要的时刻陪伴身旁。想到妈妈对自己的热切盼望，想到妈妈就这样孤零零地去了，她恨电影厂只顾拍片，只顾电影厂的利益，而丝毫不考虑她作为一个人的最起码的情感。她甚至都不想再拍片了，好像妈妈的故去完全是由于她拍片的过错似的。

在这痛苦的日子里，有一个人给了她很大的安慰。他就是张静当做老大哥看待的半个同乡——郭奋扬。

他是本厂二期演员养成所毕业的演员，也来自奉天。在张静初来电影厂时，他曾作为同乡首先来看望过她，并说以后有什么困难就找他去。后来她红起来了，成了忙人，也成了一些英俊小生们追逐的对象，他反倒不来了。张静还不知道他就是那位自己曾经崇拜过的多才多艺的著名歌手谷音。他也常去放送局唱歌，灌过唱片，还能拉一手过硬的小提琴。后来他销声匿迹了，张静怎么也没想到他就是这位老大哥。相反，他对张静却很了解，他和他的朋友们不但喜欢她的歌，也钦佩她的为人——她成为红歌星后仍然保持清白的名声，处事稳重，从不奉迎上层人物，也不去那些赚钱多但却失人格的地方演唱。当她来到电影厂时，郭奋扬曾经莫名其妙地感到由衷地高兴，当一些男同事向她献殷勤时，他也曾不知何故地觉得不是滋味。他很少同她接触，一年来他们说过几次话都是有数的，内心里却在一直关注着她。当他知道了她的痛苦时，便又来到了她的身旁，以自己真挚的友情和关怀来安慰和温暖她的心。

她振作起来了，又抖擞精神投入紧张的工作。她太爱电影

事业了，她不能离开它！

同时，对于郭奋扬，她也产生了一种异样的感情。每当想到他，张静便会感到温暖。他是那么理解自己，关心自己。和他在一起，她毫无戒心，虽然对他还不太了解，却不知为什么总要把心里的话一骨脑儿地倒出来，一点没想什么后果不后果的。而他又那么体贴，总能使她得到安慰和帮助。

可是有一天，他却突然凶得像一头狮子，她简直被他吓坏了。

那天，她和他正好在一个剧组拍戏。拍完一场戏后，导演让大家休息一下，第二场戏还没开拍，不知为了什么事，郭奋扬突然和日本人争吵起来，双方吵得很凶，中方在场的同事们都愣住了。从前，可没有一个中方人员敢和日人争执的。电影厂是日本人的，"满洲国"是日本人的，就连中国的大部分领土也成了日本人的，谁敢不依顺他们呢？抗日会被杀头，这谁都知道。可郭奋扬今天竟当众让日本人下不来台，他的话说得很尖刻，中国翻译擦着汗把他的话字斟句酌、小心翼翼地翻给日本人。要是翻出原话，不用说，准得坏事的。末了，郭奋扬十分激动地质问对方：为什么明明是侵略者，却要装做救世主的模样？为什么明明是摧残了人家的民族文化，却又要拿出热心扶持的姿态？

张静吓坏了：这样说还了得！她看了看同事们，希望能有人出来劝劝他。可大家都在暗暗地替他捏着一把汗，谁也没吭气儿，她又看看翻译，他正搓着手："唉，老郭！你让我怎么给你翻译！"

"随便！"他扔下一句话，走了。他明知道下面还有他的戏！

张静不明白他为什么要这样？那个日本人挺好的，待人很和气，他不该当众向人家耍态度！再说，他这样做不是要惹祸

吗？幸亏翻译头脑机灵，若不然……她不敢再想下去了，决定等有空儿好好劝劝他。

晚饭后她到宿舍找他，他不在。她只好寄希望于明天。可第二天早晨起来的时候，她却听说他失踪了！张静急急忙忙到他宿舍去问，同室的人告诉她：他昨夜回来过，不知道什么时候又走了，凌晨两点左右的时候，发现他床上没人，只有一个纸团，打开一看，上面划满了大大小小的“？”，大伙怕他出事，已经连夜去找了，可到现在还没回来。“这件事可千万别让日本人知道！”同事嘱咐说。

她没听完就跑了出来，心急如焚，后悔昨天没有找他谈谈。

一上午的戏，她不知道是怎么拍完的，戏一完她就直奔郭奋扬的宿舍。他还是不在，同室人刘朝说他们已经找到了他。“你猜他在哪儿？”刘朝显得哭笑不得的样子，“我还怕他寻了短见呢，把这一带的树林子都跑遍了，又跑到南湖去找他。我们到那儿的时候，真看见远处湖面上漂着个黑影，天一放亮，我们找到一条小船划过去……你猜怎么着？还真是他……”

“啊？！是……是他？”张静惊叫了一声，手顿时冰凉。

“可不是！”刘朝接下去说，“不过他可没死。人家老先生正躺在船上头枕着两手望着天儿哩！眼睛瞪得溜圆，衣服都让露水打湿了？这是演的哪出戏呀？就这么漂了半夜……”

张静深深地出了一口气，她没等把下面的话听完就起身告辞：“谢谢你！他现在在哪儿？”

“在……我怎么知道？”

“再见！”

她转身走了。他莫名其妙地眨了眨眼睛。

这件事竟成了张静和郭奋扬之间关系的转折点——

她去劝说他，却反倒在与他的交谈和接触中看到了一个新

的世界。与他交往越久，她就越是被他吸引，越是惊奇这位别人看作怪人的人原来竟有着那么博大的胸襟和深沉的感情，还有那么富于冒险色彩的经历。

他是一个小商业主的儿子。“九·一八”以前，他和哥哥都在大学读书。哥哥在北平学水利，他在由张学良资助兴办的奉天冯庸大学读中文。三年级的时候，日本人的炮火响遍了奉天城，他和他的同学们再也无法平静地读书了。他勇敢地加入了学生抗日义勇军，走上战场去和凶恶的敌人拼杀。他的腿负了伤，被送到北平去医治，北平人民像对待英雄一样地热情接待了这些在国家正规军毫不抵抗的情况下敢于自己起来战斗的爱国学生。他的腿本来已经没多少希望了，但是医院为他投入了最好的药品、最好的医生，才使他的腿得以保留。

伤好后他开始在北大旁听，后来参加了东北民众抗日请愿团，由北平南下上海、南京去向政府要求出兵抗日。北平车站奉命阻止他们上车，郭奋扬和同伴们便奋不顾身扑上铁轨，用自己的血肉之躯挡住已拉响了汽笛的南去列车……

他和同伴们终于胜利了，在南京，他们见到了蒋介石。周围是密布的枪口和全副武装的军人。代表们毫不畏惧，慷慨陈词。蒋介石竟欣然允诺：“三年内不收复失地，请杀我蒋某之头，以谢天下。”当时，郭奋扬兴奋极了！总算没有白来，总算为促进抗日做了一点工作！

他太天真了。蒋介石并没有遵守诺言，反而加紧了对抗日志士的迫害。郭奋扬失望了，他离开北平去了西北宁夏，在银川宁夏省立高中教书。此处是山高皇帝远，人口又薄，酬劳又高，倒也自在。可没过多久他就接到了父亲病危的消息，匆匆赶回奉天。父亲好像单为等他似的，他刚进了家门，父亲就咽了气。他走不出去了，只好留在奉天，朋友介绍他去“放送

局”（广播电台）唱歌，挣几个钱糊口，也为解闷。几个朋友不管是谁有了钱都要把大家聚在一起喝一顿酒，彼此倾吐一下苦闷的心情。后来他居然唱红了，成了“满洲国”的名歌手。但他根本就无心留在这里当亡国奴，只想慢慢寻找机会办张“出国证”离开这里。

那时候没有职业的人是要被抓壮丁的，他有一次差点儿被抓走，幸亏朋友们帮忙才脱险，但他却不能再这样呆下去了，便违心地考入了日本人办的电影厂，当了演员。但他却从未忘记过“九·一八”国耻和自己的抗日志愿，他一刻都不愿与日本人共事。

这些心事他从未向任何人吐露过，大家只是感觉到他有一种对立情绪，并不理解他。他初来时厂里对他很重视。他自身条件不错，1.81米的个头儿，浓眉下一双非常有神的眼睛，嘴唇棱角分明，浑厚的男中音嗓子，这些都是很好的资本。再加上他是剧团里少有的大学生，他本来是挺有前途的。但他却很特别，跟日本人说话办事总没个笑模样，日本专家讲课他也不去听；人家听他声音不错，想让他为一部影片插曲配唱，他却一口拒绝，说自己从来不唱歌（他在厂里的确没唱过，更没人知道他是名歌手谷音）；演不演片子他根本就无所谓，好像自己不是这个厂里的人。大家谁也不明白他这是为什么，有人说他是个怪人。

张静算是唯一能够知晓他的秘密并理解他的人，但也不是完全理解：她也知道日本人坏，可那些坏事都是军人干的，厂里的日本人跟那些侵略军不一样，他们帮助我们办电影厂，待我们中国人也非常好；两国人发生摩擦，上头都是先处分日本人，这还不够吗？干嘛要这样对抗他们呢？

但张静可没急着和他分辩，她决定慢慢来，老谈论这些话

题可是够危险的！她和他谈艺术，希望他能在这上面多用些心思。他果然热爱艺术，知识渊博，尤其是中国的历史和古典文学，他都有很深的造诣。他给她指出了她扮演的李师师的不足，帮她全面地分析了这个人物。张静忽然觉得眼前开阔了许多。她看到了一个以前从未看过的世界。她对他几乎到了崇拜的地步了，这次是对他本人，而不是从前的那个唱片中的歌手。

他也深深地为她的聪明美丽和善良纯真所吸引。不久他们就发现，他们彼此间竟是那么深深依恋了。于是有一天，他们热烈地拥抱在了一起，再也不愿分开了。

张静和郭奋扬相爱的消息公开以后，同事们大为惊异。

此时张静已经是公认的头号女明星了，她在两年的时间里已经主演了七八部电影，引起了厂内外人们的高度关注。她的追求者很多，既有风流倜傥的英俊小生，也不乏军政界的要人，北平的一位大公司老板愿意为她丢掉公司到新京落户，或接她去北平："我将为您修筑最豪华的公馆，让您享受最高级的待遇……"

张静对这些人都不动心，同事们还以为她要找个什么样的人呢，怎么却找了个既没钱又没地位的人？也有人夸她有眼力，说郭奋扬有头脑、有知识、决非等闲之人……

管它别人怎么说呢！她喜欢他相信他，这就够了。

于是，她和他结合了。

张静仍然在青云直上，三年里她共主演了《碧血艳影》、《燕青与李师师》、《璎珞公主》、《雨暴花残》、《娘娘庙》、《歌女恨》、《恨海难填》、《篱畔花香》、《花和尚鲁智深》等十几部影片，又参加了《劫后鸳鸯》等的拍摄。影迷们为她的表演如醉如痴。那时候厂里每上映一部新片，都要组织该片的主演到"满洲国"各城市影院去和观众见面。届时，主演们住高间、吃

西餐、每天车接车送。但这些对张静来说并不是主要的，最令她激动的还是观众们欢迎她的场面：她的剧照总是很快就被争抢一空，她不得不为那些没得到照片的观众签名留念，有时候累得手脖子又酸又疼。电影放完后，观众还要求她表演节目，有一回她一连唱了四首歌还下不了场，幸亏厂里同来的宣传课长出来解围，不然她还真没办法了呢。

厂里对那些有名气的明星们是很客气的，待遇也好。张静每月的基本工资是300元，演技津贴也是300元，后来又拿到最高薪500元。而且每年年终发“赏与金”仪式上也都少不了她，金额是500到1 000元，她做为第一号女明星，当然得的也是最高一级！她该满足了吧？当时伪新京市政府的职员月工资才六七十元哩！

可是有一天，她突然悄悄地向几个要好的朋友告别了。她对张奕说：“我要走了，我们再见吧！”

“走？往哪儿走？”

“离开电影厂。我要跟奋扬到重庆去。”她平静地说。

张奕急忙说：“你现在最好别走。我还没来得及告诉你，我已经得到了内部消息，咱们这儿也要像上海那样，实行明星制了。已经定了，女演员中你挂头牌，男演员我挂头牌！你这第一把交椅的位子，多少人争还争不来呢，你怎么倒自己往外推呀？”

“我很留恋这里，也很珍视已经得到的地位，这的确是令人向往和来之不易的。可我已经打定主意了，非走不可。我们再见吧！”张静说着伸出一只手来：“你多保重，我们后会有期。”
“能告诉我为什么吗？”张奕很替她惋惜，仍想再劝说一下。

“嗯……以后你会明白的。再见吧！”张静向他挥了挥手，走了。

她还不能明确地告诉他，自己是去抗日，是走向抗日的战场。“他准会以为我疯了。”她想。是的，连她自己也不知道是怎样下了这样的决心的。抛弃已经到手的优裕生活和令人瞩目的明星宝座，把大好年华和全部的才智都投入到那血与火的战斗中，也许还会失去生命……这对她来说可不是轻而易举就能做到的。与奋扬相处以来，张静已经懂得了许多抗日的道理，懂得了“满洲国”并不像日本人宣传的那样是什么“王道乐土”，而是日本侵略者对中国的分裂宰割。她也很为全国那些正在英勇抗战的同胞感到自豪。但她还从没把这些和自己切实联系起来。直到有一天，奋扬的一席话使得她大为震惊：原来“满映”竟是日本的一个文化侵略机构，他们办厂的目的就是为他们的侵略政策作宣传，我们这些人原来就是他们麻醉我们同胞的工具！尽管那些日本专家们看起来对我们很和善，谈的也多是艺术，但他们也是在执行他们国家政府的命令。特别是当她知道了那个被她和厂里大多数人看做有功于全厂及全厂职工的大好人——甘粕正彦，原来竟是参与发动“九·一八”事变和建立“满洲国”罪恶活动的要员，是双手沾满我们同胞鲜血的刽子手！她像被雷击了似的，惊得半天说不出话来。

“现在全国有多少同胞都在为赶走侵略者而浴血奋战，我们难道就甘愿为侵略者效力？我们就不能为了祖国而丢掉自己的利益吗？再说，祖国没有前途，我们个人永远也不会有真正的幸福。还有什么比做亡国奴更让人悲哀和屈辱的呢？”郭奋扬又进一步鼓励说。

她终于下了决心。

郭奋扬的一个朋友帮助办好了“入关证”。夫妻二人默默地告别了这里的一切，踏上了新的征途。

（摘自《长春文史资料》第二十七辑）

日伪时期的沈阳电影市场

钟晓光

随着“九·一八”事变日本势力的侵入，沈阳的电影市场很快被其控制，成为文化侵略的组成部分。日本侵略者以所谓“建国精神”抵制中国抗日、进步影片进入东北，同时大量放映日本反动影片，宣传殖民侵略政策。伪满建立后，组织了所谓“满洲国电影国策研究会”，聚结了关东军、满铁、伪政府、协和会等各方面的文化宣传力量，着手控制东北的电影事业。1934年6月，奉天市政公报刊登了伪满政府制定的“电影片取缔规则”，其中凡“冒渎帝室尊严者”、“违反王道主义者”、“违反民族协和（指日满协和）之宗旨者”、“有失国家及官宪之威信者”，特别是关于反战思想和有共产主义思想的影片，均在被禁止之列。在沈阳由当时的伪警察厅的保安科负责监查，违者轻则罚款、重则监禁。日本宪兵队成为当时主要镇压“有不轨行为”影片之机关。

早在“九·一八”前，日本国内的制片厂及“满铁”就开始在我国东北摄制宣扬日本军国主义的影片。日本侵占东北后，关东军及伪满弘报处组织拍摄了一批战地纪实片、吹捧日本侵华罪恶行径的故事片以及宣扬大和民族风土人情的风光片，如《满洲事变日支交战》、《满洲国承认日の东京》、《满洲国御大典》、《欢喜的奉天》等。这些影片先后在沈阳各个电影院上映。除此之外，经审查被“允许”上映了一些上海及国外的影片，这些影片大部分是荒诞淫秽、消极，甚至是反动的。

日本侵占沈阳后，一批日本商人开始在太原街一带兴建新式电影院。1933年初，在太原街中华茶园旧址，由吉富万一出资，滨口嘉太开设新富座（今解放电影院）。1934年由川上福市在国民市场（今北兴街）建国民电影院。1936年由水野太已亮、山本熊太郎在太原街建成银映剧场，上映“News”（新闻）影片。1937年千田尤行在太原街南边建办南座（今红星剧场）。

此外，由右田广爱于1915年7月开设的奉天馆，由毛利武男于1920年开设的演艺馆，也在伪满初先后经过维修改造（更换座席、填置有声放映机，改善观映条件）继续下来。这样沈阳电影市场的中心在伪满初年逐渐转移到太原街一带，与此同时，一些中国电影放映商也先后在中街周围兴建了一批各式电影院。1937年9月由吴泰勋、冯兴久在中街开设的光陆电影院，成为当时沈阳由中国人建办的最大的电影院。同年，由董世德在太清宫附近开设亚洲电影院。11月李云阁在北市开设云阁电影院。1937年冯金亭在大西关建金城电影院。另外，早在1935年2月由法国人鲍克苏在大西边门路北建天光电影院，这是沈阳唯一的由教会建办的电影院。这些电影院在当时无论从技术设备和资金上都远不如日本人开设的电影院，所上映的影片，也都无非是为伪满反动统治服务，成为日本侵略者控制沈阳电影市场的附属品。

伪满洲国建立后不久开始对电影进行垄断。1937年8月21日，建立了由满铁和伪政府共同投资的“满洲电影股份公司”（简称“满映”）。同时颁布“映画法”，垄断东北的电影摄制、发行及进出口影片管理。1942年伪满政府又决定把各地电影院的建立和管理工作交给满映，如当时“满映”有“奉天地区事务所”，专门负责对沈阳电影的检查和发行管理。

为了进一步满足伪满反动统治的需要，从1938年沈阳各电

影院开始上映满映摄制的三类影片，即“启民电影”、“时事电影”、“娱民电影”。所谓“启民电影”也称“文化电影”，是作为伪国家宣传的一种手段，主要是从事纪录影片的摄制，向人民灌输军国主义思想及制造“跃进满洲”的假相。这类影片如《北方的部队》、《胜利的雪》等都是炫耀关东军武力的。此外，还有《我是满洲国民》、《开拓团之春》等，鼓吹“日满一体和向中国移民”。至伪满末期，沈阳各电影院已上映这类“启民”影片40多部。所谓“时事电影”，也就是新闻片。其时有“满映通讯”（日文）和“满映时报”（汉文）以一周或十天间隔，快速报道日伪现状，配合形势进行形象宣传。各电影院一般在放映故事片前映出一二本。所谓“娱乐电影”，就是故事片，大体可分为两类：一种是利用黄色猥亵的内容毒害中国人民，如《蜜月快车》、《知心曲》、《龙争虎斗》、《王麻子膏药》、《富贵春梦》、《镜花水月》、《血浅芙蓉》、《燕青与李师师》、《白马剑客》、《百花亭》、《情海航程》之类；另一种是赤裸裸地充斥日本军国主义政治内容的影片，如《壮志烛天》，为日本帝国主义统治我国东北的侵略涂脂抹粉；《东游记》丑化中国人，宣扬腐朽的日本资本主义文明；《黎明曙光》、《白兰之歌》则竭力美化日本侵华的军事头目，颂扬他们是为“满洲新国家”立下功绩的人物。在伪满电影界中还出现了一些电影“名星”，如李香兰、季燕芬、郑晓君等。

1937年奉天伪政府对各个电影院进行全面检查重新登记，发给营业许可执照。此时在太原街先后由日本人兴建了两座规模较大的电影院。1938年12月由滨口嘉太兴建开办的大陆剧场，号称东亚第一大剧场，四层建筑，建筑面积为3 839平方米，座席2 400个，据说是仿照日本东京最大的银座建造的。1941年10月由左伯常太郎在原平安座的基础上重新营建了五层建筑

的新平安座大楼（其中一部分是电影院），据说建筑之初为了不影响放映电影，没有拆掉老平安座，而是围绕影院周围盖起来，一直将要盖成才拆掉，从停演到新平安座开始上映仅用了两个月。这两座电影院据说是当时亚洲最大电影院。“满映”还在沈阳先后建立了一些直营电影院。1938 年山本熊太郎建兴亚电影院。1939 年由田中德二郎建办协和电影院。1941 年由小松直文建办大东电影院。1943 年 2 月由松原定雄开设新民电影院。1937 年由驹田右太郎在苏家屯开设建国馆。另外，1941 年由水口隆司等人开设富士剧场（私人）。

这一时期由中国人在沈阳兴建的电影院有：1939 年 12 月由韩庆发在西北市场购买保安电影院。不久朱安东在中街建天乐电影院。由于伪满时期，所建的一些电影院困难重重，因此中国人此后很少有人再建。

伪满期间，日本侵略者不仅垄断影片的制作、发行、放映权以及电影院的建筑权，而且还强收强买中国人开办的电影院。如伪满初年强收凌阁、沈阳等电影院；1938 年 10 月伪东省实业株式会社收买了兴盛公司的东安电影院房产权，将李相三逐出，转租给日本人山本熊太郎，于 1941 年更名开设国际剧场（辽艺）；1939 年 4 月巴吉祥与日本人川上福市定约租国民电影院，租期为两年，由于经营情况好，日本人就利用其势力将巴吉祥抓进宪兵队，不到一年就将电影院强行收回；1944 年 9 月伪奉天司法普翼协会强行收买光陆、光明电影院做为自己经营的电影院。另外，一些日本电影放映商利用日本势力强行入股，吞并影院，这在伪满末期也是屡见不鲜的，如山本熊太郎当时在沈阳就有国际剧场（辽艺）、兴亚（铁西电影院）、银映馆《新闻》等三家电影院。

1944 年 3 月伪满建国十周年时，各电影院的名称一律改为

国民会馆，以满映为代表的伪满反动政府完全垄断了沈阳的电影事业，沈阳的电影经历了最黑暗、最反动的时期。

（摘自沈阳文化局《文化资料选》1985年第1期）

“新京”音乐院的创建

（日）田边尚雄　韩凤觉　译

康德4年即昭和12年（1937年）夏，现任新京特别市副市长关屋悌藏到任，他和后来的“满映”理事长，当时的协和会中央本部总务部长甘粕正彦及后来的国立博物馆副馆长藤山一郎等协商，于10月份创立了新京音乐协会。聘任当时任东京音乐学校教授的大冢淳为总指导，以创建满洲音乐文化和提倡健康的音乐欣赏趣味及提高国民的音乐素养为目的，一方面，不断地招聘乐手，充实阵容；一方面购置乐器，修建音乐剧场，积极筹备两年，于昭和14年（1939年）在协会的基础上改建为新京音乐院。建院后继续招聘著名的音乐家和乐手，发展至今，新京音乐院从机构设置到技艺阵容，都处于满洲音乐文化的领衔地位。

新京音乐院是以东京音乐学校为蓝本创建的，专业设置以西洋音乐为主，同时也设有以满洲古典音乐为教学内容的满洲乐部（相当于东京音乐学校的邦乐科）。

担任西洋音乐教学的教授有以下各位：

院　长　大冢淳　　氏（前东京音乐学校教授）
副指挥　坂西辉信　氏（前日本海军军乐队队长）
乐　长　吉田敏夫　氏（前“新响”演奏员）

小提琴　安 柄 玿　　氏（小提琴家，留德）

中提琴　黑田清孝　　氏（演奏家）

大　管　安藤义彦　　氏（海军军乐队演奏员）

小　号　小贯誉四郎　氏（演奏家、留美）

小　号　初 濑 纪　　氏（演奏家，“新响”小号首席）

钢　琴　和泉初音　　女士

这一天的日程安排是首先由我讲演，之后由新京音乐院的满洲先生们（都是著名的民族器乐演奏家）演奏乐曲，接着还要演出皮影戏。因为听众到的不齐，临时决定先演出合奏。其曲目为：桃花序、太湖船、梅花三弄、雁过南楼、扫落花、万年欢。

都是明清时代的曲目，使用的乐器有胡琴、提琴、月琴、大三弦、笛子、笙（奏最后两首曲子时使用，有一个长长的嘴子）、清笛、明笛等。

我的演讲大约在7时40分左右开始，演讲题目是“以满洲为中心的东亚音乐”。演讲之前，文化科长深井氏致欢迎词并把我介绍给听众。我在讲述过程中，还请大家听了一些唱片，为此，胜利公司的伊奈氏还为我准备了最高档的电唱机。听众几乎是满员，秩序井然，似乎很受感动。散场后一位听众热情地对我说：“在孔庙祭典之今日，又听到先生您这一番有益的高论，甚感喜悦。东洋音乐学会如有印发的研究资料，我很想得到。”

9月12日，午前10点，斋藤氏用车接我，一同去教育部拜访事务官和泉德一氏。和泉氏的夫人，如前所述，是新京音乐院的钢琴教授，也是新京音乐院的创建者之一。与和泉氏交谈的话题很广泛，共进午餐后又在和泉氏的陪同下访问了新京音乐院。与大家院长促膝深谈，就新京音乐院的机构以及未来的发展规划等交换了看法，下午1时辞别大家院长。接着和斋藤氏

一起去广播电台，由接待我们的铃木正氏做向导，走进地下室的日本和式房间，在那里听了许多录音盘，其中特别引起我兴趣的是如下几张：①由贝加尔湖一带移居在山丘地区的哥萨克演唱的民歌合唱（其中有著名的梅里玛克的诗）；②承德喇嘛寺庙的诵经音乐；③承德清音会会员演奏的乐曲；④承德文庙的雅乐；⑤蒙古民歌和马头琴曲；⑥坎吉乐庙的马市之歌；⑦蒙古摔跤的声援（拉拉队）歌。

在听录音盘的过程，“胜利”社的伊奈氏和丸山氏也赶来，至2时半，和他们二位一起辞别广播电台乘车去“胜利”社（满蓄本社），拜会了会社专务星野秀敏，并在录音室聆听了最近灌制的新唱片，其中引我注意的是：①皮影戏的音乐；②京韵大鼓与铁片大鼓（前者只用三弦伴奏，唱词考究，很有韵味，后者档次显然低下）；③落子；④茉莉花与秧歌（在新京音乐院录音）。

我曾请求他们把皮影戏的音乐复录一份给我邮寄到日本的家中，可是其后战局紧张，他们未能寄出。

（摘自《长春文史资料》第二十七辑）

伪满时期沈阳的音乐活动

傅　村

王庶同志是沈阳市话剧团离休的话剧演员。二十多年前是市话剧团的主要演员之一，曾经在著名话剧《兵临城下》中饰演师长赵崇武，当时在沈阳很有些影响。但一般人却不知，在40年代初，沈阳解放前，他却是个音乐爱好者，是沈阳小有名

气的歌手。

初冬时节，王庶同志格外热情地接待了我。滔滔不断地谈起40年代初当时沈阳的音乐活动情况。

伪满时期，日本人控制电台，那时叫“奉天放送局”，当时的文化艺术都是为日本军国主义侵略和奴役中国人民服务的。在社会上，收音机里常播放的都是《满洲姑娘》、《爱马进行曲》以及《卖糖歌》、《娘娘庙会》等流行歌曲。至于当时的文艺团体，长春有个大同剧团，沈阳有个协和剧团，都是日本人官办的。在音乐方面，奉天放送局有个职业乐队，乐手都是日本人。在声乐方面放送局有两个合唱团，第一个是日本人组织和参加的。第二个合唱团则是中国人参加的，歌手都是业余的，主持人是放送局内有个叫佟声的人，这个人“九·三”胜利后，参加了革命跟八路军走了。合唱团的指挥是郝文秀，他是当时一个中学的音乐教员，伪满吉林师范大学音乐系毕业的（郝文秀老师在沈阳解放后参加了东北鲁艺音乐系工作，“文革”时期故去了）。合唱团的成员则大部分是沈阳各中学的学生，也有小职员、自由职业者。记得现在北影的电影演员于绍康就是其中的一个，我那时也是。我们那时在郝文秀的倡导下是学的意大利学院派的东西。唱的歌记得有《泗水歌》、《无言独上西楼》、《易水歌》以及意大利的《海滨》、《我的太阳》、《桑塔露琪亚》等。那时大约每周到电台排练两次，一月对外广播一至二次，每广播一次每人发给一元钱，名曰车马费。

1943年夏，在长春（当时叫新京）由“满洲放送局”举办个人全满歌手竞赛会，在现在长影（当时叫“满映”）音乐堂举行。记得比赛结果，男歌手是长春的李瀛得第一，他唱的是《伏尔加船夫曲》；哈尔滨的鲁特得第二，他唱的《夜半歌声》；我代表沈阳（奉天）得第三，当时我叫王影，我唱的是《桑塔

露琪亚》和《易水歌》。在去长春之前，先在沈阳举行过一次选技赛，我是男声第一名，女声是一个姓肇的第一，她也去长春比赛了，在长春女声的前三名是谁，记不清了。当时除了沈阳、长春、哈尔滨而外，大连、锦州都有人参加。那个男声得第一的李瀛，他是“满映”的，原籍是天津人，他家住沈阳北市场.我和他是朋友，记得他曾由“满映”带回个《夜半歌声》话剧本，我们在沈阳还排演了，他饰宋丹萍，我饰宋小鸥。这个人后来到承德一带演出，得了传染病“虎列拉”，刚刚二十几岁就死了，挺可惜。得第二名的鲁特，就是前几年在我们辽宁省音协做秘书长的鲁特同志。

当时的沈阳，除了协和剧团外在伪满康德六七年时有个人办的银光剧团，是由一个叫李涛的人办的（此人现在还在，前年我在市第三医院还看见过他，在一个基建部门工作）。他是组织者，后台出钱的是一个叫马福臣的，这个人在十间房开一个电气社，据说他有背景，可能是日本人出钱，他出面。这个剧团在“八·一五”后国民党占据时期也很活跃。当时有几个人为这个团写剧本，一个叫安犀，一个叫杨毅，(都是业余的)，还有个叫杨建平的，这人解放后“镇反”时被镇压了。当时在沈阳有几个年轻的音乐爱好者，经常组织临时性的乐队，我知道的有拉小提琴的高英（解放后参加了森林文工团）、牛昆（解放后参加了上海乐团)，这两人当时都是小学教员。还有周南（解放后曾在北京王府井大街开个乐器店)，有拉手风琴的王典（解放后参加了新影乐团)，吹小号的赵敬魁（也曾参加新影乐团)，拉小提琴的白文治（前几年还在前进歌舞团，现在大概退休了)。这些人大都是小学教员、银行职员，王典是修理无线电的，他们经常在一起演奏些弦乐四重奏等西洋乐曲，有时也搞轻音乐，也给歌手们伴奏。那时银光剧团演出时，常常在演话剧之

前由歌手唱几首歌，或由乐队演奏几段乐曲，演员乐队都是业余的，不挣钱，只是吃吃喝喝玩玩。当时沈阳有个唱流行歌的叫季友梅，他是“满映”的演员，善于唱流行歌，是严华派的，他也参加过银光剧团的活动。这个银光剧团在国民党时期也很活跃。那时还有个叫斑马的人，在国民党时期曾组织些学生演些《笑笑笑》之类的滑稽剧。大概在1942年或1943年时，我曾跟银光剧团到昌图、法库县演出过，我那时唱的歌有《桑塔露琪亚》、《海滨》、《我的太阳》、《归来吧苏莲多》以及《夜半歌声》、《热血》等蔡绍序唱的歌。当时沈阳也有一些人是唱流行歌曲的，除了季友梅，还有他妹妹季燕芳，还有个叫佟白君的。女的有个黄玲在广播合唱团常唱独唱，佟声挺器重她。这人解放后参加了长影，现在大概是北影的演员。女的还有个叫杨絮的也挺有名。

除此之外，当时沈阳也有国乐队，演奏大正琴、月琴等，也在电台广播过，播放的曲子不外是《步步高》、《梅花三弄》等等。另外，当时西关回回营有个铜管乐队，可惜我没和他们接触过，只是听说“九·三”胜利后，基督教青年会也组织过一些知识分子搞过音乐活动，挺活跃。

（摘自辽宁省《文化志资料汇编》第1辑）

回忆我在东北的音乐生活

王　湘

“哈尔滨口琴社”事件

启发我音乐兴趣的是1931年我在小学时期的哈尔滨公园音乐会。当时，哈市盛夏每周六晚7～9时，公园露天音乐堂都轮流举行音乐会。有一个铜管乐队的演出，我的印象最深。这个乐队约有二三十人，其中有一名中国血统的“独眼龙”吹短笛。我最喜欢听进行曲。当时我只有十一二岁，我立志要学那个吹短笛的中国人。我也很羡慕那个俄籍的乐队指挥，将来也想学习铜管乐器，当个指挥。我13岁上中学后，参加了学校的学生口琴队。当时是自发的，没有人教，口琴谱也没有和声配器，只能大齐奏。吹了两年口琴，还不会吹伴奏。

1935年4月后，我对音乐产生极大兴趣。我的叔父（音乐爱好者）为我聘请“哈响”的中提琴手玛格拉姆教我拉小提琴，每周上一次课，每次课学费2元（银元）。15岁时，我叔父介绍我加入基督教会领洗，进了唱诗班。美国牧师一眼就看中了我，愿意把我带走。我叔父愿意我去宗教学校学音乐，我想去学钢琴。但临走时被父亲发现，父亲逼我去报考医学专科学校。考试时，我故意交了白卷，父亲一气之下，送我去一家医院当学徒。我干了10个月，就偷着跑到一家电影院去工作。

哈尔滨是个音乐活动极为频繁的城市，经常有外国大音乐家前来演出，如小提琴演奏家M·艾尔曼、E·津巴里斯特，钢

琴演奏家莱奥·席罗拉，声乐家夏里亚宾等，都在哈市进行过演出。夏里亚宾的演唱会的门票5元1张（黑票卖到8～10元，一般音乐会的门票为1～1.5元）。外国歌剧团在哈市曾演出过歌剧《卡门》、《茶花女》等。音乐故事影片也很盛行，如关于肖邦、贝多芬、舒伯特、柴科夫斯基等音乐家的生平影片，都曾经上演过。

当时哈尔滨市有一所俄侨办的“格拉祖诺夫音乐学校”。我于1935年初中毕业后，本想去该校学习，但当时不招生，未去成。

1935年4月，有一个名叫袁亚成的人，开办了“哈尔滨口琴社”。袁亚成在上海时，是中华口琴学会会员，来到哈市后，被德国人开办的“孔氏洋行”聘为口琴教员。“孔氏洋行”为了赚钱，资助袁亚成开办了口琴社。口琴社开办了训练班，每期两个月，每月学费2元。结业后组成口琴队。我于4月参加了口琴社。同年10月，口琴队已初具规模，排练了两个月，于1935年12月29日、30日、31日三天，举行了全满第一次口琴音乐大会，地址在巴拉斯电影院（即现在的兆麟电影院）。

当年秋天，大约在9～10月份，传来消息说哈尔滨的特务要抓口琴社的人，因为口琴社里有共产党人。当时我不知道有没有共产党人。由于口琴社举办音乐会后，风声越来越紧，于是口琴社处理一下后事，马上解散了。

1936年初，口琴社停止了活动。可是过了一阵子后，并未抓人。于是在4～5月份，经过一些积极分子串联后，口琴社又恢复了活动。准备8月举行音乐会。这时又传来警察局要抓人的消息，有些人就走了。口琴社又开办训练班，培训新人。10月份举行口琴音乐会后，风声更紧，大家互相通知一下，就都走散了。那时，我才十七八岁，又不是共产党，所以没跑。口琴

社社长袁亚成和夫人陈涓于1937年4月去了上海，从此口琴社正式解体。口琴社的印刷机等物品，都由我收了起来，以备将来再用。

口琴社演奏的曲目中，最令人难忘的是大型口琴合奏曲《沈阳月》的演出。这是一首描写“九·一八”事变日本进攻沈阳北大营情景的乐曲。

1936年下半年，我曾在哈市俄侨音乐传习所学习过。口琴社的刘性诚（现名刘忠）曾在该传习所学过声乐，后来他介绍袁亚成去学习，袁亚成又介绍我去学习。我俩曾同班听乐理课，同时我又学习小提琴演奏。这个音乐传习所是私人开办的，每月学费10元（相当于银元）。除理论课上大课外，其他技术课都是个别授课，如小提琴、钢琴等。除我们3个中国人以外，其余全是俄侨青年学生。我在这里一直学习到1937年4月被捕时为止。

1937年4月15日，日本搞了一次全满大检举。首先是在与“铁路共产党案件”有关的康嘉祎（口琴社成员）家中发现了“哈尔滨口琴社”的一些照片，由此引起逮捕口琴社的人。15日逮捕一批，3天后——18日又逮捕了12人。我是在18日被捕的。

我被判5年徒刑，在哈尔滨道里监狱服刑。1937年10月初，被送到监狱内的印刷厂干活。

我们“政治犯”都自动地团结在一起。

狱中共产党员又分为两派：一是亲苏派，以李耀奎为首，另一派以董仙桥（董海云）为首。两派矛盾很大，原因不详。

高凤鸣（哈工大地下党，现名高乃贤）和我很亲近，我教他乐理，他教我歌曲。我俩团结在亲苏派中。其中也有些共产党员居中间派。

高凤鸣是音乐爱好者，知道我学过音乐，于是他唱歌，让我记谱。我记录了《囚徒歌》（苏联早期革命歌曲）。他教我唱《国际歌》时，唱不准音调，于是让一个苏联人（也是共产党案件）教我唱准确的曲调（俄文词），高凤鸣教我歌词，这样一来，词曲就配上了，但我未敢记谱，怕一旦被发现，铸成大祸。另外，高凤鸣作词，我谱曲，我俩合作过一首歌曲。

教唱《囚徒歌》逐渐扩大了范围。有一排版工（我猜测可能是张观，当时名叫张恩荣，地下党，现任第一汽车制造厂供销处处长）将此歌偷偷排版印刷，秘密散发，以便教唱。其中有一张被监狱人员发现，立即追查。追查谁写的？谁排版？谁唱的？当时谁也不承认。

当时，由于监狱中已经发生过几起事件，如殴打日本人，杀害日本人未遂，越狱未遂……这时又发生了"《囚徒歌》事件"。监狱的印刷厂是军用加工印刷厂，当时印刷厂的骨干大都是共产党员，因为他们都是知识分子。我是检字组组长。看守怕事情闹大了，上边知道后，担待不起，又怕影响生产，未向上边报告这个"事件"，也就不了了之。我和高凤鸣虚惊一场。从那以后，教唱歌曲更为慎重，不敢扩大。

"《囚徒歌》事件"发生于1938年。1939～1940年，监狱中稍稍松了一些，还给我弄来一只口琴，让我给狱中犯人吹奏。当时生活很艰苦，劳动时间14小时，连喝水都限制，因此才一连串闹事。由于撤换了典狱长后，才稍微宽松一些，犯人可以打打球，唱唱歌，当时只准唱一些与政治内容无关的歌曲。如《天涯歌女》之类歌曲。

我在狱中没有悲观，反而觉得和许多共产党员在一起很好，受到了党的教育。姜明烈曾为我上党课。高凤鸣向我介绍马、恩、列、斯著作及苏共情况……我当时的想法是：利用狱中生活，加

强印刷技术学习，学俄文和高中物理学，出狱后加入共产党，为党工作。在狱中学唱的革命歌曲，对我鼓舞很大。我在思想上有了信仰，对前途有了信心。当时，我本想在狱中申请入党，但由于党内两派斗争激烈，我不敢申请，怕弄不好被告密。姜明烈属于中间派，不参与两派斗争。

当时狱中流行一句话："日本话不用学，过了三年用不着。"每人都知道，日本人是"兔子尾巴长不了"。当时认为，共产党就是苏联，倾向共产党就要学俄文。所以我抓紧学俄文。在狱中得知"诺门罕事件"后，大家极为高兴。

1940年，我刑满出狱。

伪"协和会中央音乐指导者训练所"

我出狱后，在一家私人印刷厂工作。1941年5～6月份，"协和会中央音乐指导者训练所"（地址在长春南岭建国大学旁边）在全满招生。协和会下属有青年团和少年团。音乐指导者的任务是教青少年唱歌，组织吹奏乐队等，目的是为了宣传"王道乐土"。虽然是在全满招生，但重点招收对象是各地的青年团和少年团短期训练，一年毕业。招生条件是：高中毕业，有一定音乐基础，能吹奏一种铜管乐器。我看到报纸上的招生广告后，就去报考。我虽然已超过报考年龄（报考年龄为十六七岁）但由于成绩突出（考取第二名），被破格录取。学习的课程有乐理、视唱练耳、铜管乐器等。我在学习期间，买了许多参考书自学，如和声学等。毕业后，原则上是那来那去。我提出志愿留在训练所当教员。当时学校中没有中国人，全是日本人。由于我的业务成绩优秀，同意我留校任教。

1941年第一期招收的学生共22人。由于日本教员经常体罚学生，打跑6人，毕业时只剩下16人。第一期学生毕业演奏

会是在哈尔滨正式演出的。后来于1942、1943、1944、1945年每年招收一期学生，共招了5期。

每期学生毕业演出都要在外地进行。第一期在哈尔滨，第二期在佳木斯，第三期在牡丹江，后来就到内蒙成吉思汗庙、热河，甚至到关内去演出。第五期是在1945年7月招生的，8月日本就投降了。

1942年，我在训练所当教员。从1943年起，日本人一个个陆续应征入伍，到1944年末时，只剩下一二个日本人了。

"音乐指导者训练所"的领导者有两个日本人，一个名叫酒井一雄，一个名叫清水正夫（海军军乐兵，圆号手）。酒井一雄准备成立一个70人的吹奏乐队。但是他在采购乐器过程中有受贿行为，因而被调走。后来就由清水正夫一人掌权。

学员加上20多名日本教员组成的吹奏乐队，经常有演出活动。节日时在街道上行进演奏。后来以"协和会青少年团中央吹奏乐队"的名义，到处演奏。开会时，先唱日本国歌，满洲国歌，然后是吹奏乐节目。实习演出被列入教学计划。

第二期招生30多人，第四期招生人数更多。后来的招生已不大公开了，主要是由各地协和会从青年团和少年团中推荐。举行旅行演出时，将历届毕业生一律招回，共同进行演出。旅行演出曾经到过华北兵营，还在沈阳广播电台演出过。

清水正夫曾怀疑我是否真正是印刷工人，对我进行过考核，由于我对答如流，才使他不得不相信。

1944年，江文也写了一首《大东亚进行曲》。为了推广该曲，协和会决定出版一本歌曲集。这个任务交给了我。我如期完成了（全部采用五线谱），还得到了一笔稿费。歌曲集出版后，立刻开展全满青少年教唱活动，把我派回哈尔滨进行活动。

1944年下半年，只进行教学，不进行演出活动了。

酒井一雄喜欢古曲曲目，清水正夫则喜欢日本曲目。“协和会青少年团中央吹奏乐队”演奏的保留曲目中有《大满洲进行曲》、《印度女王》序曲、《可爱的少女》序曲、《蓝色多瑙河》等，还有一些俄罗斯乐曲。

（吕金藻整理，摘自《长春文史资料》第二十七辑）

满洲国乐社和祀孔

韩玉洁

日本侵略者占领了我国领土东北地区后，于1932年3月建立了伪“满洲国”傀儡政权。在日本帝国主义者的操纵下，伪国务院文教部，为实现其“王道”治国的目的，在意识形态领域里首先抓了礼乐。他们认为“自古圣贤经国之大节，皆以礼乐并重”。伪满“已建国，而春秋祭孔之乐章尚未具备，饮宴之际操异域之音，礼崩乐坏莫如今日之甚也”。因而，重整祀典，恢复礼乐及礼节的制定就成为伪文教部的工作中心之一。

1933年，伪文教部责成邵继云（前清和声署庶使）出面，筹款4 000元伪币，初拟命名礼乐学校，因欲区别于祀孔乐舞，所以定名为“燕乐传习所”，[①] 隶属文教部领导，地址设在新京（长春）东二道街孔庙内。同年4月3日，在文教部礼教司内举行招生考试，吸收乐生的条件为初小以上的16岁～20岁的青少年。经测验共挑选俞学海、张禹田、王海、周灏、于哲园、段

① 燕乐：即宴乐，燕乐，始于周代，亦称房中乐，是宫廷中所用的俗乐的总称，系与雅乐相对而言。

景湘等30名乐生，于4月6日开学。“燕乐传习所”校长邵继云，助教赵连兴（前清和声署掌乐副），书记高鸿炎。乐生在学期间，每月发伙食费10元。学习科目为笙（4名）、管（8名）、笛（8名）、箫（4名）、板（2名）、鼓（2名）、云（2名）共7种乐器，每日3堂课，每堂2小时，进行雅乐训练①，其余时间为预习和自修。学习方法是先教授乐谱，再学习吹打，总学习时间为3个月，期满时每个乐生学会乐曲10余首，毕业典礼上伪文教部总长、礼教司长讲了话，并表明：“望诸生对学业继续加以研究，以上备国家典礼之用，而下为人民化导之资”。后来，“燕乐传习所”因经费问题停办。

伪文教部为保存此乐，由王季烈（执政府内务处技正）作为主要倡导者，将“燕乐传习所”改为“满洲国乐社”②，得到了郑孝胥（国务总理兼文教部总长）、许汝棻（文教部次长）、西山政诸（文教部总务司长）、上村哲弥（文教部学务司长）等人的帮助，于1933年7月举行了“满洲国乐社”成立会。据伪满报刊记载，“满洲国乐社”的宗旨为“礼可节操民心，乐可宽如民声，政以此而行之，刑以此而防之，礼乐刑政若四达而不悖，则王道备矣。盖声音之道与政相通，移风易俗，莫善于乐。”

“满洲国乐社”是以培养祀礼的乐生为主，实质是音乐班，聘请对国乐研究有素养的许雨香担任教师，并从新京市立第十九小学校选学生40名，集中于孔庙内，学习南江丝竹乐、昆曲、祭典所用之音乐等，以培养乐生的演奏能力。初建时暂用笙管笛萧及钟鼓之类的乐器，比较单调，后又增加琵琶、边钟、边磬、排箫及搏拍云锣、大钹等打击乐，逐渐充实完备，排练过

① 雅乐：一般泛指宫廷的祭祀活动和朝会礼仪中所用之音乐。广义的雅乐，包括宫廷中不带或少带礼仪性质的燕乐。

② “满洲乐”实际上是东北沦陷区的中华民族民间音乐。

昆曲《长生殿》、《赐合》、《游园惊梦》等戏。文化课学《中庸》、《大学》、《论语》、《孟子》等《四书》，教师由宫内府秘书兼任。至1936年，"满洲国乐社"已学习30余首乐曲，并继续招收部分新乐生。日伪名义上提倡"国乐"，而实质是扼杀和限制中华民族民间音乐的发展。国乐社的经费，不是政府拨给，均由发起人采取募捐或由国乐社成员共同负担，因而，许多业务不能正常开展。

日伪当局严密监视和控制"满洲国乐社"的活动，残酷地迫害具有爱国思想的青年，1934年末，乐生正在上课，伪警宪突然包围了国乐社（即孔庙），扬言庙内有电台、炸弹，对乐生宿舍及殿堂鸣枪进行搜查，逮捕了乐生于哲园、李某二人及于的同学庄甘。6个月后，于、李二人获释，被打成残废，庄某被害。自那以后，"满洲国乐社"的活动，处在伪警察监督之下。

"满洲国乐社"自1933年7月成立后，即担负了伪满皇室的礼乐（如皇帝登基大典奏乐），国家祭典奏乐，春秋二季为新京孔庙祀孔奏乐。新京孔庙始建于清同治十二年（1873年），规模不大，1924年经前吉林道尹后任黑龙江省省长孙其昌等捐款修缮，伪满建国后为皇帝祀孔所用，因而礼节制度及规模较过去又有所不同。伪政府有关当局，为实行王道尊孔，曾于1932年秋丁，1933年春丁，由国务总理主祭，在此庙举行祀孔典礼。

"满洲国乐社"除为春秋二季祀孔及国家祭典演奏外，也参加电台组织的广播演奏和舞台演出。1935年曾广播演奏《平湖秋月》、《小鸿宴》、《花弄影》，以及管乐《千首佛》等乐曲。1937年秋至1938年春丁祀孔后，相继毕业的有张禹田（解放后为长影乐团琵琶演奏家，已故）、孙友武、赵殿奎、王静波、周灏、刘宝忠、王玉平（解放后为辽宁歌舞团二胡演奏家）、俞学海（解放后为本溪南芬矿俱乐部主任，已故）等30人，其中有的还

被派至东北境内部分县城作讲习祀孔所用之雅乐教师。1938年6月，因统治集团内部矛盾，“满洲国乐社”解体，乐生没有分配工作，每天到孔庙集合待业，后与广播电台联系，以“满洲国乐社”的名义对外演出，曾在电台直播6—7次，演奏的曲目有《妲妃催花典》、《雁落平沙》、《巧梳妆》、《湘江郎》、《寄生草》、《双声恨》、《昭君怨》、《柳娘三醉》、《杨翠喜》、《汉宫秋月》、《走马英雄》及管乐《九连环》、《贺新凉》、《拨银灯》、《罗江娟》、《金钱落地》、《五圣佛》等曲目。1939年4月“新京音乐院”满洲乐部成立，“满洲国乐社”的演奏活动逐渐减少，但尚未停止，经乐生刘宝忠介绍，排练集合地点改在“新京军乐队”。此期间曾演奏过《天尊号》、《朝天子》、《梅花三弄》、《百鸟朝凤》、《庆神歌》及昆曲《邯郸梦》、《堆花》、《咏花》等曲目。

1940年“新京白鸥乐团”、“春汀新乐社”、“满洲民乐社”等群众音乐组织相继诞生，“满洲国乐社”的成员有的到“新京音乐院”满洲乐部和电台学艺课工作，有的参加其他社团活动，因而，“满洲国乐社”的名字，也就逐渐消失，被其他音乐组织取而代之。

（摘自《长春文史资料》第二十七辑）

“满洲国国歌”创作之谜

（日）木村辽次　韩冈觉　译

昭和7年3月（1932年3月），爱新觉罗·溥仪，在日本军部的保护下，由满洲国要人们簇拥着跨入了新京。街面上五色

的满洲国国旗迎风招展，到处可以听见扩声器播出的日本产“满洲进行曲”。

作为文学家也颇有知名度的国务院总理大臣郑孝胥，创作了满洲国国歌的歌词，并亲自委托东京的山田耕作为之谱曲。郑国务总理最初的歌词，大致是“……地辟今天开，松之涯令之限……（以下略）”这样一个格律，当时的报纸刊登过有关国歌创作的一些动态报道，诸如……兰花图案的御徽闪烁光芒，皇车驶进杏花村郊庙祭场，满洲国军乐队吹奏的国歌，应是曲调庄重昂扬……云云。

因此，大多数人都确信：满洲国国歌系郑孝胥作词，山田耕作作曲，但事实上，作曲并非山田耕作，歌词也与郑总理的始作面目迥异。

满洲国皇帝陛下溥仪“即位”时演奏的国歌，其歌词是郑总理改写的“天地内有了新满洲，新满洲便是新天地……（以下略）”，作词，作曲都以“无记名”发表，究其原因至少有如下“内隐”。

日本第一流作曲家山田耕作为之精心创作的满洲国国歌为何未被采纳，其中虽有许多谜底未解，但是满洲国的许多要人感到不满意恐怕是事实。

其后，郑总理改写了歌词，并在“满人”作曲家中“征曲”可是未得佳作，不觉时光流逝。

世界国联满洲国调查团的李顿氏访查新京之际，满铁音乐会的高津敏会长，成了“承包”满洲国国歌作曲的“中标”者。但是，严谨的高津氏在深思熟虑的基础上，是以邀请有能力参与国歌曲调创作的驻满日本音乐家村冈乐童氏和园山民平氏三人共同创作为条件，向郑总理“投标”的。

当然，郑总理毫无为难或不同意的理由，结果，由这三氏

的合作，产生了后来那首不露词作曲作姓名的“佚名”之作。

当时，高津敏氏是满铁本社内满铁音乐会的会长，园山平民氏是大连市视学（督学）兼神明女高的教师，而村冈乐童氏则是被称作满洲“乐坛之父”的大连一中的教官。村冈氏的私宅临近满铁本社大楼，三氏经常在村冈处磋商曲作。

郑总理的歌词“天地内有了新满洲……”是一章十三句的“满语”格律，如何使曲调与歌词的含义与语势吻合，曲作者请大连音乐学校的满人女教师杨先生助了一臂之力。

还流传着一说，即满洲国国歌的主旋律由园山氏创作；和声功能与连接由高津氏定稿；村冈氏承担了编曲配器云云，但是，真伪难辨，因为三氏均成故人。不过，我个人觉得认定旋律、和声、编配均为三氏合作的结晶更为贴切。

三氏完成曲作之后，由高津氏为代表北上赴新京“交差”，不久由满洲国军乐队演奏发表。满洲国的众阁僚、诸星将不待说，郑总理也对曲作甚感满意，可是，之后唱了几年的这首国歌，随着满洲国的垮台也像肥皂泡一样消失了。

（摘自《长春文史资料》第二十七辑）

东北沦陷时期的戏剧

李春燕

东北沦陷时期的戏剧是在东北新文学继承了“五·四”文学革命的光荣传统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此，它开始就不仅在形式上冲破了八股式的文言束缚，而且在内容上也日趋于文学革命的真正含义；并且由于“九·一八”事变这个特定历史

环境的制约，使其发展走着一条十分不平坦的道路。

一

“五·四”新文学运动对话剧虽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但是，起初在文化较落后的东北，还是京剧主宰着文艺舞台，迎合着有闲者的兴味，一般的平民百姓是很少光顾的，就是经济稍好一点的人，也只能看看马戏或者听听“落子”，所以，话剧在当时是不被人们重视的。不过，这个被人称之为塞外的东北，毕竟不是一潭死水，新文学运动的风浪一旦波及到这个广袤之地，也会受到意想不到的震颤。首先，在接受新鲜事物最为敏感的学校，一些青年学生首当其冲地扮演了革命的角色，组织排演了类似小歌舞剧的东西，打破了戏剧舞台的沉寂，活跃了人们求变成新的思想，使戏剧的变革逐渐地成为了人们的一种要求。接着，有些作家为了适应人们的需要，创作出了一些具有新思想新内容的剧作，从而使人们看到了戏剧变革的希望。

“九·一八”事变使得刚刚萌生的新剧幼芽受到了日本帝国主义铁蹄的蹂躏，但它也像其他文艺一样逐渐的复苏起来。这是由于：一是处于水深火热的东北人民不甘心遭受日本侵略者的政治奴役和文化侵略，他们在反侵略反压迫反饥饿的同时，也在文化方面进行斗争，一些有胆识的作家和文学青年，便利用敌伪的报纸和杂志，创作和发表了一些剧本，很快地复苏了濒于死亡的戏剧；二是日伪为了稳定局势和取悦于人，他们企图利用演剧来宣传“国策”和奴化东北人民，所以也就允许了一些作家和剧人发表剧作和演出，企图以此来造成大东亚的虚假繁荣，达到为其歌功颂德的目的。东北沦陷时期的戏剧就是在这种十分复杂的情况下恢复起来的。

恢复起来的戏剧，其中不只是话剧，也有歌剧、评剧、哑

剧、诗剧、广播剧等各种形式的剧种，但是就其恢复速度之快，创作和演出数量之多，质量之高，产生的影响之大和所占地位之重要，还是以话剧最为突出。因此，在整个东北沦陷时期的戏剧中，话剧便成了新剧运动的中心，并在排除了各种阻力的过程中成长和发展起来。

首先，同日伪企图利用戏剧进行反动宣传的斗争。戏剧有别于其他文学的是，它不但可以作为文学作品有很强的阅读性，而且还能用于舞台演出，有一般文艺所不能替代的感人作用。因此，日伪便抓住了戏剧的这一特点，企图利用它来进行“日满亲善”、“一德一心”、“共存共荣”以及“决战必胜”等反动宣传。但是，新剧运动在其开始阶段虽然还没有形成一种强大的势力，可是在复苏和发展的过程中，始终在爱国抗日的总体精神指导下，进行着反利用的斗争。以金剑啸、罗烽等人为首的文艺工作者，先是在《夜哨》和《国际协报》等文艺副刊上发表剧作和文章，揭露日本帝国主义者的侵略本质，号召人民起来反抗，砸碎这人间的地狱，以后又组织剧团进行演出，把反利用的斗争公开化。这虽然引起了敌伪的注意，致使两个进步的报纸文艺副刊停办，剧团也因排演进步的文艺剧目而被迫解散，但是它使日伪想要利用戏剧来宣扬侵略有功和强化殖民文艺统治的目的彻底破了产。因此，东北沦陷初期新剧运动所取得的反利用斗争的胜利，无疑是为此后的新剧发展奠定了基础，开辟了道路。1934 年以后，伴随着新剧运动的广泛开展，日伪对新剧的控制也日益加强。一方面严格地审查剧本和上演的剧目，专门指派日人领导较大的剧团，以控制进步的戏剧发展；另一方面则对爱国进步的戏剧家进行迫害和屠杀。继金剑啸惨遭杀害之后，日伪对戏剧界的统治更加严密了，其突出的表现是，伪首都警察厅设立了专门机构进行监视。从已发现的三份《关

于侦察利用文艺、演剧进行思想政治活动的报告》的秘件中，看出了日伪特务不但对爱国进步作家注册登记“展开侧面调查”，而且还跟踪盯梢，监视行动，并对其作品的描写倾向进行缜密的分析，定期向警务总局局长报告。如剧作家王则、安犀、杜白雨、山丁等人，即使他们在伪“满映”谋事，也无时无刻不在敌特的监视之中。另外，日伪还对爱国进步作家实行了两次全东北性的大逮捕，李季风、关沫南、王光逖、田琳等作家都被捕入狱，有的受尽了敌伪的残酷迫害，有的惨死在狱中。尽管这样，许多剧作家仍然坚持反抗和斗争。对于这一点，就连日伪当局也不得不承认，有一份敌伪秘件中写道：“大东亚战争爆发后，政府实行检举、镇压反满抗日分子的政策，越发引起左翼作家的警觉……他们考虑到官方的取缔，极力避免过激的描写，而尽量迂回灌输某种意识。”从这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敌人越是想以利用的手段进行镇压，新剧运动就越是在反利用的斗争中发展起来。

其次，守旧与革新的矛盾。当话剧在沦陷时期复苏了的东北文坛上出现的时候，并没有引起人们多大注意，那些守旧的卫道士对这门新兴的艺术简直不屑一顾。可是在话剧的发展形成了一种不可阻挡的势力的情况下，革新与守旧的斗争就激烈地展开了。当时这种斗争最为明显的表现，就是京剧和话剧的矛盾。京剧是一门古老的艺术，在旧中国一向被敌人认为是最高的观赏品，特别是那些有闲阶级更是把看京剧作为最好的娱乐，所以对话剧的兴起并占领戏剧舞台非常反感。他们认为，京剧不仅是祖传下来的，而且需要精湛的作功，而话剧演员只要口齿清楚长相好看，是随便谁都可以当得来的。，这种对京剧倍加推崇而对话剧于过看轻的现象，正是京剧和话剧矛盾的焦点。因此，革新者极力为话剧造舆论、创条件、占舞台、求发展的

一系列活动，都遭到了那些守旧势力的阻挠。他们不但发表言论诋毁新兴的话剧，而且不给话剧演出的场所。其实，话剧并不像那些上层社会的人们所想象的，一个话剧演员，不但要深刻的理解剧本的内容，掌握剧情的发展，表现人物的外在行为和内心的活动，而且要通过人与人的相互关系，反映出社会的面貌，使人看到的是真实的生活，而不是虚假的编造。何况生活是那么丰富，社会是那么复杂，人们的行为举止是那么多样，而内心的变化又是那么细微难测，因此，一个话剧演员如果没有过硬的基本功，怎么能在剧场的小舞台真实地演出人生的大舞台来呢？就是由于那样的认识，那些致力于新剧运动的人们才迎着“五·四”新文学的大潮，把话剧作为新剧的主体加以推行。在当时，不但有像塞克、金剑啸、安犀、李乔、王则等一些专门从事话剧创作的剧作家积极倡导，而且还有萧军、萧红、舒群、罗烽、白朗、山丁等人的鼎力支持，使话剧占领了东北的剧坛。

再次，同那些不理解话剧艺术的人们的冲突。在日本侵略者侵占东北以后，由于生活所迫，在死亡线上挣扎的人们是不可能去观赏话剧的，即或是生活还过得去的城市的商人和手工业者，还有小集镇的一些农民，虽然他们有条件去娱乐，可是，因为对新兴的话剧不理解，所以兴趣和爱好也往往不在话剧上，而宁肯去看那些具有神秘色彩的魔术和比较低俗的地方戏曲。但是，这种现象并没有维持多久，随着新剧运动的不断开展和一些戏剧家的艰苦努力，话剧也渐渐地成了深受人们欢迎的一门艺术。首先是知识分子和文学青年，他们面临着国破家亡的社会现实，希望在大多是反映现实生活的话剧里寻求到一点救国救民的道理，或者是排解一下苦闷彷徨的心情，以求得心灵的安慰。由于有这些人的关注和支持，慢慢地也就带动了那些

小市民阶层，逐渐地喜欢上了话剧；同时又由于李乔等戏剧家对新剧大众化的提倡和身体力行的努力，就更使得话剧有了长足的发展。李乔曾大胆而明确地提出："戏剧不是一部分贵族的特殊享受，穷乡僻壤贩夫走卒也同有观剧的资格，戏剧能使人人都看得到都有鉴赏的能力，那时才是戏剧运动的绝对条件。"（李乔：《决战下野台剧的构想》，载《艺文志》第九期——作者注）因此，他主张话剧要进行游动演出，要到民间特别是农村去演"野台戏"，这样就使话剧不仅在城市和集镇上演，而且也走向了广大的农村。话剧之所以成为新剧运动的主体，就是因为它不仅走出了书斋，占领了城市的舞台，而且也在广大农村的劳动人民中有了一定的地位，并且以其不可阻挡之势迅猛地向前发展着。尽管后来由于大东亚战争的叫嚣和一切为了圣战服务的要求，新剧运动受到了严重的摧残，不过，已经显示了新剧运动威力的话剧，即使在日伪高压摧残和圣战席卷的情况下，也没有忘记"复兴祖国，重建中华"的使命，仍然在岩石重压的缝隙中求得生存和发展。

二

在东北沦陷时期，众多剧团的创建是新剧运动繁荣的标志。它不仅把广大戏剧爱好者组织起来，而且还以自己的演出实践推动着戏剧的发展。

首先，"星星剧团"的出现为新剧运动开拓了新路。哈尔滨的一些文学青年，为了冲破笼罩在东北最黑暗的势力束缚，于1933年7月，由金剑啸、罗烽发起，有萧军、萧红、罗烽、白朗、白涛等人参加的"星星剧团"便组织了起来。这个剧团以积极开展进步的戏剧活动，宣传抗日救国的主张，同日伪进行文艺斗争为宗旨。它不但有明确的目的，而且还由萧军写了团

歌，以教育和团结成员，振作精神，坚定斗志，迎接黎明，期待着“伟大的红日”拂照。为了开展活动进行演出，剧团选排了美国进步作家辛克莱的《居住二楼的人》(又名《小偷》)、白薇的《娘姨》、白涛的《一代不如一代》(又名《工程师之子》)三个短剧。虽然最后由于没有借到场地而未能演出，但“星星剧团”却在暗夜里闪耀出希望的星火。这不仅因为它是在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下的第一个半公开性质的抗日戏剧团体，而且更重要的是它团结了像萧军、萧红、舒群、白朗、白涛、刘毓竹、金人等一大批爱国进步的作家，从思想和组织上为东北沦陷时期爱国抗日戏剧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正像罗烽在《从星星剧团的出现说创哈尔滨戏剧的将来》一文中说的那样：“宇宙间一切都在静态里，人们恰在黑暗里蠕爬的当儿，蓦然于哈尔滨——丑态与物质垃圾堆的哈尔滨出现了一个星星剧团，它是放着轻轻的脚步，鸦雀无声地走到了人间……它的使命就是凭着那些微的光辉，整个贯注于人们的心目中，正如天上点点的星星也要呈现和照耀于地上每个人的脸。这在从来枯槁若死的哈尔滨，真是一个先锋团体结合。”“‘星星剧团’将为全哈尔滨戏剧界开拓一条荒殊的素无人迹的前路。”(伪《大同报》《夜哨》副刊创刊号）其实何止是对哈尔滨，这个“先锋团体”实则是为整个东北戏剧界开拓了一条爱国抗日的道路，在东北戏剧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其次，京、奉、哈三大剧团的鼎立促进了新剧的发展。长春（伪首都新京）的“大同剧团”，沈阳（原称奉天）的“协和剧团”、哈尔滨的“剧团哈尔滨”，是鼎立于东北沦陷时期的三大职业剧团。

“大同剧团”成立最早，规模最大，演剧最多。这个剧团是1934年由日人藤川研一发起和创立的，加之所演的一些剧目没

有触及“日满协和”、“一德一心”的“国策”，所以没有受到日伪的干涉。开始，剧团为了赚钱，演出了一些思想内容很不健康的剧，使人们很显不满，后来，为了生存和发展，不得不抛弃《爱的箭》和《王署官》之类的剧目，一反常态的演出了苏联著名作家果戈里的名剧《巡阅史》，一下子扭转了局面，获得了成功。接着演出了曹禺的《日出》和《原野》，剧团的名声大振。之后又演出了自己创作的剧本《林则徐》、《青天壮志》、《第二代》和《夜航》等，都受到了广大观众的欢迎。尤其是《林则徐》一剧的演出，更是博得了人们的喝彩。由在长春演出，转而到东北各地较大的城镇公演，又进关到北京和天津，创造了公演153次的最高纪录。这就有力的表明，一个剧团如果一旦有了自己创作的艺术，那么它就会产生无比的凝聚力和创造力，而这也正是当时新剧运动所最需要的。

沈阳的新剧发展虽然来得比较晚，但到了1937年以后，其活跃的程度几乎同伪首都新京的情况不相上下。沈阳的演剧业开始多局限于放送剧，后来由于“大同剧团”到沈阳去巡回演出，给沈阳的剧人以很大的促进。他们也想把放送剧往话剧上推进，以使放送剧从有声无形的状态搬上舞台，与广大的观众直接见面，所以便于1938年秋成立了“协和剧团”。该剧团的创始人李乔、安犀、成雪竹等人，利用伪满协和会的场地，排练并演出了安犀编写的独幕话剧《三代》，开创了沈阳演出舞台话剧的先例。次年9月，日人上原笃为了改变剧团的业余性质，积极筹建职业剧团。因其后台是伪满协和会，成员又是以伪市政府中积极参加话剧活动的职员为骨干，所以专业性的职业话剧团——“协和剧团”便很快成立了。这个剧团是沈阳当时唯一的官办戏剧团体。为了不减大剧团的威风，它一开始就于1940年公演了日人上原笃改编和导演的《雷雨》，一举出名之后，又

去长春、哈尔滨、吉林、大连等城市巡回演出。此外，还演出了《萌芽》、《欲魔》、《生财有道》、《废墟》、《归去来兮》和《放弃》等中外著名剧目，使新剧运动在这个剧团的不断演出中更加深入人心。1942年，这个剧团公演苏联作家编写的《怒吼吧，中国》一剧，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本来，日本侵略者是想利用这个剧目的上演，暴露英美侵略中国的罪恶历史，激起中国人民对英美的民族仇恨，可是演出的结果却适得其反，广大观众不忘旧恨，更记新仇，由剧中英美侵略中国的情节，联想到日本帝国主义者的侵略和掠夺，激起了无比仇恨。大家争相观看，上座率空前，这是他们万没有料到的。为了消除这一影响，日伪当局一方面勒令该剧停演，另一方面匆忙地指使剧团的日人端山进，编造出了一个日本人在渤海湾协助中国人反对英美帝国主义海盗的多幕话剧《渤海》，可是演出时十座九空，最后不得不以停演而告终。在太平洋战争惨遭失败之后，“协和剧团”也被纳入了战争轨道。但是它所演出的进步话剧却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哈尔滨的戏剧发展，大体上也和沈阳一样，先是由放送剧开始，以后逐渐转为舞台话剧。舞台话剧一发展，演出的团体也就增多了。“剧团哈尔滨”原是一个日人演剧团体，由多田修、东纪江、堀井进所创建的，开始并不怎么出名，可是后来因有中国人王人路、郭风等主要演员加入，才使剧团逐渐活跃起来。他们演出的《黄昏大血案》、《秋宵》、《职业妇女》、《爱的犯罪》等，都是很受群众欢迎的剧目。开始，由于这个剧团比较重视音乐伴奏和演唱歌手的作用，也尽量招收这方面的人才，所以人们觉得他们对于演剧不太郑重，称它是“盲动的素人剧团”。可是也许正因为这个剧团有了音乐的伴奏和歌手的演唱，竟收到了意想不到的艺术效果，因而得到广大观众的欢迎。

第三，业余剧团的创办使新剧逐步呈现出了繁荣的局面。在长春、沈阳和哈尔滨，除了三大职业话剧团之外，还有众多的业余剧团与之呼应和配合，使得东北沦陷时期的戏剧运动异常活跃。

在长春，“银星”和“三友”两个剧团是出现的比较早的，前者由初光和孙燕谋领导，后者由称谓“三友”的邓固、捷于、孟语主持。接着是“文艺话剧团”、“银青剧团”、“同仁剧团”等的建立，一时间使长春的演剧业发展很快，这些剧团虽纯属业余性质，但它们的演出因更适合群众的口味而受到大家的欢迎。不过，能够撑得起门面并且较有影响的，也只是“文艺”、“银青”和“同仁”三家。“文艺话剧团”因为是由伪“满映”脚本科创作员山丁和安犀创办，且有吴郎、孟语、捷于、红郎、曼娜等人参加，所以阵容很强。它演出的话剧《主仆之间》、《狂潮》、《日出》、《道上》和《佳佳丽丽萧萧》等剧，引起了强烈的反响；“银青剧团”是伪满洲国中央银行的职员组织的，由于他们上演的几个剧目《家》、《沉渊》和《人之初》等都是当时较有影响的，所以这家剧团很受群众的欢迎；“同仁剧团”力主上演自己创作的作品，除《明日之春》外，熏徽的力作《青石桥》因描写了一个可歌可泣的悲壮故事而吸引了观众，从而使剧团发展壮大了起来。其他如“满映剧研会”、“放送文艺协进会”、“电波剧团”等，虽然也都跃跃欲试地很有雄心，但終因没有公演或只演过一两次就解散了而未留下什么业绩。

沈阳和长春一样，也有许多业余剧团活跃。当时较有影响的是由李乔和金山龙任编导的“国际剧团”，它经常在“国际剧场”演出，也去过锦州和抚顺等地公演，上演的剧目多为李乔创作，《塞上烽火》、《夜深沉》、《生命线》、《血刃图》等，均受到群众的赞赏。另外，“放送话剧团”，当它还没有合并进“国

际剧团”之前，曾于1939年春在沈阳演出了三个独幕剧《夜歌》、《夜潮》和《野店恩仇记》，以其上座率之高超过了历次的演出，使人们对新剧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兴趣。还有一个以成聪右、高纯、张凡时、刘枫、盛世荣等人为主要成员的“剧团奉天”，它是1942年经伪沈阳市政府弘报处批准建立的，因此它的组成人员也多是伪市政府的职员。它除了演出过匈牙利的剧本《善行》外，还演出了由李健吾创作的剧本《回家以后》而改名的《秋阳》，在短短的几年活动中，这个剧团也取得了较好的成绩。

在哈尔滨的业余剧团中，以尘沙创办的“艺文剧团”和“哈尔滨放送话剧团”最有起色。“艺文”公演的《日出》和《沉渊》很是叫座，而“放剧”因其创办人尘沙是电台的职员，所以对播音剧格外的重视，他们创作和播放的广播剧，曾在第一次东北各地播音剧比赛中获得了第一名。再有就是陈九龙等人组建的“驼铃剧团”和何宜之等人领导的“北牛剧团”，它们先后演出过《北京人》、《家乡月》、《紫丁香》、《生命线》等，使哈尔滨的戏剧活动也蓬勃地开展起来。

除了这三大城市的业余剧团之外，吉林、四平、大连、安东、抚顺、锦州、齐齐哈尔、牡丹江、绥化等一些中小城市，以及那些偏僻的小城镇，都在这股兴办剧团的潮流的推动下，办剧团、搞演出，推动着东北沦陷时期的新剧运动广泛深入地向前发展。

三

剧作创作是戏剧发展的基础。东北沦陷时期的戏剧，正是因为有了自己的创作，所以才很快地发展。从总体看，当时主要有两股较雄厚的力量：一股是新老作家的关注。这些人，不

但写小说、散文和诗歌，而且也撰写剧本。萧军的评剧《马振华哀史》、萧红的哑剧《民族魂》，虽然都不属于新剧（话剧）的范围，但是他们身先士卒的行动却对新剧的兴起和创作有很大的推动。罗烽的《两个阵营的对峙》和《现在晚了》、洗园的《归家后》、关沫南的《开张》、陈隄的《夜景》和《夜与黎明》、单蕙的《逃妇》等，都是新老作家投身戏剧创作和对新剧的支持。他们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因为没有他们的关怀与创作，剧坛就显得冷落，新剧运动就难以顺利的开展。另一股是专业作家的倾心。在东北沦陷的十四年中，专门从事戏剧创作的人不多，而能称得上是戏剧家的就更少。但是就其戏剧的创作和发展看，这一时期的戏剧还是反映了那个特殊历史条件下的时代生活。作为新剧运动的先锋当首推剧作家塞克，这个党指派来东北进行革命活动的共产党员作家，早在“九·一八”事变前就进行话剧创作，事变之后虽然很快地离开了东北，但他创作的《哈尔滨之夜》、《铁队》、《流民三千万》等，却都真实地反映了东北人民的斗争生活。金剑啸尽管年仅27岁就遭到日伪杀害，但他在短短的戏剧生活中为我们留下了非常宝贵的精神财富。他创作的《穷教员》、《艺术家与洋车夫》、《黄昏》、《母与子》、《幽灵》、《谁是骗子》、《车中》、《咖啡馆》等新剧，具有深刻的思想性和较高的艺术水平，因此当人们把他的戏剧活动和创作结合起来时，就把他誉为是东北沦陷时期革命戏剧的奠基人了。还有安犀和李乔，他们不但以戏剧活动著称剧坛，而且以其创作为新剧的发展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安犀的《三代》、《归去来兮》、《猎人之家》、《清明节》、《晚钟》、《野店恩仇记》、《淑女》等创作，李乔的《夜歌》、《家乡月》、《夜深沉》、《生命线》、《塞上烽火》、《紫丁香》、《夜航》、《血刃图》等二十几部剧本，都因大部分被剧团排练演出而在东北沦陷中后

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无论是新老作家的关注，还是专业作家的倾心，他们在戏剧创作中都有一些共同的特点，那就是：

第一，爱国抗日是东北沦陷时期戏剧创作的基本主题。在这方面，许多作家主要是抓住两点去表现。一是通过底层，揭露上层，激发人民的爱国意识。文学反映底层劳动人民牛马不如的穷困生活，揭露上层社会统治阶级暴虐的主题自古有之，并不是罕见的现象，但是因为伪满洲国是日本侵略者一手策划的汉奸政权，文学反映底层揭露上层，实际上就是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所以沦陷时期的戏剧创作，大多采取这种方法进行具有特殊含义的爱国斗争。金剑啸的《黄昏》和《谁是骗子》，安犀的《三代》和李乔的《夜航》，都是通过对最底层劳苦大众的描写，揭露上层社会的丑恶和黑暗的。《夜航》中所写的仆妇、骗子、小偷和无赖，表面看都是些社会渣滓，但作家把鄙视和抨击的矛头指向了强权者和阔家财主，所以人们自然也就会由这些人物而联想到造成这种现象的罪恶根源，从而激发起驱逐日寇救我中华的民族意识。二是描写黑暗，隐喻现实，唤起人民的反抗精神。日人曾把东北沦陷时期的文学称之为“暗”的文学，戏剧在这方面表现的也很鲜明。剧作家们在创作中尽量把作品描写得黑暗一些，企图以此来隐喻日本的侵略所造成的黑暗的社会现实，表达自己爱憎分明的思想感情。金剑啸的《母与子》和《艺术家与洋车夫》，安犀的《猎人之家》等，都对黑暗的社会进行了无情的鞭挞，有力地揭露了日伪黑暗的统治政权。李乔不少的剧作直接就以暗夜命名，如《夜歌》、《夜航》、《夜巷》、《夜深沉》、《小夜曲》、《家乡月》等，这些题目的本身就是一种黑暗的象征，再加上作品的内容所描写的吸毒、酗酒、赌博、偷盗等，又都是现实社会存在的普遍

现象，因而这种描写和隐喻就更具有了现实意义。东北沦陷时期的戏剧，就是运用这种方法来表现爱国抗日的主题的。

第二，坚持创作和演出的结合是东北沦陷时期戏剧发展的关键。戏剧的创作和演出本来是相辅相成的。创作供给演出以脚本，演出则丰富了创作的内容。东北沦陷时期的戏剧在创作和演出上是这样相互促进，推动着戏剧向前发展的。

（一）既能创作，又能演出。从1931年10月塞克创作并导演的话剧《哈尔滨之夜》起，就揭开了创作和演出相结合得序幕。此后由于各地剧团的兴办，就更为创作和演出的结合创造了条件，所以不少从事戏剧创作的人，不是当上了剧团的领导，就是成为剧团的导演或演员。如当时活跃于剧坛的安犀和李乔，同沦陷初期的塞克和金剑啸一样，都是既能创作又能演出的戏剧家。他们自己创作剧本，自己创办剧团排练演出，而且又都在剧中担当一定的角色，这样就更加丰富了他们的生活和创作。

（二）想方设法地利用演出进行宣传，扩大影响。一些有爱国思想的作家，面临着黑暗的社会现实，他们不能不想到利用戏剧这个最直接最形象的文学样式进行宣传和斗争，而舞台的演出往往比剧作本身影响更大，效果更好。所以，东北沦陷时期的剧作家，始终想方设法的寻找演出的机会，以扩大剧作的宣传作用。金剑啸在他创办和领导的“白光剧社”，亲自主持排练和导演了他自己创作的话剧《黄昏》和《母与子》，歌颂了东北人民反满抗日的思想感情。当《黑龙江民报》登出了他们演出的盛况后，日伪当局不得不勒令停演，并派遣特务对剧团人员进行监视。但尽管这样，剧团深入人心的演出已激起了人民的反抗意识，在广大人民的心目中点燃了革命的火种。

（三）通过演出不断地丰富创作内容。在东北沦陷初期，因为剧团创办的很少，所以戏剧创作主要是以在报刊上发表产生

影响。等到剧团在各地创建以后，戏剧创作就不再是以发表为主要目的了。当时，由于各剧团争着使用剧本，所以创作就成了当务之急。可是因为能执笔创作的人很少，加之有些人匆匆写出来的作品质量又较差，所以就需要在排练和演出中不断丰富和提高。如果说1936年以前大多数剧团还都以排演一些中外现成的剧目为主的话，那么在这之后就转为以自己创作的为主了。自己创作的剧作要想既瞒过日伪的审查，同时又具有反满抗日的爱国思想，这是很不容易的。于是东北沦陷时期的戏剧家们，在排演中不断丰富自己的创作，从主题到情节，从对话到独白，都修改和增加了一些不易被敌人发觉的内容。如描写黑暗影射侵略，以小“仁丹胡”来表示日本侵略者的形象等，都起到了打击敌人、教育人民的作用。在众多的作家中，李乔对于创作和演出的关系结合的比较好。他的大部分剧作开始都有蓝本，有的是先发表后演出，有的是先演出后发表，无论怎样，他的剧本都要经过演出进行认真的修改。比如他创作的独幕话剧《紫丁香》，于1940年发表在《新满洲》月刊上，该剧在他和金山龙担任编剧的“国际剧团”排演时，前半部分增加了不少人物的对话和动作，后半部分大段的删掉了人物冗长的对话，并增加了许多场景的描写和说明。这样，就使剧本更加精炼，同时也更适合于舞台演出了。

东北沦陷时期的戏剧就是这样在演出和创作的相互促进中，不断的积累经验教训，艰难的提高自己的创作和演出的水平。

第三，坚持隐晦曲折的表现手法是当时戏剧创作的主要特点。文学采用隐晦曲折的艺术表现，不足为奇。对于这一点，恩格斯早有论述：“倾向应当是不要特别地说出，而要让它自己从场面和情节中流露出来，作者的见解愈隐蔽，对艺术作品来说

就愈好。”可是，处于殖民文艺统治下的东北，“倾向”的隐蔽，不单纯是作家的一种艺术追求，更重要的是当时政治的需要。在某种意义上说，东北沦陷时期的戏剧，正是因为注意了这一种“需要”，才艰难的发展起来。

在运用这种手法进行戏剧创作时，有的作家在隐蔽对现实的针对性上下功夫，有的作家不去深挖作品的内容和主题的含义，也不对有明显抗日倾向的情节做过细的描写，而是从时间的错位和淡化背景上隐晦曲折的反映生活，避免由于过分的暴露而引起敌伪的警觉。因此有不少作品是以普通家庭的不幸、小知识分子的穷困潦倒、青年男女爱情纠葛的悲剧等比较平淡的生活琐事，暗示日本侵占东北后的现实生活；也有些作品是通过烟鬼、酒鬼、赌徒、小偷、骗子等丑恶形象，来曲折地表现沦为日本殖民地后东北人民的心理变态；还有些作品是借地主对农民的压迫，市侩人物的攀高结贵，土匪结伙成帮的骚扰等，来暗示日伪所鼓吹的“王道乐土”和“五族共和”的罪恶实质。如金剑啸在《穷教员》中虽然反映的只是两个知识分子的不幸遭遇，可是由于作家把这两个知识分子穷困潦倒的命运造成了一种氛围，通过艺术的渲染，使人必然联想到全体劳苦大众的穷困，并且在结尾处接连以“我们活着的呢？（幕慢下）我们活着的呢？（幕全下）我们能等着这个死么？”三句有力的问话，点出了主题，示意出反抗。安犀和李乔的剧作虽然没有这么明显的政治倾向，但是用曲折暗示的方法表现、暴露和反抗的主题却是同样的。

当然，东北沦陷时期的戏剧尽管在十四年间有很大的发展，但是比较起来还是缓慢的、曲折的，而又十分艰难的。因此，从它的复苏到发展以至出现了相对的繁荣，都包含着人民的血泪、作家的汗水、烈士的生命，同时这也是东北人民抗击日本侵略的铁证。

回忆伪满时期
我参加话剧活动的片断

鲁　特

我原名刘世普，由于从小喜欢唱歌，爱好艺术，对其它全不感兴趣，以致家里先后送我去营口学医、学商，都半途退了下来。由于爱好唱歌，1939年我结识了营口“春风音乐社”部分成员。时常被邀请去电台播放音乐和歌曲。后来营口组织业余剧团，我和“春风音乐社”的其他成员：李健野（原名李实）、张黎光、李笑（女）、杨玲等参加了剧团。我曾参加演出了古代题材的歌舞剧《羊角哀与左伯桃》，独唱《天伦》，还和李笑对唱了《啊！苏三》等歌曲。不久，剧团停止了活动。

1941年秋，鞍山地下党派左翼剧作家阎力夫同志到营口。他听说营口曾有个业余剧团演出效果还好，就特意来招聘演员。经李健野（和阎力夫是“连襟”）的介绍，我们相识了。阎力夫说他们要在鞍山成立专业剧团，希望我们去参加，因为我非常爱好艺术，就欣然地答应了。同年冬天李健野、张黎光、李笑、杨玲和我一同到了鞍山。

到鞍山后，阎力夫给我们介绍了一位叫回苏的同志，并又在当地招考了一些演员，有王白露（女）、马春霞（女）、杨苹（女）、王演、老黄和伪警察老安和老关，还有从关里来的老曲（我们知道他是八路军）。老曲不懂艺术，说话还口吃，只能做些事务工作。由鞍山铁西代书事务所老马头（大家都叫他马叔）当财东兼团长，成立了“鞍山众声剧团”。马叔也知道回苏

和力夫是从关里来的八路军，但他非常爱好艺术，思想也比较进步，所以他也让他的女儿参加了剧团工作。

1942年春天，阎力夫完成了话剧剧本《警惕》。经过排练在鞍山正式演出了。该剧的内容是反映一群青年失业后，生活无路，思想苦闷，因而吸上了鸦片和“海洛因”，住在一个贫民窟里。主题思想是这些青年对现实不满，要戒掉鸦片，为寻找工作和争取生活出路而斗争。阎力夫饰剧中的主要角色——吸鸦片的青年，我也饰吸鸦片的青年，李健野当舞台监督，老曲做剧务。在当时讲这是一个很进步的剧本。演出后，在进步思想文化界中颇为震动。很显然，在当时的社会制度和政治气候下办这样的剧团，无论从组织上和经济上都是不能巩固的，也是不可能长期存在的。话剧《警惕》只演出了几场，剧团就陷入瘫痪状态，本地的演员守家在地在生活上还好一些，一些外地的演员衣食住便发生了问题。换季的衣服有困难，有时吃不饱饭。但一些演员为了艺术追求理想而忍饥挨饿，精神上还是非常乐观的。阎力夫家住在鞍山，但他在剧团同我们同吃同住。有一些人包括剧团中的两名警察演员也知道阎力夫的身份和回苏的关系以及剧团的政治背景，而且阎力夫讲话常流露出革命味道。但他俩认为我们这些人都是穷光蛋，况且中国人同受日本帝国主义的压迫与奴役，有着共同的民族心理和感情，便也没有做出对不起我们的事来。

阎力夫不但擅长写作，而且健言谈。当我们为剧团恢复或重建无望而苦闷时，他在宿舍里几乎每天晚上给我们讲关内抗战的胜利消息和八路军宣传队战地演戏、宣传情况，以及一些左翼文艺工作者的进步文艺活动。我们听得入迷，感到欣慰，从而又羡慕又向往。他的讲话有很大的说服力与鼓舞力，其目的是激励我们克服暂时困难，坚持斗争，争取美好的前途。同时

也宣传革命文艺工作的重要意义。回苏也常到剧团来看我们，他懂艺术，常和我们谈有关艺术问题。

解放后，在外调时才从鞍山烈士纪念馆档案中查到回苏的全部活动资料。回苏同志是当时北平市委派到东北地区三股地下党组织（南满、中满、北满）之一的负责人。回苏属于南满地下党组织，叫“敌区工作委员会”。由回苏、郑启石、杜介雨三人组成。首先派到锦州，后来回苏到了鞍山，在鞍山铁西开个小书店做掩护。

在鞍山时，虽感到再成立剧团没有希望，生活又非常艰苦，但我和李健野等人坚持学习。回苏和阎力夫介绍给我们进步的书籍看，我每天早晨风雨无阻地到郊外野地里去练声，探索歌唱方法。其间又认识了一位海城县老王（名子记不清了），他和德国人学过声乐，歌唱理论水平较高。他教我练声曲《柯露宾格安》，他唱的音阶、音程、节奏非常准确。他还教我唱舒伯特作曲的《魔王》，进一步启发我对“美声唱法”的喜爱，使我在歌唱方法上又前进了一步。

突然有一天，鞍山伪警察局有一位警察告诉我，说营口警察局有人来信要抓我，说我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剧团，是共党嫌疑分子。回苏和阎力夫听到这个消息，立即把我安置到辽阳一个熟人的菜店去躲避，鞍山那位警察向营口警察局回信说：“此人已不在鞍山了。”我在辽阳住了一个星期，风声平静后，阎力夫通知我又回到了鞍山，阎力夫给我改个名字叫鲁特，一直用到现在。

剧团中的外地演员，感到剧团再恢复或重建已经不可能了，一部分人便离开鞍山回家了。本地的演员也不到剧团来了，这时只剩下阎力夫、李健野、张黎光和我。回苏仍在鞍山。

阎力夫不但是剧作家，也是社会活动家。他几次去长春

（当时叫新京）、哈尔滨活动想再组织剧团。最后人托人托到伪满国务院一位姓孙的当剧团的“后台”，又在“满映”请了一位姓白的导演。事情有了眉目，于1942年春天，阎力夫带着李健野和我，还有王白露、郭紫葵、张黎光等人到了长春（老曲已因病故去）。在长春又招了一部分演员（其中有现在我省科教电影制片厂的韩忠同志，他当时任舞台美工），成立了“共荣剧团”。经过排练演出了阎力夫创作的话剧《血债》。内容是反映南洋华侨反英美，实际是影射反日的。我饰剧中的南洋华侨青年雨竹（意指在阳光雨露的滋润与培育下迅速在成长），李健野饰老华侨。这个戏演出后也受到了进步文艺工作者的赞扬。也有人惊讶地说："竟敢演这样戏！"这是因为戏本带有左翼作家的风格。伪满国务院那个姓孙的看到演出后，又听到一些人的反映，不敢再当这个剧团的“后台”了。因之经济上也失去了支持，只演一两场，剧团也就不宣而散了。这时演员在生活上比鞍山时更加困难。演出的当天演员就吃不上饭，只好外借几个钱够勉强吃顿饭。后来我的上衣袖子破得无法再补，只好剪成短袖。裤子破得（屁股上）露了肉，几个人就有一套像样的衣服上街时换着穿。有些演员坚持不住纷纷地走了，只剩下阎力夫、李健野和我。

在长春期间回苏从鞍山来看过我们几次，谈了关内外的斗争形势并交流了一些情况。

在长春演出《血债》时，因为没有乐队伴奏，有时我便在换幕时清唱《夜半歌声》、《天伦》等歌曲。

在长春不但不能组织剧团，就是吃饭也成了重大问题。于是，1943年冬天我到了哈尔滨，直到1945年11月参军。

（摘自辽宁省《文化志资料汇编》第2辑）

沈阳话剧活动的滥觞

弓　月

荒原上出现的萌芽

"九·一八"事变以后，在入侵强敌的铁蹄蹂躏下，仅仅初见萌生的新文艺幼芽，自然经受不住严霜的摧残而枯萎下去。那时，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的东北人民，不仅物质生活十分困窘，精神生活也极端饥馑苦闷。然而，越是被窒息的人们越要挣揣。目睹祖国新文化濒于覆灭，许多有胆有识的东北青年不甘默默，"五·四"运动的思潮尚在他们胸中激荡，又兼看到的30年代进步电影，以及从关内偷运来的新文学书籍，也给了他们以力量和鼓励，他们便利用敌伪允许出版的某些报纸、杂志和书籍的条件，开始执笔写作。例如1934——1936年间，王肖然、惠全安、李乔、李牧之、陈育华等青年曾在沈阳基督教青年会自动组织过读书会，在《民报》出过文学周刊《平凡》；成雪竹、姜灵飞等出过《冷雾》、《萝丝》；王秋萤、佟子松、袁犀、山丁、田兵、杨野、李乔等组织过写作同人的创作刊行会，私人筹资分别出版过同人刊物《文选》、《文景》、《文颖》、《作风》、《满洲作家论集》。此外在《盛京时报》、《民声晚报》、《大亚公报》、《新青年》等报刊上还发表过许多文艺作品。当然，这是在敌人的严密监视下，难免要有所迂回，采取一些隐喻曲折的手法，这是可以理解的。奉天同东北其他地区一样，新文艺活动都是在这样相当复杂的情况下展开的，新兴的话剧自然也是在这样的

历史背景和文学气氛中破土而出的。

奉天的话剧，在沦陷区的新文艺活动中，算是跳出书刊走到群众中去的一颗新苗，最初是由广播剧开始的。伪满各大城市相继成立了放送局（即广播电台）。1936—1941年间，首先由成雪竹、徐柏灵、李乔等人利用奉天放送局的阵地，组织了业余性的放送话剧团，成员有吴春子、安犀、张艺、白薇、金莹、孙小环、张学敏、高英等人，先后编演了《夜歌》、《姜家老店》、《夜深沉》、《家乡月》、《紫丁香》等几十个短剧。不久，长春、大连、哈尔滨、安（丹）东等地的电台，也相继出现了放送话剧团的组织。他们之间，除有部分剧本交流外，没有什么联系。

在白纸上画一个记号

东北沦陷区的舞台上出现正规话剧，以长春为最早。从1934年间，日本戏剧家藤川研一（化名王清）创立了专业性的大剧团，其主要成员有于文秀、白穆、邓固、崔似愚、崔若愚、王秋颖、苗映、鸣石、莲子等人。他们常做巡回演出，曾先后来到奉天演出《雷雨》、《情天壮志》、《林则徐》、《吴三桂与陈圆圆》等剧。这些演出，给了奉天剧人以很大的促进，他们也都跃跃欲试，想使自己的话剧活动更进一步，从有声无形的广播中搬上舞台与群众见面。终于1938年秋季，由李乔、安犀、徐柏灵、成雪竹、成聪右、田菲、潘玉奎等人，利用伪满协和会的场地，组成了业余性质的协和剧团。当年排演《少奶奶扇子》未成，只演了安犀编写的独幕话剧《三代》，成为奉天产生的第一个小规模演出的舞台话剧。

首次大规模的公演，是在1939年春季，奉天放送话剧团从电台走上了舞台。他们靠私人借债筹资，在光陆电影院演出了

三个独幕剧《夜歌》、《夜潮》、《野店恩仇记》。主要演员有白穆（他是脱离大同剧团来奉参加演出，然后去上海的）、杨毅、李雪娜、吴春子、石超、张艺、白薇等人。当时在公演刊物上提出的口号就是："向寂寞里投一点声音，在白纸上画一个记号。"这次公演，上座极多，观众拥挤不堪，演出的影响是比较大的。不久，首先在奉天，然后在抚顺、安东等地自发组织的业余话剧团体纷纷涌现。尽管他们的规模大小不一，表演水平参差不齐，毕竟属于一种新生事物，因而渐能引起群众、特别是青年们的浓厚兴趣。

话剧团生生灭灭的命运

1939年夏季，金山龙、杨若呆、王宗仁、李鸥等人创立了沈阳业余话剧团，上演了丁西林的独幕剧《无妻之累》。后与奉天放送话剧团合并，改名为国际剧团，由李乔、金山龙任编导，经常在南市场的国际剧场（即今辽宁人民艺术剧院）演出。上演的剧目有《屠户》、《塞上烽火》、《夜深沉》、《生命线》、《血刃图》、《邻家女》、《正在想》等。并曾去锦州、抚顺等地做过旅行公演，算是历时较久、演出较多的一个业余话剧团体。

当话剧已被群众广泛接受之后，上演的剧目也就渐从小型发展到大型的多幕剧；话剧活动的组织也由业余向着专业发展。原在1938年秋成立业余性的协和剧团，到1939年9月由日本人上原笃主持筹建职业剧团，后台是伪满协和会，成员是以伪市政府中积极参加话剧活动的职员为骨干，其中有孙序夫（孙北）、丹玛（现名高岚）、盛世荣（盛希）、王书翰（王全）、关桂文（关桂）等。并在光陆电影院公演了三幕话剧宣传禁吸鸦片。后来又吸收了李凌、吴融、孟南、白辛（原名吴宇洪）、陈维昌（阵人）、封顺、黄玲、胡雁、姚颖、刘白、李瀛等男女演

员，正式组成专业话剧团。这是当时沈阳唯一的一个由协和会官办的职业话剧团，也是规模较大，阵营较强的剧团。从1940年开始，在奉天公演了曹禺名著《雷雨》之后，1941年到1943年先后去长春、哈尔滨、吉林、大连等城市巡回演出了《雷雨》、《萌芽》、《欲魔》（托尔斯泰的《黑暗的势力》）、《生财有道》（莫里哀的《悭吝人》）、《边城的故事》、《废墟》，以及一些独幕话剧《归去来兮》、《放弃》等等。1942年曾在奉天公演了《怒吼吧，中国》，这是苏联作家的名著。剧本内容是揭露英美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罪恶历史。日本侵略者演出这个剧的本意，是想宣扬英美列强蚕食中国的罪恶，藉以激发中国人民对英美等帝国主义的民族宿恨，为日本强盗掀起的东亚血腥战争张目。但是，演出效果适得其反，剧中的故事情节，反而更加激起广大观众对侵华日军的无比仇恨，观众争相来看，上座空前，这使日伪统治者大为惊恐，不得不很快地勒令收场。日本侵略者为抵消这一宣传上的失策，急急忙忙地由剧团的日本人端山进无中生有地编造了一部多幕话剧《渤海》。伪造了日本人在渤海湾"协助"中国人反对英美帝国主义海盗的"故事"，结果，观众不买帐，十座九空，又不得不草草停演。到1945年日本发动的东亚战争连遭惨败之后，为加强战争动员竟把剧团化整为零，分成了三个小组分赴各个工厂搞所谓慰问演出。这就是在日本军国主义者侵略政策的豢养下，专业话剧团生生灭灭的必然命运。尽管如此，原先的协和剧团也造就了一批戏剧运动的人材。如白辛、黄玲、高岚、陈维昌等人，经过革命文艺队伍的锻炼，为新中国的话剧、电影事业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1942年，经伪市政府弘报处主持，组织了一个以伪市政府职员为主要成员的剧团，名为"奉天剧团"（业余性质）。成员有成聪右、高纯、张凡时、刘枫、盛世荣等人，搬演了匈牙利

剧本《善行》和短剧《秋阳》(即李健吾的《回家以后》),并演过广播话剧。这也是延续时间较长而且较有成绩的业余剧团。

业余剧团难处多

当时除协和剧团转为专业剧团以外,都属于业余性质。经营业余剧团在当时是困难重重的。

1. 资金难筹:业余剧团不像专业剧团那样有经济来源,往往要依靠有力者的热心支持,否则便不得不借债。在开支上力求节约,服装以及大小道具,完全靠发动团员东求西借。如演出的收入有余,大家分文不取,除积累一部分作以后的演出资金外,就组织联欢聚餐或旅游。如若首演亏累,就只有一条路——散伙。

2. 人员散漫:业余剧团的成员是相当复杂的,一部分人是为了消遣、玩玩,高兴就来,不高兴就不来或晚来,甚至一个戏刚刚排好或正在演出,某个角色就中途退出。诸如此类,使剧团的组织难免松散,纪律无从要求。

3. 封建阻力:许多有志青年,往往遭到家庭牵制,尤其是姑娘们抛头露面粉墨登场,常被父母亲友看作是耻辱,不准到剧团去,以致剧团网罗人才不易。

4. 审查严密:那时要上演一个戏,必须事先把剧本送交警察局特高科审查,名曰"检阅"。审查是逐句逐字地分析,非常严密。发现稍有问题,不但不准排演,还要危及剧作者的安全。即使上演以后,特高科还要派人审查演出效果,有问题时,连同导演和演员都要承担责任。值得感谢的,是那些伪检阅官们,在文化方面都是南郭先生,没有文学常识,抓不到点子上,有时提出的意见,令人啼笑皆非。例如他们对于舞台上演的熊佛西早年所写的独幕剧《屠户》,竟误为新编剧作,曾经指责剧中

的屠户是影射日本人，有反满抗日之嫌。别看这群混蛋很讨厌，在他们装腔作势之下倒也有隙可乘。

当然专业剧团也要履行检阅制度。不过，专业剧团的主持者都是日本人，对他们总比对业余剧团的中国人放心，从而要求也就放宽多了。

5. 日伪警宪特务以及地痞流氓的干扰：这些人惯于作恶欺人，常常在演出时到台上台下乱窜，招待不周，张口即骂，举手就打，这类干扰是屡见不鲜的，剧团只好想方设法应付。

外地话剧团在奉天演出情况

随着演出活动的日渐频繁，除奉天的专业和业余剧团外，还有新京（今长春）大同剧团上演了李乔的剧作《夜航》；兴亚剧团演了《紫丁香》；哈尔滨北斗剧团演了《生命线》和《紫丁香》、《家乡月》；新京放送话剧团演了《夜深沉》等剧。

在此时期，上海的影剧剧人傅威廉、马陋芬、白云、尤光照、汤杰等人也常常趁机组织剧团来到东北演出。他们北来的目的，并不在于交流文化，而在于利用东北人民对上海影片的迷恋心情，临时搭班前来"淘金"，他们所演的剧目，不过是《王先生》、《挑帘裁衣》等无聊杂剧。他们在东北各地转上一圈，就可以饱载而归，给人们留下了很坏的印象。不过，后来的上官云珠、韩非、贺斌、毛燕华、周刍以及顾兰君等上海影剧人演出的《恋爱与阴谋》等剧，却是完全正规的，获得了各地的一致好评。

剧本的创作

在沦陷时期的东北各地，从事文学创作的人并不多，其中致力于编写剧本的人为数更少，局限到奉天一地，那就更无几

人了。特别是这极少数的剧作者，都在刚刚习作，还放不开手脚，所以在话剧活动开展的初期，上演的独幕剧偏多，直到几年以后，奉天的剧作者安犀、李乔等人开始创作多幕剧。因此，各地话剧团体，当时都感到剧本缺乏，不得不较多地搬演上海等地出版的现成剧本或外国的译作。

虽说成绩不大，那些年奉天的剧本创作可也稍稍留下了一些“声音”和“记号”。就剧本的主题内容来说，现在尚能回忆起来的，有以下一些作品：

《野店恩仇记》：独幕，安犀作，奉天放送话剧团演出。描写一个受陷害的人于深山老林里偶遇仇敌，爱憎分明地进行复仇和报恩。

《三代》：独幕，安犀作，协和剧团演出。描写三代人三种不同思想展开一场矛盾冲突。

《归去来兮》：独幕，安犀作，协和剧团演出。描写农村妇女进城后思想蜕变。

另外安犀还写了独幕剧《清明节》、《晚钟》，内容已忘记。

《夜航》：独幕，李乔作，载于《满洲文艺》创刊号，大同剧团演出。以喜剧手法描写一些社会小丑围绕一笔财物施展伎俩巧取豪夺，外来的强盗作了“主人”，真正的主人反而成了“窃贼”。

《塞上烽火》：两幕，李乔作，新京放送话剧团及国际剧团、北国剧社演出。描写受迫害的人们，在同命相怜中化仇为友一致御敌。

《生命线》：独幕，李乔作，载于《文最》，国际剧团及北斗剧团演出。揭露社会上层人物的龌龊行径与依赖上层人物舍耻求食的伪君子们的丑恶灵魂。

《紫丁香》：独幕，李乔作，奉天放送话剧团及北斗剧团演

出。描写一种囿于流俗的人，为了金钱，巴结权贵，出卖至亲好友。

《夜歌》：独幕，李乔作，发表于《盛京时报》，奉天放送话剧团演出。描写吸食鸦片的人，严重拖累了病父和妻儿的悲惨情景。

《家乡月》：独幕，李乔作，发表于《盛京时报》，奉天放送话剧团及北斗剧团演出。描写受欺压的农民，愤而杀人外逃，深夜归家探亲，误伤亲生子的悲剧。

《长白山》：五幕，李乔作，北国剧社演出。描写一个地质学家找到富矿请求开采，遭到旧政权拒绝，在走投无路中，被帝国主义分子拉拢合作。以后他认识到有损国家利益，坚决与洋人斗争，撕毁合同，收回权利，交付给第二代人。

《罂粟花》：独幕，叶白波作，国际剧团广播。描述一些被环境压得难于生活而又必须生活下去的人们的苦衷。

《逃妇》：独幕，青年女作者单蕙作，载于《文选》，未演出。描写妇女争取婚姻自由的心理和情态。

另外还有一些短剧和改编上演的现成中外剧作，不再详述。

创作与演出的评价

沦陷时期奉天的话剧活动，无论是剧本创作方向或演出方式，都存在着若干局限性，往往不能与祖国各地的形势合拍，不能与时代的脉搏共同跳动。由于东北沦陷区与其他各地隔绝，很少往来，这里的剧人对于各地文艺思潮的发展变化如何，多数是茫然的。他们本身既缺乏应有的理论指导，又难于找到可以借鉴的楷模，因而创作的剧本，差不多都是抒发个人感怀信笔摸索的习作。敌人企图利用这些文艺工作者为其侵略服务，而这些工作者却是极力回避他们的国策，王顾左右而言他。如此

躲躲闪闪，也很难掌握正面反映现实的题材，即使有所揭露，有所抨击，那也只能是隔靴搔痒，顶多够得上资产阶级现实主义的暴露文学，一般都没有什么指导性和方向性。在结构上，往往也只是墨守三一律，仿效19世纪西方戏剧的模式，带有一定程度的旧式话剧色彩，不可能有什么新的突破。

这一时期，正值大江南北抗日救国运动高涨，话剧活动普遍形成了热潮，许多剧作家可以尽情发挥爱国热忱，写出激昂慷慨气势磅礴的戏剧，为激励人心抵御外侮做出巨大贡献。对比之下，东北的剧作者却相形见绌，他们是处在沦陷区的恐怖统治之下，写出的作品，常常是贫弱无力，更是缺乏战斗性，很不适应历史时代的要求。那时即使有人写出响应抗战的剧作，不仅会涉及作者的安危，实际也不可能公之于众。

不仅如此，有些剧团还在被动或主动的情况下，编演过一些配合侵略战争、征召“国兵”、勤劳奉仕（义务劳动）、出荷（征粮）等助敌宣传的节目，而这些东西也是最为人民群众所鄙弃的。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有的剧团就搬演名著，借招牌而加以篡改，取名叫“翻案戏”。如奉天协和剧团曾在1942年冬季演出托尔斯泰的《欲魔》（黑暗的势力），将原著的主人公尼基达改名为李奇，把他求恕于上帝改为向警察官自首，以其遭受法律制裁为“得救”。这种篡改损害了原著的艺术价值，演出也以失败而告终。

总的说来，沦陷时期沈阳（奉天）的话剧活动是成就不大的，在全国的文化历史长河中，它无非是一闪即逝的一个泡沫。不过，它在这片莽莽的荒原上，毕竟是起了一点开拓作用，填补了这一历史阶段这一特殊地带的空白。

到了1941年，伪满国务院弘报处发布了《文艺指导纲要》，要把所有的文艺活动严格控制在他们手下，强迫歌颂所谓的

"王道乐土"。从此以后，沈阳的话剧活动也同其他文艺活动一样，立刻由高潮转入了低潮。沈阳解放后，这里的话剧才走上正轨，蓬勃发展起来，看今日剧场拉开大幕展现出来的堂皇场面，我们确有不胜今昔之感。

（摘自《沈阳文史资料》第三辑）

唐韵笙在吉林

高忠义

唐韵笙（1903—1970年），京剧演员，文武老生兼红生，原姓石，名斌魁，满族，祖籍东北。因随义父唐永利学戏，故改姓唐。十岁在沪首次登台演出，后到北京"喜连成"科班"富"字科带艺入科。为时不久，自己挑班流动在青岛、济南、天津，以后长期演出于沈阳、吉林、哈尔滨、大连、营口、齐齐哈尔、海参崴等地，在东北享有盛名，与周信芳、马连良一起被时人并誉为"南麒北马关外唐"。唐韵笙曾先后六次到吉林演出，给人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唐韵笙能戏甚多，生、旦（彩旦、老旦）、净无一不精，功底深厚，文武不挡，嗓音高亢嘹亮，在一个戏园子里能够一年内不唱回头戏。尤以自编自演的《东周列国》戏著称。他自编自演的戏，需要高超的技艺，别人难以演唱；而别人唱的戏，他都能唱得更好。为此，官府曾送他一个"独树一帜"的幛子。他常常在一个晚会"一赶四"的演出。如《大报仇》饰黄忠，《造白袍》饰张飞，《祭灵牌》饰刘备，《连营寨》饰赵云。自编自演的戏有：《兴周灭纣》、《闹朝扑犬》、《绝龙岭》、《好鹤失政》、《二子乘舟》、《驱车战将》、

《未央宫斩韩信》、《小霸王怒斩于吉》、全部《白帝城》、《张果老招亲》、《尧舜禹汤鉴》、《怪侠除奸记》（三十六本）和《目莲僧救母》等。他在吉林创编的《目莲僧救母》，首创用白话文写唱词，大受观众欢迎，是上座率最高的一出戏。

一

1932年，唐韵笙第五次来吉林，在新庆大戏院（原斯美茶园）组建"育凤馆京剧团"。班底有老生周亚川，文武老生周仲博，武生周少楼、张海涛，小生张菁华，花脸杨永竹，旦行王美君、孙丽君，丑行王少伯等。戏码扎硬，有《闹朝扑犬》、《金鞭记》、《鹊桥相会》、《走麦城》、《陈十策》等。这时的唐韵笙年40岁，气沛声宏，张嘴能唱两个眼、三个眼。那是夏天，溽暑蒸人，剧场门窗大开，唐韵笙扮闻仲，在《绝龙岭》中唱"倒板""将人马扎在山角，待某观看"，声音高亢入云，连在数百米之外德胜门乘凉的周仲博等几位没上戏的演员都听到了。周仲博惊叹道："唐韵笙的嗓子太棒了！"

农历七月十五日中元节，俗称"鬼节"，演出了应节戏——唐韵笙改编的全部《目莲僧救母》。由周仲博饰目莲僧。在目莲僧游地狱一场，唐韵笙运用影射手法，把现实生活的种种弊端巧妙地折射到鬼魂世界，刻画了大烟鬼、白面鬼、摩登鬼（交际花）、吗啡鬼、酒鬼、小偷鬼等等鬼蜮形象。讽刺日伪专制暴政下人生世相的黑暗腐败。唯其替老百姓出气，深受欢迎，成为此番在吉林上座率最高的戏。此后，该剧在奉天、上海亦颇受欢迎。

唐韵笙为了让观众看得懂，领会深，特意在编脚本时第一次改用白话文写唱词。这种通俗化的尝试，表明唐韵笙创作的着眼点是一切为了观众。

二

1939年，唐韵笙在吉林新庆大戏院成班演出，于此同时，又组建了“育凤剧社”，除每天坚持正常演出外，致力培养人才，提高表演艺术水平和创编排演新剧目。由唐韵笙亲任社长，广为收集人才，生旦净丑行当齐全，实力非常雄厚，为普及和提高京剧艺术做出了重要贡献。

唐韵笙在教学中，识才善教，言传身教，传真不传假，教戏又教功。他经常告诫同学：“师傅领进门，学艺靠自身；人生有时艺无止境；艺在勤学、功在苦练；台上几分钟、台下百日功；书靠念、功靠练、曲靠唱、戏靠演；一招鲜、吃遍天，一招红、吃不穷。”唐韵笙不但重视教戏，还重视育人。时常对大家说：“做人讲道德，唱戏讲艺德，台上做戏、台下做人，台上有戏格、台下有人格，台上观人艺、台下知人德。”各行当在唐韵笙先生的严格教导和谆谆诱导下，受益匪浅。在表演技艺上，各自都有独特的风格和流派。他们之间互相合作，教学相长，艺术造诣与日俱增。这些人后来已遍及长春、沈阳、北京、天津、上海、宁夏等地。其中，不少已成为大有声望的京剧演员。

唐韵笙为培养人才付出了大量心血，使之剧社传演技、艺苑增彩辉，促进了京剧艺术的发展。

三

从1932年到1945年，这十四个春秋正是东北三省沦陷，腥风血雨笼罩东北大地，人民罹难遭灾的岁月。日伪傀儡政权实行文化专制，文网四张，文禁如毛。在这样艰难的情况下，唐韵笙不畏日寇的刀锋和遍地荆棒丛莽，以勇者的姿态踏上了这片燃烧的土地。

十四年期间，他的足迹几乎遍及东北大小城镇。他为了反满抗日，自编、自导、自演了《后羿射日》，一语双关地道出召唤抗日之意。

《后羿射日》反映了上古时，十日当空，禾苗焦枯，百姓无以生存，神箭手后羿奋勇射落九日，为民除害，并保尧帝辅治天下，百姓安居乐业。

唐韵笙饰后羿，该剧灯光布景齐备，"太阳"以电灯照明耀如真日。《后羿射日》台词中有："不除日害、国无宁日"一句，痛快淋漓地喊出了全国人民的心声。

1943年春节期间，唐韵笙在吉林新庆大戏院演出《后羿射日》。一天，伪警察看了这个戏后，认为"射日"的"日"字，是指大日本帝国，于是便立即报告宪兵队，以反满抗日的罪名逮捕了唐韵笙，严刑拷打，说他是地下共产党。为此，吉林广大观众十分愤慨，更为唐韵笙的生命而担忧。

事情发生后，新庆大戏院前台老板管世英和后台"育凤馆"负责人先后找了宪兵队和省警察厅，托人说情，并将演出的全部积蓄拿出来，以重金保出了唐韵笙。唐韵笙被释放后，又闻日本人要抓他枪毙，看来势态不妙，亲朋友好们劝唐韵笙赶紧离开吉林。唐韵笙离开吉林前对大家说"日本鬼子说我反满抗日，倒没有说错，有良心的中国人，哪个不恨日本鬼子，老实说，我编写的《后羿射日》，就是冲着东洋鬼子去的，日害涂炭生灵，不除日害中国的灾难能有头吗？我有意用小花脸的数板连弹骂那群野兽，出出中国人民的气。"

（摘自《吉林省艺术集成/文化艺术志资料汇编》第9辑）

日伪统治时期
各地流传的反满民谣

安希元

“九·一八”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东北后，农民们虽然不敢公然的反抗，但暗地里常发出愤怒的呼声，下面写出几个地方的民谣以窥见一斑。

愁疙瘩

当时日本为了解决用糖的需要，在范家屯设立一个制糖厂。制糖原料是甜菜，俗称甜菜疙瘩。伪满政府指定长春县内各村分担一定数量的甜菜生产，各村就按数量分配给村内农民，按各户耕地面积的10～20%种甜菜，秋收后按种植面积产量进行收购。糖厂规定的收购标准是很严苛的，烂了、冻了都不收，收购的期限也有规定，并不是随到随收。这样就苦了农民，农民本来就没有种甜菜的经验，而且收购的价格又很低，但是又不敢公然违抗，只好忍痛含辛把自己种粮食的土地种植甜菜。甜菜收成后因糖厂不随时收购，农民们没有储藏的场所，放得久了，不是烂就是冻，烂了冻了就不符合要求，糖厂也就不收了。结果有些农民忙活了一年，到头两手空空。所以一般农民把甜菜叫做“愁疙瘩”。意思是说种了甜菜，心里就结了个愁疙瘩。每到春天种地时农民们一见面先要问：“今年你种几亩愁疙瘩？”这个问话并不是取笑，其中蕴藏着许多辛酸苦痛。久而久之，在农民间便流传着这样一个民谣：“春天种疙瘩，心里结了个愁疙

瘩。收回烂了送不出，冻了也白瞎。哎呀咳呀呀，什么时候解开这个愁疙瘩？”

捅 楼 子

当时锦西各地种黄烟，一般也按耕地面积比例种植，黄烟秋收后，必须用火烘干，专卖局才能收购。烤黄烟要先用木材搭起烤烟楼，上面挂黄烟，下面用火烘，经过一定时间才能烘干。烤烟用火不能间断，因此，烤烟的人必须昼夜轮流照看着火候。火大了烟也许烤焦了，火再大了也许把烟烤着了，烟烤着了连楼子也就被烧掉。烤着了烟烧了楼子，这就是闯了一场大祸。不但烟全光了，一年辛苦劳动的果实归于泡影，而且要受到警察的严密调查。如果被认为故意纵火，那就要送进牢里去，轻则受严罚，重则有生命危险。所以农民把烤烟烧了楼子叫做“捅楼子”。捅楼子俗话是惹大乱子闯大祸的意思。农民们往往在搭烟楼子时，一边搭架子一边口里哼着这样的几句词儿：“烤黄烟，搭烟楼，捅了楼子一命休。”

“蝎 虎 会”

当时各村设有义勇奉公队、童子团等组织，统一归协和会领导。协和会基层组织的主要工作是协助警察村政权推行工作，如派劳工、催征出荷粮、修公路和保护公路等。因为基层组织的干事都是当地的地痞无赖，他们对当地情况非常熟悉，对协助警察和村政权执行工作很方便。这些家伙往往利用职权作威作福。因此，一般农民对他们只好敬而远之，谁也不敢得罪他们，一旦得罪了他们，那么，抓劳工、催出荷粮、派工派粮，那就要大吃苦头。因此，农民们都把协和会叫做“蝎虎会”。“蝎虎”俗话是非常厉害的意思。这里把协和会叫“蝎虎会”是借

着谐音说明农民多么害怕协和会。在农民中间流传着这样一个歌谣："蝎虎会，真蝎虎，家家户户受监督。受监督，被搜查，原来他们是警察。"

出 荷 粮

伪满的粮谷出荷给农民带来深重的苦难，蛟河县农民对出荷粮流传着这样几句歌谣："出荷粮、出荷粮，出荷完了精光光，再拿什么养活我爹娘？"

三

日伪控制下的
新闻、广播与出版

东北沦陷时期的广播电台

吉林省广播电视厅史志办

东北沦陷时期，日本关东军司令部和伪满洲国在吉林省境内先后设有4座广播电台，即新京放送局、吉林放送局、延吉“间岛”放送局、通化放送局。这些广播电台是由伪满洲电信电话株式会社（股份有限公司）控制的，宣传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政策，鼓吹“日满协和”，以奴化中国人民，实行殖民统治。

新京放送局

1932年10月，侵略中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司令部由奉天（现沈阳）迁到新京（现长春）。日本关东军司令部特殊通讯部借用新京电话局两个房间，改造成演奏室（即演播室和播音室）和调整室（兼做接待室）。同年10月31日，以奉天放送局新京演奏所名义，通过长途电话线路将广播讯号传到奉天放送局播出。它是新京放送局的前身。

1933年4月3日，经过一段时间筹备的新京放送局开始播音。呼号为MTAY，发射功率1千瓦，频率570千赫，波长529米。广播发射台是由原设在东三马路的收发报用的无线电台改造成的。新京放送局初期，每天晚17点钟开始播音（星期六或节假日从上午9点开始播音），除转播日本东京中央放送局的部分日语节目外，自办节目有《新闻》（包括汉语、日语、朝鲜语、英语、俄语）、《儿童时间》、《文艺》、《日语讲座》、《汉语讲座》等。同年8月，根据日本和伪满洲国政府签订的《关于在满

洲设立日满合办通讯公司协定》，在大连设立了合资经营的伪满洲电信电话株式会社，统一经营管理东北的通讯广播事业。这时，新京放送局并入该株式会社，由大连管理处领导。同时，把呼号改为MTCY。

为了扩大对东北境内的欺骗宣传，对抗中国国民政府和苏联的广播宣传，1934年由伪满洲电信电话株式会社筹资，在新京宽城子新建一座发射台，安装了日本电气会社制造的100千瓦长波广播发射机，同时在该株式会社本部大楼内新建了增音、播音室，安装了较好的设备。同年11月1日开始播出，频率180千赫，波长1666米。当时能覆盖东北大部地区，是亚洲大功率的发射台之一。

1935年11月，伪满洲电信电话株式会社本部大楼在新京大同大街601号（现长春市西安大路2号）建成。该株式会社本部即由大连迁来新京。同年11月10日，新京放送局也由长春市南广场迁入本部大楼内办公。这时，新京放送局的内部机构有业务课、技术课。1936年，增设了营业所。

1936年11月，新京放送局的广播发射台新增了一部由日本东京电气会社制造的10千瓦中波发射机，频率560千赫，波长536米。从此，新京放送局开始办两套节目（分第一广播和第二广播），用两个频率播出。100千瓦长波发射机作为第二广播，主要是播出汉语节目，同时也播出一部分英语、俄语、蒙古语节目。10千瓦发射机作为第一广播，主要播出日语节目，有时也播出朝鲜语节目。这时的节目设置，除保留部分原有节目外，新增加了《先哲故事》、《圣典讲义》、《对学校广播》、《对家庭广播》、《协和青年讲座》、《生活改善讲座》等。

抗日战争爆发以后，日本帝国主义加强了对伪满洲国广播宣传的控制。同年7月又增设了《时事解说》等节目，并随时插

播殖民主义的政治口号。东北地区的广播宣传以新京放送局为中心，广播节目由它组织编排，统一播出，各地方放送局实行联播。并把广播节目分为甲、乙、丙三种节目。规定：甲种节目占全部节目的85％，地方放送局必须一律转播；乙种节目占10％，这类节目未经许可，地方放送局也不得随意变更，要一律转播；丙种节目占5％，在此规定时间内，各地方放送局可以自由转播，或播出地方性节目。凡属涉及国际性、伪满洲国的重要新闻报道、言论和政策性的讲话等，都要由新京放送局组织、编排和播出。1938年5月，新京放送局升格为新京中央放送局后，隶属伪满洲电信电话株式会社新京管理局领导，内设机构除保留庶务课、技术课，新增设了主管广播宣传的放送课。

为了加强国际广播，接管大连中央放送局的对外宣传任务，新京中央放送局于1939年6月和1940年7月在宽城子广播发射台增设了两部20千瓦短波广播发射机，使用汉、日、蒙、俄、英（有时使用德、法语）等语言，分别对远东、欧洲、北美西部、中国南部、南洋、海峡殖民地（马六甲海峡附近）、澳大利亚等地广播，每天广播4次，全天播音3小时55分钟。1940年1月，新京中央放送局为进一步加强对内对外宣传报道工作，调整了内设机构，除保留原有的庶务课、技术课外，将放送课扩充为三个课，即报道课、国际课、学艺课。同时，增加了工作人员。1941年1月8日，在对欧洲广播中开始定期的德语广播。最初每周三、六两次。同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后，新京中央放送局进一步扩充了反苏反共的宣传，延长了俄语广播时间。同年8月，又调整对外广播，对上述地区都增加了广播时间，其中德语广播时间延长到每次30分钟。

日本对美、英等国宣战后，为使广播宣传适应“大东亚圣战决战体制”的要求，实行了“日满一体化”的严格控制，新

京中央放送局对战况的报道、舆论的统一、对外宣传等方面都做出新的规定：各地方放送局只许转播新京中央放送局统一编排和播出的节目，不得播出自办的广播节目；将每天第二广播（主要是汉语）中的《新闻》节目增加到10次，并随时中断正常广播，插播日本东京中央放送局的临时新闻；第一广播（日语广播）全部转播日本东京中央放送局的节目。为了从领导体制上加强对广播宣传的直接控制，伪满洲电信电话株式会社把本部放送课与新京中央放送局合并，于1943年4月组成了本部直属的放送总局。放送总局拥有指导、监督和组织各地方放送局广播工作实施的一切权力。其内设机构有监理课、庶务课、编成课、报道课、国际课、学艺课和技术课。

为了推行和宣传“对付南方决战”（指太平洋战争和侵华战争），“加强北边镇护”（指反苏反共），“强化国内体制”（指加紧对东北人民的思想统治和经济剥削）和“发扬战时生活意识”等侵略和统治政策，1943年春，新京中央放送局举办了大型“农村新年”特辑节目，加强对农村的广播。同年2月17日至19日，连续三天播出了日本关东军报道队录音班采制的日军守卫北方的报道。同年5月用一周时间，反复宣传“防空生活化”的要求。为了灌输对“职域（工作岗位）即战场”的意识，从6月1日起在广播中增设了《产业体操》节目。在第二广播中举办了两次所谓“慰问产业战士”文艺广播晚会。这一类奴化宣传，一直延续到1945年8月15日东北光复。

吉林放送局

吉林放送局前身是新京放送局吉林演奏所。1934年11月，吉林演奏所将借用的吉林市电报电话局的房间改建成演播室和调整室，通过长途电话线路，向新京放送局传送广播节目。

1944年4月，吉林放送局开始筹建，12月试验播音。1945年2月，正式播音。呼号MTWY，使用两部50千瓦中波发射机，频率分别为725、1 160千赫。地址在吉林市南大马路（现重庆路62号附近）。吉林放送局设有汉语和日语两套节目，主要是转播新京放送总局编排的节目。

吉林放送局隶属伪满洲电信电话株式会社新京管理局领导。

延吉“间岛”放送局

延吉放送局于1938年4月1日开始试验广播，呼号MTKY，发射功率10千瓦。地址在伪间岛省延吉县延吉乙字街（现延吉市光明街）。同年11月1日，改用大连义昌无线电公司制造的200千瓦中波发射机正式播音，频率785千赫，波长382米。

延吉放送局初期采用汉语、日语、朝鲜语混合广播，以日语广播为主。除转播新京中央放送局的《新闻》节目外，还转播新京中央放送局和奉天中央放送局的讲演、文艺等节目。

1942年11月1日，延吉放送局增设一部50千瓦中波广播发射机，频率1270千赫，开始办两套节目，使用两个频率。新设的50千瓦广播发射机为第一广播，以日语为主；原有的200千瓦广播发电机为第二广播，以朝鲜语为主，有时也播出部分俄语节目。

延吉放送局开始隶属伪满洲电信电话株式会社新京管理局领导。1942年5月1日，延吉放送局改称“间岛”放送局。从1943年起，“间岛”放送局又改由伪满洲电信电话株式会社牡丹江管理局领导，直到1945年8月15日东北光复。

通化放送局

通化放送局于1940年11月10日开始播音，呼号MTTY，发射功率10千瓦，频率1035千赫。地址在通化大桥区甲58号，后迁至通化市西关外（现新华大街隆发委）。

通化放送局初期，采用汉语、日语混合广播。不久，又增设一部10千瓦发射机，频率725千赫，开始办两套节目，分第一广播（1 035千赫）和第二广播（725千赫）。1941年12月15日，伪满洲电信电话株式会社分配给该台一部50千瓦广播发射机，加强了汉语广播。

通化放送局隶属伪满洲电信电话株式会社奉天管理局领导。

（摘自《吉林省志卷四十一，新闻事业志广播电视送审稿》）

日伪统治下的东北广播

赵家斌*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者发动了“九·一八”事变，在南京蒋介石政府不抵抗主义下，东北大好河山很快地沦陷于日军铁蹄蹂躏之下，接着日本帝国主义便按照它的既定侵略计划，制造了一个伪满洲国。

伪国成立后，日本侵略者马上与这个伪政权签订一项协定，日方出资1亿元，伪方出资6 000万元，合组满洲电信电话株式

* 笔者曾任职于伪“哈尔滨中央放送局”及“新京放送总局”。

会社。

满洲电信电话株式会社成立后，即将东北（辽、黑、吉、热四省）各地的电报电话局以及沈阳、长春、哈尔滨的广播电台掠夺过去，这样，电器系统的通信事业，遂为日人一手所操纵。

满洲电信电话株式会社统辖东北电器通信事业达14年之久。其第一任总裁为广濑寿助中将，他曾担任过江桥血战的指挥官；第二任总裁为山田乙三中将，过去他曾是日本关东军的防卫军司令官（关东军的编制分为野战军和防卫军两方面），不用说是大批日人拥入电电会社并把持所有部门，即由总裁的任命来看，亦可想见日本侵略者对于电器通信事业的异常重视。

满洲电信电话株式会社的业务，分为三个部门，这就是电报、电话和广播（放送）。

在广播方面，最初于电电本社内，置有放送部统辖放送、普及、业务等各课。在放送课内，分为第一放送系和第二放送系，直接指挥着整个东北广播事业。

当时在东北全境内，置有四个中央放送局，即长春（伪国成立后改为新京）中央放送局，奉天（辽宁）中央放送局，大连中央放送局、哈尔滨中央放送局。除中央放送局外，尚有安东放送局、营口放送局、锦州放送局、承德放送局、海拉尔放送局、齐齐哈尔放送局、北安放送局、佳木斯放送局，以后又陆续建立了吉林放送局、通化放送局、牡丹江放送局、抚顺放送局、鞍山放送局等各地方局。这样就形成一个以长春为中心的四向放射的广播网。中央放送局虽然有四个，但是长春中央放送局则处于首要地位。

长春中央放送局置有庶务、编成、报道、学艺、国际、技术等课，其他中央放送局设有庶务、放送、技术三课，至于地方放送局则不设什么课。

广播使用的语言，分为日语、汉语（当时称满语）两种，日语广播叫第一放送，以来居的日人为听取对象。汉语广播叫作第二放送，以东北人为听取对象。因为哈尔滨有许多白俄居留，为了向他们进行日伪的宣传攻势，所以哈尔滨中央放送局除第一放送和第二放送外，又单独开辟第三放送、增添了俄语广播。

长春中央放送局的国际课，是为着向东北以外各地进行广播宣传而设的，主要是面向中国内地和南洋一带，使用的也是日语和汉语。

为了加强对广播事业的统治，1944年，满洲电信电话株式会社改变了内部的编制，撤销了本社的放送部及其所属各课，将长春的中央放送局升格为放送总局，在放送总局内，置有监理课（原编成课合并在内）、庶务课、普及课、报道课、学艺课、国际课、技术课以及查阅室等各课室。原放送部长董毓舒为放送总局长，原长春中央放送局的金泽党太郎和刘多三局长为总局的副局长。另外，并于报道课、学艺课、国际课、普及课，分别增设一名副课长，由东北人担任。日人为加强文化的侵略和统治，此前曾计划建立一所放送会馆，建筑资金预定900万元，使之成为伪国的“最高文化殿堂”，可是由于日本侵华战争越来趋陷于深渊之中，所以这项计划就束之高阁了。

在广播内容方面，日人把它分为三个部分，这就是报道放送，教养放送和慰安放送。所谓报道放送，包括一切报道性质的广播，如新闻报道、经济行情、各种实况、天气预报、节日预报等。所谓教养放送，也就是所谓有教育意义的广播，如各种讲演、学校放送、儿童时间等类属之。所谓慰安放送，系指一切文娱节目而言，如京剧、梆子、广播剧（当时叫放送剧）、广播小说、音乐、歌曲、合唱、评词、影戏、相声、大鼓等等。报道放送的材料，需要取之于国通社（“满洲国通讯社”）的稿

件，有时也采取一些报纸上的材料。讲演和学校放送则根据讲题邀请当时各方面有关的人来局广播。儿童时间的内容，有讲话也有文娱，邀请有关教师或小学学生担当。至于慰安报道的演出，则邀请各地的文娱团体和艺人担当。当时能够提供各种节目的广播电台，除长春、沈阳、大连、哈尔滨各中央局外，在地方局方面，安东、锦州、齐齐哈尔、吉林、营口也能提供一些。各种广播演出团体，如京剧团、话剧团、音乐团、合唱队等，多系当地所谓该项文娱爱好者在放送总局的支持下，所组成的。放送局所以鼓励这种演艺团体的组成，目的在于使他们为广播效力。

为了征集广播脚本，在长春本社放送课的倡议下，曾酝酿了一个所谓“文协”的组织，以便使当时能够写作的人们提供一些话剧、小说等稿本，藉以救济他们的贫困的“新演艺”的内容。由于应征稿本寥若星辰，不久这个“文协”也就不了了之了。

关于节目的编排，先是由本社的放送课主持，以后这项工作便移于长春中央放送总局的编成课（监理课成立后，归该课的编成组）了。其程序为能提供节目的各局，于前一月初即须将欲担当的广播节目作成提案并附有内容说明提交长春的中央放总送局，于是编成课召集有关人员举行编成会议，对各局所提节目加以取舍。会议后，编成课即根据会议所采取的节目，编制下月全月份的（按日按时的）广播分担表册分发各局，这样各局于前一月的下旬即可得来月的广播节目表，各局就可按此表着手本局担当节目的准备了。准备完了后，再通报长春局的编成课，编成课根据各局的节目担当通报制成每日广播节目表，先几日知照各局，至此广播节目遂最后确定。长春局担当的节目广播时用电波直接向各地送出，至于其他各局担当的节目广

播，则先由电波送到长春局，然后再由长春局转送各地。所有这些，都是控制各局广播的一种措施。

在日伪统治下，广播的编成方针，也是遵循日伪的国策进行的，新闻报道是如此，一些讲演多是如此，就是在文娱节目中，同样要夹杂一些“日满协和”、“王道政治”、“大东亚共荣圈”以及“国兵法”、“粮谷出荷”等思想内容。为了歌颂日本的所谓“武运”，不但当日军攻占新加坡之日，来了一个临时特辑节目，即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第一任联合舰队司令长官山本五十六和第二任司令长官古贺峰一前后战死的时候，也都临时编排了特辑节目，以吹嘘日本的“大和魂”和“武士道”精神的方法，来掩饰他们的败仗。

日伪统治者对于广播内容是严密监视的。根据日伪双方的协定，满洲电信电话株式会社是要受着伪满交通部监督的。伪满交通部为了监视广播内容，特在各地的邮政管理局内设一电政科，科长由日人担任，凡一切广播稿件，事先必须送到电政科审查，不然是不能广播的。电政科可以对原稿的某些字句提出修改意见，也可以勒令禁止广播，不仅对于广播稿件详加检查，即对于广播使用的唱盘的审查亦毫不放松。如京剧里的《苏武牧羊》是不准广播的，因为有“降低皇家尊严”的嫌疑，歌曲里的《大路歌》、《开路先锋》是在禁播之列的，因为它唱出了劳动人民的心声……诸如此类，不下数百余种。再举一例，亦可说明个中情形的一般。大概在1943年春季的某月份里，在广播节目中添了一项趣味讲话，譬如讲些集邮、联话等有趣的故事。某次哈尔滨局担当的趣味讲话是《南船北马》，内容不过是说些船马的故事。可是电政科竟认为这个题材不对头，有违国情，届时打来电话通知禁止广播，当时广播员与之争执多次未下，最后终于不顾电政科的拦阻广播出去了。第二天，日本

宪兵队打来电话，找广播此稿的主持人询问情节，由此可见日伪当局对于广播内容的严密监视。由于放送局与电政科时常发生矛盾、冲突、口角，而各地电政科的措施又多不一致，所以在伪满国务院弘报处成立后，为了加强思想文化统治，对于广播事业也在着手干预了。弘报处对各地电政科有统一指示，全盘审定了禁播唱片，然后由各电政科通知各放送局照行。至于讲稿与剧本等仍由各电政科就地审阅。长春局为了免除与电政科之间的磨擦，自己成立了一个查阅室，所有广播稿件由自己审查，但要对伪弘报处负责，广播完了后，将原稿送交该处备查。

日伪警宪每年都要实行春秋两次大检举，逮捕他们所谓的"思想犯"，对于供职于放送局的中国人，自然也是他们的注目之的。1942年秋，长春局的崔国治和哈尔滨局的赵文选同时被逮捕了，1945年春，长春局的张万喜、杨文元也先后被逮捕了，他们被关押在首都警察厅好几个月，受到多次的严刑拷问。

在广播节目中，时而也作着舞台中继（在剧场里播送戏剧）的编排，尤其是有名的艺人出演时。如伪满演艺协会（艺人的统治机构），为了多赚钱，曾先后邀请北京的马连良剧团、叶盛章剧团、李玉茹剧团、言慧珠剧团等来东北演唱，所到之处如沈阳、长春，哈尔滨各地，放送局都作了舞台中继的广播，藉以取悦听户，同时对于无线电收音机的推销，无形中也起着宣传广告的作用。

日伪统治下的广播收听户，是要缴纳听取费的，其金额是每户每月一元，实质上这就是课收音机所有者每年12元的税金。为了扩大听取面，以便多所渔利，普及课进行了积极的推销活动，曾以"月赋"亦即分期按日缴款的方法出售收音机。至于收音机的生产，在伪国内并没有建立什么制造厂，仅在日本

国内进行，运到伪满洲国后只是装配而已。所生产的收音机分为“国民型”、“标准型”、“斯巴型”等几种，而“国民型”又有一至七号，“标准型”一至六号等不同的类型，此中以“斯巴型”的质量较优，但是“斯巴型”除日本人外是很难买到的。

日伪当局以广播为防空司令塔，每年都有一次或两次防空演习，“敌机侵入”、“空袭警报”、“疏散”、“待避”等一系列讯号，都利用广播传达各处使所有机关、居民都按照这些讯号而有所行止。他们不知费了多少时间精力人力财力从事这种防空准备，不过完全出于他们意料之外，结果并没发生任何作用，只是徒劳心力而已。

1945年8月8日，苏联根据波茨坦会议决定，对日宣战。得到此消息，电电总裁山田乙三马上召集所属职员在放送总局集合，时间是下半夜一点左右。

山田的讲话不长，只是说：苏联政府已经对日宣战，在此情形下，全体员工要沉着应战，严守各个岗位，百万关东军必能克尽厥职，收到满意的战果等等。山田的这次讲话，不只是对着长春的电信员工，同时通过短波向各地的电电职工一道播送出去。

空气一天一天地紧张起来，“敌机侵入”、“空袭警报”的信号不断从广播传播出去，可是战况究竟如何，只有日本人会知道一些，在广播的报道中，是没有这方面材料的。8月10日以后，有些蛛丝马迹显露出来了，在电电本社和放送总局的走廊两旁以及门里门外，零零乱乱地堆置许多电信器材，据说几天以后，便要转移到通化去，日军将死守通化这条最后防线。

8月15日正午，山田又召集全体员工再集合于演奏室，员工都不知道又出了什么事。结果，是捧读日皇颁布的投降“诏书”。

自此，“满洲电信电话株式会社”随着伪满的垮台而作鸟兽散了。

回忆伪满洲国“新京放送局”

陈鸿钧

这里所写系就个人所知1941年到1945年“八·一五”新京放送局的情况，至于它何时成立以及在1941年4月以前它的活动，因个人不详，这里付诸阙为。

隶属关系

该广播电台直属于伪满洲电信电话株式会社，即伪满电报电话公司。该公司直辖三个方面的业务，广播即其中之一。为了专门管理该电台以及各地电台业务，该公司设放送部，放送部下设放送课，就播音节目等业务对各地电台进行指挥管理，该中央电台业务、设备措施等，直接受伪国务院弘报处统辖，该处有一参事官，还有一事务官对播音节目直接进行监听，发号施令，而其太上皇则是日本关东军报导处，主管这方面工作的军方人员直接去电台，向那里的日本人台长指挥布置，副台长中国人听从指挥，在中国语广播方面进行贯彻。

关于该电台机构、人事、业务

该电台设日本人台长1人，中国人副台长1人，台长之下设（用原名称）“编成课”，由一叫町田的日本人任课长（这个课不设中国人副课长），掌管电台每月全部播音节目与重要事项的确

定与监督实施。该电台主要有新闻报导、讲话、音乐演艺、儿童节目及对重庆播音。这个编成课，主要是确定、编制每月的宣传报导方针及主要内容，并监督实施的。因当时敌伪广播对象，一是对日本人，另一是对中国人（被称“满洲人”），所以该课每月要编完日本人收听的节目与中国人收听的节目，该课课长是敌军方十分重视的，因为他要代表关东军严格贯彻执行关东军和伪满政府的宣传报导方针的。

该电台在业务方面设“报导”、“学艺”和“国际”三个课，在上述编成课之下，执行，实施每个月的节目。

（一）报导课（意即新闻报导科）

这个课和敌伪一般“报社”同样，是通过电波向全东北进行时事宣传报导的，中设两个股，一股是日语宣传报导，另一股是汉语宣传报导，先是由一名人事课长总管，分设两个股长，每个股有股长2人，正的是日本人，副的是中国人，后改为课长（日本人）、副课长（中国人），它的新闻报导的材料来源，是伪满洲国通讯社每天即发的“满洲国通讯”，这是日文稿，在中文广播时，是由这里的中国人译成中文报导材料，然后每天分早，午、晚由这里的播音员通过电波进行报导。

（二）学艺课（包括讲演、音乐、演艺、儿童节目）

该课与上述“报导课”同样，先设一个日本人“课长”，分两个股，每股正副两个股长。后来也改为课长（日本人）、副课长（中国人）。在负责中文广播股里还有一个日本人，没有名义，但全面监督中国人的情况，两个方面的节目种类大致一致，在中文节目里有讲话、演艺（其中包括话剧、京剧、相声、大鼓等）、音乐（中国音乐、西洋音乐）、儿童节目，有时进行现场广播，各种节目各有人联系、执行。

这里的“讲话”被看成是重要节目，主要是用来进行敌伪

宣传的，有时由伪国的“要人”讲话，如伪“国务总理”张景惠，伪“大臣”以及伪“协和会”主要大员，在伪国的什么纪念日里，由伪政府直接安排，其讲话人由电台“隆重”迎送，其他一般的“讲话”人选，也都经该台台长、编成课长等决定，进行接待，该电台各业务“课”、“股”每个月征集一次节目，提案由各股人员提出，编成课选用，作为下一月节目。

各种演艺和音乐节目都由专业个人或团体演出，在当时的专业团体中，有“文艺话剧团”、“京剧团”、“广东音乐会”、“吹奏乐团”等，各演出团体和个人在演出之后由该电台付给一定的报酬。

在参加播送这样的节目的中国人中间，除极个别的人以外，大多都是心中抑郁，心怀不满。前述“学艺课”的那个课长，有一次就对着几个中国人厉声地说：“你们的思想里都反满抗日，这个我知道！但是这不要紧，你们得给我干！不干不行！”在敌伪统治后期，中国人职员家属都被安排住到一所住宅里去。这些人们每天晚饭后常到一起谈唠，发泄个人的郁闷和忿恨，在夜里很多人打麻将，到深夜，才在电台调整室中偷听祖国抗战的消息。

（三）国际课

这是该电台对国外进行广播的一个机关，有一个日本人课长，成员分两部分，一部分是用英语对海外进行播音的，这一部分人占该课成员的多数，使用打字机，打英语稿件和用英语播音都是由这些人来进行；另一部分是中国人，大约有五六个。另外还有一个懂汉语的日本人和中国人坐在一起，这些中国人和报道课的人员同样，翻译伪满洲国通讯社的日文稿子，译稿交日本人审阅，最后交播音员对重庆方面进行播音。该课课长（日本人）有时写时事评论文章，交由中国人（副课长）译成汉

语，然后播音。所有的稿件在播音前，一律交由懂中文的日本人审阅。

该课有一个译稿的中国人，一次他喝醉酒，归途中，说出他做了日本人的特务。

日本帝国主义实行的是法西斯统治，1945年“八·一五”后的二三天，在广播电台“学艺课”做过副课长的一个日本人说：首都警察厅特高课的“黑名单”上有4个人原定同年10月逮捕，这4个人中有两个人是学艺课的。

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后的一段时间里，电台由苏联红军控制，在此过渡期间，该电台保持着少量不同内容的节目播音。

日伪时期承德的广播事业

张显增　王立军

本世纪20年代初，世界上出现广播电台。承德自30年代建立无线广播，至今已有50年的历史了。50年来承德的广播事业，经历了日伪、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后三个时期。

日军侵占承德后，1936年1月1日便在承德市南营子大街（现承德南营子五金商店处）成立ラミンオ营业所（即无线电营业所），负责收音机整机、零配件的经销和修理业务。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发生后，日本侵略者为了进一步推行其侵略政策，扩大其宣传阵地，于同年7月22日在承德市石洞子沟北山坡下，成立了伪电信电报株式会社承德放送局，开办了日语广播节目。呼号为MTHY，使用50千瓦发射机，波长328米，频率915千赫，埋设地网300平方米，木杆水平天线

高度80米，发射机为自激变调式的中波广播。主要是转播伪满新京（长春）、沈阳和大连放送局的日语广播，没有自办节目。

1941年12月8日，日本偷袭美国海军基地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侵略者为强化对中国人民的奴化教育，又于同年12月15日，在承德放送局开办第二广播，增加了华语广播节目，发射机功率扩大到1 000千瓦，频率是1 270千赫，发射台址仍在承德市石洞子沟北山坡下，受信所（即信号接收点）在石洞子沟南侧傅家沟内（现长途线务站院内）。1942年台（局）地址迁至承德市小佟沟南山（现在地区广播电视局院内）。

1943年伪承德放送局升格为承德中央放送局，下属赤峰放送局（建于1944年9月1日，台址在赤峰前亭街甲409号，呼号为MTEY）和平泉放送局（未建成日本就投降了）。

伪承德中央放送局的机构设置有业务系、技术系、放送系、受信所和普及课（即原无线电营业所，于1942年改为承德放送普及局，1945年夏并入伪承德放送局）。课（系）以上负责人都是日本人，中国人在里边担任的都是一般工作人员，先后担任该局局长的有大冢敬之、连川亮吉和玉苹仲吾。

（摘自《承德文史》第五辑）

日伪统治时期鞍山的无线广播

鞍山市广播电视局史志编辑室

由于鞍山特定的历史和地理条件，决定了鞍山无线电广播产生于日伪统治者即将覆灭的前夕。

盛产钢铁的鞍山，20世纪初日本帝国主义就伸进了魔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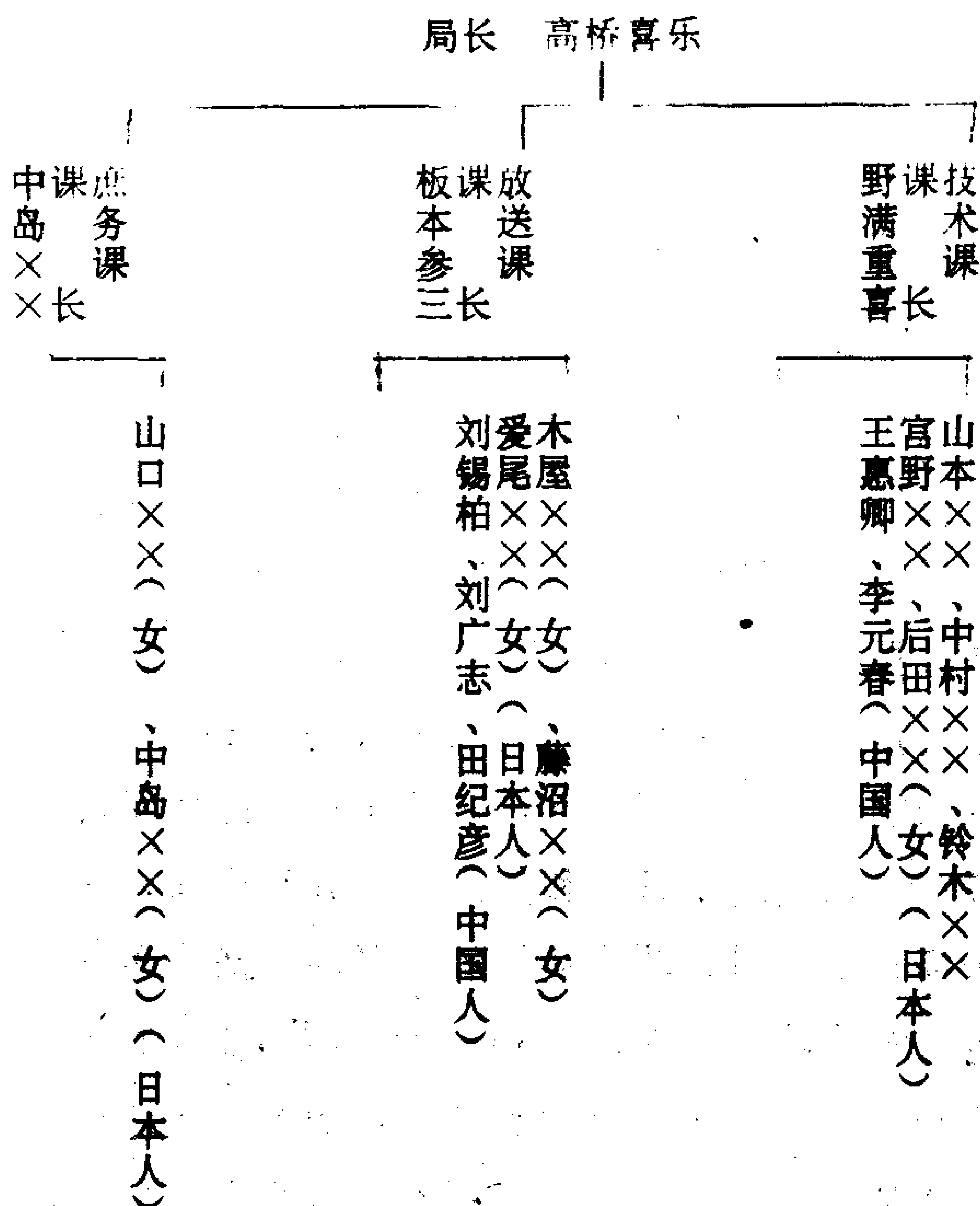
“九·一八”事变后，侵略者把鞍钢（日伪时期称“昭和制钢所”）扩建为殖民地性质的联合企业，成为它的重要钢铁基地之一 但当时在东北来说，鞍山毕竟只是一个工矿区，政治、军事上的重要性，不如沈阳、大连、营口等城市，所以作为它的现代化宣传工具的无线电台的创建，时间比那些地方晚一些。这以前，在鞍山许多日本人和少数中国人家里已经陆续有了收音机（据昭和14年即1939年《满洲放送年鉴》的统计，当时鞍山日本人6 020户中有收音机的有2 061户，中国人1 8298户中有收音机的271户。另据“满洲电信电话株式会社”《满洲放送听取者数分布图》1940年统计，当时鞍山共有收听户4 560个，其中日本人3 590户，中国人970户）。为此，早在1937年就设立了“鞍山ラミソオ（无线电）营业所”1942年改为“鞍山放送普及局”，它的业务除出售和修理收音机外，还收取收听费。1944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接近尾声，日本侵略军在太平洋战场上节节败退，鞍山是日军钢铁供应基地，连续遭到美国飞机空袭。为了加强防空和欺骗宣传，他们就设立了“鞍山放送局（广播电台）”。正如《东北经济小丛书·电信》所说：“……又于本溪湖、吉林、兴安、鞍山及抚顺分别成立广播电台，此乃为避免空袭，由大电力广播转变为微电力广播，故有此卫星式广播电台之增设也。”

“鞍山放送局”筹建于1944年初，这年9月1日正式成立。地址在当时的长大区“鞍山电信电话株式会社”（简称“电电”）日本人独身宿舍“电电一心寮”，借那里的三个房间作为临时局址（一是办公室，一是技术室即机房，一是放送室即播音室）。主要设备是一台功率为10千瓦的发射机，发射频率为725千赫，呼号为MTJY。广播主要用日语，时间一天三次，早晨5：30—7：30时，中午11：30—13：00时，晚间17：30—21：00

时。其内容主要是转播奉天（沈阳）放送局节目，也有些地方新闻。21点以后，用华语广播半个小时，内容有新闻（大都是由日语新闻翻译过来的）、通知、唱片等。遇有美机空袭，就播送空袭警报，先用日语，后用华语。放送局有两台电话直接日伪鞍山南部防卫司令部，一有空袭情况，伪司令部马上通知放送局；如果飞机接近鞍山了，就再次通知放送局马上发出警报。当时鞍山街上安有大喇叭，一广播居民都知道了。

这样简陋的设备，显然不能适应当时侵略者的需要。于是，他们同时又在附近兴建了一个比较正规的建筑（在现解放路），占地约500平方米，有大、小播音室各一个，机房、办公室各一个，还有休息室、局长室、锅炉房等。1945年春，放送局迁到这个新址。广播用的发射机是从日本运来的两部50千瓦机器。由于两部机器安装的电子管不同，一部实际输出功率较大，另一部功率较小。这时就把日语和华语节目分开广播，功率较大的机器用来播日语节目，功率较小的机器用来播华语节目。前者频率仍为725千赫，后者为1160千赫。呼号都是MTJY。两套节目内容和以前差不多，仍然都是以转播奉天放送局节目为主。鞍山放送局当时的机构、人员情况，据曾在该局工作过的王大光（即王惠卿）等的回忆如下（见表）：

日伪鞍山放送局机构、人员表（1945年“八·一五”前）



此外，属“放送普及局”的收费人员有：赵仙洲、程志金及两名日本人；修理人员有：崔庆多、陈福志、刘春秀、常凤书、张德庆。

1945年8月15日，从广播里传出日本天皇宣布向盟军无条件投降的诏书，鞍山放送局的日本人听了痛哭流涕；中国工作人员听了都很高兴，庆贺祖国的光复。鞍山局势很快发生了变化。妄图窃夺抗战胜利果实的汉奸和国民党反动派搞起了什么“治安维持委员会”、“国民党市党部”等。8月下旬，苏军进驻

鞍山，日军被迫缴械，成立“卫戍司令部”。不过，这些组织一时还没有介入放送局，

10月初，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山东纵队和冀热辽第16军分区的官兵在鞍山会合。在改编了鞍山的保安旅，接收了日伪“昭和制钢所”等之后，随即于10月24日派人接收了鞍山放送局，改称“鞍山广播电台”，并派靳纯英为台长。我党领导下的鞍山人民广播事业由此诞生。

（摘自《鞍山市广播电视志》）

哈尔滨放送局和哈尔滨中央放送局时期

尔泰　丛林

口琴社演播《沈阳月》

哈尔滨广播无线电台1932年2月5日被日本侵略军占领，7月改称哈尔滨放送局，恢复了广播。1933年9月，伪满洲国电信电话株式会社统一接管了东北的广播电台，哈尔滨放送局也就成为满洲电电所属的一个部门了。1934年7月，新京（长春）到哈尔滨的广播专用中继线路建成，开始实行全满联网广播。

哈尔滨放送局的所有广播节目都由日本人来办，即或是满语（汉语）节目，也全由日本人来搞。所以哈尔滨放送局的广播节目怪声怪气，奇腔异调，它播发出来的声音同中国人发出的声音似乎隔着一道鸿沟，不太容易进入中国人的耳朵，广播收不到他们预想的效果。为了扭转这种情况，从1935年下半年开始，哈尔滨放送局开始让中国人参与办广播。因此逐渐请一

些中国人演播节目，单独播出或向联网中继输出，广播到全满洲去。

1935年秋后，哈尔滨放送局请哈尔滨口琴社来演播口琴曲。他们演奏了《沈阳月》、《轻骑兵》、《快乐的铜匠》等曲子，进行了反满抗日的宣传。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哈尔滨口琴社事件的一个重要起因。《沈阳月》是很有思想性、战斗性的大型口琴协奏曲，原名叫《战场月》，由于乐曲的名字太引人注意，演播时改叫《沈阳月》。它描述的是1931年“九·一八”日本帝国主义强盗向沈阳北大营进攻时，爱国官兵奋起抵抗，被蒋介石强令撤退的悲愤感情。这次哈尔滨放送局广播它，人们从收音机旁听到了《沈阳月》的吹奏：开始由口琴社的几个队员吹出缓慢而低沉的声音，这声音的音调逐渐提高，接着更多的队员逐渐跟上来，一起合奏。人们听去，真像一轮明月从东方冉冉升起。演奏向下进行，声调发生了变化，有如暴风骤雨袭来，阴森可怖；继而有如冷泉在幽谷中呜咽，时而有如闷雷在空中滚动，时而又如壮士面对易水而悲歌……这首口琴协奏曲，把人们推回到历史的悲剧场面，使人回忆起沦亡之恨，激起了人们仇恨日本帝国主义的情绪和爱国的深沉情感。听众在潜移默化中增强了民族意识，乐曲发挥了良好的作用。演奏这首乐曲时，队员们各个面容严肃，蕴含着怒气。在演奏声调激昂凄绝的时候，指挥精心指点，眼角都闪着泪花。

原来哈尔滨口琴社是在共产党员姜椿芳、金剑啸、任震英组织支持下进行活动的。口琴社以教授口琴、演奏口琴为纽带，团结教育广大青年，在青年中进行工作，曾经动员口琴社的社员捐赠一部分钱，支持党办的其他宣传刊物。口琴社在社会上的活动，引起了日本人的注意。他们察觉到背后有共产党人的活动，口琴社是和反满抗日有关的组织，演奏的口琴曲在思想

内容上也是不能允许的。因此，1937年4月，敌人对哈尔滨口琴社进行了法西斯镇压。除了1936年袁亚成与陈娟离开哈尔滨回上海之外，所有的口琴社社员全部被捕。敌人严刑拷打每一个社员，也没有抓到任何把柄。最后日本人把口琴队队长侯小古押到警察局地下室枪毙了，王佳文被判5年徒刑，口琴社音乐顾问刘性诚及其他口琴社成员，被折磨了几个月之后释放了。后来，刘性诚又来哈尔滨中央放送局MTFY合唱团当了“嘱托”，带领这个合唱团演唱古典歌曲，坚持不演黄色的流行歌曲。因为刘性诚参加过哈尔滨口琴社，日本人对他总是放心不下，甚至让人监视他的活动，生怕再有像《沈阳月》一类的乐曲或歌曲，通过广播电台广播出去。但1938年7月8日口琴曲《沈阳月》又以其原名《战场月》在广播中播放出来了，斗争仍微妙地进行着。这充分体现了广播电台内部中国人斗争的顽强与奇妙。

《南船北马》风波

哈尔滨放送局1934年7月实行全满联网广播。由满洲电电株式会社放送课组织全东北各大城市的放送局，分别制作节目，通过中继线传给新京（长春），再通过中继线同时传给各放送局，用无线电波发射出去。1938年5月，哈尔滨放送局改为哈尔滨中央放送局，1941年3月，迁到松花江街601号新厅址，还是进行全满联网广播。1942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广播由放送总局统一安排。各中央放送局仍然分担制作广播节目的任务。

当时，哈尔滨市私立龙光学校校长王雁秋，给哈尔滨中央放送局“节目编成”边永禄送去一篇广播稿，题目是《南船北马》。

表面上看这是一篇有点趣味性的闲话，讲的是各个地方人

们的不同习惯。南方水多到处是河沟港叉，出门总得划船；北方地广路长，外出常常需要骑马。其实王雁秋是在抒发一种怀念国家的情绪，用说趣文闲话的方式，引起广大听众时时想念我们和划船的南方是一奶同胞，而且更不要忘记北方骑马的辽阔土地正是祖国不可分割的领土。边永禄编好了这篇稿以后向上送审，只等稿件被采用以后，编辑通知王雁秋到时来电台播讲。

其实《南船北马》稿子送邮政管理局电政科业务股第二放送监督室审阅时，收发监听郝清廉没有看完稿子，所以没有盖上“供览”橡皮戳子，股长、课长自然也就没有看。哈尔滨中央放送局第二放送（汉语）负责《南船北马》的“节目编成”边永禄，在节目播出前30分钟打电话问郝清廉，稿子可不可以让王雁秋播出？郝清廉没有看完稿子，就小心起来。因为曾有一次市长到放送局讲话，秘书迟送了讲话稿，郝清廉按“编成”意见盖了“供览”橡皮戳，股长、课长也都签了字，但讲出的话则有“希特勒欲涂欧洲版图于一色”词语，被上司追问，认为市长讲话影响了日德轴心国的国际关系，不久市长被撤职，而郝清廉也跟着吃了一惊。太平洋战争爆发，放送管理得更严了，所以这次对王雁秋的广播稿郝清廉因未细看，只好推说稿子内容是胡扯，文不对题，暂且不放，让“编成”边永禄另换节目。郝清廉的“暂且不放”说起来容易，但仅剩30分钟，是无论如何也来不及了，边永禄心里自然十分着急。于是他就向郝清廉解释，稿件没有什么问题，也没有额外的胡诌，认为可以播放。郝清廉说：“你放你负责！”边永禄一听，这话十分刺耳，觉得话里充满威胁的口吻，也便动起气来，随口答道：“我负责！”一气之下，到时间就让王雁秋进播音室去讲。

收音机里清晰地传出王雁秋讲《南船北马》的声音。没有

几分钟的工夫，第二放送办公室的电话铃哇哇地响起来，响得又急又瘆。边永禄意识到是郝清廉来的电话，硬挺着不接。等王雁秋把稿子播讲完了，边永禄才接电话。郝清廉在电话中叫边永禄待处理，把弦绷得更紧了。这可吓坏了王雁秋。边永禄想，一不做，二不休，何不来个先下手为强呢。于是边永禄把全部经过告诉了第二放送主事赵忠恕，赵忠恕和边永禄又找了放送局长日本人高桥将武，口口咬定邮政管理局方面有意刁难。一席话说得高桥为放送局的人撑腰，他主动和邮政管理局的日本人联系，争是非，讲道理，事情闹得挺大。邮政管理局方面知道高桥将武有实力，他的哥哥在警备队当大佐；郝清廉也意识到放送局方面的抗争力量很大，亦属不可轻易触犯，因此，他自己也就先放软了态度。王雁秋觉得事情十分难办，真地闹将起来，自己必得首当其冲，弄不好，有坐牢的危险。所以他积极从中活动，通过关系通融，在一家大饭店摆了两桌酒席，把放送局方面的和邮政管理局方面的有关人员都请到，调和了两方面的关系，才算把事情压了下来。

不打不成交，以后郝清廉对放送局方面的事好办多了，管理上放松许多，遇事总是商量着办。后来河南新民会邢幼洁访问“满洲国”，到哈尔滨放送局讲话，稿子里边大讲岳飞，讲民族气节；放送局的“编成”知道邢幼洁虽然是汉奸，但他在广播中讲岳飞，讲气节总比其他更好，就同意邢幼洁来讲话。讲话稿送上邮政管理局，郝清廉看了，电话打到放送局进行商量，放送局方面说，你若给他删了，邢幼洁就不讲了，并且说他发了脾气，骂道：“怎么连祖宗都可以不尊崇了吗?”结果郝清廉给讲话稿盖了“供览”的橡皮戳，又说服了上边的日本人，邢幼洁还是按原讲话稿讲了。还有一次，新京（长春）中央放送局来电话，要哈尔滨中央放送局就交“出荷粮”问题组织制作

一个节目，鼓动中国人交“出荷粮”，哈尔滨中央放送局以需要人多，眼下人手不够难以制作为借口加以抵制。这事虽然与郝清廉无直接关系，但他看在眼里，已经意识到哈尔滨中央放送局的中国人在进行合法的抵制。郝清廉也在那里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装做不知。

FY 合唱团

FY 是哈尔滨中央放送局MTFY 代号的最后两个字母，Y 是放送的意思，F 是哈尔滨放送局的第次号，FY 合唱团就是哈尔滨放送合唱团。这个合唱团的成员，有的是电台的人，有的是业余音乐爱好者。它由放送局拨款，来完成节目制作，由放送局专属而又不在编。这个合唱团的嘱托叫刘忠（即刘性诚），是一位音乐家。他原是一个中学的音乐教员，为许多古诗词谱过曲子，如柳永的《雨霖铃》、李清照的《菩萨蛮》、李煜的《虞美人》、王维的《阳关三叠》，还谱过诗人徐志摩的《快回家吧，姑娘》等。这些诗词中许多是“托儿女之辞，写君臣之事”的。刘忠1935 年参加过“哈尔滨口琴社”和任白鸥一起当音乐顾问，指导过《沈阳月》的排练演出，他参与《白鸥弦组》经常在电台演出。1937 年刘忠被日本警察机关逮捕，在狱中匪刑吊打，灌辣椒水，折磨了几个月，终因没有抓住什么切实的把柄而被释放。但仍是日本人那里的挂号人物，属于不放心分子。FY 合唱团的许多成员，音乐修养都很高，像指挥王钧鼎（王垒丁、王一丁），他指挥过我国音乐家赵元任的《海韵》大合唱，由俄国人交响乐队伴奏。《海韵》的内容，反映浪漫的少女，在海边寻找希望，然而被海浪吞噬。意境深远，含蕴丰富，音乐气势雄浑，指挥难度很大。FY 合唱团排练时，刘忠就推荐他的学生王钧鼎来指挥。当时外国人，特别是俄国人不相

信中国人能够指挥得了、指挥得好。但是，王钧鼎指挥得出人意外的好，他充分发挥其指挥才能，和谐而适度，旋律优美。《海韵》大合唱公演时外国人感到十分惊讶，不断地叫好。首演结束时，那些俄国人激动不已，掌声经久不息。王钧鼎还在广播电台讲《音乐欣赏》，每周一讲，讲贝多芬、莫扎特等大音乐家及其作品。讲的过程中，讲到法国革命，讲反映法国大革命时期的作品，边放音乐边讲解，有时影射鞭笞日本侵略者。为此，哈尔滨宪兵队名册上，王钧鼎已被画上了两个圈，然而，王钧鼎一如既往，照例讲下去，他最看不起向日本侵略者出卖灵魂的徐曼飞等，不久王钧鼎的音乐“嘱托”被解除。

FY 合唱团人多时达五六十人，哈尔滨的许多音乐爱好者，特别是职员、教员来参加的很多。FY 合唱团也培养出一批音乐人才。那时候日本人对于广播有严格的“放送规则”，共有 54 条，其中第32 条又有18 项“禁止放送”的明文。例如第3 项不准“宣传共产主义、无政府主义之理论以至战略战术或煽动其运动实行或支持此种主义之团体”；第4 项不准“煽动暴力主义、直接行动、大众暴动等或支持有此种主义之团体”；第5 项不准宣传“使国家存立基础之动摇之事项”等等，控制十分严密。所以FY 合唱团制作的节目，除了必须打的幌子以外，多是中性的、庄严的歌曲，或者演唱一些外国的著名歌曲，像《魔王》、《菩提树》、《流浪者之歌》等等，抵制下流黄色的歌曲。这样，放送局觉得有不放心和不满足的地方，他们想利用“古风音乐会”与FY 合唱团相并立，以期掺入一些为日本统治者所得意的节目，同时在两相比照中，钳制FY 合唱团不至于走得太远。这个“古风音乐会”宣称专门演奏国乐，而实际上，它有的时候不伦不类。国乐应该是我国传统的管弦乐器，可是这个乐团演奏中，却夹杂着中提琴和一些西方乐器，成了一个“杂烩”。古

风音乐会常有一个警视厅推荐来的“嘱托”出现，他有时穿着警尉的制服，有时穿着时髦的西装，脚上穿着半截小黑皮靴。这个音乐会中有个日本人松永，他是市公署的职员，一演出就穿和服，有时也穿警佐制服。警视厅推荐的那个“嘱托”虽然也参与古风音乐会这个管弦乐团演奏节目，但他本人不像其中的工作人员，而是说来就来，说走就走，没人敢问。因为人们对带警字的人都敬鬼神而远之，怀疑他的身份来历，是否系派遣来的坐探。这个“嘱托”在同仁中显威风，飞扬跋扈，没人敢惹。那时，办公室里办公桌是按使用人的职务、资格排列的，有职衔的依照大小排列在前，没有职衔的排列在后。有一回，刘忠同王钧鼎谈话，古风音乐会的那“嘱托”没在屋，刘忠无意中坐到了这个“嘱托”的位置上了。他俩唠着唠着这个“嘱托”回来了，他们也没有注意。而这个“嘱托”一见，立刻火冒三丈，大发雷霆，破口骂刘忠算什么东西，并且阴险而又狠毒地说：“宪兵队难道没把你的屁股翻过来吗！”露出一副凶相。对于这种人，刘忠只是用沉默的方法来蔑视他而离开了办公室。在刘忠他们的FY合唱团排练或演播时，那“嘱托”常去演奏室的观听席参观。人们都知道，这个“嘱托”混迹古风音乐会不过是埋个隐身草，去参观实际上是进行监视。但是刘忠FY合唱团还是以合法的形式演唱了一些李清照和李后主的诗词，以图用它来感染人不忘国耻，唤起人们反抗日本殖民主义统治的意识。

广播剧《新天地》

1944年7月25日，哈尔滨中央放送局播出了一出广播剧《新天地》。那天是所谓“协和会”的创建日，晚7时在《儿童节目》时间里，向伪满全国广播。

《新天地》是一出喜闹剧，剧作者“孤帆”（即赵乃禾）。

这出广播剧的剧情大体是这样：在山村的一个院落中，杂居着几个民族的居民：有日本人、朝鲜人、俄国人和中国人。日本人是这个村子的村长。

山区每年都有山洪暴发，大家对于洪水都很恐惧。这一天日本人村长告诉大家今天晚上有特大山洪，人们要到村中一座石头房子里避难，要用砂袋加固房身，用砂袋堵严门窗，如果经不住这次洪水，那么大家就死在一起。于是全院的人都集拢到这座房子里，在恐惧的气氛中等候着命运的裁决。笃信天主教的俄国人在行将就死的时刻，良心发现，进行了忏悔。他说，过去他在村中干了坏事，卖牛奶，往里面兑凉水，很对不起大家，请求饶恕。屋里许多人幡然醒悟说，哦，确实是这样，好几个人喝牛奶闹肚子拉稀。接着朝鲜人也进行了忏悔，说他在村中卖大烟，进行贩毒活动，坑了不少人。正在这时，有个中国人又打喷嚏又淌泪，犯了大烟瘾，那个朝鲜人还上前去安慰，并且道歉，承认自已害了许多好人。见此情景，那个日本村长也深负歉疚地说，他在村中借教小孩子们学日语之故，接受了家长们送的许多钱物，而孩子也没教好，很不应该，对不住大家。就在忏悔的旋风越刮越烈的时候，那个俄国人说他干了很不道德的事，他跟朝鲜人的老婆通奸。朝鲜人一面羞恼难当，一面承认说，他早就觉得他家的小二长得像个二毛子。全屋子里边的人立即议论纷纷。大家长时间哄哄，有一个中国人气闷不过，就搬开砂袋，捅破窗子，居然有一束早晨的日光射入室内，新鲜空气和远近的鸡鸣声一齐钻进了这座黑暗的石头房子，外边根本没有什么山洪来过。这时大家都来问村长，这个日本人村长只得承认是骗诓蒙蔽了大家，其实并没有什么洪水。人们从恐惧中解放出来，又说笑起来，他们围着村长开玩笑，说：

"哈哈原来你是一个大骗子!"就在大家的喜闹狂笑中，结束了这出闹剧。

广播剧播送完了以后，新京（长春）"弘报处"裴事务官来了电话。电话打到哈尔滨邮政局电政科业务股第二放送监督室郝清廉那里，让把"孤帆"的广播剧《新天地》脚本明天寄往"弘报处"。郝清廉想问问出了什么问题，裴事务官没有理他。于是郝清廉头脑发胀，心情紧张起来，因为孤帆的稿件他没有盖章，只报来一个节目单。赵乃禾推说广播时参加播音的人要人手一份稿件，必须广播后才能把稿子送来。郝清廉以为那天是"协和会"成立纪念日，又是儿童节目时间，加上广播剧剧名是"新天地"，这是伪满洲国国歌中的歌词，便一点也没想到内容会出问题。平时郝清廉同赵乃禾也有过来往，关系也不错，就允许他事后补交剧稿，并且郝清廉在儿童节目广播时，没有监听，跑到地下室打乒乓球去了。现在上边一要稿子，按惯例一定是出事了，势必要牵连到专管监听的自己，所以郝清廉十分紧张。他想找赵乃禾，但赵已经下班了。郝清廉就去找监督室主任韩承愈，韩承愈同裴事务官在日本留学时是同学，想求他给问一问稿子出了什么事。韩承愈一问，裴事务官说这出戏里面有反满抗日的言论，快把稿子送来。郝清廉一听，事关重大，这不仅是追不追究自己失职的问题，而是关系到赵乃禾的安危问题了。郝清廉心里反复考虑，渐渐地已经形成了一个主意。第二天一上班，郝清廉就找来了赵乃禾，问明了情况，才知道，广播剧把"满洲国"这个所谓"新天地"，写得一片漆黑，各种人都欺侮中国人，他们都是骗子，而最大的骗子是日本人。这个节目还正赶上纪念"协和会"建立，又对"全国"广播，实在是一起反满抗日的事件。郝清廉见到赵乃禾第一句话就说："你实在是胆子太大了!"然后他让赵乃禾马上把原脚本收齐通通烧

毁，另写一个可以冒充而又没有把柄的脚本顶上。赵乃禾立刻动手另写一个脚本交上来。

伪满洲国对于广播控制很严。以广播稿件或广播节目的审查来说，它由国家行政当局的邮政管理局电政科业务股第二放送监督室来审查并监听。邮政管理局属伪满洲国交通部。与此同时，宪兵队、电电管理局，也都进行监督管理。另外还有伪满思想文化统治中枢——“国务院弘报处”总监督（广播稿件一律要求一式五份，由放送局庶务课填表编号呈送给邮政管理局、宪兵队和电电管理局，放送局留一份，广播者自己留一份）。稿子到了邮政管理局电政科的业务股第二（日语稿送第一、俄语稿送第三）监督室，经过收发监听，交“系”主管，送“系”主任，再交股长，上交事务官，上送科长（理事官），再送副局长、局长，层层审阅，签字盖章。

哈尔滨邮政管理局电政科对于哈尔滨中央放送局内部情况掌握得很清楚，知道这座广播电台里既有国民党系统的人物。也有倾向共产党系统的人物。因为邮政管理局的股长小西健治、科长安武柳条、局长植田三郎都是有证件的宪兵队本部的“嘱托”。宪兵队提供邮政管理局一个《要注意视察人名簿》，赵乃禾、边永禄、赵文选……都在册。据日本人掌握，赵乃禾毕业于哈尔滨铁路学院，会俄语，属工大系统倾向共产党方面的人物。他在社会上很活跃，喜欢戏剧，在《月光曲》、《烽火万里》等话剧中曾被特邀饰演主角。他演技好，声音宏亮，仪表扮相很帅，博得社会上各界的注目，受到一些青年的崇敬，他的演剧活动被视为有秘密结社之嫌。

如今，脚本稿子是后来送来的，第二放送监督室“供览”橡皮图章是可以加盖的，但是日本人小西股长、安武科长、植田局长的签字和盖章是不好办的，再加上新京（长春）“弘报处”

方面催要得紧，事情就更难了。郝清廉急得团团转，无奈只好去找第二放送监督室主任韩承愈。在郝清廉的观察中，韩承愈虽然在日本留过学，社会能量很大，但他对中国人因触犯日本人而获罪的总是肯于出力帮忙，甚至还担一点风险。其实韩承愈是一个通天人物。别看他留学日本，是技士十四级，他可是日本宪兵队的“满语”（汉语）教师，日本宪兵对他这位老师很尊敬，所以宪兵中有不少人是他的学生和朋友。韩承愈同邮政管理局局长关系又不一般，人人都知道他是嫡系。再加上他同新京“弘报处”的裴事务官等都是留日的同学，同新京的许多上层日本人有关系。郝清廉在韩承愈面前说，责任在自己身上，是自己同意赵乃禾后补交稿本的，没想到“弘报处”要看稿子，请韩承愈帮助斡旋。韩承愈就拿了稿本找局长植田三郎，说自己疏忽，没有及时上送，植田在稿子上签了字，科长、股长也没费许多唇舌都补签了字。随后，韩承愈给新京裴事务官去了电话，说明稿子股长、科长和局长都审阅过，没有什么大问题，劝裴事务官何必劳神多事，这才算把事情了结了。

不过，在日本人那里，赵乃禾被列入“紧急处置”人员名单之中。哈尔滨中央放送局局长高桥将武，也在暗中加强了对赵乃禾的观察，搜集他的材料，误以为赵乃禾是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幸亏“八·一五”日本人垮了台，祖国光复了。赵乃禾才算免遭毒手。

十姊妹在放送话剧团中

哈尔滨中央放送局有一个放送话剧团，专门演广播剧。剧团中有那么一些人，由于思想倾向相近，艺术趣味相投，个人感情相亲，他们在演剧活动中互相照应，每个人又比较纯朴，于是就以年龄为序称为十姊妹。说是十姊妹，但是，并非全是女

性，而是有男有女；同时十姊妹并非10人而是13人。他们是1.尘沙；2.傅澄；3.曹雷；4.白鸢；5.白浪；6.苏秀；7.侯爵；8.石笛；9.张扬；10.乐然；11.陆园；12.风眠；13.韩梅。这些人中老大和老疙瘩年龄相差近20岁，每个人的阅历、修养各不相同。十姊妹的说法一传出，立即引起了日本人的注意。他们的行动受到跟踪与追查，暗中有人调查他们有什么背景，同什么人发生联系，有什么反满抗日的活动等等，于是一种恐怖的气氛笼罩在头上，十姊妹都感到有一种无形的压抑，但是他们的活动照常进行。他们所在的放送话剧团喊出了一个口号，叫做“为艺术而艺术”。他们只演艺术性强的话剧，不演下流荒诞的剧和政治性强的所谓国策剧。用艺术至上来抵御来自日本人的干涉，也可以用艺术性不强作为理由来拒绝演某些剧本，以艺术性强为理由来演所要演的剧本。有一次他们演曹禺的剧本《日出》，日本人把尘沙叫去，问他为什么要演这个剧本，尘沙说这个剧本有艺术性，人们愿意听，愿意看，别的剧本，没有人听、看。日本人没有更多的说话，就强迫尘沙说明剧本所写的是1935年以前的事，一定要在演出前向观众声明。尘沙答应下来，在演出前，让一个小青年到台前只说了一句话：“剧中说的是1935年以前的事”，然后照常演出。他们要演《晦明风雨》，就说剧本艺术性高。这个剧本内容是良家被突然闯进来的坏人搞得家破人亡。老百姓一看，不必多说，剧本的意义就清清楚楚了。

放送话剧团早在哈尔滨放送局时期，1935年下半年就成立了。那时，放送话剧团的成员很少，有孔繁绪、任白鸥、盛暑震等6人。演出小型广播剧，强调声音化妆，一个演员在广播剧中要担任两个或者三个角色。放送话剧团的出现，是日本人包揽全部“满语”（汉语）广播，广播节目奇腔怪调，怪里怪气，

既不像汉语，又不像外语，几乎没有几个人听，使广播成为陷入死胡同的产物。日本人察觉到人们对广播不感兴趣，“机”虽设而常关，就想出来“满语”（汉语）节目由满人（中国人）来办的主意，因此出现放送话剧团。哈尔滨放送局1934年7月开始实行“全满”联网广播，哈尔滨放送局也承担制作广播剧节目的任务，通过广播专用中继线向“全满”广播。但是，1936年11月，哈尔滨放送局改日语、“满语”（汉语）、俄语三种混淆放送为单纯的日语放送，叫做第一放送。这时哈尔滨放送局取消了“满语广播”，哈尔滨放送话剧团也因此而结束了它的历史使命。1940年7月哈尔滨中央放送局又重新设立了第二放送，即“满语”（汉语）广播，所以不久也建立了放送话剧团，由尘沙主持。尘沙原名叫洪徽善，因为想到一粒尘沙在敌人眼睛中也会使它难受，就把名字改了。后来尘沙讹为沉沙、陈沙，他也无从订正。他领着十姊妹，打着为艺术而艺术的招牌，演了不少广播剧、话剧，社会影响很大。日本人也感到了他们不那么顺心，像小小的尘沙磨眼一样，然而一时又没有什么办法处理他们。

1945年8月19日苏联伞兵进入哈尔滨，第二天哈尔滨驻扎了红军司令部。洪徽善把十姊妹的人立刻组织起来，两天排出了话剧《沉冤》，第三天就演出了。不几天，中共哈尔滨的党组织派孙刚黎来找他们，在哈尔滨道外东光寮会见了有关领导，把剧团正式叫做“八·一五”剧团。他们连续排演了《蜕变》、《血溅山河》等剧目，收到了很好的演出效果。后来，“八·一五”剧团改称为“塞北风剧团”，十姊妹的成员几乎全都参加了这个剧团，集体参加了东北民主联军，从此，他们脱离了哈尔滨广播电台。

（摘自《哈尔滨电台史话》）

黑河放送局

曹国彦

日本侵略者为了配合其侵略战争，宣传“建设东亚新秩序，日满亲善，皇军必胜”等殖民主义政策，进行反苏反共宣传，干扰苏联电台，从1938年开始实行扩充广播的五年计划。根据这个计划，伪满电信电话株式会社实行了“小电力，多数局主义”，先后建立了许多小功率的放送局（即广播电台）。伪满电信电话株式会社的扩充计划中，要求对“国境上的小城市，为了防止敌对电波的侵犯，要研究设置特殊的广播设施。”

东北解放前，伪满共有21座放送局，1938年12月20日在伪黑河省建立的黑河放送局便是其中之一。局址设在黑河街南岗，伪黑河省瑷珲县日本文职官吏宿舍附近（现黑河市第二农机修造厂处），隶属齐齐哈尔电信电话管理局。电台呼号“MTSY”，广播频率795千赫，广播形式有第一放送，即日语广播。

1940年，黑河放送局迁至黑河六道街南，迎恩路西（现黑河兴安街81号南侧，迎恩路26号北邻），筑有320余平方米砖瓦结构平房一栋。局内设放送（业务）室、技术室、总务。局长和各室主任均系日本人。黑河放送局自建立至东北解放，共6年零7个多月，局长和各室主任均先后更换过一次。前局长大村周造，后局长西村文之助，前放送（业务）室主任渡边寿，后放送室主任佐藤，前技术室主任大木，后技术室主任沼野，事务三田。放送室主任佐藤兼日语放送员。日本职员有男放送员

志田贤尚（现在日本群马县势多郡宫城村苗个岛一一四七）、高桥，还有一名女放送员，两名男技术员（其中一名姓未本）。中国人职员有张一伟、王懋钧、王幻麈、任宝三、杨常祥，他们先后担当汉语男放送员，张秀芝为汉语女放送员，技术室值机员刘镇远、仲延信，勤杂工邹殿恭、韩立勋，修理工小郭。另外还有一名40多岁的白俄罗斯人为俄语男放送员。

1941年起，黑河放送局用日、汉（当时称满语）、俄（当时日本称露西亚语）三种语言播音，即第一放送为日语、俄语，第二放送为满（汉）语。第二放送播出频率为1 100千赫。日播出时间约11小时，以转播伪满新京（长春）中央台和日本东京中央台节目为主，每日有约30分钟的自办节目。自办节目主要是15分钟地方新闻及邀学校学生和专业剧团、业余剧团演播歌曲、话剧、京剧等文艺节目。为组织自办节目，放送局在机关、学校、街公所、剧团均有联系人。伪黑河省公署李凤山，银行行长罗青凡，街公所街长何绍先，戏院的朱佩珩、潘桂荣，协和会孙鹏翼，业余剧团的单传慈、张华、高德山均为放送局自办节目的联系人。黑河大戏院到放送局演播过《捉放曹》、《空城计》、《四郎探母》等京剧，业余剧团演播过话剧《第二夜》，流行歌曲《真善美》、《秋水伊人》、《蔷薇处处开》、《支那之夜》等节目。演播后有时给钢笔做纪念品，有时给20至40元的放送费作为报酬。

黑河放送局为扩大影响，有时还在剧场专门召开“慰问收听者大会”，日本局长讲话欢迎大家收听放送局的广播，并组织文艺节目为听户演出。

黑河放送局录用的中国人放送员、值机技术员，一般均先到伪满新京（长春）中央台学习两个月后再回黑河工作。放送员学读稿、改稿及放送局规章制度；值机员学习放送机操作技

术。张一伟、任宝三、刘镇远等都在伪满中央台学习过。伪满中央台的姚远是放送员学习的负责人。张一伟初到放送局是准职员，工作一段后，经考试达到电语学四等合格，日语语步试验三等合格，晋级为乙种职员。除做日常班次的放送员工作外，还参加采访和组织文艺节目工作，召开“慰问收听者大会”时，担当日语翻译。

在苏联开始向德国侵略者反攻以后，黑河放送局收听并记录苏联的对华广播节目。

1945 年 8 月 9 日早晨，伪满中央新闻广播了苏联正式向日本宣战，在满洲东部业已进军的消息，当天上午苏联飞机对黑河空袭扫射，此时，黑河放送局呈现慌乱。下午 2 时许，接到乘火车向北安撤退的命令。下午 3 点钟召集全局会议，日本人宣布命令：全局职员包括中国人，下午 5 点半到放送局集合去火车站，6 点半发车。人要轻装，只带走放送机，其他设备、物品一律烧毁，中国人职员不准带家属。当时张一伟、张秀芝、杨常祥、仲延信、修理工小郭、勤杂工邹殿恭和国电通信社临时支援放送局的徐常绪都参加了会议。下午 4 点多钟散会。张一伟、杨常祥、徐常绪三人避开日本人进行商量，觉得跟日本人走非送死不可，绝不能跟他们走，但在黑河又怕被日本人发现，于是徐常绪提议，到东四嘉子他家躲避一下，这时三人便一起到回民旅店找到了徐常绪家的马车，去东四嘉子，在徐常绪家躲了一夜。放送局的其他中国人，也无一人随日本人撤走。至此，黑河放送局随日本侵略战争的彻底失败而告终。

（根据张一伟遗稿整理，摘自《黑河文史资料》第四辑）

富锦放送局

王明义

在旧社会，富锦县是江北邻县绥滨、南岸松花江下游的同江、抚远以及南邻宝清等县的粮食产品的集散地；又是上游名城哈尔滨的轻重工业产品的转售中心。因而，电灯、电话、电报、邮局、自来水等公用设置都称完备。日伪后期，富锦放送局（广播电台）又应运而生。

富锦放送局创建于1940年春季，坐落在原富锦西南门外300米之路东（即现在的第三小学校址）。

富锦放送局播放功率为3 000瓦，当时与佳木斯、牡丹江等地的放送局相比是较强的。波段为中波1230千周，呼号为MTOY。它与富锦电报电话局同属日满合办的掌握东北四省通讯命运的“满洲电信电话株式会社”（“株式会社”即股份有限公司），社址在原新京大同广场（即现在的人民广场）西侧。该公司股份日本人占有51%，“满洲”占有49%。

东北四省日伪时期计有电台新京、吉林、安东、延吉、哈尔滨、佳木斯、富锦、奉天、大连、营口、四平、齐齐哈尔、北安、黑河、牡丹江、海拉尔、锦州等17座，后增至21座。这些地方电台统归设在长春的“满洲电信电话株式会社”所属的“放送总局”管辖。

富锦放送局为华语转播台，其设备情况为：

柜式播音机两台，操纵台一座，能接收长波、中波，短波播音的八电子管大型收音机4台。

播音室的四壁、天棚、地板均用草垫（塔塔密）敷贴；天棚、四壁用黑色大绒贴面，地板草垫上铺绿色长麻绒。播音室内除桌椅、送话器、电唱机外，有五组多功能风琴一架，装有流行歌曲、京剧、大鼓、世界名曲等一千多枚唱片的柜子一座。

富锦放送局的从业人员编制恒数为局长1人，业务主任1人，播音员3人，技术主任1人，技术员4人，杂役1人；下属放送普及所从业人员4人，放送监听官1人。这些人员中，除播音员3人，杂役1人，放送普及所4人为华人外，其余均系日本人。

第一任局长由富锦电报电话局长（姓名记不清了）兼任，第二任局长叫河村，第三任局长油谷荣。先后任业务主任的有中林和大津，技术主任是和田等人。

播音员当时称放送员（日本人叫“阿纳温萨”）。创建初期的播音员有放送总局一位姓曹的，加上张万春、张绍先共3人。1940年春，开始播音后，姓曹的就回放送总局。1940年秋在富锦本地招考播音员，王明义被录取，张万春、张绍先转去长春。又调来一位叫韩云瑞的。1943年韩云瑞去职又招收了陈世宝、刘庆云2人。1940年陈世宝应征当国兵，又招收了陈宝书，直至光复。

放送普及所的从业人员有赵宝峰，赵常利、杨××等4人，该所业务范围是收收听费，推销收音机，维修收音机等。

1940年春，富锦放送局创建后，即开始转播“新京放送局”的华语广播节目，每天转播时间3次。第一次播音时间为5点——8点30分。节目内容为开始曲、节目预报、天气预报、广播体操（当时称建国体操）、音乐节目等。第二次播音时间为11点——13点30分。节目内容为新闻、音乐等。第三次播音时间为17点——21点30分。节目内容为曲艺、新闻、音乐、歌曲、

广播剧、时事述评、评书连播及天气预报、节目预报、终了曲等。其中开始曲、节目预报、天气预报、终了曲均由富锦放送局播音员演播。

每天的第三次播音，有时也穿插一些富锦地方节目，如京剧、歌曲、音乐等。参加演出的儿童歌曲节目，一般都是邀请各小学老师组织学生演出；流行歌曲则邀请中小学男女老师演出；京剧由“富锦京剧团”定期演出；音乐节目由“北辰音乐会”演播。

富锦放送局每年4月末均组织一次“儿童放送大会”。大会邀请城内各小学学生集中在富锦大戏院演出歌曲、音乐等节目，小学生停课一天参加这个活动。

富锦放送局本为华语转播台，但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每天中午与午后均转播日语新闻节目。

每天午后2时，通过短波，由放送总局宣布节目内容，富锦放送局值班播音员抄收，再结合本局要穿插的节目内容编排，经局长审阅，再刻钢板印刷发送给放送监听官，各机关、学校。

这里有必要提一下仅有的两个播音组织“富锦京剧团”和“北辰音乐会”。

富锦京剧团是个业余文艺团体，负责人是王敬在，人们都称他为王翻译。他的妻子、女儿还有其他京剧爱好者一起组成京剧团，除到电台播音外，其他活动不详。

北辰音乐会为王明义发起组建的业余团体。其成员有王兆禹、刘庆国、赵俊生等人，以演奏乐器为主。后又吸收王国兰、郝淑贞、孙淑媛等人，也播送歌曲和广播剧。“北辰”取北极星的象征义，即根据孔子语录“譬如北辰而众星拱之”的中心意思命名。因而日本宪兵队和县特务股对这些人十分注意。后来，在兴农合作社工作的曾当过宪兵队宪补的周文辅也打进这个音

乐会。他们认为“北辰”是倾向北方——苏联。其实当时没有这个意思。以后才知道，当时所以能引起特务们的注意，就是因为王明义在1940年当小学教员时向学生讲过：“你们是中国人，不是满洲人。”从此，王已被特务列入要视察人的名单里。

1945年5月9日，希特勒战败，富锦地区日军也全面撤离。这时，富锦放送局也奉命将原有的高功率播音机拆运长春，换了一个功率为10千瓦的小型播音机。这部播音机仅有现在的双缸洗衣机大小，一个人可以背得起来。1945年8月7日，富锦放送局即停止播音，放送局人员均集中到富锦正大街的电报电话局。8月8日，日本人都撤到富锦南岗的军队工事里。8月9日晨苏军江上战舰轰击富锦城，12日，富锦光复，放送局结束。

（摘自《富锦文史资料》）

秦素

尔泰　丛林

秦素是哈尔滨广播电台早期的播音员。1929年播音员李淑玲转到东北无线电收发处，就由秦素来接替。

秦素原名秦宽华（又名仲容），河北省遵化县人，1929年时24岁。她身型健美，思想开通，性格直爽，为人刚强能干。她出身富家，为了与封建婚姻抗争，为了自由，只身来到哈尔滨。秦素善于交游，她与第三国际的人有过接触，同进步作家打过交道，同中东铁路局的上层人物（如李绍庚督办、俄国人等）有交往，关系很熟。秦素会俄语，业余时间还去念夜课，学习法学（预科）。她声音柔润、甜美，口才好，善演讲，并且是法大

业余剧团的出色演员。

广播电台是一个消息汇总的地方，也是联结上层与下层的纽带。这样的环境使秦素逐渐认识到，自己所从事的广播工作，应该是为民族、为国家的振兴而呐喊的一个岗位；自己是民众信得过的消息传播者，生活的干预人，同时也是经常使人快乐的好朋友。所以，秦素觉得从事广播工作使自己精神充实。这位活泼、爽快的女子，有她特有的夙愿和抱负。秦素和苑崇古一段壮烈、动人的故事即是一例："九·一八"事变后，1931 年 11 月 4 日，日本步兵第十六联队长滨本喜三郎率两个大队步兵和一个大队野炮兵，由日本关东军参谋石原莞尔亲自参加指挥，向驻守在嫩江桥的马占山所属的军队进攻。这里的部队并不是马占山的本部，因为他新任黑龙江军事总指挥，他的人马仍在黑河一带。这里的部队原是1928 年10 月按张学良的命令筹备起来的索伦山屯垦区的部队，有苑团、张团、赵团三个混成团，共7000 多人。这些士兵训练有素，士气高昂，英勇善战。前线指挥是一位英俊的军官，他叫苑崇古。苑颇有爱国热情和军事指挥才能。这次战斗一打响，全体将士奋勇杀敌，日军受到沉重的打击后，又迅速增援四个大队的步兵和五个中队的炮兵，但仍无济于事。结果日军死亡180 多人，伤996 人，另外还死伤伪军700 多人。这是"九·一八"以来，日本关东军第一次受到中国军队的真正的抵抗。这一次战役，使日本军参谋本部十分惊慌，在国际上也造成了很大的影响。消息传出，中国人民受到了极大的鼓舞，在中共满洲省委号召下，哈尔滨市各界和学生立即组织慰问团，赴嫩江桥前线慰问抗日战士，秦素就是慰问团的组织者之一。

慰问团到了前线，送上了慰问品，秦素代表慰问团向抗日战士致意。她那一席充满爱国激情的讲演，她那发自肺腑的对

于爱国抗日英雄的崇敬感情，深深打动了全体将士的心。特别是她讲到抗日将士是中国民众的代表和希望，说得前线指挥官苑崇古心血沸腾。他上前同秦素紧紧握手，两人目光相碰，互相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会后秦素又对苑崇古指挥战争的情况做了采访，谈得特别投机，初遇知己的感情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又加上慰问团中有一位成员是苑崇古的亲戚，他向苑崇古详细地介绍了秦素的为人，疏通了内在的感情。到慰问团离去，秦素与苑崇古分手的时候，他们约定互相联系，互相通信。

秦素回到哈尔滨，一方面利用广播宣传这次抗日战役的胜利，一方面发动民众捐献，支援抗日前线。秦素组织捐献义演时，剧场内好的坐位票价很贵，10 元一张。这种票一般推销不出去，秦素拿了一把，来到上层人物中，以她的口才，晓以大义，使他们晓得买义演的剧票是一种爱国的行动，结果高价票销售一空。他们把募捐来的钱及时送到了前线。

11 月 10 日，日本关东军主力多门中将的第二师团也调到了嫩江桥前线，在日军飞机狂轰滥炸，枪林弹雨之中，苑崇古指挥军队鏖战了 10 天，终因寡不敌众，武器相差悬殊，撤出阵地。19 日撤到齐齐哈尔时，苑崇古的军队只剩下 1 500 人，后来又转移到了海伦。此时日军侵略的下一个目标，就是哈尔滨了。而东省特区张景惠又是一个亲日分子，抗日前景黯淡，因此秦素毅然离开广播岗位而去下就一个长途电话员。实际上，秦素已经投入抗日的洪流。她利用职务之便，每天半夜，把她搜集的情报用长途电话打给在海伦的苑崇古。使苑崇古提早知道许多消息。譬如：1932 年 1 月 15 日，在日本策划下，吉林“剿匪”司令于琛澂率军进犯哈尔滨时，张景惠“绝对合作”的消息；1 月 27 日李杜占领哈尔滨时，反对张景惠为欢迎日军命令全市挂日本国旗，得到人民支持的消息；以及日本大特务土肥

原贤二到哈尔滨等情况。

1932年2月5日，哈尔滨陷落，秦素无法容身，就潜离哈尔滨到海伦投奔苑崇古。抗日的共同理想和并肩战斗的情谊使他们两人的感情发生了飞跃。在海伦吉顺丝坊，秦素与苑崇古结为夫妻。后来，日军北进，马占山的黑龙江省政府和黑龙江军事总指挥部在海伦站不住了。一次激烈的战役，苑崇古的队伍伤亡惨重，终于抵敌不住被打散了，苑崇古怀着为国殉难的决心，还是坚持，在此紧要关头，是秦素掩护着救出了苑崇古。面临祖国山河残破，秦素和苑崇古无限悲愤。秦素出主意，利用她过去同中东铁路局的关系，凭她一口流利的俄语，可以取道苏联，绕回北京，再寻抗日的门路。苑崇古同意，他们去了苏联，由苏联绕道海参崴，经海路回到了北京。

在北京，秦素他们住在碧云寺附近的农村中。苑崇古每天出去找抗战的门路，但是，蒋介石的不抵抗方针，使苑崇古的一切努力归于徒劳，他指望蒋介石抗战的幻想破灭了。后来，国民党给他一个空头职衔，硬把他的炽烈的抗日热情压了下去。秦素每每到碧云寺散心，看到孙中山先生停放棺椁的地方，都触景生情。她想到了孙中山先生缔造的中华民国，如今遭到日本军国主义者的侵略与蹂躏，而自己联想到报国无门的现实，又生发出无限的感慨。她也曾去北京广播电台要求参加工作，然而得到的是冷冷的拒绝。正在这时候，秦素发现苑崇古潦倒并沉溺于青楼女色，玷污了她的忠贞爱情，她痛苦万般。在西山红叶随着秋风飘落之际，山河破碎的现实和爱人背离的凄楚，使她无法忍受，这位刚烈的女子，终于在碧云寺中触碑而死。鲜血染红了碑石，红叶掩盖了她的尸体。

还有一说，秦素死在碧云寺附近的家中。平日秦素身穿素服，常去碧云寺，忽然数日不为人所见，房东生疑，去敲门无

人应答，遂捅破窗棂纸窥探，见秦素躺在床上衣着整洁，原来已服毒自杀死去数日。

（摘自《哈尔滨电台史话》）

日本帝国主义对伪满新闻报业的垄断

郭君 陈潮

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东北的侵略，历来使用两手政策，一方面使用“剑与火”的政策，进行领土占领、政治统治和经济掠夺；另一方面利用思想文化领域，从精神上奴役东北人民，摧残其民族意识，使其忘记祖国，甘当侵略者的顺民。

在思想文化领域的诸部门中，侵略者把新闻报纸作为其侵略的开路先锋，是侵略的喉舌，是言论机关。在侵略者看来，在侵占的地方创办报纸，至少有三个功能：一、他们创办日文报纸，组织遍布各地的记者网，从各个角落搜集情报，以供其政府制定侵略政策使用；二、利用报纸向本国人民宣传东北的富饶，引诱本国人民来东北开拓经营；三、他们创办中文报纸，利用报纸发行速度快，覆盖面广的特点，最大限度地鼓吹其侵略政策，用以麻醉中国人民，掩盖其侵略野心。正因如此，日本在中国东北创设新闻机构，创办报纸，完全是有计划，有步骤，由国家来投资的。

“九·一八”事变前，日本在东北办报的情况

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东北创办报纸，早在本世纪初就开始

了。日本在东北最早的报纸，是营口的《营口新闻》，创刊于日俄战前，日俄战争时休刊。从日俄战后到本世纪20年代，日本人在东北创办的报纸大体如下：

在大连的第一家报纸是末永纯一郎主持的《辽东新报》，创刊于1905年10月25日。其次是1907年11月3日创刊的《满洲日日新闻》，这两报都是日文。1908年10月18日金子平吉创办的汉文报纸《泰东日报》，这是一家颇有影响，出版时间很长的大报。1908年11月，满铁社员滨村善吉，以满铁为后援，创办英文《满洲每日新闻》，是向欧美人进行宣传的工具。此后，1917年12月创刊了《大连经济日报》，以攫取东北经济情报为其宗旨。1919年《关东报》（中文）创刊，1920年日文《大连新闻》创刊，1922年汉文《满洲报》创刊，它原为1922年《满洲日日新闻》汉文版。

在沈阳，最早的一家日本人办的报纸是中岛真雄创办的汉文《盛京时报》，创刊于1906年10月18日，终刊于1944年9月14日，历时38年，当时是沈阳有报史以来，经历时间最长的一家报纸。此外还有1907年7月1日创刊的日文报纸《奉天每日新闻》、1912年9月创刊的《大陆日日新闻》，1921年9月1日创刊的日文《奉天日日新闻》和1924年7月24日创刊的日文《奉天新闻》。

此间，在辽宁地区的日文报纸还有安东的《安东新报》(1906年10月17日创刊)，营口的《营口新报》(1908年2月11日创刊)，辽阳的《辽鞍每日新闻》(1908年3月10日创刊)，铁岭的《铁岭日报》(1911年7月21日创刊)，开原的《开原新报》(1918年3月29日创刊)，抚顺的《抚顺新报》(1921年2月24日创刊)，本溪的《安奉每日新闻》(1926年8月25日创刊)。

在长春，有1909年1月1日创刊的日文报纸《北满日报》，

1914年12月创刊的《长春商业时报》，1920年12月15日创刊的《长春实业新闻》，1920年4月20日创刊的《长春日日新闻》。在吉林有1922年6月1日创刊的日文报纸《吉林新报》。在延边，1924年12月24日创刊日文报纸《间岛新报》。在哈尔滨，1922年10月1日创刊汉文报纸《大北新报》是《盛京时报》的哈尔滨版。同年11月1日，创刊了日文《哈尔滨日日新闻》。

到1927年，日本在中国东北创办的报纸已有70种之多，其中日文报纸以《辽东新报》、《满洲日日新闻》为首，后来这两家报纸合并，又兼并了《大连新闻》，以《满洲日日新闻》的号头出刊，成为一个拥有75万元资金的报纸公司了。汉文报纸影响最大的是《盛京时报》和《泰东日报》。就各报的发行量来看，以1921年为例，《辽东新报》日销量为37 000余份，《盛京时报》销量为25 000余份，《泰东日报》为8 700余份，《满洲日日新闻》为25 800余份，几乎全部占领了东北地区的新闻阵地。

在这一时期，日本国内的通信社也纷纷到中国东北来创设分社，在沈阳有“奉天电报通信社”（1922年成立）、“商业通信社”（1921年成立）；大连有“电通社”（1921年成立）、“帝国通信社”（1924年成立）、“日满通信社”（1921年成立）、“联合通信社”（1925年成立），“商业通信社”（1924年成立）；安东有“商业通信社”（1923年成立）；开原有“商业通信社”（1924年成立）；长春有“商业通信社”（1923年成立）。这些通信分社不仅供给东北各报以新闻稿，操纵东北各报，而且，通过这些分社勾通与日本国内通信社之间的联系，加强日本国内与东北的联系，达到其侵略的目的。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对伪满洲国新闻报业的高度垄断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九·一八”事变，武力侵占了全东北，之后又炮制了伪满洲国傀儡政权。为了强化对东北人民的思想统治，它紧紧地抓住报纸这个言论阵地，对伪满洲国的新闻报纸进行了严格的控制，建立了完整的垄断机构，以便实行高度的集中和垄断。它首先把原东北的中国人办的报纸严格控制起来，进一步再把它消灭掉。“事变”第二天，日军军队就占据了《东三省民报》、《新民晚报》等报馆。用“绑票”的办法，将各报主持人挟持到“满铁”的一个小楼里，恫吓各报今后不许发表反日言论和东北实况，否则将予取缔。1923年11月，伪满公布了所谓《出版法》，规定东北地区的报纸、杂志的出版，要取得他们的认可，并限令东北各报社的记者、职工要登记造册，呈报立案，把东北各地中国人办的报纸及编辑人员，控制在他们的手中。

为控制中国人办的通信社、报社，日本又提出了“一个国家一个通信社”的政策，于1932年12月1日，成立了“满洲国通信社”简称“国通”，通过它来垄断东北的新闻通讯机构与事业。“国通”的任务是采集、编辑、发行新闻稿，为伪满境内汉、日、英、俄、朝鲜等各种文字的报纸及无线电台提供新闻，并强迫尚未停刊的几家中国人办的报纸，使用其新闻稿，甚至还强行命令某条新闻必须登载，某条新闻要用什么标题，登在什么地方，都有严格的规定。为严格控制伪满的新闻事业，实行所谓“日满通讯网一元化”，1937年4月，与日本“同盟社”订立了契约关系，主要内容是：1.“国通”派驻日本和中国（指关内）的通讯员，皆入籍于“同盟”，“同盟”派驻伪满的通讯

员，皆加入“国通”；2. 缔约前，“国通”在日本东京、大阪的支社，和“同盟”在伪满各地的支局，相互移让；3.“国通”从伪满发送消息到日本和外国时，用“同盟”的名义，“同盟”从外国和日本发送消息到伪满时，用“国通”的名义，实行“新闻交流”。“通讯一元化”的结果，使“国通”变为“同盟”的一个支社。

“国通”还极力扩大通讯网，在东北各地增设支局，到1940年，它已有6个支社、24个支局、3个通信部和9个通商部，通过这些支社、局，采集伪满境内的新闻。又通过“同盟社”的关系，利用其海外通讯网和与“同盟社”联盟的外国通讯社，如英国的路透社、美国的联合社、合众社、法国的哈瓦斯社、德国的德意志社、意大利的斯泰劳尼社、苏联的塔斯社等的联系，形成国际通讯网，发送国际新闻。新闻稿，每日发送2至4次，用汉、日、英、俄四种文字，供给各地报社和伪官厅、军宪机关、伪公共机关、银行公司等使用。

为进一步控制伪满洲国的新闻通讯事业，伪政府于1936年4月7日发布“满洲弘报协会组织章程”，9月2日“满洲弘报协会”成立。弘报协会是伪满国务院弘报处的一个隶属机构。弘报处是伪满最高的宣传机关和情报机关，它下面设立许多组织如“满洲映画协会”、“满洲放送协会”、“满洲观光联盟”、“满洲弘报协会”等，分管电影、广播、旅游、新闻各部门。伪满弘报协会是一个完全由日本人操纵的官方组织，它是兼营通讯社和报纸的托拉斯，是垄断为满洲国新闻通讯的“新闻王国”，它把伪满洲国的新闻报道、言论和经营三方面统一起来，实行严格的官制统制。

“满洲弘报协会”不仅政治上有靠山，又有雄厚的经济基础。它成立时有资金200万元，到1940年已拥有资金800万元。它

的资金来源有二：一是伪满政府拨给；二是“满铁会社”、“满洲电电会社”资助。

弘报协会推行“一地一报”的方针，对伪满各地报社进行兼并和“整理”。首先被合并的“满洲国通讯社”，后来由于“业务不便”，不到一年又分离出来，但仍隶属于弘报协会。初期被兼并的有8家报社：日文报社有《满洲日日新闻》、《奉天日日新闻》、《哈尔滨日日新闻》、《满洲新闻》4家；汉文报社有《盛京时报》、《大同报》2家；朝鲜文报社《满鲜日报》；英文报社《满洲每日新闻》等。以后又陆续吞并和收买，到1940年末，已经有19个“加盟社”了。除上述8个报社外，还有“齐齐哈尔新闻社”、“安东新闻社”、“间岛新闻社”（以上是日文）、“泰东日报社”、“大北新报社”、“安东时报社”、“黑龙江民报社”、“三江报社”、“延边晨报社”、“热河新报社”（以上是汉文）、“哈尔滨时报社”（俄文）。这些“加盟社”在业务上和资金上，都受弘报协会的控制。对于不宜兼并的报社，就进行整理合并。1937年8月，它把奉天《大亚公报》、《民报》、《奉天公报》、《民声晚报》、《奉天日报》合并于《盛京时报》。同年10月，把大连的《满洲报》、《关东报》并入《泰东日报》，把长春的《满洲商工日报》并入《满洲新闻》。此外，在哈尔滨、牡丹江、延吉、齐齐哈尔、佳木斯、安东、承德等地，用这种“大报吃小报”的办法，被“整理”的还有14家，当时东北共有40余家报社，属于弘报协会的竟占3/4，其发行量占全“满”报纸发行总量的85%，剩下几家“非加盟社”，其力量微乎其微，根本无力与“加盟社”抗衡，只是因为不问政治，只登社会新闻，才得以苟延残喘，如奉天的《醒时报》便是如此。通过兼并和“整理”，整个伪满洲国的新闻通讯，便全部控制在弘报协会的手中。

伪满“弘报协会”在兼并“整理”其他报社的同时，又极

力加强其内部的业务建设。首先是修建弘报会馆，它是以“弘报协会”和“国通”的名义，投资50万元（伪币）修成，1937年10月动工，次年11月竣事。建筑面积1 200平米，地址在伪新京中央大街儿玉公园（今长春市胜利公园）前。这是“弘报协会”和“国通”的办公楼，一些外国驻新京的支社，也驻在这里，成为伪满洲国的新闻中枢。其次就是培养一批忠于协会的记者。首先是提高报社人员的待遇。弘报协会的报社网建立以后，实行各报社记者报酬统一的制度，各报社的记者，不论内勤、外勤，不论大报、小报，不论边陲地带或城市，在同等级者，其报酬大致相等，用以刺激记者工作的“积极性”。其次，实行记者交流制度，在一定期间内，各报社可以互调记者，使记者熟悉各种报纸的业务，以提高其“素质”。第三是建立专用电话线和电传照像设备。弘报协会利用“电电会社”是其股东这一条件，很快完成了安东奉天间的日、朝鲜、“满”的直通电话，后又完成了大连、奉天、新京、哈尔滨的直通电话线路。“电电”又根据“国通”的要求，于1937年夏，完成了奉天——大阪间电传照像业务，之后又完成了新京——东京间的电传照像业务，同时在伪满洲国内地，特别是偏僻地区也实行了电传照像。这样，新闻稿可以用电话直接发向报社，提高了新闻传播的速度，而新闻照片的传播又较大地增强了伪满报纸的宣传能力。

随着日本侵华战争的日趋紧张和国际形势的变化，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即1941年8月25日，伪满政府发布“满洲国通讯社法”、“新闻社法”和“记者法”，建立所谓“新闻新体制”。这个新体制的方针是：

1. 在文化发达的城市，内容重复的报刊要停刊；2. 在偏远的地方，即所谓“政策实行不彻底”的地方，要创办新的“满

文”报纸；3.“国”内现有报纸，要积极报道伪满洲国情，以使“与国际关系相适当”。

根据上述三个法令，对伪满洲国通信社进行了改组，在1941年12月21日撤销了弘报协会。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为加强对新闻的管制，建立起三个大新闻社。即“康德新闻社”，用汉文出版，统管汉文报纸，合并了18家报社；“满洲日日新闻社”，用日文出版，兼并了3家报社；“满洲新闻社”，用日文出版，合并了6家报社，统管日文报纸。随着战局的发展，1944年5月，《满洲新闻》和《满洲日日新闻》又合并为《满洲日报》。

日伪报纸内容剖析

在日本帝国主义操纵下的伪满洲国新闻报纸，其宣传内容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鼓吹日本侵华战争的“合理性”，宣传“大东亚圣战”、“日满一德一心”，污蔑中国人民的反日斗争，宣扬侵华战争的“辉煌战果”，甚至是制造谣言，用以欺骗中国人民和日本人民。但由于汉文和日文报纸的地位和读者对象不同，其内容上又有很大的区别。这里以汉文的《大同报》和日文的《满洲日日新闻》为代表，加以分析和揭露。

《大同报》是伪满洲国政府的机关报，1932年3月15创刊。这家报纸完全仰仗着日本侵略者的鼻息行事，奉承侵略者的意志，读者多数是生活在日寇铁蹄下的东北人民，所以，它是典型的“奴隶型”报纸。《大同报》每日发早、晚两刊，每日对开3大张，共12版，有“重要新闻”、“专文”、“本市新闻”、“社会新闻”、“经济新闻”、“社评”、“副刊”、“广告”等栏目。

《满洲日日新闻》是日本侵略东北最古老的报纸，也是一家势力最大的日文报纸。它的读者群是在东北负有侵略使命的日本人，包括上至操纵伪政权的日本军政人员，中至掠夺东北财

富的富商大贾，下至无恶不作的流氓浪人，是“奴主型”的报纸。

“社评”（即社论）是报纸的灵魂，它代表政府对当前形势或重大事件发表指导性言论。“杂评”是对一些具体事物发表具体意见的场所。《大同报》由于其奴隶地位，它不敢对形势或重大事件发表言论，很少有“社评”，偶尔有一篇“社评”，也都是无关紧要的内容，诸如“严防偷窃”、“种痘与防疫”、“医师不足与保健”、“妇女职业与道德关系”等。至于“杂评”，则根本没有。《满洲日日新闻》则不同，它每日必有一篇“社评”，各版都有“杂评”，有对一般时事和国际情况的杂评，有对伪满经济的杂评，有对社会问题的杂评等，它站在侵略者或者是统治者的立场，用“社评”、“杂评”来指导形势，或者纠正统治者当局的某些错误。如1940年4、5月间，它出了这样的社评：“急谋根本的对策——油房休业与专管制度”、“贸联推进的目标——认清重大使命”、“物资困难与生活方式的根本改革”等。这些社评不是一般地歌功颂德，而是面对着日本在伪满的实际，发表的“积极”意见。它既暴露了日本对东北的榨取所遇到的困难，又为它出谋划策。“杂评”也是如此，如“关于开拓政策的进展”、“在满纺织业的危机打开的观察”、“抑止物价的昂腾”等。

从“新闻”和“专文”这两个栏目，也可看出《大同报》和《满洲日日新闻》的不同。“新闻”是最新或最近发生的事情，是报纸言论的主要成份，也是形成舆论的主要原料。日本侵略者用捏造的新闻来无事生非，造谣中伤，制造舆论。《大同报》的“重要新闻”栏目，一般只刊登政令新闻，什么“价格并配给统制法”、“强化暴利取缔令”等，强迫东北人民必须遵行。再就是宣传日本侵华的“战果”和对我抗日部队的诬蔑。但是，令人奇怪的是打得如火如荼的欧洲战场，即欧战新闻，却很少报

道。这是因为日本侵略者不愿让东北人民知道欧洲战场的情况和日本在欧洲战场上所处的不利地位。在“一般新闻”和“社会新闻”栏目中，也只登些恋爱、情杀、桃色新闻，再就是什么“满日亲善佳话”等一类麻醉人民的“新闻”。《满洲日日新闻》则不同，它积极报道国际新闻，如欧战情况、外交活动、欧洲特派员的通信。它重视日本国内的新闻，如政治改革、经济难关等。它也报道中日战争的“战果”和对我国抗日战争的谣言，但这类新闻不算太多。它很少报道伪满洲国的政令新闻，对伪满的经济情况，偶而也有比较真实的报道，如“失业满人卧轨自杀——王福仁被制麻会社解雇”、“买价过高公定价过低——屠户铺老板的悲鸣”、“豆腐制造不出来——豆腐坊老板叹大豆的缺乏”。这些新闻暴露了在日寇铁蹄下东北经济情况，意在提醒日本当局的警惕，这和《大同报》的桃色新闻截然不同。

“专文”是指系统地评论文字系统的记叙文字。《满洲日日新闻》的专文，多记日本在东北经济榨取方面的情况，如“东边道资源概况”、“营口港的将来”、“扎赉诺尔油田”、“满洲经济政策的重点转换”、“新贸易机构的经纬及其将来”等文章。再就是关于国际形势的专文，如“苏联的近东政策与土耳其民族”、“欧洲大战对中国事变的影响”等。而《大同报》的专文，则是什么“法院旁听记”、“国军视察记”、“日满关系愈加紧密”等无关紧要的文字。

从副刊上也反映了这两家报纸地位的不同，《满洲日日新闻》不太重视副刊，只有“家庭”、“文艺”等栏目，刊登一些家庭享受、小说、随笔之类的文字；而《大同报》的副刊，名目繁多，“消闲”、“电影”、“学生”、“家庭”、“文艺”等栏目，多登一些毒汁四溢的消闲文字，或登一些“废物怎样利用”、“火柴的经济使用方法”等。在“文艺”副刊中，偶而也能见到

反映铁蹄下的东北同胞悲惨生活的文章。

再值得一提的是《盛京时报》，它和《大同报》一样都是伪满时期销行全东北的头号大报，在它的极盛时期，日出3大张半，14个版面，发行量达18万份。该报仰仗帝国主义特权，针对中国时政，放言高论、挑拨离间、造谣生事，唯恐中国不乱。"九·一八"事变以后，该报更加得天独厚地称雄于沈阳，版面不断扩大，销量增加，及至卢沟桥事变发生后，更加骄横一时，睥睨一切，在沈阳乃至全东北呈现大一统的局面。它的新闻稿很短，一般为一二百至五六百字，外市县新闻在百八十字上下，但桃色新闻、凶杀案、演员生涯等却添枝加叶，篇幅较长。其副刊除综合性的"神皋杂俎"外，还有"家庭"、"青年"、"儿童"、"妇女"、"文学"等栏目，一般都内容贫乏，文字水平亦差。"文学"副刊自1940年后，曾间或发表一些带有进步倾向的作品，这是东北进步作家，利用敌人阵地发表的言论，是日本侵略者意料不及的。随着日本在侵华战场上的失利，到1944年9月15日，《盛京时报》改为《康德新闻》奉天版，结束了它38年的历史。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伪满洲国随之垮台，《康德新闻》同其他在日本操纵下的伪满洲国报纸也都"寿终正寝"了。

综上所述，日本侵略者控制下的伪满新闻报纸，表现了十足的殖民地性质，它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政策的号角和工具，是日本侵华的文化尖兵。

（摘自《东北沦陷十四年史研究》第1辑）

被囚禁的新闻

林　穆

在东北地区，新闻事业也有过几十年的兴衰史，其间还有过一个时期的畸形变化，那就是伪满时期对于报纸的三度统治（日本人叫做“统制”）。由于报纸是反映民意的有力武器，日伪当局畏之如虎，千方百计加以控制，力谋使之就范，一律为他们的侵略政策服务。于是，他们根据愈来愈紧张的局势变化，挥动政权大斧，随心所欲地削改新闻机构，除了统一报面所有的言论、消息外，就连版式、语言，甚至报社的组织也都按照日本方式改变。对于那些不放心的报纸，不论是中文报、日文报，也不论其规模或影响大小，一声令下统统砍掉。如此统来统去，最后终至统成了一家之言，使报纸完全失去了反映民意的性格，这就是伪满时期统治新闻的特殊现象。笔者曾在伪满新闻界工作十多年，现在就所能回忆起来的当时情况，分段做个介绍。

“九·一八”事变前的概况

历时最久发行量最大，而且在伪满最有潜在势力的，是《盛京时报》，这家报纸有38年历史，是日本战败沙俄后企图侵略中国的一支文化尖兵。表面上它是受日本“南满铁道株式会社”支援，暗中据说与日本关东军司令部第四课有密切联系。这个报社的社址设在日本租界内（即今沈阳市和平区和平大街北头），社长先是中岛直雄，后为染谷保藏，主笔是菊池贞二。编辑局长（即总编辑）先为大石智郎，后为酒家重好。编辑人员

有一部分是日本人，多数都出身于日本为侵华而设于上海、专教汉文的“大同书院”。这些人一般都能撰写中文、编辑报刊；采用的华人编辑，有穆儒丐、王冷佛、金小天等当代的知名文士。菊池贞二化名“傲霜庵”专门撰写中文社论（由华人学究李克庭修词）。由于他们是外国人，拥有治外法权，敢于触及满清政府及军阀政权的时弊，意在起离间作用，迷惑了不少读者。当时有些报纸，尤其是《东三省民报》及其附属的小报《新民晚报》(社址在大南城门里文庙旁）洞烛其奸，同他们公开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两下里常作笔战互相诟谇。当然，广大读者还是拥护本国的报纸，所以《新民晚报》洛阳纸贵风行一时。主编者林霁融化名“胡诌博士”，常写一些讽刺小品，最受读者欢迎。

伪满初期的新闻统治

“九·一八”一夜炮响，日本军首先占据了沈阳城，《东三省民报》还坚持出版了许多天。记得那时该报社论公开提出的口号是“沉着、冷静、不屈服”，如此挺身抗争，确是表现出一定的民族气节。不过，所谓“沉着、冷静”，幻想依靠谈判来解决问题，也反映着导致失败的不抵抗主义。不久，日本人便下手统治新闻，多数报纸被迫停刊了，只有回民的《醒时报》被留下来，大概是为了笼络回族。当然，这时的《盛京时报》不仅保留，而且越发活跃起来。他们为了把势力伸张到北满，又在哈尔滨建立了《大北新报》，委派其编辑局长（即总编辑）大石智郎出任社长，成为《盛京时报》派生的子报。后来，著名的大汉奸赵欣伯，通过日本的特许，私人占据了沈阳的《东三省民报》，改出《民报》，并继续出版原有的周刊《沈水画报》，委派他的亲信魏诚斋任社长，日人工藤旨浩任编辑部长。另外，

经日本人批准，又新出现了几家报纸，如《大亚公报》（社长王光烈、总编辑于莲客）；《奉天公报》（负责人忘记）；《奉天日报》（主编杨鸿影）；《晶画报》（主编赵任情）等。自然了，此后各报的政治言论，都要按照日本的定调来歌唱，尤其对政治版的消息来源，伪政权控制极严，只许采用伪“满洲国通信社”稿，别无其他路径。而所谓“国通社”的消息，又都是来自日本的“共同社”、“同盟社”，所以原稿一律是日文，必需要经过翻译才能登载，因而报社特设了翻译部，不言而喻，消息的内容都是鼓吹日本侵略政策的。尽管如此，还常有内令禁止发表某些需忌避的消息，在报纸出版之前，伪警察局还要进行严格审查，如果送审的大样（付印前的整版样）不被盖上“检阅济”（即审阅完毕）的图章，报纸便不能浇版付印。有时盖章以后打成纸型，又临时通知撤销某篇文章，报社不得不在纸型上“开天窗”（挖纸型）或刮铅版，对于消息的封锁，力求风雨不透。

尽管如此严密，中国人心毕竟是他们无法统治的，某些有心人，有时仍能乘其间隙，给他们掏胸一拳。据我回忆，就有过这样的趣闻：

1935年，日本政府摆布当了伪皇帝的溥仪访日，去会见他们的天皇裕仁。当然，他们要大肆开动宣传机器，让报纸隆重宣扬这场傀儡戏。《盛京时报》不但列为头版头条，而且加上最醒目的标题“二圣交欢”。本来这“交欢”二字属于日本用语（当时中文报生搬硬套日本语言的病态很严重），在中文里容易产生歧义，偏偏他们所写的“欢”字，又是平时罕用的“驩”。稿子发到排印工厂，被一位有心的工人看出是可乘之机，就在临付印时，煌煌大标题“二圣交驩”竟然变成了“二圣交驢（驴）”这个字不但闯过了警察局检阅的眼睛，而且传到读者的

手中，这当然是犯了所谓“大不敬罪”。日本宪兵队发现之后，暴跳如雷，百般追查，有一位新来的徒工，勇敢地出面掩护，承认是自已识字水平太低，拣字时错把“驪”字拣成了“驢”，弄得宪兵队也无可奈何。

那时除执报界牛耳的《盛京时报》外，其他报纸的发行量都不甚大，有的只印一两千份甚至几百份，显然，销数如此低微，很难招揽广告，其收入远远不足以维持存在。所以有的报社人员极少，名义上叫做新闻机构，实际只有三五个人支撑架子，而且经常不能开资。他们并不是乐于苦撑，其办报的目的，是为了捞取一点政治资本或招摇撞骗的邪恶势力。如赵欣伯是为了扩张他的汉奸地位，有的人则是利用记者资格在社会上钻营勒索，有些地痞甘愿花钱挖弄，办成一个外县的某报分社，就可以敲些竹杠而自肥，有无工资是在所不计的。因此，有的报纸为了敷衍出版，自己不编，专去剽窃他报的成品，看都不看，就整版搬用，有时连别家报社的声明稿也给搬上了。倒不是说所有的报社一概如此，如《大亚公报》、《醒时报》等的作风还是比较正规的。

“七·七”事变后的新闻统治

日本人侵占了东北后，也把他们内部的派系斗争带到了这些地方。日本的一个财阀西片朝三，一心想借新闻事业在东北发展其私人势力，首先在大连创办了《满洲报》，聘得名士金念曾担当主笔，出版日刊两大张，气派很大。并且他们为取悦中国读者，在战争时期敢于发表日本军失利的消息，例如公然登载过“金泽师团全灭”等的报道。因而这家报纸影响较大，发行量仅次于《盛京时报》。西片曾对金念曾说过这样话：“有朝一日，咱俩同去坐牢。”

西片朝三不是志在旅大一地，是想以他个人的力量在东北新闻界树立权威。他在大连取得初步胜利之后，便开始向北发展，于1935年又在沈阳大西街创办了日刊一大张的《民声晚报》，委马星垣任经理，先委韩篁洲后委张达任编辑长。网罗的编辑人员，绝大部分都是富有学生气质的青年，版面上也就相应出现了一些朝气，因而刊行不久就很引起读者的重视。然而，这种私人势力的膨胀，难免与《盛京时报》等官派形成对立，特别是报纸的内容，老气横秋的"盛京"往往不是青春气盛的"民声"的对手。尤其是在"七·七"事变爆发时，各报纷出号外，抢先出版，展开了报道最新消息的竞争。伪满的报纸编辑工作，夜班只做到10点钟左右，《民声晚报》这时却打破惯例，编辑人员通宵不寐坐待伪"国通社"的最后电讯，天一亮便把最新消息的号外散布全市，因而《盛京时报》的消息常常是瞠乎其后。这一来，两家报纸的矛盾更激化了。有一次伪"国通社"一时疏忽，发出了中国政府《告全国人民书》全文，号召全民抗战救国，《民声晚报》立即译出发表，当警察局慌忙电令撤销时，这篇文章已经发到全市读者的手里了。

在时局日趋紧张的情况下，这类现象使日伪当局十分惶恐，于是，他们又施展"铁腕"，实行第二次的新闻统治。办法是每省只留一家报社（当时日伪把东北全境划为10个省），奉天省自然是《盛京时报》独存（日文报只留《满洲日日新闻》——现《辽宁日报》社址）。其他报纸，包括日文报《满洲新闻》都限于8月1日一律强迫停刊。侥幸的是回民的《醒时报》又被保留下来，这是念它发行量小影响不大，留下做个"配碟"。就在7月下旬，《盛京时报》发布了这条命令，将被扼杀的《民声晚报》当然不甘心，他们以取得出版权为法律根据，抗令不从，坚持继续出版到8月3日。这就惹恼了日本宪兵队长，将《民声晚

报》负责人传去，拍案大叫，宁赌纱帽也要逼迫停刊。毕竟那时法西斯强权高于法律，“民声”和“满洲”等报都不得不一齐关张，至此，西片朝三自我扩张的野心，终于成了泡影。

一果独存的《盛京时报》，从此高视阔步势力更大了，他们把《民声晚报》、《大亚公报》的部分编辑人员吸收进来，注入了一些新鲜血液，版面也逐渐活跃起来，每日出版三大张半，发行量达17万份（在当时的东北算是最多的）。另外，他们还增加了4开版的《小时报》，专门登载一些社会花絮；同时又帮助“锦州省”创建了一份《辽西晨报》。

战争后期的新闻统治

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日本军虽曾猖狂一时，不久便力竭势衰转入困境了。形势日趋严重，日伪当局唯恐人心动摇后方不稳，更想从严封锁失利的消息，于是，他们又进一步统治新闻了。尽管当时长春的《大同报》是伪满政府的机关报，而主宰统治的，仍然是实权在握的《盛京时报》。1943年首先在长春成立一个“满洲新闻协会”，统辖全东北的中日文报刊，由《盛京时报》社长染谷保藏担任理事长。继之，同年又把东北各地的中文报统统改称《康德新闻》，总社设在长春《大同报》原址，调《盛京时报》主笔菊池贞二担当理事长，穆儒丐担当理事，编辑局长酒家重好任总社编辑局长。其他各地的报社全部改为支社，如《盛京时报》改称《康德新闻》奉天版，所有各地方编辑记者，都归总社统一领导调动。这样，各地报纸不光是言论一致，组织上也划为一家，名实都成为真正的一家之言了。这做法，即使在日本也是别开生面的，其目的没有别的，就是要把报纸的喉舌掐得更紧。

伪满国务院弘报处（相当于宣传部），为了虚张声势，还在

1941年、1944年派遣报界代表参加广州和东京召开的“东亚新闻记者代表大会”，1943年在长春召开一个“东亚操觚者大会”（也同属新闻记者大会）。此外，伪弘报处还于1942年在各大城市举行一次“记者资格考试”，对合格者授予充当新闻记者的资格，实际被录用者寥寥无几。

到了1945年8月15日中午，日本天皇裕仁通过广播颁发诏书，宣布忍辱停战，即无条件投降。第二天《康德新闻》的最后一张报，登出了头条报道：“大东亚战争停止，满洲帝国事业至此结束。”于是，《康德新闻》也就随之作了鸟兽散，再也不搞什么新闻统治了。

（摘自《沈阳文史资料》第四辑）

伪满时期在长春出版发行的报纸

洪丽华

在长春沦为日本帝国主义殖民地的14年中，据查到的资料，曾先后出版发行过20种报纸。其中，中文报纸4种，日文报纸12种，朝鲜文报纸2种，蒙文报纸1种，英文报纸1种。

中文报纸

《大同报》

《大同报》是傀儡政权满洲国政府的机关报，是当时影响最大，日本当局控制最严的报纸。大同2年（1933年）3月1日正式发刊。康德10年（1943年）改名为《康德新闻》。社址在长春东六马路原《大东报》社址。“九·一八”事变后，由日本

关东军顾问都甲文雄主持，改组机构，更换人员，刷新版面，改用新机器、新铅字，出版朝夕刊12版《大同报》。经费由满洲国政府补助。从业人员210名。印刷厂在社址后面的平房。机械设备有马力诺尼式轮转印机2台，平板印刷机2台。康德9年（1942年）有轮转印刷机4台，平板印刷机4台。

《大同报》行销全东北。康德元年（1934年）发行1.5万份。在日本东京、大阪，中国东北大连、奉天、吉林等地都设有分社。分社遍于长春各县。分社负责人（即社长）在小县城里也算是头面人物。大的分社兼办通讯采访，写稿人也叫记者，但编制不在总社。当时发行报纸不通过邮局，而是通过分社或由专做卖报的生意人兜揽订户，雇报童送报。朝刊，必须在清晨7点钟前送到读者手中。夕刊是刊登当日新闻，要在吃饭前送到。

大同2年（1933年），社长为王光烈（王希哲，中国人，是金石和篆隶书法名家），副社长为都甲文雄，主编为山田源二，营业主任为横山八郎，发行部长为衣宝田（中国人）。这些人都是经关东军第四科严密注意和慎重挑选的。日本人认为社长王希哲作为旧《东三省公报》社长，是新闻界受难时期——张作霖、张学良时期，奉天的中国报界举足轻重的人物（“八·一五”光复后，王回沈蛰居，后离沈去北京居住）。副社长都甲文雄是个老中国通。主编山口源二笔名“海旋风”，是新闻杂志界有名的锋利而洒脱的笔杆子，是一个老中国通。他崇尚淡泊、侠气而饱经风霜。营业部主任横山八郎，以前曾任北京《顺天时报》记者，后升任东方通讯社北京分社长，被称为“锐利周到而正派的人物”。尤其是都甲和横山的中国话已经不是门外汉，同年轻的中国记者寝食起居在一起。康德5年（1938年），社长为染谷保藏，主编为大石智郎，总务兼编辑局长为汤畑正一，营

业局长为虫明猛。康德8年（1941年），社长为染谷保藏，编辑局长为岩下挥夫，营业局长为福岛洁。康德9年（1942年），编辑局长为酒家重好，原为《盛京时报》编辑局长。

《大同报》社的组织机构，康德10年（1943年）设有编辑局，局长、次长各一名。局长负责编辑局全面工作。局长之下有论说委员，专门撰写社论。

编辑局内设整理部，即编辑部，每块版都有一名编辑负责。

取材部，即采访部。有中国人和日本人记者、摄影记者、漫画记者（日本人，笔名梅琳）。

文化部，名为“部”，实际只有一个人，负责主编副刊。

校对部，负责校对看样。

翻译部，主要任务是将日文稿翻译成中文稿。一是翻译国通社通讯稿；二是翻译该社日本记者采写的新闻稿。同时还负责由长春向沈阳、哈尔滨每天定时的电话通讯工作。当时中国人记者10余人，只有一两个稍通日语。

资料部，一名工作人员，藏有图书、图片和新闻资料。

营业部。

据《大同报》社的记者回忆：到《大同报》社去工作的人员不需要考试，只要有人介绍，填写一份履历表，经编辑局长谈话，认为行了，就可以上班了。上班后，先领“辞令”。“辞令”就是报社发给的任命书。上面写：“兹任命×××为大同报社职员，月薪××元，此令。社长×××（印）。年月日”。报社的工作人员有职员、雇员之分，记者是职员。记者上班后报社给办理市内电汽车全线免票和火车二等车免票使用证明。同时要交两张最近免冠照片，由报社负责，一张交送新京警察厅特务科；一张送交主管警察署特务系，登记为“要视察人”。就是说当了记者以后，就要有特务经常来“视察、观察”了。

记者采访用名片，不用记者证。采访路线由取材部部长来指定。记者出勤，不要求到报社，可以直接到采访地点。不乘公共交通车时，报社有汽车定时接送。遇有特殊采访任务，由编辑局长或取材部长指派。如采访皇帝“临幸”军官学校第一期毕业式，受报社指派的记者，先得到一本封皮上盖着“绝密”章的材料。内中详细说明自皇帝出宫起，至典礼完毕止的一切行动仪式和时间。在正式典礼的前两天，还有一次“演礼”，即预演。除关东军司令官以外，其余自总理大臣以下所有参加的人员，一律到场。由一名近卫军官，手执黄旗，当做“如朕亲临”，一一行礼如仪后，演礼完毕，记者开始正式写新闻稿。新闻稿撰写晴、雨两套，分发沈阳、哈尔滨两社。正式典礼那天，通过电话说清楚天气晴或阴或雨就行了。正式典礼那天，记者必须要穿协和服，戴协和礼帽、白手套，胸前佩带协和礼带。臂上带有黄地红边，印着“新闻记者班”字样的袖标。新闻记者要在指定地点排成一列。排头是班长，是首都新京警察厅特务科长。摄影记者另有地点，服装样式和文字记者相同。对摄影记者有条规定，只许在指定地点摄影，不许走动，而且摄影机会只给一次。有一次国通社的摄影记者在帝宫前，拍皇帝出宫的照片没有拍好，又没有办法不向报社发稿，只好把往年的旧照片拿出来充数。以为只拍皇帝的车，看不见人没什么关系。不料这一年皇帝乘车车饰与往年不同，见报后被弘报处和警察厅特务科同时发现。通报下来，给予罚俸处分。还有一次《大同报》日籍摄影记者在安东（丹东）镇江山上等候给皇帝拍照。等的时间太久了，要小解，又没有厕所。他见满山花木，绿荫丛丛，就躲到深处方便一次。谁知道并未逃出特务的监视。回报社后，大会宣布为“不敬罪”，被罚了一个月的薪俸。

伪满时对记者最好的待遇是免征“国兵”，另外有些机关，如国务院、民生部、市公署、协和会等，都设有记者俱乐部。记者俱乐部有徽章。机关里，都有弘报人员，专司发布新闻，接待记者。有些机关、团体还经常举办记者招待会。有定时和不定时的两种，内容也不一样。有的是为了达到宣传的目的。有的纯属于应酬交际。定时招待会如弘报处主持的火曜会，每周二中午在卜劳威大菜馆举行。中国人记者部分编辑和论说委员参加。会上讲述形势，指出下周宣传重点。主持人多为弘报处参事官庄开永。不定时招待会用于宣传的目的。如，满映拍成新影片举行招待会；演艺协会为名演员演出与各界人士、新闻记者会面的招待会；邮政总局、林野总局为开展业务举行的招待会，都属于此类。不属于宣传目的的招待会是很多的。机关、团体都有这笔经费，经常设宴与记者联欢。

《大同报》朝夕刊对开12版。1至5版为政治、军事方面的新闻版。1版刊登社论和要闻，2版刊登国内国际新闻，3版刊登吉林新闻，4、5版刊登东北各地新闻，6、7版为文艺版，刊登小说、戏剧、诗歌等，8版正页以外，刊登人物小说、风土人情、文化教育、科学历史知识等，9版为经济版，10版和12版刊登广告，11版刊登各地新闻。《大同报》是伪满洲国政府机关报，是日伪当局的舆论工具，政治、军事版都是采用“满洲国通讯社”新闻稿，为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政策服务，大肆宣扬“日满一德一心，谊切股肱，亲善提携”、“满洲国赖盟邦仗义援助，国运年盛一年”等等。语言极其肉麻，呈现一副奴才相。

《大同报》在组织上受伪满国务院弘报处领导，业务上受“新京首都警察厅”特高科的监视与检查。日伪当局对该报的出版是严加控制的。每期报纸在付印之前，都要把大样送交“新京首都警察厅”特高科检查盖章后，才可以印刷出版。但是，他

们对《大同报》副刊的内容却不大注意检查。我地下党组织就抓住敌人这个薄弱环节，利用副刊这块阵地编发抗战作品。在日伪黑暗统治中传播革命火种。

1933年8月，哈尔滨一批革命文艺工作者，根据地下党组织的指示，把长春出版的伪满政府机关报《大同报》副刊抓到手，利用该报副刊创办了《夜哨》文学周刊。每周为该报日刊编一期文艺专刊。《夜哨》的编辑工作由在长春的陈华负责。但每次发表哪些稿件，由在哈尔滨的文学工作者说了算，把要发的稿件寄给陈华，不足部分由陈华补充。这样《夜哨》上发表的一些小说、诗歌和独幕剧，隐晦地揭露了日伪的残酷统治，号召人民起来进行反抗斗争。独幕剧《两个阵营的对峙》描写了一群精神病患者，借铁路员工之口愤怒地喊出："起来，全世界的罪人！"小说《口供》揭露了甘心充当日伪统治者的爪牙，骑在人民头上做威做福的日伪警察的罪行。诗歌《从黑暗中鉴别你的路吧！》和《说什么胜似天堂》，揭露了日伪罪恶统治的本质，唤醒人民起来斗争。"凭自己的力量，凭大家伙的力量，一定能把地狱变成天堂！"

中国现代著名作家萧军、萧红和白朗，都是《夜哨》文学周刊的撰稿人。萧军以"三郎"为笔名发表的诗有：《说什么……》、《全是虚假》、《搬夫》、《喑哑了的三弦琴》和《一天砸碎一电灯泡的故事》；萧红以"悄吟"为笔名发表的新诗《八月天》、小说《小黑狗》、《哑老人》、《渺茫中》、《烦扰的一日》；白朗以原名刘莉发表诗《陨星落了》、小说《只是一条路》、《叛逆的儿子》等。《叛逆的儿子》连载11期。主要内容是通过对一个背叛地主家庭的青年的描写，揭露封建地主阶级的自私、奸狡、残忍和剥削的本性，并发出"将以正义和真理"向其"逼攻"的呼号，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33年《夜哨》发表了一篇署名文光的文章《路》，讴歌抗日游击队战士，被敌人察觉而被迫停刊。《夜哨》从1933年8月6日创刊到同年12月24日停刊，共出21期。在群众中是很有影响的。

《实话报》

《实话报》是《大同报》社出版的一份小报，和《大同报》一样创刊于大同2年（1933年）3月。日刊、4开4版。主要刊登社会新闻，属于茶余酒后低级趣味的读物。《实话报》的名字是当时弘报处的事务官于晴轩给起的。《大同报》和《实话报》的工作人员是可以灵活调动的。

《盛京时报新京号外》

《盛京时报新京号外》创刊于1933年。不定期出版。发行人汤畑正一。

《康德新闻》

《康德新闻》是康德10年（1943年）7月1日由《大同报》改名而来。开始为对开4版大报，出过晨刊，晚刊，日刊。1版为要闻版，2版为综合版，3版为东北新闻，4版为文艺版。后改为小报，4开2版。宣传内容主要是日本军事力量的强大和取得的战果。《东京电》、《大本营消息》充斥整个版面。随着日本在战争中的失利，版面上的《大本营消息》减少了。但日本帝国主义仍不甘心于失败，还利用报纸宣扬他们的势力如何强大。在1945年5月10日的《康德新闻》还刊登文章说："最后的胜利在我日满一体与盎格鲁撒克逊一决雌雄，敌方内藏矛盾，我应努力向前。"在同一天的报纸上发表社论《由欧战结束所得之教训》，声嘶力竭地叫喊："上下一心，坚持必胜信念，忍耐艰苦，奋斗直至最后一个人，甚而最后一人流出最后一滴血以前，绝不屈服，绝不后退。"侵略者的下场走向失败，这是历史的必

然。3个月后的1945年8月15日中午，日本裕仁天皇通过广播宣布日本无条件投降。第二天出版最后一张《康德新闻》，登出头条消息是："大东亚战争停止，满洲帝国事业至此结束。"

《康德新闻》社社长是日本人染谷保藏。内部机构设有编辑局、局长和次长各1人。从1943年至1945年，第一个局长是日本人酒家重好，第二个局长也是日本人须藤，第三个局长是中国人于莲客。编辑局下设：社论委员会、整理部、取材部、文化部、翻译部、校对部、资料室。除校对部外，其他各部都有日本人。编辑记者共有六七十人。

《康德新闻》社的印刷厂，厂长是日本人，叫本川。副厂长是中国人，叫孟兆麟。四五十名工人都是中国人。机械设备有24吋带子式轮转印刷机2台，16页、8页平台印刷机各一台，手播铸字机4台。还有采字、排版、打火版等设备。据当时工人回忆：铸字机铸出字以后，还需要用锉磨去飞刺，用刨床刨去字尾，然后才能使用。铅字有5号、3号、2号、初号等。排版分码小版和成大版，还有换大样子的。成完大版，经校对可以付印时，要用大刷子打好纸型，用压版机烤干纸型后，要倒成铅版，然后上轮转机印刷。每天印出的报纸，用一台三轮摩托车送到东四马路发行所发行。

日文报纸

《新京日报》

大同元年（1932年）由《北满日报》改名为《新京日报》。社址在长春中央通（斯大林大街）。日刊。发行人籍田琢磨。康德2年（1935年）与《大满蒙日报》合并，改名为《大新京日报》。

《大新京日报》

《大新京日报》是在康德2年（1935年）由《新京日报》与《大满蒙日报》合并成的。该报为私人经营。社长中尾龙夫，编辑主任片山民部。报纸每日上、下午共出12版。有轮转印刷机等一切近代设备。在沈阳、大连、吉林、哈尔滨、东京、大阪设有支社。日本昭和11年（1936年）新闻资料记载："《大新京日报》作为推行满洲政策的前哨，发展很快。"《满洲国现势》一书记载："《大新京日报》是满洲国言论界的最高权威。在满洲有完备的通讯网。"康德4年（1937年）10月1日与《满洲商工日报》合并。康德5年（1938年）11月10日改为《满洲新闻》，康德6年（1939年）1月1日将《间岛新闻》买下，作为附属报纸经营。

《满洲新闻》

康德5年（1938年）11月10日《大新京日报》改名为《满洲新闻》。朝夕刊8版。社长是和田日出吉，主编是笠神志都延，总务局长是名越福次，营业局长是和木本久。康德9年（1942年）总务局长是和木本久，编辑局次长是森崎实，营业局长是村田攬雄。印刷设备有超高速轮转印刷机、活字铸字机、照相机。社址在长春中央通（斯大林大街）。

《新京日日新闻》

社址在长春永乐町（广州路）四段一号。个人经营。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伪满洲国成立，日本当局把《长春实业新闻》改为《新京日日新闻》。每日改出上午版、下午版，共8版。后改为晚报，12版。染谷保藏是报社代理人。康德6年（1939年）社长是上田贤象，编辑局长是松本勇，营业局长是水越内之介，总务是十河荣忠。康德8年（1941年）社长是城岛德寿，主编十河荣忠，编辑局长是片山民部，主笔是山口慎一。

印刷设备马力诺尼式轮转印刷机2台，还有莫诺太普铸造机。从业人员有日本人35名，中国人56名。

《满洲工商日报》

创刊于日本昭和8年（1933年）9月25日。晚报4版。社长得丸助太郎，编辑主任佐佐木元哉，主笔松浦郎，广告部主任金内藤太郎。昭和11年社长右谷一。印刷机械平板印刷机3台。从业人员35名。社址在长春大马路39号。

据日本昭和11年版新闻资料记载："自昭和10年得丸助太郎就任社长以后，报纸作为纯粹的市场版活跃在新京工商业者机关报的位置上。"

《满洲日报长春号外》

创刊于日本昭和7年（1932年）3月15日。日刊。发行人男里顺生。

《满日号外》

创刊于日本昭和7年（1932年）。不定期出刊。发行人笠神志都延。

《满洲日日新闻》

创刊于日本昭和7年（1932年）。不定期出刊。发行人中村猛夫。

《大朝满洲号外》

日本昭和7年（1932年）创办。不定期出刊。发行人下村宏、坂来静一。

《大每满洲号外》

创刊于日本昭和7年（1932年）。不定期出刊。发行人城户元亮、楢崎欢一。

《满洲日日新闻新京号外》

创刊于日本大正7年（1918年）3月15日。日刊。发行人

佐藤武雄。康德9年（1939年）发行人中村猛夫。

《新京商况日报》

创刊于日本昭和10年（1935年）。日刊。发行人田代克巳。

英文报纸

《满洲日报》

社址在长春八岛通（北京大街）。民国元年（1912年）创刊于大连，是东北唯一的由日本人经营的英文报纸。康德6年（1939年）11月迁到"新京"（长春）。社长小野敏夫，常务理事太原要，编辑局长中野升，营业局长小山市郎，朝刊8版。设备打字机7台，平板印刷机5台。

朝鲜文报纸

《满鲜日报》

社址在长春永昌路。创办于大同元年（1932年）8月24日。日刊，8版。康德6年（1939）社长兼营业局长李性在，编辑局长廉尚燮，主编山口源二，顾问崔南善。康德8年编辑局长洪阳明，康德9年编辑局长菅原理一，康德10年理事长大本正郎。设备轮转机1台。在东京、大阪、京城、北京、天津、大连、奉天、哈尔滨、牡丹江、间岛、清津、雄基、罗南等地均设有支社局。

《满蒙日报》

创刊于1932年。合伙经营。晚报4版。轮转印刷机1台。据日本昭和11年（1936年）版新闻资料记载："《满蒙日报》以指导住在东北的一百万朝鲜族同胞为目的，于1933年创刊。组织为理事制。营业主任李性在代理事长主持工作。该报发行网遍布东北，直到朝鲜北部。在推行满洲国政策方面具有重要使命。"

蒙文报纸

《青旗报》

日刊。社长菊竹稻穗。

通　讯　社

《满洲国通讯社》

《满洲国通讯》社是由日本电报通讯社满洲分社和新闻联合社满洲分社于1932年合并后创立的。作为推行“满洲国”政策的辅助机构，该社负有极为重大的使命。机构庞大，通讯设备完善。电讯发行除在长春、沈阳、旅大、哈尔滨、丹东、齐齐哈尔、锦州等地设立总分社外，各主要城市均设有分社。经日本中转可收发世界各地信息。电讯发行遍及东北各地。东北各种报纸政治版的消息，只许采用《满洲国通讯》社稿。而所谓“国通社”消息又都是来自日本的共同社和同盟社。

“国通社”创立时，主编兼通讯部长里见甫，编辑部长大矢信彦。机构设有通信部、编辑部、庶务部、联络部、俄文部。社员约百人。康德9年（1942年）12月，十年后的“国通社”人员增加，机构庞大。理事长松方义三郎，理事寒河江坚吾、建部昌满；监事佐藤武雄、顾问小野敏夫。机构设有总务局、编辑局、通信局、业务局、印刷所。

《新京通信》社

《新京通信》社社址在大马路49号。1934年8月由《长春满洲通信》改为《新京通信》社。出版《新京通信》日刊、日文。主要发布“满洲经济新闻”、“机关新闻”和“土建工程新闻”。社长中村明星，编辑长田森卓藏，营业部长都志牧男。

《延边晨报》始末

吴育森

龙井创刊和初步经营（1932—1934年）

1. 创刊和筹办经过。在旧中华民国17年，由延边关俊彦（建国后曾任政协吉林省委员会副主席）、方景涵（龙井电话局长）、姜渭清（延吉商会长）等发起，创办了一个地方报纸《民生报》。由于这个报曾有我地下工作人员孙×（名不详）、周东郊等编过一个时期，在唤起群众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启迪文化方面作了不少工作，因而很有声誉，是个在当时很受边民欢迎的报纸。也正因如此，受到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机关总领事馆及特务机关的嫉视，乘“九·一八”事变之机，勒令于1931年底停刊了。

紧接着1932年3月伪满洲国成立，原《民生报》的编辑长张君实已公开投敌，作了龙井商埠局长（相当于今天的市长），他和日本总领事馆及特务机关之间勾搭得很密切，从张的个人意图出发很想办个报纸为自己增加些政治资本，在敌伪方面更不待言，这些侵略家伙，本来早就总结一条经验“攻心为上”，认为报纸是最有效的工具，何况当时又是所谓“新国初创”，在许多方面需要宣传“王道乐土”的形势要求下，所以也大力支持。因之就在1932年8月20日创刊了《延边晨报》，社址龙井，纸面32页，周六刊。这个报纸从它诞生一开始就赤裸裸地公开了它的真正面目，是以“宣德达情”，“日满协和”，宣传“王道

乐土”为主，是在日本总领事馆、特务机关[1]、延吉市政筹备处三方联合之下举办的，是地方的机关报。这就公开地向人们宣布了它是敌伪政权的宣传工具。

2. 张君实是怎样借机起家的。汉奸张君实据说是清末大臣张××的后人，受过他的先人办洋务的一些思想影响，有一套迎合帝国主义手法，曾任驻美国领事，略通点英语，也有一点玩弄文墨功夫。本来他已落魄在天津了，正赶上东北易帜之后，各地大捕共产党，因此原在《民声报》社活动的共产党人被通缉而走了，张乃得机由天津被聘而来，担任《民生报》编辑长，那时正是“九・一八”事变前夕，日本帝国主义侵略阴谋已经图穷匕首现，中朝人民反日情绪相当高涨，特别影响到边防下层士兵。1931 年秋，我驻龙井的陆军士兵，激于日警夜间挑衅，当场击毙其两名，为此吉林省政府大伤脑筋，幸亏得到地方群众反日情绪的帮忙，特别是下层士兵，仇日思想很盛，日本才没敢继续挑衅，结果赔款 2 万元了事。由于这件事《民声报》反映了当时士气，代表了正义呼声，起了支援政府作用，帮了政府一个大忙，论功行赏，张君实侥幸邀功，被提为龙井商埠局长（这是当时一般地方官们争逐不得的一个肥缺）。实际上张只不过巧妙地利用了人民、士兵抗日气氛，在报纸上写了几篇抨击日方挑衅，为政府争争理的文章，反映了当时人民的反日高涨情绪，遂迫使日本鬼子仓卒由朝鲜出兵，停留不及一月又仓卒撤回。

不久伪满成立，张乃公开投敌并攀到汉奸张燕卿（曾任伪财政、外交、实业部长，据说是张之洞的儿子）门下，称兄道

---

① 日本陆军罗南十九师团驻龙井的特务机关，公开挂“日本陆军驻龙井特务机关”的牌子。

弟，就这样他接管了《民生报》社的一切物资及一部分人员，创刊了《延边晨报》，把《延边晨报》抓在手里，成为自己政治上、经济上的资本。据了解伪政府每月补助报社300元，大部为张所中饱，另外张还向报社安置私人，扣押工人工资，十足表现出其剥削阶级丑恶本相，不过这个贪心的家伙竟因恋于烟（鸦片）色（好宿妓），1933年不光彩地死掉了。

当时依附于张的有张抱一，他是在张的培养下而继起担任《延边晨报》的主编角色。他在报上写了不少“社论”，大部为敌伪张目，替敌人宣传的，因此也很为敌人所赏识。还有个二号角色牛月峰，他主编地方版和文艺，是个灰色人物，在初期表现还好，后来干脆堕落得不屑一提了。

3.《延边晨报》的主要活动内容。《延边晨报》是接续《民生报》而发刊的，由于人民对《民生报》有个较普遍的良好印象，所以虽在沦陷期间人民对于《延边晨报》也是寄予很大希望的。但实际它已变质了。它的版面共分4个版，每版8开，全幅一大张，第一版是国际版，即以社论和国际新闻为主要内容。第二版为经济版，主要为国内政治、经济消息。第三版为地方新闻，主要有日伪军事战报（主要与抗日武装力量作战的一些报道）。第四版是文艺，主要发刊一些各阶层人们所写的所谓天籁心音，毫无思想性可言，个别篇章尚隐讳地说明了一点问题。

这一时期总的主要罪恶活动，即在政治上帮了敌人一个大忙，替敌人侵略起了开道鸣锣的作用。因为那时日军刚侵略东北，人民反日情绪并未因日军强兵压境而慑服，抗日风暴风起云涌，延边一带色彩尤为浓厚。其中主要抗日力量是后起之秀的抗日联军，那时在延边最为活跃的有金日成、童长荣、柴世荣、崔贤、延吉县王隅沟，安图县的大蒲柴河，和龙县的长仁江，药水洞，汪清县大荒沟、罗子沟都是抗日的著名根据地。日

伪军警每次战斗回来都损伤很大，但在报纸宣传上，却从来不输口，称自己是“皇军”，称抗联为匪（赤匪或思想匪），每次都“凯旋”，“斩获多少”云云。这个报纸就起了炫耀日军成功，泄抗日气氛的作用。报纸的社论一方面宣传“王道乐土”，“日军替民除暴”，一方面宣传“抵抗日军无用”，“无异以卵击石”，因此日军每次出动，都附带大量报纸，以向抗日武装和人民宣传，企图惑乱和瓦解军心，涣散人民抗日力量。但事实上这些报纸不落在抗联手里则已，一落在抗联手里就成为抗联了解敌伪情况的参考资料了。这个时期的该报第四版由于日伪当局的检查还有一隙可乘，不少进步文人，组织了“秋原”、“银岛”、“晓风”、“蔷薇”等专刊，刊载一些倾向进步的诗文，但多属政治上、思想上的苦闷的象征，还缺乏真实的面对面斗争，当然更谈不到什么明确的政治方向了。

迁延时期（1934—1945年）

1. 迁延背景。1933年伪满地方区域改划，成立了间岛省，省城设在延吉，因而延吉成为政治、经济中心，同时日本总领事馆撤销了。根据这种客观形势需要，《延边晨报》就由龙井迁到延吉发刊，社长由日本有关人员委派，让新由抗日救国军投降不久的周东华来担任。周也是个个人野心不小的家伙，企图以报社作为个人政治资本乘机搞这样或那样活动，以为龙井不如在延吉接触面广，也力主迁延，于是该报乃于1933年迁到延吉。

2. 周东华是个什么样“人物”。他是头道沟地主周老总的儿子，在张作霖的讲武堂学过几天，当过旧东北军的士官，1931年担任延吉县地方武装保卫团团长，“九·一八”事变后，追随救国军担任团长，后来在抚松投降日军，是延吉日本宪兵队长

佐藤最赏识的红人。“七·七事变”后，佐藤调华北日本派遣军，周又投到佐藤那里，依靠佐藤的力量先后担任牟平、聊城县长，与我山东抗日人民武装为敌，做了许许多多坏事，解放后听说已被镇压。

周不仅政治上是个败类，生活亦极下流无耻，狡诈异常。在他担任社长时期，专门巴结日本人，给当时日本人警务厅长吉村送礼（上等的人参、鹿茸等），伙同日本宪兵队的邵旭东翻译敲诈勒索，以庆祝报社迁移的名义，向当时的延吉大商号管家磨房、齐家磨房各勒索了200元，其他人100元50元不等，都为他们自己所分肥；另外还以发行地方人物志的名义向地方各阶层人大量勒索，每人最少3元，按出资多少，编写个人事迹，收的钱也都纳入个人腰包。周的另一套本领即玩弄女人，专门搞戏子、妓女，稍有逆意，即伙同他的伪军、伪警朋党寻隙生事，曾逼得当时在延吉唱得正红的金灵芝出走，还砸过演员的下处（住宅）。

周虽是武人出身，但却有几个文人朋友，为此，他由伪《大同报》（伪政府机关报在长春出刊）拉来李绩勋担任编辑长，陈大录担任政经编辑，赵鲜文担任文艺编辑，吴育森担任地方编辑，除吴以外全是新人。报纸已完全变为地道的伪宣传工具和黄色新闻了。从报面看，第一、二版全是日伪政治、经济新闻，第三版全是地方新闻，第四版全是些黄色低级杂品、短文，读了令人作呕。总之这一时期的《延边晨报》进一步替敌伪作宣传，卖力气更大了，如伪满建国4周年纪念，该报征文时，有一条当选标语是：“建国仅四载，政绩胜千秋。”以此就足以证明其平常干些什么了。

到了1937年由于日本侵略者对东北统治已渐巩固，乃进一步向华北伸侵略魔手，同时加强其对东北内部的统治，厉行改

革各种机构，对新闻事业也进行严格控制，成立了所谓“满洲弘报协会”，举凡全东北的新闻出版事业单位全隶属在这个系统之下，是一个大新闻托拉斯。它兼并了其他中小新闻事业单位，在这种情况下，《延边晨报》就为满洲弘报协会接管了，周东华得了1 000余伪币的油水，借机下台找到他日本靠山，随着日军进关当上了伪山东牟平县长。

这一时期《延边晨报》的主要活动，是大肆宣扬日军侵略东北、华中、华南战果；进一步麻痹人民斗志，仿佛日本已占领半个中国，中国殆无挽救希望，灌输侵略是“仗义兴师”，中国应甘受奴役的思想，说东洋有个日本可以当亚洲监主；不受白种人侵凌，联苏联共是最大罪过，主张“反共反苏”，故意为侵略者辩护，故意歪曲真理，仇视苏联，仇视中国共产党；诬蔑反侵略战争，诬蔑人民力量，宣传“支援日军、完遂圣战！”在东北全力灌输治安肃正，主张“彻底排除共匪”（主要是抗日联军）。

3. 迁延后期。1937年《延边晨报》由满洲弘报协会接管后，派来了日本人社长（由满洲国通讯社延吉支局长中村秀男兼任），改名为《间岛时报》，由《大同报》又派来了新编辑长张钰霖负责编辑事务。内部机构有所精减，只设编辑、营业、印刷三部，统受社长领导。这一时期在编辑形式，印刷技术方面，都比从前有提高，能自己铸造铅字，印铜板，也就是说它作为宣传工具，更为有利于敌操纵了。

1940年以后，由于纸张逐渐紧张，报面缩为16开周六刊，人员也有更迭，派来了日本人专职社长木谷仁，原编辑长张钰霖调回《大同报》，由吴育森接替，营业部也派来了日本人部长。木谷仁是个老牌日本特务，远在“九·一八”事变之前即来东北，专摘政治、经济情报，因此曾得到日皇的“御赏”，这是他

一生最引为光荣的，常常在得意的时候向大家夸耀。来延之后，和日本特务机关、宪兵队往返仍很密切，一些年轻的日本特务、警宪人员都恭维他是“先辈”。不过在这一时期他对报社内部人员一般采取笼络手段，并未授给他们什么特殊任务，他本人和特务机关关系密切的另一证明，即曾接受特务机关委托，把一个曾受日本特务机关训练过的中国特务赫贡发派到报社，假充报社记者，到县公署等机关进行采访，干着特务勾当。社内人明知他是特务，多敬而远之。

4. 这一时期的报社活动。在宣传方面已经是更进一步大谈“大东亚共荣圈”，“日满华一体化”，“共同建设反苏防共的新体制”，“皇军必胜、美鬼必败”等等谬论。内部情况报道大体是：第一版完全是战斗消息，新闻来源完全是“满洲国通讯社”（简称国通）供给。记得当时常常以头条消息报道“大本营发表”——即日本最高司令部发表的消息，实际上这种消息也透露出日军作战常常吃败仗的情况。由于在宣传上不输口，所以常称这种失败叫“玉碎”（取宁为玉碎不求瓦全之意，实际上是全军覆没完全被歼的代称）。在国内政经版第二版多宣传伪《国兵法》、出荷（搜刮粮食）、储蓄、献金、献铁，实际上是公开搜刮民财，借助于新闻宣传来动员，打掩护。第三版地方新闻，大部为当地敌伪军政警宪机关所提供，原因是那时伪省、市、县公署都成立了弘报股，它受伪国务院弘报处领导，一方面对新闻出版机关进行监督，一方面对这些机关提供一些政府所要宣传的资料，每天记者都到那里去采访。报社专有一名记者，专跑这一线路。另一记者则专跑伪日警宪机关，采访他们所提出的消息。这类消息有时以军政首脑发言姿态出现。有时以记者采访所得消息出现，此外还有些报社各地分社所提供的所谓“社会花絮”，多属桃色新闻，故意耸人听闻，迎合低级趣味，哗众取宠

之类的东西。

敌伪对报纸是怎样操纵的

1. 派其最亲信走狗或直接派日本人担任领导。伪《延边晨报》从创刊到"八·一五"解放，先后共有5个领导人，前两个是投敌的叛徒，张君实和周东华，都是日本人的亲信宠儿，后3个中村、八木、木谷等都是日本人，负责全面监督。举凡报社编辑、营业最高权限都把持在他们手里。末期连管营业的也都换上了日本人。全部职员不足10名的一个小单位，竟插进了两名日本人，其浸透工作可见一斑了。

2. 通过"检査新闻"来进行制裁。每天报纸编辑排版完了，在未印行之前必分头的向当时的省弘报股、市警务厅特务科、宪兵队三个机关先送一个样本去检査。负责检查新闻的人员是受过专门训练的，一张报纸从头到尾全部检阅一遍，如无问题，即可印行，如有问题，轻者空白，即所谓开天窗，重者补换或停止印刷，有时还要找编辑人进行追究。记得有一次发生过这样一件事情：内容中有一段新闻是报道日皇检阅军队的记事，文字中恭维日皇为"大元帅陛下"，不慎被印刷工人排成"犬元帅陛下"，一字之差这是对日皇的大不敬，按出版法来讲，这是犯罪行为，幸在未印之前发现，立即订正。虽如此，编辑人员被警察列入"刑事要视察人"（即应受秘密监视），很长时期才获解除。

3. 用新闻出版法来严格限制出版自由、言论自由，如违反出版法即以反满抗日名义治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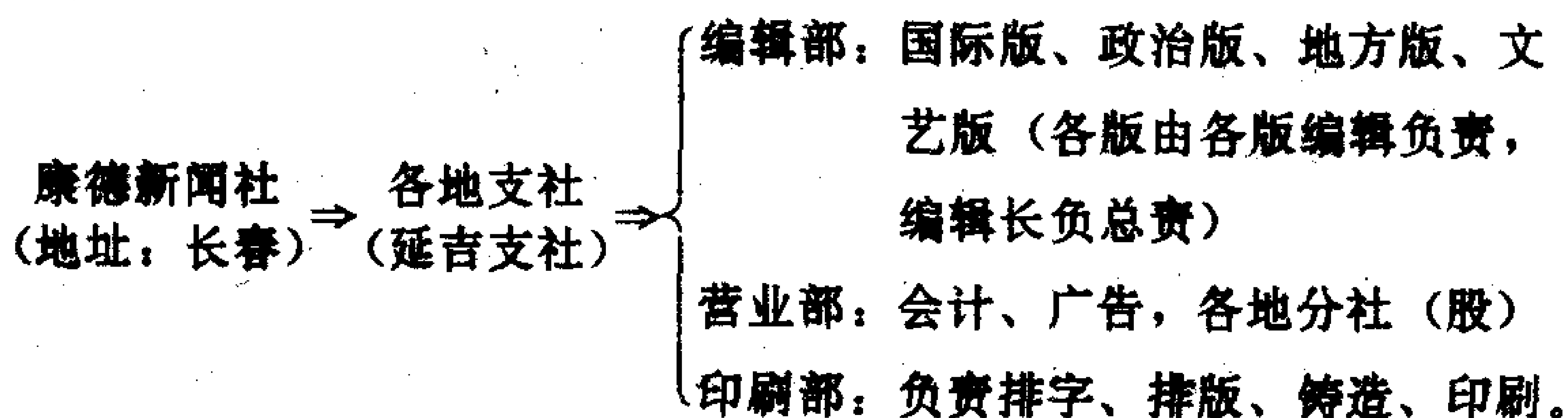
4. 通过内部密令，限制或封锁某些消息。如抗联破坏某某铁路线，攻下了某某城镇，日军在安东对教育界的大屠杀等重要事件，事前向报社发来指令，不许刊载。其中有永远不许刊

载的，也有的短时期封锁的。如伪满实行粮米统制时，在事前禁止刊载，在正式实行之后才准许登载的。

5. 通过地方机关进行材料垄断。伪省、市、县公署全有弘报股，专门替政府发言，发表消息，为报社记者提供资料，另一方面他们还代表政府，监督报社。

6. 中央监督报社的系统，是国务院的弘报处、关东军的报道部。他们是报社的太上皇，发号施令，成为敌伪新闻事业的中枢。

7. 通过本业务部门进行内部控制。伪满末期全东北汉文报纸统一归并于康德新闻社，人事、经济、编辑事务，实行高度集中到中央，各地支社均无权力。所以到了后期各报版面几乎一模一样，仅仅三、四版略有变化而已，说明敌人对新闻统制已达极点，其结构大体如下：



《延边晨报》发行量虽不太多，每天只发行500多张，但其分布区域却是全延边各主要城镇都有，其宣传面并不太小，作用是很坏的。

《延边晨报》之下还有各市、县、城镇分社（共20余处），虽属代销报纸性质，但也有写稿业务（如今天的通讯员）。他们往往借写稿，或招募广告向群众勒索；也有的借办代销为名，设赌抽头，诚为社会之瘤。

简短的结语

《延边晨报》（后来改了两次名），从1932年创刊到1945年

停刊，是与伪满共存亡。原因就在于它是敌伪的宣传工具，地方政府机关报。

日本侵略者对于侵略是有其各方面经验的，办报纸做开路先锋也是其得意之作。日寇很早就在东北办过《盛京时报》、《泰东日报》、《关东日报》一类报刊，从来对报纸是抓得很紧的。它所派进去的人也是老于斯道的，不仅掌握编辑方向，甚至经营管理，事无巨细，一插到底。

伪满新闻界点滴

金永顺

1940年8月，我考入伪满《大同报》社，在编辑局任电稿（日文）翻译，兼给文艺部绘制卡通。以后又调到吉林支社担任国际版编辑。

现将当时敌伪统治下的“新闻事业”中，我所闻所见的一些情况凭记忆拾掇如下：

《实话报》造谣是家常便饭

《实话报》是伪都中的一份黄色小报，记者经常是“闭门思访”故意编制“桃色新闻”和一些光怪陆离的无中生有的消息。惯用“姑隐其名云云”等词句，假造事实，取材偏重于低级趣味，兼而起到麻醉思想的作用。记得该报有一次因雨天无稿，一记者闭门搞了一篇《某旅馆内野鸳鸯幽会，登徒子用灯泡探入巫峡》的捏造消息，一时小报风快。这条消息不但通过检阅，还得到日人编辑局长岩某的赞扬，称之为“有出息的记者”。

一字之差，险些坐牢

1942年，伪帝溥仪出巡安东，正值我在《大同报》值班。在刊载伪帝出巡这条消息中，排字房工人将“皇帝陛下”排成“皇帝狴下”，经我校对并未发现，所幸送交检阅之前被校对主任发现才免于难。事情发生之后，大家都担着一把冷汗。因为这一字之差，就会判你个“思想犯”、“大不敬”的罪名。为这事，我们一起值班的几个人都写了“悔过书”。

端午节前发生的事

1944年的端午节前，伪吉林市公署经济科决定因循中国旧俗实施特配白糖、鸡蛋、汽水。分配量规定日本人每人鸡蛋5个、汽水1瓶、白糖1斤；朝鲜族每人鸡蛋2个、汽水1瓶、白糖0.5斤；中国人每人鸡蛋1个、每户汽水1瓶、每户白糖1斤。此事引起《吉林新报》几个同事的不满，从“日满协和”来讲简直是把日人、朝鲜族人和中国人分成老少三辈，于是大家在《龙潭晓钟》栏目中，对不平的事实加以攻击，立即引起驻扎吉林的日本宪兵队长、吉林警务处特务科长、吉林市副市长的注意，随后就发生了《吉林新报》编辑长失踪的事件。

哪里敢有真实的报道

1944年敌伪逼粮（出荷）的最紧张阶段，报社里派出一位外勤记者随同“出荷督励班”到桦甸县境。他们发现十八九岁的大姑娘，见到来人仓惶跑进囤子里去不肯出来。当时还以为是山沟里的姑娘好羞怕人，嗣后听到当地人反映因为棉布奇缺，许多人穿不上衣服，有许多家是两口人穿一条裤子。类似这类消息，敌伪是不准许如实报导的，只有伪造虚构才能通过检阅，

否则就有“思想犯”、“文字狱”在等待着。

伪满洲国通讯社专门供给各报新闻通讯稿件，该社和伪首都各新闻社和报导机关有通报用的直线电话，这种电话专门由日本人把守，通报的主要作用是临时传递“重要新闻”和“注意事项”、“取缔事项”。记得有一次北满密山附近一座日军火药库被我抗日军队炸毁，“通报”传递了这条消息，随后又附注“禁止发表”（“通报”用的电话就在我的邻座，由一个叫佐野的日本人负责接听并记录，有时他记完以后离座，我就偷看几眼）。

伪满新闻业发行概况

郭骐

东北沦陷14年，在日伪统治下，按新闻业发行变化的概况可分三个时期，由1931年至1935年假定为初期，由1936年到1940年假定为中期，由1941年至1945年东北解放止假定为末期，初期可称为全盛时期，中期末期渐趋衰落。仅就个人所知概述如下。

伪满初期新闻业发行及分布概况

哈尔滨新闻业发行概况

1.《国际协报》(大型)，发行人张复生，社址哈尔滨道里。

2.哈尔滨《公报》(大型)，发行人关宾如，社址哈尔滨道里。

3.《滨江时报》(大型)，发行人范介卿，社址哈尔滨道外

南头道街仁义巷。

4.《东陲商报》(大型)，发行人××(不详)，社址哈尔滨保障街。

5.《晨光报》(大型)，发行人××(不详)，社址不详。

6.《午报》(小型)，发行人赵郁卿，社址哈尔滨南十六道街。

7.《大北新报》(小型)，发行人《盛京时报》社，社址桃花巷，社长是日本人山本久治。

8.《公报》(俄文版)，发行人《公报》社发行。

9.《哈尔滨新闻》(日文版)，发行人是日人，社址道里一面街。

10.《哈尔滨日日新闻》(日文版)，发行人日本人，社址道里地段街。

此外尚有薛大可(来历不明)在哈组织发行《东北日报》(记不准确)，仅昙花一现旋即废刊。王觉民在哈尔滨头道街发行《民报》，因经费关系为时不久即停刊。

11. 外地出刊(指关内外)之报纸，在哈尔滨设立支社或分社以营利为目的贩卖有如下多种：

国内：有长春、奉天、天津、北京、上海等地出刊者有长春《大东报》；奉天《东三省公报》附《小公报》、《盛京时报》；天津《大公报》、《盖世报》；上海之《申报》、《新闻报》；北京之《北京晨报》；以上都是大型报，有的一张、二张、三张。北京《实话报》、《京报》，为小型报，因内容之不同皆拥有一部分读者。

国外：绝大多数为日本东京、大阪出刊之，如《读卖新闻》等，读者仅为日人。

哈尔滨当地发行之各报，内容绝大多数登载国内外要闻及

社会新闻、经济消息以及文艺作品。发行之目的除《大北新报》系日人经营带有文化侵略性质外，其余都以营利为目的，所以对人员设置（包括编辑、营业）虽系大型报亦是人数很少。如在编辑方面仅有编辑长或总编辑，编辑、外勤记者则有的一人，有的不设。因而产生了职业记者（指采访当地新闻）一稿两投甚至三投赖稿费以为生的现象，其内容则多系道听途说，闻风是雨，甚或闭户造车，故耸听闻，甚至借以欺作者，故在报面上经常发现更正启事。

长春新闻业发行概况

长春新闻业远不如哈尔滨发达，我所知仅有《大东报》一家。虽系大型，内容简陋，其他则不详，后改《大同报》并出刊小型的《实话报》。

奉天新闻业发行概况

1.《东三省公报》附《小公报》，发行人王希哲。此系中国人在奉天经营的绝无仅有的报纸，在编辑印刷等方面远胜于哈尔滨发行的报纸，颇受读者欢迎。

2.《盛京时报》，发行人日人，大型两大张。因出刊多年，再加日侵略者别具野心，不计赔赚，在内容、印刷上力求充实，整洁，所以发行份数较多，贩卖较广。

此外在大连尚有日人经营《汉字报》、《满洲报》、《关东报》亦系大型，较次于《盛京时报》。其贩卖地亦远达长春、哈尔滨各地。

以上系1931年前后的新闻发行概况。迨至“九·一八”事变后，伪满洲国成立，哈尔滨《晨光报》、《东陲商报》、《民报》先后停刊，原因不外经费不足，营业不振所致。此外所余的中国人发行的报纸虽仍照常发行，但在当地警察厅的监督下（所有稿件必须通过检阅，即使日人出刊的《大北新报》，也是

这样），不过仅维持现状而已。时《大北新报》由小型的扩充到大张（大型）。

此外受外地影响（指奉天有画报出现）哈尔滨也先后出刊《五日画报》。发行人虽系《大北新报》，实际经营者为中国人靳辑五，在《大北新报》，的援助下，自负盈亏，刊载内容与《五日画报》同。为时不久靳辑五据说因欺诈被当地人告发被日本军队逮捕死去，即行停刊。《五日画报》后几年（时间忘了）因曲狂夫改业停刊。

材料（指刊登的国内外要闻及社会新闻以及经济消息，文艺作品等）来源。当时哈尔滨发刊的各报要闻皆由日本的电通社以后是国通社供给，社会新闻则为职业记者供给，经济消息则大多数为当地的钱粮交易所发表的每日发生经济的情况，属于文艺类则为一般读者，有的给稿费，有的无酬。

经营方式。少量直接卖给读者，大都以分社性质大力招揽承办人，给予一定的利润、由分社转送到读者手里。由承办人先付出一定数量的押金（按包销份数而定），在名义上总社对分社凡事给以支持，因此，属于懒惰分子们即乘机开办某报分社，既能谋点利润，又能借此为护符从事设赌卖大烟等不法活动。分社开设地址不限，除哈尔滨、长春、奉天各大都市一种报纸可能有3～5个社外，县镇甚或一个屯也有1到3种报纸的分社。各分社所交的押金则皆为总社资金周转的流动金，换句话说，各报社即依赖此押金维持营业。

伪满初期在哈尔滨出刊的中国报纸如《国际协报》有时不甘心受日本侵略者的统治，也登载有刺激性的记事。哈尔滨《公报》、《滨江时报》等则皆着重营利不计其他，因而在初期的后一段时间，《国际协报》遂在日伪当局的压力下废刊。《滨江时报》亦因经济条件所限营业不振停刊。哈尔滨《时报》则仍

然照常发行，《午报》也依然存在。

伪满政府对新闻业的统治，系由两方面入手，一方面由长春所在的伪国务院弘报机构来领导（以后改名为弘报处）。各个时期的宣传重点、内容、方法都由该弘报机构统一指示，通过长春的国通社供稿或直接向各报社发出书面指示；一方面由各报社所在地的警察厅特务科弘报股来监督检查欲刊载稿件，如有不应公开的记事虽然已经铸版亦得挖去，如已印刷亦禁止贩卖，对责任者给予申斥和写始末书（检讨书性质）的处理。这个现象多发生于国通社身上，即不应发表者国通社有时不慎发表，至于各报本身在记事中如发现错别字容易引起与日伪不利影响者，亦如此处理。另外如地方机关也专设弘报机构，省市机关有什么重要政令或什么措施会议等需要宣传，则由弘报负责人员召集各报记者发表，也有时由省市长用谈话形式对记者发表，统一刊载报上。一般性新闻亦必须由各机构中直接责任者许可，记者才可能撰稿刊登，否则对记者要给以责难，或阻绝记者以后采访的道路。

各报社的经费来源除专靠各分社的押款作周转资金外，还赖每逢新年和各纪念日、节日（指春节）招登庆贺新年广告的收入。广告专人兜揽，予以20%提成。所以每个新年这项广告费收入即有达数千元者。报社本身因为增加贺年广告版面亦增加，不另收费。

版面编排技术除《盛京时报》外多不注意。伪满末期所存在的各报在原有的基础上都有所改进，但仍无足够吸引读者的能力。

各报纸大多数社长以下分编辑、营业两部。编辑部有的设主笔（如《国际协报》），有的设总编辑或编辑长，下设编辑、记者；营业部则分营业、工厂两个部门。除属于印刷事务归工厂

外，其余如贩卖、广告以及会计等业务都归营业部门管理。

伪满中期新闻业发行及分布概况

“七·七”事变后，因日本侵略者之贪婪无厌，侵略锋芒又指向全中国，对伪满的统治日益加强，新闻业更不例外。在残酷的压力下，中国报废刊的废刊，收买的收买，按地区形成三大势力；即南满以奉天为中心的《盛京时报》；中满以长春为中心的《大同报》；北满以哈尔滨为中心的《大北新报》。但此时的《大北新报》仍未与《盛京时报》脱离母子关系，一切经营管理仍归《盛京时报》监督，而规模则已与《盛京时报》几乎并驾齐驱，斯时出刊的报纸大致如下：

哈尔滨方面

1.《大北新报》(大型)，出刊2大张，有一个时期出刊3大张，不久又改2大张。

2.《午报》(小型)，斯时已为《大北新报》收买，仍然以原名义正常发行。

3.《公报》(大型)，出刊一大张。

4.《五日画报》。

长春方面

1.《大同报》(大型)，两大张。

2.《实话报》(小型)。

奉天方面

《盛京时报》(大型)，2大张。

《东三省公报》(大型)、一大张（忘了此时是否存在，估计是在这个时期中废刊的)。

大连方面

《满洲报》(大型)，两大张。《关东报》(大型)，一大张。中

国内地各报，在伪满洲国贩卖逐渐减少以至绝迹，即或有亦包裹甚密不露痕迹。日文报如《读卖新闻》等，因日本人增多贩卖份数亦大渐增加。通讯社——满洲国通讯社（简称国通）已逐渐扩充。

在此期间，日伪当局为使中文报纸在宣传方面能够满足要求，于1936年在东京召开大东亚操觚大会，被召集的有汪伪政府记者代表团、伪满洲国记者代表团。

1927年日本撤销在伪满的治外法权，在伪满国务院弘报处主持下也派随行记者团前往东京。

伪皇帝赴日本时，亦有记者团随行。在汪伪政府成立时，伪满政府亦派遣记者前往观礼。

在此时期，各省亦间有发行之小型报，如在锦州省有《锦州日报》，吉林省《吉林日报》（在初期即已发行），还有《抚顺时报》、《黑河时报》、《三江报》（三江省佳木斯）、《黑龙江民报》，至于各报确实发行年月，系官费或私营都不详细。

伪满末期新闻业发行及分布概况

日本侵略者在所谓的大东亚战争发生前，对新闻业的统治已愈益加强。在伪满国务院弘报处的决定下，每周在长春召开各地编辑责任者定期会议，弘报处在这个会上指示如何配合时局作好宣传工作，各报社汇报上周工作情况，这个会议多为日系人参加，至于中国人则参加以《大同报》为召集者的各项会议（进行一个时期即行停止）。

1940年7月第二届大东亚记者操觚大会，由汪伪政府主持在广州召开。被邀参加者有日本新闻界、伪满新闻界代表团。1941年秋伪国务院弘报处为便于统治和统一领导，以在长春的《大同报》为中心将奉天的《盛京时报》改称康德新闻社奉天支

社，原《大北新报》改称为康德新闻社哈尔滨支社。

奉哈两支社无理事会。哈尔滨支社编辑局在局长下设编辑、总务，地位与局次长相当。两支社本着统一领导的精神，在总社的指示和支持下，对所在的南北满各省发行的小型报进行买收归并，如奉天支社《抚顺日报》、《锦州日报》买收合并改为康德新闻社抚顺支社、康德新闻社锦州支社。哈尔滨支社则将《黑龙江民报》、《三江报》、《黑河日报》买收合并以后，又开设康德新闻社牡丹江支社、东安支社。此时一切重要记事则在伪国务院弘报处的指示下，统由康德新闻总社撰好，分别向各支社发送，限期发表。

1943年伪满举行庆祝建国10周年活动时，大东亚第三届记者大会在长春召开。参加者除伪满各报记者外，日本和汪伪政府都有记者团参加，这个会的主持者为伪国务院弘报处。

在康德新闻社出现的同时，哈尔滨出刊的《公报》于斯时亦改称为《滨江日报》。虽照常出刊（大型），但亦是气息奄奄，勉强出刊而已。斯时，哈尔滨新闻业只有康德新闻社哈尔滨支社和《滨江日报》两家，长春则只康德新闻社一家，奉天则只是康德新闻社奉天支社一家，而体系亦一元化。至于大连亦只有《满洲报》一家，较诸伪满初期使人有不胜今昔之感。这个局面直至1945年东北解放。

日军侵占后的佳木斯电报局

陶冶镕口述　刘天光整理

1931年爆发“九·一八”事变，虽然东北地区成立了伪满

洲国，但行政机构，基本是原班人马，换汤没换药，所不同的是把国旗的“青天白日满地红”换成了“红蓝白黑满地黄”而已。延至1934年，才有日本人正式接收电报局。时间是在冬季的某一天晚上，突然开来了很多辆轿车，有官、有兵还有翻译，其中也有不少文职官员。第二天主要机关、部门都派来了日本人。

来佳木斯电报局进行接收的第一个日本人名叫高木卫。他是日本海军的退伍通信军官，通晓英文，并能拍发英文电报。到任后的职务为“主事”，这是日本企业的官衔。他的权力大得很，局内的一切大权，都由他掌管，就是局长要决定事情，也必须得到他的同意才能执行。

接收伊始，在机器设备上没有什么增添，业务上增加了一名会拍发日文电报的报务员，面对一些年龄稍大的老报务员，一律均以“待命”为由，发给6个月工资，令其等回家，不再录用。以后开始办理日文电报业务（在1934年日军未接管佳木斯电报局以前，佳木斯电报只发中文电报、英文电报，不办理日文电报，老电报员也不懂抄发日文电报技术）。由于当时的中国人只会拍发英文电报，要发日文电报，还得把日文的“カ、キ、く、个、コ”，拼成英文的“Ka、ki、Ku、Ke、Ko”才能发出。因此，在电报业务上设了二个班子受理业务，凡是日文电报，都由日本人值机、拍抄；中文电报则由中国报务员利用莫尔斯电报机抄发。

1934年，也就是日本人接收后的同年6月。日本人运来了新机器，全部废除了莫尔斯电报机，从此，全部改为音响通报了（音响通信就是听音抄、收电报）。以此为契机，日文的电报量，一天比一天增加起来。

1936年，为了改造接收过来的英文电报员，使他们学会拍

发日文电报，在哈尔滨市马家沟开办了电信讲习所。由局抽调一名有发报基础的青年电报员，送去培训。这一年的2月，我作为第一期的学员，在这个讲习所学习3个月，主要科目是学习日文音响通信。我就是通过这次学习，又掌握了日文的抄发报技术，回局后可以用英文、日文双管齐下值机上台。

1937年，随着电报业务量不断增多，将原来归地方上商务会经营的市内电话局，接收过来并入电报局。当时市内电话局，已有百门磁石式交换机一台。全局工作人员，大约10个人。改名为佳木斯电报电话局。至于哪一年又把电报电话局改为“满洲电信电话株式会社”，因为年久我已记不清了。

合并改名后的佳木斯电报电话局，把电报部分的设备、人员和业务，从西门里的老电报局，搬迁到通江街后院的市内电话局，一起办公。西门里的旧址，改为无线电发射台，设有150千瓦功率的无线电发报设备和蓄电池及充电设备。

电报通信分有线与无线两种，以有线为主，主要干线有佳——哈，佳——富，佳——鹤三条主要线路。为了防止干扰，收发报机分驻在西门里电报局原址和通江街路东“东乐天饭店”后院新址，每天与哈、富、鹤等地进行联络。在有线线路和路杆发生故障时，则利用无线电疏通电报。

随着市内电话之接收，把原电报和电话局的员工20多人，和新增加的一些日本人，集中起来大力进行技术更新和改造。并按日本人的管理方式，分别设立了电报、电话、技术、线路、庶务（现在的总务那一摊）等课（相当于现在的科），各课都有一名日本人当主事（相当于现在的科长），下边又设若干系（相当于现在的股）。从而，使一个仅有8个人的老电报局，一跃成为拥有40左右人，比较大的通信机构。

电报费用：伪满洲国成立后，自己发行了纸币，起名叫

"国币"，当时的兑换率是1元钱纸币换1元现大洋。那时在街面上已经禁止使用现大洋，可是老百姓背地里仍用现大洋作为货币流通标准，兑换率高于"国币"。因此，拍发电报时，都用国币现金支付。打"和文"（即日文）电报，每组6分钱，地名和人名以两组标准计算，所以打"和文"电报，每份电报有六七角钱就足够用了。因计价便宜，凡是能掌握日文的商场、货栈、工厂等大买卖，以及个人都愿发"和文"电报。中文电报是按字计算，每个字虽也是6分钱，但是地名、人名、内容也算电文，每份平均约在2元左右，所以发中文电报的日渐减少。以比例衡量，日文电报的比重要占80%以上，中文电报不超过20%，英文电报逐步淘汰。

电话业务有了很大改革进步，挂长途电话，可以不必再到电报电话局窗口挂号，有市内电话的，坐在家里就可以挂，而且可以直通哈尔滨，除遇风雨雪雹天气外，基本听得清楚。计费标准，以每3分钟为一次通话，超过3分钟而不足第二个3分钟算两次。以此类推，按通话地点远近不同，各有各的价。电话的月租费，每部电话每月收代料（就是电话费）5元。

伪满洲国大同年间（指1933年以前），虽然日军侵占东北，佳木斯涌进了不少日本官吏和经商的日本人，但毕竟比康德年间（从溥仪登极做了伪皇上算起）涌进的官吏、商人、军队、开拓团少得多，所以康德年后发报量猛增了，每天抄发电报300份左右。

就是这300份电报量，用机器抄收，也很不适应，因而每天都存在压发电信现象。为了适应业务量改动的需要，经日本技师动手，把人工音响电路，改为"双工"通信，就是4个人为一组，在同一条电路上，同时收发，可以做到互不干扰。尔后又改成"快机"工艺技术，就是发报纸条，先用"三柱作孔"打

上眼，尔后用快机发出。这种快机的性能，每分钟可以发出电文280个字。

日军侵占东北的目的，就是要把东北变成他们的殖民地。

佳木斯一带有丰富的煤炭、木材、毛皮等工业原料和大豆、小麦等粮食。为了把掠夺的重要物资，集中和运输出去。一方面修建了佳——哈铁路和两处飞机场，把佳木斯建成水、陆、空联合运输的交通枢纽。另一方面在这里屯驻重兵，以期配合法西斯德国从东方进攻苏联。为此，日本侵略者不仅把佳木斯这个小镇，升格为市，而且还变成了伪三江省的省公署所在地。

自从省公署设在佳木斯以后，市政建设得到了发展。大批日本移民不断迁居到佳木斯附近一些县份。统治中国人民的一切机构，包括军事、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卫生、交通，甚至管煎饼铺的、修鞋的组织，都派进了日本浪人当头头。同时垄断中国经济命脉的一些企业，也相应地陆续地建立起来，诸如什么主管煤的“满炭”，主管掠夺土地的“满拓”，以及名目繁多的“满电”、“满林”、“满毛”等。满洲电电就是其中的一个。

日本侵略者在这里不仅建成了银座街、同和街和顺和街的日本人居民区，而且他们还有自己的专用商店。如消费组合是专为官吏服务的；为军队提供副食的商店叫作“陆军御用达”；甚至连日本兵的军用妓馆都有相应配备。佳木斯的电信行业受这种畸形发展环境的影响又有了新的进展，成为日本侵略者进行侵略、掠夺、开拓、殖民、工商活动的重要的通讯工具。

1938年，电报电话局由合并后的通江街原东乐天饭店后院，迁到南岗大街新建的二层大楼（即现在的地址），正式挂出“满洲国电信电话株式会社”的牌子。全局职工约在200人左右，其中80%是日本人，所有各部门管事的主事，都是日本人。在

这个局里，中国人当“干部”使用的只有5个人，其中3个人是报务员，一个是庶务员，一个是机务员，其余的都是话务员、投递员、线路工或杂工。

这时的电报局，由于配备了150千瓦和300千瓦发电机各一部，已具备自动通报条件。所以佳木斯电报局成了中心站电报局，佳木斯附近各县发往哈尔滨以南的电报，都由佳木斯接转哈尔滨电报局，由哈尔滨电报局再接转其他地方。电信地点，不仅在东北三省可以做到四通八达，连朝鲜和日本本土都可以和佳木斯联接电报。

市内电话，在磁石改供电的基础上，全部改成了自动电话。有百门交换台4台，自动交换台1台。在当时情况下，基本满足了市内、长途电话的需要。

1942年，针对扩大电报电话业务的需要，又分别在南大街(现在德祥街工人浴池原址)和同合街设立两个支局。服务对象，南大街支局专为中国人服务，同合街支局供日本人和归顺日本的朝鲜人使用。这二个支局都把接受的电文，发往市局，由市局统一编号外发。

扩大后的佳木斯电报行业，业务量明显增多。在一般情况下，每个班都要抄发四五百份电报，平均每分钟抄发一份电报。可是值机的人手不足，常常造成电报积压。当时能上台的受过正式电报训练可以值机抄发报的有韩锡候、刘家畸和我，再就是日本人。日本人中有的技术老手，多数摆资格、嫌累，少抄、少发也没人敢管。而那些从开拓团新抽上来的新手，还属于培养提高阶段，3个人不顶一个人用。于是重担就压在我们3个中国人身上了。

在我们3个人值班的时候，都能保质保量轻松地完成任务，可是一到日本人值班，到交接班时，总有留发电报50到100份，

这就无形中加重了中国电报员的负担。报务人员既是脑力劳动，又是繁重的体力劳动，既要求速度快，每秒钟抄发一个字，又要求绝对准确无误。

当时，报务员在中国人的心目中，还被看做有技术的体面人，可是在日本人手下，无疑就是奴隶。少干就要受斥责，怠工就要被开除没饭吃。特别是还有日本宪兵，日夜在电报局监视、守护，弄不好就很容易当做反满抗日，拷打处死。报务员韩锡候得了重病，日本人硬是不准假，让他出勤，韩咬牙坚持了两天，就病倒不能上班，到第六天头就活活被折磨死了。这是我亲眼看见的日本侵略者虐待中国报务人员的罪行，今天回想起来，仍然叫人切齿痛恨。

报务员刘家崎，虽然没遭到和韩锡候那样可悲的下场，但也挨了日本浪人一顿猛揍。事情的经过是：有一个经营"三姓楼"妓馆的日本浪人，这个日本人是"中国通"，在日本宪兵队当翻译，又是妓馆的老饭，还很可能兼电报局什么官。这个"三姓楼"，有如日本影片中的"望乡"性质，挣来的钱主要资助日本军修飞机场。有一次发来一封军用飞机即将在佳着陆的电报，由于刘家崎过度疲劳，在值夜班时睡着了而误了事。结果被那个浪人和日本宪兵，打得鼻青脸肿，辨不出面目了。

论遭遇我是其中最幸运的一个。我在1938年由于连续发报，手累肿了，而且还得了肺浸润。经过当时的佳木斯最大最有名的"满铁"、"满赤"（满洲国赤十字会）两家医院会诊，都开出了肺浸润的诊断书，本来应当休息。恰好饶河电报局因缺乏熟练电报员而发不出报，硬把我逼到饶河电报局去，作为特殊"恩赐"和"照顾"，叫我边工作，边休息。

作为电报员，我也享受过难得的清闲，这主要是归功于抗日联军破坏线路的革命行动。在1936年到1937年这两年，我党

领导下的抗联战士，活动十分频繁，而且对敌斗争很有成就。隔三差五，不是将哈长线路切断，就是其他线路被割，由于维修费时费力，再加红地盘抗联的抵抗活动，所以一旦线路遭到破坏，少则三两天多则五六天没事干。有时边修边遭到破坏造成连续多日不能通电。这时我们中国的同事都窃窃议论，拥护“抗联”这种抵抗活动，它为我们带来了希望。

我50年来一直干电报这一行，这种工作必须聚精会神，手指必须不断地、准确无误地敲打着键盘，结果我的右手先是经常青肿，继则颤抖，最后终于痉挛萎缩而失去运动功能。在解放以后，我做了一段时间的报务工作，党和国家为了照顾我的身体，叫我去做电报的教学工作，使我有机会继续为电报事业发挥余热，为培养这方面的人才做点贡献。

（摘自《佳木斯文史资料选辑》第二辑）

伪满“满洲电信电话股份有限公司”始末记

王家栋

“九·一八”事变前后东北电政事业的概况

东北电讯和邮政原来均归交通部管辖，部内有电政，邮政两司分别掌管。但东北情况特殊，南有日本南满铁路和所谓“关东州”（旅大地区）经营的电气通讯事业，北有中东铁路（苏联经营）的通信设施，在电政事业上，主权受到严重侵害。1931年爆发了“九·一八”事变，由于通信事业是政治、军事的神经中枢，就首先遭到日军的侵占，通令立即与南满铁路沿线日本电信、电话局合并。许多员工受到迫害向内地流亡。在

沈阳，首先由“维持会”决定成立了东北电政管理处，设在沈阳故宫内。在日本军管下，由沈阳满铁附属地日本邮便局局长岐部与平和吉林省城电报局局长白锡泽为正副处长。随即着手恢复已占领的各城市原有的国营电报、电话局及无线电台的业务。1932 年 3 月 1 日伪满傀儡政府成立，伪交通部接收了各地电报、电话局。并将沈阳的东北电政管理处划分为奉天、哈尔滨两个管理局，分别管理东北三省以及蒙疆热河等处的原有的电气通信事业。

当时由于南满、中东两路另成系统，在经营管理上有很大矛盾，因而伪满通信事业必须“一元化”的问题，就提到日程上来了。这时，我是长春市电报电话局局长，有关当时情况回忆录述。

“满洲电信电话股份有限公司”的创立

日本帝国主义者要加速侵略，自然要控制满蒙通信事业，出于它们经常所讲的“一元化”（例如铁路一元化）的需要，于 1933 年 9 月 1 日创立了“满洲电信电话股份有限公司”，名义上是日“满”合办，实际上就是交给日本人包办。通过所谓两国政府协定，把原东北所有电气通信事业和南满铁路沿线附属地以及“关东州”内日军所霸占的大众通信机构全部合并，统归“满洲电信电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电电公司）经营管理。从 1933 年 9 月 1 日起正式开始接收营业，从此东北四省所有的有线、无线电气通信设施，全部被日本侵略势力掠夺到手。日本帝国主义者对该公司极为重视，因为它在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均负有重大使命，在贯彻执行侵略政策上，是一时一刻不能离开的，所以日本人对电电公司称之为“国策公司”。

日“满”两方协定内容有：

甲、权利

1. 公司之财产所得、营业契约、登录以及其他事业上必要之物件，得以免除租税及一切杂捐。

2. 享有关于电气通信设施上所需要土地之收买权、业务必要时交通机关之利用及其营业上所必要之一切特权。

3. 对铁道及航空事业附属的通信设施以及警备专用的电气通信设施，如需利用时，须向监督官所申请许可。

4. 公司发生意外解散时，政府当以相当的代价收买。

乙、义务

1. 公司制度的变更，董事及监事选任及解任、公司债务的募集、电报电话费的决定及变更、利益金的处理、每年度事业计划、各种协定的签订、设备物件的让渡等等，均需得到两国政府监督官所的许可。

2. 对两国的军事通信，应采取军事上必要的措施，必须认真执行。

3. 公司对两国政府铁道、航空、警备厅必要的通信，须无条件的供应。

4. 在两国政府免费处理范围内之电信业务，今后仍继续有效，及予免费处理。

5. 两国政府对公司的设备业务，以及财产状况、工事施行状况的报告，依据命令提交两国政府监督官所检察。

6. 公司在接收两国政府出资电气通信设施的同时，根据电气通信设施及业务，以及各种设施需要的工作人员，一并接收。

丙、其他

1. 股东及董事限日满两国政府的公职人员或私人。

2. 民间股份股息按年分配利润，政府股份不发给利息。

3. 每年利益金的分配不得超过一分。

4. 对“满洲国”政府公民或法人分得股票，在每次交纳股款或支付利息时，均以“满洲国”通货为基准。

5. 不得以公司的电气通信设施，或附属的设备物件等作为担保品，或作价处分等。

所谓东北电气通信事业的“一元化”

公司的实质是替日本帝国主义者把东北所有的电气通信事业全部掠夺过来，交由日本人统治。因此在公司成立的当时，立即把原国营的通信事业，全部接管。接着就陆续进行接管东北的县营、民营或县民合办的四乡电话事业。但这些地方办的电话局，规模大小不一，在经营管理上多半各自为政，杂乱无章，既无系统的管理规章制度，也无系统的技术操作规程。当时东北各地方计有电话117局，电话用户14 000余户，散在全东北四乡各处。在伪“电电公司”成立后除警察及公署机关事务专用的电话外，其余通信设施全部被该公司接收。根据两国协定，该公司按年分别提出一部分资金，作为收买县营、民营等电话局的收买费，以实现日本侵略者通信事业“一元化”。

1935年3月，日“满”向苏联强行收买中东铁路，铁路沿线的通信设施，伪满交通部即交由“电电公司”接管。

当年延吉地区（现在的吉林省延边自治州）各县没有经过条约形式，由日本帝国主义的朝鲜总督府强行在我国领土上，通过当地的日本领事馆设立的电报电话局也被“电电公司”于1936年3月间，从朝鲜总督府会宁邮便局接收过来。

该公司在通信事业接管中，无论是原国营的或是旧军阀经营的以及资本家经营的均被一网收尽，然后按日人计划，加以归并调整，并建立各种企业的规章制度。合并了满铁、东铁以及所谓“关东州”与延吉地区的通信事业，至此日本侵略者一

贯所追求的通信事业“一元化”，完全实现。日本“电电公司”的工作人员，绝大部分是从日本国内递信省邮电部派来的，也有些从原南满铁路沿线附属地，以及“关东州”电报局电话局接收过来的日籍工作人员。所有各局通信业务，全由日本工作人员包办，把持一切，留用的中国人全是些电报员、电话技术人员和线路工、送电报工、杂役等。担任高级较重要职务的中国人是绝无仅有的。

“电电公司”机构的组织形式

伪“满洲电电公司”接管了伪满境内中、日、苏三国的电报电话，无线电各种通信设施。它的监督官所为伪满交通部和日本递信省。在撤销了奉天、哈尔滨两电政管理局的同时，另在奉天、哈尔滨两邮政管理局内，增设电政处，专门从事监督管理伪满电气通信业务。

1937年伪满交通部邮务司改组为邮政总局，在总局内设电政处。各邮政管理局内的电政处又改为电政科，专门从事监督管区内的电气通信业务。除上述各监督机关外，伪满政府为强化国家“弘报机构”，特别对广播事项及广播通信的指导、取缔，规定由“国务院弘报处”直接监督，交通部仅负责监督一般的公众无线递信业务。至于对广播电台的主要广播方针与广播内容，统由“国务院弘报处”负责掌管。它是以伪国务院总理大臣的名义实行监督的，而交通部仅是对广播的波长、频率、设施等方面进行管理。至于日本递信省对“满洲电电公司”的关系，由于伪满交通部的工作人员几乎全是由日本递信省派来的，等于直接经管一样。此外，“电电公司”的重要工作，又全部是通过日本关东军的计划制定的，这就说明关东军有操纵指挥实权。

伪满“国务院弘报处”是一个推行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政策，反苏、反共、奴化中国人民思想，实行法西斯统治的一个“特务机关”。关于伪满的一切奴化教育和法西斯宣传，都是由“弘报处”一手包办的。凡属宣传机构，如广播电台、报纸、文艺团体、杂志社、电影制片厂等等，均由“弘报处”直接监督指挥，根据“弘报处”所制订的方针政策贯彻执行。全国广播电台所宣传的各种侵略政策，无论是政治的、经济的、军事的，全须听从“弘报处”的指示。

“弘报处”从表面上来看，是伪满国务总理大臣直接掌管的一个政府宣传部门，但从实际工作性质来看，它是在日本关东军直接支配下，做实行所谓大陆政策灭亡满蒙的侵略工具。

“电电公司”的组织机构是：在公司总裁的领导下，设4个部，1个无线总局，6个管理局，1个地方局，2个职员养成所。在各局下设若干课系，掌握电报、电话、无线电台一切业务。总裁及各部部长、总局长职务，由理事（董事）分别担任。公司内除副总裁及无线电总局局长及一名监事是中国人外，总裁及各部部长全由日人充任。公司内高级职员有参事及课长两员、秘书一员，共3名参事定员，其余为一般职员，在文书课内有翻译3名，规划课内有计划科员2名，共有10余人在本公司工作。其余在各局方面工作的都是低级职员。公司内副总裁以下总局长、监事、参事课长、课员、翻译等10余名中国人，全是有职无权、吃饭拿钱、牌位而已。我当时在公司的经理部充当营缮课长，当然也不例外，饱食终日，无所事事，什么也不知道，这种亡国奴的滋味，实非局外人所能意及。

公司的总裁、副总裁、理事、监事等高级干部，要通过股东会推选。按协定规定，每年3月末公司召开一次股东大会，会上通过例年决算，及当年预算、当年业务规划等报告，并通过

董事、监事等高级干部的推选，任命总裁、副总裁、各部部长、总局长。公司各部部长、管理局和地方局局长等均由参事技师等级的职员担任。以下一般职员分三级，即甲种职员、乙种职员、准职员，除此以外则为雇员（技术工、杂务工、送电报工、收费员等）。

工资待遇是上厚下薄，相差悬殊，充分体现了资本主义的特点。上层工作人员收入多，养尊处优，而一般工作人员和工人们是被剥削和压迫的对象，劳累终年吃不饱穿不暖，尤其是中国工人的工资还赶不上日本工人的一半，也没福利劳保待遇。当时工人们常说“黑爪子挣钱，白爪子花”，这充分表现出来工人群众对日人的愤恨不平心理。

（1）总裁、各部部长、监事、总局长等待遇极厚，他们的年俸总裁是1万元，部长、总局长7 000元，监事6 000元，另外每年可分红利1万元以上，总裁每年总收入达3万元。

（2）职员们的月俸，根据学历、经验及担当的职务，分别制定工资额。职员最高月俸为450元，最低为30元，另外每年按工作成绩、出勤状况，分别按两期发给慰劳金。一般雇员，每人每年应分得的慰劳金逐级缩减，为数极少。

（3）雇员是日工资制，按工作日数计算，出勤工作就给钱，不工作就没有工资，当时日人管这叫作“日给者”。这些骶级的雇员们，每人每天拿的工资不过5～6角钱，最高也不过1元5角钱。

依上述情况，可见总裁1人的收入，相当于中等职员20人的收入，相当于下等职员30人的收入。真是上厚下薄，相差悬殊，伪满社会对工人阶级的压榨摧残就是这样。

关于福利劳保待遇，中日两国职员虽在一块劳动，系同样等级，则差别很大。日本人不分职员或工人，全都在公司建筑

的文化宅居住。对中国人员除副总裁、董事、监事、参事级的高级干部有文化住宅外，其余一般职员和工人，仅发给微许的住宅费，由自己找房住。因此一般中国员工，没有文化住宅，都是冬不能防寒、夏不能防热的草舍茅屋，卫生条件极差。发生疾病时，需自己花钱去治疗，没有免费医疗的待遇。死了没人管，要是因公伤死亡，也不过给400～500元的丧葬费，谈不到什么抚恤劳保，劳动人民的处境，真是牛马不如也。

如前所述中国人在公司内任高级职员的，已为数无几，至于各外局，如各大城市一、二等的电报电话局，全是日人当局长，各大局的工作人员中国人也为数极少，仅电报员、送电工，用中国人为他们效劳。至于在各小县城镇的三四等小局局长，才派中国人去充当，多半是些老电报员出身的。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帝国主义者还要派二三名日本工人来监视。中国局长事事都得取得日本工人同意，才能执行，才能维持住他的饭碗。

业务概况

1. 电信：随着伪满局势暂时的稳定，电报利用者在逐年增加，在旧中国张作霖统治东北时期对无线电报相当重视，沈阳设有功率强大的无线电台，除处理全国各地的无线电报外，同时办理国际方面的无线电报通讯。1934年伪满在长春的大无线电台建成后，即把沈阳的无线电台国际通信业务全部移交长春无线电台办理。沈阳、哈尔滨、大连三个无线电台，专办理对日本国内和中国各地的通信业务。到1939年末止，东北境内已有了48个无线电报局，能和有线电信网相呼应办理通信业务。

又在1937年9月份起，同日本各地开始实行电视通信（电信传真）业务，加强了日伪间的通信联络。

2. 电话：伪“电电公司”历年架设新的电话号数远远赶不

上实际需要，因此各大城市的电话号，就现出一种供不应求的现象，投机分子从中抬高电话的市价，把用200～300元装设一台的电话，经由日本买卖商人一转手就卖到2 000～3 000元的高价。因此一般私人经营的小工商业者，几乎无法装设电话。

无线电话在长春无线电台建成后，装成日满间无线电话回路，从此日满两方各主要都市，全部能随时随地联络通话，缩短了日满间之距离。

3. 无线电台：东北无线电台事业，约在1923年各大城市即开始建设。因为它是新的技术科学，懂得的人还不多，彼时地方电力供应不普遍，人民文化程度又比较低，因此未能迅速开展起来，只是沈阳、哈尔滨、大连等几个大城市有，主要是收受、拍发官报，一般商报比较少，利用极不普遍。至于无线电话的使用更是寥寥无几。在广播方面，也是同样。当时，唯有军阀、官僚、富商、大户一些资产阶级用它收听音乐、戏曲和新闻报告等，作为酒后茶余的消遣。投机商人利用它收听经济行情、做倒把的勾当，一般劳动人民有的甚至买不起一台收音机，是得不到广播欣赏的。

伪“电电公司”成立后，除接收了沈阳、哈尔滨、大连等三处无线电台外，随着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政策的深入，在长春又修建了一所大型无线电台，大肆扩充无线电广播事业。在长春、奉天、哈尔滨、大连等四个大城市，除办理通信（电报电话）业务外，都装设了无线电广播台电话回路。当时在这些大城市收听广播的仅5 800余户，日本侵略者为加强推行满蒙侵略政策，又在东北各地大量增设无线广播电台，遍地设立无线电普及营业所，向广大人民群众动员收听广播，推销无线电收音机，不但廉价出售，而且还可赊卖，分月付款，由普及营业所办理赊卖手续。每月按户收广播听取费5角，作为广播收入，

按月由普及营业所收费员去收费。日本帝国主义者就利用这个广播宣传机构，始而向伪满国内宣传“王道乐土”、“一德一心”等奴化思想，继而反苏、反共、反人民，并向华北、华东方面大力宣传侵略整个亚洲的政策，即建设“大东亚共荣圈”，煽动嗾使搞独立自治，以分裂中国。由1933年到1941年止，不到10年内，在东北四省就设立了15个无线电广播台，有中、日、俄、蒙、英等5种语言，日日夜夜地向各地传播各种侵略政策。到1941年末，太平洋战争爆发时，全东北各地听户已达45万余户。当时还在各主要城市，增设“二重广播”，即用两国语言同时广播。在奉天、大连、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处用中、日语，在海拉尔除中日语外，还用蒙俄两种语言，同时哈尔滨还有俄语的广播。日伪的广播事业，主要目的是在于宣传其侵略政策和进行奴化教育，但就每月向听户收听取费讲，已充分说明帝国主义者对殖民地的经济掠夺，如水银泻地，是无孔不入的。

日本帝国主义者为便于向东北各地普遍推行其侵略政策，对各广播电台的设置是煞费苦心的，伪满各地的广播台犹如星罗棋布。

在上述这些有线无线电信电话的联络网外，日本侵略者为确保伪满境内通信安全和加强日满间通信联络，扩大远距离通信网，从1935年起开始建设远距离地下“无装荷电缆线”。首先是从安东到沈阳，接着从沈阳到长春，全部工程，于1940年完成，这就解决了日满两方首都间，以前不能直接通话的困难，而更便于伪满对日本、朝鲜间的长途联络。这种新技术的地下“无装荷电缆线”的建设完成，在日本科学技术界，划一新纪元，电气通信技术得到进一步的改善，从此以后5 000公里以上远距离的通话，得以畅通无阻，而且增加回线的回路，即是一回线可作三回路使用，提高了使用效率。

日本帝国主义在占领华北华东后，野心更进一步膨胀，发动太平洋战争，侵略东南亚，称霸整个亚洲。在这种情况下，伪满就向中、苏、欧、美各国和南洋方面开辟了国际通信直通回路，扩大了通信范围。另外，日侵略者又把英国和丹麦两国经营的大东、大北两个电报公司在远东敷设的海底电缆掠夺过去，以达到通信事业的垄断的目的。

职员养成所和职员练成所

为了大量培养电气通信事业各种必需的技术及业务知识后备人才，“电电公司”在长春、大连两地各设职员养成所一处。招收中日两方的中、小学毕业生入所学习。2年毕业，毕业后分配到各电信电话局、所服务，到1941年末计有2 000余名毕业生已在工作岗位上服务。但都是些地位低微的电报员、话务员，每月收入不过20余元。这些工作人员中的中国青年，多半奴化思想很深，只知做驯服工具而已。至于职员练成所，是由于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的青壮年几乎全部应征，所有在乡军人以及老弱也都召集出来，投入侵略战争当炮灰，人力痛感不足。于无可奈何中，只得用中国人和外行的日本人代替来担任后方各单位工作。“电电公司”也不例外，因而就在职员养成所内，设立一所职员练成所，专门培养在职干部和新补入的外行进行短期的业务技术训练，同时对思想上及体格上也进行训练。这个练成所因系在战争后期为了适应战时体制而设立的，从开始设立之日起，到日人投降之日止，参加学习的人数不多，没起到多大的作用。

以上仅就我个人在伪“电电公司”工作经历的回忆作以记述，可能有些不妥不详之处。

伪满电信电话会社的设立

阮振铎

1933年我在伪建设局时期，曾兼满洲电信电话会社设立委员会委员。当时伪政权的各部总长、次长、局长等，和长春市各大商号老板，以及地方银行经理等，都是委员。委员长是日本退役海军中将山内静夫，副委员长是三多。这个会社是满日官商合资，伪满是以原东北各地电报局、电话局等各种设施作为现物出资，并加入了一部分股份。委员会目的就是为了募股，因之各委员不拘多少都得认股。每股100元，分四期交纳，我认了20股。这个会社于同年成立，把伪交通部所管的电报、电话和放送等事业，全部交给该会社经营管理。这个会社因有日本方面出资，是属于特殊会社的一种。从此就切断了东北人民对内对外的消息，任凭日本侵略者捏造欺骗宣传。

四

鼓吹“神道”为殖民统治服务

鼓吹“神道” 为殖民统治服务

吕元明

“建国神庙”与“惟神之道”

日本帝国主义为了给其血腥侵略找出“理论根据”，大肆鼓吹“日满亲善”、“王道乐土”、“民族协和”、“惟神之道”等骗人口号，并把它美化为所谓“建国精神”。这些骗人的口号，随着日本帝国主义对东北殖民统治的加强，不断改换其内容，以便为其最后吞并中国东北制造荒唐的理论根据。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者首先利用溥仪等，发表一个“满洲国建国宣言”，宣扬在中国东北建立一个“新国家”，实行“王道政治”，建设“王道乐土”，标榜“满洲国”的“独立”。同时，日本侵略者为了欺骗世人耳目，又宣扬日本是“新国家”的“友邦”。伪满洲国之所以能够建立，是“友邦”日本出兵帮助的结果。

1934年，溥仪当上“皇帝”，被召到日本去拜谒日本天皇，日本大肆宣扬伪满“建国”是“沐日本天皇的皇恩”、“顺天之意”而建立的。因此，溥仪从日本回来后，发表了一个所谓“训民诏书”，胡说什么他与日本天皇“精神如一体”，要东北人民和日本“友邦一德一心”，东北人民应感恩戴德、服服贴贴，作牛马，当顺民，任日本侵略者宰割。这样，“日满”关系变成了“一德一心”，在“法律上”成了“不可分”的关系。以后，日本侵略者把日本说成是“盟邦”，又把伪满初期标榜的“王道”换成了“皇道”。

“七·七”事变以后，日本帝国主义为了使东北彻底殖民地化，又玩弄了新的花招，决定在伪新京建立一个所谓“建国神庙”，供奉日本“天照大神”，作为吞并我国东北归为日本版图的一个标志。因此，日本帝国主义者又叫傀儡溥仪于1940年第二次“访问”日本，让他把日本的“天照大神”捧回来，当作“建国神”供奉在“建国神庙”里，表示伪满的开始不是起源于清始祖，而是和日本一样，始于“天照大神”。然后，经日本侵略者一手炮制，以溥仪名义发表了一个所谓《国本奠定诏书》，说伪满洲国是在“天照大神”的“神光”保佑下建立的，溥仪和日皇亲如一人，因而伪满洲国的“国民”也就是日本国民的一部分，伪满洲国也就应该为日本所统治，从而把“盟邦日本”改称“亲邦日本”。

什么是“亲邦”呢？日本侵略者说：“亲邦就是父母之国的意思，日满两国的关系，就像父子的关系，至亲之爱和道义，把两国结合在一起。”事实上，从“建国神庙”出现之后，伪满的许多日本官吏都公然讲：“日本是你们的父亲，你们是儿子，儿子明白吗？”

紧接着，日本侵略者还炮制了一个所谓《国民训》（共五条），强迫中国人背诵，其中第一条说：“国民须念建国渊源发于惟神之道，致崇敬于天照大神，尽忠诚于皇帝陛下”。从此“惟神之道”就成为摧残中国人民族意识的荒唐说教。所谓的“天照大神”，本来是一个日本迷信的天神（原始神话的太阳女神），是日本统治阶级为维护其所谓“万世一系”的天皇制而编造出来的，把它看成是日本国产生之始。他们叫溥仪捧回“天照大神”（实际上只是一支剑和一面镜子），暗示溥仪是日本天皇的后代，使之舍弃复辟清朝的念头；同时用“建国”始于日本神这个谬论，把中国东北纳入日本的版图，使之成为日本的

领土；另外又胡说伪满是“奉天照大神为建国元神”，炮制了“惟神之道”，强制东北人民接受，从精神上摧残中国人民，使之“皇民化”。日本侵略者说：从傀儡“建国”到“惟神之道”，是“从独善性进入到对日本的依存性”。伪满的“独立”外衣，到了此时已经被日本殖民主义者完全剥掉了。一个日本神供在伪首都新京，就成了伪满“国体”的大事，国家的性质变成了降下一辈的从属国，而下一步就是并入日本版图了。

日本侵略者和汉奸带头，天天向建国神庙行礼，表示对它的虔诚。日本侵略者还强迫中国群众也向它行礼，承认它的权威。甚至在伪“保安法”中还规定：如对“建国神庙”有“不敬罪”者，要判处一至七年的徒刑。

可以看出，日本侵略者是把“满洲国”的发展历史分为“建国，日满一德一心，惟神之道这样三个阶段”。从这三个阶段中，我们看到日本帝国主义在政治上吞并中国东北所玩弄的三个把戏：即从“友邦”至“盟邦”；最后变为父子关系的“亲邦”，这真是历史上罕见的侵略行径！

日本殖民主义者力图通过日本宗教迷信，摧毁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除了在伪都搞“建国神庙”外，还在东北各地搞了不少日本“神社”。据1945年统计，日本在我国东北城乡搞了大小日本神社295座。他们妄图通过这些日本军国主义祟拜的神灵，给中国人民套上精神枷锁，使中国人民“皇道顺化”。

对封建意识形态的利用

在伪满十四年的殖民统治过程中，日本殖民主义者广泛地利用了封建意识形态。日本帝国主义本身就带有封建的特征，而中国封建阶级经常是帝国主义的附庸。

在伪满初期，日本侵略者曾经特别着重利用了儒家思想。伪

满“独立”打起的一面旗帜是“王道乐土”。日伪当局特地解释这是来自于孔丘的“先王之道”。1931 年，当日本殖民主义限禁使用中国课本的时候，曾经让学校开设“四书五经”课。封建余毒成了殖民主义者利用的东西。当时卖身投靠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的一批汉奸，特别卖力地鼓吹伪国家遵从孔孟之道。1932 年在“振兴孔教”、“祀孔参政”的旗帜下，伪国家把一年两次祀孔列为国家法定祭日。

但是，日本帝国主义利用孔教进行殖民和统治，和伪满傀儡打算以孔教进行清室复辟是不一致的。1932 年和 1933 年，伪满傀儡还穿着清代祀孔的封建大袍子，到文庙去祀孔，在日本殖民主义者中间，夹杂着戴着貂尾帽子、足登厚底鞋、身着绣袍的清代一群遗老，真有点清室复辟的样子。然而，日本殖民主义者很不以为然。在主子一声训斥下，傀儡们便俯耳听命了。日本侵略者通过报刊、广播多次说，伪满不是“满洲历史的继续”，相反倒是“日本历史的继续”。1939 年伪民生部发布命令：以后祀孔不再穿清服，改穿“协和服”，也不再行清代的三拜九叩礼，改行日本式的三鞠躬。到了 1940 年，把日本“天照大神”供到“建国神庙”里，日本殖民主义者曾经想废止祭孔。但考虑到封建意识形态对中国人影响之深，仍有利用的价值，日本殖民主义统治者还是没有最后废除祭孔，但是却把“建国神庙”的祭祀列为伪国家“建国”的大典祀日，而把祭孔排在从属的地位。

伪满时期，还利用其他宗教来控制和麻痹中国人。除了日本宗教之外，据 1942 年统计，佛教有寺庙 2 100 多个，僧侣 5 000 多人；道教观 2 300 余个，道士 4 000 余人；伊斯兰教寺院 200 多个，阿訇 400 多人。伪满在蒙族地区，也利用了喇嘛教，还利用了其他一些“慈善”机关。

日本殖民主义者还利用了基督教、天主教等宗教。

伪满初期，日本殖民主义者对中国东北的宗教信仰进行了广泛调查。1939年，伪民生部公布宗教规则：各宗教宣传教义、扩建设施、立庙修寺、转移迁居、修办合并等等，都须得伪民生部“大臣”批准，不合规则者受罚。实际上宗教信仰自由已经不存在。在信仰方面得听从日本殖民主义者指挥。日本殖民主义者为了便于管理和控制，于1939年建立了各种宗教的统一组织，如伪“满洲国佛教总会”、“道德总会”等等。

有不少日本人直接参加伪满佛教、道教、基督教等的活动，其中有些是披着宗教外衣的殖民主义分子。拿“在家理”这种信仰组织来说，最初是中国人的秘密结社。日本殖民主义分子打进这个结社里，策动了一部分“在家理”的头头，使这个组织的一部分信仰者在政治上支持日本侵略者和伪满洲国。1933年，“在家理”在日本殖民主义分子策动下发生了大分化。1934年由汉奸冯谏民当委员长，建立了“大满洲国正义团”，公然为日本殖民统治者效忠。

伪满时期，以布教为名跑到东北的日本基督教传教士，有些人和军队、伪政权勾结起来，干着压迫中国人民的勾当。有些人还跑到抗日斗争激烈展开的热河地区，名曰“布道”，实际上是破坏中国的抗日斗争。1939年策划成立“满洲传道会”的日匹信亮，就曾跑到热河去“传道”，干了许多破坏中国抗日斗争的勾当。日本一伙披着宗教外衣的殖民分子，曾把抗日斗争迅猛发展的热河地区作为“布教”重点，进行所谓“宣抚”工作。

表彰“孝子节妇”，也是伪满时期日本殖民主义者从精神上奴役中国人民的一种方法。截至1943年，日伪共搞了孝子700余人，节妇2 700余人，烈妇28个，贞女2个，义仆6个，懿行

400余人，耆老48个，总计3 600余人。日本殖民主义者鼓吹说：“孝子节妇”是“王道之源”，“国民道德的根基”。还说这些“孝子节妇”是伪“国家”、伪“国体”的代表，是“建国精神的发扬”。特别把卑躬屈膝于日本统治者的一些表现，列为“孝子节烈”的标志。由此可见，日本殖民主义者利用中国封建意识形态，是为其殖民统治服务的，是为了从精神上束缚中国人民。另一方面，封建阶级及其意识形态，在敌伪统治下也成了殖民统治的附庸。

（摘自《伪满洲国史》）

伪满的祀孔

王国琪

伪满洲国成立后，日本侵略者为了长期统治，防止人民反抗，除用极残酷的血腥镇压外，更以笼络来麻痹中国人民思想，对中国人民固有的某些习惯，加以保存和推行，以掩盖日本帝国主义的野心，并维持其统治势力。对春节、元宵节、端午节、中秋节、祀孔等民间固有习惯节日极为重视，在各节日均行放假一日到四五日不等。其中对祀孔更为重视，这并非是尊重中国人民的习惯，重要的是麻痹中国人民思想。日本侵略者既利用孔子学说，就必须重视孔子、尊敬孔子，以蒙蔽中国人民。祀孔活动是尊敬孔子的绝好机会，所以对祀孔要隆重举行，每年要实行春秋二次祭礼。在我的记忆中，以1933年秋季祀孔最为隆重。

祀孔活动是由伪满文教部礼教司负责。在1933年的暑假以

前即着手准备，购买或订制各种应用物品。长春市原有文庙坐落在东二道街，规模不太大也没有其他关于祭祀时所用的物品，只有大成殿、东西庑及后殿、崇圣祠几栋房子，室内也只有供桌和牌位而已。这次祭祀是溥仪亲临致祭，祭祀要格外隆重，必须按古礼举行，因而特制了乐器、旌旗和服装等物。乐器有门鼓一、门钟一、大鼓二、钟一、磬一、边钟一、边磬一、敔一、柷一、博附二、笙四、笛四、箫四，此外旌旗类的麾和节各二支。所有这些乐器和旌旗，是和沈阳市故宫内陈列的相仿。掌管这些东西的人，分舞生、歌生和乐生来担当歌舞和奏乐。由附近小学的高年级男生来担当歌生和舞生，由市内各小学的音乐教员及擅长乐器的其他小学教员来担当乐生。这些人的服装是由文庙给准备的。

在1933年暑假期间，伪满文教部特派沈阳市担当祀孔歌舞指导的某小学教师（姓名忘了）来长，负责训练歌生和舞生达20余天。

这次祭祀大约是在九月下旬的丁日，由伪执政溥仪（那时还没有称皇帝）亲临祭祀，届时做好了一切准备工作。将通往文庙的道路进行维修，沿途安装大的电灯和聚光灯，文庙门前还铺上一层黄土，门上安上彩灯，文庙院内和殿内原无电灯，这次也安上电灯。祭祀的时间是在早晨2时，所以在前一天的晚上，文庙附近实行戒严，满布着伪军警，还有日本军队也参加在内，不准行人接近。由于在午前2时举行祭祀，而担当的歌生和舞生的学生，家居分散，恐怕临时来得不齐，因而将这些学生于前一日晚上集宿于文庙小学校宿舍内，由于这些学生年龄不大，又系从各个家庭来校集宿，感到新奇，加之宿舍也不大，拥挤不堪，致使长时间不能入睡，吵吵嚷嚷直到午夜1时，即起来准备。

祭品有整牛1头，整羊12只，整猪12头，分别陈列于各殿外檐下，还用厨师七八人专做各种祭菜，足做了一下午，也不知做了多少，供桌上已经摆满了。祭礼完毕，祭肉则按官职的大小，分别分给参加祭祀的人。

参加祭祀的人的服装，除歌生、舞生和乐生是由文庙准备的，其余之人完全自备。歌生和舞生的帽子系蓝色，帽顶系一长方形平板，身穿蓝布长衣，黑色镶边，足穿蓝布鞋。歌生是8人手持笏板，立于阶上。舞生是64人采取“八佾舞于庭”的形式，排列在阶下。乐生24人还有执麾节的各2人头戴坤球帽，身穿蓝缎长袍，鸭蛋青色镶边，袖头也是鸭蛋青色，翻卷成马蹄袖，腰系鸭蛋青色腰带加飘带，足登大绒青色长靴。穿起来活像东北的狐仙庙内泥塑的胡三太爷，令人哭笑不得。其余参加祭祀的人一律蓝袍青褂，坤球帽和长靴，其中的日本人也是一样。但除主要祭祀的人外也有不戴坤球帽而代之以帽头的。

祭祀当时先祭崇圣祠，由伪国务总理郑孝胥主祭，之后则祭祀大成殿及东西二庑。大成殿主祭由溥仪担当，四配及东西二庑的主祭人则由各部大臣担当，没有担当主祭的大臣和一些有地位的伪官吏，均做陪祀官在阶下陪祭，担当执行祭祀的是一些下级伪官吏和中小学校长。祭祀时实行跪拜礼，行三拜九叩礼，当时歌生唱歌、舞生做舞、乐生做乐，殿内高燃蜡烛，香烟缭绕，酒气触鼻，歌乐齐奏，呈现一片严肃景象，似乎是对孔子的真心的祭悼。祭祀时由迎神开始，然后举行初献、亚献、终献，最后为送神。在全部祭祀时有歌有乐，只在举行初献、亚献和终献时才有舞。歌和乐都是四字和四音为一节，每节的前二字各为二拍子，后二字各为四拍子。舞也是按乐和歌的拍节，每一字为一动作，动作比较简单，分八行排列于庭前，舞生各手执长约二尺许的红色木棍二根，其中一根顶端还插有一野鸡

翎。

溥仪只参加过一次。据说在溥仪参加祭孔后，在下一次祭祀前半月时间，在文庙内发现有炸弹，所以溥仪以后再也没有参加祭祀，由伪国务总理郑孝胥担当主祭。郑孝胥离职后，则由张景惠担当。可见，日本帝国主义为了达到殖民统治的目的，是怎样利用一些要职人员进行祀孔活动的。

别有用心的日满学生讲习会

宪 均

1933年3月间，我在日本陆军军医学校学习，日本外务省嘱托（日本神官）小笠原省三到学生俱乐部来访我，说要办日满学生讲习会，请我率领伪满学生参加。我集中了120余名留学生参加了讲习；日方方面也参加了30余名。讲习场所在“一桥”（地名）日本商科大学讲堂，每晚讲四个钟点，讲习10天。讲演的10人都是日本第一流的学者，经费由日本外务省“对支文化事业”费项下支出。讲习题目如下：

演讲题目	讲演者
1.《由地理历史方面看满洲》	白鸟××文学博士
2.《满洲的古代建筑》	矢吹××工学博士
3.《满洲的古墓》	鸟居龙藏文学博士
4.《支那乐器的特征》	田边尚雄理学士
5.《支那佛教》	××××
6.《老庄学》	小柳司气太文学博士

其他几项还有什么日本武士道、惟神之道等等。

讲习后有茶点座谈会，讲习当中有速记，讲习后，把讲习录集成一部书在日本各书店（出版价1.26元）发售。小笠原省三还送了我一本。

白鸟讲的《由地理历史方面看满洲》主要意思是：满洲由地理上可分三部分：其一是黄土地带，以辽河、松花江沿岸为中心的产粮区域；第二是森林矿山地带，以吉林、兴安岭、通化为中心的木材矿产地区；第三是沙漠地带，以兴安为中心的牧马牛羊区。这是个有丰富物产的地域，北边有黑龙江、乌苏里江，东边有鸭绿江、图们江，南边有万里长城又有旅大、安东等海口，因此满洲由地理学看来是一个天然的独立地区。其次由历史上看，满洲曾有过高句丽国、渤海国、辽、金、元、清等强盛国家连续地出现。满洲这块土地实际上没有受到汉民族的统治。总而言之，他的讲演就是说满洲不是中国的。

《满洲的古代建筑》，矢吹讲演。大意是说：第一是满洲一带的古塔——砖塔，除去朝阳的北塔是唐的建筑外（唐塔是方形塔），其余所有的塔都是辽金以后才有，尤其是辽塔最多，其形八角，在建筑学上看来比唐塔发达很多。第二是大凌河岸的万佛洞和义县的大佛寺，这也与中国内地的建筑有所不同，有满洲独特的建筑方式。第三是承德的喇嘛庙，这些庙在建筑学上看来是世界上有名的技术，是与中国一般建筑完全不同的。总之他的讲演是说，满洲古代建筑有满洲的特色，宁可说比中原的进步，而不是受中原的影响。

《满洲的古墓》，鸟居龙藏讲演。他讲的大意是由古墓证明高句丽、渤海、辽、金等各时代的文明兴盛，国土广大，甚至提出契丹文字是汉文字系统以外的系统文字，满蒙文字更不必说。总之，他的意思是说满蒙民族系统和文化系统，不属于中

国。

《支那佛教》，讲演者氏名忘记。讲演大意是说，支那佛教是支那佛教。满蒙佛教是满蒙佛教，是喇嘛教，跟支那佛教不相同的。

《支那乐器的特征》，讲演者田边尚雄。他说在中国古书上根本不见弦子、胡琴等乐器。弦子是元朝传入中国的，胡琴更是北方的东西，至于笛子也有六眼、七眼之别，也有南北的区分。总之就是乐器满蒙也是有其独立性。

《老庄学》，讲演者小柳司气太。他说日本人若不研究老庄学，不可能了解中国。中国人不了解老庄，不能在社会上存在。老庄思想支配着中国社会大多数人。表面上，中国虽受儒学的礼教统治，在思想里老庄的学说势力很大。那么老庄学的根本是什么呢？说是处于"有用无用之间"，脱离政治。总之他的意思是不叫人们去参加政治。

这个讲习会的目的，是从各方面证明满洲与中国不是一家，用各种学说麻痹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的头脑。这就是日本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民族离间政策的一个具体表现。

日本侵略者伪造和篡改历史的卑劣伎俩

郭布罗·润麒

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后，为了掩饰犯罪行为，对东北的历史进行伪造和篡改，他们以为，这样就可以欺骗中国人民，缓和中国人民对他们的仇恨。

他们想把东北的人民和关内的人民分离开来，把伪满洲国成立以前的东北 历史一笔抹杀，说什么，伪满洲国是“奉天承运”出来的，溥仪是什么第一代创业的“君主”，所以在他以前之历史就无须乎考据，世界上哪个国家在有史以前不都是混沌的，追究又有什么用？意思就是说，东北这块土地，在伪国成立之前还是太古洪荒的时期，既无人，又无生物；又说东北这块土地，原来根本就不是中国的领土，不过被“霸占”了多年，误认为是中国的领土罢了。现在“满洲国”成立，与中国“脱离关系”正是恢复原来的状态。这种荒谬绝伦的说法还不算奇怪，更奇怪的是说，东北这块土地，原来是日本的，在中国人尚未来到此地的很早很早以前，日本的神就降临了。因为他对当地有功，当地人“感谢”他，并替他建了庙祭祀他（这个庙指吉林小白山上的关帝庙、娘娘庙来说的，下面详述）。

1932 年伪满成立那年，有一个日本人，名叫金子定一，自命为中国通，是个退役的少将，早年充当过天津驻屯军司令部的部附，后来退役即在东京流浪。他为了迎合当时帝国主义者的心理，在各种刊物上发表些关于中国的荒谬的文章。那时我也在东京，记得看见这样一篇怪文，题为《大和民族大陆还原论》。它的内容大略是这样：日本民族原本生在大陆（当然指着中国大陆）上，后来因向海外发展，才成了今日的日本，这次日本人又进入了中国大陆（指中国东北），正是日本民族的大陆还原。意思就是说，现在在东北居住的中国人，是外来的，他们日本人才真正是“原住民族”。

1940 年，我正在吉林伪军管区，听说由日本来了一个调查团，说不久要来吉林做学术调查。果然不久大队人马便来到了吉林，我记得能有10 个人以上。我当时想，既然说是学术上的调查，调查团必是由些学者组成的。没想到来了一看，却完全

不对，团长不但不是什么学者，相反却是一个以侵略中国为职业的日本浪人，名叫川岛浪速。这个人年逾八十，两耳全聋，但精神奕奕，团长是如此的人物，团员就不必问了。

这个调查团到了吉林，首先声明，是参拜小白山的庙，其次是调查该庙和日本神道的关系。

他们说：这个庙（指吉林小白山上的庙，是老爷庙还是娘娘庙，现在记不清）的建筑方式和庙中所陈列的祭器、执事等（金瓜、钺斧、朝天镫）的样式跟日本“素盏鸣尊”（天照大神的儿子）所用的东西有相似的地方（就是他们也未敢说完全一样），例如庙的斗拱、祭器中的香炉和执事中的大刀。

因此便很快地下了结论，说这个庙，原来就是祭祀素盏鸣尊的庙，根据日本的历史（不用说是他们临时瞎编的）某年某月，日本神素盏鸣尊，降临此地，建立了“国家”。这个“国家”的成立，是在这块土地上尚未存在过任何民族的时候，意思没有别的，就是胡搅蛮缠硬要把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东北的疯狂罪行，说成是“回老家”的“合理”行为。

在1928年或1929年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国的野心，将变成为具体行动的时候，在日本全国各地，流行着一本著作名为《成吉思汗即是源义经》(忘记著者的名字了)。这本书著作的目的，本来是为了夸张日本民族的伟大性和鼓吹他们的优越感。把称雄世界的人物，说成是他们日本人，当时很博得一些御用学者的赏识。但真理究竟还是真理，不能颠倒的。因为这本书的内容过于荒唐，与事实的年代不相符(源义经才一岁的时候，成吉思汗三四十岁了)，稍有点常识的人，谁都不能相信，所以这本书喧嚷一时，不久就冷淡下去了。但后来，日帝侵略者们为了混淆是非，加紧侵略，便又把这本旧帐重新翻出来，说什么成吉思汗就是源义经的化名，东北这块土地，都是700年前，源

义经一手建立起来的，意在言外就是说，这块土地就应该属于日本，这种荒谬的说法，真是不值一驳，只能供做笑料罢了。

日本帝国主义又说，“世界上最老的国家是他们日本”。我在伪满军队里，曾看见过关于宣传日本是世界第一的老国的图表（这图表长约一米六七、宽约有一米），上面用极美丽的色彩绘成世界各国的历史年代表，最上不用说是日本了，把他们存在的历史硬延长了二三千年，其次是埃及，再其次才是中国。这个荒谬的糊涂图，当时各地的伪机关和学校都有配挂，这个意思就是要使中国无论在历史上、文化上，也都要比日本晚上几辈儿的。

接伪“神”的经过

溥　仪

这是1940年，关东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推行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国策而主持策划的。后来我听说关于这个接伪神的阴谋，日本早有计划。有两件事（后一件事是我听说的），我愿说一说。

一、在1939年，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曾指挥侵略蒙古人民共和国，被苏军同蒙军把它粉碎（即诺门罕之役），由于侵略失败，跟着他就被撤职。当他临回日本之前向我告辞的时候，他对我表示过，日满的亲善关系，如果将来能使两国宗教信仰也一致，那就更好。当时，我想是他个人的话，后来才知道这是日本的国策。

二、（这是我听说的）这个接伪神的事，关东军早有计划，没想到日本国内的本庄繁不赞成这事。关东军参谋长饭村穰曾

派人和他疏通。我想本庄并不是反对日本的宗教侵略，这只是他的老奸巨滑，他不主张急进，而是取稳进主义的宗教侵略而已。其实早在我没去日本前，伪宫旁就已准备了伪神庙的奠基。1940年关东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命吉冈安直通知我上日本见裕仁，迎接伪天照大神。吉冈说这是表现日满一德一心、不可分的关系，说日满宗教必须一致。我问他，满洲本有宗教，何必多此一举？他声色俱厉地说，这是军司令官通知我的，这是日本既定方针，没有任何犹豫余地。我也听谷次亨说过，星野直树伪总务长官曾在伪国务院向谷次亨、丁波说，迎接伪神这是日本既定方针。在这种情况下，我答应了日本帝国主义分子的要求。后来，吉冈又给我一张字纸，限定我对裕仁所谈的话。他令我向裕仁表示："我根据日满一德一心、不可分的关系，我衷心愿意迎接日本天照大神到满洲国奉祀。"等我到了日本，见裕仁的时候，我便掏出吉冈给我的字纸，一面看，一面向裕仁说的。我说完了，裕仁便对我说："这是陛下自己的事。既然陛下愿意，我只得从命了。"他刚刚说完了这话，登时起来用手指着早已准备好了的一个桌子上摆的一个长方匣，还有三件东西，对我说，这就是神器。这一切说明，一切都是早准备好了的，不过要我为日本作这个傀儡戏而已。日帝自己不便把伪神搬到东北令人祭祀，想尽办法，勒令我去完成。在我把伪神接回的途中，吉冈安直取出一纸告诉我，这就是回国后要颁发的《国本奠定诏书》的原文。他令我回长春，必须立即颁发这伪诏书。这是伪总务厅嘱托佐藤知恭所拟定的，也就是星野直树所制定的。第一次访日回东北前，远藤柳作仅口头告诉我必须颁发伪《回銮训民诏书》。这次吉冈竟拿出早作好的伪诏书全文。这说明他们是在东京取得日本有关人员同意的。回长春后，伪总理张景惠把伪诏书拿来，经我签字颁布。紧接着日本侵略者又制定了

一连串的计划：建立伪建国神庙；派桥本虎之助当伪祭祀府总裁，沈瑞麟当副总裁；规定对伪神庙失礼为大不敬，受严惩。头一次所谓大祭，规定我向它拜，关东军司令官以及伪总理以下伪满汉奸大臣等都参加。又规定每月十五日我向它拜。并令伪官吏、伪军都须向它拜，强迫学生以及市民向它拜。从此以后，吉冈安直随时令我向它拜。凡是在日伪报纸上登载日本侵略者打了胜仗的消息，吉冈就令我上伪神庙拜，算是谢神府保佑日本得胜。后来日本愈战愈败，报纸上尚掩饰说，前天皇军玉碎了多少，昨天又体当了若干。吉冈急急慌慌地令我赶紧到伪神庙祈祷神佑。就这样拜到日本全面投降，一直到强迫我上了通化大栗子沟，吉冈还跟我寸步不离，桥本虎之助还捧着伪神器，直到在沈阳被苏联军逮捕为止。在伪满时，吉冈由日本约来一人名筧克彦，说是给裕仁母亲讲伪神道的，足足地给我讲了好几个月，给汉奸官吏也讲。

关于《国本奠定诏书》

古海忠之

天皇制日本军部异想天开，硬是以“满洲国建国精神即日本精神，日本肇国的大理想归结于‘八纮一宇’”精神为由，在溥仪头一次访日后的诏书中宣布“朕与日本天皇陛下精神如一体”“日满一德一心”，而作为将这种关系在精神方面更加彻底地加以贯彻的手段，又试图将“天照大神”以某种手段移至满洲国。关东军第四课长片仓衷根据军部的这一意图，从1938年秋起，活动满洲国政府要人、特别是卖国的中国人首脑者，极

力鼓吹“祭祀满洲国一般人民尊敬之神，通过经常叩拜，统一国民精神，这对满洲国是绝对必要的；唤起敬神观念，使人们有所寄托，提高道义感，这种精神工作是应该做的”。片仓衷还装着的确民主的样子，说“这主要是中国人的问题，因此必须充分听取他们的意见”。前后召开了十多次讨论关于神的问题的会议。作为国民崇拜目标的神，中国人首脑中，有的主张孔子，有的主张关帝，意见纷纷，莫衷一是。片仓衷提出天地人三种之神，继续进行研究，所谓“地之神”，他提议将“为满洲建国而献出生命的人们”（即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充当镇压抗日救国的爱国者的肉弹而卖命者）合祭，建造像日本靖国神社那样的东西，结果得到赞同；接着，作为“人之神”，他又提议祭祀明治天皇，就这样一步步地制造了祭祀天照大神的气氛。对于皇帝溥仪，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和梅津美治郎直接与其谈话。于是，1940年6月，借皇帝溥仪为祝贺日本纪元二千六百年第二次访日之机，实现了计划。

皇帝溥仪自6月22日起在日本访问19天，亲自向日本天皇祝贺纪元二千六百年，并与日本皇帝尽情交欢之后，参拜伊势皇太神宫、橿原神宫和各地天皇陵寝。7月10日归返新京。15日安放从日本带回的“神体”，在帝宫内建造建国神庙，祭祀天照大神。同一天，张国务总理等文武百官，特殊会社代表300余人齐集帝宫，举行了所谓《国本奠定诏书》颁发式典。

通过《国本奠定诏书》的发布，把原来还比较暧昧的“满洲建国精神”规定得极为明确。通过这一诏书，把日满两国的立国根本同一起来，即都是基于“惟神之道”，并以皇帝名义宣布。换言之，满洲国虽然采取独立国的形态，但是与日本则是完全一体的，承认为日本的延长。

《国本奠定诏书》也是同样，皇帝溥仪并没有发布诏书的绝

对自由。诏书虽然出自宫廷，但重大诏书原则上都是先由总务长官和关东军第四课长以上首脑拟定梗概，然后通晓中国古文的佐藤知恭，根据总务长官的指示，将之拟成中文。原稿须经关东军同意后，总务长官才亲自去皇帝溥仪处听取意见，再与关东军首脑商议，进行部分修改，溥仪同意后才算完成诏书原稿。事实上傀儡满洲国皇帝必须同意，因为他不同意也必须发布。

于是，满洲国也祭政一致了。政府明确，满洲国的祭祀属于皇帝大权。为掌管有关祭祀事项，设祭祀府。1940年7月15日，在修改满洲国基本法《组织法》的同时，公布了掌管建国神庙及建国忠灵庙（即祭祀片仓衷所说的所谓“地之神”）事务的祭祀府官制。

本来，日本帝国主义在满洲国通过日本人支配体制的确立，日满共同防卫，日满经济一体化等，从政治、经济、军事上牢固地掌握了满洲国，现又通过了《国本奠定诏书》的发布，把精神、思想与日本一体不可分的关系强加给中国人民。这种对东北人民进行全面镇压和愚昧化、奴隶化，强制推行政策，绝不是表示日本帝国主义强大，而倒是虚弱的表现。

（摘自古海忠之等所写的日本侵华史料，标题是原有的。）

大搞“惟神之道”实行奴化教育

曲秉善

在溥仪第二次访问回到长春的第二天，日伪的喉舌《大同报》，大字登载了伪皇帝溥仪到日本去，倍受日本皇室的优待，

并亲拜日本伊势皇太神宫，在感激之余，誓心供奉“天照大神”，以祷国民的福祉。不多日子后，就拿溥仪名义发出所谓《国本奠定诏书》。诏书内强调溥仪信奉“天照大神”以祷国民的福祉，奠国本于惟神之道，张国纲于忠孝之教。同时，伪政府也公布了祭祀府的官制，置总裁副总裁神官等掌管供奉祭祀“天照大神”的祀典仪式等。规定供奉“天照大神”之庙名曰“建国神庙”。祭祀府的总裁由伪协和会中央本部长桥本虎之助充当，伪协和会中央本部长换了三宅光治；又公布了对于“建国神庙”所谓不敬罪的惩治法。遂在溥仪住所（所谓伪宫廷）的后院修了一所小庙，就是供奉“天照大神”的所谓建国神庙，由溥仪按期奉祀。伪政府对全伪官公吏、人民团体职员都发给一个圆型的“建国神庙国本奠定纪念章”，每逢有重要式典时必须把它佩带在规定的位置。日本帝国主义者马上利用起他们苦心制造的“侵略工具”（即天照大神），疯狂地普及“惟神之道”，崇敬“天照大神”，在精神和思想上进行毒化，使我东北中国人民遭受了无限的危害。日本帝国主义把“惟神之道”和日本帝国主义式的“忠孝之教”，作为教育中国人的基本精神。在学校里强使学生背诵所谓《国本奠定诏书》，在所谓建国精神课程内讲解“惟神之道”和日本帝国主义式的“忠孝之教”，颂扬“天照大神”本质的“德惠”，强使学生记忆，考试时考它，升学投考时问它，向纯洁的儿童青少年学生们的头脑里灌注日本帝国主义分子制造的那种荒唐无稽的麻醉剂与奴化剂，妄想使东北中国的学生们、青年们忘掉祖国，认他们制造的祖先为祖先，甘心受他们的侵略。侵略者们又说：“惟神之道不是宗教，乃是知与行的结合”，所以，他们在每天学生早操之前，使学生遥拜日本皇宫（即日本天皇裕仁的住所）、建国神庙、帝宫（即溥仪的住所）。在每次将要吃饭之前，学生们必须闭目对“天照大神”

表示感谢，然后方能吃饭。学生们每在听读所谓诏书时，或在课堂上听到说“日本天皇”、“天照大神”、“皇帝”时，必须肃然立正或端坐屏息倾听，否则即受严罚。日伪政府时常要求学生到各地日本神社去参拜、去勤劳奉仕（即劳做），又对学生们说：“每逢经过日本神社前时或帝宫前时必须敬礼，否则即按规定处罚。”开原女子国民高等学校（即女子学校）日本主事强使学生种水稻田给“建国神庙”种祭米。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这些规定，使东北的中国青少年学生们的精神无时不感受威胁，健康也受到莫大损害。日本帝国主义又用所谓“国兵法”强迫东北中国青年入营，为使之成为他们的忠实的炮灰，在各兵营里都设有“建国神庙”的分庙，妄想使其忘掉祖国弃掉同胞，做他们的忠实的走卒。在各伪机关人民团体里早会时全都遥拜皇宫、建国神庙、帝宫，每有集会、仪式时都要读所谓《国本奠定诏书》和遥拜，录取新职员或伪官吏投考官级时都要考“惟神之道”。伪政府又规定了“建国神庙”创建纪念日，逢此日全东北民众各户要悬挂伪旗，各机关、学校、商行放假休息，在长春“建国神庙”举行大祭，各机关、人民团体、学校都举行庄严的仪式。日伪政府又规定凡通过各地日本神社之前必须对之敬礼，即或坐在电车大汽车里的人也必须起身对之敬礼。各团体又时常率领市民男女到各地日本神社参拜和勤劳奉仕。如有中国人对“天照大神”、“建国神庙”稍加评论或发出不慎的言辞时，即以犯了“不敬罪”处以严刑。1941 年时我听说，伪铁岭市市长中国人徐澌九在学校校长会议听到日本殖民者讲所谓惟神之道，他回到他的办公室里对一部分校长说：“是什么东西，把老张家的老祖宗硬教老李家供。”想不到在这一部分校长中有日本人，就把徐澌九告发了，拿到法院下了狱，以徐澌九犯了“大不敬罪”判处长期徒刑，直到日本投降时他尚在监狱

里。日本殖民者又利用这侵略工具进行各种掠夺，在东北各地划出给“建国神庙”种供粮的土地。在那块土地内不准种他们指定以外的作物，把土地用黄绳圈上，所得的生产成果必须悉数给伪祭祀府送去，使辛苦终年的农民一无所获。并利用“报本溯源”作借口施行掠夺，每年春季在“建国神庙”举行丰年祈愿祭祈祷丰年，如果那年适逢丰收时，则说这是由于神赐，必须对神表示感谢，以报神恩。1944年武部六藏就用这个花招，在各省将1943年度指定粮谷出荷数量完成后，于1944年的春季，硬说1943年受神（即所谓天照大神）的庇祐得到丰收，应感谢神恩，强迫各省再出荷10万多吨，共掠出50余万吨。这种利用报恩出荷的名义，在完成指定出荷数量之外，又迫使各省出荷之事，不仅这一次。日本殖民者还利用1942年伪满庆祝伪政府成立十周年之时机，使溥仪在十周年敕语中，用“亲邦”（即指日本而言）字样来形容两国关系。伪协和会中央本部长三宅光治还发表了讲话，解释亲邦的意义说：“亲如父子。”就是意味着，日本是伪满的父邦，伪满是日本的子邦。从此以后人们在说话时或写文章时都要称日本为“亲邦”。同时，来到东北的日本人也都更加趾高气扬。自以“亲邦”的属民自居，骄傲蛮横。1942年我曾听人讲过，在大石桥有一位中国人，他是伪协和会的伪分会长，有一天他和车站的日本人口角起来，日本人把他打了。日本警察来后，那个日本人诬蔑说中国人打他了，于是那野兽般凶暴的日本警察就说：“你是协和会的分会长，你知道不知道日本是你们的亲邦，日本人都是你们的爸爸，好！你这东西竟敢打你的爸爸。”于是把那位中国人毒打一顿，还拘留了好些天才把他放回去。

奉迎“神玺”始末记

于跃东

神玺乃是日本神社里供奉的一个物件，这个物件，为什么名为神玺，我不太了解。其实神玺并不是什么稀奇之物，乃是长不满一尺半，宽不过一尺的一个木头匣子，里边装着一个稍厚的纸条，上面写上九个汉字，匣的外面为白色，木质很精细，在匣面上饰以简单花纹，有如两支箭头模样。这个神玺，虽属简单，但在伪满时期，由建国神庙取来，确不容易，要经过种种手续和仪式。我在伪满当过吉林女子国高校长，曾经参与奉迎一事。

伪满学校里，建筑神殿，奉迎神玺，这个事与学校教育有关，因为伪满的学校办的是奴化教育，而奴化教育的措施，虽然方式很多，而神道教育确占措施中的主要部分。为了说明事实，无妨先说学校建设神殿之经过。先是在伪康德初年，学校里的日军教职员，提议在校长室里设置神龛，我当然允许，不敢阻拦。神龛的形状，是长有三尺、宽有二尺，用木材做成的有如中国佛龛的样式，里面供的什么东西，我不知道。龛前设有香炉一个，花瓶一对，在花瓶里各插树枝一枚。这个神龛是钉在校长室的墙壁上，距离地面约有一丈多高，每天早晨教职员上班，须到校长室签到，在签到之前，即须向神龛行礼，退出后亦如此，这是学校里设神道教育的开始。同时在教学科目中，有建国精神一门课（后改国民道德），这门课程在各科目中，占着首要地位。担任这门课程的，多为日本教员，教材内容讲述

日本建国精神，如说日本是神国，祖先是天照大神；日本天皇是万世一系，天皇具神格，称为现人神；又说满洲建国，是顺从天意，和日本建国一样，日满两国为一德一心，有不可分的关系，所以日本的大神。即是满洲的大神，用这些谎言，以麻痹学生的思想，而达其奴化教育的目的。这是伪满的初期，学校里施行神道教育情况。及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在学校里更变本加厉地施行神道教育，除在课堂里讲述神道和率领全校师生赴日本神社参拜外，还在学校校庭里，建筑神殿。这个神殿建筑，虽然工程不大，但要选择适当地点，并且还要工精料细。吉林女高神殿，建筑在原校门之西，地方较为宽敞，在殿之周围栽植树木，殿之前面，修建一条石头甬路。别看这个殿高七八尺、宽五六尺的木造小房子，建筑费用竟花到4 000元左右。神殿修好后，要奉迎神玺，我亲自去长春（新京）建国神庙奉迎，还有我校村川副校长给我保镖，我们两个人实心实意地去长春办理这件重大事情。

吉林市内当时共有男国高六校，女国高一校。在伪满康德10年秋季，由省民政厅派人领我们去长春迎接神玺。一共去了14人，日本人校长居多数，中国人校长，只有我和赵、莫3人。在出发前，要整备服装，也就是要穿协和服，戴协和帽，佩协和带，还限定穿黑皮鞋。到达长春后，住在一个日本旅馆里，翌日清晨，我们这些人一同前往建国神庙。在神庙稍息后，由一位神官引导我们到神位前，然后由四五个神官举行仪式，并有几个神官在旁边作乐，其仪式我还不甚懂，什么迎接呀，修祓呀、奉奠呀、送神呀，最后每校交给一个木匣子。我是双手奉接，不敢怠慢，这样足足搞了一个多钟头，然后才退出建国神庙，各校分乘汽车，直驶长春车站。登上了火车，将神玺放在车内小桌上，我们十几个人，是态度庄严，敬谨护卫，未敢稍

有陨越。乃至回到学校后，早有教员和学生，在校门前迎候。我把这个木匣子，放在校长室内，着专人看守，第二天才纳入学校神殿以内。在纳入的时节，又请吉林神社的神官来学校举行纳入仪式，足足又搞了一天。学生停课，教员会餐，认为这是学校里一桩大事，这样我的奉迎任务才算完了。

学校神殿完成后，每天教职员和学生到校，都要向神殿行礼。午后退校也要行礼，如果有谁藐视，或者不行礼，即认为大不敬，要受到严格的处分。神殿的钥匙，放在一个小木箱里，白天晚上，分别由值日值宿者保管。在当值簿上，还要记载神殿的情况，如果没事，即写“神殿无事”四字，其事的重要，可以想见。在大战方酣之际，日本海、陆、空军在各地节节失利，因此学校里对学生更加紧灌输神道教育。不仅在学校里早晚要向神殿行礼，还在每星期一全校师生结队赴吉林神社参，以祈祷日本的武运长久和大东亚的圣战完遂。在此时期，吉林市国高学生所受到的奴化教育已达到了一个相当程度。乃至1945年8月15日祖国光复，日本降服后的第二天，我校教员和学生将神殿打倒拆毁，我将里边的神玺取出一看，原来是十几个汉字（字句忘记），写在一个厚纸条上。当时想，为了这几个字，我曾经付出很大精力，真是啼笑皆非。

徐渐九事件

张云腾

1937年（伪康德4年）“七·七”事变以后，日本帝国主义为使东北彻底殖民地化，又玩弄新的花招，决定在伪满洲国首

都——新京，建立一个所谓的“建国神社”，供奉日本国神——“天照大神”。日本帝国主义者又让伪满皇帝溥仪于1940年（伪康德7年）第二次访问日本，叫他把日本的“天照大神”（实际是一支剑和一面镜子）捧回来，当做伪满洲国的“建国神”供奉在“建国神社”里，表示伪满洲国的建立，不是起源于清太祖，而是和日本一样，始于“天照大神”，说明伪满洲国是在“天照大神”的神光保佑下建立起来的。并在伪《治安法》中规定：“如对建国神社有不敬者，要判处一至七年的徒刑。”

日本帝国主义者对中国人民的统治和镇压，是言出法随的。从徐渐九事件中，可以得到充分证实。

徐渐九是伪满铁岭市长。因是外县人，不知其籍贯，亦不详其身世。据说曾于日本某大学毕业，精通日语，当然与日本人有交往和联系，博得日本人的信任。当时日本人所扶植的傀儡和培养的奴才大多私心太甚，奴性十足，只知有己而不知有国家、民族，对日本侵略者俯首贴耳，他们甘当奴隶，引以为荣。但也有极少数人，有正义感，有爱国心，毫无奴颜媚骨。越是和日本人有来往，越感到自己被歧视，受凌辱，因而越觉得日本人可憎，祖国可爱。徐渐九就是这样一个人。

1942年（伪康德9年）8月伪铁岭市召开暑期教员讲习会，会议的议程有市长训话。至时，徐渐九市长出席了会议，他开始讲话了，但不时扫视会场，看有没有日本人。他又问在座的老师：“屋里有日本人没有？”群众回答：“没有。”他看没有日本人，憋不住了，眉昂色动地讲起心里话来。“你们看，他们口口声声‘日满一德一心’实际是叫咱们跟他们一德一心，他却不跟咱们一德一心，如果真是一德一心，为什么日本人吃大米是生活必需，中国人吃大米就是‘国事犯’呢？”

当他讲到战争形势时，他用教鞭指着地图慷慨陈词：“你们

看，这不是一道红线吗（图上用红线标志着日军已到之处）？这好像患疔毒症一样，起红线就危险了。红线越伸越长，毒火归心，就完蛋了。”

接着讲到“天照大神”，他义愤填膺地说：“叫我们供天照大神，老张家的祖宗，硬叫老李家供奉，行吗？”

最后又讲了世界形势，结论是中国必胜，日本必败。他讲出了多少人要讲而不敢讲的话。

但不幸汉奸告密，第二天，日本拘捕了徐渐九。不仅罢了他的官，而且按伪《治安法》规定，说他对建国神社不敬，判处了徒刑。这就是在铁岭震动颇大的徐渐九事件。

这一事件的发生，使铁岭人民对日本法西斯更加憎恨，对自己的祖国更加热爱，对徐渐九寄以极大的同情。只因在日本法西斯严酷的统治下，人们敢怒而不敢言。

（摘自《铁岭文史资料》）

回忆为“诏书”所受的迫害

吴兆祥

我于1940年被伪吉林市政府教育科派充吉林市黄旗屯小学校长。当时不论中小学校都由上级颁发《回銮训民诏书》、《国本奠定诏书》和《时局诏书》。这个小学校校舍很简单，只有7间房，3个教室、1间教员休息室，没有教员值宿室，也没有火炕。这对于保管诏书感到极大的担心和困难，有时候我把各种诏书放在家里，有时候放在学校里。放在学校的时候，夜间是十分担心的，怕盗贼把小木箱拆坏，又担心失火烧掉。当

时我心里想，这三个班的校长作不好倒没有什么，如果把各种诏书丢失或者焚毁，我这个校长就无法交待了。为了一劳永逸，于1941年春天我买了一张奖状用纸，仿照《国本奠定诏书》的字体和格式自己写了一份《国本奠定诏书》放在诏书箱里，把真的三种诏书放在家里的衣服柜里，每月的8号就拿出我写的这张“诏书”读一读就搪塞过去了。当时不仅学生不知道我读的是假诏书，就连教员也没有注意到这件事情。

真是冤家路窄，1941年10月，有一天我正在讲课，忽然瞥见吉田（日本人）和杨夕健两位视学骑着车子风驰电掣地闯入院内，进入教员室。杨夕健说：“江南区某小学的《国本奠定诏书》是假的，往上追求责任，原任校长死了。因此我们要把全市各学校的诏书检查一遍。”杨视学的话还未落地，吉田视学戴上了白手套：“我要拜见诏书。”我一听大吃一惊，好像一瓢凉水泼在我的身上，头上冒出了凉汗。一看当时的处境简直是武大郎服毒，吃是死不吃也是死，所以我就直截了当地说：“我校的全部诏书都放在我的家里，没有在这儿。”吉田说：“放在家里对于诏书恭敬吗？”我说：“不够恭敬可是很安全。”他又说：“为什么不把诏书放在学校呢？”我说：“学校没有火炕不能值宿，我怎能叫教员值宿。”质问了我几句后，他们匆忙地登上车子奔向他校去了。

从这件事情发生以后，我心里总是忐忑不安，怕受到处分。在校长会议时，一听到关于诏书的指示，我就如坐针毡十分不安。1942年1月伪吉林市政府教育科将我调到德惠县城内西广国民优级小学去任职，被撵出吉林市。

害人的伪满“皇帝诏书”

陶 庸

诏书使人望之生畏

诏书的颁发与“奉戴”

诏书的书写格式：开头贯以“诏书”两个字，接着便是正文，正文完了，另起一行书有“御名御玺”四个字，最后才标明年月日。我所见到的诏书，也就是颁发给一般机关学校没有加盖所调御玺的石印的诏书誊本。可是这一纸誊本，好不厉害，在由中央颁发给地方的机关学校时，却要举行十分隆重的“诏书奉戴式”。

当向学校颁发《回銮训民诏书》时，我正在凤城县立通远堡两级小学当校长。颁发到我们学校的诏书，是由凤城县视学徐典章搭车敬谨恭送到学校的。徐视学由县刚一出发，教育局长何泮林就和我有电话联络，叫我举行隆重的仪式，率领全校师生整队敬谨“奉迎”。当时我是小鬼接城隍，真是诚惶诚恐。学生列成四行纵队，教员在前，恭候在校门之外。这时我的服装是十分整齐的，身上协和服，头上协和帽，脖子上还挂有协和礼带。当我见到那位护送诏书的“使者”离我不远时，我随即戴上了洁白的手套，紧走两步，接过他用双手高举到头顶上的黄布包，接过了诏书，照例我也两手敬谨地高举在头上，亦步亦趋地走向校庭。这回护送诏书的使者，却退到我的身后，当我把诏书放在布置好了的垫有讲台的桌子上，后退五步时，护

送“使者”已毕恭毕敬地登上了讲台，这时我们全校师生早已回到校庭整队等候。当司仪宣布开会，“使者”抽开封筒，十分斯文地揭开诏书。当他开口读出“诏书”两个字时，我们全体师生立刻俯下头来，屏息倾听，在听到读至“康德二年五月二日”的最后一句，全体不约而同地抬起头来。这次的“奉戴仪式”是在徐视学简短的训话后结束的。仪式完了，我把诏书“奉戴”到校长办公室离地七尺修好了的靠壁的木架上，外面罩以黄布，真像供奉祖宗神灵一样。“奉戴诏书”还有些注意事项：非遇式典与意外，平时不得移动位置；如果稍有污损，甚或不幸而有所焚失，则以“大不敬罪”论处。因此这个神圣庄严不可亵渎的诏书，竟成了使人望之生畏的不祥之物了！

平日的敬谨“奉护”

两份诏书对我个人的压力实在也不小，第一次“奉戴”诏书时，我担任校长，在职期间我是十分忐忑地“奉护”它，不敢稍有疏失。以后我做了教育行政工作，负有监督“奉护”的责任，一个学校的失慎，我也会代人受过的。

颁发到学校的诏书，多数都是高置在校长室里正面墙壁的木架上，一般学校置备不了“奉安库”。平日对诏书的保护，是十分担心的，若是遇到寒暑假，问题就更大了。校长教员常要参加短期的集体训练，无事也该回家休息休息，学校只留一两个工友，是不大保险的。要想把诏书移动到安全的处所，也怕被坏人告发，说什么无故移动诏书是大不敬。但是事情都有例外，胆子大的，人缘好的校长亦自有其不能告人的办法。

我担任过安东、凤城两县教育科的学务股长，也做过通化县的教育股长，虽然对诏书不负直接“奉护”的责任，而间接的监督“奉护”的责任并不轻，在学校的寒暑假期间，担心各校诏书的安全，有时连觉都睡不好。为了避免代人受过，我想

出一个办法，在每届假期之前，都向各校下达“敬谨奉护诏书，不得疏失”的训令。表面是为了提醒各校长的注意，实际是意在万一发生意外，给自己找辩解的理由。

诏书污损与焚失就是大祸临头

凤城县对遭受水灾各校损失的诏书的苦心处理

1937年农历七月初二，正是全县教师集体训练最紧张的一天，教育局把全县教师集合到城里，事前并没有顾及到各校诏书的安全问题，更没有想到恰好在这期间城南依兰勃勒河流域发生了百年未有的大水灾会祸及诏书。那年夏季雨水较大，依兰勃勒河上游地区山洪暴发，好像瀑布似的直泻下来，平日卷起裤管就能徒涉的小水，彼时则有如长江大河，使人望之兴叹。由于正值七月的朔日，黄海的海潮尤大，大洋河的水反而向上源倒流，使得龙王庙附近几十里方圆顿时变成汪洋泽国。人畜的伤亡，农田的被冲与屋舍的被毁，损失之重无法估计，是百年来所未曾有过的，但是并没有引起伪省、县当局的怎样注意。这次水灾，使陶家堡、温家堡、敖家堡与赊里沟几处校舍都被冲倒，龙王庙校舍被淹没，还有好多校舍被冲毁。这虽然不是小事，但凤城县教育局并不是对几十处校舍被冲倒与冲毁感到可惜，而是为被污损与冲失的几十份诏书，大为焦急与头痛。那时，教育局长缺员，由学务股长刘星一主持一切。经他初步调查，在水灾中污损与冲失的诏书不下三十几份。刘星一作过翻译，一口好日本话，在“参事官”宫泽次郎面前红得很，加之是伪满大同学院出身，神通也大，所以这个事件由他处理，可能问题不大。但是他一心要当官，却不敢把这一实际情况报告上去，深怕影响他的将来。因为他在召集全县教师到县训练时，并没有对诏书的安全作出要慎重保护的安排，他是有渎职过失

的。

第二年(1938年),我从县立文庙小学调到教育科作礼教股长,当时教育科长是前任视学徐典章,学务股长是李宝云,我们三个人都是不懂日本话的“白帽子”,胆子小得很,甚至连树叶落下都怕打脑袋,哪里经过这样的大事,真是愁煞人也!不过事已至此,不能再拖,必须硬着头皮,具实呈报,请求处分。但是也怕受到“领导疏失,奉护无方”的指责而遭到无情的处分。就在这个紧急的关头,学务股长李宝云,情急智生,要伪造诏书,就议于我。当时我是愣装大胆,不仅赞同他的计划,也给他出了一些点子。县里本来设有自办的“官立印刷所”,在得到印刷工人的协助后,由我们科里的职员蔡长奎照样描绘了一个底板,付印之后,确实真假难辨。随后秘密分发到20多个学校里,以补充损失的数目。关于陶家堡、温家堡、敖家堡以及赊里沟等几处学校所损失的诏书,却具实呈报了,这个呈文是李宝云亲手拟的,他把温家堡、赊里沟两个学校的诏书,说成仅被污损并未冲失,而陶家堡工友于某被水淹没身死,找到为“奉护”诏书而殉职的借口。至于敖家堡小学由于教员殷兴德的妻子因暑期守护学校,大水袭来,全家命尽,诏书冲失又情有可原,具实呈报原无妨碍。这样的构思,实在是急难中挤出来的。我在这方面又出了一点力,就是我代替陶家堡教员赫贵纯拟了一个呈文,是以于工友为奉护诏书而惨遭灭顶,请求给予抚恤,以昭示奖劝。当赫贵纯把这件呈文送到县里后,大受赞赏,李宝云更乐得不知怎么的好了,在向伪安东省呈报县下学校诏书在水灾中遭到污损与冲失情况的同时,也把这件呈文抄出附件一并恭呈上去。事后确由省拨下一笔抚恤金来,因为于工友是独身,就作为给他重置棺椁,重新典祭的费用。关于诏书一案,也得到了省里以“备案”了之的法外赐恩,而告结束。

这真是天大的幸事。

安东县小学诏书的丢失与被焚，几乎酿成冤狱

1939年春，我同徐典章一起调到安东县教育科，徐任科长，我是学务股长。到差不久，就受到伪县长宫文超的嘱托，叫我们对前阳山村小学教员于老师，不要轻易更动，因为他校的诏书，被人偷走了，交接时会露出马脚的。于老师是个少不更事的年轻人，事出后几次想要逃跑不得，又要自寻短见，幸亏经过伪县长宫文超的安抚，并告以机宜，才暂时安下心来。1940年春，宫文超事先得到有被转动的消息，他想到经过自己帮助掩护的"空印盒"，始终是危险的，他又把科长和我找到面前，计议处理办法。当时我提出由我回到凤城取来一份仿制的诏书以事顶替的办法，徐典章还有点犹豫，而宫文超却喜出望外，让我立即写五天出差凤城的"出差命令书"。实际由安东到凤城，乘火车一天可以往返两次，用意叫我多得几个出差旅费，以示薄奖。凤城教育科保管这份诏书的是我的老同仁、好朋友彭书城，当我向他说明来意，他就偷着拿出一张给我。在我返回安东见到宫文超，报告"不辱使命"的经过后，即电召于老师到县领诏书，在我向于老师谈话时，又制造一套言词，说什么这是我们过去保存的一份诏书，领回后，要慎"奉护"，并要保守秘密，不得让其他人知道。于老师再三称谢地走了，这个久悬的案子，也无声无息地结束了。

俗话说得好，"福不双至，祸不单行"。1941年初，安东县又出了一件学校诏书被焚的事故。事故发生的时间，是在那年农历的春节，大东沟街一家药铺不慎失火，风大火急，片刻之间一切化为灰烬。不巧得很，春节前大东沟后一处小学的宋老师偏偏把诏书送到该药铺来保管，大火之后，连诏书的余烬也看不到，这个天外飞来的灾祸，是宋老师万万也想不到的。宋

老师年岁较高，更是怕事。事故发生后，不知怎样处理才好，就贸然来到教育科，并未经过我们的引介就闯到徐科长的面前，惊惶失措地报告诏书被焚的原委。当时正值日、满两个视学都在旁边，三个人便交替地追问起来，样子真像“三堂会审”，日本视学井科荣吉，是科里掌实权的真头子，他听不懂中国话，就由视学崔文宝作翻译，当情况了解后，他认为教育科处理不了这个案子，就把这个所谓大事故报告给副县长渡边三浪。渡边出身于上海同文书院，是个中国通，还会一口流利中国话，从他取名三浪不叫三郎，也可以知道他是一个不好应付的怪物。他把科长、两个视学和我都找到面前，大发雷霆地斥责了一顿，更无情的是决意要把我们（不包括他们日本人）都给予应得的处分。我作学务股长的责任较大，所幸由于我在寒假前拟过“敬谨奉护诏书”下达各校的训令，渡边在言词上对我放宽些，而对徐典章却毫不容情，声色俱厉地追求责任。弄得徐典章回到科里，对着两个视学，大哭一场。什么案件，一到渡边那里，小的会变大，简单的会变复杂，愁得徐典章如丧考妣，几天愁眉苦脸，失去了科长的气派。可是他并不老实到底，还要找个垫背的，立刻监视了宋老师的行动，必要时想把宋老师从严惩处，叫人坐监，以减轻自己的过失。因为在敌伪统治时期，“奉职无状”就是过失。冒失鬼不压事的渡边三浪，不等教育科研究出办法来，就向伪安东省文教科作口头的报告，并研究对责任者如何处理的问题。当时文教科长是由吉林高师调来不久的小松先生，他是作过大学教师的，比较稳健和聪明些。他知道这在“满洲人”看来是件了不起的大事，可是在他们日本人的眼里，什么诏书不诏书的，皇帝那个活人还不是他们安放的牌位么？而且各校的诏书，又本来是个誊本，更不该以假当真，况且如上报“中央”，省县当局多少都有责任，岂不是弄巧成拙，反而自

讨无趣么？还不如压下的好。至于小松向渡边怎样解释的，我们虽不是详细知道，不过我们再见到渡边三浪，他却已平息多了。

起初在渡边返县后，我们全体教育科同仁都捏着一把冷汗，认为凶多吉少，万没想到渡边这个家伙有好几天不好意思到教育科来，只通过井科荣吉转告教育科放回宋老师。到此我们才如释重负，精神顿觉轻松。最后教育科对这一案件的处理，也是在渡边三浪示意之下不了了之，只存案不上报而告结束。这次风浪平息后，我调回凤城做学务股长，徐典章则降职一级，调到省里当股长，毫无疑问这都是渡边的意见，给我们一个轻微的调职处分。

诏书本是一纸誊本，竟使人望之害怕，仔细想来，并不奇怪，它背后有几个作祟的东西在。在敌伪统治的十几年当中，诏书委实压得我好苦，有谁想到它也有个无人理睬、废纸不如的下场？1945年“八·一五”，日本投降了，伪满垮了台，日本也险些亡国。在“九·三”胜利的前夕，伪通化市公署在院内举行了一个散伙仪式，那是我从伪通化省转来不到一个月的事。我看到伪市长赵长生，从“御影橱”里捧出了一向被称做御影的溥仪像和两份神圣不可侵犯的诏书，一齐投到事先在厅前挖好了土坑里，点起火来，随着青烟的上升，再也没人为之害怕了。至于最后存在各校的诏书，任你做废纸，也无人过问了！

五

加紧奴化教育
推行愚民政策

伪满普及日语教育的奴化作用

安希元

伪满初期，中、小学校即添授日语，大抵由日本人教员讲授。当时日语授课时数在课程表上占的比重还不大，大约占中国语文授课时数的二分之一。中国语文教科书还叫做国语。大同2年（1933年）以后，日语授课时数逐年增加，待新学制实施以后，伪满当局为彻底推行奴化教育，日语教育的普及放在首要地位。这时把中国语文教科书由“国语”降为“满语”，表面上它和日语并列，实际是要以日语代替“国语”。市内各级学校增加了许多日本人教员，他们不光是担任日语课，也担任其他各学科的讲授。上课时不管学生听懂听不懂，都用日本话讲课。学生为了弄清楚课程的内容，就不得不努力学习日语。每天朝会上日本人教员向学生发表事情时，除非极重要的事情而用翻译外一般都是直接用日语讲。同样在教职员会议上日本人副校长或日本人教员讲话时，也都用日语，这也促使教职员不得不极力学习日语。有些中学还规定：入学试验，日语不及格不录取；学年试验，日语不及格不能升级。更有许多中、小学为了加强学生对日语的学习和运用，实行所谓“一日一语”。就是有计划地每天规定出一句日本语，由值日教员把这句话写在迎门的大黑板上，使全校学生清早一到校首先就看到这句日本语，限令学生当时就念几遍。回头在上课时，老师也首先问学生今天的“一日一语”是句什么话，有什么意思，学生回答后，再令全班学生念几遍。晚上放学时，值日教员还要向学生问一

遍，学生答对了，才能放学。经过一个阶段还要在班上对这一阶段的“一日一语”实行测验。教室墙上挂着“片假名”和“平假名”字母表，高年级并用假名拼音表来装点教室，使学生一抬头就可看到日本文字。训练学生用日语讲话，举行定期的日语比赛会，成绩好的给予物资奖励。另外，训练学生早晨到校向老师用日语问早安，晚上离校时也要用日语向老师问晚安。因此早晨入校和晚上离校时，全校到处都响起用日语问“早安”和“晚安”的嘈杂声音。正是利用了这样的教育环境，来使学生耳濡目染的渐渐地满脑子装的是日语。尤其一年级的小孩子一入校就走进这样的环境里，容易先入为主，目的是使他们不知道自己是中国人。

再看看日语补习班推行日语教育的情况。教育厅为了使各机关职员及一般愿学日语的人随处得到学习日语的机会，拨出一笔经费在各机关内和地点适中的学校，开设日语补习班。日语补习班的授课时间是在晚间。补习班一开课就很快发展起来。因省实验小学地点适中，教育厅便允许在该校开设一班日语补习班。当时我在实验小学担任校长。这个补习班由毓文中学日本人教员金子乐担任讲课。最初补习班仅40余人，开课后不久，就由40人发展到七八十人，一个班容纳不下，便又增开一个班，由女子中学日本人教员荒木员一担任讲课。后来两个班人数最多到100人以上，还有许多人要求入校，因为限于教室容纳不了，没能够完全收入。一处如此，其他各处补习班也可想而知。日语补习班为什么发展得这么快呢？其原因在于各机关在职人员的工作需要。当时各机关的往来公文都是用日语写的，职员不明白日语，不用说用日文来写公文，就连看都看不懂，怎么去应付工作呢？机关主要负责人都是日本人，他们当然都用日本语分派工作，职员不明白日语也难于应付。因此，各机关职

员不得不努力学习日语。日语补习班规定每晚上课两小时，从晚上7点到9点止。可是学习的人们真表现了“求知若渴”的精神，下课后总有许多人围着日本人教员问这问那，我也是其中的一个。金子乐和荒木员一对学习的人“求知”的要求，表现得十分耐心，总是有问必答。本来他们9点钟下课应该离校，可是他们经常在10点钟以后才离开学校。学习的人们异口同声地称赞他们的“热心”，其实他们这样做，原是为了完成奴化教育的使命，同时却又博得被奴化教育者的好评，也算是“一举两得”了。

伪满当局还利用奖励和升官制度来推行日语教育。康德3年（1936年，大概是这年吧）制定语学检定制度，日本语检定合格，给予语学津贴，以资鼓励。语学合格按程度分四等，即特等、一等、二等、三等。特等合格给予津贴25元、一等15元、二等10元、三等6元。一、二、三等津贴以三年为限，比如三等在合格后三年内考不上二等，即停止发语学津贴，二等考不上一等，一等考不上特等，也同样处理。语学检定试验每年举行一次，由语学检定委员会组成检定小组，分别在各省区举行。当时我在伊通县公署担任教育股长，虽然在日本镀过一次金，但日本话并没有学好。日本人宫崎视学极力鼓动我去新京（长春）应三等语学试验，他还替我报了名。记得检定试场是在大经路小学，主试的共3个人，其中一个人（中国人）是熟人，他见我进来，第一句就说：“你这么大年纪（38岁）还扯这个做什么！”我觉得很不好意思，但既然来了，也就试一试吧，他胡乱问了我几句就算完事。因为应试的人很多，他还忙着问后来的人。以后不知怎的，我还合了格。我以后再也没有应二等语学试验。

伪满官制有特任、简任、荐任、委任之分。委任和特任不

分等级，简任和荐任分等级。荐任以上叫做高等官。荐任官一般须经过考试（也有认为资历相符，不经考试的），叫做高等官考试。高等官考试条件之一，须有语学检定三等以上合格证明，因为考试时直接用日语回答问题。考试有初试、复试之分，初试合格才能参加复试。康德7年（1940年）我正在乾安担任农业学校校长，一天忽然接到高等教育科通知，于某月某日（日期已忘记）到新京文教部参加高等官考试。我觉得这是意想不到的事，考试前一日高高兴兴地回吉林，第二天便和一帮应试的人（吉林应试的有十几个人）乘早车到新京文教部报到。等到下午4点钟呼到我的名，我随着来人走进试场一看，嗬！这个排场，可和语学检定试场大不相同。上首一连排坐着四五个穿着礼服的日本人，都摆出一副庄严的面孔，下面放着一支椅子是给应试的人准备的。我的日本语本来不好，一看到这个场面，更不能对答如流，约经过二十分钟的考问，总算完了。我想完了就算完了，没想到初试还合了格。初试合格自然就有资格参加复试了。记得复试在当年的冬季，试场是伪满的“国务院”。试场的安排又和初试不同了，场内上首高高地坐着十几个考试官，大概坐在中间的就是主考官，下首坐的两个人担任记录。我坐定即由主考官叫右面一个人提出问题，大抵是关于“东亚共荣圈”的一些问题，当时日军已侵占了南洋群岛一部分。他问我：“皇军都占领了哪些岛屿？”我哪里能答得出来。接着又由左面的一个转换了话题，问我的志愿，后来又由一两个人问了一些有关时事的问题。约经过三十几分钟才叫我退场。当时虽然是冬季，出来时却觉得浑身是汗。

语学检定、高等官考试吸引了成千上万的人，我也是其中的一个。为了准备好日语，不知费了多少时间，消耗了多少精力，这正说明了伪满当局利用奖励和升官诱引的方法，来尽力

普及奴化日语教育的又一个方面。

伪满吉林市小学教育片断记

杨文建

一、奴化教育的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

在伪满建国初期是日本侵略者统治我国东北的开始，教育重点首先是废除中国原有的教学秩序、教学内容和教材，代之以日伪的课程设置和教材，并声嘶力竭地宣扬王道教育。下令各学校讲课以“孝经”、“四书”为教本。当时我在吉林市立第五小学校任高级班教员，就讲孝经和论语。1932年5月的一天，伪吉林省教育厅厅长荣孟枚偕同随员到校视察，并在我教的这个班听了我讲孝经课。当时伪文教部发出通知，强令各中小学校教室内一律不准悬挂中国地图，全东北都不得悬挂中国地图，也不许观看；不得使用“中华”字样；不得使用中国教科书。在课程安排上开始讲授日语课。当时在吉林市小学中，班级比较多，并设有高级班的学校，自1932年底先后派日本人来校任教务主任并兼教日语课。吉林市立第五小学校也派来了一名叫芝野盛秀的日本教员。

1935年，伪满编写并出版的进行奴化教育的新教材足有20多种，分别发给各年级使用。在课程安排上日语课列为主课。从这以后，原有的中国传统的民族文化教育课程，全部被摧毁殆尽，整个学校教育，完全被日本侵略者控制和操纵。1935年5

月，溥仪访问了日本回来后颁发《回銮训民诏书》。伪文教部通令各学校师生都得认真诵读。从此“日满一德一心”便大讲而特讲起来。每天早晨晨读时教师便率领学生咿咿唔唔地念起来。当全吉林市小学生举行书法竞赛时，就以这“诏书”为内容用墨笔来默写，并选评优秀者予以奖品。

当时在各小学校中，教学方式方法都得依照日本国内小学那样来进行教学。音乐课多是教日本歌曲。如《桃太郎》、《春天来到了》等等。上体操课喊口令也得用日本语。

1934年秋，溥仪在关东军的示意下，曾从伪新京到吉林市小白山进行望祭。市内各中小学师生，齐集吉林市西南通往小白山去的温德河子桥下东侧，参加迎送仪式。当溥仪坐着的红色敞篷汽车和一些随员坐的汽车来往通过桥上时，迎送的师生都得低下头来，不许仰视。直到这些人从桥上通过完了时，我们才各回各校。

第二阶段：

实行“新学制”。日本帝国主义为了进一步确立奴化我东北中国人的殖民主义教育制度，于1938年开始正式实行“新学制”。直到1945年伪满垮台止。

什么是“新学制”？所谓“新学制”是在小学教育阶段仍采用四二制，前四年初小改为“国民学校”，后二年高小改为“国民优级学校”。这样年限缩短，课程减少，学生的知识面狭小。况且以日语课为主课，再加重劳动作业课，学生的文化水平显著降低。“新学制”教育的根本特点，就是殖民奴化教育。当时伪民生部的“训令”里说：“新学制”的任务是“为养成忠良国民，即以建国精神为基础，陶冶人格，涵养德性”。从这个“训令”中充分看出就是要东北人民规规矩矩，俯首贴耳，充当日本殖民主义者任意驱使和宰割的“忠良”亡国奴。

1938年春季开始，吉林市各小学校校名一律改换。如吉林市立大马路两级小学校，高级班改为吉林市立大马路国民优级学校；初级班改为吉林市立大马路国民学校。在同一个学校门口，同时挂上两个校牌子，学校印章也分成两个使用。而对吉林市效区原有的私塾也加以限制。除部分解散、合并外，留下的寥寥无几。同时以"国民义塾"名义完全控制起来。当时吉林市仅存留龙潭区的白泥多河国民义塾一所就是一例。实际上就连私塾也被取消了。

在这种殖民主义教育政策的奴化下，学校师生都必须"虔心诚意"地崇拜日本天皇和伪满皇帝。从大力宣扬"日满亲善"、"民族协和"的"王道"转换为大力宣扬"八纮一宇"的"皇道"。对溥仪颁发的《即位诏书》、《回銮训民诏书》和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所发布的《时局诏书》等，都要求学生会背诵、会默写。记得当时师生都剪发成秃，戴战斗帽，腰后系一条手巾。这样表示决心支持"圣战"。

这些诏书（誊写本）都高高地放置在每个学校校长室内，对它必须精心在意地加以保管。如有丢失，便依法惩罪。每日早晨，教职员工到校后首先得向它致敬。

"新学制"实施后，小学设有一门"国民科"课程，这门课程是把日本殖民主义政治和语文混在一起而编写的教材，教材中有一半是用日语讲授的。这样就占去全部课程的二分之一的时间。1942年后，小学还单开设一门"建国精神"课。这门课程的内容主要讲"日满一德一心"、"精神如一体"、"日本亲邦"、"大东亚共荣圈"等等。同时把地理和历史课都取消了。在"新学制"中还把日语课和中国语文课课时列为相等，并把日语课也列为国语课。这样就突出日语课和日语教学所占的课时数。

日本帝国主义者为了加速使日语成为"国语"，从1936年开

始，实行日语的“语学检定制度”，每年举行一次考试。考试合格者依据成绩分别可取得日语“特等”、“一等”、“二等”和“三等”资格。除发给合格证书外，在头一年里还发给补贴费。学生考学校或就业都要看日语的资格。

在语文教本中，充满了反动内容。日本历代天皇、历代将相武士、宗教迷信故事等等占满了课本。大肆宣扬“惟神之道”、“八纮一宇”等等。胡说什么伪满的原始不是起源于中国，而是和日本一样开始于“天照大神”。又胡说什么伪满是在“天照大神”的“神光”保佑下建立起来的。溥仪和日本天皇亲如一人，伪满就应该归日本管辖，而把原来的“友邦日本”、“盟邦日本”进而改称为像父子关系的“亲邦日本”。1942年9月5日伪满国歌歌词也改换为“神光开宇宙，表里山河壮皇猷，……”的新歌词，更炮制了一个共五条的所谓“国民训”，强迫学生背诵。其第一条就是大肆宣扬“惟神之道”，内容是：“国民须念建国渊源发于惟神之道，致崇敬于天照大神，尽忠诚于皇帝陛下。”实际“天照大神”本来是日本统治阶级为维护其天皇制而设置的一个日本迷信的天神。这样无中生有炮制“惟神之道”，强加在小学生的幼小心灵上，使他们无论在精神上、意识形态上都遭受了严重的摧残。

二、学校的合并情况和校内编制

1. 合并情况：

在吉林市政筹备建设时期，设有市立小学10所。第一小学在当时的运动场内，第二小学在巴尔虎门外，第三小学在北极门外，第四小学在致和门外，第五小学在西关迎恩街，第六小学在西关五道胡同，第七小学在西关西石砬子，第八小学在黄旗屯，第九小学在东关文庙西侧，第十小学在东关南昌邑屯。这

10所市立小学校除第一小学在吉林城内，其他9所小学均在城外。城内和城郊均有永吉县和省设置的小学。在市立10所小学中以第五小学校班级最多，有初级班8个，高级班5个，其他各小学均为初级班小学，这10所小学约计共有48个班，教职员工62人，学生数为2 000余人。1935年，吉林市立第五小学校被伪文教部指定为吉林市模范小学校。学校增派日本人主事一名。1936年吉林市成立后，由于市区扩大，加强市政管理，将在吉林市内设置的吉林省立模范小学和永吉县立模范小学划归吉林市管理。又将永吉县城区的永吉县第一、第二、第三高级小学和提法司与临江门小学等5校以及省师范附属小学及省女附属小学先后都划归吉林市管理。1937年"新学制"实施后，由于吉林市郊区扩大，成立江北、龙潭、江南、白山等区，原属永吉县管理的大常屯、大红旗屯、温德河子和江北棋盘街朝鲜族小学均划归吉林市管理。同时将原吉林市致和门外和北极门外的小学合并一起，新建北山小学校。而把城内的市立第一小学撤销。永吉县城区后新街、卧虎屯、东昌邑屯和车站巴尔虎屯小学也都划归吉林市管理。从表面上吉林市小学数目比原来10所增多，但都是从省、县划归过来的。

2. 校内编制：

伪满的财政支出，军事治安经费占30～40%以上，而教育经费少则不到1%，多则也只占2%而已。由于教育经费的减少，学校教师人员的编制就要紧缩。当时吉林市小学教师人员编制异常紧张。一方面由于日伪对教师经常进行迫害，人心惶惶；另一方面由于从事教育工作生活毫无保障，奈难度日。每个小学校教师人员编制原则上一班一名教师，什么课程都教。只是有高级小学班（国民优级学校）的设有专科（音乐、体育、图画）教师。只有两三个班的初级小学校（国民学校）校长也同

教师一样担任一个班的课程，校长是兼任，不专设编制。各学校都有一名日本教员（有的兼校），有高级（国民优级）班的学校则多设一名到两名日本教员，他们除教日语课外，并管理学校。

学校设校长一名，下设教务、训育、体育和事务四个部。各部负责教员称为主任。教务工作主要是掌管教学进度和编制授课时间表等。训育工作主要是管理学生。体育工作主要是训练学生。而事务工作则主管收“授业料”（学费）和校内房舍维修以及购置事项。

教员工资待遇非常低薄。每当寒暑放假期间，因为不上课，就给教员开半工资。女教师在产假期间，由自己找代课教师，代课教师工资从自己工资中支给。

教员根据出身学校分为教谕、教导和教辅三种。完全师范毕业的为教谕；而教谕又分为三等；师范讲习科或师范特修科毕业的为教导；而中学（国高）毕业的为教辅。教辅多是代课教师。这三种教师根据教学年限等经考试都可进级。随着师资种别不同，工资待遇也不同。

三、进行奴化教育的几项主要措施

日本帝国主义为了达到奴化我东北青少年一代的目的，不仅在学校课堂内采取了种种奴化措施，在课外也采取了许多具体措施。其主要内容有：

1. 强迫小学生劳动，严重地摧残了孩子们的身心健康

由于劳动强度大，任务重，一年四季终日不得休息，许多学生患了病。每天强制性的劳动很多。所谓“勤劳奉仕”就是强制性劳动的代名词。在每个小学校的教员室中都挂有“月中行事板”一块。在那板上每天都写上安排的劳动项目。今天到

吉林神社去清扫，明天去铺马路，后天到校园去割草，大后天去挖沟。小学生终日不得休息，毫无复习功课时间。这些青少年们由于终年劳累，干不动也得勉强去做，弄得疲于奔命，劳累不堪。有的班级劳动差一些，日本教员轻则加以斥责；重则下毒手痛打。

特别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协和会对小学校青少年的法西斯式的控制和奴役，更是变本加厉。从1941年起，伪满吉林市协和会把对青少年的所谓“教化训练”作为它的重点之一。当年3月5日，协和会里成立了青少年团统监部，把各学校的青少年都纳入这个团里。在各小学中都成立了“勤劳奉仕队”，还发了一个旗，为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效力。当时它们提出“训练就是活动，活动就是训练”的口号，强迫小学生去修筑道路，挖沟渠，抬木头，担负各种沉重的力不胜任的劳役。说这也是“勤劳奉仕”。实际这就是从事无报酬的劳役。

2. 利用每天朝会和节令日集会搞奴化教育

每天朝会时，全校师生按班级在操场上分别列队等候全体教师。在体操教师的日语口令下全校学生都肃然静立。朝会程序，首先是向“皇室遥拜”，一齐背诵《国民训》。接着学校训育主任讲话，值日（值周）教师提出要求或通知事项。最后全体师生做“建国体操”，完了后，学生分班拉队边唱歌边走回教室。

伪满公布的法定节日有“元旦”、“建国节”、“祀孔”、“万寿节”、“五·二访日《回銮训民诏书》颁发纪念日”等节日。学校内有“开学式”和“毕业典礼”等。在这些节日里，校长穿上协和服礼装，捧读《回銮训民诏书》。另外根据节日性质不同，讲有关节日的事项。

3. 利用封建迷信占领意识形态领域

日本侵略者为了掩盖侵略本质，大肆提倡“王道主义”，建设“王道乐土”。于是在每年春秋两季丁日举行祀孔仪式。当日，各校师生拉着整齐的队伍，衣冠楚楚，都早早地到吉林市东关文庙去集合，参加祀孔仪式。各学校师生按指定顺序分别列队，肃然静立在大成殿阶下，听候司仪者宣布祀序。首先是奏乐，主祭人致祭，献三牲，行三鞠躬礼后，唱“泗水之精尼丘灵，博学而无所成名……”孔子赞歌，司仪者宣布礼成，各学校便带领自己学校学生返回学校。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伪满于1941年12月8日发布《时局诏书》，并从此规定每月8日为“诏书奉戴日”。在这天早上全校师生集合，校长照例穿上协和服礼装，读《时局诏书》后，全校拉队到吉林神社去参拜，祈祷“武运长久”、“圣战辉煌”等。

4. 训练教师

关于训练教师（校长）可分为一般和特殊两个方面。一般的是在寒暑假中集合全市小学教师和校长编成中队，下分小队，进行军事教练。同时还找省、市主管部门负责人来队做政治报告、时局讲演、军事报告，还讲述“惟神之道”等等。特殊的就是专对20多名小学校长进行训练。训练的内容有：

一是强行军。强行军是组织这些小学校校长进行长途行军。记得在一个炎热的暑假中，伪吉林市公署教育科将20多名校长集中到市维新街小学校听讲演后便由吉林市出发奔向江东龙潭山。这时我正在吉林市大马路小学校当校长，当然也得参加这次训练。当我们到龙潭山上时已傍晚，便在龙潭山上庙宇中睡下。夜中雷雨交加，一直下到次日早上。在宿雨初晴热气蒸人的盛暑里，便奔向龙潭山之最高处南天门，从这里下去沿着去往小丰满的铁路沿线，一直走到小丰满。自山上往下走的时候，道路泥泞，越走越滑，越滑也就越跌倒。我们滚了一身泥巴，好

不容易走下山来。每个人浑身是汗、泥呀、水呀，简直成了一个泥人。顶着炎炎赤日，每个人强走也走不动，双脚都打成血泡。到小丰满时，都累得精疲力尽，又饥又渴，躺下去就睡着了。次日返回之前教育科的股长（日本人）还斥责了大家一阵。

二是打坐。打坐也叫打参，日本话叫坐禅。日本国家是以神道设教的国家。认为神是有无尚权威的。他们信仰神道和佛教，具有十足的迷信色彩。在一个寒假中，有一天高天飘雪，大地冰封，寒气凛人，阴霾密布，伪吉林市公署教育科将20几名小学校长集合起来，在日本教员的监督下，齐集吉林市西关温德河子桥北端的吉林市自来水公司的楼上，吃住在这里。

受训科目是每天上午听讲建国精神、日本神道，下午进行打坐。打坐是由吉林神社派来的和尚。那和尚讲“打坐要万念俱空，唯一祈祷日本大东亚战争武运长久”。我们每天打坐，初则不习惯，腿脚全麻木；继则感到异常疲累，全身疼痛。那从神社找来的日本和尚可凶恶了。他身穿法衣，手持戒尺（竹板），当我们打坐时就在背后巡视。看肩背稍有弯曲向下垂落时，从身后就偷偷地狠狠地用戒尺击打一下。这样每天下午不知挨多少回戒尺。每日早晚还由这和尚领着念日本经。饭前饭后还得表示感谢，并祈祷。这次在这里训练了一个星期。

另外，有时还派遣教员到外地去学习。有的由省、市派到伪新京（现长春市）南岭教员讲习所去学习，时间是6个月。有的是由伪文教部（民生部）派遣到日本去留学，时间为1年。有的派到大阪府天王寺师范学校，这之中有的到熊本青年学校，有的到日本东京府青山师范学校。我就是被伪文教部派遣的第五届小学教员留学生，与黑山县打虎山小学高翔九一起到青山师范学校二部二年班去学习的。

伪满中小学教科书的编发

张耀先

在伪满文教部教学司设有编审部，由日本人加藤任部长，成员有几名日本人和四五名中国人，分别负责担当中小学教科书的编写工作。由伪满图书会社统一印刷出版和配售。

我在名义上是编审官，实际是办理事务官的事务，在部长办公室里办理有关教科书的配售和一般庶务事项。在业务上常与编写教科书的人取得联系，又因和编写“满语”的中国人金大镛及编写历史的日本人木谷在日本同学，所以对编写的内情有所了解，仅就所知，述之如下：

一、统一编审，加紧奴化

在伪满奴化教育政策的指导下，所有的中小学教科书都集中在文教部，由编审部负责编审借以达到其奴化中国东北青少年的罪恶目的。

在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中国东北的初期，各地中小学还仍然分别使用中国时期的教科书，只对富有民族意识和爱国思想的部分教材加以删除，或对个别地方用墨笔涂抹。其中视为涂抹对象的是地理和历史教科书。后来干脆禁止使用旧教科书了。凡是中小学的课本，完全统一由文教部编审和翻译，交由伪满图书会社再进行统一印刷、出版，并直接配售。为此，在伪文教部教育司成立了“编审部”，专门编纂中小学校使用的教科书。其编纂的原则必须以“日满亲善”、“王道乐土”并忠于“皇帝

陛下”、信奉“建国神庙”的建国精神为思想基础。从小学到中学的课本内容，充满了民族自卑和崇拜日本的殖民地教育的浓厚的奴化色彩。

二、以假乱真篡改历史

我曾接触过的所谓日本历史学家，如教日本历史的峰内教授和教东洋史权威的高岩博士，他们为了充当“御用学者”，替日本军国主义者侵略服务，往往信口雌黄，歪曲历史事实，并且自圆其说地伪造一些荒谬的论调和逻辑强迫人们相信。

就拿日本的所谓“天照大神”来说吧，在日本古代史上只是一种模糊的神话；在日本近代史上明治天皇统治时期，为适应资本主义发展的新形式，要求有一个统一的中央政府，于是在“尊王攘夷”运动中，人为地臆造出“天照大神”这个偶像，借以维护和强化中央皇权的统治基础。到19世纪末，日本走上帝国主义时代，飞扬跋扈的军人、政客积极向外侵略扩张，便大张旗鼓地抬出了这个偶像作为撞骗的招牌。并且胡说什么日本的皇室完全是由天照大神作鼻祖而“万世一系”传下来的，当代的昭和天皇即是“现人神”了。在日本国内企图用这种论说实行“愚民政策”，防止人民反抗。

为把这个论说适用于中国东北，于是就进一步加以引申，硬说“天照大神”在有人类历史以前就存在，她不但是日本的祖先神，而且是全人类的祖先。不言而喻，当然也是所谓“满洲国人”的祖先了。因此在编伪满历史的草稿上，首先肯定了“满洲国”的祖先是“天照大神”。这就是说利用神话来作为解释其“同文同种”的侵略学说的依据。证明日本人来中国东北统治不是侵略，而是以同一子孙的身份，来分占土地，是理所当然的。用木谷的话来说：“满洲国人里就包括日本人，日满是

--个祖先，经营祖先的土地，开发祖先遗留下来的资源，人人有份。”想从根本上奠定牢固的基础。所以，在伪满首都的“新京”伪帝宫营造地的上头，建有一个“建国神庙”，占据最优越的地势，把它放在伪帝室之上，这就充分说明日本帝国主义的阴谋诡计了。而建国神庙里所供奉的就是论说里的“天照大神”。在木谷编写的伪满历史上，首先把“天照大神”搬来给中国人当“老祖先”。有一次木谷编纂历史时对我说：“再过10年20年，天照大神的威力，在满洲青年一代里，要起更大的作用。”可见其用心之毒了。

至于有关近代史中的“甲午战争”、“日俄战争”等重大历史事件，竟颠倒黑白，进行种种歪曲。说什么“甲午战争”是日本人对中国人的膺惩，是由于中国人不守信义而引起的。“日俄战争”则是日本人的仗义行为，为了挽救“满洲人”的痛苦才打仗的。更为荒唐的弥天大谎，竟把现代史上的“九·一八”日本帝国主义入侵中国东北，说成是东北人民痛恨张氏父子（张作霖、张学良）的残暴，群起反抗，由东北人民恳切的邀请，日本皇军才仗义兴师，帮助东北人民驱逐张学良军队，以便东北独立自主，人民安居乐业。起初日本帝国皇军不肯管别人的闲事，但是鉴于同文同种的血肉关系，不肯坐视东北人遭受的痛苦，才出仁义之师，帮助满洲建国，使人民享受“王道乐土”的幸福生活。这完全是一派胡言乱语，信口开河地编成了历史，强迫中国人去教中国青少年。不怪木谷说“再过10年20年，天照大神要起作用了”。至于在历史上把满洲（东北）从中国版图分裂开来的捏造论据，更不胜枚举了。

三、文字同化，重日轻华

日本统治朝鲜和台湾，所采用的最毒辣的手段之一，就是

用日本文字来代替当地人民的固有文字。当时的台湾人，不使用中国文字，朝鲜的文字也被日本文字所压倒。日本统治“满洲”也是采用这种手段。首先是到处推广日本话，反映在教科书上是小学从一年级开始，就要学习日文，并把日语同华语（“满语”）同等并列。在编纂上是把重点放在日语上了。对日语的文法语条等，尽量推敲研究，积极商讨怎样才能使“满洲”的青少年在学习日语上，容易掌握和消化，开会座谈，现场调查，忙个不休。编审部的费用，也是在编写日语方面使用的最多。可是伪满语则是马马虎虎，既不开会研究，也没作过一次现场调查。编满语的人无事可作，有时随便选几篇古文或孔孟的经学，经由研究满语的日本人圈点或指定，自行琢磨，安插在满语课本里。至于学生能否接受和能否提高语文知识却无人问津。更严重的是满语里掺杂一些所谓“协和语”，就是使用一些日本人惯用的汉字来当作满语。如“新京”的朝日街，便在满语里写成朝日“町”，把十字路口写成“过町”。以及“你的挺好”，“我的如何”等似通非通的语言，也搬到课本上来。如把“电影”二字变成了“映画”。更有甚者是把理化专用名词也完全用日文来表示，所以使学生在学习上就是不会中国文学，而只要懂得日文，就能顺利地完成学习任务。因此，只要精通日文，就万事大吉了。“国高”（中学）的课本深浅程度只相当于日本小学的后期程度。但是国高毕业以后，就可直接升入伪满的“大学”。当然这样的大学，是赶不上日本国内的高等学校的程度。

四、图书株式会社垄断教科书刊物的出版和印刷

在出版行业里，印刷出版教科书刊，利润最大。为排挤中国人经营业，在伪满洲国成立后，“满洲图书株式会社”成立了。

它对教科书、刊物的出版，进行垄断。教科书的配售办法，是由编审部负责分配。首先是由各市、县将所需用的教科书数量，汇总报省教育厅，再由各厅处负责报伪文教部，预约定购。文教部再根据具体数字，向图书会社订货印刷。图书会社依照编审部核定的数目，再向各省按比例直接配售。由于战争连年，纸张奇缺，印教科书很成问题。因此必须由文教部派人去日本大阪等地几家大纸业公司交涉，仅能买来满足不了需要数量一半的纸张。依照合同规定，凡由文教部交涉来的纸张，必须全数交由图书会社使用。在一次文教部召开的教科书的配售会议上，讨论印刷课本纸张分配比例问题。印刷课本需要纸张最多的是日语和满语课本。与会人员，意见不一，当时在座的文教部大臣卢元善郑重而满怀信心地说："日语最重要，中小学学生，学不好日语对将来的学习和作事情，都要成大问题，这是个基本性问题，对印刷日语课本的用纸，不需要考虑，必须满足它的需要。满语课本，可以少印一点，两三个学生有一本满语课本。满语吗，学不学都会。在满足日语教科书用纸以后，把剩下的纸再印刷满语课本就行了。"会后，日语课本大量发行，满语的发行数字，还满足不了三分之一的要求。据说农村小学根本分不到满语课本，而只好全学日语了。

有一次编审满语的金大镛请加藤部长吃酒，由我作陪。酒饭之余，加藤说："你们会日本语，懂得日本事情很好。将来满洲人必须和台湾、朝鲜一样，渐渐地使用日文代替汉文，只有使用同一的文字（日文）才能真正达到'日满一德一心'。同时满语有多难哪，学会了日文，自动地不用汉文了。你们看，在官厅里很多思想好的青年，不都是互相之间不说满语了吗。"接着又说："我的最大任务，就是怎样能够尽快地通过教科书使青年一代都会日文，喜欢日文，放弃对满语学习兴趣。"还说：

"台湾用了将近30年的功夫，完成了文字的统一，朝鲜也费了20多年的力量，才达到今天的程度（当时朝鲜学校完全使用日本文字了），'满洲人'有了台湾、朝鲜作榜样，可能要快一些，说不一定再用15年，就可以完成全用日文的使命，我也算是对日满'一德一心'尽到了力量……"从这些话里可以清楚地看到他和卢大臣是异口同声，唱一个调子，在为积极推行学校的奴化教育卖尽力气。图书会社除了印刷出版教科书外，还要出版《新满洲》、《麒麟》等刊物，以达到其营利目的的。主要编辑人是荣孟枚。刊物中的封建毒素较深，搬弄孔孟经典，介绍日本的维新文明，鼓吹"王道乐土"，宣扬日满"一德一心"的"建国"精神。尽管订户不多，可是出版数量并不少。

从以上列举事实中，不难看出伪满日伪统治者一唱一和，配合默契，积极贯彻其奴化政策，为进一步加深伪满洲国的殖民地化打下基础。

（摘自《四平文史资料》第一辑）

我在长春市自强学校校园生活片断

裴素云

长春市自强学校（现在长春市自强街小学前身）是1915年由长春市实业家裕昌源经理王荆山出资，借用东大桥附近的山东会馆兴办的。1918年又增招初中班。1920年于马号门外新校舍建成（现在第七中学校址），便将学校迁入新址。他聘请杨世祯为校长，对学校加强管理。杨世祯号"维周"，磐石县人，自幼家贫，刻苦读书，学品兼优，在吉林省立师范毕业后，曾留

学日本，约于1926年前后到自强学校任教。在此期间制定了校训“自强不息”，又制定了校歌，歌词是“自强不息法天行，丕基肇五公。桃李花，溢都城，玉琢白山璞，珠含黑水盈。山高水长，努力前征，中华之光荣”。“九·一八”事变后，他把最后一句改为“新京之光荣”，但是师生都不歌唱，自然地唱成“自强之光荣”。

由于王荆山出钱资助，学校规模不断扩大，又不惜重金聘请高质量的教员，学校办得很出色，在东北三省颇有名气，社会上一致反映自强学校治学严谨，校风校纪严正，学生一律着黑色立领制服剪平头，不许留分发（初时只收男生，不收女生）。一些达官权贵、社会名流、富豪士绅，纷纷将子弟送入该校，王氏家族亲属也多在该校读书。学校确实培养出一些人才，现在自强的老校友遍及海内外，有许多在欧美港台，他们对母校念念不忘。1987年旅居海外的张学文先生（张学良将军的堂弟）与其夫人王文瑞女士（王是王荆山的侄女，王荆山弟弟王焕卿的女儿），回国到天津探亲，由张学思夫人陪同，千里迢迢来长春自强小学访问。

我于伪满初期，曾在该校高小读书，毕业后升入伪新京第一女高（初、高中）学习，后又升入师道科，毕业后又回到该校当教员。经过伪满、国民党时期，直到解放后1950年8月调离该校，仅就回忆的学校生活片断，略述于下：

一、伪满初期

1935年冬我于伪新京第十六校（西二道街小学）初中毕业，1936年春季开学考入自强小学高小教书。“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魔爪渐渐伸入教育领域。为便于统治，把全部学校收归公办，这时自强学校已取消中学，改成“新京特别

市立自强两级小学校”（初小、高小），隶属于伪新京市公署教育科管辖。杨世祯仍任校长，教务是宋景春，宋也是长春市很有名气的教师。王荆山在师生中仍有影响，都称他为“校董”。学校规模很大，有本校和分校：一、二年级在分校（现在自强街小学校址），本校是中、高年级，绝大多数班仍在本校（现在七中校址），院内共四栋砖瓦结构教室约数十间。校庭十分宽阔，有操场，篮球、网球场，各种运动器械如肋木、横梯、单杠……庭内遍植杨、柳、榆树，西侧有一座木结构凉亭，供师生歇凉休息，环境十分幽美。校庭南端建有汉白玉石碑一座，是表彰王荆山之弟王焕卿办学的功绩的。因王荆山忙于经商，后来把自强学校交给其弟王焕卿管办，我入学时大家还称王荆山是“大校董”，王焕卿是“二校董”。

伪满初期，日本人为了粉饰天下太平，宣扬王道乐土，学校虽改成公办，各校还是按旧的教学制度上课，课程设置变动不大，只是增加了日语课，课节不多，把“党义”换成了“修身”。当时郑孝胥任“国务总理”，一些满清遗老遗少提倡尊孔读经，高小国文课本是文言文，还学《孝经》、《论语》等，作文也要用文言。例如1936年全市高小学生会考，作文就出了一个“五道之本在乎忠孝”的题目，真是难煞了十几岁的小学生。班级编排名称也是按孝、悌、忠、仪、礼、义……我是在高一孝级。据说我们班如果按建校时延续下来的班次应是高二十四班。全校女生不多，我们班只有十来名女生，级任刘德权，是一位十分俭朴正直的夫子，总是穿着一身洗得已褪了色的蓝制服，足登一双家做的圆口布鞋，说话有点口吃，教课却十分认真，对学生既严格又热情，除体育、音乐、日语外，各科都由他一人包教，每门课程都是十分耐心细致的讲授。当时很重视毛笔字，课表内不仅有大楷、小楷等，作文也要使用毛笔小楷

书写。刘老师批改得很精细，用毛笔沾着一个大贝壳中研好的朱墨圈圈、点点，眉批、总批，好的句段都圈点出来，真是一位诲人不倦的好老师，至今仍令人怀念。

学校生活除每天上六节课，早晨要举行“朝会”。第一堂课前，全体师生齐集操场，值周教师对学生“训话”后作“建国体操”。学校还办了校刊，由老师组织一伙高年级爱好文艺的学生自己办，每期出刊张贴在校门迎面房山头上，学生都兴致勃勃地投稿。全市每年组织一次“会考”，各校选拔数名成绩优秀的学生参赛。自强的学生，大多是名列前茅。

到了冬天，校庭内浇冰场，许多富家子弟，纷纷买冰鞋练习滑冰，学校规定不穿冰鞋不许上冰场，一些贫苦学生，眼看着同学们在冰上奔驰飞舞，羡慕已极。最令人气愤不平的是虽然没冰鞋不许上冰场，却同样要担当清扫冰场的任务。不知哪位好心人，趁浇冰场之际，暗中偷偷地把冰场围堰捅开个大洞，水流出来冻了条长长的冰趟子，我们这些没冰鞋的学生，也有了打“滑跐溜”的机会。

最使我印象深刻，感到十分有意义的是学校组织一次去吉林旅行。游览了北山、小白山、龙潭山、圣母洞……那时龙潭山很荒凉，古木参天，杳无人烟，据说还时有土匪出没，为了安全，学校特请了警察保护。

伪满时期有几个节日学生必须参加：

1. 建国节：每年3月1日是伪满洲国“成立”的日子。在大同公园（今儿童公园）举行仪式。唱伪满“国歌”，“国务总理”大臣“训话”，春寒料峭，天气很冷，学生们站一会儿便挺不住了。

2. 万寿节：伪满皇帝溥仪的生日是旧历正月十三日，为了表示普天同庆，晚上举行提灯会，小学高年级以上学生参加。学

校发给每人一个圆型的小纸灯笼，两支小蜡烛，由老师领着到伪皇宫前去参拜。大家排着队在伪皇宫前广场等着。据说溥仪站在墙内探出半个身子，向人们致意，天黑什么也看不清，学生们盲目地跟着三呼“万岁”后就解散回家。

3. 春秋丁祀孔：伪满初期学校最隆重的活动是参加春秋两个丁月的祭孔。在溥仪登极前，祀孔由“国务总理”郑孝胥主祭。1934年即伪康德元年，溥仪登极后，遇到第一次秋丁祀孔，他要亲自当主祭官，就使这一年的祭孔仪式非常隆重。据说文庙小学（现在东二道街小学）从暑假开始就参与准备工作。选派学生当歌生、舞生进行练习。到了祭祀那天，文武官员以及参加祭祀的人，都穿着蓝袍子、青马褂、头戴圆帽头，歌生、舞生、乐生也都穿特制的古式服装，脚穿靴子，采取古时祭孔仪式，旌旗匾伞仪仗队。祭品除特制的供果外，还有三牲，整猪、整羊各12头，牛1头，都是屠宰后的白条，架伏在大成殿及东西庑（两侧厢房）前，参拜者一律行三拜九叩大礼。我们学生每年参加祭孔看不到这样场面，在庆典后，各校学生在老师率领下，列队到文庙大成殿前，行九十度鞠躬礼，大家对殿前陈设的猪、牛、羊很感兴趣，据说祭孔完毕，校长还能分到一块肉呢。

1937年，自强校内轰动最大的事件是校长杨世祯之死。杨校长因患盲肠炎（阑尾炎）入新京市立医院（现医大二院址）手术而死。他年龄不算太大，平时身体也很健壮，病情又不复杂，市立医院是新建的，设备齐全，很多日本医生，医疗水平较高，杨校长便是经日本医生做的手术，居然致死，不能不令人怀疑。传说是医生马虎，落在体内一个止血钳子感染致死，更多人怀疑是日本人故意害死的。噩耗传来，全校师生大为悲恸，社会上震动也很大。杨校长在学校终生任教，十几年惨淡经营，用

心良苦，培养人才，在教育界德高望重。为悼念他，在校内高搭灵棚，大办丧事，各界吊唁者络绎不绝。学生也派代表参加了吊唁，并宣读了祭文。为了表彰他办学的贡献，在校庭南端西侧立了一座半身铜像，学生每天进校门先向王荆山铜像敬礼，再向杨校长石碑敬礼。杨校长逝世后，任命宋景春老师当校长，我于1937年冬高小毕业，离开了学校。

二、伪满后期

1942年12月，我于伪新京第一女高师道科毕业，翌年1月，分回到自强国民优级学校教书。这时帝国主义对教育的统治已达到白热化程度。首先是学制大改变，1937年颁布了"新学制"法令，初小改为国民学校，高小改为国民优级学校，中学改为国民高等学校（初、高中共四年毕业）。师范教育分师道大学和师道学校。师道学校分本科、特修科，本科招收国高毕业生学习一年毕业，任二等教谕（相当于甲种委任官），特修科招收小学毕业生学习两年毕业，任教导（相当于乙种委任官），还有教辅，是文化业务低，不够级别，不在官吏之列。资深的校长，还有荐任官，穿高级面料的"协和服"，举行仪式时胸前佩带一条黄色绶带，表明官阶。

课程设置、教科书都彻底改了，增多了日语课时，增加了"建国精神"，该课程都是宣传"日满亲善"、"一德一心"、"共存共荣"的内容，直接由校长或教务主任讲授。取消了国文、历史、地理、自然等科，改成"满语"课，教材是一本杂七杂八不伦不类的大杂烩，每课少则几页，多则几十页，学生根本学不到真知识。尤其是派来了日本人统治学校，各校都增加了日本教师，每校都有一名日本人任"首席"（相当于副校长），中国校长只是一个牌位，大权都掌握在日本人手中。当时学校校

长是孔庆春，虽然资深，在教育界颇有声望，也得听“首席”斋藤的。孔校长于1944年调走，调来了日本人竹内任校长，他土里土气根本不懂教育，师生给他起了个“绰号”，背地里叫他“老土豆子”。

各种活动也都渗透着奴化教育的色彩，如每天上课前师生齐集操场，举行“朝会”，首先向“皇宫遥拜”，面向东方向日本皇宫敬礼；再进行“帝宫遥拜”，面向伪皇宫方向，向伪满皇帝敬礼；然后齐声背诵《国民训》，最后再作“建国体操”。每天中午12时，全市统一鸣汽笛，师生起立、立正（无论在教室或操场）低头“默祷”，祈祷“日本皇军武远长久，大东亚圣战胜利”。大家在心中暗暗咒骂日本鬼子快快完蛋。遇有举行仪式，校长还要宣读《回銮训民诏书》。这是溥仪于1935年4月为了报答其主子动身访问日本，回来后颁布的“圣旨”，要全体国民必须与日本“一德一心”、“共存共荣”，每校有一份，平时供奉在特制的“神龛”里，举行仪式时，由校长捧出宣读，全体师生都要立正，低头恭听。

这时的自强学校仍有分校、本校两处。校址规模很大，教职工很多，是国民学校和国民优级学校的两级小学。在长春市很有名望，记得伪“国务总理”大臣张景惠的小儿子七少爷一年级也在该校就读。每天上学有两仆人（一男、一女）陪护。

到了1944年，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已到穷途末日，学校里充满了恐怖气氛。为了预防空袭，教室门窗玻璃贴满了“米”字型纸条，校庭内挖了很多防空壕，师生一律着“防空服”，男的必须戴战斗帽，打绑腿，女性着黑色紧袖紧腿的防空服，每人必须带“防空袋”，内装防空帽、三角巾、白毛巾等以预防毒瓦斯和临时救护之用。也经常进行防空演习，听到防空警报（鸣汽笛），立即整装进入防空壕内避难，整日人心惶惶不

能安心上课。

为了镇压中国人民的反抗，日伪的白色恐怖统治愈来愈严重，在警察署、宪兵队、“思想矫正局”、“指纹管理局”等众多的特务机关里，有很多老师被认为是反满抗日的“思想犯”，动辄被抓去严刑拷打。我也曾被列入黑名单，在被监视之列。1944年冬，在我带学生外出参观之际，几名特务来校搜查了我的办公桌，虽没找到可疑证据，但并没因此罢休。数周后日本特务又把我叫到校长室进行长时间盘问，终因无确凿证据，才免除一场灾难。那时的学校教师均惶惶不可终日，经常有人被以一些“莫须有”的罪名抓到宪兵队严刑拷打，灌辣椒水、过电。听说我的一名同学，新婚之夜即被抓走。我被迫于1945年7月编造了个辞职结婚的理由，离开了我心爱的学生和热爱的教育事业。

在桦川国高尝受的奴化教育

董 琦*

一、他乡求学 事与愿违

1943年（伪康德10年）冬季是日伪当局强制实行“粮谷出荷”的第三个年头，老百姓已经没饭吃了，我却刚好读完了汤原县国民优级学校，论年龄刚满13岁。我父亲是个农民，家里没钱，不能让我闲在家里白吃饭。可是，一个13岁的孩子又能

* 作者曾任佳木斯市委宣传部长，现任佳木斯市政协主席。

干点什么呢？想来想去，还得读书。我自己也多次想过，吃点苦算不了什么，只要多读几年书，将来成为“人上人”，就可以不受汉奸、警察和绅士们的窝囊气；要能做点“大事儿”，赶走日本人，还能光宗耀祖呢！就这样，我在父亲的支持下，下决心报考国民高等学校。

那时候，汤原县城里没有中学。在伪三江省内，原来只有三处国民高等学校，一处设在佳木斯，另外两处设在依兰县城和富锦县城。这三处学校规模较大，历史较长，找不着“门子”、“窗户”的穷学生，要想考进这些学校实在不那么容易。刚好，伪三江省在悦来镇新设了桦川国民高等学校，于1943年（伪康德10年）冬季招收第二期新生。学校新办，地方偏僻，报考的人数不算太多，考取希望较大。这所学校对我来说，尽管远离家乡200余里，不如佳木斯和依兰那样就近方便，但是为了能够考取，还是去悦来镇好些。再说，说不定那个地处偏僻的学校，日本人的统治会差一点。于是，我们几个同学相约结伴，坐火车到佳木斯，再徒步走到悦来镇，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报考了桦川国民高等学校。走路，考试，六七天的时间，留给我的记忆只有一个字：冷。

当时值得庆幸的事情是我被录取了！那是很兴奋的，心里泛起了许多笼统的幻想。1944年（伪康德11年）春节过后，我辞别父母，离开家乡，到桦川国民高等学校去报到。可是，我一到就感到了完全失望。新、老学生加一起三个班，每班50人，教职员中的日本人就有三名，校长名叫田口三郎，教导主任名叫太田敏雄，还有一军事教官也是日本人。一个个骄横粗暴，“武士道”精神十足，完全没有教育家的风貌。校舍倒是新建的，但是取暖设备很差，坐在教室里干挨冻。而且那时候的建筑施工不讲“工完场清”，院里院外，房前屋后，到处是砖头瓦块，

废土成堆。学校当然是不会雇人清理的，三个班的学生得用多少时间才能干完这些活儿呢？还能上课吗？

失望、沮丧，就是我考入桦川国民高等学校后的第一感。

二、饱受奴役　饥寒交迫

我在桦川国民高等学校读书的头一年，从1944年3月正式开学到同年12月结业，真正坐下来上课的时间至多不过5个月，其余时间尽是没完没了的体力劳动。被迫的体力劳动，尤其是吃不饱饭，还要强打精神硬干，叫它是奴役倒更为合适。

桦川国高强迫学生劳动，算起来有许多名目：清理校园，耕种实习地，"勤劳俸仕"，甚至给汉奸地主去铲地、割地，据说这都是为了"支援圣战"、"建设大东亚共荣圈"。日本校长"训话"时还说：只有勤劳的汗水，可以汲取理智和知识。于是，从清理校园开始，干起了奴役式的体力劳动。当地的天气，3、4月间校园的土地尚未解冻，我们这些学生便抡起大镐，挥动铁锹，抬上土筐子，清除砖头、瓦块，平整一堆一堆的基建残土。干累了，想要休息一会儿，可是冷风刺骨，实在难耐，只好咬牙干下去，用汗水热热身体。砖头、瓦块还没清理干净，又让我们修筑围墙，挑冷水合泥浆，好不容易砌成一点，校长一看不合格，又推倒重来。捱到5月份，大地解冻了，耕种实习地又成了经常性的劳动。送粪、刨茬子，人拉犁杖开地垄。春耕不久便是夏锄，一个学生一条垄，谁也别想找轻快。我们几个年岁最小的同学干不动，没到地头就晃儿，还要受到并无恶意的奚落。有人编个顺口溜："张克让，姚兆和，董玉春，周玉琢，大脑袋，小细脖，光吃饭，干不动活儿。"这里说的董玉春，就是我的原名。要说最苦最累，还数秋收背庄稼，实习地在悦来镇的西门外，往返一次10多里路，我这刚满14岁的瘦小学生，

每背一次都是汗流浃背，频频停下来喘息不止。有一次，我背着庄稼刚刚走到城门口，突然眼冒金花，眼前一黑便摔倒在地上。大同学看不下去，替我背回了那捆庄稼。别的劳动，我这里就不细说了。总之，那年春、夏、秋三季，除了雨天之外，绝大部分时间都在被奴役。冬天上课的时间多点，但是要在教室里干挨冻。14 岁，是少年学生的黄金时代，而我的黄金时代却是在被奴役的劳动中度过的。

吃得饱、穿得暖的时候，人的自觉劳动当然是美好的。问题是我们这些学生一个个饥寒交迫。桦川国高的住校生，几十人住在一个四面土炕的大宿舍里。土炕不烧火，一年四季除了"三伏"天而外，即使是春暖花开的时候，一进宿舍也感到阴森森、冷嗖嗖，没有一点暖和气儿。特别是一到冷天，铺底下一层谷草，身上一床小破被儿，咸宿"当团长"——直不了身子，同学们被逼无奈，总是和邻铺的学生合起来睡，合盖两床被，互相依靠着，借取对方的体温，否则就无法入睡。伙食呢，口粮实行"配给制"，早晚两顿喝稀粥，一人只能喝一碗，不是高粱米就是大糙子，而且带糠皮儿。只有中午那顿饭可以吃干的，还有一碗白菜汤，汤里有几块豆腐、土豆什么的。有些外向型的同学，不厌其烦地叨咕着一句话："日本人吃高粱米——没法子！"事实上日本人还是吃大米的，同学们这样说，不过是借用当时流行的一句歇后语，吐露一点心中的不平而已。

在生活上给我留下最深记忆的，是当时总盼轮到自己担任"食堂值日生"的日子。到那天，可以和另一名同学一起抬个水桶，到豆腐坊去抬豆腐。临走时，从食堂抓一把咸菜或咸盐，回来时慢慢走5 里多路，边走边吃，有时即或是顶风冒雨，那又白又嫩的大块豆腐填饱了肚子，也是感到香甜无比的，仿佛世界上所有的美味佳肴也都不过如此。

饱受奴役，饥寒交迫，这就是桦川国高学生所能受到的基本训练。今天想来，这恐怕不能视为日本人校长田口三郎先生个人的“德政”，应该说这是日本侵略者对中国学生实行奴化教育的必要手段。

三、有书难读　有口难言

桦川国高在强迫学生劳动之外，毕竟还有将近一半的时间是要上课的。那么，上课又是怎样安排的？据校方宣布，在四年制的全部课程中，有语文、数学、理化、作物（即农业课）、音体美和军事课，也许还有历史、地理（记不准了），似乎也是应有尽有，事实则不然。大量的基础知识被砍掉了，数学课是被简化得无法再少的代数和几何，物理、化学变成了粗浅的自然常识，历史、地理没开课。与此相反，最惹同学们反感的日语课却占全部课时的三分之一，而尽人皆知的高粱、谷子作物生长一类的农业课又是每周都有。我在桦川国高读书一年半，当时便觉得有书难读，过后想想更觉得什么也没学到。

这里有必要讲讲当时的日语课。如果把日语当作一门外语，当作学习外国科学技术或进行国际交往的工具，那当然是完全必要的。而我们当时学日语，是当作“满洲国第一国语”来学的，日本侵略者企图通过日语课把中国学生变成“二鬼子”。正因如此，日本校长亲自讲课，一个单词重复多少遍，清音、浊音都要严加区别，学错一点便要遭受辱骂，甚至拳打脚踢。学校还有一项规定，在校学生从二年级以后每年都要参加一次伪政府组织的“语学检定”（即日语等级考试），达到三等以上水平的发给等级合格证书，承认翻译资格，升学、就业可以优先，工资之外还可以按月领取“语学津贴”。然而，多数同学对它不感兴趣，私下里说：“日本话不用学，过了三年用不着。”就是

出于这种本能的抵触情绪，同学们在学日语的时间里坐在课堂想别的。所以，我那一年半的时间也白白放过了，现在连日语字母都认不全。

饱受奴役、饥寒交迫而又有书难读，同学们自然是满怀怨气，愤愤不平。然而，那时的学校生活阴森恐怖，谁也不敢随意说话，有口难言，装哑巴最为安全。值得说明，日本侵略者在禁锢学生思想方面确有一套办法，其中，给我留下深刻记忆的至少有这样三条：

一是强塞硬灌。日本侵略者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已面临彻底失败的绝境，但仍幻想着征服人心，以便长期霸占我国东北。在桦川国高，每天早晨都要把全校师生集合起来，先向皇宫（即向日本天皇）遥拜，再向帝宫（即向伪满皇帝）遥拜，然后唱日本国歌和伪满国歌，背诵《国民训》。所有这些，并非仅仅是一成不变的仪式，而是一种"忠诚训练"。这一套顶礼如仪之后，日本人校长还要进行"训话"，吹嘘"日满亲善"、"大东亚圣战必胜必成"，要求学生"养成中坚国民"、"循规蹈矩"，不许"胡思乱想"。这些骗人的鬼话，不管你如何厌恶，还是每天听一遍。同时，在教室，在宿舍，墙壁上总是贴着红红绿绿的标语，除了重复那些欺骗性的宣传口号之外，就是警告学生"莫谈国事"、"守口如瓶"。这是日本侵略者禁锢学生思想而强塞硬灌的反面补充。

二是制造分裂。日本侵略者把法西斯式的"阶级服从"强加在中国学生身上，让上班生任意体罚下班生，达到他们分裂学生的目的。我刚到桦川国高入学的第一天，学校没开课，跑到悦来镇街上逛了一圈。当我走回宿舍，刚一进门，就有一个上班生打了我两个耳光，打得我懵头转向，还不知为了什么。打完了，他才大喊大叫地说："你，在街上见了我为什么不敬礼？

你还哭？委屈吗？委屈了，再打你两下！”幸亏一个上班同乡从旁讲情，这件事情才算结束。从此，在我心里不但对这位上班生埋下了对立情绪，对其余上班生也产生了警惕心理。因此，我在那一年半的时间里，除了对个别十分要好的同学之外，轻易不敢说点心里话。其他同学，我看也都差不多。而且常遇到这种情况：当一个同学说话稍有不慎之外，就会有另一个好心的同学从旁制止，奉劝他“少说两句吧，没人会把你当成哑巴卖了”。

三是使用暗探。日本侵略者在学校里使用暗探是十分隐蔽的，可不像后来听说的国民党的小特务那样公开。桦川国高的学生、老师，有的一本正经，不苟言笑，对日本人校长、教导主任和军事官敬而远之；有的爱说几句日本话，对那几个日本人表现为恭顺，甚至是逢迎，也许还是表面现象；还有的当面点头称是，背过脸去就骂娘，而内心里想些什么，别人也无从了解。但是，确实有暗探。有一位名叫李干（干字读甘，原是繁体字，这里从简）的老师，当年30多岁，中等身体，敦厚朴实，治学严谨，据说在课堂上说了一句真话：“日本人侵略中国，我们都当了亡国奴！”当时并没有日本人在场，可是事后却被一群全副武装的警察、特务从课堂上给抓走了，事后杳无音信，生死不明。这件事完全暴露了日本侵略者的狰狞面目，也告诫全校正直的师生，那里确实有暗探。

日本侵略者就用这套办法来禁锢学生的思想，不准你说出半句真话。在桦川国高，既让你有书难读，又使你有口难言，这便是日本侵略者对中国学生进行奴化教育的主要方面。

四、苦尽甜来　长记过去

1945年（伪康德12年）入春以后，桦川国高表面上还是种

地、铲地、"勤劳奉仕"，没完没了的劳动周而复始。对学生的思想禁锢依旧严严实实，以致希特勒垮台，日本广岛挨了原子弹的轰炸，这样的国际大事都没人了解。然而那年征兵的日期提前了，日本"在乡军人"纷纷应召入伍，日本人露出了愁眉苦脸。这时候，我们这些受够了奴役之苦和思想禁锢的青少年学生，预感到日本侵略者要"完蛋"了。

1945年8月13日，苏联红军的炮舰从松花江逆流而上，开过悦来镇，开进佳木斯。往日不可一世的侵略者，这时狼狈不堪，逃跑的逃跑，被俘的被俘。日本侵略者企图训练成奴才的青少年学生，如同出笼的小鸟，一个个欢呼跳跃，欣喜若狂。

现在知道下落的几位同学，郑艺钟、程启徽、姚岚、黄宝祥、邹凤岐等等，在党的培养下，有的当了大学教授，有的在党政机关作了领导干部。这些人聚首忆旧，对那段学生生活总是记忆犹新，不能忘怀。

（摘自《佳木斯文史资料》第七辑）

日伪统治抚顺时期的奴化教育

姚云鹏　李凤侠　王成璞

早在"九·一八"事变之前，抚顺地区就已沦为日军的殖民地。当时抚顺市区（今东西一路至东西十路）均为"新站"，属于日本租界地。因此在抚顺矿区租界地内施行的教育，实际上就是殖民地教育，亦即"奴化"教育。

当时在抚顺地区仅设有"满铁"抚顺公学堂（今西十路三十二中学）一所，小学六年制。所学课程，以日语为主，体练、

劳动等次之，专门培养为满铁抚顺矿服务的廉价劳动力。在抚顺公学堂毕业后，还可升入高一级的抚顺炭矿学校，其文化程度与抚顺工科国民高等学校略同，除日语等必修课外，尚有技术专业课程，给抚顺煤矿培养较高级的驯顺奴隶。

1931年“九·一八”事变，翌日日军侵占抚顺。日本帝国主义在抚顺的当权者，将曾在抚顺公学堂任教的“满系”（中国人）教师冯焕章调到抚顺县教育局当视学，不久即提升为县教育局局长（县街合一）。冯焕章上台后，即秉承日本主子的旨意，把日本法西斯办公学堂推行奴化政策，实行奴化教育的那套办法，在抚顺县内推行开来。

一、通过“朝会”天天进行奴化教育

日本帝国主义者精心策划的奴化政策与愚民政策，是一对孪生姊妹，奴化青少年学生是基础，同时奴化成年人，全面灌输反动思想，取缔自由，摧残身心。

当时学校每天都要上“朝会”。第一项先“向东京遥拜”，即向东京的日本天皇遥拜；后向新京遥拜，即向长春的傀儡皇帝溥仪（康德）遥拜。第二项是“默祷”，即在默默中为侵华战争中的炮灰，所谓“忠灵”祷告默哀。第三项是唱“国歌”，即1934年（大同3年）3月1日“建国大典”所公布的《满洲国歌》：“天地内，有了新满洲，新满洲，便是新天地，顶天立地无苦无忧……”1941年以后，又重新公布了国歌，内容则是“神光开宇宙，表里山河壮皇猷，永受天祐兮，万寿无疆渤海讴……”词中的“神光”原句，指的是日本天照大神开创了宇宙世界，在天照大神的保护下，渤海之内齐声讴歌“万寿无疆”。这首所谓的《满洲国歌》，简直成了日本国歌。那些天真无邪的孩子们，就这样天天唱下去，长此“奴化”，怎能不使学生们把伟大的祖

国淡然忘却？第四项是宣读“诏书”(1941年12月8日，日本帝国主义偷袭珍珠港，溥仪颁发《时局诏书》)。在机关学校“朝会”上，经常宣读的是康德皇帝的《回銮训民诏书》：“朕自登极以来，亟思恭访日本皇室，修睦联欢，以伸积慕。今次东渡，宿愿克遂……”读“诏书”的人，态度要毕恭毕敬，如在机关必由机关之长宣读，在学校则由校长宣读。宣读“诏书”者，必须身穿绿色“日满协和服”，系黄礼带，戴白纱手套，“请送”“诏书”目不斜视鞠躬四十五度。就是日本人读此“诏书”，即使装腔做势，也必须按此礼仪行事，以达到奴化“满洲人”的目的。

1941年（康德8年）以后，日本帝国大本营，以“满洲帝国政府”之名，又颁布了一项“奴化政策新措施”，即臭名昭著的《国民训》。机关、学校每天都要在“朝会”上逐条、逐字用日语集体背诵，其要旨无非是迫使人们“崇敬天照大神，忠诚于皇帝陛下”。当时“满洲人”路过东七条通（今东七路团市委前路口）的日本神社，哪怕相距500米，也得行九十度的敬礼，不然一旦被路北的日本警察分所发现，就要受严厉的处罚。总之，日本帝国主义利用各种手段，贯彻“奴化政策”，妄图把“满洲人”培养成他们的忠实驯顺奴隶，能按其意志行动的机器人。

1941年12月8日，英、美对日宣战，爆发了太平洋战争，日本帝国主义则称“大东亚战争”，于是对东北人民的奴化教育，日益加剧。为了建设所谓“大东亚共荣圈”、“共存共荣”，傀儡皇帝溥仪又颁发一道“诏书”。原来承认日本帝国是“满洲”的“友邦”、“盟邦”，这次而升为“亲邦”。顾名思义，“友邦”、“盟邦”还得说是“平等友好”关系，而“亲邦”就成为父子关系、君臣关系了，即臣必忠于君，子必孝于父。君叫臣死，臣

不敢不死；父叫子亡，子不敢不亡。“父邦”说什么就是什么，要什么就得给什么，必须绝对服从，丝毫不得违背。日帝不仅大肆征兵、抓劳工，要“勤劳奉仕”、强迫”出荷”，就连小学生们也要在限期内，完成繁重的征集任务，如让他们采集山葡萄叶，向他们征收猪血、牲畜皮毛、洋麻、蓖麻等等军事物资。

二、通过教材进行奴化教育

教材是教育思想的体现。日本帝国主义为推行其愚民政策，潜移默化地毒害青少年一代，非常注意教材的编写。伪满政府命令把语文课改为《满语》，修身改为《国民道德》，地理改为《满洲地理》，历史改为《满洲历史》。孩子们一入学，就对他们进行爱“国”教育，要他们认识伪国旗，“国旗扬扬扬，红蓝白黑满地皇……”（初级小学一年级课本）。国民高等学校和国民优级学校的地理教材上竟说：“由地理形势来看，长城是一道横线，内外分开，自古以来，即各有天地。”在历史教材上则进一步说：“从古至今，关内关外均各自为国”，同时举出扶余、高句丽、辽金等例证。很明显，其歪曲历史的目的在于抹掉中国青少年们心灵中的祖国观念，让他们盲目相信自己是“满洲国人”，忠于“满洲国”和日本“盟邦”。

伪满建国以后，奴化教育日趋加深。当时大肆宣传的“建国精神”，即以“王道”为主，“仁义礼让”为先，“满洲国民”必忠于“皇帝陛下”。国民学校后期改编的一年级《满语》课本，第一课是《皇帝陛下》，“皇帝的陛下警察官，有统治满洲国民的至上权……”。《论语》、《孟子》、《孝经》、“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等纷纷出笼，充满课本。

为加强日语、体练、劳动三科的教学，抚顺县教育局特增派三名视学委员，各司一科，专职担任巡回督导，以监督“奴

化”教育政策的实施。

三、通过“阶级服从”培养奴性

日本军人奉“阶级服从”为天职，伪满学校的军事教练教学生也是以“阶级服从”为主。教师打骂体罚学生是经常的事。在学生中等级森严，高年级的学生可以打低年级的学生，正如日本兵可以打伪国兵，伪国兵可打伪警察，伪警察可打老百姓一样。那时学校与学校之间，特别是奉天国高在抚顺的通勤生同抚顺国高生之间，经常发生群殴事件。学生在外打了人报告给日本教师，不但不受责罚，还要受鼓励，说是好样的。相反，如果学生在外挨打被日本教师得知，还要被狠狠打一顿。千金寨第九高级小学的童子军，曾用军棍把大同电影院的设备打得稀烂，学生也未受责罚。至于女子比男子又低一等，女子国高的学生，除一般的课程外，还有《烹饪》和《家事》等课。她们不仅要做帝国的驯服工具，还要做男人的奴隶。总之，从学校到社会直到家庭生活，都极力灌输等级观念，使“满洲人”成为毫无反抗精神，只会服从恭顺的奴隶，以维护其法西斯统治。

四、监督训练教师　贯彻奴化政策

日本帝国主义者深深懂得，贯彻奴化政策，必有一支适应的教师队伍。当时，伪满洲国新培养出来的教师为数很少，而留用的教师，又多思想“陈腐”、“对满洲教育方针反应迟钝”，于是采取两种办法：一是重点学校改设国民优级学校，周围学校都归其领导。本校有日系教师驻校，虽名为教师，实际上掌握全权，还负有监视“满系”教师言行的任务。“满系”校长和教务主任有苦难言，如果事事请示日系教师，他认为你是窝囊废；如不请示又说你目中无人，大发雷霆。二是设师道训练所，

根据推行奴化教育政策的需要来培训教师。在新京设立中央师道训练所，培训“全满”师资，其学员为各省、市、县选送的青年教师，时间为5个月，结业升任一级教谕（委任官）；在奉天设立地方师道训练所（附设省立师道学校），任务是轮训全省教师，主要是训练如何灌输奴化教育思想，时间也是5个月。学科以日语为主，“体练”、“口语”和“建国精神”三科为辅。教官均为日本现役军官。在训管方面十分苛刻，教官时常责骂学生，教官一发怒，就罚全体学员跑步，让学员绕400米的操场跑16到20圈，常有一些体弱的学员晕倒在操场上，学员们整日里提心吊胆。

日本帝国主义为加强奴化教育，还向各省、市、县机关、学校派日系官吏做副职，掌握全权，任正职的“满系”官员没有任何实权。如中和国民优级学校（今之十七中学地址），就派来个叫竹滨的日本人做副校长；亲仁国民优级学校（今大官屯小学处），就派来个叫久助的日本人做副校长；抚顺工科国民高等学校校长是日人权滕丰藏，训谕主任先后由日人野月浩和川村力卫担任。各校日系校长、主任有权监视、体罚“满系”校长和教师。工科国高电气科班主任赵荫兰（哈工大毕业），就曾被川村力卫打过耳光，罚过跑。原因是赵和学生曾谈论电影《夜半歌声》插曲，解释过“誓和那封建魔王抗争”这句歌词，于是被扣上“政治嫌疑”的罪名，身遭凌辱。同时，奉天军管区还向各国民高等学校派遣现役军官，对学生进行军事训练，以做为补充伪满陆军的预备力量。抚顺工科国民高等学校先后有伊东染二（骑兵少校）、白焕章（陆军中尉）、王兆渭（陆军少校）任教官。另一方面，还从市县各机关单位、企业、商店选择一部分适龄健壮的青年，分期到“青年训练所”（今十九中学西侧）进行军事训练，由现役军官任教官，每期半年至一年。征

兵不合格的“国兵漏”，要参加“勤劳奉仕”，白白干活，不给任何报酬，稍有“越轨”，即遭受严厉的惩戒。

日伪统治十四年期间，在奴化教育政策下，抚顺出现了大批文盲，小学毕业生很少，一般人家供出个小学生，就算是出个秀才了。那时全市只有两所国高，直到1944年，才新增一所林科国高，可见受到中等教育的人就更是微乎其微了。

（摘自《抚顺文史资料选辑》第六辑）

一个伪满学生的回忆

齐德满

我出生于1926年，6岁随父母从辽宁老家来到黑龙江铁岭河青梅村，家庭以种地为主。伪满时期，因为家穷念不起书，整天帮家里做农活、放猪、采猪菜。我在野外看到村里孩子背书包上学，心里又难过又羡慕。1940年春，在我的央求下，通过亲戚的资助，我才上了青梅村小学一年级，这时已经15岁。我当了学生，心里好高兴，由于刻苦用功，两年学完了初小的课程。1942年春，经老师介绍，又上了铁岭河的培英国民优级学校。以后又在一面坡和宁安的国民高等学校读过书。我的学生生活大部分是在伪满时期度过的，接受的全是日本奴化教育，伪满学生的痛苦，我有亲身感受。

一、挨打受辱的棍棒教育

在伪满，由于日本侵略者奴役中国人民，我们当学生的挨打受辱时有发生。1943年夏，我正在培英校念书，一次上日语

课，日本教师青木压堂（不按时下课），恰巧一个外班下课小学生扒在窗口往里看，我用日语说："走、走！"青木在讲台上白了我一眼，没说什么。谁知，下课后却遭来一场横祸，原来青木心怀鬼胎，见我年龄大，怀疑我反对他，借机哄他。下课后，我刚走出教室大门，他就凶狠地抓住我，左右开弓打了我两个嘴巴子。这还不算，只见他满脸杀气，又找来一根大木棒，不容分说，朝我的身上和头部猛砸。当时，我两眼一黑，昏倒在地，在场的学生看着也不敢上前拉开，因为日本人青木横行霸道，谁拉谁就挨他打。我清醒后，同学们扶我去找班主任陈宝琦，所有的中国老师见此情景，内心十分气愤，但也是敢怒不敢言。后来又去找校长杜云程，他也是束手无策。当时青木有二十六七岁，在学校老师中他是级别很低的教导，但他是日本人派到学校来暗中监视的，学校的事情由他说了算，校长决定的事也必须先同他商量。铁岭河有日本宪兵队，与青木来往密切，谁还敢惹他呢？我白白地挨了一顿毒打，心里对日本侵略者有着刻骨仇恨。

在当亡国奴的年月，挨打受凌辱的何止我一个学生，又何止是一所学校？1944年，我在一面坡国民高等学校念书时，日本教师打骂学生更是家常便饭。有一次上农业课，教农业的日本教师白尾，在地里监视我们播种大豆，同学们干活很劳累，反感情绪很大。中间乘白尾不在的时候，同学们不给他好好干，在地里挖一个大坑，把豆种埋进一部分，种子少，可以少干点活。有的撒豆种，往埯里撒一大把；有的在埯里不撒种子，以此表示对日本人的反抗，后来豆苗长出时，白尾又带领我们到地里去看，结果怎么样？有的埯一棵豆苗没出，有的长出一大堆豆苗来。白尾在地里什么也没说，把我们全班60来人领回学校操场，排成单行，拉开距离，让全体九十度大弯腰。他拿起一个

大棒子，往每个人的屁股上狠揍一棒，以示惩罚。打累了，中间还歇一歇，嘴里骂着。记得站在头前两个同学没有挨打的思想准备，结果被这突如其来的大棒子打趴在地，脸擦破，鼻出血。我们心里开始紧张，硬着头皮等着挨揍。这一天中午，学校不给我们饭吃，饿得好难受。

二、奴化教育的精神枷锁

我们在伪满花钱上学念书，根本学不到什么科学知识，无论小学还是中学，日语、国民道德、农业劳动、军事训练等课程占主要地位。还迫使学生背诵伪满皇帝“诏书”、“国民训”，参加朝会、周会、勤劳奉仕等各种奴化教育活动，这些内容都是日本人实施奴化教育的手段。他们天天宣扬的是“日满亲善”、“日满一德一心”、“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等一套，灌得脑子发胀。日本人不叫学生学知识，因为学生明白了道理就会起来反抗他们。因此对学生实行愚化、奴化政策，以同化东北青年学生，培养为他们服务的驯服奴隶。

我在一面坡国高读书时，那里的校长和教导主任全是日本人，还有几个教师。学校名义上是国高，实际上是农林学校，大部时间参加劳动实习。除了种地，还得护林防火，只有在下雨天才能上课。所以，发的课本一学期学不会，学生基础课的成绩非常低劣，对奴化教育心怀不满。我们班有个同学名叫南立德，是上一班降下来的，主要是日语不好，为此，他非常气愤，说：“我不学那玩艺儿，愿咋的就咋的。”致使他一再降级。日本人教师本身文化不高，只起特务作用。白尾在国高教农业知识，其实他什么知识也没有，只是领着干活，打学生，我们背后叫他“白猪”、“蠢猪”。

我被青木、白尾等日本人打过后，对奴化教育那一套更不

服气。我也不乐意学日语，听说日本兵从东南亚撤退，战局不好，更觉得“日本话不用学，再过两年用不着”，盼望日本人早点垮台。但是不学日语又不行，不会日语不准考学，所以我采取应付，日语考试前复习压题，死记硬背几道题，基本跟上就可以。

三、自残骨肉的等级划分

在伪满的国民高等学校里，日本侵略者极力推行阶级绝对服从的军国主义的法西斯校规，学生不仅要绝对服从老师，而且低年级学生要绝对服从高年级学生。在一面坡国高，学生胳膊上戴有白杠标志，几年级几道杠。低年级学生在街上见了高年级学生要敬礼，否则受任意训斥与暴揍。有的行礼也不成，还可以找别的毛病，如名签歪了，衣扣开了，帽子偏了等等。随便一个借口就可以打骂。有的虽然当时不打不骂，过后到学校把低年级学生找到教室，同样可以拳打脚踢地教训一顿。一面坡国高三年级学生芦明水，经常打骂低年级学生。他个子小，打高个学生不得劲，于是站在书桌上，居高临下，用脚狠蹬狠踢。还有四年级的范迪贵，对我们低年级学生打得也狠。1944 年夏天军训时，他是行军的中队长，有两个低年级学生背包打得不规则，他竟以此为理由，把他俩打得牙出血，所以低年级学生对他恨之入骨。我那时在校住宿，吃的不好，每次回家返校，总得带些炒面或别的什么好吃的东西。这时，必须先分给同寝室高年级学生一部分，不然会找茬打骂我的。

在奴化教育的毒害下，学生之间是敌对关系，互相仇视，互相戒备，没有什么团结友爱。留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宁安国高与牡丹江国高的两校学生打架事件。1945 年，我转到宁安国高读书，宁安国高的学生与牡丹江国高学生在火车上发生口角，结

果打了起来，于是两校学生互相打骂，多达数百人，受伤的不少，其中把宁高三年级的学生韩××肋骨和胳膊打成骨折。后来由双方校长出面才平息。日本军国主义的绝对服从的校风，给中国学生制造了内部矛盾，使其自残骨肉，便于日本人的殖民统治。

四、当牛做马的勤劳奉仕

日本侵略者把伪满学生不当人看，而是作为奴隶对待，每年很少时间学习知识，大量的是勤劳奉仕，强制学生为日本人干活，一干三四个月，甚至半年。我因为在一面坡国高尽干活，有反感，于1945年春天转学到宁安国高，谁知，宁安国高照样强制劳动。我刚来不多日子，学校各年级都分头去勤劳奉仕。我们班50多人，到二道河子钓鱼台村熬葡萄叶子，给日本人做酒石酸石灰（日本人用于飞机涂料），5月份去的，一直干到"八·一五"光复。我们在那里干活，过着同劳工一样的生活，与劳工住在同一工棚。早上天一亮起床，五六个人一组，负责熬一口锅。先把葡萄叶子装锅，添水、加药，然后烧火，把叶子熬成水，把水再熬干，最后熬成粉面子装口袋运走。那里葡萄叶堆成山，都是劳工从山上采的。烧柴都由我们自己上山去砍。每天劳动十几个小时，十分疲劳。在工地吃的是大楂子、窝窝头，喝的是菜汤，根本吃不饱。晚上睡工棚，地下潮湿，前半夜蚊子叮，后半夜又冷，生活非常苦。当时领着干活的是体育教师马绍海。"八·一五"光复了，我们在山沟里干活还不知道。后来小火车一停，马老师也没回来，工地上没人管，我们也不干了，步行几十里往家走。走到二道河子，才知道苏联红军来了，日本投降了，我们才舒心地往家奔。

（摘自《牡丹江文史资料》第六辑）

我受伪满"再教育"的回忆

于跃东

伪满对于学校教职员施行再教育，这是伪国既定的方针，目的是为了使教职员体得建国精神，了解日满一德一心的实质，很好的为奴化教育服务。我在伪满康德元年（1934年）起到光复前止，曾担任过吉林省立女子国高校长。在这10多年当中，曾受过多次再教育，将短期受训的三次写在下面。

一、派赴国立师道高等学校受训

伪满康德4年（1937年）秋季，吉林省教育厅派我去国立师道高等学校受训，日期为一周，一同受训的全是国民高等学校校长，共20多人。这次受训是吉林省教育厅委托师道高等学校办理，由学校专派坂田学监负责指导。坂田是日本退伍军人，年纪50左右，态度严厉，不苟言笑。他在学校并不教课，专任学监，每天在校监督学生上课，监督学生休息，他和学生在同一食堂用饭，在同一宿舍寄宿，表面是和学生共起居，共作息，其实是监视学生的一切。他对学生管理特别严格，他走在任何地方，学生见他必须举手，敬礼，即此可见一斑。因而学生对他是望之生畏，敢怒而不敢言。我们这些受训人到校后，坂田即给我们进行了一次长时间的训话。大意是说：你们既来受训，不要以校长身份自居，要做一个寻常小学生。满洲人一些习惯不好，应当向日本人学习。开始即给我们一个当头棒吓。这样我们在受训的一周里，是与师道高等学生共食宿，共休息。规

定每天上午上课，下午受训，其课程由师道高等教员日人须乡主讲，坂田也作两次讲演。他们讲的全是建国精神（须乡有《建国精神》一书），大意是说：满洲实行五道，是皇帝的大理想，从皇帝访日的实现，即完成五道的理想，也就是千古不灭的建国精神。又说满洲与日本是一德一心，一体不可分，永久保持协同关系，并在政治、经济、产业、文化上，要取得协调。在大东亚新秩序建设上，古来圣贤未能实现，而大满洲明显地实现了。这一套生拉硬扯，不但须乡这样讲，坂田也是这样说，可见他们对于建国精神，是一个鼻孔出气。及到下午则由坂田指导我们训练，他的训练，不是讲解，而是实做，把日本女学生所学的"礼仪作法"全盘拿出，让我们样样练习。他特别对于如何捧读诏书，如何参拜御真影（皇帝照片），如何向帝宫遥拜，如何参拜神社等作法，都让我们每个人实地演习，因而花的时间较长。我们最感难学的是不动姿势和举手敬礼，此两种动作，如果谁做得不好，即被坂田加以冷笑，当时受训人很难堪，都说咱们不是军人出身，这个动作，当然做得不好。可是日本人竟给以冷笑，真是对咱们太轻视。本来伪满对于教职员实行再教育，不是为了提高教学质量和办学能力，而是把教职员看成无知无识，用一种愚民政策，让教职员服服贴贴供他们驱使，从整个再教育方针看来，即表现这一点。所以我们在受训期间，不是心情畅快，而是闷闷不乐，到受训的最后一天，还让我们每个人作一篇感想文。我倒忘记感想文是怎样作的了，大概是说些在受训以后，得到了收获，并没有敢说出内心不痛快的话。感想文交上后，才准许离开师道学校，算是受训完了。

二、派赴吉林江南工兵营受训

在伪满康德7年（1940年）夏天，我被派到吉林江南工兵

营受训。这一次受训的有中国人，也有日本人，全是吉林市中小学校长和一部分教育行政人员，总共40多人。主办这次训练的，是协和会吉林市本部和吉林省民生厅两个单位。在入营受训以前，即规定全部受训为军事训练，所以在事先即通知受训人要做好准备，所带行李要简单，不准携带书物，特别规定要戴战斗帽、打裹腿、扎腰带、穿软鞋。从这种规定看来，即知是一场艰苦训练。及入营以后，才知道这次受训是协和会民生厅委托吉林第二军管区办理，由军管区又交给江南工兵营主持进行。担当指导训练的，是日本福田教官，这位教官身材细长，威风不小，摆出日本军人不可侵犯的神色。我入营当日，不知什么原因，即派定我和第三国高校长赵恭福两人为分队长。派定以后，有些日本人还不满意，认为在受训人当中，有不少是日本在乡军人，而不委派他们，竟委派两个满系校长，真使他们有点不服，但也无可奈何，只好服从。原定受训日为5天，每天上午由福田教官讲述各种军事技术，并讲大东亚战斗情况，还讲日本军队如何精良等等，午后则纯为军事训练，每人发给步枪一支，从基本训练开始，一直做到攻击冲锋为止，把我们训练得筋疲力尽，腰腿酸疼。而一日三餐，又都是高粱米干饭，有些日本人说高粱米饭很香，有的说没法子，吃罢，这倒应合了我们常说的一句俗语：日本人吃高粱米——没有法子。其实最困难的是晚上训练，规定每人轮流站岗，在两个小时站岗勤务内，无论在室内或在室外，均须持枪伫立，不得稍有疏忽。我们当队长的，还得查勤，随时向福田教官报告情况。还规定在就寝时，须全脱衣服，不准打裹腿睡觉。如果听到号令，要在5分钟内，将衣服穿好，裹腿打好，否则以违犯纪律处罚。我记得有一天夜里，半夜1点钟左右，福田教官鸣号，所有受训人均在甜睡中惊醒，立即将衣服穿好，裹腿打好，持枪在院内集合，

福田发令说现在江北岸宾宴楼地方有敌情，赵队先头，于队接后，向敌人前方攻击。我没听清楚是什么命令，遂领着一个小队，本来应当随赵队往西走，而竟向相反方向的东边跑去。在月色朦胧的黑夜里，通过杂草丛生的一条小路，一直跑到江桥的南头。这时我才发现我把路走错了，怎么办呢？只好率队而回，等我到达兵营以后，福田站在门口，大声对我说，你的队不是向敌人攻击，而是见敌人逃跑了。遂即对我大加训斥。本来我的日本语是半路出家，没学到好处，这个军事用语，即没听清，也没明白，所以闹出笑话，真是有苦难说。这样的晚上集合，不只一次，真使我这个作队长的，无所措手。受训到最后一天，还开一个座谈会。我是一言没发，回到学校后，更觉这次受训，对我没有什么教育意义。我想一些参加受训的中国人，也会有同感的。

三、派赴中央师道训练所受训

在伪满康德8年（1941年）12月间，吉林省民生厅派我到新京（长春）中央师道训练所受训。这次被派出的，有吉林市教育局长和视学官，还有吉林全省国民高等学校校长，共20多人，其中日本人居多数，中国人是少数。在出发之前，通知参加受训的人，在服装上要穿协和服，戴协和帽，准许穿大衣，惟不准带行李。这次受训是吉林省民生厅请求中央民生部办理，由部里教育司把我们送入中央师道训练所，并把我们这些人组成一个班。我们入到训练所后，即安排在一个宿舍里寄宿。当时每人发给5条毯子，并告诉我们说：这5条毯子，是连铺带盖，并无其它寝具。在第一个晚上，许多人是合衣而卧，不敢脱去衣服，因为在零下30多度的天气，睡在板床上，怎能不冷呢。受训日期规定为5天，每天受训，主要是讲课，科目规定为建国精

神、历史地理等课。这些课程用日语讲授，不作翻译。这次训练的目的，是从各科的讲解里，授予伪满的一些知识，从而让日本人了解满洲的事情，好好去干；让中国人换换脑筋，改变思想。所以在每天的讲课里，都着重的说明这一点。当时讲课的多为日本人，我倒记不清姓名了，仅记得有[illegible]一个教学官和师道的傅教授。我特别对于傅教授记忆较清，因为他是中国人，他教地理课，全用日语讲解，我当时感觉这个人真是了不起的，他讲的是满洲地理形势，对于山脉河流物产等等讲得很清楚，特别对于松花江的流域与东北农业开发上，说得更透彻。讲历史的是日本人，他说满洲地方，不是中国领土，古代为肃慎地，唐朝为渤海国，到了清朝，满族即入主中国。民国时代张作霖占据东北，张死后其子学良继承父业，张学良在东北是横征暴敛，使满蒙3 000万民众，过着悲惨的生活。张学良并与南京政府结合，实行排日政策，遂于1931年“九·一八”以柳条沟事件为契机，全满各地举起独立自主的烽火。他把日本侵略东北的野心，全部掩盖起来，这是他们的用意。至于建国精神科，讲得更微妙，说日本占领东北是膺惩军阀，有如古代的吊民伐罪。看来在这5天讲课里，总括其目的不外让我们体得日满一德一心，彻底了解伪满的建国大精神。另外每天早起有集体训练，首先让我们练习跑步，然后练习建国体操。指导训练的是日本人，不记得他的姓名，但记得他身量不高，络腮胡须，身着和服，腰扎裙子，大有日本武士之风。这个训练，需要一个很长时间。在天气严寒的早晨，真是使人感到痛苦。每天晚上要开座谈会，座谈当日的学习心得。还有两天晚上，给我们预备一点吃的东西，这个东西，是用红小豆加白糖，煮成豆子汤，日本人认为很香甜，我们吃着倒不觉怎样好吃，不过在寒冷的晚上，能够吃到一碗热豆汤，也算不坏。惟感觉不好

的是在受训期间，任何人都说天气寒冷。训练所采暖设备不好，我记得吉林同文校长小林、六高校长福太秋，他们每天上课，将毯子围在腿上，以避寒风。我虽没向他们学习，但始终感觉身体不适，并且我的日本语本来不好，这次直接听讲，真是有如鸭子听雷，不知他们真正讲些什么。

伪满勃利国高学生的“勤劳奉仕”

苏俊峰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日本军国主义妄想称霸世界，强行组阁什么大东亚共荣圈，唆使它的喽罗国家为它效命；疯狂地推行愚民政策，灌输什么王道乐土、共存共荣、日满亲善、义勇奉公等奴化思想。用大和魂和武士道精神去奴化、去统治被他们侵占的殖民地人民，为它们搞法西斯侵略扩张去效劳、去卖命。于是就强迫男性青壮年不是去当奴役兵，就是去修工事，再不就是干别的苦力活儿。这，就是他们美其名曰的“勤劳奉仕”。就连国民高等学校的学生，也都以勤劳奉仕为先。

飞机场割草除雪一年不断

飞机场割草除雪，是压倒一切的“学科”，它虽然没有列入课程表内，但任何课节都得给它让路。无论是县公署、警察署，还是宪兵队、西大营，只要来个电话，风雨不误，准时必到。

去飞机场割草的学生还得有个样呢，头戴圆顶大檐儿遮阳草帽，在前面正中帽檐儿上，印着鲜红醒目的“勤劳奉仕”四个大字，左肩斜背水壶，右肩斜挎饭兜，裤腰带上别着雪白的

羊肚儿毛巾，拖在右臀部上。左手握着镰刀把，刀头夹在胳肢窝里，只有一只右臂前后摆动，步调整齐，高唱军歌，走向劳动场所。

飞机场跑道是混凝土灌注的，倒挺光滑。可是长在四周的杂草，正如"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那样，割了这茬长那茬，一年得割两三茬；割了这处有那处，一个轮回五六处，大家说，勃利割了上互助，互助割完去杏树，吉兴、双河五六处，没有车乘靠走路。

1943年，仲秋翌日，冷风飕飕。勃利国高三个班学生齐出动，去杏树飞机场割草。年逾花甲的老校长，亲自挂帅出马。早5时出发，取捷径，急行军，9点多钟才赶到。

分配给割草的面积很大，正常速度一天是完不成的，何况时间紧迫，又长途跋涉，疲惫不堪呢。尽管如此，同学们都渴望早点儿干完，争取搭上晚上那趟火车赶回去，一个个生龙活虎一般，你追我赶。只听银镰刈草唰唰唰，不闻嬉闹说笑叽喳喳；跟"磨洋工，磨洋工，拉屎撒尿半点钟"比较起来可大不一样了！

杏树飞机场驻军关东军大尉，看到这样的劳动场面，非常满意，特意指派两名士兵抬来开水给同学们喝。休息时，又特意把同学们召集在一起，异常兴奋地训了顿话，夸奖说同学们积极支援了大东亚战争，效忠于天皇陛下……又对站在身旁的陈校长伸出大拇指，不住地称赞："尧漏西！尧漏西！塔伊恨尧漏西！"（好！好！太好了！）还一边给师生们来个举手礼，一边不住地说："谢谢……"陈校长频频打立正，连连点头，"哈伊！哈伊！哈伊！"不住口。像这样笑容可掬，精神焕发的情形，还是很鲜见的，因为尽受东洋人的斥责和辱骂了！

万万没有想到，同学们的这次劳动感动了"天照大神的神

光普照”，“沐浴了天皇陛下的皇恩浩荡”，这位关东军大尉发“慈悲”，吃午饭时每人发给一个黑面包，真是一桩稀罕事儿啊！

领受了皇军赏赐的“盛情美餐”，就着自个带去的节日“佳肴”，土洋结合填饱肚子，接着又开始劳动。虽然任务过于繁重，由于同学们不顾休息，拼命苦干，直到日落西山，夜幕降临，好歹才算干完，没误搭车时间。尽管是凉爽的秋天，同学们却都汗流浃背，精疲力尽，一停工，吃凉食，打起哆嗦了！

回来时，搭上了火车可倒不错，没曾想，站在运煤的空车厢里，冷风刺骨，冻得同学们牙齿咯咯响，浑身打颤颤，你拥我，我挤你，也不怕弄脏衣服，也不顾蹭黑手脸，像窝雏鸡似的聚成一团。那位校长和几位老师，一直是面向车尾，裹紧风衣，帽檐儿卡到眼皮上，两手紧紧地插在兜里，木然挺立。皎洁的明月，幽静的夜空，难入眼帘；汽笛呜呜，车轮隆隆，难入耳鼓，心急如焚，恨不得一步抵家。

到勃利车站下车时，同学们活像刚从矿井里上来的煤矿工人，涕淌泪流，不少同学患了感冒。那年逾花甲、身体瘦弱的校长，就更不用说了，患了重感冒，住院医治，休养了很长时间。

冬季除雪，只是勃利县城东边的飞机场，由勃利国高学生来清除。飞机跑道上一般是存不住积雪的，即或无风天，降下鹅毛雪片，存下了积雪，也容易清除。唯有飞机场东边沿着蜿蜒丘陵修筑的飞机窝，一遇到暴风雪往往就给覆盖了，飘来的积雪很硬实难以清除。

1943年年末，有一次除雪正赶上“烟儿泡”天，任务紧急，不能耽误第二天飞机起飞。我们班分担清除两个飞机包的积雪，尽管同学们拼命干了一下午，也没有清完，因为赶着往外清，赶着往里飘。负责监督清除积雪的日本士兵和带队的老师研究后，

就决定连夜干。

吃完晚饭回来继续清除时，雪早已飘满，一下午的劳动毫无成效。这时，天公偏偏又与人作对，风越刮越狂，雪越下越大，风卷雪，雪随风．漫天飞舞，昏沉沉，白蒙蒙，天昏地暗。任你费九牛二虎之力，掘起一锹，撮出一块，霎时又给填满。同学们在严寒的黑夜里，顶狂风，冒暴雪，尽管累得气喘吁吁，帽檐儿下热气腾腾，还是不见效果。于是经带队的老师请示日本军官之后，决定暂时停工，等风息了再继续清除。

我们跑回学校教室围炉取暖，等候干活的命令。到午夜以后，风势渐渐减弱，飞雪渐渐停止，又跑回现场去，重新开始清除。天将黎明，才清除完毕，没误飞机起飞，这还得天公开恩，风息雪止，至于一年得除多少次，那也得由天公来决定了。

县公署空袭警报昼夜监守

第二次世界大战，法西斯国家濒于溃败时期，就更加担忧飞机袭击，已把防空警报看成是挽救垂亡、免遭摧毁的一线希望，严防空袭已经成为总动员、齐参战的军令法规。

防空警报，是“敌人”飞机轰炸来了，防空了望哨发现了，鸣起警报机，发出信号，通知军民对空射击，防备空袭。了望哨设在县公署三楼顶上(县政府楼)，是个八角形凉亭式的木房，玻璃窗户宽敞明亮，四周圆形走廊围着木栏儿，东边儿对县城那面安装着警报机，房顶旗杆上挂着“红兰白黑满地黄”的伪满国旗，有风天还可以识别风向。了望哨里备有电话机一台，直通警备司令部执勤长官，由两组透镜组成的可以随身携带的望远镜两台，《警报日志》一本。了望哨的人员两班日夜替换监视，每班四人。

警备司令部，设在县公署二楼北头。正对楼梯的较大的那

个屋是伪正副县长的办公室，由此往北是个大会议室，非常时期做为警备司令部防空指挥所。南头靠墙的讲台上放着一张大办公桌和几把交椅，桌上有一台电话机，这是警备执勤长官的座席。东西两面靠窗台从南到北各摆着一排长条桌，桌上放着防空专用电话机12台，每台旁边放着一本《警报通令录》。专用电话是直接通往县内大四站、倭肯、杏树、八家子、青龙山、小五站、七台河等七个村防空警备所。勃利街公所直属于警备司令部，电话另作他用。专用电话还直接通往罗圈河、桃山、大茄子河、北兴等四个防空警备所的开拓团。每台电话机由一人看守，并负责填写《警报通令录》。

这些警备工作人员是从哪里来的呢？警备执勤长官是警尉补以上的警察官和少尉以上的当地驻军军官，轮流执勤，每班二人，日满人各一，以日人为主。其余那些看电话的和了望哨的人员，就都是勃利国高学生了，美其名曰“警报通令传达员”。传达员下达命令、报告情况，一律用日语讲话。

了望哨的同学发现敌机了，立刻向看电话的同学报告：“发现敌机×架，由××方向我处飞来！”看电话的同学紧急复述报告给警备执勤长官，同时警报机也鸣起来。执勤长官马上下达命令：“通令各警备所！”警备司令部指挥所大办公厅里，立刻紧张起来，电话铃声和呼叫声混成一片。顷刻警报通令下达完毕的同学，急忙跑到执勤长官面前，陆续站成一排，一个接着一个报告：“××警备所，警报通令下达完毕，接令人×××，×分×秒，传令员×××。”坐在正座上的日人听取报告，坐在旁座上的满人执笔记录。这已经是背熟了的一套术语了。虽然十多个人接着报告，也不过五六分钟。倘若有的同学在别人报告完了他还没有下达完，为首的这位日人长官就气冲冲在奔到他跟前，一边骂着，一边把电话抢过去，厉声呼叫：“马上到这

儿来！”这个警备所的负责人可就走了“红运”了，来到警备司令部——这一关可不好过啊！

有一次，我负责通令下达的防空警备所是罗圈河开拓团。警报通令下达完了，向警备执勤长官报告时，因为“拉啊各伊音卡啊”（罗圈河）的“各伊音”没有发好音，又过于紧张反倒结巴起来了，耽误了后面的同学报告，被执勤长官骂了顿“叭嘎”，几拳头就把我杵到墙旮旯儿，罚站一直到下班。

“敌机”在上空盘旋了几圈后，逐渐消逝在远方天空。了望哨的警备执勤长官报告：“敌机×架，向××方向遁去。”这时警报机“呜！呜！呜！”鸣叫起来，空袭警报解除！执勤长官下达给传达员，传达员下达给警备所。下达完了，接着各警备所向警备司令部报告空袭情况，大半是“平安无事”，也有的“炸毁房屋多少间，伤亡多少人”，信口开河，假装正经。

第二次世界大战，法西斯国家接近溃败的边缘，空袭警报更加频繁，日日夜夜警备不停，勃利国高的学生就得日日夜夜充当警备人员，每隔两周就得轮值三昼夜。这是非常时期沦陷区的奴隶应尽的什么“义勇奉公”、“勤劳奉仕”的“天职”，至于求学读书啊，那就可想而知了。

连珠山撬锈运弹饥寒交迫

1944年11月上旬，勃利国高三年级学生，在刘玉珠老师率领下，去密山县连珠山勤劳奉仕35天。

由勃利车站乘火车，经林口、鸡西，在连珠山车站下车。由东安省（现在的密山市）派来的两名伪官吏作向导，沿着弯曲的山路往北走约七八里路，就是关东军在东安省境内最大的军火和军需基地连珠山。

当来到横穿山谷的铁刺网第一道关口时，这两位伪官吏和

站在大门口等候的一个关东军上士作了交待之后，就沿着来路回去了。把门的和跟这位上士来的两名士兵，挨个搜查，检点人数完了，又领着我们往山里走了二里来路，到一处较开阔的山谷。在山谷东边漫山坡上有几栋板房，这就是我们勤劳奉仕的宿营地。

最前边一栋板房，中间是伙房，西头是仓库，东头是看管我们的关东军宿舍。为首的一位是滕野上士，长得身材魁梧，猪肚形长瓜脸，面貌凶恶。我们都管他叫“鞋拔子”。还有三名上等兵。各校带队的老师也都住在这儿。先后来这里勤劳奉仕的还有杯口国高和密山师道学校，都是一个班50多人。勃利国高住在第二栋板房西头，往后还有两栋。据说这是修军火山洞时劳工住的。

板房已经破旧，龇牙咧嘴，四处透风。屋里用木板搭成的南北大铺，屋地一头一个砖砌大火炉子，都积满尘垢，挂满了蜘蛛网。经过一番打扫之后，按组排号把行李、用具放在南北大铺上，就算安了“家”。

宿营地的四周都是铁刺网围着。沿着山沟东坡再往里走二里多路，是第二道关口，铁刺网的上边还多了两道电网。大门两侧两个岗楼，双岗把守。由此再往里走，大沟小岔，山头岗包，都是装军火弹药的山洞，勤劳奉仕的学生就在这里劳动。

来到连珠山的当天下午，开晚饭前，三个学校的学生都集合在伙房前空场上。滕野上士披挂整齐，全副武装，神气十足地走到学生前面，由密山师道学校的班长统一喊口令向他敬礼。他还完礼用日语喊了一声“稍息”后，开始训话了，先讲了一通儿太平洋战争大日本皇军英勇作战，节节胜利，支援圣战，大东亚总动员的大道理，接着提出了几条训令：一条，作息时间，要严格遵守；二条，听从指挥，他把三个上等兵分别加以介绍，

每人分管一个学校；三条，守口如瓶，作业时看到的情况，不许外讲；四条，不准随意外出，35天内，特殊事情外出时，得请假，由带队老师请示他批准；五条，进入现场作业，任何人不准带火吸烟。以上五条有违犯者按军法处治。

每天早晨5点钟，都是刺耳的号声夹杂着“起床！起床！”的呼叫声，把同学们从忧惧的梦乡里惊醒。那位上等兵和带队的老师常是一起走进宿舍来催促。我们急忙穿衣、叠被、站排、跑步、作操、用餐，集合出发赴现场劳动时，太阳尚未出来。

进出第二道关口，天天是早、午、晚两进两出，都是二路横排站好，班长向门卫报告人数，报数检查之后，若是不耐心，叫出来一两个摸摸兜，搜搜腰，装模作样检查一下还算不错，若是认真起来，尤其是出来时，几乎挨个都得摸摸搜搜，耽误的时间就得用跑步来弥补；若是弥补不上，超过规定时间，管现场的军衔如果比管我们的军衔高就得挨训斥、受辱骂。

进了第二道关口，走不多远，这三个学校就分别往自己学校作业的沟岔走去；进了沟岔又按组分开，每组包一个山洞。山洞的形状也相同，有的像一个圆形的大谷仓，有的是由一条隧道分出了几个洞。山洞里储藏的多是弹药和武器。漫山坡上用苇席、苫布遮盖着的一堆堆、一垛垛，则是除弹药以外的其他军需物资。

我们劳作时看到的弹药，有连珠、大盖、套筒、“三八”等各种步枪子弹和轻重机枪子弹；有榴弹炮、迫击炮、高射炮等各种炮弹；还有手榴弹、炸弹等等。这些弹药多数是张作霖统治东三省时，沈阳兵工厂制造的，东北沦陷后被日军夺去，又运到这里来储存。山洞里阴黑、潮湿，弹药存放日久，弹壳已生绿锈，弹丸已氧化成灰色。来这里勤劳奉仕的学生，主要是用砂纸把弹药上的锈蹭干净。

我们来往经过第二道关口时，常遇上一伙面黄肌瘦，衣衫褴褛的劳工，晃晃荡荡，颓靡不振地出入工地。他们住在哪儿，干些什么苦力活，我们都不详细。据说这些人都是从关里抓劳工抓来的，修完军火山洞也不放回去，怕泄露其中的秘密，所以便被处死。

勃利国高全班学生分成四组，每组包一个山洞。头几天还比较轻松，由身高力壮的同学把弹药箱子扛出来，放在洞口或洞口与洞口相连接的大道上，大伙围在一起用砂纸往下蹭锈。完了，再装进箱子里，钉好，扛进去。往后一天比一天紧起来了，定时间任务，三个人为一小组，自己搬运，擦一箱弹药。如有到收工时干不完的，就得大伙帮助干完。有的组同学干活较慢，格外使劲也常落后，就不好意思总叫同学们帮助，于是就偷工减料，把没蹭好的装在箱子底下，想蒙混过关。没曾想，在收工时被管现场的士兵发现了，狠狠地骂了一顿“叭嘎！”，杵了一顿拳头，又全都倒出来，非叫他们组人给重新蹭好不可。还不准别人帮助，叫其余同学先收工回去。

可走到第二道关口时，门岗一检查少了三人，不让过去。带队教师向他说明原因，他叫都在此等候，一起回去，尽管一再请求，也是不行。万般无奈，带队教师只好领一些大同学又跑回去，向管现场的士兵一再恳求、说明、致歉，才允许别人帮助干完，放他们三个回来。其余那些同学就得站在那儿挨冻，等他们回来重新检点人数后，才一起放过去。

打这以后，检查得更严了，谁也不敢再蒙混过关了。先干完的小组就主动去帮助没干完的同学，好一起收工，一块回去。

就这样，磨啊！蹭啊！一天天挨过去。双肩划破了，压肿了，两手磨破了，冻僵了，也得坚持到底，坚持干完35天。陈林同学扛弹药箱子压吐血了，一直坚持干完。回到学校后，即

回家休养。第二年春季开学升入四年级，他因吐血未好而休学了。

紧张、艰苦的一天劳动，应该得到温饱，很好休息，恢复体力，可是，这些勤劳奉仕的学生又怎样呢？还是看看我们的吃住吧。

住的板房，早已破旧，既不遮风，又不御寒。没有风的夜里，同学们也是常常轮换着围炉取暖，唉声叹气，默默无言，屈指计日，度日如年。

在北风呼啸大雪纷飞的夜晚，板房里冷风飕飕，灰尘弥漫，马灯昏暗。同学们，裹紧棉袄，系紧腰带，扣上帽耳，抄着双手，跺脚踏步，缩颈端肩，浑身颤栗，通宵达旦。有的同学实在熬不住了，就和衣躺在冷铺上，蒙上被子，卷缩一团。明晨醒来如同睡在雪地一般，雪掺灰尘覆盖一层。

伪满时，东北沦陷区被蹂躏的"满洲人"，所有衣食用品都得配给，就连对勤劳奉仕的学生一日三餐也实行配给。

做饭的大师傅是由各学校选派的学生，高粱米、大糙子，不是夹生，就是串烟；几乎顿顿都是土豆汤，一碗汤喝完了，碗底上一层泥。这样的饭菜要能吃饱了，也算不错了！吃饭时十五六人为一组，轮流由两名值日同学上厨房去打来，同学们按自己睡觉的铺位坐好，等候值日同学把菜饭分盛在每个人的碗里。若是剩下了就再分点儿。这样，等平均分完了，也就凉透了。还得一齐用日语说一声"受领"才可以吃。真是饥不择食，吃得舔嘴巴舌的，舍不得放下碗筷。先吃完的还得坐在那儿等着，等都吃完了，还得一齐致谢。

谁要轮着值日，这一天还算不错，打饭时偷偷摸摸握个大饭团子，用手绢包好，揣在怀里，找个机会溜到一边把它吞掉，这一天总算没挨饿。

有的同学上伙房去打水，顺便揣回几个土豆，或拣回几个白菜根，趁夜半更深放在火炉子里烧熟充饥。这若是被巡夜的士兵遇上了，他就脱下皮拖鞋，挨个打嘴巴子。他打完了，还叫同学们站成一圈儿，你打他，他打我，我打你，打了一个圈儿再倒回来打，谁要不使劲，他就打谁给作样子。打够了还不死心，又拿起烧糊巴的土豆往脸上连烫带蹭，弄得同学们脸上红一块黑一条的。洋鬼子蹂躏、践踏沦陷区的青年学生，所使的花招真是千奇百怪，所要的手段真是阴险毒辣！

一天，吃完午饭，于子清同学向刘玉珠老师请假，说是连珠山车站跟前的小屯子有家亲属，他想去借棉衣，刘老师向滕野请示了之后，给开了“外出许可证”，经门岗检查之后，才放他出去。

晚上4点多种，天已黑了，于子清同学才匆匆回来。门岗检查他双肩背的日本式大背兜，分量很重，叫他把背兜放下来，打开一看，上面是他自个穿的小棉袄，底下全是大煎饼，门卫急忙给滕野打电话。偏巧，这天下午滕野上劳动现场检查去了，门卫收下他的外出许可证，先放他回工棚子。

于子清同学回到工棚子里，往买煎饼的同学的铺盖卷里藏大煎饼，刚要藏完，同学就收工回来了。他惊慌失措地对同学们说：“不好了！快把煎饼藏好！叫门卫检查出来了。”大家慌乱一阵，掀起铺盖卷儿去藏煎饼，还没等消停，滕野就逼着刘老师气势汹汹地一前一后走进来。同学们好像耗子见着老猫似的，急忙跑到各人铺位坐好。滕野走进屋来二话没说，瞪着眼珠子，恶狠狠地拽过来几个铺盖卷儿，抖落出来两卷煎饼，叫刘老师看，又凶神恶煞地用日语逼问：“怎么样？明白了吧！”把刘老师训一顿，又命令他：“交给你了！看你们怎么办吧！”

刘老师心里早已明白，万般无奈，才忍气吞声，咬紧牙关，

装模作样，打了于子清同学两个大耳光子。这下子不要紧，倒把“鞋拔子”给惹翻了！解下他腰上扎的橡胶皮带，左右开弓就抡起来。直抡得于子清同学浑身上下青一条、紫一块，于子清一声不吭，忍痛屹立。马灯昏暗，阴气森森，盘膝而坐的同学们目瞪口呆，心急如焚，怒火中烧……

抡完了大皮带，“鞋拔子”又命令学生把铺盖卷儿都抖落开，把煎饼拿出来摆到个人前边。他也真够“殷勤”，不嫌麻烦，沿着南北大铺绕场一周，一份儿一份儿地把煎饼都给塞进火炉子里了！这个家伙才得意忘形地走了。

“鞋拔子”走后，同学们盯盯地瞅着刘老师，刘老师呆呆地伫立着，相对默默，泪珠盈盈，泣不成声。久久……久久！刘玉珠老师悲愤填膺，语重心长，喃喃自语：“我们……我们是……中国人哪！忍耐……忍耐吧！总有一天……会熬出头来！”

同学们更加悲愤，呜咽起来……

新立屯垦荒种田直到光复

1945年，春季开学个月有余，勃利国高三四年级两个班学生100多人，离开故乡，到密山县杨木岗村新立屯去勤劳奉仕、垦荒种田。

上新立屯跟上连珠山是同路，经过连珠山，再经过密山，在虎林这边的宝东车站下车，再往东南走有百余华里，距兴凯湖约15公里的地方，便是我们垦荒种田的新立屯。

由宝东车站到我们种地的地方，再一直往东、西、南都是一漫平川，一望无际的大草原和新开垦的撂荒地，没见着一个像样的屯子。在我们劳动这边，约五六华里却有一片废墟，荒凉、凄惨的景象令人心寒。据说这是东北沦陷以前建立起来的有五六十户人家的一个屯子，当时命名为新立屯。日寇侵占了

东三省，为了便于统治，把这个屯子的居民给撵走了，新立屯这个村名却沿袭下来了。

这片废墟的北边有一座庙，尽管破陋不堪，仍肃然伫立，是我们过往此地的必游之处。庙内几尊神象已经折胫断臂，浑身伤痕，挂满罗网，积满灰尘和鸟粪。

由这片废墟再往南走，奔兴凯湖的方向，约五六里路，才是我们勤劳奉仕的宿营地。这段路程不是能通行车辆的大道，而是过洼塘蹬塔头，跨草甸子，踏草筏子，穿树棵子，新踩出来的一条弯曲的毛道。在略凸起的小荒丘上，搭成几座我们住宿的板窝棚或席篷子。

小荒丘上，还残生着稀稀落落的杂树棵子。西南边是去年新开起来的大片撂荒地，没有耙细，草筏子的缝隙处长满了黄蒿、杂草、各种嫩树条子。东边是新挖出来的运河，有七八米宽，两米来深，一直往南下去，国兵漏子还继续在挖。通新立屯儿的那条大道，被运河给截断了。在我们耕种的撂荒地的西南，是几处日本移民——开拓团的驻地，稀落的房屋里只有女人留守，新开垦的大片土地多未耕种，呈现出一片凄凉、寂寥、荒芜的景象。

上新立屯垦荒种地的学校除勃利国高外，还有密山工业国高，密山师道学校和林口国高，都是三四年级两个班学生，四所学校共有400来人。勃利国高三四年级学生混合在一起，编为四个劳动中队，在四年级学生中委派中队长领导劳动。

初到劳动现场时，有几个负责指挥开荒种田的日本士兵，指手划脚地分配住处，安排活计。其中为首的一个生得尖额头，洼扣脸儿，眍瞜眼，黑嘎胡，鼻梁上总卡着墨镜。这家伙凶相恶煞，真够吓人，我们都叫他“丧门星”。各校带队的教师，见着他都垂手恃立，听他摆布。“丧门星”把头一段活计安排完了，领着

两个亲随就走了，也不知道干啥去了，只留下一个吃粮不管事的小山，在这儿逍遥自在。

头一段活计是割洋犁片缝隙长出来的黄蒿、野草、杂树棵子，每人拿两趟往前割，割够一背还得背回去。越割越远，越远越慢，一直割了五六天，才干完了第一步活计。可也不错，伙房跟前儿堆起了柴火垛，一举两得，做饭有柴烧了。

下一步活计是计划用机器把撂荒的洋犁犁过的地耙一遍，不打垄，埯种。不知什么缘故，耙地的机器不来了，这个“丧门星”带着两个随从却匆匆忙忙地赶回来，召集各校带队的教师开了一下午会，又重新作了部署。第二天上午，又亲自到地里去，指手划脚忙活了半天，下午趁我们下地劳作的机会，又蔫不唧地溜走了。

打这儿以后，我们就按照“丧门星”的规定去劳作。两个人一组，一趟洋犁片当做一条垄，一人刨埯，一人点籽儿。埯的直径得一尺左右，把草筏子刨碎再点籽儿。一埯就得刨十几镐。照这样下去不光挨累，进度也太慢，一天干不多少。再加上每隔三两天，就得轮流有一个班去背吃粮和豆种，还得去一个班打烧柴。就这样干了10多天，才种上将近一半儿。

快到芒种了，一天早晨，忽然间“丧门星”领着两个随从又跑了回来，我们正在集合出工，他把带队的教师留下，嘀咕了一上午，又作了重新部署。这回更是匆忙，吃完午饭喝得醉醺醺的，都没来得及休息就走了。下午集合出工时，各校分别开会传达了“丧门星”的部署。大致是：过了芒种，不可强种，抢时间，定任务，顶芒种抢种完。这下子可把同学们的“积极性”给调动起来了，可真加了速度，三两镐就把草筏子刨起一块，用镐往起一撅，抓把豆种儿往下面一塞，就种完了一埯。下一埯，也许走上几步再刨一个，临末了，索性刨起一大片，往

起一撬，把剩下的种子往底下一倒，就结束了半天的播种任务。

盛夏期间，田间锄草时，即景生情，使我们联想到种子的生命力该有多么强大啊！那么大块的草筏子都被压在底下的豆种发芽给顶起来了。同时又为之担忧的是“丧门星”此刻若再降临，那又该怎么样呢？幸亏安排完了“抢时间，定任务”那段活计以后，他们就逃之夭夭了。

这些垦荒种田的同学们，从打来新立屯一直到光复时离开，每天吃的都是大豆、高粱米、苞米面三色主粮，并且多半是发霉的。学生做饭，又烧现打来的湿柴，煮出饭来不是串烟，就是夹生；蒸出窝头来不是欠火，就是碱小；几乎顿顿都是大豆汤，再不就是炒盐豆儿。吃大豆可没法限量，因为豆种没数，不过可不能顶饭。有的同学还把豆种偷偷地揣出去，上挖运河的国兵漏子的厨房找做饭的大师傅换大饼子吃。若是采来野菜，熬顿菜豆汤，那就美餐一顿，改善生活了！

下面这套嗑，已经成为同学们的口头禅了：

窝火头，珠泪汤（淌）；伤心饭，苦菜香（汤）；干起活儿懒洋洋；冒虚汗，心发慌；思家乡，泪汪汪。

吃的发霉的高粱米、苞米面儿，还有种的大豆种，都得自己去往回背。上哪儿去背呢？就是在前边已经提到的旧废庄儿，庄儿北边的那座庙，庙前边有两栋旧房子，就是我们去背粮的仓库。这是供应新立屯左近的日本开拓团、苦力、国兵漏、勤劳奉仕学生的唯一粮食基地。

不管风天雨天，每隔三两天就得轮流去一个班背粮，因为背多了还没有地方存放。按个子高矮，体力强弱，背15～25公斤。一个个都累得气喘吁吁，汗流浃背。

住的低矮的板窝棚、席棚子，闷热、憋屈，使人抑郁；潮湿、阴暗，令人烦燥。每当夜幕降临的时候，什么瞎虻、蚊子，

还有"刨锛儿"、小咬，这些吸人畜血液的小飞虫，也随着扑向人们。尽管你双手持物不住驱打，它也拼命扑向脸上、耳朵、脖子、手背、脚脖，狠命地叮几口，起个血泡，痛痒难忍。还想睡觉吗？于是就得笼起火来，压上湿柴，冒起浓烟，宁肯烟熏、挨呛，只有驱除这些小东西，紧闭门窗闷起来，才能让你入梦乡。

同学们一天天地盼哪！等啊！度日如年。一直到8月9日。那位留守的小山，他不怎么知道了虎头被苏联飞机轰炸了，这天早晨很早就起来吹起床号。劳动阵地的司号员是我们班的朱宝禄同学，小山学着吹号，平时也常抢着吹。已经被他吹醒的同学听出来又是小山吹的，就不耐烦地斥责："这鬼崽子睡毛愣了？真他妈讨厌！"谁也没有起来。不一会，小山和各校带队的老师一边拿棒子敲门，一边喊："还不快起来！苏联飞机来了！昨天把虎头都轰炸了！"

同学们听说苏联飞机过来了，惊慌失措，手忙脚乱收拾东西，捆行李。有的同学把被褥套都拽扔了，准备升学考试带的书本分量虽重却都背着。有的手脚慢的同学还没有来得及吃饱，就都跑出去看苏联侦察机隐隐约约凌空而过。这时简直是乱了营的"败兵"。

尽管在这万分紧急的时刻，带队的陈惠宣老师还尽了最大努力，做了安排：选派三、四中队队长刘玉书、张国军两名同学为先，带着护照、现款，先去宝东车站联系购买车票，到宝东一家烧锅安排晚饭。

我们背着行李，怀着惊慌、恐惧的心理，忍饥挨饿奔走了百余里的路程。太阳快要卡山，我们逃到宝东车站南边的漫岗上时，车站上的景物历历在目。突然间，"轰隆！轰隆！"几声巨响，好似天崩地裂一般，震得人们毛骨悚然，——汽油桶爆

炸，宝东车站浓烟翻滚，火光冲天；火车汽笛狂吼悲鸣，开出宝东车站；哀嚎、狂呼声使人胆战心寒，凄楚难言。被甩下的人群，彼此难顾，四散逃亡。

目睹此景此情，好似晴天霹雳，同学们三个一伙，五个一群，嘈嘈嚷嚷，你呼我唤，一哄而散。我们一伙5人，当天晚上没走，在宝东车站附近的一家农民家里投宿一夜。次日（10日）凌晨，随着逃亡的人群奔走，路上遇见4名同学，一行9人奔走了五六天，15日到家里，遭到战争炮火洗礼的勃利县城，苏联红军的坦克部队已经开进来了。沦亡十四载的东北三省，又回到祖国的怀抱。

学生应以学为主，伪满时期的国高学生又以什么为主呢？在四年学习生活中，除去美其名曰“勤劳奉仕”的时间，剩下的还能有多少学习日呢？回首昔日沦陷区的奴化教育，就更加珍惜今天幸福的学习生活了！

（摘自《勃利文史资料》）

六

摧残教育　迫害知识分子

痛苦的回忆

董春华

伪满时九台只有一所中学——九台国民高等学校，我就在那里读了三年书。在这段时间里，曾耳闻目睹一些令人永世难忘的悲惨事情。

1941 年的春天，学校又开始了一个新的学年，那时是春季始业的。外乡的学生从四面八方向这里集中。一天，一个庄稼人打扮的老汉把一个个子矮矮的、圆脸庞、大眼睛、相貌清秀的年轻人送进了学生宿舍。大家都很热情地欢迎他——这位新来的伙伴。从攀谈中知道了他叫刘廷弼，家住西营城子，是新考取的。老汉是他的父亲。那时在乡间谁家要有一个中学生就很不简单了。因此，他年迈的父亲对他抱着很大的希望，希望他出息人，养老送终……老汉在临走时又嘱咐了儿子一番：不要想家，在这里好好念书，和同学们好好相处。然后，又转过身来对大家说："你们对他要多看管一些，他年岁小，不懂事，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多担待一些。"大家被这种父子间的真挚的爱所深深地感动了。都点着头说："那是一定！那是一定！"

开学上课了，第一堂是日文，那时日文是最主要的科目，由日本副校长娓岛来担任。提起娓岛来，学生没有不恨他的。因为他不把中国人当人看。他那副尊容也真逗人发笑。脸短得出奇，戴着一副大黑眼镜，几乎掩盖了他的整个脸。他一开门进来，刘廷弼这个乡下来的孩子一见这个怪物，便抑制不住自己，笑了起来。这一下子可闯了祸，娓岛把他从座位上拖出来，拳

打脚踢，摔倒在地上了。但还不放过，又上去一脚踢在肚子上，刘廷弼当时就起不来了。这时大伙把他抬回宿舍去，心里都很难过。但仍未想到这样纯朴、天真活泼的青年会因此离开人间。过了几天，病势加重了。只好给他父亲捎信来接他回家。刘老汉接信后当天就赶来了，仍是第一次来时的穿戴，只是那时的满面笑容换上了一脸哀愁。老汉泪流满面地把儿子抱在车上。同学们也都忍不住哭了起来。又隔了几天，不幸的噩耗传来了——刘廷弼死了。当时大家真都不敢相信，他确实死去了。

娓岛呢，当然仍旧当他的副校长。在那个暗无天日的社会里，日本鬼子打死一两个中国人，还不是吃面条一样。

日文课真是讨人厌。一来记不住，二来不爱学。经过那个惨事以后，一上日文课大家就提心吊胆，等于"过关"。因为说不好，念不会，同学们没少挨打。这家伙还有一个绝户招儿：一个念不完，全班举桌子，一举就是一堂课。大家这可真正是遭"洋"罪了。

娓岛调走了，同学们都乐坏了，李校长叫列队送他。大家心里想：送就送，给他送丧，祝他将来挨枪子儿。

接着调来的是女川副校长。这个家伙个头儿可真高，比平常人高一脑袋。他一脸狡诈气，穿着一条露屁股的呢子裤。因此学生们赠给他个外号"破裤子"。有人要问："他那么穷吗？"不！他很有钱。那他为什么穿破裤子呢？这家伙有点像中国的"土地主"，是典型的"守财奴"。

他到任后，就调动了全校学生——不花一文的劳动力给他盖洋房、修浴池、种西红柿、种西瓜、种狗宝，给他剪羊毛、打毛衣。喝！好家伙！贪婪的手伸向学校各个地方，好像要攫取这里的一切，唯恐有一星半点漏下似的。

干活时，他亲自监工。谁要是干得慢点儿，他就连打带骂。

大家也有招儿对付他：他来了大家就像满劲似的干起来，他走了大家就歇着，磨起“洋工”来。后来他发觉了，就发明了一种新的惩罚办法:跑圈儿。400米的大圈一跑就是10圈20圈的。

几个月后，他的洋房盖成了，他的菜果丰收了，他穿上了羊毛衣服。这完全是学生的血和泪呀。学生在这一学期课程耽误老了。我还清楚地记得：半年只讲两课满语（中文）。

“破裤子”苦心经营的“家业”没有享受多久就调走了。新来的是西塔副校长。他对学生的思想抓得可真狠。

他来的第一天，在朝会上介绍了他。他讲了一些话后，就把二年级的王宝山同学叫出来，叫他用日文背诵“诏书”。王宝山没背下来，被他一顿嘴巴打得满嘴流血。这就是他给我们的见面礼。以后，这家伙不管是集会时或走路时，他随时都可能叫你背“诏书”。有一次我班有一个同学没背下来，我们全班被罚在雪地里站了一堂课。很多同学手脚都冻坏了。

伪满绥中县小学教员的地位

李兆信

怎样才能当小学教员

伪满时期的社会是非常黑暗的。伪政府录用小学教员的办法是考试，不论新老教员，每年寒暑假都要进行一到两次考试，其目的不是为选拔适合小学教育的师资，更不是为了测验文化高低和业务能力，而仅仅是让掌握小学教育的官僚们借考试之机大发其财。考试录取的标准是礼物好坏和行贿多寡，谁送得

多而好谁就能被录用，而且能被分配到较好的学校，差一些的则仅能被录取而要到偏僻的山区，至于那些两手空空的人，虽有较高的文化和工作能力，也必然名落孙山。至于看卷判分就完全是走形式了。所以，每逢寒暑假，一些新老小学教员的心里总要忐忑不安，新教员怕考不上，老教员怕失业，就得想尽一切办法做行贿送礼的准备。我在前卫南杨家屯小学当教员时，学校地临海边，秋季盛产著名的白眼鱼。我的同学耿崇山在王汉山屯中心校当教员，为了逢迎上级，托我代买25公斤白眼鱼，送给科长和督学。我的家境非常贫寒，有年老多病的父亲，又有妻子儿女，每月的工资维持不了最低生活水平，但为了不失业，平时就得在饥寒交迫的生活中再节衣缩食，忍受衣不遮体食不果腹的痛苦，挤出钱来准备进贡。我是回族人，除送礼外，每年尔代节（回族的节日）还得借钱买油买面炸油香（回族高级食品，类似饼）送给官老爷们。为此，父亲着急上火，双目失明；爱人因饥饿而患胃溃疡（解放前相继死去），但那些官老爷却经常过着花天酒地的腐化生活。当时有个日本督学官，名叫泽村，外号大鬼头，女教员送的毛衣鞋袜也特别多，这个督学官把到手的礼物单放一个屋里，号称“泽村仓库”，这是当时人所共知的。在伪满时期想当一名小学教员，就必须满足那些贪官污吏的欲望。

小学教员进入农村

伪满农村小学校都掌握在当地土豪劣绅手里，另外还有一名专管学校的所谓学董，教员走进他们的一亩三分地，去留就得由他们说了算。所以，小学教员在县里闯过一关，还得闯第二关，教员进村必须先登门拜访那些土豪劣绅学董，事先备好礼物，到他们家中说些请关照的话，临走还得给小孩子钱。经

过谈话，他们感到人对心思、钱物两满意，才能把你留下。如应酬不到，他们会想法找词把你打发回去，使你不能立足。我师范毕业后初当教员时就知道农村有这种陋规，为了应酬，我父亲出五分利向张某借了20元钱。平时还得百般维持，年节都得馈送礼物。至于办婚丧大事以及孩生日娘满月，更得人钱一起上，否则教员位置就难稳固。我在白庙子小学当教员时，因当地地主徐某娶儿媳妇，前两天我回家结婚没上礼，以后又没补，就说我擅离职守，通过村长把我调出。在这个黑暗社会里当一名小学教员实在不易，拜了山神拜土地，也还得终日战战兢兢地工作。

农村学校惨状

伪满时期实行愚民政策，根本不重视小学教育。三五个屯才有一所小学校，而且很不像样子，校舍大都设在村头庙里，破烂不堪。多数小学只一个班，搞复式教学，一班里一、二、三、四年级都有。教员走进学校，举目是墙倒屋塌的凄凉景象。教室里破桌子板凳残缺不全，甚至连一支粉笔都没有，因为微薄的一点办公费也已入了学董私囊。教室是个小黑洞，少窗缺门，办公室和宿舍更谈不到了，一张破书桌，一条破板凳，就是办公桌椅。想用纸张文具只有教员自己买。对面是锅台连着炕，厨房兼宿舍，炕上没席子，锅台没有锅，要吃没米，要烧没柴，无人过问。一个教员来到这样的学校，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只好亲自下手修补教室，修理桌凳，到各处找学生，购买柴米。教员的工资由村长从县里领来转发，但往往发的不及时，或者村长放利了，或者他自己占用了，三五个月下不来，平时用钱只能临时借点。寒暑假给算清就算是好的了。我在前卫南老爷庙小学校当教员时，叶村长经常克扣教员工资。适值我父头部

患疮需钱治疗，向他再三要求也是置之不理，直到暑假也没算清。一年后调到白庙子小学，校舍如上所述，无法上课办公，住宿还没有炕。村长不理不睬，自己又无力修理，只有在这“五风楼”似的小屋里含泪忍受。

小学教员的社会地位

自从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那天起，东北的人民就当了亡国奴，做牛做马。他们把中国人不当人看，伸手就打，张嘴就骂，汉奸走狗也狐假虎威，骑在人民头上做威做福。小学教员跟普通老百姓一样，任人欺凌，被侮辱打骂是常事。1938 年初冬的一天，日本督学官原田到前卫优级小学视察，全学区所有小学教员 100 多人，都必须在早晨到前卫城迎接。当时我在距前卫城 18 华里的营守堡小学当教员，怕来不及，在前一天晚上就赶到王岗台中心校，次日早晨3 点钟集体出发，要过宽 4 里的河床，河水没膝，又没有桥，只好涉刺骨凉水而过。到前卫城天尚未明，就在寒风中排队迎接督学官。迎到校后，开始检阅，当学生走过检阅台前向督学官敬礼时，在操场旁参观的教员没有敬礼，这个督学官大发雷霆，骂不绝口，并令重新敬礼。该校有两名女教员，一姓佟，一姓张，因病体弱，校长命其整理办公室，出来较迟。检阅结束后，督学官不问青红皂白，命其随从人员带她们绕场跑三周作为惩罚。每周有 800 米，又高低不平，跑完后两人脸色苍白，昏倒于地，经抢救才脱险。1939 年寒假，教员在县城集训，我因步法走错，日人教官把我提出来单独练正步，前面有一积雪三尺深的大坑，日人教官不下口令不能停下，我只得向坑内走去，等从坑内爬出来时，两腿冻僵，但敢怒而不敢言。我有一个同学高宝德，因练习“建国操”体操时面容带笑，被说成是不尊敬日人教官，拳打脚踢，鼻口流

血，真是有冤没处诉。每逢放寒暑假的前一两天，教育科派人到车站路口守候提前回家的教员，如被碰上，不是撤职就是严加处罚。由于从上至下不把小学教员当人看，以致群众也有个别人称小学教员是“教圈”、“孩子王”等。当时，流传这样一句话：“家有二斗粮，不当孩子王。”在伪满当小学教员处处受压迫，受折磨，回忆起来真叫人寒心。

（摘自《绥中文史资料》第三辑）

伪满教师的非人生活

刘述先

伪满时期，扶余镇内各小学直接受着国民优级学校日本主事丁田、中心校主事井考、满蒙校主事大山的统治和奴役。丁田等人是县教育科日人大汇视学手下的爪牙，以丁田为首他们在各学校中横行霸道，任意殴打侮辱教师和学生。丁田总是阴沉着脸，像凶神伏位一样，有时他故意在盛夏的烈日下，召集各校教师训练走正步、拔慢步，不合乎他的心意，就是一阵责骂，走起来没头，拔起来不放。致使每个人累得满头大汗，又不敢擦。有时到哪个学校里，贼眉鼠眼地找茬子，说这个教师行礼不好，那个学生姿势不正，总是借故在师生面前侮辱或责骂一顿。有时还采取玩弄羞辱手段，你在生活习惯上难以接受的事情，硬带着你去做。记得曾有这样一段事。有一年7月间的一天，天气正是炎热，中心校受丁田之命，通知各中小学校长，要在中午到中心校集合。那时谁敢违背，都是提前去报到，大约有10余人，正在互相询问猜疑间，丁田哭丧着脸，从办公室

走了出来。这时有人喊了集合之后，他就当众说："从今天起，每天要在中午集合，到江边洗澡，现在就脱去衣服，只准带上兜裆布（撒包特，当时每人卖给一个），不许携带其他服装，快！"然后就整队出发。大家听后，变毛变色，面面相觑，心想洗澡还可，带个兜裆布和赤身裸体有多大差别，不像个样，这怎么办呢？每个人心里既是为难，又是愤恨，但谁也不敢说啥。丁田站在旁边怒目监视，在此威逼之下只得脱去上下衣服，带上兜裆布，赤光光的实在难堪，个个低头丧气站在队里。在跑步奔向江边时，过往行人，无不停步而视，引以为辱。奴役生活，于此可见一斑。

伪满吉林师道训练所，是日本强盗训练本省教师、推行奴化教育、残害青年一代的大本营。当教师的不去受训，就有失业的危险，拒绝受训，当时就得被革职。为了维持生计，明知是受罪，谁能不去呢。记得第三期生训练开始时，日本教官采取各种强迫、残暴、侮辱等奴役手段，来对付受训人员。受训日期虽是半年，遭受的非人待遇，却是有口难诉。例如，每天三堂日语课，比啥都难熬，尤其不会日本话的，一入课堂就心神不安，他不管你日语程度高低一律对待。当教官偶不顺心时，不是当面斥骂，就是逐出课堂，隆冬数九一站就是一两个小时，冻得你无处躲、无处藏。军事课更是难过的一关，铃声一响，都提心吊胆地跑到操场去集合，教官像凶煞神一样，站在你的面前，打几下，骂两声，那是很平常的事了，好些人腿上青一块、紫一块，都是军事课时被大皮马靴踢的伤痕。每天早上要跑步，路程是3～10公里左右，不准请假，不准中途掉队。每周总有一至二次长途跑步，或是半夜三更的紧急集合（如由伪吉林省政府到哈达湾车站），有跟不上的，回来便是一顿斥骂，有时还罚集体晚开饭几小时。宿舍阴森森地像个冰房，晚上睡觉，就是

穿上皮袜子，戴上手套和皮帽子，早晨起来，被头还尽是冰霜，手脚冻得不顶用，只有盼到星期日跑到浴池去，算是得到暖和的地方。每天都是提心吊胆，心惊肉跳，说不上要过几个关口。恐怖生活，真是使人心神沮丧，难熬难过。有一件更野蛮更侮辱人的事，我还记得很清楚。就是在过旧历年时，训练所宣布放假5天，规定是旧历初四回校报到，初五上课，在初四晚上点名时，大约有六七人因故未能如期返校，第二天他们就陆续回来了，向值日教官述说晚到的理由。当时都准许报到，并未提出指责，以后就都照常上课了，谁也没有议论没有注意这个事。不料初六日晚上训练所的日本主事泽田和教官早间等人，把晚来的六七人，都叫到教官室。有些人很替他们担心，也随着悄悄地站在教官室窗外张望，晚到的几名同学，在教官室一边，垂手站立，几个鬼子教官怒冲冲的便骂起来，哇哇的什么混蛋，滚回去等等。有的同学详细说明晚回来的理由，泽田鬼子哪里肯听，横眉立眼的更加大骂起来，早间装腔作势，跟着溜缝，教官室真像阎罗殿一样，一阵拍桌声，一阵责骂声。情况虽很严重，都以为闹一气就完事了，哪想越来越厉害，后来泽田鬼子竟饿虎扑食一样地站起来就要打人，停了一下，就恶狠狠的指着几个人叫他们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左右各打两下，不使劲，不响不快，就得重打。窗外人见此情景，又是愤恨，又是难过。六七个人在鬼子威逼之下，不得已自己打起自己来，有的脸已发红，有的口角流出血来。就这样，鬼子还是未消气，倒背手站在地当中，看看这个，看看那个，忽又喊叫起来："不行！你们要互相地打。"这几个人迟迟不动，鬼子又咬牙切齿地说："快打，快打！"站在窗外的人，起先是窃窃私语，继而怒气填胸，目观这种残暴狠毒的情况，再不忍停留下去了。愤愤地各自走去，在宿舍里讲"受人奴役苦难言，何日才是出头年"。

以上只是几个片断回忆，伪满教师生活，究竟是什么样，看看这几方面情况，就可以从一斑而窥全貌了。

回忆伪满时期的教育生涯

孙加毅

一

伪满时期，社会上流传着“四大硬”（即警察署、协和会、日本窑子、宪兵队）和“四大软”（即青年塾、老教员、国兵漏子、劳工团）之说。从这可以清楚地看出，伪满时期教师地位低下到何等地步，人民灵魂工程师的声望还不如日本窑子，实际也确实如此。

延寿县的教育事业原来是比较落后的，但就是这样一偏僻落后的小县，仍然没有逃脱侵略者的魔爪。康德元年（1934年），侵略者为将教育事业纳入他们的轨道，就开始逐步向教育界安插日本人，首先派川岛岩到公安校任主事，名义上是主事，实际上凌驾于正校长之上，掌管学校的一切大权。后来换为根本利德。成立中学时，先后派佐佐木东一、丸山正秋、寺井慎任副校长。后来又派寺田到县公署主管教育工作。日语教师多数由日本人担任，有吉岗基树、久保保、带刀武视等，他们虽是某校的日语教师，但不固定在一个学校，可以随意到别的学校去“视察”。他们一方面担任日语课程，另一方面，是侵略者在我教育界的代理人，执行监视中国教师言行的任务，对中国教师可以随意发号施令。如果发现或听到某个教师，甚至是学

生的言行有所谓可疑的迹象，便及时向其上级报告。伪满时期给公立小学派来一位日语教师，叫吉岗基树，表面看起来和蔼可亲，实际阴险毒辣，对其主子非常忠效。有一个星期天，他发现有些教师与外界人士集会聚谈，就把这一情况报告给县参事官（副县长）铃木三藏。为此，铃木三藏和后来继任参事官的绪芳义门经常在星期日、节假日及晚饭后率其随从和翻译官，以“关心”教育和教师为名，到县一校、县女校找校长或教师、工友询问一些情况。有一次，他们又到县女校探听情况，正好碰上了我，同铃木三藏一起来的翻译官吴二问我：“这些老师晚饭后来校不？到校都干些什么？”我没敢照本实发，应付说：“有三位老师是独身，寄宿在学校，也有时来一两位老师，都是来学校批作业的，没有干别的事情。”当时，我是县女校工友，他们量我年纪小，不敢撒谎，这事就算过去了。

更可恨的是，日本人将警务局警务指导官中牟田一家安置在县一校西侧的两间学校办公室居住，随时窥视教师的一举一动，掌握知识分子的动向。在这种环境包围下，教师不敢有一点过分行为，甚至连一些心里话都不敢说，否则随时随地都会惹来麻烦，遭到意外和不幸。

日本侵略者在组织上统治我教育界之后，紧接着通过各种宣传形式，加紧奴化宣传教育。他们到处张贴标语，什么“日满一心一德”，“皇帝陛下万岁”，“莫谈国事、守口如瓶”等，还派出宣抚班，带着电影机到各地巡回宣讲演出，宣扬其侵略战争的合法化。每当日本人打胜仗时和满洲国建国纪念日，都搞大型庆祝活动，以宣扬其“赫赫战果”，并由特务股拟出题目，如“新加坡改称昭南岛的意义是什么？”、“试论皇军南进政策的意义”、“如何强化北边镇护”等，让教师讨论之后写出思想认识和感想，然后交警务科特务审查上报，以掌握教师的思想动

态。搞得广大教师人人自危，如不按他们的要求去做，就要受到审查。

另外，侵略者还在伪满首都新京（长春）建立中央师道训练所，哈尔滨相应设立了地方师道训练所（以后并到哈师道学校），每年都要在各地抽一些青年教师去受训，我县每年被抽受训的大约有四到六名青年教师。受训教师除接受“建国精神”、“王道主义”等政治内容的教育之外，还要到王兆屯的伪军23团接受严格的军事训练。

伪满后期，县政府成立了特殊搜查班和思想矫正院。由特殊搜查班派出的便衣特务到处流窜，随时随地传讯老师、学生及有关人员，了解教师的思想活动状况，如有可疑迹象，立即上报特务机关，然后将可疑的教师送进思想矫正院进行审查。1944年冬，我与徐中山老师，因没有领学生给鬼子剥线麻（敌人掠夺的战略物资），被满脸酒气的伪副县长八岛正雄叫到警察派出所当面斥责，说我们思想不良，对其“圣战”没有认识，拍桌子、破口大骂，并要李警务股长马上逮捕我们。幸而一名伪职员，找八岛正雄有事急去，我们才幸免去思想矫正院审查处理。

阮书声老师毕业于吉林师范学校，先后在县一校和县女校任过教，教学非常认真，对学生的思想、学习、生活等各方面都极为关心，深受学生的爱戴。阮老师在吉林学习时曾与朱殿超同志搞过抗日活动，朱殿超在吉林被日本特务逮捕，阮老师也暴露。延寿特务机关得知这一情况后，由特务科派一名警尉多次传讯阮书声老师，胁迫他交待问题。阮老师借酒痛骂日本鬼子。1940年3月1日晚，正当县公署为伪满建国节召开提灯庆祝大会时，阮老师悲痛欲绝，酒后投井自杀。此事发生之后，广大教师受到极大震动，教师个人筹资为阮老师送葬。敌伪当局

害怕师生起来斗争，便贼喊捉贼，假意派出人员，到教师中了解阮老师死因，以掩人耳目，此后就不了了之了。阮老师死后遗下弱妻和幼小儿女，过着极度贫困的生活，而广大教师则敢怒不敢言。

二

在日本人面前，中国教师是低人一等的，作为一般教师的日本人对中国教师也有无限的权力，轻则训斥、侮辱，重则开除。公安小学主事川岛，经常到日本酒店“入船楼”或朝鲜酒店饮花酒、伴艺妓，胡作非为，不务正业。自己的行为不轨，然而却以统治者自居，趾高气扬，横行霸道，无论何时，师生见到他必先问好，否则就视为大逆不道。该校的康世珊老师就不理他这一套，因此后来找茬打了康老师。特别是女教师，在这些日本人手下遭遇就更惨了。公安小学有一个姓杨的女教师，因年轻貌美，被带刀武视这个无耻之徒所看中，几次意欲调戏都遭到反对，所以怀恨在心，到学期末人事调动时，只他一句话就把杨老师调到偏僻的农村，杨老师因有许多困难无法到那里工作，被迫于1940年离职回辽宁老家。遭遇最悲惨的算是公安校的费老师，县公署的一个日本翻译把她玷污后，又卖到了外地妓女院，沦落为娼妓。

在那时，教师不但要受官府的压迫，还要受有权有势之人的气。我们这些教师在有权有势的学生家长眼中，只不过是他们雇用的佣人罢了，经常有些学生的家长到学校来纠缠老师、质问老师为什么没有把他们的孩子教好。记得有一次公安小学召开父兄会（也就是家长会），一位有权势的家长不顾影响，仗势欺人，当面质问其子女的班主任周老师说：“周老师教我家孩子两年多，可算术的加减法都不会，只识十几个字，连自己的名

字都不会写。这半年，我们请了一个私塾先生，虽只有六个月的工夫，可算术不仅学会了加减法，而且还学会了乘除法，字也识了八九百，《三字经》、《百家姓》和许多唐诗宋词都会背了，将学生送到你们这个学校能学出什么名堂呢?”这种不顾客观事实的恶毒攻击，使老师们非常难堪。特别是高年级教师更难当，一些家长带着威胁的口气和老师说：我这个孩子就算交给你了，他念好念坏，毕业能不能考上国高就在于你了！在这种环境中工作，教师的心情总是忐忑不安、如履薄冰。

那时教师不但被侵略者当作他们实现奴化教育的工具，而且往往还充当劳工的角色，为其霸占我国领土服苦役。

当时各个学校都有不少农田，从春播到秋收的一切劳动都得教师领头去干。另外还被调去修建城西的两个飞机场和所谓的忠灵塔灵园。此外还要派一部分教师到新京为傀儡皇帝修建皇宫和建国神庙。1942年，我县30多名青年教师被调到一面坡国民高等学校参加所谓的“中坚教师暑期训练班”，那次参加训练班的教师总共有2 000多人，我就是其中之一。训练班除政治教育外还要参加严格的军事训练和繁重的体力劳动，每天长达16小时。这些教师原来体质就很差，加上训练班的伙食不好，不少教师都染上了流行性疾病（毒性痢疾、霍乱……），我也未能逃过这场灾难。侵略者连最起码的人道主义都不讲，不但患病不给治疗，就是因公受伤也无人过问。

三

伪满时期，作为“穷教书”的教师只能靠微薄的工资来维持生活，其标准之低是难以想象的。尽管如此，也不能得到保障，不是今天被迫为日本侵略战争捐献，就是明天被无理克扣、拖欠，致使相当一部分教师家庭生活朝不保夕。

那时小学分初小和高小。初、高小教师的工资差别是4元钱，即初小26元，高小30元。但是，由于教师多学校少，有的只好两人顶一个人来教一门课，这样工资也只能挣半个人的，那就是十四五元钱。这点工资只能维持教师本人的生活，而家人妻小就无着落了。

到伪满中后期，日伪当局为紧张的战争需要，经常向师生强制缴纳战时物资，如：金属、猪肉、线麻等，还强迫教师购买“战时债券”。

更为可恨的是“九·一八”事变初，拖欠教师的薪饷的情况经常发生，后来才搞清楚，拖欠教师的这些工资都被当时主管县财政的曹督办从中侵吞了。他用这笔钱为其儿孙购买了大量的花岗石条，以作为其万年后的基业。后来，这位曹督办逃亡到阿城去了。这事件激起了全体教师的义愤，引起了“闹薪”事件。尽管如此，官家仍然不管，最终只由曹督办的代理人用他所开烧锅的水酒代其抵债，结果，几个月的薪水只换了15公斤白酒。

广大教师长期在艰难困苦的生活中煎熬，拖垮了身子，有的默默地死去了；有的为了维持妻儿老小的生活，被迫改行，甚至有的当了泥水匠。其实，我们这些教师的要求并不高，只要填饱肚子就行。杨景峰、张家驹等一些老师常说：“那个时候，我们一个月能吃上几顿大煎饼就行了……”但就是这样的标准也达不到。

四

广大教师虽然生活在政治的高压下和极端贫困的生活之中，但他们并未屈服，民族感和爱国心在大部分教师心目中更加强烈。教师们在教学内容上作文章，采取多种办法，增强学

生的民族观念和培养学生的爱国思想。

孙友宏等音乐老师在尽可能的情况下，尽量挑选健康的、具有能激发学生们民族感情和爱国热情内容的歌曲教给学生唱，如《苏武牧羊》、《满江红》、《怀旧歌》、《天涯歌女》、李后主的《虞美人》等。

孙景略、林汉等满语老师的“文章”更多，他们在讲古文课时，借古喻今，对学生进行引导，使学生们热爱中华民族，憎恨入侵之敌。常讲的有文天祥的《正气歌》；诸葛亮的《前后出师表》；李密的《陈情表》；陶渊明的《归去来辞》、《桃花源记》；范仲淹的《岳阳楼记》；杜甫的《三吏三别》等。同时，还常通过讲韩愈的《师说》、《进学》等一些古文篇章，潜移默化地告诉学生们，拯救祖国、报效祖国，要实现这一远大理想没有知识不行，所以要从小珍惜大好时光，努力学习，掌握真正的本领，为实现自己的抱负打下坚实的基础。

在讲到歌颂军国主义的课文时，则尽量发挥反面教材的作用。如高小满语课中《乃木希典》一课，是歌颂乃木效忠于日本明治天皇，在侵略战争中立功受勋，最后为明治天皇的逝世而自杀殉职的精神。教师们讲此课时，特别着重讲其描写在我辽宁金县战场一节：“……十里腥风新战场，征马不前人不语，金州城外立斜阳。”指出这个杀人魔王，为争己功，杀我无辜同胞，致使人血所染之腥风，远闻十里为之遥，欠下中国人民累累的血债，以激起学生们对侵略者的义愤。同时还告诉同学们，傀儡皇帝溥仪在访日时还到乃木墓前搞哀悼活动，指出汉奸和侵略者是一丘之貉，是民族的败类。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伪满时，尽管日本人很凶，但是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一些教师勇敢地站出来，同他们进行了面对面的斗争。前面提到公安小学主事川岛岩因得不到康世

珊老师的恭维，总是想法找茬子整治康老师，可是后来被康老师教训了一顿。那一次是川岛特意检查康老师的教案，结果康老师没作。川岛找到了借口，大肆指责康老师，康老师不服，川岛气急败坏，举手要打康老师，因多数老师都在办公室，而没打起来。从此川岛更加怀恨在心。不久的一天，康老师晚上值宿，当时，我是管理学生宿舍的，又是单身，就在学校住，所以，值宿的事都是由我来代值，这一情况川岛是清楚的，平时也从来未管过。这天只是为了找康老师的茬，在晚上10点钟才突然来校检查，见康老师不在，即命学生把康老师找来，康老师来后，他边责问边伸手打康老师的嘴巴，还把康老师打了一个跟头。康老师站起来后，一怒之下，痛打了川岛，后来我领许多学生费了好大劲才将他们拉开。川岛的前额被打个大血包，吃了亏。这下可惹了大祸。第三天，康老师在班级里向学生作了声泪俱下的惜别讲话，告诉学生们要趁青年时期，在祖国危亡的关键时刻，努力学习，争取取得好成绩，以求抗战的早日胜利，否则当亡国奴之苦，是可惨的，最后，朗读了李商隐无题诗“相见时难别亦难”，以表示对同学的留恋之情。该要挥泪而别，被迫逃往哈尔滨谋生去了。这一事件解了教师的心头之恨。

（摘自《延寿文史资料》）

五常县日伪摧残教育片断

王绶之

残暴的思想肃正

伪满康德6年（1939年）4月，日本侵略者在五常县实行“思想肃正”，首先着重文化教育部门。五常街第一警察署指导官中牟田，到五常街教育馆去检查书籍，发现奉天学生文范一书中，有“偶像的崇拜”几个字。中牟田发现后，认为这是毁谤伪满皇帝溥仪的言词，大发雷霆，立即把教育股长崔殿云逮捕。原教育馆的书籍，有一部分是五常县中学教员郭锡宾买的，因而郭锡宾有故意买反满抗日书籍的嫌疑，所以把郭锡宾也逮捕起来。继而把县立第一高级小学校长吕世瑞也逮捕起来，五常街女校校长徐化圃在监外听候处理。

审讯时着重在反满抗日和与共产党地下组织有无联系等。每日必审讯一次，每审必须严刑拷打。受刑最重的是崔殿云，有一次用柞木斧把打得崔殿云遍体鳞伤，把屎都拉裤子里。崔殿云哀告说上便所回来再打，鬼子一声不响，仍怒气冲冲打个不停。后来裤子里边的大小便越来越多、越来越臭，鬼子才不打了。以后又有一次把崔殿云仰卧着用绳子绑在板凳上，用辣椒水向鼻子里灌，灌的时间长了，头发根都冒血了，肚子涨得像鼓一样，鬼子再用柞木斧把打肚子，使辣椒水再由口中吐出来，然后再灌，又把肚子灌大后才放下来。那时崔殿云已不能动弹了，用二人把他架回监去。该事件经过几个月的审讯和调查，未

得到真正证据，但是仍将崔殿云免职永不任用，将吕世瑞、郭锡宾、徐化圃免职，将郭锡宾、吕世瑞判为要视察人，每到过年过节时，集中到派出所监视两三日。

摧残教育

伪满康德7年（1940年），五常县中学农中班学生于国珍和同学金玉珠闲谈时说："日满亲善为什么事事都是日本人说了算呢?"由金玉珠密报警务科特务股，即将于国珍逮捕严刑拷问反满抗日的情形及是哪个教员主使的，同时还引诱于国珍说：你说了不但对你没有关系，还赏给你国币。于国珍坚决不承认，残暴的日伪特务用筷子夹于国珍的手，几乎将于国珍的手指夹断。以后继续抓人，今天到校抓一名，明天抓两名，毫无事实和证据，任意严刑审讯，弄得人心慌恐。学生有的吓得不敢上课，教员吓得无心授业，学校当局也没有办法。事情延续两三个月，被逮捕审讯的学生有20多人。同时双城中学也发生同样的事情，情况更为严重。因此滨江省民生厅不得不出头交涉，才把事情平息下去。总之，伪满时教师没有一天无忧无虑地授业，学生心理担负的是思想犯，身上担负的是勤劳奉仕，没有一天能一心一意地去学习。因我也在五常县当过校长，崔殿云和郭锡宾又是我的同学，所以关于以上两件事情知道得较详细。

（摘自《吉林文史资料》第十七辑）

日本侵略者暗杀了王国华

雷音动

40年代初的朝阳凤仪女子师范，在全省遐尔闻名。凤仪女子师范的校长王国华，是一位有民族气节的教育界知名人士。王国华，字化远，1888年11月26日生于朝阳县王营子乡树林子村的一个贫苦蒙古族家庭里。他父亲王凤仪，是东北女子义学创办者。他暗中立志，将来一定把儿子国华培养成为有用之人。王国华8岁时，王凤仪便送他上私塾，由于他刻苦读书，成绩优异，1910年考入奉天两级师范学校。读书4年，每次考试成绩都名列前茅，毕业后回到朝阳。1917年在朝阳大阪义学任教。1925年王国华受乡人推戴，在羊山成立义学，名"国华学校"，王国华任校长并兼任教学工作。1929年绥中邓尊楼聘请王国华创办"阙本学院"。1930年王国华又回到朝阳，在城内马公祠院内创办朝阳女子师范学校。1933年，日本帝国主义侵占热河，王国华充任朝阳第二小学校长。1934年，王国华为承父志，在朝阳开办女子义学，名为"凤仪女子师范学校"，国华任校长。这所学校的教师，除聘请的之外，多是王氏家人执教。王国华的大半生从事义学教育，他办师范，培养师资，为发展朝阳的教育事业辛勤工作，在辽西及东北大有名声。

日伪时期，他憎恨日本侵略者推行的奴化教育制度，更憎恨和反对日本对中国的文化侵略。他具有中华民族的气节，他教学或讲演，都以《中庸》之刚毅精神贯穿始终，鼓励学生为民族独立而读书。他在官场从不穿协和服，更不贪图高官厚禄。

日伪当局提拔他当朝阳县教育局长，他坚决不去任职。从而惹怒了日本人，引起对他的注意。王国华的三子和四子在黄埔学校读书，他嘱咐儿子要为中华民族生存而读书，这更激怒了日本人，派特务侦察，意以“反满抗日”之罪名，加害于他两个儿子，三次被拘捕到朝阳日本宪兵队，均被富商孙寿堂先生设法保释。但是，王国华仍未摆脱日本人的严密监视，并要在他身上下毒手。

1942年初冬，王国华应邀到大连西岗子道德会讲演。在六天的讲演中，王国华把《中庸》思想之精华“智、仁、勇三达德”的民族正气，贯穿整个讲演中，听众受到启示，引起强烈的反响，点燃了振兴民族之火。这几天的讲演，使日本人不安，他们露出了狰狞的面目，要杀害王国华这位爱国的教育界著名人士。日本人设下圈套，“宴客贵宾”。王国华胸怀民族大义，出席了宴会，日本头面人物频频向王国华“敬酒”。王国华饮酒后，回到住所，因酒中有毒而发作，抢救医治无效而死，终年55岁。王国华的尸体运回朝阳，葬于大凌河东凤凰山下王凤仪之墓前。日本侵略者毒死王国华，是他们对朝阳人民欠下的又一笔血债！

（摘自《朝阳县文史资料》第二辑）

日本宪兵在磐石县的一次大逮捕

张　帆

1931年9月18日日军侵入东北后，为了达到它长期统治的目的，对中国人民采取残酷的镇压政策。磐石这个地方，在当时是中国共产党满洲省委和磐石中心县委所在地，一些抗日的

团体组织，曾跟日伪进行过拼搏。因此，日伪认为磐石县是个“隐患”，教育界有“反满抗日”思想，不是“顺民”，所以恨之入骨。1934冬，日本侵略者在东北各地进行了一次对教员大逮捕的同时，对磐石的教员也进行了一次大逮捕。这是日本侵略者侵华的一次严重罪行。

1935年1月初的一天，天刚放亮，天空阴沉，刮着北风，下着清雪，天气很冷。一伙从吉林来的日本宪兵在磐石县城内出动了，带着一个翻译，跟着几个伪警察和一些伪团丁，有准备地对几个学校和一些教员家，进行大搜查，大逮捕。搜查完了逮捕15个人（其中一名农民），他们是：

磐石县教育局教育股长丛树春（字雨村）；

磐石县教育局县视学李文芳（字渔丹）；

磐石县初级中学校校长董吉昆（原名铭才，字大民。据说被捕时是教务主任）；

磐石县初级中学校训育主任王德本（字沫军）；

磐石县大成小学校校长于治舟（字润舫）；

磐石县福安小学校校长邸省三（字绍曾）；

磐石县福安小学校教员杨青山；

磐石县福安小学校教员周利源（字建熙）；

磐石县福安小学校仆役崔仲仁；

磐石县天一女子小学校教员丛耀深（字伯瑜）；

磐石县烟筒山小学校教务主任王文富（在烟筒山被捕）；

磐石县烟筒山小学校教员刘兆田（在烟筒山被捕）；

吉林师范学校学生李渔放（在吉林被捕）；

吉林毓文中学校学生葛汝非（捕时地点不详）；

磐石县农民李文翰（给葛汝非送信被捕）。

他们不管到哪个学校或是哪位教员家，都是恶狠狠地骂着，

所有的箱柜，翻个底朝上，犄角旮旯，翻个遍。偶尔发现书信等物，如获至宝，以为找到线索了。就连福安校教员杨青山的一张毕业证书，也给拿走了。虽然什么东西也没搜出来，但搜查完了，却将这些人，一个一个地反绑起来，押到磐石日本宪兵队去。

这些被捕的人被推进拘留所后，面向墙跪着，低着头，不许说话，不许张望。鬼子还给看守一把竹剑，叫他相机行事，谁不老实就狠打。在这以前，葛汝非早就被抓进来了。他已经被打得遍体鳞伤。两只眼睛只露一条缝了，精神恍惚，一声不响地在地上趴着。被捕的人谁也不知怎么回事，个个提心吊胆，只好默默地等着。从清晨一直被关到上午9点多钟，日伪特务又把这些人三个一串连绑起来，绳子捆得紧紧的，推上汽车。鬼子凶狠地吆喝："抬头的不行，看的不行，说话的不行，统统地趴下！"几个鬼子坐在这些人的身上，汽车就朝南开走了。谁也不知上哪儿去。当车经小南门外时，福安校工友崔仲仁，手举一顶皮帽子喊："把这顶帽子交给邸校长（邸省三）！"鬼子似懂非懂地问道："什么地干活？嗯！"伸手就把崔仲仁扯上车，并说："你的也来吧。"教员杨青山刚要抬头，鬼子很快给他几洋刀背，打得他头昏眼花，再也不敢动了。

汽车飞快地开到火车站。下了汽车，又连推带搡地，关进了闷罐车厢里，锁上车门，不多一会，就朝吉林方向开走了。经过烟筒山站时车停了。原来，烟筒山小学的王文富、刘兆田也被抓来了，早就在车站等着呢。这些被抓的人下车小便后，又被带上车，车就开走了。

当天下午2点钟左右，到了吉林车站。站里站外布满了岗哨，一个个恶眉瞪眼，端着刺刀，戒备森严。其他旅客一个也没有，就连车站的职工，一个也看不见。日本宪兵端着刺刀向

这些人吆喝着："快快的，快快的！"上了汽车又叫趴在汽车里，上边蒙上大苫布。谁要稍微一动，立刻遭到脚踢，枪托打。李文芳个子高，将苫布顶起来，鬼子骂了几句，踢了两脚。大家心里像揣个小兔子似的，暗想，不知要过多少道"鬼门关"。只好默默地蹲着，低低地弯着腰，坐在冰凉的车板上。

不多时，汽车停了。鬼子把苫布揭开，说："统统地下！"只见周围站着些日伪警特，把这些人押上二楼。原来这地方就是吉林警察厅。

进去后，个个必须低头静坐，都面朝南，不许说话。隔了一会儿，就听走廊里哗啦哗啦地响，原来是一些凶手拉着铁镣铐进来，给每个被抓来的人扣上一副足有十多斤重的铁镣铐，唯恐扣不紧，凶手们又使劲地用锤子敲打着，震得脚脖子像折了似的，又麻又痛。接着又在每个人的背上用粉笔画上"1、2、3、4、5"阿拉伯号码，按号再分押到吉林市内五个警察署去。

寒冬腊月，这些被捕的人，从早到晚，整天连口水都没沾嘴，更不用说吃饭了。一个个连冻带饿浑身发抖，有气无力，昏昏沉沉，每个人都预感到，灾难即将临头。

天已经黑了下来，拘留所里只有一个小黄灯，暗暗地闪着微弱的光。过了很长时间，才把这些人又用汽车分别押送到外五个警察署去，只留下李渔放、葛汝非和王文富三人。认为李、葛二人是重犯，王文富是因为年轻，就没往外署押送，暂时也押在厅里。

第二天早8点多钟，又把这些人全集中在警察厅。

令人恐怖的严刑拷打开始了。"主审"是两个"警佐"，一个是日本人，一个是中国人。旁边还有五六个凶手，身上穿的是"武士道"服装，头上戴着战斗帽，每个凶手拎着一根大镐把粗的硬木棒子，这棒子已经磨得光溜溜的了。凶手们像凶神

似地准备下手动刑。刑审室里还摆着各式各样的刑具，上大挂用的大粗绳子，下头带着大铁圈，在那悠悠荡荡地挂着，令人毛骨悚然。

先审问的是董大民，他身上挂着的木牌子上写“共党嫌疑犯”五个大字。这一定怀疑是共产党了。每个人都在寻思，“大祸”就要临到自己的头上，谁也别想逃出“虎口”。董大民一直被审问到下午4点多钟，凶手们把他抬回拘留所。只见他两只胳膊被打得一动不能动了，上大挂抻得就像两根木棒子似的直挺挺地垂着，他使尽全身力气，想站起，可怎么也站不起来，咬着牙，好久才爬到墙根趴下，一口一口地喘着气。身上被凉水浇得加上出的汗，就像被大雨淋过一样，鼻青脸肿，面无血色。他一直被连续刑审7天，身子实在不行了，可是鬼子还要继续刑审，当时的“法医”提出，身体需要恢复一下再审，刑审这才稍缓下来。可是董大民只剩一口气了。其余的人，除丛树春、周建熙二人外，和董大民所受的刑法基本一样，所有刑具用遍，所有刑法使尽。紧绑双手上大挂，一挂就是一个多钟头，放下来都是半昏半死的样子，手指抻出挺长。昏过去，就可劲用水管喷凉水，苏醒过来反说你装死，打得就更凶了。凶手们还往鼻孔、嘴里灌辣椒水；仰卧、俯卧压杠子，左右两边各站一个又粗又胖又有劲的凶手，使劲用两脚踩着、压着；用战刀背猛砍，每个人的脸上被打成血葫芦似的。个个死去活来，皮开肉绽，不等旧伤封口，接着又来重茬。每个人的棉袄、棉裤都打“开花”了，每个人的手脸，处处是伤疤、血痕。打得谁也没有活的心了，希望给个痛快，省得零受罪。王文富被打得实在受不了啦，把筷子削出尖来，要寻死。不料被看守看见了，说“要暴动”，反而又遭到毒打。在受刑审的人中，次数最多受刑最重的就数李渔放、葛汝非二人了。认为他二人是“重犯”，比董大

民受的罪更重。以后对李、葛二人，日本侵略者采用了“轮番”审的办法，审完李渔放，四个凶手抬回来，扔在地上，又马上将葛汝非拽出去。这样，三番二次轮流刑审，就连凶手都累出汗了，该有多么凶残。

审问工友崔仲仁：“你是干什么的？”“我是仆役。”“你的仆役来干什么？”打了个嘴巴，又搂两耳光子，“他妈的滚蛋！”然后就把他放了。真叫人啼笑皆非。

凡是受审的人，都受到逼问：“你与共产党有什么联系？”可是审到末了，谁也说不出谁和共产党有过什么联系。还审问，参加过什么秘密组织；从事过什么抗日反满活动；另外有哪些人参加了这些组织，都是多大官，比如县长、局长等，都可以说，不要怕。在审问中采取威胁引诱手段，如，说了对你有好处，别人都承认了，你再不说，等杀头就晚了，等等。

这些被捕的人，一直关到1935年5月间，除李渔放、葛汝非二人外，其余都释放了。释放时对这些人说：“回去不许乱说，谁要透露出去，一定要杀头的。”叫每个人写一张悔过书，“保证以后老老实实，安分守己，不乱说乱动。”然后告诉这些人，自己想办法，求亲靠友，借点路费各回各家。就这样一场轰动全省，震惊人心的大逮捕结束了。

这些受害人回到磐石后，众亲友纷纷探望。福安校长邸省三不能认人了，并直说胡话：“哎呀！又来了。你们坏我干哈，无冤无仇……”好像得了精神病似的。没过几天，就去世了。县视学李文芳，原是一位非常健康的人，也因刑伤过重，到家不几天就去世了。县中学董大民被打成脑震荡，不能说话，行动困难。县中学训育主任王德本两个大拇指上大挂抻出半指长，只是皮肉连着，什么也不能干了。一年多以后，勉强用两只手夹粉笔写黑板字。大成校长于治舟，两只手不能端饭碗，不能使

筷子，不能解裤带。教育股长丛树春出来数月，仍旧两臂直垂，不能抬起，不能回弯，吃饭时把嘴凑到饭碗里吃。

这次大逮捕是吉林和磐石同一时间开始的。还有人说，这是全省日伪在各市县采取的统一行动。磐石县学生李渔放，曾先后在吉林毓文中学、吉林师范学校念过书。他当时曾有过爱国和反满抗日的活动，他和当时毓文中学校长李光汉是师生关系。逮捕李光汉时，李渔放也被捕。葛汝非本是磐石县明城碾子沟人。曾在毓文中学念过书，抓李渔放时，在李的身上搜出葛的来信，据此，又去抓葛。葛的一位亲属闻信后，求一农民李文翰给葛去送信，遇上日伪特务，也就把这送信人抓去了。逮捕葛汝非时，又从他身上搜出他在磐石声称办学募捐的名单，日寇又参照这个名单和李渔放供出的名字，然后对磐石教员开始了这次血腥的大逮捕。

（摘自《吉林市文史资料》第六辑）

日伪对吉林教育界大屠杀见闻琐记

范广明

1935年，原敦化县私立敖东中学校长张威之（字器瞻）在吉林市病故。张氏当时在吉林市粮米行街开设松柏药房，并在工业专科学校教英文课。由于他于1932年被吉林日本宪兵队逮捕后，拒绝了伪省署派他做伪扶余县长的命令而去经商，很受教育界的赞扬，他的葬仪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当时吉林市教育界爱国力量的一次大检阅。尤其是张氏之死恰恰是在伪吉林市警察厅进行第一次逮捕之后的不几天，这次被捕的教育界人士

有私立毓文中学校长李光汉（榆树县人）、市立第五小学校长魏辅周、女师附小主任李禾村（原名李寿田）等人。前往张家吊唁的人们都怀着沉痛的心情，似乎是有意抬高这位当时在吉林市教育界并不是十分突出人物的身价，隆重地举办了葬仪。动员了相当广泛的各中学敦化籍学生参加了葬仪行列，女师、一中等校全体师生在灵柩经过时举行路祭。这种和当时政治气氛很不协调的行动，一方面集中地显示了吉林市教育界爱国力量的集结，用对张氏哀悼怀念的形式表现了对日本帝国主义和当权汉奸们的愤怒抗议；另一方面也引起了日本侵略者和汉奸们的注意和怀疑。

我是在张成之逝世后两三天从敦化赶到吉林张家吊唁的。在张家我接触了吉林市教育界人士多人，并与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教务主任娄少石（本名德镛）谈到了爱国人士被捕事件。当时娄少石（是张氏治丧工作中最活跃的人物）还没有考虑危险会降临到自己头上的问题。由于我们的关系很亲密（除了是同乡还是师生），我提醒了应认识事件的严重性，并考虑它和自己的关系，从而采取妥当的自处办法。他告诉我说："这是由刘继瀛所引起的麻烦（刘曾在1932年在一师担任初中部训导员，这时已逃往北平）。他曾从吉林中国银行提取北平汇来的1万元款项，被日本宪兵队侦知，日本人由于他已逃往北平，没有捉到他。但是日本人认为这笔款子是用来做抗日活动经费的，所以就捉了这些人出气。"我说："刘继瀛和你同在一个学校共事，又是北大同学，应该考虑一下事件和自己的关系。"他说："看看我和他在一起照的相片是不是还没毁掉，这是很要紧的。"我又问他近来和一师校长邹海瀛的关系怎样。他很乐观，认为没有恶化的征兆。我说："虞华（娄少石的堂兄）被邹设法撵走的事情你还没有忘记吧？从那时起我就看出你和邹陆涵（邹海瀛的

字）之间并没有半点交情，你以为在学校里很为他卖力气就能取得他的好感，这是很靠不住的。”娄少石听了我的话没有什么表示。我由于当时在敦化县东关小学教书，请假已到期，没有参加张成之的葬仪就回家去了。在行前还曾和娄少石夫人谈过这个问题，她主张要把一些有关政治的书籍烧掉。后来听说他们正在灶火坑烧书的时候，吉林市警察厅的鹰犬就来逮捕他了。这些人当场除了胡乱拣走了几本书以外，还从墙上挂的镜框后边搜出一张娄少石与刘继瀛等人合影的照片。这张照片据娄少石夫人后来告诉我说是当时烧掉有关东西时没注意漏下来的。

娄少石被捕后关在吉林市船营街警察署，他的夫人曾去探望过一次，会面的地方是厕所，以后就见不着了。曾经有人在街上看见娄少石和许多被捕人士被特务装上卡车前往江南和北山，当时娄少石光着头，身穿水獭皮领大衣，用大衣领包着耳朵。特务们把他们押往江南和北山，是要他们招供在哪里的开会地址。经过了几个月的严刑拷打之后，日本侵略者没有得到什么东西。有一天特务通知娄少石夫人，说娄少石已经病得垂危，家人可以前往省立医院服侍。娄少石夫人赶到医院时，见他已经神智不清、语无伦次，始终没有说出一句清醒的话留给家人，就糊里糊涂地死去了。直到临咽气时特务们还在病榻前边监视着。据日本医生宣布是死于“肠伤寒”。谁能相信日本侵略者的鬼话呢？日伪当局用尽了酷刑，什么也没有得着，终于不得不放弃按照常规把“政治犯”移交伪满司法部门审讯判刑的程序，而采取了暗害的下策，企图以“犯人病故”的托词来逃避杀害优秀的中华爱国儿女的罪责。

毓文中学校长李光汉被关押在吉林市粹档街警察署，日本侵略者把他单独地禁闭在传达室里边的一个小屋子里。不但与一般犯人隔离，而且与警察署里的一般“员工”不许接触。日

本侵略者在审讯中，对他使用了惨无人道的毒刑，“上大挂”使两只手臂的肩胛骨关节脱臼，后来关节部位腐烂生蛆，两臂和两手瘫痪残废，吃饭时只得把嘴伸到碗里，其惨状见者酸鼻。有一天傅兆麟先生因事路过该署传达室，见他满腮胡须、面如土色、精神恍惚，不忍卒睹。他最后也是在关押期染上“传染病”丧命的。

女师附小主任李禾村被关押在吉林市北山警察署，由于他机警圆滑，和看守人员处得较好，不但允许家人探监送来金钱、衣物和食品，而且能在看守陪伴监视之下到北山散步。但是毕竟不能逃脱日本侵略者安排的命运——身染“传染病”死去。

市立第五小学校长魏辅周和李光汉、李禾村、娄少石等人的死法一模一样。他们都被分别监禁在吉林市内的各个警察署里，怎么都得上了致命的“传染病”了呢？在病笃临终时期都神智不清，不能向家人诉说所遭受迫害的情况，含冤饮恨而死。日本侵略者所谓“传染病”“肠伤寒”云者，只是欲盖弥彰。

和娄少石同时被捕的还有吉林第一师范学校训育主任丛绍章，后被邹海瀛保释。

这两次逮捕都由伪吉林市警察厅长孙仁轩秉承其日本主子意旨亲自策划指挥的。孙仁轩是旅大人，曾毕业于旅顺师范学校，“九·一八”事变当时在长春满铁附属地当巡捕，是日本帝国主义豢养多年的走狗。在任伪吉林市警察厅长期间，即以迫害中小学教师和各界爱国人士而取宠于日本主子，一师校长邹海瀛和他是一丘之貉，表里为奸，也是这次事件幕后的参与者。吉林人民对这两个民族败类都恨之入骨，莫不盼望早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生啖其肉。光复后，两个家伙都在延吉市被人民政府镇压伏法。消息传来人心大快。但是如果和他们的叛国罪行来比较，还是死有余辜的。

据我所知，1935年前后，日本帝国主义在全东北境内进行了有计划的大规模逮捕，其锋芒就是指向各大中城市的中小学教职员（当时大专学校还很少），先后在安东、沈阳、吉林、齐齐哈尔等城市都发生了类似的捕杀伪教育厅长、中小学教职员的事件。日本侵略者认为教育界人士是抗日运动的组织者和领导者，镇压了他们就意味着镇压了这个运动。当时教育界中确有一些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领导和参加了抗日运动，而更多的人只是具有某些爱国之心和民族意识，并没有直接参加反满抗日活动。日本帝国主义镇压东北教育界人士是出于侵略者的政治需要，是对知识分子的任意宰割。

（摘自《吉林文史资料》第十七辑）

娄德镛被捕前后

娄德埠　于春海

娄德镛因“救国会案件”于1935年11月间，被日本特务逮捕，1936年4月被害致死。同时遇难的爱国人士有吉林毓文中学校长李光汉、教师李禾村。吉林市小学校长魏辅周等10余人。

娄德镛字少石。汉族，1905年生于吉林省敦化。祖父娄永和，农民，清末由山东随先人逃荒至黑龙江宁安镜泊湖，敦化设县后迁到敦化。父娄晴，行四。德镛幼年父母双亡，后过继给八叔娄照为嗣。1913年入敦化县两等小学校（即初等和高等小学），毕业后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取吉林省立第一中学。1922年考入国立北京大学预科。后值八叔患肺病，得到敦化亲友士绅的资助，以优异成绩考入北京大学法律系本科。此时与敦化

的富户梅家订亲，得到梅家的资助得以攻读大学。

在北京读书时，德镛常与进步人士接触，受到很大影响。尤其仰慕周恩来、马骏等革命家，曾与马骏晤面，得到马骏的照片。寒暑假回敦，每每谈起，绘声绘色地宣传周恩来、马骏的爱国活动。

1927年，德镛从北京大学法律系毕业，1928年被吉林省立五中聘为训育主任，同时兼授数学、英语、法律等科目。受到刘旨予、赵恭福二位校长的器重。

1932年初，伪满洲国成立，吉林省教育厅由日伪控制。荣孟枚任教育厅长，将吉林五中与吉林一师合并，由吉林东局子迁到八百垅大学校舍，定校名为吉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校长为邹海瀛，聘娄德镛为教务主任，丛佩文为训育主任。第一师范校舍范围较大，中楼是办公室，下设图书馆；东楼为教学楼；西楼于1933年被吉林省警察大队占用。

1933年的一个夜里，警察大队把校舍四周围住，说有共产党传单。当时校长邹海瀛与其续弦李元淑回到长春度蜜月，所以由娄德镛出面，动员师生员工检查图书，将易被敌人检查出问题的书一律烧毁。第二天，邹海瀛接到电报返回学校。不久，来了两个“电驴子”，上坐日本特务。日特下车，上楼少顷，由邹海瀛、丛佩文陪着走出，来到东侧教学楼，进入四十班。从佩文点名，令张其义出来，当场戴上手铐。又点刘哲（现改名陆平）的名，不在，刘已逃走。然后到楼下带走一名学生，由邹海瀛亲自坐“电驴子”将这三名学生送到日本宪兵队。

1933年11月，日本殖民者开始在吉林市向教育界发动大逮捕，据说是由一师初中训育主任刘继瀛逃往北平而引起的。原来北平救国会发动海内外爱国人士捐款，支援关外义勇军，其中有一笔由北平汇到吉林的1万元，提款人是刘继瀛。刘继瀛听

到风声不好，取款后逃往北平。此消息被日本宪兵队得知。唯恐教育界参加抗日活动，故在教育界进行大逮捕。娄德镛与刘继瀛在北京时就有交往，后来又在一师同仁，经常在一起抨击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罪行，所以德镛预感到自己可能被捕。便回家整理书籍。夜里正在烧毁书籍时，十余人破门而入，持枪将娄夫人及小孩统统圈到屋地中心不许动。然后四处搜查。当看到灶间有烧书的白灰，便百般审问，此时门上边的大镜子被碰掉、打碎，露出后面垫镜子的相片，其中有一张是娄德镛与刘继瀛、娄幻三人的合影，于是日特根据这张照片逮捕了德镛。

德镛被捕后，家中不知他关押在何处。后传闻喂了狼狗、被日本人活埋了等等，一直无确切消息。旧历年将到，一天晚间，来了一位面戴口罩的人，自我介绍是看守，又说是娄先生叫来的，同时拿出一张字迹潦草的纸条，说德镛很想念孩子们，想吃饺子等等。娄夫人惊喜异常，马上包了三十几个饺子，托来者捎去。相隔月余，这个好心肠的看守又来了，说："上次娄先生边吃饺子边说：'真香！真香！算过年了，过年了！'"同时告诉娄夫人已安排好去见娄先生。那天晚上正赶上下雪，娄夫人随着看守到一个豆腐坊后院的厕所，等候不久，见一黑影移来，梅氏细看，正是德镛。只见他瘦得变了样，脸色青白，流着热泪。当时，夫妻俩抱头痛哭不已。片刻，德镛问起孩子们，并嘱咐梅氏设法营救。会面约五分钟，忍痛离去。

梅氏能与德镛会面，全亏看守安排，一方面因为看守是中国人有正义感，另一方面也由于梅氏花了钱，打通了他。此后得知了德镛被捕后的一些情况。

德镛被捕后，日本警特就没停地过堂，什么上大挂，剥去上衣毒打，用子弹头穿肋骨，受尽了酷刑。这当中，哈尔滨来的几个日本特务，更是惨无人道，竟将德镛的四肢打脱了臼。为

了加紧逼供，曾让德镛去辨认救国军开会、藏枪的地点。德镛明知已活不多久，因想见孩子们，便答应去江南，但要求从新开门白起推子胡同路过。日本侵略者答应了，便把德镛押上了汽车。当路过家门口时，几个孩子恰好在院里玩耍，听到汽车声，便跑了出来，竟意外地看见了日夜想念的爸爸。此时的德镛用大衣领子遮住了半边脸，为的是怕孩子们见到伤痕累累的脸而吓着他们。汽车开走了，所到之处，他又一言不发了，再次遭到毒打。

1936年4月初，日本侵略者见从他身上榨不出什么来，便对他下了毒手。在刑讯室里，日特端起一碗黑药汤，骗他饮下。德镛心里很清楚，这是毒药，奋力反抗不喝，被强行灌下。几小时后，娄德镛成了呆人，此后昏睡不起，神志不清。日本侵略者以伤寒为借口把他押送进吉林省立医院，由日本人院长专门“治疗”。

在医院后期，娄德镛已生命垂危，日伪当局通知家属去医院见面，梅氏与不满10岁的女儿桂环，来到医院。看守人员只许梅氏一人进屋。梅氏进去，见到德镛已奄奄一息，任凭呼唤已毫无反应。

过了两日，年仅32岁的娄德镛被日本侵略者害死了。后由堂兄娄德坤及亲属虞子新出面，把他装殓，埋葬于吉林北山义地。

本溪"思想犯"案亲历记

朱光璧

1936年初，日本侵略者为准备大举向中国关内侵略，巩固对东北的殖民统治，首先在本溪地区阴谋制造了一起"思想犯"案，以镇压知识分子和人民群众的反满抗日活动。我当时作为"思想犯"，曾亲自经历了这一案件。

1935年（日伪统治东北时期）是我到本溪河沿中学任教的第二年。当时社会上流传着"明年（指1936年）是非常之年，世界上将有重大事件发生"的说法。据说这种说法是有根据的，是根据国际间条约推定出来的。日本人都这样讲，甚至在公开集会上也这样讲。其实这是他们在大规模军事进攻中国关内前所制造的反动舆论。

1936年1月，正值学校放寒假，学校校长李如翔到校说："日本人将进行大搜查。"因而让我们几名教员检查学校所有的图书、刊物，把当时所谓违反禁忌的人物图像及著作，"九·一八"事变前出版的地图、地理、历史、杂志等，付之一炬。为了保存《辞源》一类的工具书，也把其中的有关中日条约及战史的记载，逐项涂掉。同时，我也把家中保存的书籍和信件捡出大部分烧掉，以防不虞。果然，时隔不久，本溪"思想犯"案发，我被捕入狱。

1936年初（农历正月十六日）晚7时许，我正在家哄孩子玩，忽听敲门声甚急，开门后，立即有两名日军和两名伪特一拥而入。他们问清我的姓名后，立即搜身。然后两个人押我离

家，另两名留下搜查。我被用汽车押送到伪警察厅前时，又见被押上车一人，是当时本溪县第一小学校长崔庆桂（字芳秋），他是我的小学老师。我问他："抓我们干什么？"他还很乐观地说："大概找我们了解什么情况吧！"我深不以为然。一直把我们押送到日军守备队。在守备队的值班室，我见到另外被捕的3个人，他们是伪县教育科社教股长王殿卿、伪县警务股长毛羽丰、伪县土地股长李如芝。这时，进来两名宪兵，拿走了我们的腰带、腿带和鞋带，把我们关押在一间房内，并且说："我们奉上级命令监视你们，你们住在这里，不准互相交谈！"我们就这样被关押起来。房内无床，亦无桌凳，我们只能席地坐着或躺着，因为有宪兵的监视，也不能互相交谈。后来，两宪兵在外屋下起棋来，我们才能用在大腿上写字的办法，互相沟通思想代替说话。当时我想：我们几个，虽然平素互相认识，但不来往，为什么被抓到一起来呢？可能是日本侵略者要进行恐怖性的镇压，先拿我们开刀了。在我们去厕所时，总有一名日军持着带刺刀的枪在身后看守。从日军士兵互相问答的谈话中听到了我们的各种罪名，有的说我们是"马贼"（日本侵略者对抗日队伍的污蔑称号），有的说我们是反满抗日分子，有的说我们是准备向关内逃亡的人。总之是罪名不轻。这些越发证明了我想法的正确。

我们被押在日军守备队的第二天，我校校长李如翔亦被抓来，和我们关押在一起，被关押的增至6人。第三天，崔庆桂被提走，下午送回。他说："被提走后，押到日本宪兵队，并未堂审，但是听到了审讯室里有人被打的惨叫声，凄惨极了。"第四天崔又被提走，此后，一去没回。又过一天，王殿卿也被提走没回。这时，只剩下我们4人，都面壁枯坐，呆若木鸡，连用写字代替说话的精神都没有了，人人都感到大祸即将临头！

我是在被捕后的第六天提审堂讯的。由两名宪兵把我押送到宪兵队。刚一进厅堂，就看见崔庆桂、王殿卿两个鼻青脸肿地在一旁站着，崔的额角上还带着几条渗血的伤痕。进审讯室后，见正面坐着3个日本审讯人员，中间的一个胖子是主审人（据说他是沈阳宪兵队派来的一个股长），还有一名翻译，另外是出出进进的几名宪兵。审讯开始时，主审者装扮出很客气的样子说："这里有个案件，与你有关系。你必须讲老实话，把案情讲清，如能这样，就放你回去；不然，隐瞒不说实话，那就罪上加罪，后果就难说了。"接着讯问我的学历、职历。然后转入正题，问我参加过什么组织，是不是共产党员？我说："我不是共产党员，连一个共产党员也不认识。"还未等我说完，就被陪审者打了几个嘴巴。我坚持说："我求学时期是张作霖时代，他极端反对共产党，共产党不能公开活动，因而我未能接触到共产党。"他们不信，反复逼问，我也没说出一个，又挨了几个耳光。主审者又问："你不是共产党，是不是国民党？"我答："也不是，我什么党也未参加。"主审者暴跳起来，喊叫着说："你念书时，国民党在东北已经公开，一般学生都参加了，你就没有参加？不说实话，给他上刑。"立刻上来两名宪兵，扒掉我的棉衣，把我摁在事先准备好的长条凳上仰卧，用绳子紧紧绑住头、臂、腰、腿，然后将绑我的长凳靠脚的一头垫起，使我身体与地面成30度角，头朝下。一个宪兵拎起一个装满冷水的大水壶，向我鼻孔倾灌起来，同时另两名宪兵用棍条狠狠抽打我的臂、腰和腿部，以为这样可以逼出供来。其实水灌到几分钟后，人就昏迷过去，对于一切痛苦已无知觉，这点，日本人是不懂的。他们灌凉水的办法是，把人灌昏迷后就停一会，等待苏醒过来后再灌。这样对我反复几次，把我折腾得无力再支持了，才停下来。用刑后，审讯者已走，只留一名日本曹长看

着我。我想：下一步审讯将怎样对付呢？我不是国民党，当然不能承认。但不说出几名国民党，也是不能过关的。经过考虑，作出了这样的决定：现居本溪或在东北其他市县的国民党员一定不能供出，至于逃入关内的，不妨供出几名，他们不在东北，是不会被日伪当局逮捕的。这样想好之后，又等了很久，审讯者回来了，继续审讯。我说："我本身不是国民党员，但我认识的国民党员倒是有一些：马缵益是沈阳师范校长，梅黄裳是沈阳师范教导主任，孟祥符是国民党辽宁省党部职员，刘克俭是本溪新民小学校长，杨遇秀是东大学生，高元利是本溪某小学校长。"我举出的人员，除高元利已死外，其余人都早已不在东北了。审讯者又问："在本溪还有谁是国民党？"我说："我回本溪不到二年，除前面举出者外，不知还有谁是了。"时已将晚，第一次审讯结束，我被送入囚室。这时，精神紧张解除了，肉体上的伤痛发作起来，伸手一摸，臂、腰、腿多处已是皮开肉绽，肿得很高，伤处和衬衣贴在一起，身子不敢扭动，彻夜痛苦，未能睡觉。

天明，又对我进行了第二次审讯。问："本溪有什么反满抗日组织，你参加过哪些活动？"答："不知道有什么组织，我也没有参加什么活动。"这时，主审者又咆哮起来，叫喊道："别人都承认了，你还顽固不说，给他上刑。"于是，两个宪兵过来又给我灌凉水，但时间较短就停止灌了，又继续审问，逼我承认，我仍然拒绝承认。这时，他们便取出一页纸说："这不是你的组织和活动吗？"我一看，这页纸上写的是我所起草的"励行会"章程。原来在伪满洲国成立后，日本侵略者为了消磨东北青年的志气，熄灭青年的爱国思想，在当时东北城市乡村遍设"管烟所"，置有女招待，公开贩卖鸦片。那时，青年中毒受害者甚多。我为教育青年，寄希望于青年救国救民，因此，在假

期草拟了这份章程，主要是教导学生不要吸食鸦片，以免沾染恶习。这种真情，当时当然不能全盘讲出。于是我辩解说："我校毕业生有些人因吸食鸦片而成为废人，辜负了国家的培育和希望，所以我想成立个'励行会'，劝勉学生在校好好读书，毕业后洁身自爱，不染恶习，好好为国家服务。我写这页章程交给学校呈请上级批准后，再着手组织，现在这个草稿还未修改好呢！"他们看看章程的稿子也是这样写的，因而没再追问，结束了第二次审讯。此后我又被送回日本守备队原来的拘室中。此时，这里只剩下被拘的3个人，而且都经过了审讯，感到案情的严重，互相无语，面面相觑，也许是互存戒心的缘故吧！

两天之后，我又被第三次提审。这次审讯室内只有日本宪兵曹长和一名翻译。由翻译直接向我说："今天下午，对一些罪重的人执行死刑。队长认为你还年轻（时我仅30岁），想给你一线生路，只要你把反满抗日的组织情况交代清楚，有悔过自新的诚意，队长将免去你的死罪，将来还可以释放你。如果你顽固到底，不肯交待，下午就把你们一同枪毙。"说完，就把纸笔放在桌上，让我写交待书或悔过书。我说："没有的事，不能编造，我无法写。"他说："你不肯交待，就写个遗嘱吧！你死后，保证能送到你的家里。"我寻思片刻，他催促我："时间不多，要写就快写！"于是，我拿起笔含泪写道："父母亲大人，我无事家居，祸从天降，狱中含冤，莫能自白。吾朱氏三世行善，得此恶果，良可浩叹，……"没写完，就不让写了，把我推进囚室。

囚室内，这时挤满了人，外面走廊和厅堂还站了不少人。这里虽然也有宪兵监视，但不太严。晚间，大家拥挤睡觉时可小声私语。因此，我知道了这里的囚犯有商店经理，有机关职员，最多的是小学教员。几天后，原在日本守备队拘押的6个人，除

崔庆桂之外，都囚禁到这里了。这里是夜间好过白天难熬。早饭一过，都提心吊胆地正襟危坐，等候呼名提审，即使提审的第一名不是自己，也得等候呼第二、第三名。在都屏息凝神待呼提审时，经常听到由审讯室传来的悲惨叫声，天天如此，空气异常紧张。宪兵队的刑讯极端残酷，有灌凉水、灌辣椒面、上大吊、打棒子、刮肋骨、用火烧等刑。有时两刑并用。被抓到这里受刑后放出去的绝无仅有。不仅政治犯被严刑拷打，就是一般小事，这里也用刑讯。如王殿卿就是因他的6岁小儿在课本第一课皇帝陛下的旁边写上了"大王八"三个字，被刑讯拷打，打得胳膊都抬不起来。毛羽丰因为一支枪的问题，也被单独传讯拷打一顿，打得腰背不能动弹。

有一天，会日语的李如芝去厕所，回来说：他不止一次地听到宪兵队长与沈阳宪兵队通电话，研究本溪的案件，可能要把我们转移到沈阳去。这个消息，又给大家精神上增添了负担。可是，很快又传出消息说，今后不再过堂（提审）了，让大家养好伤，伤养好就释放。当时，大家并不相信，可是此后敌人对囚室的看管确实放松了，也无人被提审了。接着，从宪兵方面传出一个离奇的消息：说这次案件之所以扩大，是由崔庆桂胡诌乱讲所造成的，罪责应由崔来承担。在一天下午，敌人进行公开审讯，将崔庆桂示众，审讯人员和县指导官（日人）唆使崔的属下教员肖梦潭、肖承朴等人当面打崔以泄愤，并叫大家去观看，一片吵闹喧嚣之声直达囚室。这些似乎证实了以前传言的可信。但是，我很奇怪，抓"思想犯"明明是日本人有目的、有计划的一种阴谋镇压知识分子的行动，为什么中途停止了呢？难道真的要草率收场了吗？当时，百思不得其解，只能等待事情的发展。

在我们于宪兵队囚禁过程中，许多后期被捕的人受过刑讯

后，一批批地陆续释放了。最后，有一天，看守兵对我们说："你们的伤养好了，可以释放了。"其实，当时我们身上的伤还很重，只是从脸上看不出来而已。在释放我们那天，敌人还举行了一个奇怪的仪式。在一间房子里，我们先站成一个横排，然后敌宪兵队长领着几个地方官绅(其中有伪本溪县长王荫椿、伪农务会长崔××、士绅孟凌云等）进来。首先宪兵队长说：你们被检举，都是有罪的，经过审讯，罪证很确凿，但皇军宽大为怀，以日满协和为重。兼之地方官绅联合做保，特从宽处理，释放你们，你们要感谢皇军，今后要努力工作，以求立功赎罪。另外，你们必须牢牢记住，这里的情况及审讯受刑等，不许外传，对父母妻子也不准泄露。如果有人乱说，一定要抓回砍头，决不宽饶。接着，伪县长又按日宪兵队长的意思重复一遍，才释放我们，结束了我的二十多天的牢狱生活。我们的出狱，名义上是地方官绅保出来的，实际上是伪当局事先做好的圈套，以便下台。那几个保人我都不认识，当然也并不感激他们。

我被释放回家后，最初，一般亲友为避嫌疑，都不敢和我往来。到我家看望的只有2人，一个是我的学生石常惠，一个是我的堂弟朱光升。石与我有亲属关系并是同乡，当时他是本溪县公署参事官高木（日人）的秘书。一天晚上，他偷偷地到我家，告诉我他在高木的一个小日记上看到了我的名字，下面写着"要视查人"四个字，劝我言行要特别注意。这时我才知道，我是早就上了日本侵略者黑名单的人，怪不得被当做"思想犯"而被捕入狱。朱光升当时是县警察训练所的警兵，他来家看我时，问我："你知道你们为什么释放得这么快吗？你们被释放，完全是警察教练所教官常伯英的力量。"我问他怎么回事？他说："你们被捕后，常感到不安，他是一位有抗日思想的人。后来被捕的人多了，他不敢在家住，夜间就躲藏在后山妓馆里。

有一天半夜，他回到教练所，伪传命令说是欢喜岭出现股匪，奉命立即出发剿匪。他带领全副武装的四五十警兵，连夜出发，走到欢喜岭，天已拂晓，这时他便正式宣布：今天不是剿匪，是领你们造反。大家都知道，本溪近几天抓了很多人，我们不能等着死，现在我领着你们到东边去投奔抗日义勇军。讲完，指派十来个亲信警兵断后，我也在内（朱光升自称），继续前进。可是人心不齐，逃跑者不断出现。他们手中都有武器，断后者也不敢阻拦。走到小市时，只剩下十来个人了。这时，我也乘机跑回来，最后常只带几名亲信去东边了。”听完，我明白了，就是常伯英的率众起义投奔抗联的事件，使日本侵略者震惊，他们害怕压迫过甚，激起民变，所以本溪宪兵队与沈阳宪兵队反复通话联系，研究对策，才决定迅速结案，释放人犯。

以“思想犯”罪名被日本侵略者抓去的人大都释放了，但崔庆桂始终没能出狱，一直被押到秋季，还陪过几次绑，后来不知所终。有的说他被送到连山关日军宪兵队杀害了，有的说是被喂狼狗了。他的罪名是心术不正，诬陷好人，欺骗皇军。这个罪名是硬加在他头上的，实则他才是真正被诬陷被欺骗者呢。当然他在受审时挺刑不过，乱咬了本校教员，也是不对的。

这次本溪“思想犯”案件，虽然只死了一个人，但轰动很大，远近皆知。当年夏，我赴沈阳，在火车上遇见安东省伪教育厅科长荆百斛和安东林科中学校长秦有德。他们问及此案，我简略谈谈。荆说：“安奉线（即现沈丹线）是日满的通路，也是日本的生命线，不把这条路线的人镇压伏贴，他们是不安心的。你们这次幸免于难，将来恐怕还会有类似的案件发生。”果然，就在这年秋冬之交，“安东事件”发生。也是以“思想犯”的罪名，大抓知识分子，被抓的大都是教育界人士。当时安东是一个省，管辖许多县，各县有许多人被日伪逮捕，规模之大，被

捕者之多，远非本溪可比。至于结案处理，更与本溪不同。被捕人员有的被杀害，有的被判刑。秦有德被敌人杀害，荆百斛被判12年徒刑。另外，我的同学马福双、兰兆环在通化师范学校当教员也被捕了，结果如何不详。该案结束后，安东省所属各市县的中小学教员奇缺，次年（1937年）春，安东省竟在报上登广告招聘教员，可见该案灾难之重了。

写到这里，我又想起一件小事：

1937年春，在《安东日报》登载招聘小学教员时，有一同学刘凤训（梨树县人）特地到本溪来约我一齐去安东应征。我问他这是为什么？他说："安东事件"已过，那里不会再大抓思想犯了。奉天省（现辽宁省的一部分）可说不定。我们到安东省去是"避危求安"，是明哲保身的办法。我因家室之累太重，没有同意。后来，他是否到安东去，我就不知道了。从这件小事中可见当时的知识分子在日本殖民主义统治下的悲惨处境了！

以上事情是48年前的往事，是我亲身的经历。回忆当年当亡国奴的悲惨遭遇，对比起今天的幸福生活，越发激起热爱社会主义祖国的强烈心情，同时也越发感到加速四化建设，充实国力，抵御外来侵略的重要了。

（摘自《本溪文史资料》第一辑）

黑山师中校事件

周 伦

"黑山师中校"即伪满黑山初级中学，地处"关马井"西

侧。当时，学校挂两个校牌，一是“黑山初级中学”，一是“黑山师范讲习所”，“黑山师中校”是统一简称。事件发生那天，学校正在上课，前前后后，一清二楚，其经过是：

伪满康德3年（1936年）3月中旬，黑山师中校正式开学上课，同学们都怀着喜悦心情来到学校。我是一年新生，因教室未修完暂在食堂上课。开学后第三天早晨刚上一节课时，忽听汽车怪叫几声，刹时把全班同学的注意力吸引到窗外。当时，有两辆大卡车开进校庭，车上载着全副武装的警察，约20多人。卡车刚停，他们就气势汹汹地跳下车把校门禁闭，并奔向各教室。到我们教室的一个日本人，手持战刀，紧跟在后面的一个警察面对教室凶狠地喊叫：“这是几年级？班长是谁？快出来！”是时，全班同学都吓呆了，班主任赵尊谦老师面色苍白地说：“班长快出去。”我刚到门口，日本人嘟噜一阵，翻译就问：“你们上几天课了？”我说：“只上三天课。”又问：“为什么在食堂上课？”我说：“教室没修完呢。”这时翻译跟日本人又嘟噜一阵才让我回屋。当他们离开教室，我抬头往外看时，汽车上绑着不少同学，而且语文老师李晓峰也被绑在车上，不久汽车就开走了。

当天下午我逃回白厂门村大康屯。惟恐不安全，又躲避到钟家沟姑母家。过了17天学校派人找我，到校后，传说二年级以上正副班长有共产党员嫌疑，李晓峰老师是发起人。另外还有教育局长张仰山等都是同案，一起被逮捕了。

事过两个月之后下来通知，说张局长的灵柩明日送回。师生闻此噩讯，无不为之垂泣。翌日清晨师生齐集南门外等候，果见一辆卡车载着黑棺材，停到南门外。当时简单的吊祭一下，王作宾老师读悼词，全体师生泪如雨下！

目睹日本侵略者伙同汉奸对无辜师生所犯罪行，我当时深

感悲愤。

（摘自《黑山县文史资料》第一辑）

“仰山事件”真相

赵昆刚　王荣升整理

“仰山事件”是在日本侵略者蓄意制造“九·一八”事变后的1936年，日本关东军参谋部炮制了“治安肃正”“三年计划大纲”，妄图三年内从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消灭一切抗日力量的前提下发生的。由于日本关东军的部署，相继在满洲国进行全面秘密肃正，黑山“仰山事件”就是日本关东军所属的军警宪特们奉行日本帝国主义政府对中国知识分子残酷关、杀、镇压政策的真实写照。伪大虎山宪兵特务股××（原二道境子教师）、特务傅景山（教师）和黑山县共荣旅馆经理刘××为了泄私愤，趁机合谋密告伪教育局长张仰山等人是“赤化分子”在黑山的代理人；于是伪当局在黑山地区内逮捕了一批无辜的知识分子。这样，一场有预谋的黑山教育界大惨案——“仰山事件”爆发了。

1936年3月某日清晨，黑山县警察署门前架着机枪，街头巷尾都是荷枪实弹的日军守备队。街头上路断人稀，家家关门闭户，人人藏躲不敢喘息；日军捕人的汽车，在街上狂叽猛撞和守备队急促的皮靴声混杂在一起，震撼着黑山全城。黑山教育局长张纯景（字仰山），就在这种恐怖下，以“赤化分子”、“共产党员”、“反满抗日救国会黑山分会长”的莫须有罪名被捕了。是日相继被捕的有：黑山中学校长孙尚海（字冠彬）、语文

教师李遇春（字晓峰）、教育局学务股长张鹤年（字锡龄）等人，被送到大虎山日本宪兵队。事隔两天的深夜，又有大虎山宪兵队的警车开到黑山，逮捕了黑山基督教堂牧师孙益三、仁济医院大夫赵景三、县署财务科长杨振安、基督教徒（女中教员）孙文元、县教育局夫役李忠贤，以及黑山中学学生张宝奇、陈品新、齐维良、李执忠、徐克谦、曹文永、汤维明、李绍武、张桂棠、徐显华等多人。其中张纯景、孙尚海、李遇春、张鹤年系所谓“赤化”重要人物，被关在大虎山宪兵队受严刑审讯。敌人使用一切残酷手段，如灌凉水、打棒子、坐老虎凳等都没逼出口供来。三四天后把张纯景、张鹤年等押送锦州宪兵队。其余被抓捕的教师、医生及部分学生，经审讯后释放了。

大惨案发生后的第六天，又有日本宪兵特务，带着4名警察到教育局办公室搜查张纯景的“赤化材料、进步书籍”及所谓的“共产党”文件，他们把办公室的砖地刨开，但一无所获。之后又到学务股长张鹤年家搜查，吓得张鹤年的老母惊惶万状一病不起，惆吓成疾。

当时黑山全城，戒备森严，十步一岗，五步一哨，日本便衣特务、中国的汉奸腿子，不时出没县署、民宅，人人战战兢兢提心吊胆，时刻担心有被抓捕的危险。

张纯景、孙尚海、张鹤年、李晓峰等被押到锦州宪兵队，关在牢房隔离审讯。日本宪兵特务利用各种残暴手段，施以各种严刑逼供。张纯景被打得皮开肉绽、血肉模糊、死去活来，忍刑不过，屈打成招，竟胡说起来：“我是共产党员……（其实不是。）”最后含恨死于锦州宪兵队的牢房里。

张鹤年被捕后，带上了手铐脚镣，敌人施以酷刑灌凉水，被灌得肺胀腹肿，连身上的毛孔都浸出水珠，但张刚毅坚定，什么口供也没有供认。孙尚海在锦州宪兵队的刑审大狱里，被日

本宪兵摔在砖地上，四个特务“踢皮球”，踢得他在地上翻滚跌爬，深夜在昏迷之中被送到日伪的特设救护医院。当孙尚海清醒时得知：张局长刑伤惨重，含冤已死。而且张在没死之前，日本特高课掌刑者，把他打得鼻青脸肿，身上皮肤好像靛叶一般，最后将他装进麻袋里，几个特务抬起来往砖地上摔，疼得他呼叫不止，在昏迷中胡说一气，屈打成招。张纯景生前关在囚牢里，哀痛地大声疾呼：“我太冤屈了！是谁这样地陷害我呀！”并喊着：“我死后做个冤屈鬼也得报仇呀！”张纯景局长就这样离开了人世。

大惨案幸存者孙尚海说：“我在囚牢里被提出来，这次不是行刑审讯，而是利用精神恐怖的手段，逼我认供。”原来，日本宪兵特务把他拉到活杀中国人的现场让他看。第一场是杀人活剧。事先把训练好的吞噬中国人成性的日本狼犬放出来，扑向绑在狼狗圈桩橛上的中国人，顿时撕开皮肉，扒出五脏六腹，鲜血淋漓地被这些恶犬吞噬着。被吃的所谓满洲犯人痛楚万状，颤抖四肢死去。

第二场杀人活剧更是惨不忍睹。把活人作射击靶子，让几十名新征调来的日本青年小鬼子，练习射击，把几个活生生的中国活人靶子穿得满身弹孔，有的揭开脑壳；有的炸烂胸膛；有的打断双腿；有的没被射死，还在无力呻吟……是可忍，孰不可忍！看后，日本特务凶狠狠地对孙说：“你的！赤化分子！承认的！”“不说的，他们的一样！”孙尚海一时呆若木鸡，三次昏倒在地，被日本宪兵提撑着……

孙尚海在锦州日伪特设救护医院时，亲耳闻他的学生孟昭明（是这所医院唯一的中国护理医生）说：“这所医院明则是救护刑重的犯人，实为解剖活人的场所。近来有几名满洲犯人，用来作解剖手术，作日本医生搞人体解剖的实验，把活生生的中

国人剖腹、切头、剥皮、开膛、一直拿出心肺，人也就停止呼吸了。”还说：“解剖活人都是日本医生干的，不让我参加，这都是我收拾尸骸时得知的。进这所医院能幸免一死真是百里逃一呀！”

黑山中学教员李晓峰被押解到锦州宪兵队后，经数次刑审，身遭种种酷刑，遍体鳞伤，目不忍睹。敌人用火箸（筷子）灼烙胸部与肋间，还用香火熏烧腋下，最后忍刑不过，胡说一通，在严刑逼供下，承认自己曾散布过不满日满亲善的言论，做过“赤化”的演说……后来，被关进锦州大狱，在服刑中死去。

无辜的师中学生李绍武等十几人被送进大虎山宪兵队，也身遭酷刑。他们有的五指缝间夹笔杆，敌人用力紧握，疼得他们哭叫起来；有的双手举椅子，折腾他们；有的打杠子，打嘴巴，口角流血；有的威逼恫吓，被吓得目瞪口呆，精神失常。但谁也没有承认口供。对于抓捕的学生都是经过单独刑讯，直到4月末，家长写来保证书，才被释放出来复学。

此外还有无辜受害者，黑山基督教徒、仁济医院大夫赵景三，经大虎山宪兵队的非刑拷供后，抬回家不久死去。

黑山教育大惨案——“仰山事件”是日本军国主义分子蓄谋炮制的一场大冤案，是日本侵略者与汉奸特务勾结，恶意编造所谓“赤化分子”、“共产党员”名单，在黑山文化知识界搞什么“治安肃正”的一次镇压活动。这场大冤案、大假案波及县署要员及教育界、文化界、宗教界、学生等各方面人士，恐怖笼罩着黑山县城，轰动了辽西各地，震惊辽、吉各省。真是骇人听闻，惨不忍睹。

黑山教育大惨案，亘时两个月之久，惨遭非法刑审的无辜者达20多人，其中受严刑逼供而惨死者3人（张纯景、赵景三、李遇春）。间接惊悸成疾死亡者1人，即张鹤年之母，子被捕母

惊悸成疾，子归而母绝。遇难者家属被惊吓中疯症者2人，即张纯景之妻、孙尚海之妻患精神分裂症，疯癫不语，失去常态。惨遭酷刑身患残疾者3人，有张鹤年，刑后患肺部水瘤症，孙尚海因脑震荡患高血压症，教育局夫役李忠贤，久囚阴湿牢狱，患疝气病。其他被捕人等幸免伤亡。

日本军国主义者为了欺世盗名，掩人耳目，他们居心叵测地装出一副假仁假义嘴脸，以惑群众。如黑山教育局张纯景含冤之死，以棺衾收殓尸体，遣灵柩运回黑山，并令县署副参事官美浓丰吉率县署公职人员及中小学校师生千余人列队出城接灵，并派礼教股长李某与科员高某陪同死者妻属护灵返黑山。接灵人等敬立城外公路两侧，垂首默哀，以示悼念。

"仰山事件"发生后，黑山各界人民无不发指，痛斥日本侵略者的血腥罪行。中国人民同仇敌忾，义愤填膺，更加坚定抗日必胜的信心。

（摘自《黑山县文史资料》第一辑）

七

安东教育惨案

我所知道的“安东事件”始末

王贤沛

“安东报国会”事件的起因

“报国会”的由来

“九·一八”事变后，东边镇守使于芷山所属步兵第一团，驻在凤城县，团长姜全我投降日本侵略者，团副唐聚伍则率一部军队抗日，任抗日军总司令，号召爱国人士起来抗日，东边道一带各县爱国人士，群起响应，并以“报国会”名义，向抗日军捐赠军费。

孙文敷向锦州汇款的原因

在“九·一八”事变后，辽宁省政府迁至锦州，成立临时辽宁省政府，和日军还没有侵占的各省、市、县尚有联络。当时的安东县长孙文敷，在日军还没有完全进驻安东县时，曾以“报国会”名义，向锦州临时辽宁省政府汇款25万元奉票。这笔款，是由安东商务会经手，用商业上转帐的方法汇去的。因为“九·一八”后当时的银行汇兑业务停止。孙文敷的意思，是认为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为不能长久，中国不能放弃东北不管，辽宁省政府还有回来的那一天。但是他已任伪职，又不敢明用安东县长的名义。因此，孙文敷委托安东县教育会长秦某，与安东商务会联络商洽。以“报国会”名义汇款，以表示自己忠于旧主的意思。

安东商务会内添日本顾问

1934年，伪满政权的组织机构改革，增设安东省，安东县成为伪安东省的首县，安东省公署设在安东市内。这时，各个伪机关内，都有日本人参加把持，唯有民间团休的商务会组织内，还没有日本人参加，特别是安东县是柞蚕丝生产集中的场所，各商家也很殷实，商务会也很富足。日本帝国主义为了榨取掠夺，必须把握各行业的业务情况，首先必须把商务会把握在手中。所以在1935年，日本殖民者通过伪省实业厅长在安东商务会内添设一名日本预问，参与安东商务会内部事务。同时，还有数名日本人参加到商务会内办公，他们在商务会的帐内查出了汇往锦州的一笔款。查的结果，是安东报国会汇给锦州临时辽宁省政府的。

安东报国会事件的经过

阴谋计划

自“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者感到东北人民抗日爱国的思想，无法制止，特别是东边道一带，抗日部队出没无常，使日军受到严重的打击，所谓反满抗日的思想行动，甚为炽烈。日本殖民当局想用镇压的方法，消灭中国人的“反满抗日”思想，但又无词可借。正在这个时候，发现了报国会汇款的事，便阴谋计划假借“报国会”的名义，扩大范围，杀一儆众，镇压中国人民的抗日爱国思想。于是他们组织了以日本特务机关、日本宪兵队为主体，有伪安东省公署警务厅、伪满军安东地区司令部、伪满军宪兵团参加的临时治安维持委员会。

逮　捕

1936年秋，日本安东宪兵队，以“反满抗日”的报国会事件为名，逮捕安东县教育会长秦某，安东林科中学校校长关某，继之，逮捕了已任伪安东省公署教育厅长的孙文敷，安东省公

署教育厅礼教科长荆可图，并逐渐扩大，凡是伪安东省所属旧东边道各县的教育界人士，大批被逮捕。据说，被日本宪兵队逮捕的人，在毒刑拷打讯问下，根本说不出“报国会”的具体情况，甚至不知“报国会”是一个什么组织。担任审讯的人，即告诉被审讯的人说：“你只要说出两个人的名字，就不追究你了。”被审讯的人苦于毒刑，只好说出两个自己所熟悉的人名，宪兵队即逮捕这两个人，这两个人再说出4个人名来。就这样，日本宪兵队先后共逮捕了约三四百人。当时所有东边道一带的教育界人士，被捕的被捕、跑的跑，以致教育一时成了半停止的状态。事情经过约有一年，到1937年春，才结束了这一惨案。

我和甲斐的谈话

在1937年，我以伪安东省公署民政厅行政科长的身份，到伪省管下各县视察村行政，约有一个多星期的时间才回来。我家里告诉我，连续两天有人来电话问王科长在家么？问他是哪里时，没有答复，电话就挂上了。这时，正是以报国会为名大批逮捕人的时候，人心惶惶不安，怕被牵连逮捕；又由于有两次无名电话，语气很不客气，家里感到害怕，嘱咐我打听打听。我到民政厅当行政科长，是由于岩间德也的介绍（岩间，是我父亲王永江当奉天省长时的顾问），他曾嘱托伪安东省公署总务厅总务科长甲斐在政治上关照我。现在，我只有找他去打听。

在我告诉甲斐关于电话的事，是否与报国会事件有关联的时候，他笑了，说：“报国会事件里有你。”我说：“有我，怎么未逮捕我？”他说：“约在半月前，被宪兵队逮捕的人说有你。但是，我知道你以前没到过安东，你和孙文敷他们都不认识，我曾见过宪兵队长和特务机关长，他们已经谅解了，决定没有你的关系，你放心吧。明天我同你到特务机关长那里，谢谢他对你的关照，你不必对别人讲，就当没有这个事就算了。”

我和田中义男的谈话

我同甲斐一块去见日本安东特务机关长田中义男。甲斐说：王贤沣特来谢机关长对他的关照。我当即表示了感谢的意思。田中说："我听甲斐君说，你是王永江的儿子，王永江是有名的政治家，你将来是有前途的人，我们对于你一定要特别的照看，决不能让你受坏人的牵连，你安心吧，没有问题。"

我和谷口的谈话

过两天后，我同甲斐一块去见日本宪兵队长谷口，谷口说："特务机关长说你是王永江的儿子，是满洲国有前途的人，不能让你受坏人的牵连。但是你要谨慎，我们还要调查。你知道，满洲国是日满协和、一德一心建设王道乐土，决不允许有'反满抗日'的分子存在，报国会是'反满抗日'的组织，妨碍我们建设王道乐土，不把这些人清除，满洲国不能安全，宪兵队负有维持满洲国安全建设王道乐土的责任，所以根据事实，检举了一部分坏人，大部是知识分子，是有思想的，是妨碍满洲国建设王道乐土的。若不办，满洲国的建设、安全就谈不到了。既然特务机关长这样说了，我没有什么意见。"甲斐说："请队长安心，我保证王君决不是那样人。"谷口说："好。"我又表示了感谢的意思。

轰动全伪满的安东报国会事件，于1937年春结束。1937年2月，孙文敷等10余人被判死刑。其余的人，经伪满法院分别判处徒刑的约有五六十人。在日本宪兵队内，被刑讯致死的据说也有约50余人。

“安东教育事件”大惨案

马腾云　李鹤云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南京政府推行不抵抗政策，遂将我大好河山沦入日本帝国主义之手。我东北人民，在日本侵略者的铁蹄下，受尽蹂躏与苦难。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杨靖宇、邓铁梅、苗可秀等，先后在安东（今丹东）地区燃起抗日烽火；广大爱国知识分子，不甘心当亡国奴，以各种形式，向民众作抗日救国的宣传。日本帝国主义为了维持其法西斯反动统治，采取高压手段，一方面向我抗日武装力量进行残酷扫荡，一方面大肆逮捕爱国知识分子，进行血腥镇压，制造了震惊全国的“安东教育事件”大惨案。现根据蒙难的幸存者的回忆及部分档案材料，整理出这一事件的梗概，供历史研究及教育后代的参考。

事件发生的时间和波及的地区

“安东教育事件”发生在1936年冬（即民国25年，伪满康德3年）延续到1937年春天。日本侵略者以“肃清东边道[①]救国会”为借口，以安东宪兵队为首，从1936年11月12日（阴历九月二十九日）开始，到翌年1月7日（阴历十一月二十五日），在安东、凤城、岫岩、宽甸、庄河、桓仁、通化、临江、长白等县，大肆搜捕省、县教育厅（局）长、会长、中、小学

① 东边道系清末民初的旧行政区划。辖安东、凤城、岫岩、宽甸、庄河、桓仁、通化、临江等沿江各县。

校长、教务主任等及部分商界、财界人士达300余人。当时，安东属省城，被捕者又绝大多数服务于教育界，故人们习惯称之为“安东教育事件”。

事件的起因

“安东教育事件”的起因是比较复杂的。总的来看，是日本侵略者为了强化其反动统治，对具有爱国反满抗日思想的教育界、知识界的一次血腥大镇压。其借口是“肃清东边道救国会”。

“九·一八”事变后，流亡在北平（今北京）的东北爱国志士高崇民、阎宝航、杜重远、车向忱、卢广绩等，成立了“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简称救国会），并把这个组织逐渐扩展到东北各地。据说，原安东林科中学校长李献廷接受北平救国会的指示，1932年返回安东活动。他与当时安东省教育会会长、林科中学校长秦有德陈述了心情，秦积极赞成，并通过工商界以日本函馆地震救灾的名义，为救国会募集资金。1935年12月20日，安东省教育厅举行中学教员鉴定会。在林科中学，秦有德秘密劝导各界以教育界为中心组织分会。听说，除抚松县外，安东省境内先后都组织了分会。由于这个组织是秘密的，筹集资金是通过教育会进行的，大多数人是不知道的。

1936年，救国会事机不密，被汉奸出卖。桓仁有个盖洪洲，他哥哥叫盖维新，曾在张学良的兵工厂工作，乡里有什么难办的事，常常求托于盖洪洲，地方一些豪绅也很器重他。“九·一八”事变后，张学良退入关内，盖洪洲的身价亦日趋衰落，常受一些绅士的冷遇，盖因而不满，当他得知该县绅士金巨廷和救国会经济上有联系后，就写黑信告密，把信交给宪兵队翻译，要他转给宪兵队长砂本。翻译看了信后，没把信直接交给砂本，却

先给金巨廷看了，想借此勒索。但金看翻译的意图，怕他以此为把柄继续要挟，就拒不承认。翻译变了脸，把信交给了砂本，金巨廷等人便被宪兵队捕押起来。经过严刑逼供，金招认了。日本宪兵队便在桓仁搜捕了100多人。其中有个叫李大华，曾任安东县教育局视学，李在严刑下又供出同安东县教育局有联系的人，于是，事件波及到安东。

疯狂的搜捕

1936年11月12日（阴历九月二十九日）夜间，安东县日本宪兵队突然把县教育局长邓士仁的住宅围住，凶神恶煞似地闯入室内，枪口直逼邓的胸口，大肆翻箱倒柜，片纸只字也不肯放过。从凌晨3点多钟搜到近6点钟，一无所获，便把邓绑走了。同时被捕的还有安东县教育会长、金汤小学校长张镇藩，安东县教育会副会长、新安街小学校长于学礼，安东县第四小学校长单荣道等。搜捕时，把他们的书籍，连同办公桌抽屉全都拿回宪兵队，带不走的大卷柜贴上封条。当晚捕的还有安东省林科中学校长秦有德。秦家住的是一座二进院，半夜凌晨1时许，秦家铃响了，秦与妻子去开门。秦妻问："谁?"外边答的口音不明。当秦妻开门时，秦便乘机藏在大门后边，敌人直奔内院，秦暂逃脱，藏于东坎子一位姓姜的家里（后经友人孔昭鹦又转到英国楼地下室。不久，秦被汉奸秦有君密报宪兵队，后被捕入狱）。敌人没有抓到秦有德，便把秦妻和儿子一起抓去，并搜查了秦在林校的办公室。在这段时间里，到处一片白色恐怖，宪兵队、警察署的小汽车横冲直撞，有时敌人将小汽车开到学校院内，指名逮捕；有的趁下班将人带走；有的在路上被截走，并警告家人和同仁不得声张。第一批被日本宪兵队逮捕的还有满商小学校长马仁田、安东县第一小学教务主任褚永康、省林科

中学教务主任李庆善、训育主任侯泽麟、安东省教育厅长孙文敷、安东总商会长孙朗轩、图书馆长宋子云、讲研所长孙德润、教育局学务股长刘国安等42人。11月15日，日本宪兵队检查了商立小学的书籍，下午逮捕了该校校长刘景芳，接着又开始第二次逮捕。11月16日下午，两个日本宪兵和一个翻译坐着小汽车到安东县第二小学，问校长迟学禹："你是校长吗?"迟说："凑数。"翻译说："宪兵队请你去有点事。"就把迟抓走了。当车到了安东省警察厅，就把迟押到一个地下室。日本宪兵冈田拍了拍迟的肩膀，用半生不熟的中国话假惺惺地说："你的朋友大大的。"迟一看，有各学校的校长、教育局的事务员30多人。12月3日，又继续逮捕了金汤小学教员陈仁轩、朝阳小学教员张仁凤、林科中学教员佟进阶。不久，又逮捕了中央银行安东支行行长淳于喜亮等多人。

与此同时，日本侵略者在各县也大肆搜捕。12月14日夜间，岫岩守备队长藤井率部倾巢而出，逮捕了男、女中学校长关英华、赵书纬、教务主任曹甫瀛、训育主任谢忠厚、教员孔昭伦、寇绍准及教育局长江敦友、教育会长关桂生、内务局长夏渔生、农务会长于瑞庭、商务会长王凤武、财务局长李乃臣等多人。

在宽甸逮捕的有：宽甸县教育会长、县师中小学校长丛树春、职业中学校长吴凤宸、县女中校长邹绍南、县财务局长栾继先、县内务局长杨春华、商务会长李铭三、万字会长王冠五、农务会长吕武臣、商务会副会长徐静波、马如九、中央银行宽甸支行经理李世瀛、县城街长唐荫阶、职业中学教师李季等人。

凤城县被捕的有：教育局长何泮林、中学校长李云霖、女中教务主任袁中怡、第一小学校长关子荣、职业中学校长左秀海、第三小学校长姜振昌、第四小学校长马庆贵、第五小学校

长李绍岩、第三小学教务主任赵际清、商务会长白宝山等。

据不完全统计，被日军逮捕的安东97人，宽甸21人，凤城19人，岫岩14人，桓仁115人，通化26人，庄河14人，辑安3人，临江、长白各1人，合计311人。

严刑逼供与英勇斗争

日本侵略者以“思想犯”、“国事犯”罪名逮捕的这批人，都由宪兵队“突击”提审和严刑逼供。11月17日下午提审刘景芳，问他做过什么事，刘说：“教书，没做过别的事。”这时，敌人就吩咐打手把刘的头、手、脚绑在一个长凳上，用水壶往他鼻子里灌凉水，刘不招认，被打得死去活来。18日上午，又继续对刘施刑，把刘的两手背到身后绑紧吊起来拷打，刘仍不开口。敌人又用一根杠子压在刘的小腿上，开始上去两个人压，后增加到4人、6人、8人。只听“咔嚓”一声，刘痛得昏厥过去。苏醒后，腿断了。在提审迟学禹时，迟不讲，7个日本宪兵就把他吊起来，用铁棍、竹板，从上身打到下身，边打边吼：“你的说话!”直打得迟不能动了，才放下来踢到墙角里，再审问另一人。豺狼成性的日本侵略者，审讯时用尽了各种酷刑，灌凉水、压杠子、用竹尖刺指甲、用烧红的炉钩子烫全身，有的还把人打得血肉模糊后扔到狼狗圈里喂狼狗，真是惨无人道，灭绝人性。

在严刑逼供下，许多人表现出“身受囹圄苦，救国志不移”的伟大爱国主义的英勇气概。安东县第一小学教务主任褚永康被捕后，用手指在毯子上划“不知道”给难友们看，积极准备与敌人斗争。11月14日审讯邓士仁时，邓宁死不讲，日本宪兵就用地板刷子把邓的头按到水锅里灌凉水，活活地把邓折磨死了。曹甫瀛被捕后，借孩子送饭之机，悄声让孩子转告家属：“一要立志，二要放心。”当曹被拉回原教室让曹上课，敌

人拍照取证时，曹还向学生发出“不当亡国奴”的庄严号召。曹被日本鬼子昼夜审讯，打得遍体鳞伤，终未变节。于瑞庭被审讯时，不但不供认．并怒骂敌人“口唱王道，实是霸道”，被敌人活活打死。关英华在敌人严刑拷打下，义愤填胸，他乘敌人不备，抓过案上的刀，直向敌人砍去，当场壮烈成仁……

面对英雄的中华儿女，敌人残暴的手段失灵后，又换了新的花招，妄图软化蒙难者，这一手又被大家识破了。王奉璋被连灌四次凉水，没有问出个子午卯酉时，有个翻译便凑到王跟前说：“救国会，日本人也知道不一定有，但这是日本的国策，你若老不承认，把你打个腿断胳膊折，出去是个残废，你不如轻溜溜地承认点，判上几年徒刑出去，还能做点什么。”但王奉璋心里有数，不论敌人怎样花言巧语，始终没有上当。敌人第五次审讯林贵家时，日本人没露面，让两个翻译把林领到街上一家商店客房里，桌上摆有香烟、苹果、茶水。林一进去，敌人就以宾客相待，说什么这些日子让林受罪了，并说：“我们看你是个好人，想设法把你救出去。”林问：“你们能用什么法子把我救出去？”翻译说：“你就把救国会里都是谁，你们募捐了多少钱，在哪儿存的，你告诉我们，今晚就放你回家，照常当你的女师校长。”林说：“生死我都不考虑，任凭你们处置。”两个家伙一看达不到目的，又把林押回去。

惨无人道的日本侵略者，为了逼供，什么伤天害理的事也能干出来。他们给秦有德的儿子灌辣椒面时，让90多岁的祖母在一旁看着；还每天毒打秦的8岁女儿，问东问西。8岁的孩子，她能知道什么呢？孩子被打得直哭叫，险些双目失明。90高龄的秦母，在敌人酷刑下，心身受尽了折磨，坚贞不屈。王贡生受刑时，其不懂事的孩子王明鼎不忍看着其父亲备受摧残，便劝其父招认算了，其父厉声说：“大丈夫生而何欢，死而何惧？”

大义凛然，忠贞不屈，被日本侵略者活活打死。

在日伪严刑逼供下，也有人在敌人写好的供词上划了押，承认拿过教育捐，但不知那是给救国会的。安东总商会的会长孙朗轩在敌人严刑逼供下说："各商号捐的款都是我转给救国会的，下边他们并不知道此事。"他一个人承担了。

奉天陆军军法处的无理宣判

1936年年末的一个阴沉沉的午夜，街上行人绝迹。冰天雪地，全市电灯骤然全部熄灭，日伪宪警，如临大敌，荷枪实弹，晃着刺刀，把安东52名蒙难者，两人绑在一起，押到火车站。蒙住头，装上开往奉天（今沈阳）的闷罐车，到了奉天北站，又被押上汽车，解往奉天陆军监狱。

到了奉天监狱，全给带上脚镣，一个屋里关押3到5人。开始，什么也没问，一天两顿饭。早晨高粱米稀饭，晚上高粱米干饭，半碗菜汤。

6天后，陆军军法处开庭审理。一个日本鬼子，一个翻译。一个一个地提审，主要问参加什么组织，有多少人。有一次，法官在提审宋安东时问道："你何时加入救国会的?"宋答："没参加。"法官问："那你为什么在安东宪兵队承认参加了，还划了押。"宋说："回法官话，在严刑下不得不承认。就是法官你在严刑下也得承认。"呛得法官什么也说不上来，只得把宋安东押回狱中。在提审迟学禹时，法官问："救国会谁是头。"迟答："没参加救国会，不知谁是头。"法官问："在安东宪兵队怎么说参加了呢?"迟说："那是打得实在受不了，说的假话。"法官无奈也只得叫迟下去。

尽管日伪什么材料也没有问出来。但是，他们仍是按照他们的既定国策干下去。

阴历腊月二十六日吃晚饭的时候，一看守宣布说："明天要宣判安东县的了。"单荣道听后，知道自己是必死无疑的，就对看守说："请您行个方便，给我一点纸，写个信，叫家中来人收尸。"看守给了他十多张纸，他写了信。李勤业也写了家信，给看守一些钱，叫看守把信邮走了。

第二天上午，陆军监狱的院子里布满了全副武装的军警。军法处一个科长到囚房外大喊："大家把行李整理好。"不一会儿，叫万寿紫、林云庭、王奉璋等19人出监，押到法庭。法庭是一个大屋子，台上有20多个日本军官，只有一个中国人，王某，系军法处长。他宣布万寿紫等19人判处有期徒刑5年，予以缓刑，当场释放。万等被摘下镣铐，领出法庭，站在监狱院内。接着喊刘景芳、钟树瑞等14人，宣布判处有期徒刑13年4个月。第三批是迟学禹、于学礼、侯泽麟、荆百斛等19人，宣布判处15年徒刑。最后一批，军警用枪口对着蒙难者，押到法庭，宣布孙文敷、秦有德、张镇藩等11人为极刑。宣判后，由法警一个个架着难友推上刑车。孙朗轩大骂日本鬼子："你们末日到啦！"临刑时孙态度镇静，高呼："中华民族万岁！"从容就义。

接着，安东日本宪兵队交给县公署死者名单一份，叫转告各家去奉天领尸，并告诉不准家人哭泣。蒙难者家属闻之，个个泣不成声。他们赶到沈阳大西关姜公祠一看，亲人已面容皆非，血肉模糊，被装在几块烂木板钉的棺材里，上面写着死者姓名。家属欲哭不准，只有含恨啜泣。家属在索取衣物时，件件都是血迹斑斑，不忍一一过目。但是，中华民族是不能被征服的，广大民众是站在死难者一边的。有的过往行人，见死者家属悲痛欲绝，怕日本侵略者再加害于亲属，便把他们扶到僻静之处，劝其早归，免得再出是非。当死难者的棺木过往时，行人无不唉声叹息，对死难者家属投来同情的眼光。

抚顺监狱里的非人折磨

在奉天军法处非法宣判的10到20年徒刑的，很快被转到抚顺监狱，约有80多人。安东县21人。侵略者唯恐这些人再图谋不轨，便都给戴上四五斤以至八九斤的脚镣，而且不分昼夜地让戴在身上。开始关在一个大屋子里，白天都整天坐在木板上，不准歪头斜脑，更不准讲话和看书报。不仅大小便需要报告，就是咳嗽、吐痰，晚间睡觉翻身，也得报告。有时，有人出口粗气，看守便吼道："你心里想什么，要跑吗?"穷凶极恶，如狼似虎。监内伙食，十分粗劣。一日三餐，全是带霉味的高粱米稀饭，白菜、萝卜不洗干净就下了锅，既不卫生，又吃不饱。1937年春天，监狱里发生了热病，仅"安东教育事件"一案里的难友就死了15人。有的还没断气，敌人就用被子给蒙住，促其死亡，然后把值钱的衣物抢去。监狱里的看守，常常勒索受难者，让向家中要钱给他们使用。有的人家中无钱，无奈就将衣物给看守，以求看管得松一些。

在狱中，蒙难者亦不屈从敌人的淫威。饭食不堪入口，难友们就串通一起向监狱当局提出要求，允许家属给送"簿子"(即送吃的)，经过斗争，当局不得不答应，这对一些人得以活着出狱，不能不算是原因之一。平时，难友们互相体贴，互相照顾。一年之后，让受难者到工厂里干活，但脚镣仍然不分昼夜戴在腿上，有的就磨破皮、腿肿，肉里出现紫斑，难友们就向家里要些药物和食品，帮助渡过难关。安东县教育局事务员刘长德腿肿了，迟学禹就给他搓治，刘景芳就背着他上下工。难友们互爱互助，坚持活下去，要亲眼看看侵略者的末日。

一切反动派都是惯用大棒加胡萝卜的反革命两手的，日本侵略者也不例外。他们一方面对具有爱国思想的志士采取残酷

的镇压手段，一方面又虚伪的搞“减刑”。第一次是伪满傀儡皇帝访日，减余刑四分之一，以后庆祝日本纪元两千六百年，日军轰炸美国珍珠港成功等，又减了三次，各减余刑的四分之一。这样，大多数是1943年前后出狱的。有的出狱时已气息奄奄，如凤城第四小学校长马庆贵出狱后即死亡。有的精神失常，有的剃发为僧，光复后才还俗。进抚顺监狱时多人，活着出来的只有三四十人了。

光复后的控诉

1945年“八·一五”光复，“九·三”胜利后，安东成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民主政府。为怀念这一事件的受害者，中共安东省委曾在友谊电影院召开千人大会。会上死难者家属及蒙难幸存者，进行了血泪控诉，当场处决了罪恶累累的伪安东省视学官等三名罪犯，为人民和死难者报了仇，雪了恨，并对秦有德等家属，发放抚恤金。1946年在鸭绿江造纸厂又召开类似大会。1948年安东第二次解放后，市公安局处决了27名反革命罪犯，汉奸秦有君等受到了应有的镇压。

“安东教育事件”的殉难者的血没有白流，人民将永远怀念抗日救国的英烈们！

（摘自《丹东文史资料》第三辑）

教　育　惨　案

——庄河抗日救国会纪实

庄河县政协文史办公室

1936年冬至1937年春，在日本帝国主义白色恐怖下的安东省，发生了一起骇人听闻的屠杀爱国知识分子事件。受难者除政界、工商界的少数人之外，多为教育界内部曾参加过抗日救国活动的中小学校长、中学教师等。因此，后来的人们都习惯地称之为“安东教育事件”，或谓之“安东教育惨案”、“安东教育救国会”案件。

庄河县当时属安东省管辖，也是“安东教育参案”波及较为严重的区域之一。本县境内的一些有民族气节的爱国人士，特别是教育界有声望的爱国人士，在这一案件中，成为当然的罹难者。辽宁省档案馆的敌伪档案，把庄河参与这一事件的抗日组织叫做“北平救国会庄河分会”，庄河本地称之为“庄河抗日救国会”。

庄河抗日救国会的渊源，应追溯到“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或“辽宁抗日义勇军”的历史。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面对着国土沦亡，故乡父老兄弟被奴役被杀害的凄惨情景，去往北平（北京）的原东北各界爱国人士杜重远、阎宝航、高崇民、车向忱、王化一等，在原东北军爱国将领张学良支持下，于9月27日成立了东北民众救国会。逃亡到北平的东北大学、冯庸大学的青年学生500多

人，蜂拥加了入这个组织。在此期间，庄河县在东北大学和冯庸大学读书的学生郑地令、华春深、李树春等，也随着学校南迁流亡到了北平，参加了“收复东北打回老家去”的示威游行，同时参加了向张学良将军和南京政府的请愿活动。后来，在庄河中学读书的吕其恩、吕其惠、吕其善、吕其恕、吕善昌、王玉地、于世英、吴广运、姜悦勋等中学生亦陆续流亡到山东、北平等地读书，探求救国道路。这些远离故乡的流亡学生，在东北民众救国会所组织的“抗日救亡，复土还乡”的爱国活动中受到了爱国主义的熏陶，为后来的抗日救国思想，首先能在庄河的知识界得以迅速传播，以致庄河抗日义勇军的建立，开辟了道路。

为了宣传抗日救国道理，深入到东北故乡开展救亡活动，原东北大学教师车向忱受东北民众救国会的委托，化装成药房先生，原在东北大学读书的宋黎和另一个姓李的学生化装成两个徒弟，于1931年底从天津塘沽乘日本“天潮丸”轮船出关，在大连登陆。沿途来到皮口、庄河等地，向知识分子、农民群众和原东北军旧部宣传抗日救国思想，揭露蒋介石卖国求荣的丑恶行径，以唤起人民大众的觉醒。为在安东省教育界成立抗日救国会或义勇军打下了思想基础，1932年，东北民众救国会又派遣原安东林科学校校长李献廷返回安东，假装亲日，暗地联络教育界人士，组织抗日救亡活动。

1933年春，安东省教育界“有力同心者”于安东图书馆秘密集会，成立了北平救国会安东分会。安东林科学校校长秦有德为会长，安东省教育厅长孙文敷（字斗南）为名誉会长。救国会的宗旨是：抗击日寇，收复东北。

据庄河县第一、二届政协副主席林贵家（字省三、曾任伪庄河女子师范学校校长）在“文化大革命”前遗稿中记载，及

东沟县同案难友迟学禹（东沟县上届人大副主任）老人提供：北平救国会安东分会名誉会长孙文敷，于康德2年（1935年）12月20日，利用省教育厅长的地位，将出席安东省教育厅举行的中学教师鉴定会议的13名代表，召集到安东林科学校，秘密集会。庄河县出席这次会议的代表是宋良忱（伪庄河县教育局长兼两级中学校长）和林贵家。这次会议又进一步完善了北平救国会安东分会组织。会议还部署安东省所属各县要立即组织起“以县教育局长及其教育界人士，农、商会长和其他官民有力者为中心”的抗日救国会。会议期间，孙文敷抓紧时机，趁晚间暗地邀请同他亲近的人，来到他家秘密策划抗日救国的具体事项。宋良忱是被邀请的亲近者之一。历时5天的中学教师鉴定代表会议，实质上变成了策动抗日救国的秘密会议。

宋良忱、林贵家回县之后，马上着手抗日救国会的组织筹备工作。1936年春，宋、林召集以教育界为主的某些人士会议，成立了庄河抗日救国会。会上，大家一致赞同秦有德和孙文敷为北平救国会安东分会的主要领导人（孙当年毕业于日本东京士官学校，曾是杨宇霆、阎锡山、孙传芳的同学，但也一度厌恶杨宇霆等迷于官廷，只顾争权夺利，不顾百姓死活的丑恶行为。他在民国14—17年间任庄河县长时，努力兴办教育。在县内曾得到“廉洁清风两袖”的赞誉。因此，在教育界享有较高威望。

庄河抗日救国会由13人组成。宋良忱任会长，伪庄河县政府内务局长杨维峤任副会长。下设4个部，每个部由一个部长和1～2名干事组成：

宣传部长：林贵家。下设两名干事是：伪庄河县教育局礼教股股长许三辰（别名许子扬）、伪庄河两级中学训育主任张彦果（别名张季实）。

总务部长：杨维嶠兼任。下设1名干事，由伪庄河县教育局科员于心泉（别名于德渊）担任。

组织部长：戚景龙（伪庄河两级中学教务主任）。下设2名干事是：伪大孤山第三小学校长王道权（别名王宪五）、伪庄河职业学校、即庄河农业中学校长孙俊卿（字任秀）。

监察部长：姜雅亭（伪庄河县商务会长、私营“同力和”商号经理）。下设2名干事是：伪庄河县教育会长兼第一小学校长孙孝先（字辑武）、伪庄河县警务科长王俊峰。

另有伪庄河县大孤山第二中学校长徐成章（字锦轩）也是抗日救国会的主要成员。

庄河抗日救国会成立的时候，庄、岫、凤一带的抗日斗争活动仍在继续，从日本的正规军到以李寿山为头子的汉奸武装——大同队均遭到抗日义勇军的严厉打击，日伪统治集团的嚣张气焰大大削弱。为了配合抗日义勇军的斗争，狠狠地打击日伪军，庄河抗日救国会一面抓紧发展组织，一面积极地开展抗日救亡活动。

庄河抗日救国会，从开始的500多人，发展到700多人，抗日救国会的成员中除少数各界有名望人士之外，其主要对象是中、小学校长，中、小学教员。县教育会的领导，把全县参加教育会的中、小学教师全部转入了抗日救国会组织，并将每人每年缴纳2元钱的教育会费直接转为抗日救国会会费。

康德3年（1936年）4月，庄河抗日救国会召集救国会的主要成员会议，会议是宋良忱、杨维嶠主持的。这次会议着重动员募集捐款，议定将一部分捐款支援北平救国会安东分会，一部分捐款支援东边道的抗日义勇军。时隔不久，庄河抗日救国会得知邓铁梅余部欲来庄河的消息，遂布置会员作好迎接准备工作。

接着，庄河抗日救国会又在庄河县教育局召开了会议，会议的主持者是宋良忱。这次会议，主要是研究决定从全县参加教育会的中、小学教师每人每年40～80元的工资补助款里扣留5%，名义是补充教学经费不足，实质上是作为救国会的捐款，共凑集了7 000多元；县工商会凑集捐款3 000多元；有的救国会会员还额外地捐了一些，如宋良忱个人就捐款300元。总计募集捐款1.058万元。

1936年6月至8月，原邓铁梅余部的一名营长李子英，以贩卖大烟为名，两次来庄河，经宋良忱、姜亚亭批准领取募捐款3 500元。他们有了捐款，后来在北平救国会的支持下，购买了一些枪支弹药，加强了义勇军的武器装备，增强了战斗力。庄河抗日救国会，还通过安东救国分会的关系支援俗称北大林区即杨靖宇所属的抗联部队2 500元捐款。

庄河抗日救国会事件的暴露是同安东救国分会遇难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其总的原因是日本侵略者为了肃清“东边道抗日救国会组织”，镇压抗日义勇军，熄灭反满抗日怒火。

抗日救国会被日本侵略者洗劫的导火索有两种说法：

(1)据历史资料记载，事件首先是从桓仁县开始破露。1936年9月17日日伪警务机关在侦察中偶然发现，东北人民革命军总司令杨靖宇的副官李相山派遣到地方的工作队员冷遇春潜入桓仁县城，谋划征收义务费，立即将其逮捕，审讯过程中，潜入本县活动的另外两名工作队员，以及本县绅士吴凤兴、孟继一、孟广心的募捐活动也被发现，遂被逮捕。

(2)迟学禹等当时被难者提供，“九·一八”事变前，桓仁县有个铁匠，叫盖洪洲，他哥哥盖维新在张学良的兵工厂工作。该县的一些绅士经常通过盖洪洲托其哥哥盖维新帮助解决一些难办的事情。因此，盖洪洲在桓仁县内曾一度受到一些绅士的

推崇。“九·一八”事变后，盖维新随张学良进到关内。这时，倚仗其哥哥的势力，风行一时的盖洪洲失去了直接为故乡绅士们办事的机会，自然落了威并遭到绅士们的冷遇。盖洪洲因此便怀恨在心。当盖洪洲在偶然中得知桓仁县绅士金巨廷等人在抗日救国会的策动下为抗日义勇军提供捐款时，觉得发泄私愤机会已到，立即托人写信，密告金巨廷等参加救国会。金巨廷等就这样被宪兵队捕押起来。接着，以桓仁县教育界为主的救国会成员近百人被捕。这股大逮捕的阴风很快波及到安东省城及其所属各县。

1936年11月中旬，安东省教育厅长、抗日救国会的名誉会长孙文敷、安东省总商会长孙朗轩、图书馆长宋子云、讲研所长孙德润、教育局学务股长刘国安、教育局会计王宝瑋等多人被捕。在搜捕过程中，宪兵们从安东省教育厅一名姓孙的科员的办公桌里发现了救国会名单，这就成了日本侵略者大规模逮捕的把柄。北平救国会安东分会就此基本瓦解。

搜捕抗日救国会的风暴很快卷进庄河。1937年元旦，驻扎在庄河城内的日本宪兵队，使出了阴险狡猾的花招逮捕爱国志士。他们首先来到宋良忱家门外，声称请宋良忱参加县政府的元旦宴会。一入宋家院内，凶相立即暴露，遂以“反满抗日”的罪名将宋良忱逮捕。5天之后（元月7日），日本宪兵队用类似的手段先后把杨维嶓、孙俊卿、姜雅亭、徐成章、林贵家、王道权、戚景龙、张彦果、王俊峰、于心泉、许三辰，孙孝先、刘德武逮捕。其中刘德武当时释放，余者13名全部被押进了庄河县城日本领事馆（现为庄河县幼儿园所在地）。

逮捕风暴过后，整个庄河县城到处是万马齐喑的悲凉景象。人们面面相觑，不敢集结，更不敢议论国事。在一段时间里，两名日本宪兵每天早晨都站在庄河中学的校门口，手持刺刀闪闪

发光的大枪，怒目监视着来校的师生。师生们既不能随意溜出校门，又无法安心上课。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被鬼子戴上“国事嫌疑犯”的帽子。一时间，活泼欢快的校园失去了朗朗的读书声，代之而来的，是师生们憎恨和仇视日伪野蛮统治的情绪愈来愈浓。

事隔不久，日系东繁人进入了庄河中学任副校长、教师等职，原校英文教师田肇履任校长。领事馆的特务、日本宪兵天天出入学校翻箱倒柜，搜查书籍。除教科书之外，几乎“非秦籍皆焚之”。嗜书如命的青年学生，含着热泪，把心爱的书投进火中。天后宫（旧庄河中学宿舍院内）前的三个大鼎，通宵达旦，书烟弥漫。年逾古稀的姜悦鹏老人（庄河中学退休语文教师）回忆这段凄惨历史，甚感悲切激动。他说：“我手中保存的一部英汉大辞典，就是在那时候被强令扔进火堆烧掉的。”

1937年3月13日（农历二月初一），被判处极刑的宋良忱、杨维峤等6名爱国志士，于奉天南门外浑河岸上被日本侵略者杀害。

杨维峤临刑前在一个火柴盒上写下一首短诗，转给前去奉天收殓尸体的亲属于鸿沚（字晌洲）。诗曰：

生儒死僧证本性，

晨钟暮鼓起斯文。

6位死难者的尸首，有的就地掩埋，有的由家属或亲友设法运回了家乡。杨维峤的尸体经亲属于鸿沚回旋周折运回了故乡，并遵照他的遗愿，埋在庄河城北老爷庙岭。据其弟杨维嶂回忆，墓碑上镌刻着“东北大学文学士杨维峤之墓”等字。

侵略者为了笼络人心，玩弄王道乐土的伎俩，对在抚顺监狱服刑的所谓“叛徒”，先后施行了二至三次减刑，历经几次减刑，不少人得到提前出狱。庄河县同去抚顺监狱的，除了张彦

果被折磨死于狱中之外，余者林贵家、戚景龙等，于1945年“八·一五”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投降之前，先后出狱。

（摘自《庄河文史资料》第二辑）

通化教育界惨案亲历记

徐云翔口述　徐　华整理

1936年冬，日本宪兵队把省立第六师范（设在通化县城——今通化市第二中学校）前任校长马骥北从辽阳老家抓回来之后，又把现任校长佟儒也抓了起来。不久，女中校长修禄、原教育股长马清川（字文泉）和农中校长杨培伍都接连被抓起来了，闹得全城教师惶惶不安。

12月20日早饭后，我正在炕上坐着，一个朝鲜翻译领着个日本宪兵来到了我家。翻译问我：“你叫什么名字？”我依实回答说：“我叫徐云翔。”翻译对日本宪兵说了句什么，又对我说：“走吧！”他们把我带到日本警察署（今通化市民主路派出所后院），推进门洞的小屋里。进屋一看，里边已抓来了5个人。他们是我们农中校的数学科主任战德成、自然科主任宋栋臣、教务主任王育成（字炎培）、数学教员赵广智和奉天省立师范的向老师。

在这里押了3天，又把我们送到日本宪兵队拘留所。在押的有男的也有女的。每次审讯大都灌凉水、灌辣椒水，摔、打，严刑逼供，问我们干些什么“反满抗日”的事，有的还拿我们开心。有位女中的体育教员郭毓琴怀了孕，她穿的棉袄鼓得高高的，日本宪兵拍着她的肚子嘲弄地问：“孩子的有？”日本宪兵

见她低下了头，便开心大笑起来。

另一名叫别士儒的教员，60多岁了。一进监狱就把假牙摘下扔了。他是山东人，摘了牙，话语就更不清楚了。日本人问他的时候，翻译张秋水费了很大的劲才听出："我是月薪20元的代课教员啊！"日本宪兵听明白了他的话后，似乎觉得不屑费力，把他和郭毓琴一起放了。

在宪兵队拘留所一共押了我们26个人。3天之后，就把我们每两个人戴一副手铐，逼上了两辆汽车。我和宋栋臣同戴一副手铐。两辆汽车都用帆布蒙着，只能看见驾驶楼里坐着的日本宪兵。汽车跑了20多分钟，冷丁停下来，宪兵端着枪呜哇叫着让我们下车。俩人戴一副手铐子，上下车很不得劲。下车一看，才知道汽车到了通化北山官道岭北坡。宪兵见我们都愣在地上，又呜哇直叫："快快的解手！"听说"解手"，这才松了口气，我们赶紧地小便。临上车前发现汽车风板上写着"肃正工作"四个字。

到了山城镇，又把我们推上了火车，电灯亮的时候，我们到了奉天（今沈阳）。走出车站，又逼我们钻进了一辆大客车里。客车窗户用布遮得溜严，外边啥也看不见，汽车跑了20多分钟，才知道到了"奉天陆军监狱"（今沈阳大南关下头）。进了大门，里边是平房。押我们过了一个过堂门又是一趟平房，再过过道门，又是一趟平房。进了第四个过道门，就把准备好的脚镣子挨个给我们砸上了。我请求换一个小一点的脚镣子，看守立即瞪大眼睛说："你这个8斤镣子还嫌重？邓铁梅戴的是20斤的呢，那是现给打的！（邓铁梅是抗日英雄，一家全被杀害了）。"

来到奉天，已是12月27日，我带的鸭毛褥子，不准带进监狱，刚过第一个过堂门就被扣下了，说是狱里边有铺有盖。进监狱一看，只有两条毯子，让铺一条盖一条。监狱里比外边冷，

早晨起来，板铺缝里全是白霜。我住的监室很小，住4个人，除我之外，有我们农中校的宋栋臣、秦有德（安东林科中学校长）和一个县银行经理。小屋挤得无法仰脸睡，只能侧着身子。因为太冷，晚上谁也不脱衣服。宋栋臣穿件羊皮袄，生了虱子，顺着羊毛直窜。

吃的饭每天都是带皮的苞米糙子，有的人咽不下，就把嚼过的皮吐出来，用纸包着，偷偷扔掉。

转过年，1月29日，军法会审，把我们带到第一栋平房里的法庭上，我们站成一排，我扫一眼，我们通化县的26人全到了。坐在法庭上的法官是中国人，另有翻译官和记录员，他们身后坐着三四个日本人。说是军法会审，实际问得很简单，即叫什么名字，当了多少年校长或是教员，就问这么几句话，问完又押回监室。

以后是单人过堂。问我："你是美术教员吗？"我说："是。"日本人问："你的画画的会？"我说："学过画画。"日本人递过一个墨盒，一支毛笔和一支铅笔，让我照他画。在我画画的过程中，又把我们农中教员谭尚志叫了进来审问，问的还是那一套。等我画完了，日本人（可能是宪兵队的头头）说了一声"约西"，说完就让我走了。

2月的一天，听看守说，头一批枪毙了5人，其中有一个临上刑场时质问日本人："你们还能错杀无辜么？"日本宪兵一听不好，忙把他连同其余4人的嘴里都塞了棉花。后来知道，敢于质问的人是通化县原教育股长马清川，另外4人是省立第六师范前任校长马骥北、现任校长佟儒、女中校长修禄和我们农中校长杨培伍。

第二次军法会审时，只剩下21人了。省六师教员里佐华（字汉藻）、修广汉等6人，被判刑13年零4个月。农中数理教

员温成贵、教务主任王育成、数理教员战广智（字德成）、国文教员宫宪斌、化学教员谭尚志、教员姜勤、赵殿礼、宋栋臣、×××、省六师教务张森、栾兆环、女中国文教员孙耕尧、师中教员郭景华、原教育所所长——通化县志主编李振华（字晓锋）和我，共15人，被判了5年的犹豫刑，监外执行。

2月2日，看守把我们的脚镣子全给砸开了，送到奉天西站的日本宪兵队，把我们的头剃光。日本宪兵队训了话，大意是：必须老老实实地效忠大日本帝国，不准反满抗日，如果再犯，就追加13年零4个月徒刑。我们就这样糊里糊涂地回到了通化。

（摘自《吉林文史资料》第十七辑）

“教育事件”亲历记

李介夫

我原名李世瀛，字杰夫，现名李介夫。1905年生。原籍营口县，现住丹东市，1923年冬，毕业于辽宁省立商科第一高级中学。1925年春，入旧边业银行，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并入伪满中央银行。1933年转任该行宽甸支行经理。

1936年，日本侵略者在东边道各市县展开一个所谓的思想大讨伐，遍及安东、凤城、宽甸、岫岩、桓仁、庄河、通化等地。首先受害的是教育界人士，嗣后，逐渐殃及其他各界，故习惯称之为“教育事件”。现将我亲历、亲见、亲闻记述如下：宽甸城内日本宪兵队从初秋起即开始捕人。县师中校长、教育会长丛树春（字育深）、职业校长吴风宸（字定宇）、教师李季、训育主任肖懋彦、女子学校校长邹绍南、三育小学校长高某都

先后被捕。我是冬11月初，先于家内严行搜检后被捕的。拘留场所是临时改用一家歇业的浴池，室内各床位都用整匹白布包着，被拘留者都被隔离，各不相见。只有在大小便时在厕所里，在看守的监视下有一见的机会。当时，看守人、审问人都是日本人。除在审问时用中国翻译外，其余时间见不到一个中国人。需用的被褥及饭食，都由家里人送去，但只能守候于门外，不能进入室内。

我是在晚5时前后被带入监所的。入所后立即审问，审讯时在座的有县警务局两个指导官、宪兵队小队长及一名日本警察，没有翻译。最先问话的是立山指导官，他用半语子的中国话问我："为什么逮捕你知道么?"我自然回答说："不知道。"这3个字一出口，立即触怒了他们。一声怒吼，4个人一齐动手将我捆吊起来。离地虽不高，但在他们4人拳、脚、棒的两面踢打游动之下，我先是哀号，后便昏厥了。豺狼们见我无声无息，才将我放下来，连拖带架，将我拖到床铺上。我喘息片刻后，又被架去审讯，仍然是暴打、昏厥，然后又被拖回扔到床上。约10分钟后，来了个日军医官，略事诊视，即给我注射，是强心剂还是止痛针，我不知道。只觉注射后，减轻一些痛楚，肉体上的伤痛减轻了，而思想上的伤痛却增加了。

第二天早饭后，审讯又开始，指导官不见了，只有宪兵队长、中国翻译和1名宪兵，3人坐堂，仍然是简短的问话，用力暴打，直至昏迷，才架回床上，找来军医注射。

第三天上午仍是昨日3人。这一次却公然说我是反满抗日组织里的重要一员，我当然要极力辩白，这又触怒他们，一个宪兵用一大碗辣椒水来灌我，只灌了一半，我就气息奄奄，呼吸失灵。他们又将我架回。这次医官来后经过一番较细的诊视，才给注射，随后又向宪兵小队长说了几句什么。

在审讯我的同时，对其他被难者同样进行了严刑拷打，吼声、哀号声不断。一次，在厕所里和丛校长相遇，他是故意来找我通消息的。因为这个临时监所，对大小便的时间不加限制，而监视的日本警察，又站在很远的地方。丛就对我说，县红万字会分会长王冠五和他同时被捕，但因胡说、认供，后又翻悔而翻供，遭到几次毒打后，在很冷的一天，宪兵将他衣服剥光，捆在木凳上，放到院内灌辣椒水，活活被折磨死了。尸体抛向何方，谁也不知。你的床位就是原来他住的地方。我当即向他说："这样看，咱们宁肯被打死，也不能胡说。"他说："太对啦。"这就坚定了我的信心。

审讯突然中止了两三天，但捕人仍在继续。县商务会长李铭三、农会会长吕武臣、县内务局长杨春华、商务会副会长徐静波、马如九、县城街长唐荫阶等也先后被捕入监。

宽甸城内原驻日本宪兵队只有一个军曹小队长，4名宪兵。但是，沉默几天后，忽然在一天的上午，由外地调来五六个宪兵，其中有一名准尉队长、一名曹长、一名军曹及两三名宪兵和日本、中国翻译等多人，在监所里立刻展开大规模的审讯，所有的房间都被用作审讯室。野兽般吼叫，夹杂着被难者哀号，实在令人不寒而栗。

我被日本翻译带到他们所谓的队长面前。他坐着，让我也坐在旁边的椅子上，用和缓的语气向我说话，由翻译转说："你们所干的事，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你要快快地说实话，就叫你快快地回家，你可以说吧。"我哀婉地回答说："我有什么理由反对满洲国呢？我实在说不出我有什么反满抗日的事情来。"话刚落音，这位队长立刻显出不耐烦的神色，马上命翻译把我送回去。

次日晚7点后，一个宪兵将我带到一个最里间的审讯室里，

有一个着便服的日本人（后来才知他是营口宪兵队曹长大曾根），坐在办公桌的西面，让我坐在东面，开口便用流利的中国话向我说："你是营口人，我也是营口人，咱们是乡亲，可以来叙谈叙谈。"我回说："这很好。"开始是山南海北不着边际地谈，从营口的知名人士，谈到沈阳、安东以至全国各地，我对此大多是以闻所未闻，茫然不解的态度来回答他。以后转入正题，给我纸笔，让我写出心里话。我为了消磨时间，缓慢地将我昨天回答那位队长的话，加以润色，写了一篇多。他看过后，不加可否地递给我让再写。我又将在银行里的经历详细写出。他看后，仍命再写。我答以实无可写的东西之后，他也未再催逼，但问话却又开始。断断续续地，有关的，无关的，问个不休。那个宪兵已添了多次炉火，倒上两三次开水，并坐在旁边椅子上打了多次的瞌睡，这时已是凌晨4点多钟，那宪兵有些耐不得，过来将我拽起立在室中央，手里拿块劈柴，恶狠狠地问我："你说话不？快快地说话。"没等我回答，便用劈柴打来，只两下便将我打倒在地。大曾根起来阻拦，他才住手。由两人将我架回监去。

第二天晚8时后，又经过3个多小时的讯问和答话，仍无结果。大曾根改用恐吓手段。此时，在外间正有一曹长刑审高校长。大曾根将门拉开，陪审宪兵将我带到门边让我看。高校长手脚捆在一起，高吊在房梁上，已被折磨得不成样子，而下面的军曹却还是狂吼乱叫，手持长手杖猛打不休，我睹此状，立即昏迷，他们又将我拖架回床，并由军医注射。

第三天又问了很长时间，我最后哀求说："队长啊！豆子里有油，经过挤压，它就出油；石头里没油，你把它压得再碎，也压不出半滴油。"他听了，立刻冷冷地说出一句我听不懂的日本话来，并挥手令宪兵将我送回床位。

过两天，又由那个专门能用重刑打人的曹长，把我带去审问。我以为是要来硬的，但是进门后却向我说了较长一段话，翻译翻给我说："我们的政策，是一种讨伐政策，全世界都这样做，你怎么样？快说实话吧！"我回答说："我说过的都是实话，再要我说，只能再重复一遍。"

就在这一天，他们用诱惑手段，从吴凤宸校长身上打开了缺口。经过较长时间的问话后，在吴回来时，已无脚镣声。而送他的翻译，边走边和吴交谈。我从布帐缝里见到吴脚上已无脚镣。

缺口一打开，暂时听不到审讯室里兽吼和人号，但对其他被难者的审讯，仍在不断进行。

在12月末的一天，我被带到审讯室。这次在座的除大增根曹长和一个外来的警佐及一名翻译外，还有县立山指导官，丛、吴两位校长也在内。我一进门，大曾根就用日本话问我，"他们都承认了，你怎么样？"我说："他承认是他的事，我和他们毫不相干。"立山插口说："你们的事，我们通通明白，你要快快说。"他见我还不开口，就加重语调说："我们的法律，只要有6个人作证，你就是不承认，也同样可以判罪。"我苦笑一声说："用大日本宪兵队长的身份，在满洲国不要说找6个人，就是找60、600也是极容易的事。"立山先插口骂我一声"八卡"，大曾根厉声说了一句日本话，翻译也同样叱责我说："滚回去听着吧！"从此，再没问我。

1937年1月10日早晨，通知所有的被难者家属说，即日将我们送往沈阳，让家属给准备少许随身使用的钱物。约在8点左右，开来了一辆大客车。在上车之前，立山指导官向我们说："你们这里到现在没有说实话的还有两个人，一个是杨局长，一个是李经理，杨只说了一半，李一点也没有。到沈阳要通通说

出，快快回家，不然，脑袋的没有。”他说完就由宪兵曹长和宪兵们把我们带到车上送往安东。同行的有丛树春、吴凤宸、杨春华、邹绍南、吕武臣、唐荫阶、高校长、肖、李二教师和我共11人。抵安后，肖、李又被送回，另将李铭三送来。原在安东审讯的金文彬县长、栾继先财务局长也一起送往沈阳，计12人。

当晚在安东宪兵队的拘留所里，始与栾继先相遇，金县长另在他处羁押。拘留所内只有板地，无炕、无床。听到栾的转述，才知道去年末，已由安东送沈52人，凤城11人。他在安东遭到的刑罚，比在宽甸的人为重，全身扒光，灌凉水，满身浇水，然后用铁刷狠狠刷去冻结的薄冰。每次回拘留所，都是拖回来，有一次是倒拖回来，脑后拖去了头皮，伤痕犹在。极刑惨目，实不忍睹。

晚8时左右，忽有一朝鲜翻译拉开窗口给丛、吴二人送袜子，他是他们二人的学生。我们下车时，见他含泪向丛、吴二人说：“你们都来了。”说完，便背过身去。在送袜子时他急促地说：“你们明天送沈阳，到沈阳的都不轻呀，你们快翻供。”说完关上窗口快步走开。这时，室内诸人，聚商如何翻供，只有吴校长偎在一个角落里不言语。

次晨7时，将我们12人用汽车送到火车站，由军曹和宪兵们押送到沈阳。下车后，即由专门押解犯人的囚车，将我们载到陆军监狱。经过一整套入狱手续：点名、搜身、抽裤带、登记、钉镣后，这才收监入狱。

狱室是两栋，一栋大、一栋较小，我们有8个人被投入较小的一栋里，室内两面对立10个小屋，中间有约2米宽走廊。进门西间是看守室，东间是小库房，我们所有被收的衣物，都放在这里。这8个人是：金文彬、丛树春、栾继先、吴凤宸、杨春

华、李铭三、邹绍南和我，分监在1—8号监室内。

监门只有一米高，必须深深躬腰，才能进出。入门后，见室内有3人盘膝坐在不满半尺高的板炕上，靠边有一人合衣蒙被躺着。3人见我进屋，自动地从中间腾出空隙来，让我坐下。看守锁门走后，他们才小声和我交谈，我才知其中有两人是通化中学教师，一名是逃兵，躺着的是安东的秦有德。他俩和秦有德都已经过一次或两次审问。秦有德醒来后和我谈起，我才知道安东支行经理淳于喜亮也被难。

据通化两位教师说，通化中学有一位日系副校长，曾为此事和当地宪兵队做过激烈辩解，随后他又印发传单，说明被捕26名校长、教师们无罪，但被遣送回国。

监室里的情况实在令人望而生畏。全室约有7尺见方，后墙高处有2尺长、1尺宽的扁窗，正面是碗口粗的密木栅，栅下面的一角是加重锁的小门，其余两面是通屋顶的高墙，地下角放一个无盖铁便桶。

典狱长是日本人，临时问案的法官也是日本人，其余是中国人，其中有一名准尉看守长，两名上士和一些中、下士。在监里，威风凛凛、杀气十足的是看守班长们。我第一次体验到周亚夫所说的："将百万兵的大帅，也不及小小狱吏的威风。"这真是"见狱吏，头拱地，口欲言，而心胆惧！"

几天过后，由庄河送来13人，岫岩9人，其中，孤山学校校长收入我同屋里。

监狱生活是绝对受限制的，每人发一套薄被褥，早起要卷得整整齐齐。两顿饭，平时是高粱米。偶尔有一顿小糙子粥。早吃稀饭、咸菜，晚吃干饭、菜汤。早6时起床，十几分钟后放风和大小便，按规定是15分钟，但看守们往往提前收风。必须快走快便，时间略长，非打即骂。收监后，点名、坐候。监内跳

蚤、虱子多得无法清除，只有放风时到院内抖掉一些。

不定期的放风，到院子里走圈子，这看来是好事，但也是一次虐政。被难者无裤带，脚拖重镣，在短短的15分钟后，每人都是精疲力竭，喘息不堪。

几天过后，审讯开始，法官是日本人，翻译是中国人。第一次审讯，问过姓名、年龄后，问我："你有哪些反叛行为？"答："我什么反叛事也没做过。"第二次又问，"你对你的事情有什么要解释的？"我说："我是满洲中央银行里的一名忠实的行员，我忠于我的支行经理职务，绝不是满洲国的叛徒。宪兵队不顾事实，强加给我罪名，我认为在法律上是不会生效的，请法官细察，免我受冤。"翻译完后，令我回监，以后再没审问。

记得农历二月初一这天，宽甸、岫岩、庄河的被捕者同日宣判。丛树春、栾继先被枪决，吴凤宸、杨春华判13年4个月徒刑，其余8人我们都是5年徒刑，缓期执行，被放出狱。这种缓刑是无限期的，因此，我出狱返回营口故乡时，仍受当地警宪的刁难。

（摘自《丹东文史资料》第三辑）

桓仁教育界惨案真相

肖玉琛

1935年秋我从陆军训练学校陆大专科班毕业以后，回警备司令部任原职。这时于芷山已调任伪满军政部大臣，由于琛澂接任奉天省警备司令官。1936年，为了适应侵华战争的需要，奉天省警备司令部改编为第一军管区司令部，由中将王静修任司

令官。同年12月，我被晋升为司令部中校作战科长。

“七·七”事变的前夕，为了巩固侵华大后方，日军一方面运用全部日伪军事力量“扫荡”抗日游击队；一方面残酷镇压所谓“善于煽动”的知识阶层。桓仁教育界惨案就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发生的。

1936年冬，驻今辽宁省桓仁县的日本宪兵队，突然逮捕了桓仁县尖山子小学张校长等20多名爱国知识分子，押到宪兵队监禁后，施以各种酷刑，强迫他们承认参加了以张校长为首的“抗日救国会”，并编造一份假案情，勒令被捕者照假案情招供画押，谁要不肯承认，就给灌辣椒水、坐老虎凳、剥筋押条、针刺指尖……整整拷问了半年之久，有的眼睛被打瞎了，有的胳膊和腿骨被打断了。不少知识分子被折磨成了残废，最后被迫在日本宪兵队编造的所谓“反满抗日供词”上签字画押。

日本法西斯为了进一步扩大镇压知识阶层的舆论需要，于1937年5月，将屈打成招的桓仁县20名知识分子送交伪第一军管区军法处进行军法审讯。会审组织规定，除军事法官外，必须有本科军官参加。我和军械处中校处员刘秉岩被军管区中将司令官王静修指令参加这次所谓的“军法会审”。

会审的组成人员是：审判长王冠英（军法处长）；审判官三浦（日本法官）；陪审官刘秉岩、肖玉琛（本科军官）；检查长小泽（日本法官）、姚法官；翻译、书记官各一人。

军法会审是1937年5月进行的。法庭设在第一军管区驻地——旧军阀张作霖元帅府东厢房军法处的一所大庭内。这天早上7点半，参加会审的成员按照指定的位置进入法庭就座后，由执法士兵把戴着手铐脚镣的20名“犯人”带入法庭。这些所谓“犯人”个个蓬头垢面，骨瘦如柴。有的断肢折臂，有的眼球暴露，血肉模糊，惨不忍睹。我是第一次参加这样刀光剑影的审

讯，也是第一次看到这样遍体鳞伤的“犯人”……心里暗想：这是法庭，还是地狱？

审讯是在8点开始的。第一个被提审的是尖山子小学张校长。当姚检察官问过他的姓名、年龄、职业、住址后，要求他本人呈述“罪行”。张校长拖动着一条受伤的腿，抓住围栏，挺直腰杆，义愤填膺地说：

“在座的各位法官，请看看我们这些缺腿少胳膊的所谓‘犯人’，你们就会明白，宪兵队送交你们那些‘供词’是怎么得来的。他们对我们进行了整整6个月的严刑审问，仅我个人就先后被打昏过3次，直到把我一条腿打断，一只眼睛打瞎……请诸位看看，现在我的腿还在淌着鲜血呢！难道这样屈打成招的供词，你们也相信吗？”

“住口！”姚检察官拍了一下镇堂木，喊道：“照这样说，难道是宪兵队编造假案不成？”

“检察官先生，”张校长毫无惧色地问：“法律是不是尊重事实？宪兵队说我去年9月在山林中开会的那一天，我正在桓仁县参加教育局召开的各小学校长会议，我还在会上作了教学汇报。既有人证在，又有文件在，可是宪兵队硬说那一天我在山林中召开‘反满抗日’的救国会议……请问检察官，难道一个人能分成两半吗？”

“可是你已经在供词上画押了。”姚检察官指桌上的供词说。“这上边难道是别人按的指纹吗？”

“是我按的指纹不假。”张校长吃力地移动了一下身子：“难道你们没有看见我这只被打瞎了的眼睛和这条被打断了的腿吗？”张校长把衣服扯开说：“你们再看看我这一身伤痕……”

参加会审的官员们听完张校长有理有据、义正辞严的申诉，个个面面相觑无言对答。这使所有“犯人”的精神为之一振，争

先恐后地控诉宪兵队严刑逼供的罪行：

“宪兵队硬让我们承认参加了张校长召开的救国会……”

“不承认，就给我们用大刑……”

“你们看我的胳膊……”

“你们看我的眼睛……”

“……”

“犯人”的叫屈声和脚镣手铐的碰击声混成一片，法庭秩序顿时乱了起来。检察官把镇堂木拍得“叭叭”直响，也没有能够镇住“犯人”的愤慨情绪。直到审判长答应重新讯问，法庭才慢慢地静下来。

通过讯问，几乎所有“犯人”都推翻了原来的供词，一致要求重新调查此案。姚检察官用了半天时间一一进行答辩，并指示书记官做了详细记录，然后宣布说：“虽然今天犯人的供词与原来宪兵队提交的供词完全相反，但检察官不能听信一面之词，因宪兵队提交的供词，犯人已签字画押，既有人证，又有物证，因此本庭只能按照法律程序起诉……”这时法庭又哄了起来。日本法官小泽一看形势发展下去，不但会导致推翻宪兵队用了半年时间严刑审讯得来不易的全部供词，而且将严重影响宪兵队的威望和日本帝国的形象。他凶相毕露地拿起镇堂木用力一拍，厉声喝道：

“这么说，你们无罪，宪兵队有罪，对不对？真是岂有此理！已经画押的供词翻案的不行！”

接着宣布休庭。所有“犯人”被20多名执法兵押回监狱。

午后1点多，会审员被召集到军法处办公室，商讨起诉和审判事宜，审判长王冠英首先发言，他说：

“大家都听到了犯人的申诉，有什么想法，可以自由地发表个人的意见嘛。”

上午审讯的悲惨景象历历在目，每个在座的中国人都心里明白：这里除了日本人的强权自由外，哪里还有中国人的法律平等。大家你望望我，我看看你，日本人看中国人说什么，而中国人又不知道这些日本法官的真正用心。由于双方都在等待对方首先发言，从而形成了一个长时间的沉默。这种沉默，像一个衡量良心的天平，摆在我的面前，引起我多次感情冲动，想说几句公道话。但一想到宪兵队，一想到上午那些断腿、折臂的“犯人”，我冲到嘴边的话，又咽了回去……

“我看这样吧……”日本法官三浦终于开口了：“大家知道，这个案件不是我们检举审讯的，而是日本宪兵队送交过来的，而且日本宪兵司令部对审理此案已作了明确指示，我们无权重新检察和重新审判，因为宪兵队送来的审判材料手续十分完备，我们用不着再去研究它了。”

这次会议就在所谓“自由发表意见”的情况下结束了。

第二天按时开庭。检察长小泽在审讯中凶相毕露地逼着每个“犯人”承认原来的供词。尽管一些“犯人”坚持说原来的供词是日本宪兵队严刑逼供，要求重新审理，但这位日本检察官竟置若罔闻地重复了一下由日本宪兵队提交的供词，就宣布“审讯完毕”，除两人免于起诉外，其余“犯人”仍按原来的供词起诉审理——20多名“犯人”只用了3个小时的所谓“审讯”，就匆匆休庭。

第三天早8点，审判继续进行。日本法官三浦拿着日本宪兵队判决原稿，对被判刑的人按所谓“法律条文”论罪定刑。尖山子小学的张校长、教导主任和一个姓王的“3名主犯”，以“设立抗日救国会、捐款支援抗日救国军、驱使会员扒铁路、切电线、窝藏共匪……”等“颠覆国家罪”，判处死刑。除一名60岁的老人、一名16岁的少年和被捕前就已残废的3名“犯人”宣

布无罪释放外，其余18名“犯人”分别判无期徒刑到3年以上徒刑不等。

审判结束后，在宣判前照例要开一次法官和陪审员参加的碰头会，对审判结果“是否合适”，进行扼要的研究。审判长王冠英一再要求对三浦法官作出的判决发表意见。

“肖科长说说吧？”

三浦法官笑眯眯地盯住我，不知是让我打开僵局，还是有意试探，这使我感到非常作难。在法庭上几次想说而没有敢说的一点想法，又开始在我的脑子里蠕动起来……我试探地说：

“我是第一次做陪审官，法律知识又很浅薄，不过我认为桓仁教育界案件是由桓仁日本宪兵队慎重检举，由姚法官起诉，三浦法官判决，是完全符合法律程序的，我无异议，不过有一点……”

我小心翼翼地说：“尖山子小学校长提出的他开会的地点和内容的确有出入，是否应该重新查实一下……”

“哦……”三浦法官点点头说：“肖科长提得很好，当时我对这个问题也有同感，曾到宪兵队查过。但宪兵队长说：‘这个案件经过半年才落实，上边催得很紧，不能再更改。审判也需要按原计划处理。’情况就是这样……按理我不该向大家讲，既然肖科长提到这个问题，希望大家理解就是了。”

“对，情况就是这样……”我后悔多此一举。

这天下午开庭，由审判长宣读判决书。他先宣读无罪释放的3人，然后按照判刑少到判刑多的次序进行宣读，最后宣读判处死刑的3人名字，并宣布立即执行。这时由典狱长开始执法。我们在一片混乱和杀气腾腾的气氛中，匆匆退堂。

法院门口有三辆大卡车停在那里。我亲眼看到执法队将判死刑的张校长3人推上汽车，驶往沈阳城南浑河沿执行枪决。据

说张校长临刑前曾振臂高呼："赶走日本强盗，还我锦绣山河！"

前两年，我曾在一个偶然的机会见到了当年住在桓仁县的佟光同志。解放后，佟光同志来鸡西工作，任鸡西矿业学院的日语教师。佟光同志告诉我，他的一位亲属也在那次事件中被鬼子无辜杀害了。他说，当时受牵连的远不止二三十人，而是上百人。安东省的教育厅孙厅长就是死于此案。佟光老师也认为：那是日本帝国主义为进一步侵华，扼杀进步舆论，蓄意制造的一次镇压知识分子的血腥惨案。

（摘自《一个伪满少将的回忆》1986 年版）

父亲的殉难经过

左良知

我父亲左秀海，东北大学毕业后任凤城县职业中学校长兼农业实习所所长。在职期间，适逢"九·一八"事变，在这民族危亡关头，为挽救东北三省沦陷国土，他组织与领导了凤城县抗日救国会，任会长。在开展抗日救亡斗争中，又被教育界拥戴为凤城县教育会（工会）会长。

抗日救国会，是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民众团体，在凤城县是以教育界为主，联合各阶层人民建立的反满抗日组织。它和东三省各地人民一样，不顾南京反动政府的不抵抗政策，纷纷举起反抗大旗，与各地义勇军武装一起，从不同角度向入侵的日本帝国主义展开了浴血的救国救民斗争。

在漫长的十四年的艰苦岁月里，虽然敌强我弱，但他们不畏强暴，坚持斗争。在斗争中牺牲的中华儿女何止千万，我父

亲仅是这个行列中的一个，现就他不幸被捕与殉难经过，据我所知追述如下：

不幸被捕

我父亲是1936年旧历腊月二十三日，被安东日本宪兵队去到凤城职业中学逮捕的。那天早上8点多钟，天气很冷。我父亲冒着严寒领着全校师生在操场上做朝会、念“诏书”。那天早晨正当凤城职业中学在奉行这种当时视为至高无上的公事时，突然凤城警察署的大金、二金两个翻译，领着两个安东的日本宪兵闯进了学校。这帮家伙一到学校办公室，见我父亲不在屋里，便急不可待地马上逼着校工小高（名平阁）到操场上喊左校长。小高搞不清他们突如其来的真正目的，因而叫他们坐等片刻，以俟校长下朝会再说。可敌人硬是不肯，逼着小高立刻去喊。小高拗不过，只好无可奈何地向操场方向走去。这时敌人紧紧跟在小高身后。

敌人这种不可一世的汹汹来势，已被念诏书的父亲瞧见了。只见小高快步紧走地到校长跟前报告说：安东日本宪兵队请您去开会。我父亲看出诡计多端的日本宪兵不怀好意，为了应付眼前突变的事态，不给广大师生造成恐慌气氛，他大声对小高说：“既然宪兵队请我去开会，也不是急三火四的事，可以叫他们到办公室坐等一会儿，我这里不是正在念诏书吗？怎么能随便中止停下来呢？”这些话显然是给敌人听的。

我父亲的话音刚落，敌人已齐刷刷地围在讲台跟前。其中一个宪兵，朝我父亲叽哩哇啦地吼叫了一阵，意思是说，他们奉上级命令，专请左校长到宪兵队开会议事，马上跟着走，迟误一刻也不行。我父亲看敌人那副骄横霸道的样子，讪笑着说：“哪有像你们这样剑拔弩张的请人开会的呢？我现在念诏书，这

是皇帝颁发的，谁敢阻拦?”那时，念诏书是所谓相当严肃的事，连皇帝本人也不敢贸然干预，何况一个小兵呢？但日本宪兵从翻译那里听明白之后，瞪圆两眼说：“什么诏书不诏书，通通不要了。”这样一来，敌人的狼子野心便暴露无遗了，开会是假、抓人是真。与会的全校师生立刻明白了：他们敬爱的校长，将要落到敌人的毒手里了。

父亲并未因猝不及防的事件而举止失措。他一本爱国者的大无畏风度，沉着而镇静地走下讲台，他对敌人不屑一顾，气宇轩昂地对小高说：“你到办公室把我的礼帽取来！”便昂首阔步地走到敌人前边，直往校门走去。敌人跟在后面，把父亲押走了。

中午时分，心地纯朴善良的小高怀着惶惶不安的心情跑着到我家报信，他怕不幸的消息惊坏了我母亲，说话吞吞吐吐，母亲发觉小高说话神色有异，约摸可能发生了什么事，她叫小高直说快讲，不要拐弯抹角。于是，小高便把早晨日本宪兵怎么抓人的事一五一十说了一遍，临了，小高还神情紧张地叫我母亲赶紧打听打听。母亲骤闻之下，久久地怔在那里。但一贯刚强惯了的性格，使她猛然清醒过来，果断地对小高说：“你快去招呼那些和校长常来往的朋友，让他们避避风头。”其实，敌人已在凤城教育界、工商界开始抓人了，这便是震惊省内外的“安东教育事件”。不仅在凤城，那时，安东各县也都进行了大逮捕，到处都陷入白色恐怖之中。

傍晚，母亲从一位在火车站剪票的铁路工人那里得知，日本宪兵用手铐把我父亲押上去安东的火车。她回家后，沉痛而感慨地对我说：“自从秋后你父亲与通化师范佟校长失去联系，便知道时局紧张，但没有想到日本鬼子下手这么早。早知如此，让你父亲到北边打游击就好了(佟校长也是东北大学毕业的，与

父亲同学，是通化救国会的，也是这年冬天被捕的)。父亲被捕后，母亲把一切都置之度外，全力以赴想法营救父亲。

约在一个星期后的一天，有一位李教师从监狱里放出来。给我家捎来一串钥匙和我父亲身边的一些零用钱。他说，左校长叫家里把校内东西急速取回，别叫敌人得去。同时告诉家里，他的案情十分严重，是有去无还的。李教师说，左校长在宪兵队刑讯时，一点口供都没有，反而厉色指责日本鬼子的侵略罪行，他比别人更加危险。听说，明后天，安东宪兵队要把他解送奉天（今沈阳）日本军法处了。母亲听后，失声大哭起来。

后据同监难友安东县五区小学校长刘景芳老人回忆时说："他（指我父亲）在日本宪兵队审问时，挺刑不屈，死不承认，使日人无可奈何。"从父亲在狱中捎出的信来看，他始终坚贞不屈，对敌人抱着势不两立的态度。他对母亲写道："所恨者未能杀敌首万千，以消我胸中豪愤耳。"他确实是位坚决的抗日分子。

英勇就义

我父亲是1937年旧历正月二十二日，与凤城县抗日救国会的6位战友，被奉天日本陆军军事法庭以颠覆罪非法宣判死刑的，同日午后枪杀在奉天的浑河沿。

父亲殉难那天，敌人个个荷枪实弹，如临大敌。父亲和他的战友们，在最后向祖国告别的时刻，依然豪情满怀，大义凛然地在刑车上振臂高呼："中华民族万岁！""抗日救国万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敌人见此情景，慌了手脚，立即把刑车掉过头来，又开回监狱，把嘴里堵上棉花，戴上手铐脚镣，眼睛蒙上黑布，才又押往刑场。

罪恶的枪声响了。敬爱的父亲和抗日救国会的其他6位战友都倒在血泊之中。

我和母亲痛不欲生地冲向前去。母亲在父亲身旁晕了过去。我一头扑在父亲身上，掏出他嘴里的棉花团，解下蒙在眼睛上的破布条子，父亲那双瘦骨下陷的眼睛，仍然怒睁不闭。这是死不瞑目的啊！我用手把父亲眼睛合拢起来。连声叫喊："啊！天啊！爸爸看看我们吧！"尽管我破嗓呼喊，也拉不起倒在血泊中的父亲了。此时此刻，我再也听不到唤儿呼女的慈父之声了，只有那鲜红的血还从头颅中直往外涌，忠于国事民族的父亲的死，比泰山还重！当我给父亲脱换衣服时，他那双温热的手，还和活着的时候一样叫我感到温暖，但我父亲再也不能领我上学去了。眼前的国恨家仇，寡母孤儿怎能不叫人胆肝碎裂，痛哭欲绝呢？

父亲的灵柩运回凤城后，母亲带我在门前设起灵棚。母亲说，父亲是为国为民而死，死得壮烈。所以，不顾敌人的刁难阻拦，公开吊唁发丧。我跪在灵前烧纸安灵，亲友邻里相继而来。我记得有一位叔叔在我父亲出殡那天早上，在灵前拈香致悼词说："秀海！您是民族之光。愿您的精神永垂不朽，万古常青。"凤城职业中学的学生，在出殡前一天晚上，络绎不绝地来到灵前哀悼，他们为失去好校长而沉痛流泪，有的亲自烧纸祭奠，情景十分感人。

敌人是非常狡猾恶毒的。他们一面用公开的残杀手段镇压，另一方面又暗下毒手，宣判凤城县清真小学于松涛主任和凤城县文庙小学关子荣主任无罪释放。但在临释放前，给他俩注射了慢性毒针。我父亲曾在牢房里向这俩位难友嘱托过，让给我母女捎个口信，于松涛主任放回后即捎信给我们，由于我们忙于料理丧事去迟了，于已因毒针发作而身亡。幸亏关子荣主任身体好抗力强和及时抢救，他把我父亲的遗言转告给了我们。父亲叫我们在他死后到临江县十八盘岭下一家小店，找一位姓李

的交通员，那里的抗联义勇军会安排我们的。虽然我们母女后来没有去成，但那里的抗联在杨靖宇司令率领下，十分活跃。就像我父亲在信中说的："尚有为的，一定会坚持斗争到最后胜利。"

虽然事隔多年，但悲壮慷慨的往事仍深深地刻在我的脑海里。我要永远以前辈老人的抗日斗志，作为我振兴中华的动力，继承父辈的精神，使其发扬光大。

（摘自《丹东文史资料》第三辑）

邓士仁酷刑架上就义

邢佐相

邓士仁字之杰，铁岭大甸村人，奉天两级师范毕业，曾任铁岭县第一高级小学校长十余年，后兼铁岭县教育会长。在"九·一八"事变时，日军占领铁岭，因邓素孚众望，被士绅推荐为铁岭县教育局长。1933年，调安东县任教育局长。

邓士仁对学生经常进行爱国教育，每逢"五·九"国耻、"五卅"惨案纪念，都亲自讲话，教育学生发愤图强，以雪近百年来的奇耻大辱。他在担任铁岭县教育局长时，办公桌上放一本字帖，我问："邓老师还练字吗？"他说："我喜欢读帖，懒于动笔。"我细看，是《正气歌》，遂知其醉翁之意，深服其爱国之志。我在铁岭女师任教时，他常常教育我"不要把学生教糊涂了"，"现在认真教好学生，用在将来"。可见他把救国救民的希望，寄托在青年一代身上。他转职安东县教育局长后，积极参加救国会的各项爱国活动。他常说："中国人要好好给中国人

办事。”

1936年，日本帝国主义疯狂镇压人民爱国行动。8月的一天，邓下班回家对他夫人胡云程说：“日本宪兵在桓仁县大肆逮捕教育界人士，不少人被酷刑折磨死了，有的喂狼狗，有的被扔进浑江。”胡问：“为何被残害？”邓说：“不必问了！”这天，邓的情绪很不好。晚上，邓整理书橱书籍，拣出一堆字纸、书信，塞进炉子烧了，就在这时，他已经被盯梢了。

11月12日凌晨3点，日本宪兵和伪警察有几十人团团围住邓的住宅，凶神恶煞似地闯入室内，枪口直逼邓的胸口，并大肆翻箱倒柜，片纸只字都不放过。从3点搜到6点，一无所获，便把他绑走了。邓士仁对这突如其来的不幸事件，却从容不迫，处之泰然，临走时对胡云程说：“不必为我担忧，要好好照看孩子！”据悉：与此同时被捕的有，安东商会会长孙朗轩、安东县教育会会长于礼亭、安东省教育厅钟股长、镇江山小学校长张镇藩、安东林科中学校长秦有德等人。

就在邓士仁被捕的当天晚上5点钟，一个日本宪兵到他家问：“邓局长哪去啦？”胡云程答：“被宪兵队抓去了。”那个宪兵说：“回来了，大概一会儿就到家。”言罢，贼眉鼠眼地溜走了。第二天早晨，又来一个宪兵，说是“邓局长要转到奉天陆军监狱去，怕冷，托我来取皮袄。”胡云程说：“一会我亲自送去。”胡借送皮袄的机会来到日本宪兵队，宪兵说：“邓的，跑啦跑啦的有。”胡说：“在这里哪能跑呢？”宪兵说：“那，你到警察厅看看。”于是胡又去警察厅。警察厅说没有，又到日本大衙门（日本警察署），大衙门也没有，真是没办法，只好悻悻而返。时已日落西山了。第三天早晨，又来了一个宪兵，问：“邓局长没回来？”胡未答。晚上，又先后来了两个人，也都是同样的话，并说：“邓局长回来，到宪兵队自首，罪可减轻，若不，

罪上加罪。”

正在日本宪兵表演丑剧时，胡云程从一个内幕人那里得知：邓士仁被捕当天就开始刑讯，先用胶皮鞭打，接着灌凉水，随后灌煤油。打得他遍体鳞伤，死去活来，昏厥数次，可是他却闭目不语。宪兵队长气急败坏，遂把邓悬空吊起来，可怜这位无辜者受到残酷折磨，这样一吊竟与世长辞了。等到暴徒再审时，发现邓士仁死了，就将其尸体送到连山喂狼狗了。于是，他们立即派人四处放风，说是邓士仁逃跑了。

与邓士仁同时被捕的人，同样活不见人，死不见尸者，不知有多少。亡国之恨，何其有极。我和邓士仁志士，有师生关系，对他的无辜被害，含冤饮恨，不忍其湮没，谨录之。

（摘自《沈阳文史资料》第二辑）

刘国安被害祸及全家

刘毓芹口述　沦　石整理

被捕和探监

我的丈夫刘国安，铁岭县人，幼时家贫，刻苦读书，关心国家大事。在铁岭师范读书时，他怀着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仇恨，向同学宣传爱国抗日的道理，发动群众抵制日货，曾被当局拘留两天。1925年“五卅惨案”，刘国安率领同学起来罢课，并游行示威。1926年考入哈尔滨铁路小学任教，经常作爱国宣传。“九·一八”事变，日本侵略军进入哈尔滨市，刘国安和他的同学白培辛持枪偷袭日军，各击毙日军一人然后潜回铁岭。刘先

后在抚顺中学和铁岭中学任教。1932年8月随铁岭县教育局长邓士仁，转到安东任县教育局学务股长。因参加安东抗日救国会，于1936年11月13日下午4时，在工作岗位上被捕。这个可怕的消息传来，我立刻昏厥在地，70多岁的公婆，幼小的儿女，惶恐万状，哭作一团，全家彻夜未眠。第二天我抱着两岁的小孩，来到安东日本宪兵队，站岗的宪兵，狰狞凶相，令人可怕。我问："刘国安在这？"他找出一个翻译对我说："在这里。"我的心算落了底。因为听人家传说，抓去的人要喂狼狗的。接着我说："我要看一看。"回答说："不准看。"第二天我带着衣服抱着孩子又到宪兵队，想借送衣服的机会与刘国安见一面，结果是衣服留下了，不准见面。我多方设法，托人弯转，终是徒劳，得不到什么确切的消息。

非法的判决

1937年2月安东日本宪兵队把这些辜被捕的爱国志士，移送到伪奉天陆军监狱。这时正是天寒地冻的腊月，监狱的牢房中很冷，被难者吃不饱、穿不暖，又冻又饿，再加上酷刑拷问，都被折磨得死去活来，但并没有逼出半句口供。后来除个别人宣布无罪释放外，绝大部分被诬为"反满抗日"，分别判处死刑、无期徒刑或20年、15年有期徒刑。我的丈夫刘国安等11名爱国志士就是在这次被杀害的，

诀　别

当我知道安东日本宪兵把这批爱国志士移送到伪奉天陆军监狱时，我带着孩子从安东赶到沈阳，恰好遇着同时被难的孙文敷厅长的小随从（忘记姓名），他领我到监狱看守的家里，看守说："你来得正好，明天就是孙文敷、刘国安等11人处决的日

子。”这话如晴天霹雳，使我怔忡万状，这个小随从提醒我，我马上拿出5元钱，交给这个看守，恳切地托他代买几个烧饼送给刘国安，让他在临终前吃个饱，尽到我们夫妻最后一点情意。在监的刘国安，知道了我来探监，可以想像这是他在绝望中的最大安慰，在他生命仅存的一刹那，乘机在药口袋上写了一个遗嘱，由看守转给了我。上写：

“毓芹：我未死于病，而死于国事，已是幸运，亲老子幼，累卿一人。教子成人，重整门庭，迁徙农村，暂谋生活。安拜。”

我当时勉强抑制悲恸，也用纸条写了两句，来安慰将要永诀的丈夫，上写：“我永远忠于你的意志，决不动摇，服侍二老，教养子女，请君放心。”又恳求看守送进去，看守出来告诉我：“刘国安说：‘见字知心，死无遗憾。’”这是刘国安被捕后两个多月时间我与他的唯一通讯。

志士慷慨就义

第二天（阴历腊月二十七日）我抱着孩子来到监狱门前等候。精神异常紧张，四肢颤抖，牙关作响，盼望着在他临终前我能见他一面。这时从监狱里出来一名特务，我问：“这回有刘国安吗？”特务反逼问：“你听谁说的？你听谁说的？”从中午等到下午3时，才从监狱里出来两辆刑车，“犯人”坐在车箱中间。周围是宪兵和特务，手持明晃晃的刺刀，开往浑河北刑场。这11名爱国志士，都有高度的民族气节，视死如归。有的高呼：“中华民族万岁！”然后慷慨就义。

我急忙赶到刑场，准备收尸，但行刑已毕，尸体已不见了。只见雪地上血迹斑斑，十分凄惨，我不禁泪水满面。

难过的年关

我悲切地赶回安东。无法掩盖事实，只好向公婆说明，安慰老人说："我养老送终，决不两样。"腊月二十九这天，安东警察署召集被难者家属，告知案件的处理，并催促在来年的正月初四日，到沈阳的关岳庙领尸。我们在安东，本来就无亲无故，在警特的监视下，谁敢同情我们，生活的来源断绝。手中原有的钱，去沈阳已花光了，年关在即，连挑水的工钱也付不出来了。经济发生了严重困难，在这火起火落的困窘处境下，全家老小都患火眼病。正是漏屋逢雨，祸结灾连，这个年关是怎么度过的可想而知了。

过了年，阴历正月初四日，变卖衣物做路费与王宝璋的妻子阎素芳赶到沈阳，在阎书刚（阎素芳的弟弟）的帮助下，买了寿衣和棺材，来到关岳庙。陆军监狱的管理人刘某，同情我们，给了很大方便，把刘国安尸体的血衣脱下来，擦净尸体，穿上寿衣成殓。即将刘国安、王宝璋的灵柩，一起雇车送到铁岭马蓬沟和大汎河分别埋葬。

迁回铁岭后的苦难

阴历正月十五日又变卖了东西家具，作为路费，我们全家迁回铁岭。生活稍微安定，但我的精神失常了，亲友看我有老有小，若有意外，谁来照顾这一家人呢！便一面劝解，一面给找工作。1937 年 3 月，我到铁岭龙首山小学代课。地方上的警察特务经常盯梢，学校不堪其骚扰，半年后离职。又经同仁帮助到距城 30 公里的阿吉堡子小学任教。这个偏僻地方，可以少些麻烦。但是因为应酬不周被调转更远更偏僻的杨相国屯小学。于是，一家老小又搬到这个小村，租了一铺北炕。3 个大人 3 个

小孩挤在这小炕上。天气寒冷衣服单薄，老人孩子冻得不敢出屋活动，只靠我一个人挣扎。到第二年暑假我不得不托人情，才得调到大汛河小学(距县城15公里)，恰好落脚在共患难的王大嫂阎素芳家里，她的16岁儿子听父亲被捕被害，心脏病发作，突然死去。只剩下王大嫂孤单一人，这时她的精神也不正常，我们在一起生活，互相照应，可以说相依为命。可是警特死死地盯着我们不放，可怜我们成为不可饶恕的罪人，每天提心吊胆。好不容易盼到抗日胜利，不料想蒋介石派兵进入东北，弄得物价飞涨，粮食奇缺，人民活不下去了。两位老人由于朝夕思念儿子，看到疮痍满目的情景，发愁上火，以致公公耳聋声哑，婆婆双目失明。1947年冬，缺柴无粮，两位老人相继故去，孩子们也因营养不良而夭折，只剩一个男孩总算活过来了。

老人死后，我也迁到沈阳。经朋友介绍，在沈阳市立师范做女生管理员，孩子也上了学。这时的沈阳市，粮价一日三涨，我们的生活更加困难，饥寒交迫，已进入山穷水尽的境地。幸而沈阳解放，不然早已转乎沟壑矣。

(摘自《沈阳文史资料》第二辑)

单荣道遭惨杀并株连其子

单熙明

我的父亲单荣道生于1892年，以优异成绩毕业于奉天简易师范学校。毕业后，被聘为安东县立小学教员，不久，升为安东县立第三小学校长。他为办学事业竭尽忠诚，经过10年精心筹划，将原来几间茅草平房的学校，建设成一座砖瓦楼房，成

为安东县立第一流学校。

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安东沦陷于敌。

在这国土沦亡，群众处于水深火热之际，爱国志士，奋起参加抗日救国活动，安东、凤城、庄河、桓仁等县的民众救国会，相继成立。

安东民众救国会组织起来以后，行动机密，成绩很好。会员每次开薪，由工薪中扣除部分，作为捐款，就这样月复一月的将所筹集的捐款，汇总送往东北民众救国会。

1936年秋汉奸盖洪洲出卖了桓仁救国会，会员被逮捕，组织遭破坏，接着汉奸李大华、杨慕平也出卖了安东等地区的救国会。于是安东、凤城、庄河、岫岩等地的组织也陆续遭破坏。会员全被逮捕。在教育界造成一片恐怖气氛。仅在安东一县受到株连而被捕者80余人，而这些被害者都是文教界的知名人士。如孙文敷、邓士仁、秦有德、孙朗轩、刘国安、单荣道、张镇藩等。

我父亲被捕经过是这样的：1935年深秋的一个夜晚，一群强盗深夜破门而入。一个特务问：“你叫单荣道吗？”父亲答：“是。”又说：“起来，穿好衣服，不许动。”接着就到处搜查，后又到学校进行搜查，最后把父亲带到汽车上押走了。

我家离张镇藩家不远，母亲心情悲愤地去张家打听消息，结果也是同一个时间发生了同样事件。同时还听说于里庭校长和迟疏久校长等人也都被捕了。

约一个星期，得到消息说是被押在日本宪兵队，母亲叫我送行李衣服，我背了行李到七道沟日本宪兵队，对门卫说明来意。站岗的日本兵横眉瞪眼，冷不防左右开弓，打了我一顿耳光，接着就照我小腿狠狠地踢了一脚，我被踢倒，日本兵举起

刺刀照着行李就是一刺刀，说："开路开路！"我当时是一个十四五岁的孩子，怎能受得了如此毒打，躺在地上，好半天才起来一瘸一拐地背着行李回家。母亲见我被打成这个样子，难过地哭起来了。

又过了半个月，母亲又叫我送行李，我也想看看父亲。这次门卫没有打我，而是把行李收下了。两个月后又通知我家去取行李，可是所取回来的行李，还是我送去的那个原样，根本就没给父亲使用。

事后听人说：我父亲等人被捕后，每天都受严刑拷打，用毒打、灌煤油等酷刑直折磨得我父亲七窍流血。逼问："你是不是抗日救国会会员？"父亲回骂说："你们是狗强盗！"日本宪兵就用烟头烧，直烧得他几次发昏，遍体鳞伤，接着又把两个大拇指吊起来飞打，日本宪兵仍然没有取得口供，最后又叫我父亲抱炭火盆，两手都烧焦了，最后的回答仍是"不知道"。爱国志士们受尽了酷刑，但无一人屈服。

敌人后来把我父亲与其他一些爱国志士转移奉天陆军监狱，继续审讯。

1937 年2 月5 日最后一次审讯，我父亲等11 人以"反满抗日"罪被判死刑，当他们被送到刑场处决时，志士们都大骂日本帝国主义狗强盗，高呼："中华民族万岁！"尔后慷慨就义！

父亲尸体运回乡里后，警察特务下令：不许烧纸，不许吹喇叭，不许念经，不许杀猪摆席，抬出埋葬完事。

父亲死后，我们自然是"反满抗日"的家属了，全家失去了自由，我是他的长子，更备受欺凌。

1937 年我正在职业中学读三年级，受尽了日本教师的欺凌。上体育课时，日本教师以练武士道为名，拿我当靶子，拳打脚踢，打倒了站起来，还得立正。入凤城师范学校，在校期

间，上劳动课，日本教师叫我挑大粪浇西红柿，不小心浇在叶子上，强逼我朝着西红柿跪着，叫我把大粪吃了，我不吃，他就往我头上浇大粪。

1939年冬由凤城师范学校毕业后，我被派到安东县村立小学当了3年教员。在这3年中，日本特务对我进行两次“身元调查”。1941年冬集训时，有一次因雪天迟到，日本教官当着教师面罚我跪，还拳打脚踢，进行人身污辱。

父亲死后，母亲带着弟、妹等搬回老家居住（安东市郊）。我家处于洼地，有一次大雨成灾，洪水把我家房子冲垮，母亲带领弟、妹到别处躲灾，保长宫明璋领着保丁，边赶边骂，你们是国事犯，反满抗日的罪人，不在自己家为什么还到处乱走，快回去！保丁押着母亲、弟、妹等回到被水冲倒的旧居，到残墙边，母亲一头就倒下了。

1945年日本帝国主义被赶出了中国，共产党、八路军解放了东北，我家才得翻身。

（摘自《沈阳文史资料》第二辑）

八

建立各类学校
为巩固伪政权服务

伪满开原实验小学

王 夏

开原实验小学的前身

开原实验小学，从前人们叫它日本公学堂。过去日本帝国主义，曾经于其所占据的满铁沿线各城市的附属地内设立了许多中小学堂，开原日本公学堂，就是其中一个。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了东北，成立了傀儡政府，在伪政府的统一规划下，便把这个学堂改为开原实验小学。日本帝国主义建立这个小学之初，本是做过长远打算的，所以校舍的建筑既坚实耐久，又堂皇壮丽。校址在花园的东南隅，所以又称为花园小学。该处地势宽敞，环境清幽，而且学校的设备完善。只就体育设备一项来说，排、网、足、篮、单杠、双杠、肋木、滑梯、秋千、平均台、轩轾板等设施，无不应有尽有。

尽管校舍和设备如此完美。但是一般人都不愿意送子女入学，原因是认为学日本语没有用。至于穷苦的人们，像这样的学校，他们不仅不愿意送孩子入学，根本也无力入这个小学，因为这个小学，要求入学的儿童必须是穿戴齐整，而且要干净利落的，穷孩子哪有这样的条件。在这里念到六年毕业，成绩好一些的，还可以考进满铁中学，或者给日本鬼子当个翻译；成绩差一点的，有些人是做了巡捕腿子，也有些人是做了洋买办。不管怎样，只要混点洋事，不仅有吃有喝，而且还能撑门面。

实验小学师资的选拔和教学情况

在公学堂的时期，教员大部分是日本人，中国人不过三四名。及改为实验小学之后，日籍教员逐渐调走，华籍教员越来越多。当1941年2月我到这校时，日籍只有校长冈村，首席福田。教员里只有一名女的，名叫武阿之。此外有个管庶务的名叫井口。这时华籍教员是11名。这11名教员比较起来看，应该是县内小学师资较高的。因为是实验小学，在人事上自然要侧重一些。因此伪教育科历年从师范毕业生里选拔一二名优秀的派来这校当教员，另外也从县内城乡各小学里选拔一二人。胜任的多留几年，不胜任的可以随时调走。调走以后绝大部分人做了校长。只要能到日本人山中大照（伪县视学）的家里去，借拜年叩节的因由，给小孩扔下个三十五十的，就可以派你做校长。要想挑一挑学校，那全看用钱多寡而定。如果拿个百八十元，就可以弄到离县较近的、条件较好的学校，但是一般人一时拿不出那么多的钱，就不能挑地点条件，只要能做校长对自己的颜面好一些，也就满足了。

在这个学校里，日语是压倒一切的学科，虽然“日语”课原则上都必须日籍教员担任，但到后来日籍教员少了，便不得不用华籍教员。但冈村很不放心，因为华籍教员不管他的日本话会得怎样熟练，如果要像日籍教员上课始终不说一句中国话，那是很困难的，因此冈村常去听华籍教员的日语授课，课后还要指挥一番，并且还让多听日籍教员的教课。日籍教员的授课主要靠手式、实物、画图等方式，越是说不好的话，越反复多次地重复，并不完全根据教材，目的在于实际会说、会写、会用。至于满语算术教得好坏，向来没人过问。

对日语的学习不仅限于课堂上，课外的日本话训练，抓得

也是非常紧的。为了让学生养成说日本话的习惯，便规定了学生每天来校和退校的一套日本话。比如，早晨来校时，见到教师说："先生早安！"午间说"日安！"晚上说"晚安！"临走说"再见！"如遇有的学生因不习惯忘了说的时候，一被冈村发现，就要着实地训练一通。让那个学生从外面走进来，立正后说"先生早安"，叫回去时，先行个礼，再说"先生再见"。遇着一些学生说得不带劲，便三遍五遍、七八遍的出来进去反复地练习。旁观的人都感到心忙意乱，直到冈村说声"约西"（好的意思），才能停止。冈村说完便哈哈哈几声狞笑，学生认为这比挨打都难受。

教职员晨会，本是这校创始的。每天在朝会前10分钟召开。所谓开会，也是冈村把当日记在预定行事板上的话，再重复地向教员们说两遍。冈村不在校便是乔本说。至于其他的人只不过是出两个耳朵听一听。每天都是这样，长了连听也没人听了。你讲你的话，我想我的事儿。不过凡是乍到那个学校的教员都摸不着头脑。问别人又怕人不理，觉得这么几句话都没有听出来，还配到实验学校来。越是这样想的人，越好出漏子，闹成笑话，或严重点的就不免受冈村的责备。

教职员晨会一结束，马上就继续响起了学生朝会的铃声。教员赶紧出来站在本班学生常站的位子前边，以监视学生。午会也是如此。站好队后，首先向天皇陛下和皇帝陛下遥拜，然后做"建国"体操，做完操冈村照例进行10分钟左右的训话。因为没有人给翻译，有些教员和低年级学生是听不懂多少的，但是今天讲大日本帝国，明天还讲天皇陛下；今天讲日满亲善，明天还讲一德一心。类似这样的词语是人人皆知的，其他的话一揣摩也就懂了。但在讲话中有一样必须注意的事，那就是一听见冈村提到"陛下"的字样时，必须赶紧立正站着。为了引起

人们的注意，司令员要喊出“立正”的口令，随着口令动作会一致。有一次一个二年级小男生正当喊立正口令时，偶然笑了一声，当时被冈村听见，着实地打了两个耳光子。

每逢节日或假日，师生们不仅休息不着而且要比平时苦恼得多。比如3月1日伪满“建国节”，4月29日“日本天长节”，5月2日“回銮训民宣诏纪念”等节日，在前一天照例要进行半日训练。训练行进的队形、步伐、喊口号、敬礼等。口令、口号，一律用日本语。半日的训练，中间连休息都没有，一连气就是3个钟头。级任教师喊得口干舌燥，同学们走得腰酸腿疼。

再有节日的服装。如果弄得脏了或坏的时候，一经查出来是绝对不允许的，这样一来，有钱人家的子弟可以准备两套，没钱人家的孩子就不好办了。只好洗一洗，补一补。如果洗得不干净或补得补丁不对色，被冈村一发现便要逼问，弄得小学生哭哭啼啼，级任教师心惊胆战。因为说不定冈村什么时候发脾气，一发脾气，就要斥责学生，甚至打骂。

特别令人讨厌的是冈村的没头没脑的讲话，一讲起来就几个钟头。不是讲大日本帝国主义的如何强大，如何仗义，尽力地援助满洲国，就是讲天照大神是个怎样的救世主。为了让学生听懂他讲话的整个内容，这时总是要人给翻译的。当他讲到得意的时候，总是眉飞色舞地越讲越有劲，学生站得腰酸腿疼，越听越厌烦：不管你听得再腻，腿站得再酸，甚至头晕了，也不得不听下去。

总之，冈村的讲话，有两重用意，一重是宣传“王道”思想；一重代替了日本语的讲课，因为别的学科都无所谓，日本语是时刻要灌输的唯一的科目。

严格的军事训练

每周星期三午后的半日军事训练，这是县内其他小学所没有的一个特殊科目。这也是令人最头疼的一科，所以每到星期三午后，简直如同过关一样。号声一响，在3分钟内，三年级以上所有的队员（即学生）必须迅速地跑到指定的阵地赶紧排得整整齐齐。哪一队迟钝了一些，小队长（即级任）就要吃不消。如遇冈村不顺心时，轻者厉声呵叱，重则来个集体性罚站，因此没有敢违犯的。

军训开始时是层层的报告。报告一律用日语。训练中更要绝对服从，如在前进中听到一声“卧倒”的口令，不论是壕沟、洼塘、或满是人畜粪便的地点，也得立即伏卧；前进中如果未下“立定”的口令时，即使是碰到墙也得越过去。所以在遇到墙壁较高的情形下，能爬过去的学生便爬了过去，爬不过去的也得手扒足登地做着爬过去的动作。不然的话便予以罚站罚跪、禁闭、打板等所谓的军事处分。

日籍教员对华籍教员的歧视

日籍女教员武阿之，人们叫她“捂袜子”，又叫她“武则天”。这是人们恨她，认为她很狡猾而且又很阴险妒嫉，因而叫开的。在她的心目中，华籍教员就是他们的奴才，只能听命，连提点建议的资格也没有。比如，有的级任提出学校应该研究一下怎样防止失盗现象。武马上放下脸子说：“校长的说话，别人的说话的没有！”意思是：你们中国人竟敢干涉学校的事，真不自量。

另外有个华籍女教员李国忠，为人聪明能干，很受学生的敬重，武因之深为嫉恨。有一次武的学生欺负李的学生，李凭

理解决两个学生的争端。武知之大为嗔怪，就凭一个中国的亡国奴才，竟敢这样地数落她班的学生，这真是胆大包天。因此便蛮横地对李说："你的满洲人，乱七八糟说话的没有，我的学生，你的管不着……"此后人们总看见李的满眼含泪和武的气势汹汹。

实验小学的黑幕片断

趁火打劫

实验小学在每年招考新生的时候，正是学校里一些头头和平时受宠的一二名华籍教员有利可图的良机。历年来由于绅商竞送子女入这校念书的人多，而录取的名额有限，势必有些人的子女录取不上，这样就有一些人要设法托人。托人就势必托靠在校最受日本人宠信的所谓"红人"，才有可能办到。而这些红人也常想给冈村效劳，有这样的机会，怎能轻易放过，一来这不但为了效劳冈村取得更大的信任，二来个人也可以趁火打劫，闹得个肥吃肥喝。因为凡是经过他们给办入学的，没有一个不花钱或送礼物的。花钱多是10元、20元（20元是当时小学教员乍出任的月薪），拿礼物的更较优厚：成袋的上等面粉，还要配上鲜鲤、罐头、蜜桔、好烟卷等。如，据我所熟知的两个华籍教员：一个叫石光复，一个叫王兆义的，因在校时间较长，日本话说得很流利，所以很受冈村的宠信。至于他俩受贿多少，又给了冈村和其他日本人多少，这是无从查考的，但是送礼物的人是不少的，这种情况也是当时人所共知的。

混水摸鱼

实验小学历年都要给学生统一订做学生服。年年的制服都做得瘦而短。有的体格瘦点的或个子矮一点的学生，穿上还可以看得过去，至于身体粗壮的，个子高的，同样号的制服，一

穿到身上又瘦又短。这样一到发制服的时候，就会有些学生来找级任。有的说，上衣太瘦，有的说裤子太短。事实上并不是学生捣乱，实在是衣服做得太不像话了。有的袖子短有一手，裤腿短二三寸，还有的裤子瘦得包在屁股上。学生嗷嗷级任，级任只好百般劝解。至于怎么会做得又瘦又短呢？大家是心照不宣的。如果是成衣局有落项，那么管庶务的日本人井口怎肯答应，冈村也不能答应，事情不是很明显吗？那么结果怎么办呢？吃亏的还是学生，只好拿回家去，弄点同样颜色的布，瘦的帮一帮，花的是好钱，换来的是不合体的、拼补帮衬的衣服。

日伪统治下的绥化“国高”

曹佩新

学校概况

我于1940年1月至1945年“八·一五”时，曾在绥化“国高”任教。

这所学校的全称是：北安省立绥化国民高等学校。简称绥化“国高”。校址在现在的消防队驻地，原伪县公署对过，是由民国时期的黑龙江省第二中学改名建立的。在民国时期黑龙江省有两所重点中学，第一中学在齐齐哈尔，第二中学在绥化。日本侵占东北以后，把第二中学先改称为：滨江省绥化中学，后来又改为北安省立绥化国民高等学校。伪满时期的学制是：国民小学四年，国民优级二年，国民高等四年，也就是说，念完国民优级才能考“国高”。

1940年秋，在南门外西边的“穷棒岗”屯（现在的太平岗机床厂所在地）新建了校舍，学校迁至该地。此处占地面积很大，但是设备简陋，属于学校的土地有300余亩，有教室12间，还有校长室、教官室、事务室、值班室、厨房、餐厅等。另有学生宿舍10间，日本教员家属宿舍10间，农具室一栋，农夫室1间，猪、羊舍10间，还有一个简单的气象园。

学校类型是农业国高，学制4年。我来时，一二三年级各两个班，四年级一个班，共有学生350名。这些学生半数是绥化城内的，其余来自五常、呼兰、郭尔罗斯前后旗、巴彦、望奎、庆安、铁力、绥棱、海伦、克山、北安等地，多数是比较富有的家庭的子弟，本县内的学生有少数是机关职员、工人、农民、小商人的子弟。

从1941年起，增加了朝鲜族班。班级按忠、孝、仁、义……的顺序排，新增加的朝鲜族班是一年级的仁班，后来把班改为组，至1944年，全校增至12个组（班），每个年级都是3个组，即忠组、孝组、仁组。

学校的领导机构

1940年我来校任教时，校长赵廷珍，首席教员是日本人山崎。1941年校长是曲振华，副校长是日本人未次。不久，未次调走，又调来个叫饭田的日本人任副校长。教务主任是日本人矢岛，事务主任是日本人今村。1942年曲校长调走，由饭田任校长。1943年，校长是日本人三好左门。1944年至光复，校长是日本人深城真义。中国人当校长，都配备日本人当副校长，日本人当正校长后，就不再设副校长。1942年前，表面上是中国人当校长，但实权在日本人的副校长手里。1943年以后则从名义到实质完全由日本人操纵。

招生情况

这所学校每年只招收100名学生，分两个组(即两个班)，还招收一个朝鲜族班，也就是仁班。因为伪满时期“国高”非常少，又无别的学校，所以附近十几个县的近千名考生都力争考取这所学校。由于招收数量少，招生制度不严，营私舞弊现象严重。在这种情况下，日本校长干脆明确规定：每个教师可以推荐一名学生，不论成绩如何均录取。这样一来更降低了质量。

除了按名额招收的学生之外，还有一部分学生是后援会(后援会是学校外一个组织，由当地士绅组成)成员的子弟，学校通过后援会可以向社会索取点供学校使用的物资，他们以胶车、马匹支援学校种地，因此他们的子弟入学不受分数限制，但不占录取名额。

课程设置、教学内容、方法和设备

日本对“国高”学生的奴化教育是逐步深化的，表现在课程设置和教材上是逐步渗透、逐步向深广发展。

(一) 课程设置

开设的课程有：国语、国民道德、数学、物理、化学、历史、地理、农业、英语(1942年以后列为敌性语言而取消)、音乐、图画、体育、军训。

(二) 教学内容

1. 国语。所谓的国语包括日语和满语(汉语)。日伪把东北人民称“满洲人”，规定日语和汉语为“满洲国”的国语。

日语每周6节，在各门课程中占授课时数之首。把日语列为国语是殖民地化的一个典型标志。担任日语课的教师均为日本人，他们不懂汉语，凡是讲课、提问、考试等均用日语，目的

是迫使学生学日语。

满语课每周3节，以前叫国文，后改叫国语。主要内容是文言文和白话文。白话文占多数，大多数是无名作者的文章，日本作者宣扬日本历代天皇、将相武士以及法西斯军人的传记、故事，如乃木大将、佐久间大佐事略等。还有曾国藩的文章。此外，也有少许鲁迅、朱自清的文章。这些文章都是挖空心思选的，或断章取义，或在讲授时曲解原意，灌输英雄造时势和做统治阶级驯服工具的思想。

2. 国民道德。国民道德课后来改为"建国精神"，是奴化教育的主要课程，其宗旨是麻痹学生的思想，泯灭民族意识，使之成为日本侵略者的驯服工具，内容有：

(1) 宣传日本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大和民族是优秀的民族，日本的"天照大神"是"世界之父"，宣扬"惟神之道"、"八纮一宇"。

(2) 宣扬学生要做"满洲国"驯服的"中坚国民（国兵、警察、伪官吏)"，守"学生之本分"。

(3) 美化日本侵略中国的"我国之建国"，其中讲在"友邦之援助"下建立了"王道乐土"，中国人应"报恩感谢"。

(4) 宣扬日满同文同种应相亲，对日本侵略者应"一心一德"、"共存共荣"、"民族协和"，建立大东亚共荣圈。

(5) 美化傀儡政权的"皇帝即位"、"天壤无穷的国体"、"忠君报国"。

(6) 宣扬"大东亚圣战完遂"、"大东亚圣战必然胜利"。

3. 数学、物理、化学。教材内容较浅，又没有良好的实验设备和药品，教师讲课基本上是照本宣科，只有认真传授知识的老师，教学很认真，例如刘忠贤老师，没有实验器材就用手势演示，边比划边讲，颇受学生的欢迎。

4. 农业。农业课分为农业、林业、畜产等内容，教材很不先进、不系统，原始的内容多，如《农业泛论》讲的全是过时的耕作方法和耕作制度。虽然属于农业国高，讲的农业并不先进。

农业课本原来是汉文的，后来改为课本的每一页的上半部分是汉文（当时称满文），下半部分是日文。到光复前，课本一律改为日文的。有个叫福田的日本教员，教三年级作物课，他不懂汉语，上课时就让学生把汉文先翻译成日文，学生故意给他难堪，他把全班的学生挨个叫起来，都说不会翻，福田毫无办法。因为我是这个班的班主任，他就找我，让我和学生讲，就说他的业务水平并不低，就是汉语不如学生，希望学生帮他翻译。我无奈，就找于观海、王秉禄两个学生帮他把绪论翻译过来了。这位福田就把这篇绪论翻来覆去讲了一个学期。

5. 军训。从1941年起，开设军训课，由伪满现役军人担任教官，一般是尉官或校官，多数是即将被淘汰的军人，另外配备助手一名。军训课的目的是为日本帝国主义培养盲目服从的顺民，并准备补充兵员，为其充当炮灰。开始每周两节，随着战争形势的变化，军训时数逐步增多，有时连续搞一个多月。军训课的内容完全和日本军队的训练科目一样，采取法西斯的训练方法，教官对学生要求非常严苛，最典型的是姚荣泰（陆军上尉），他完全继承了法西斯军人那一套。为了向上爬，对军训非常卖命，是忠实的走狗。每逢他上军训课都要由组长（即班长）用日本话喊“向教官先生敬礼”的口令。学生不会喊或喊错了都要挨打。每当他上课都拎个板子，手指着板子训话：“看见了没有，我就用这板子要成绩！”喊了立正之后，就到学生身后踢小腿，如果踢弯了，就说没用力站，随手就用板子打。有时到学生面前伸手要枪，学生不知怎么回事，就把枪交给了他，

这时又要挨打，理由是，武器不论什么时候都不能交给别人。这些事都不是先讲，而是打完了再讲。他上课，有时全班同学都挨打。

1941年秋，上面要来检阅。为了应付这次检阅，全校停课一个多月，体育教师也协助训练，除了队列训练之外，还有匍匐前进，利用地形地物进行战术训练，还搞野外军事演习，和日本侵略军的正规部队一样。搞野外军事演习时，姚荣泰因身体太胖走不动，就骑马指挥。自1942年以后，这种军训年年有，每年一至两个月。姚任军训教官期间，有三次上级官员到校检阅。第一次是第三军管区司令王之佑（中将军衔）来检阅，对姚的训练颇为满意，还题了“学贵有恒”四个字，挂在校长室里。第二次是第八军管区司令吕恒（中将军衔），第三次是伪北安省长李叔平。经过这几次检阅，他们认为姚确实和其他中国教官不同，是个实行法西斯统治的人才，得到了主子的赏识，将他调回部队，由上尉晋升为少校。

6. 历史。历史课程主要讲“满洲史”和日本史。所谓“满洲史”，是他们胡编的，将女真族历史单列出来，目的是不让青年学生懂得中国历史。日本史也是夸大其词，渲染吹嘘日本大和民族如何优秀。说“满洲国”是在“天照大神”的神光保护下建立的，是日本的一部分，根本不让学生知道中国的历史。

7. 地理。主要讲“满洲国”的，就是东北三省的地理，并细讲日本国的地理。把日本分若干个区域详细讲，目的是宣扬日本是世界上强大的国家。

8. 农业实习。这是“务实教育”的主要内容。名曰农业实习，实际是变相劳动。学校有农田20余垧，从种到收全是学生劳动。劳动工具是原始的，不讲农业技术，只是干活。

农田劳动由日本教官加藤负责，他说什么时间用人，教务

处就随时调动学生，有时上了半堂课也要停课，这类劳动一年2至3个月，缩短了授课时间，各科连一少半课也讲不完，星期日安排劳动不休息，所以，加藤有句口头语，把一个星期的日月火水木金土说成是“月月火水木金金”，没有“土”和“日”，即没有星期六（土）的半日休息和星期天（日）的休息。

（三）教学方法

学校在教学上不做具体要求，所以不少教师也就不讲究教学方法，教材也是七拼八凑，很不系统，凡是外国的人名、地名、国名、化学元素名称以及各种术语均用日语的“假名”来代替，还有些不伦不类的“协和语”。有些课本一半汉文，一半日文，至光复前，除了“满语”课本外，全改为日文了。

（四）教学设备

这个学校的前身是黑龙江省第二中学，当时设备很全，有较齐备的理化实验器材，藏书几万册，是商务印书馆发行的《万有文库》的重点装备户，按期发来书刊。“九·一八”事变后，学校成了日本兵营，大批书籍垫了马圈，实验仪器遭到破坏，改为“国高”时，教学设备已所剩无几了。

勤劳奉仕

所谓“勤劳奉仕”是为日本侵略者进行义务劳动。从1942年起，“勤劳奉仕”成为教学内容的一部分。其形式有两种，一种是临时性任务，如：修飞机场的“格纳库”（飞机堡）；修日本守备队的弹药库；给兴农合作社、农科所、日本私人农场筛小麦，选种、割玉米、起土豆、起牛蒡（日本人爱吃的疏菜）等。另一种是集中时间修筑工程。如1943年春天给四方台烟草株式会社挖水田修大坝，学生赤脚站在冰碴上挖土，修两个多月才完工（这座大坝即现在的四方台水田主干渠）。又如1944年修绥

望公路，住在野外，搭个临时窝棚，夜间狼嚎蚊子咬，狼有时竟冲进窝棚吃学生的剩饭。野外施工吃不到盐，有时也吃不上饭，加之潮湿，很多学生患了皮肤病、胃病。由于日本人把学生当成苦力，激起中国教师和学生的强烈不满，日本人来了就干点，走了就不干；还采取破坏工具的方法进行反抗，他们把两个土篮都装满满的土，使个寸劲一挑，扁担就断了，将铁锹使劲挖到土里，用力一别就折了，有时一天破坏工具无数。

课外的奴化教育

日本侵略者对中国学生进行奴化教育，不仅在课堂上、课本里宣扬“天照大神”、“日满同神”、“日满亲邦”、“父子之邦”，而且贯穿在日常生活中。

1. 教师朝会

每天早晨上班后都要举行教师朝会，由教务主任主持，全体教师排成两行，按方向先面向日本东京的“天皇”的“皇宫”，再向伪新京——长春的“帝宫”及“建国神社”遥拜（致最高敬礼，弯腰九十度）。然后用日语齐读《国民训》，不会日语的就跟着像念咒语一样，叽哩喳啦的念下去，谁也听不清念些什么。中国教师把这种例行公事视为儿戏，根本不当成一回事，只不过应付罢了。

2. 学生朝会

教师举行朝会时，学生就要在操场上集合，教师朝会结束，一同参加全校的朝会，学生按年组排队，校长登台听完各班学生组长报告人数后，由体育教师喊口令，分别要面向“天皇的皇宫”和“帝宫”、“建国神社”遥拜，用日语背诵《国民训》，唱伪《国歌》，校长讲话，宣扬一番“大东亚圣战”的“战果”，然后排队进教室。

1942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还要在朝会上祈祷三分钟的日本皇军必胜。其实，师生在祈祷什么，很难说了。

3. 周会

周会除了例行朝会的内容外，要由校长亲自宣读《回銮训民诏书》，灌输所谓的“日满亲善，一心一德”。

4. 诏书奉戴日

1942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每月8日定为“诏书奉戴日”。这一天，全城各学校师生都要在东门外“神社”（地址在现在的制粉厂）集合，由县长或副县长宣读《时局诏书》。后来这个规定改在学校举行，校长必须穿“协和服”戴“协和礼帽”，佩绶带，带白手套，由穿戴与校长相同的教师双手过顶捧出《时局诏书》（这个差事由有资格的教师轮流执行），校长在台上向“诏书”致最高敬礼，接过开读，念完后致最高敬礼，再交给捧来诏书的人，送回校长室的“神龛”里，接着校长讲话，照例宣扬一番“日满亲善”、“大东亚圣战”等鬼话。

5. 崇拜“皇帝”和“天皇”

学校要求学生在言行中，必须崇拜日本天皇和伪满皇帝，赞扬“日满亲善”，会背《即位诏书》、《回銮训民诏书》、《国本奠定诏书》、《时局诏书》、《国民训》。

6. 祭神社

每年的春秋两季都要举行“祭神社”仪式，由日本和尚念咒语，超度战死的日本侵略者的亡灵等。

7. 利用所谓的“节日”灌输“日满亲善”思想

每年都举行“天长节”（日本天皇的生日）、“万寿节”（傀儡皇帝溥仪的生日）、“建国节”（伪满建国日）的庆祝仪式，也是读一通诏书，给学生灌输一番“五族协和”（满、汉、蒙、回、藏）、“王道乐土”、“大东亚圣战必胜”的思想。

8. 日语检定制度化

为了诱惑学生学日语，在校内进行日语考试，合格的分别定为“一、二、三等”翻译的资格（三等就可以进行一般会话）。用佩带臂章的方式作为等级的标志，一等三道杠，二等二道杠，三等一道杠。还强迫学生用日语读《国民训》、《回銮训民诏书》、唱“国歌”、“校歌”以及一些颂扬圣战的歌曲，如果不用日语就要遭到毒打。规定朝鲜族学生，只能说日语和“满语”，不许说本民族语言。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下令所有朝鲜族学生必须改为日本姓名，要和日本人一样服兵役，很多学生改名时痛哭流涕，为了不忘祖先，他们改名时采取了在原名上加字的方法，如张奉秀改成张本奉秀，金正道改成金本正道。

“阶级”绝对服从

“国高”极力推行“阶级”绝对服从的军国主义的法西斯教育。学生必须无条件地服从教师，稍一不慎，就要受到惩罚，轻则责骂、重则挨打。在学生之间级别更为森严，高年级学生可以以任何借口打骂下级学生，不准下级学生反抗。年级的标志是别在领口上的“Ⅰ、Ⅱ、Ⅲ、Ⅳ”代表四个年级，学生之间互相见面，只要从标志上看出自己是下级生，就必须主动敬礼。因为字型小，很难辨认，下级生一时马虎，未给上级生敬礼，就要挨打，这也是培养驯服工具的手段之一。

“国高”教师的等级和待遇

“国高”的校长和教师都要根据学历和考试成绩授予职称。分为教谕、教导、教辅几个级别，并有官阶。

校长：校长属于职务不是职称，但大多数是由有“教谕”职称的人担任，是“荐任官”的官阶，和伪县长平级（伪满文官

分为：委任官、高等官、荐任官、简任官、特任官五等。

教谕：凡是伪满正式师范大学本科毕业的从事教学，定为“教谕”职称。

教导：凡是伪满其他大学，师道学校（相当于师专）和不是师范系列的留日大学毕业生从事教育，定为“教导”。

教谕和教导都是“委任官”的官阶，教谕以上公出可坐软席车。

教辅：不是伪满的大学毕业生和没念过师范的，包括旧民国大学毕业的人，定为教辅，是“委任官试补”的官阶。

教师的工资：

中国的教师工资很低，教谕每月七八十元（伪币），教导、教辅六七十元（伪币），生活是非常困难的。

日本教员与中国教员工资相同，但是日本教员的津贴相当高，有出国津贴、家族津贴等。津贴的数量高出工资很多。另外他们在生活上还有特配。如烟、酒、糖、茶、大米、酱油等。价格也相当便宜，生活非常好。

中国教师与敌特的斗争

为了反抗侵略者的统治，使青少年学生从被奴役中觉醒，中国教师利用上课、谈话等方式，常向学生讲中华民族的历史，传播抗日战场上的新闻。教师的言行引起了警察特务的注意。有一次宪兵队以反满抗日的罪名把王绍业和许德珩老师抓走了。王绍业经亲友的多方奔走，总算活着出来了，身体受到了严重摧残。许德珩则一去未还。自此中国教师在精神上受到了很大刺激。很多教师提心吊胆地工作，但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教师并没有放弃斗争，虽然没有组织，没有领导，但是大家觉得中国人民不能长期受他们的奴役，只要活一天，就给学生讲点中

国的事。为了慎重，在讲课时采取婉转的方式透露一些抗日内容。例如学生问老师"苏联是什么性质的国家？社会制度好不好？"老师就说："什么国家不清楚，但苏联人民很拥护，工业也很发达……"这样暗示学生就明白了。有时老师把消息暗地传给可靠的学生，在课堂上则什么也不讲。

随着形势的变化，特务密探对学校的监视越来越严，有时他们在老师下班后带着手枪到学校翻箱倒柜地搜查。有个王老师曾对我说："我每天早晨上班，都嘱咐家里，晚上不回来，就不要等我了。"意思是说被捕了。

宪兵队的特务为了严密地监视中国教师，把工友张桂林叫到宪兵队，让他给密探当"腿子"。那时我独身住在学校，下班后，他找我商量怎么办，他说："我是中国人，不能昧良心。"他不愿意干，打算不去。我说："你当也有好处，听到什么不利的消息可以早点告诉我们。"这样他当上了密探的"腿子"，从此每星期都去一次宪兵队，回来都详细地说些情况。有一次回来立即找我，他说："宪兵队很注意老丁头（丁春海老师），你告诉他多加小心，下班后哪也别去，监视很严，夜间他家的前后有好几个宪补（中国人在宪兵队当走狗称宪补，永远补不上宪兵）站岗。"我立即告诉丁老师，他知道这个情况后谨慎起来了，宪补监视三个多月，没捞到什么就撤了。

宪兵队每次找张桂林都问校内的反满抗日情况。他都说没有，宪兵队在他身上捞不到什么油水，就把他撤了，又在学校附近的地主家找了一个"腿子"。张桂林告诉我说：这回把张某某拉去当腿子，你们要小心点。

教师的状况

当时中国教师绝大部分是有民族气节、不甘当亡国奴的。他

们利用各种机会与敌人斗争，最典型的有王老师、张继哲、丁春海等人。他们在日本人面前不卑躬屈膝。例如王老师，当“诏书奉戴日”轮到他捧诏书时，他不是双手过顶举着，而是用胳膊夹着。由于他很有民族气节，教师和学生都很敬佩。日本人对他也不敢轻易下手。他当着日本教师的面骂伪满总理大臣张景惠“头脑昏庸，尚可利用”，他上课时经常给学生讲中国的状况，明确地告诉学生：“我们是中国人，不叫满洲人。”那时我们有收音机的教师，还经常在夜间收听重庆的广播，把这些消息不断向学生传播，特别是光复那年王老师领一部分学生到克山“勤劳奉仕”时，他和一些学生说：“小日本快完蛋了，没几天蹦达头了。”

还有些老师悲观失望，他们多是老年教师。他们憎恨日本侵略者，但对中国的前途悲观，经常以打麻将、吸鸦片、酗酒来解闷气，他们还寻找适当方式向日本人发泄不满，比如酒后装醉打他们，嘲笑他们。

日本教师大多数经常打学生，在中国教师面前吹嘘他们的武士道精神。少数日本教师有厌战情绪，对日本军国主义政策不满。如田中教师在日本人面前不讲话，但对中国师生很亲近。日本侵略军连连失败，兵员不足，日本教师中的丙种在乡军人也成了强征对象，被强征入伍的感到末日来临，哭哭啼啼，“大和魂”’精神一点也看不见了。

学生状况

学生中只有极少数相信日本帝国主义的那一套，绝大部分学生对日伪的奴化教育不满，不甘心当亡国奴。他们要求老师多讲关于中国的历史、地理和抗战消息。毕业后不愿替人卖命，看不起唬洋气的警察，骂他们是“警察狗”，毕业时日本侵略者

"鼓励"学生当警察，待遇比较高，可是去的人却很少。

伪国高的结束

1945年8月15日之前，连续降了40多天雨，8月15日这天突然放晴。这天早晨从"新京放送局"（广播电台）发出预告："今天午间有重要新闻，请注意收听。"反复播了几遍。中国教师都纷纷议论，猜测是什么内容，午间人们都在家里收听广播。原来是日本天皇无条件投降的诏书。这个惊人的消息，一下子振奋了中国教师，久受压抑的心头吐出了塞满胸腔的闷气。下午上班时我们都喜气洋洋，扬眉吐气，说话的声音都比以前高了；日本教师则个个垂头丧气，有的眼睛都哭肿了。校长深城真义又把在校的学生召集到操场，讲了几句话，大意是：8年的中日战争，我们失败了，你们胜利了，战争从此结束了。讲完话一改往日的傲慢姿态，恭恭敬敬地给中国教师和学生行了一个礼，懊丧地走了。伪"绥化国民高等学校"，也随着日本帝国主义的投降而结束。

（摘自《绥化文史资料》　韩玉江整理）

我所了解的伪满建国大学

刘第谦

伪建大的校址

伪满建国大学（以下简称建大），位于长春市斯大林大街（伪满新京大同大街）最南端的西侧，地名欢喜岭。建大坐西面

东（现为航校及工业学校校舍），北邻伪建国忠灵庙，西邻畜产兽医大学。两座石砌的敦台，构成了没有门的校门。进入校门绕过花坛不到百米是大礼堂，名曰“养正”，是集会与武道训练场所，规模较大。礼堂南北两侧各有一幢两层建筑，是图书馆和教室。礼堂西是大操场，与礼堂相对的是食堂和浴池，其两侧各有6栋半月形的平房，是前期一、二年级宿舍，三年级宿舍在西北侧，是两层建筑。其东邻为医务室与病院，东南为校本部，称“本馆”，是学校办公室和后期教室。后期塾舍、食堂在前期之南，相距500米左右，由两幢三楼组成。以上统称校部。校部迤西，南是一片草原，北是丘陵沟岔。校园内有农田和各种训练场地，占地65万方坪（坪是日本计量单位，合36方尺），折算为3210亩。殖民者选择此地，理由有二：一、南湖之滨，景色宜人，幽雅寂静。二、邻近有伪建国忠灵庙。建大要求学生死后入庙享祀为“最大光荣”和“最高理想”。伪建大塾歌最后的一句话是：“建国忠灵庙，是我们的归宿。”以此鼓励学生作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政策的牺牲品。

伪建大的培养目标

1937年2月在伪满新京成立“建国大学创设准备委员会”，5月在东京形成为“建国大学创设委员会”，组成这个委员会的15名委员是：关东军参谋长东条英机（伪满总督府的二把手）、总务厅长官星野直树（伪国务院的真正主宰者）、陆军参谋本部少将作战部长石原莞尔（核心人物）、陆军省军务局满洲班长片仓衷、关东军参谋部第四课部员辻政信（做具体工作）、协和会总务部长甘粕正彦及作田庄一、平泉澄、筧克彦、西晋一郎、张景惠、罗振玉、袁金铠、伪大同学院院长井上忠野、稻叶岩吉等所谓“各界名流”。

1937年7月15日——17日于新京军人会馆大礼堂召开大会，出席有东条、星野、作田庄一、平泉澄、筧克彦、稻叶岩吉、宇田一、辻权作、张基景惠、罗振玉、袁金铠等人，由东条任委员长，星野副之，会上通过了《建国大学创设要纲》、《建国大学令》、《第一期生选拔要领》、《教授聘请计划》及“建校三阶段”等有关规定，并议定学校名称为建国大学。接着修建校舍和招收学生，翌年5月2日正式开学。

伪建大的培养目标是：“造就深刻体会建国精神，彻底实现日满一德一心的骨干力量。”即要在建大培养出一大批桢干“栋梁之材”、“满洲国的国士”、“协和会的职员”。至于协和，殖民者解释说“以力合者谓之协；以义合者谓之和”，即“通力合作建设新国家”。建大《总则》里也说：（建大学生）“都是实现协和理念的同志。”因此，建大学生入学后必须参加协和会，毕业后约有五分之一左右的人分配到各级协和会。

伪建大的总长（校长）是伪国务总理张景惠兼，副总长是名誉教授作田庄一兼。张景惠在担任总长期间，是个尸位素餐的挂名校长。除掉每年8月的开学式上由他领诵特颁“诏书”和毕业式上伪帝来校时由他领班三呼万岁以及日皇裕仁的三个胞弟——秩父、三笠、高松宫，朝鲜废王李垠来校视察时，他伴同前导外，另外什么都不管。给学生做过几次训话，但三句话不离卖国求荣的老本行。比如，有一次精神训话，他讲了一阵令人作呕的建国精神后，貌似关怀青年的样子说：“官是有你们作的，可别闹事，过去（可能指三·一八惨案），北京学生闹事，不是都叫段总理搁机关枪给突突了吗？”接着又介绍自己叛国投敌当汉奸的经验说：“要多练手腕儿。”“要好好保养身板儿，这可是本钱啊！”“我老啦，靠我靠不住啦！副总长（尾高）那人倒是挺厚（忠厚）的，跟着他，没错儿。”“要听话！当长官的

最稀罕（喜欢）听话的，谁听话谁有出息！”

1941年大礼堂落成时，请他题横额，他题的“养正”二字，写得一大一小没有对称，当秘书把日本人写好的养正二字拿来让他摹拟，他说：“又让我挥毫啊！”因为他不懂这是句恭维话，一时传为笑柄。他自知傀儡，所以他对副总长作田说：“我不懂教学，一切拜托您多操心了……你看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吧！”

副总长作田庄一，是1905年东京帝大的毕业生，1908年应聘到我国武昌，任湖北法政学堂教习，以后又留学美、英、法三国。他任京都帝大助（副）教授时，讲授《统制经济》，同左派名教授河上肇针锋相对。因不受学生欢迎，长期不得提升。1929年的世界经济危机之后，日本走向法西斯化，河上肇被捕入狱，作田否极泰来。1930年他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提升为教授，1931年擢为经济学部长（院长），1938年1月被提升为伪建大副总长。

作田主宰建大后，尽管他的政治立场是反动的，但他敢于提倡学术，从东京、京都两帝大请来了筧克彦等3名名誉教授，千叶、福岛等7名教授（都有博士学位），又从朝鲜请来名教授崔南善，从北京大学请来名教授苏益信、鲍明钤。由于崔南善参加过“三·一”独立运动，朝鲜总督南次郎提出过抗议，苏、鲍二教授参加过抗日爱国活动，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寺内寿一也提出异议，所有这些，作田先生都毫不动摇。一个时期建大的教授特别多。1943年我考入建大时，教授与副教授还有七八十位。师资队伍这样庞大，是和作田的雄心分不开的。有人说，作田要把伪建大办成一座名副其实的最高学府，最低要赶上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最高是把建大办成一个开放的世界性大学。他打算请中国的胡适、印度的圣雄甘地、俄国被放逐的托洛茨基、美国的《大地、分家、儿子们》的作者巴里·巴克……来校讲

学。他对教授的讲学是尊重的，对学生的学习是重视的，虽然还谈不上学术自由。因此，在他掌政的四年半期间，这所造就帝国主义统治中国人民工具的伪建大成了名副其实的伪满洲国的最高学府。

关东军宪兵队对建大中国学生的爱国活动进行第一次镇压是从1941 年末开始的。11 月逮捕孙松龄，12 月逮捕杨增志，1942 年1 月全面大逮捕，到4 月才算基本结束，共捕学生18 名（包括闻风逃跑2 名）。最后以“反满抗日罪”判处无期徒刑者2人，绝大部分判处15 年，最低刑期5 年（注：日伪对伪建大进行过三次逮捕：第一次是在1941 年11——1942 年3 月，先后捕去杨增志等16 人，加之闻风逃到关内的2 人，共18 人；第二次在1943 年开学不久，在一天上课时突然点了10 个人的名字，接着捕去8 人，未捕去的2 人逃入关内；第三次在1945 年5 月，捕走乔百令等9 人，未待判刑，因日本投降他们就出狱了）。

在大讲“民族协和”的最高学府里，反满抗日被捕的人数也最多，这不能不说是一个讽刺。作田副总长同塾务科长（后改部，管学生训育）青本副教授都因此而放声痛哭，承认办学失败。尽管如此，作田还是到监狱去看望在押同学，他一副惋惜的样子，说：“你们并非因道德败坏而犯罪，你们是为了自己的民族宁肯捐弃自己生命的人，是政治犯……我不但不责备你们，还希望你们能够挺起胸膛活下去。”当关东军因此事件诘责他本人时，他从容不迫地答道：“在民族协和没有真正实现之前，出现这种事件，是无足为怪的。”据说，作田曾要求关东军：把这批被捕学生交给他，由他负责进行再教育，而未被允许。最后作田不得不因这次事件于1942 年6 月16 日引咎辞职。只保留了建大名誉教授职务，回到自己的故乡山口县。

离职后，他对建大还是念念不忘的。1943 年他由故乡风尘

仆仆地来校讲学。题为《王道乐土的理想》，讲课时两眼望着前方，发音清楚，语调缓慢，谈到“民族协和”时，他说：“满洲建立帝国时（指1934年），学生也提灯庆祝，但在解散回家的路上，他们就把提灯踢坏踩扁，并且都哭了……可见体会王道乐土，民族协和之不易。”又说：“日满两国，名为两国实是一家，王道乐土、民族协和必将实现。”“但令人遗憾的事不断发生，民族协和并未实现，这是不可容忍的，希望你们……做出榜样，做出贡献。把王道乐土的理想变成现实。”

接替作田主宰建大的是日本国军事参议官陆军中将尾高龟藏。他毕业于日本陆军大学，是战犯东条英机的上级生，是1938年7月，对苏挑衅的“张鼓峰事件”的指挥官。尾高在军界的资格很老，常常倚老卖老。1944年秋，东条来建大讲话时，我亲见东条先敬礼他才还礼，尾高登台致词时，虽然也吹捧东条一手创立建大，是什么“建大之父”，但对东条的称呼却是“东条君”，而不用敬称的“阁下”。这表明他就是在职位低于东条的情况下，照旧摆老资格。

尾高来校后，与前任显著不同，第一次讲话，他就发誓要把建大变成一个：“深刻体会建国精神，适应‘大东亚圣战’需要的一所新型大学。”也就是说“加强奴化教育及军事训练，为侵略战争效力卖命”是他的办学方针。正因如此，他把前任作田的重视学术改为重视军训和思想控制。从这以后伪建大的军事训练加强了，服从命令被强调到无以复加的程度，就是校务会议上最后也要由“副总长阁下”（人们必须这样称呼他）来“统裁众意”，以“指挥官决心已定”的口吻一锤定音。他的德政是：先是军事教官打学生，继而有些教授、副教授也不止一次地打学生了。

尾高这套以治军的方式治校是适应日本帝国主义太平洋战

场上节节败退，垂死挣扎的形势的需要。说他把建大变成一座大兵营也不过分。1944 年秋，他举行了校内阅兵，这一天，他骑着高头大马，由军事教官太田登执辔随行，宛如皇帝巡狩。在看完战斗演习登台讲话时，他挥舞右拳，大骂三浦少校（伪军配属武官）是完全失败的指挥。顿时全场愕然。

尾高是日本法西斯军人里的死硬派，1945 年，建大的日系适龄学生全部被征入伍，中国学生从6 月份也开始“勤劳奉仕”。前期一、二年级在校搞农业生产，三年级以上先去沈阳兵工厂（奉天造兵所），一个月后再到公主岭飞机工厂（满洲飞行株式会社中机械处）从事生产军火武器。8 月8 号，尾高到公主岭“慰问”，翌日清晨就碰上空袭，起初人们还以为是美机B——29，半个小时后，当番（值勤）报告说：“苏联敌机30 余架来袭。”尾高霍地站起来问：“没有弄错吗?”当番学生答：“确实，苏联对我宣战了。”这时尾高二目圆睁，呆视远天，下意识地猛拍一下大腿，失声地说道：“完蛋了。”下午，他奉电回新京参加关东军紧急会议，行前，他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对大家作了个简短讲话，说什么：“这才是我们盼望已久的战争哩！……这才是真正的战争哩！……真有趣啊！……皇军必胜。”

“八·一五”前夕，伪满洲国的首都——长春市陷入一片混乱，日子最不好过的关东军一直担心和恐惧的厄运终成为现实，在关东军高干会议的一片哭声中，只有尾高一个人跳出来大喊：“我要带领建国大学学生抵抗，给我30 万元经费，我去打游击。”结果是，钱款领到手后，第二天照数退回，声称：“我干不了！”

光复前夕，七、八期生的日系同学还剩70 多名，学校以护校为名全体发给实弹武装起来，一为随时出战，二为监视中国学生。8 月11 日，尾高带领青本副教授与安倍教授等来校，召集全体学生在操场集合，武装的日本学生站在一边，徒手的其

他学生站在一边，尾高戎装登台，喊完“皇军必胜，苏军必败”的口号后说：“苏军已到白城子，日本学生全体参加游击战，‘满’、‘露’（俄）、鲜（朝）系中自愿参加者，跨出队列一步。”他连问几遍，只有（家靠近日本）济州岛的一名朝鲜族学生参加，余无应者。无奈，他只有宣布：“参加保卫战的发给军装、军器，其余的到公主岭参加勤劳奉仕。”接着他又到大同学院，要学生接受军事编制，准备在苏军占领区打游击，结果碰了钉子。8月15日上午，气急败坏的尾高全副武装，率领两卡车荷枪实弹的关东军来到大同学院，下令三期生到操场集合，把学生代表万兴治、宋立生等喊出队列，接着他抽出战刀威胁学生说：“胆敢拒绝打游击，把建大精神扔到哪里去了？”想不到学生代表并不理他这一套，沉着地申明不去打游击的理由。如果在平日，尾高早把战刀一挥顿时血肉横飞了，但这时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已成定局，行凶杀人当时就得不到好下场，于是也只有软下来。两个钟点后，日皇宣布无条件投降。日本投降后，尾高还以“打游击去”为名，拐走学校全部公款，包括90万元的教职员退职金。他换上中国老百姓的服装，携带妻子和3个女儿逃之夭夭，幻想有朝一日东山再起。

殖民者的怀柔政策

伪满学制是春季始业，各大学招生统在下半年进行。第一批招生在9月，由建大一校招收；第二批招生在10月，由军官学校一校招收；第三批在11月，由18个普通大学招收。报考建大的手续是：凡经国民高等学校校长推荐，学习总平均在90分以上，操行甲等，经官立医院检查，证明身体健康者方可报名。先经校方审查、平衡受理后再邮寄受验票（准考证）。考试分两次进行：第一次考试在哈尔滨、长春、沈阳、大连、承德、安

(丹)东、锦州、吉林、牡丹江等地举行。对中国学生考：1、日语；2、常用语（本族语）；3、历史；4、地理；5、数学；6、作文（有的年度常用语与作文合并）。经笔试合格者发给往复路费，供应食宿到本校参加口试与身体复检，这是第二次考试。因为是用日语授的课，所以口试主要看日语程度。也有知识测问。我记得向我提出的问题是："孟子的民为贵、君为轻，你怎么看？"这题很刁钻，因为伪满提倡尊孔读经，目的在培养忠君与等级服从观念，而孟子却提出"君为轻"，所以考生必须对这个矛盾作出合于他们口味的分析和解释才行。体格检查在军医院进行，检查得细致而严格，最终合格者寄给入学通知书。由于每个考生对建大、军校与普通大学有三次应试机会，结果每期建大新生同时考中三校者几占半数，余者考中两校，只考中建大一校者，虽非绝无，也是仅有，够得上按殖民者需要的德、智、体标准择优录取了。当时很多中学生对建大是向往倾慕的，因为它待遇好，也因为它六年制，幻想可以学到一些东西。还有一个最现实的原因是：伪满的大学考试，特别建大、军校两校没有徇私舞弊和人情后门，这是尽人皆知的，加上它又是全公费，结果在这所"最高学府"里反倒是家境不佳者占相当大的比率。因为家境贫寒者自知求学不易，有些人又一心要改换门庭，因而焚膏继晷孜孜以求。在伪建大的总共500多名中国学生中，只有七期生谷学谦（东北师大副教授）是伪交通部大臣谷次亨的侄子、八期生袁樾林是伪尚书府大臣袁金铠的孙子。谷学谦本是高才生，袁樾林是投考两次才考中的。他入学后，同学们对他有议论，以为是照顾所谓的"建国元勋"子弟。为此，校当局曾郑重宣布："袁樾林是成绩合格被录取的，不存在照顾之说。"殖民者之所以这样不徇私情，从严考取，主要是为了把学有成就的知识分子全都拉拢过来，以便为自己造就一批有使用

价值的人。

选拔从严，有利于中国学生爱国集体的形成。如果改为推荐制，专门推荐亲日分子，情况就将大不相同了。

其次是待遇从优：新生入学报销旅费，入学后发给被、褥、毯子、呢子和布做的学生服、帽子（校内战斗帽、校外大沿帽，伪满各大学只有建大、军校戴大沿帽，其他各大学仿日式戴四角帽）、皮鞋一双，胶鞋、手套随时补充，此外还有饭盒、水壶、书包等，学习用品、伙食、医疗完全公费，每月还发给零用钱5元，称为津贴。毕业后送入专门训练伪官吏的训练所——大同学院受训3个月，结业后一律给以高等官试补任用及150元伪币。另外，开校之初，伪帝特颁“诏书”，日皇三御弟及废王李垠来校视察以及战犯东条的两次讲话，都被说成是高看一格的“政治待遇”。

建大学生毕业后要到大同学院受训一事，在1938年颁的《建国大学令》里并无此项规定，1943年建大第一期毕业那年，殖民者考虑到，伪大同学院与建大都是造就伪官吏的场所，不注意将会发生两个各立门户的文官系统。为此，3月15日，以“敕令”修改《建国大学令》，补充规定前期是二年半修了，后期照旧三年毕业，毕业后到大同学院受训三个月。6月，一期生毕业，接着到该学院受训，学习《建国论》、《满洲行政论》、《官吏道》等十几种课，结业后任伪官吏，从此成为定制。

在建大，确实是把假协和扩大到最大限度，用石原莞尔的话说：“一律平等是铁财”，但这是假的。说它假，是因为“协和”是钓饵，收买是目的，谁都知道，父母受压迫，而对自己表示“善意”这是狐狸设宴。说它假，假在假戏真演，以一件“小事”为例：中国学生为了请假回家，便由家中拍来电报：“父病危笃，速归。”千篇一律，都是类似理由，结果“危笃”的

父母亲一个也没死。任何人都能鉴别出来电报的理由是假，但负有控制与监视学生任务的塾头，几乎无例外的都给假，并在给假与消假时两次给以慰问、安抚。这种心照不宣的假戏，一直演了8年。

伪建大的建制

（一）行政机构

建大在伪满的统治机构中，是伪国务院直属的一级组织。它同大陆科学院、大同学院一样不隶属于文教部，而是与它平行。

校本部设总长一人，总揽校务；副总长一个，襄赞总长。名虽如此，实则不然，汉奸总长并无实权，而副总长名虽襄赞，实乃主宰。整个伪满都是这样，建大自不能例外。

总长以下的直属机构：

1. 校本部

（1）1938——1944年设6科1室

总务科　　科长：高木一也；副：泷川淳。

教务科　　科长：教授重松信弘；副：村教三。

军教科　　科长：陆军大佐小松茂九万。

训务科　　科长：教授富木谦治。

塾务科　　科长：助教授青本敏彦。

图务科　　科长：教授登张信一郎。

医务室　　医官：军医大佐小原德太郎。

（2）1945年起为5部1官（改医务室为医官、并训务于塾务）。

总务部

庶务科长：江原节之助。

教务部　　部长：教授千叶胤成。

基础科主任：千叶胤成。

教务科长：教授森下辰夫；副：斋藤毅、伊藤满。

文教科主任：教授四宫兼之。

政治科主任：教授村井藤十郎。

经济科主任：教授须永秀弥。

前期科主任：教授森信三。

塾务部　　部长：教授村井藤十郎。

塾务科长：理事官吉川武德。

前期塾训育主任：教授安倍三郎。

后期塾训育主任：教授村井藤十郎。

军教部　　代部长：陆军大佐铃木重义。

图书资料部　　部长：嘱托中岛犹次郎。

图书科长：中岛犹次郎。

资料室主任：助教授大村道渊。

医官　　军医大佐小原德太郎。

2. 参议会与评议会

参议会是备伪总理大臣（建大归伪总理大臣管辖）咨询机关。有权讨论与决定学校大政方针，委员由会长（总理大臣）任命；评议会备总长咨询，包括校内日常工作及有关教学重大措施。

3. 大学院

《条例》规定："招收毕业生优秀者与其他大学人员中经认为合格者。从事建国精神和对专门学术之深入研究。"又规定："无固定年限。"事实上大学院只有建制并未真正成立。其因有二：一是1943年是日帝走下坡路的一年，无意于发展教育事业；二是1943年6月第一期毕业时，副总长作田已离校一周年，他的班底也随之失势。军阀尾高无意也无力领导大学院。

4. 研究院

是作田经营的，尾高来校后扩大了研究队伍，安插一批他所认为合格的人为研究员。

《条例》规定："以建大之教授、副教授为主，吸收大同学院、大陆科学院、师道高等学校、政府、协和会之主要成员构成。""研究建国原理、国民思想、国家政策、必须学问之蕴奥，以及研究以精神团结为中心的治校方案，用以指导学生。"

研究院承担了《满洲建国十年史》(1932年——1942年)和《满洲百科辞典》的编写任务。

学院组织机构、主持人名单如下：

院长：由副总长兼任，1942年尾高易作田。

基础研究部　　部长：文学博士千叶胤成。

文教研究部　　部长：文学博士福岛政雄。

法政研究部　　部长：总务厅次长松木侠。

经济研究部　　部长：院长兼任。1938年——1942年经济学博士作田庄一；1942——1945年陆军中将尾高龟藏。

综合研究部　　部长：协和会中央本部总务部长官原达郎。

1941年有研究员66人，1942年激增至120人，其中，中国人不到10名。反映了不但在行政部门是日人的一统天下，研究部门也是一手垄断。

出刊了"期刊"、"研究报告"和一批"论文"。内容是反动政治方面多，专门学术方面少，并仅限于作田时期。

（二）学生

1. 学年编制

按《建国大学令》规定：前期授普通课，3年修了（1943年3月改为二年半）属于预科性质；后期授专业课，3年毕业，属

于本科，共6年。

2. 学生的民族比例

建大是多民族汇集的学校，各期（年级）都由汉、满、蒙、回、朝、日、俄7个民族构成，殖民者出于不可告人的目的，硬把7个民族分成两个对立部分：

“满系”别称“大陆系”，包括汉、满、蒙、回、俄5族，统以伪满洲国的“满”字命名，而非满族。这是伪满的官方称呼，目的是让各族都承认自己不是中国人，而是“满洲国”人，俄国人也不例外。“满系”每年录取的人数不等，一期生55名（最少的一期），三期生64名，四期生77名，五期生84名（最多的一期），平均每年召70名左右，其中蒙、俄两族受照顾。录取时留有固定名额，不问分数高低必须录取10名左右，其比例概为蒙7俄3，我所在的六期则为蒙9俄4。

“日系”别称“海洋系”。以大和族为主，包括日帝直属殖民地朝鲜半岛和台湾省的汉人。日本殖民者的“理由”是：他们都是日本国籍，这样，硬把东北的汉族同台湾的汉族划分为两系，以及对东北出生的朝鲜族学生，不论其汉语程度如何高，日语程度如何低，也不许随“满系”入学。日系的招收人数：1938年为95名，1943年96名，1944年103名，1945年105名，年平均招收100名，如果加上新三期则超过110名，即使把台胞加入所谓的“满系”两系的比例还是日占五分之三，“满”占五分之二。

上面所提的“新三期”，是因为建大从四期起改为由国民高等四年毕业生考入，这样日系生就会多念两年，为了不吃这个“亏”，校当局在三期生下一年级中又招收一期日本学生，叫做新三期（后并入老三期），日本人还嫌不够，规定从四期开始，“满系”先入学一年，到二年级时，日系新生再插班入学。这样

做，客观上对中国学生的民族团结大有好处，全塾只有塾头与日系指导学生是日本人，私自开会都可以办到，迨第二年日系新生入学时，中国学生的集体业已形成，日系处于被动地位，很难收隔离、分化、控制之效。后来，殖民者察觉这是怕吃小亏（日系多念二年）却吃了大亏。于是赶忙改弦更张，重新规定：从八期起两系同时入学，但为时已晚。这样，建大的四——七期，都是中国学生先入学一年，只有新三期例外。大战后，回国的日本同学总是把新三期称为四期，四期以下顺延，出现了中国学生八期，日本学生九期的与实际不相符的情况。两国复交后，中国同学提出：建大共有八期而非九期，新三期已并入老三期并非独立的一期。直到1981年，日本学友才接受了中国学友的建议，废止了九期之说。

3. 在籍学生总数

建大在校生的总数，最有代表性的是1943年，因为在这以前年级不齐全，在这以后人数变化大，只有这一年六期俱全，延期征召的规定尚未废止，从而人数稳定。这一年一期生（后期三年）107名，二期129名，三期224名（旧制生144名、新三期80名），四期166名，五期187名，六期（前期一年，这一年没有日系）82名，总计在校学生895名。

1944年春，学生总数是929名，这是建大在校学生数的最高峰，足资参考。但到这年夏季，日系学生大批应征入伍，以致6月19日二期生毕业时，原有的129名学生，只毕业了53名，表明在这期间有70多名日本同学被“天皇陛下御召”去了。其他各期也大致如此，日本同学的人数大大下降，使中日学生的人数对比开始颠倒过来。

4. 毕业生总数

建大毕业了三期学生，大约210名，中国学生居多。

1943年6月12日一期生毕业。由于伪帝溥仪“御亲临”，折腾坏了全校师生，事前演习了一星期。届时路上布满军警，师生肃立以待，装模作样煞有介事，无非是殖民者为提高傀儡的形象与建大身价而进行的一次矫饰做作滑稽戏。9点20分，伪帝莅临。毕业典礼开始——伪帝庄严伫立，全体肃然致敬；接着由张景惠向106名毕业生颁发毕业证书；行礼如仪后到操场，进行了做建国体操、伪帝阅兵、全体学生通过主席台以分列式给伪帝看等一系列活动。一直闹到11时30分他才“启跸还宫”，典礼于斯完成。这天下午一时，日文版《满洲日日新闻》便以头版头条刊登建大毕业式消息及分列、毕业式照片，下午全校宴会。晚上举行庆祝晚会，毕业生由挂名校长在总理官邸设宴招待。

一期入学时共150人，毕业时为什么减少44名？除少数死亡、降级者外，主要是第一次大逮捕和逃奔祖国者一期生也占相当比重。日系学生还有20人左右当兵（因为首次废止延期征召，还采取自愿和挑选，所以波动面不太大）。到1944年6月19日53名二期生毕业时，日系毕业生只剩下一个人，仪式也不像一期毕业那样隆重。原因是：1943年7月，由废止延期征召改为凡是大和族，不问体格好坏一律入伍。到1944年进一步规定，凡属日本国籍者一律当兵。连建大的副教授以下的日系教职员也不例外。因此二期毕业时，日本同学只剩下1人。对入伍的，一律发给毕业证，承认学历。

三期毕业的时间是1945年6月，那时德国早已投降，日本侵略者面临末日，毕业式草草举行。这期毕业可能是55人，日本同学只有北冈宪一郎1人。

这三期毕业生大约210名，日本学生占十分之一稍强。

5. 建大师生在籍总数

战后日本同学成立了“建国大学同窗会”，对建大八期学生及教职员的人数、生存者、死亡者、消息不明者作了调查统计，发表在同窗会刊行的第26期《会刊》(1983年10月12日版)上，此表可能有遗漏。根据《建国大学要览》所载：一期150名，二、三期（加入的新三期为80人，此表为85人）234人，四期171人，五期180人，六期185人，七期185人，八期160人，共1 406人，比此表多27人。其次，它忘记统计由各大学考入之后期一年生。1940年一期生前期修了，校方于是年招收各普通大学毕业生（包括在职大学毕业生之适龄者）。从一期到五期，每年招一次，人数平均为4—5人。例如三期考入3人，四期考入6人。这批同学未列入入学人数总数，约20名上下。

（三）塾制

“塾”，在我国是旧时民间教读的场所，最早见于《礼记·学记》：“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庠。”后来传到日本。明治维新前夕，日本有名的学者、教育家长州藩士吉田松荫在山口县的下关附近建立义塾，称“吉田义塾”。由于吉田熟通汉学兼懂洋务，便在义塾里传授尊王、攘夷、倒幕，主张维新。培养了板垣通助、伊藤博文、大限重信等“维新八义士”，成为维新的骨干力量……（明治）维新派胜利后，“塾”与吉田的名字深入日本民心。可见“塾”本身并不是什么坏东西。

建大的塾，在建制上隶属于塾务科，并非行政一级组织，但因其能起奴化的特殊作用，有特殊的存在价值，因而把它当作一种制度看待。

建大的塾，有五种职能。

1. 新生入学后，马上编入塾。每塾在20人左右，不超过30人。在塾头的管理下，在指导学生的具体指导下，塾生在塾中起居生活、复习课业、锻炼组织性、纪律性、集体观点和办事

能力。即所谓“培养共性，锻炼个性”。

2. 建大的“塾”所起的作用：掌握与控制学生的思想行为为主，课业居次。其主要对象自然是中国学生。塾用民族合塾，待遇一致以示“协和”。真正用意在于对中国各族学生起隔离、监视、拆散团结的作用；另一方面用繁琐的宗教仪式、紧张的武士生活，说日本话，过日本式的生活，从思想到习惯、耳濡目染、日久成习，用以进行奴化，以达到彻底日本化。

3. 塾设塾头和辅佐官，掌握一切。塾头是日本名词，即一塾之长，是舍监、学监、辅导员，由副教授、教官一级的日人担当。辅佐官是由一、二期毕业生留校人员担当，是见习塾头。他掌握与控制学生的思想，监视学生校内外的活动，根据学生的特点，因人施教，寓奴化教育于生活中，最终目的是：把日系造就成为殖民者，把“满系”造就成为殖民者的奴才。

塾头以执行塾训育为业务，他们都讲《塾训育》课。该课无固定钟点，围绕时事、政策（校政）、生活现存问题，灌输“建国精神”“民族协和”等谬论。主持全校训务的辻权作少将也亲自当塾头，讲《塾训育》课。

每当学年结束时，塾头对塾生的“塾生活评语”，能解决塾生的去留、升降。因此，塾头的职位虽然不高，作用却颇为重大，可以说，他才是奴化教育的具体执行者。

4. 前期各塾设指导学生，由后期生中的中、日上级生各一人担当，由塾务会议决定。他们同塾生一同起居、食宿。白天上课，下课回到塾来。中国人任指导学生的大多数是爱国的，他们用虚抓塾生活来应付塾头，用“暗渡陈仓”的手段，实抓中国学生的爱国团结。

指导学生的任务是：协助塾头管理日常事务，指导塾生的生活，起示范作用，故称指导学生。他是塾头提名校务会议决

定的。

5．“塾当番”，即值日或值周。由于建大的办学宗旨是养成“躬行实践的指导者”，因此要使每个人都有锻炼组织能力和处理事物能力的机会。为此，建大从不设立长期任职的班长，而是按日文字母的姓氏的顺序，挨次值周。在值周时，他是班长也是舍长，在塾头领导、指导学生指导之下，起传声筒和带头人的作用。一般地说，塾头掌握全面，管大事，指导学生管生活、纪律及学习；塾当番则是处理一天里的事务。

在塾当番之外，还设有“塾务委员”，由最高年级学生3～5人组成。大致分工如下：

（1）管理伙食的2～3人，可称之为伙食委员；

（2）管理浴池，每日开放一次，可称之为生活委员（伙委兼）；

（3）管理图书室，每晚对学生开放（看、借、还书），可称之为图书委员；

（4）管理统一行动，起床、集合、三餐、熄灯时敲大鼓，可称之为总值周。

以愚民政策为基础的奴化教育

（一）教育特点

1．宗旨

深刻体会“建国精神”，建设“道义世界”。

《建国大学令》里说：“在于体得建国精神之神髓，研究学问之蕴奥；躬身实践，养成道义世界之先进的指导者为目的。”

如何深刻体会“建国精神之神髓”，作一个“道义世界”的“先进指导者”？

所谓的建国精神，实质是如何看待伪政权，特别是伪政权

与殖民者的关系。殖民者要求中国学生这样认识：

——“九·一八”事变是日帝“为避免满洲为赤俄所侵吞，才冒群疑而不避，犯众咎而弗辞，仗义兴师，解我倒悬”；

——日帝制造伪政权（伪满）是“假我尺柄、授我丘民”（即：日帝通过伪政权，统治3 000万同胞，去建设最终成为日帝直属殖民地的“王道乐土”）；

——日帝在东北的掠夺资源，输出资本乃是“帮助友邦开发”。日帝侵略东北有“理”，压榨人民有“功”；

——“日、满名虽两国，实为一体”，中国人要同殖民者“一德一心”，让日帝永远霸占东北以求“共存共荣”；

——日帝不但是“友邦”，而且是“盟邦”、“亲邦”；“满洲国”不但是“天皇陛下御棱威”的恩赐，也是“神光开宇宙”天照大神留下来的“杰作”；东北人民不但要感恩戴德，而且要争取“日满合并”，成为“皇民”；

——中国人要“仰赞天业”，帮助日帝的“大东亚圣战”（太平洋战争）的“完遂”（胜利），最后达到“八纮一宇”的“伟大理想”，即把东亚的“八纮（即八方）放在日本的统治之下，成为“一宇”（日本统一），以建设“大东亚共荣圈”。这就是建国精神的“神髓”。

所谓的“道义世界”就是要建大学生在深刻体会建国精神的神髓之后，按照日本殖民者训练自己的模式，再去训练自己的同胞，也让他们像自己一样，心甘情愿地认贼做父和附敌为奴。并且不止于此，还要把殖民者一手制造的“满洲国模式”搬到关内去，“让4亿人羡慕3千万”，最后完成把东亚的“八纮”统一在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之下，这也就是“大陆政策”的最终目标。能为这“道义世界”（大陆政策）出力卖命的人，就是“先进的指导者”。

2. 特点

为了实现上述教育宗旨，伪建大在培养、训练学生的具体实践上有三大要求：一是教育与政治实践密切结合，就是不从政的人也要了解政治；二是教育与劳动相结合，即学以致用；三是文武结合，军训，同时用武士道精神武装学生的思想。它强调：

（1）行重于知。建大历来提倡："领导者不只是办公事、发命令，更重要的是带头实干。"干，就是实践。

根据其重视实践，知和行的摆法是："实践为经，学问为纬。"即实践为主体，学问是辅助。

知，首先是钻研以等级制为基础的"皇道"、"王道"、卖身投靠为敌效命的"建国精神"，然后才是统治人民所需的知识。

行（实践），在建大是以"塾生活"为中心。在那个日满合塾的条件下，说日语、学日本习惯、过日式生活，亦步亦趋、且学且行，达到一个模式，才算得打下了实践的基础。在此基础上，通过各种训练——军、武（剑、柔、弓、合气武道）、农训，马、枪、剑、滑翔术甚而去扫猪圈、睡牛棚，以培养武士道精神。

正因为行重于知，所以尽管建大生在入学考试时选拔从严，校内考试却形同虚设。升级并不根据考试，塾头的"塾生活"考查结论才是决定一切的。甚至毕业考试，也不过审查一下"毕业论文"和走一个国家考试的过场而已。

因为学习无压力，写毕业论文时又允许借阅禁书作参考，这给中国学生读中国书、读进步书大开了方便之门。

（2）德重于智。建大对学生的要求是："陶冶人格，涵养德操及研究学问之蕴奥。"又说："以修养为主眼"，这样，学问只能是"敬陪末座"，这说明德重于智。

德——性格与德操。殖民者对中国学生所要求的"德"是：

按照武士道精神与风范雕塑性格、涵养道德规范，一直“修养”到能够甘心附敌、与敌同化，变成个准日本人，才是殖民者所要求的德操与人格。有了这样的“德”，再加上知，方能够得上殖民者所要求的标准。

（3）中坚官吏

“中坚”一词系“协和语”，释为骨干或核心。建大毕业后，经过短期训练，便任命为伪官吏或协和会职员，成为效劳敌人的骨干。

（二）学习

1. 以基础知识与精神训练为主体的前期课程（预科）。

（1）训练课

精神训练80节，军事训练430节，武道（柔道、剑道）训练260节，农业作业230节，精神讲话95节，共1 195节。

（2）文化课

自然科学与高等数学365节，人文科学120节（包括政治、经济、哲学诸概论、心理、伦理诸学），历史（包括西洋史、东洋史、日本史、满洲国史）330节，日文300节，汉文330节，第一语学（日系学生学汉文，满系学生学日文）535节，第二语学（按志愿报名编班，英语、德语、俄语、法语、意大利语、蒙古语6种任择其一，另编班，从二年级开始学习）295节，共2465节。

三年总共3 660节。一年级授1 200节，二年级授1 200节，三年级授1 260节。

2. 以分科学习为主体的后期课程（本科）。

（1）训练课

精神训练、军事训练（诸兵种联合训练）、武道训练（柔道、剑道、弓道、合气武道任择其一，合气武道是日本化的武术）、

农事训练（农耕、蔬菜、畜产加工、农产加工）、操作训练（汽车、滑翔机、练习机、机械修理）。

（2）基础学科（共同课）

教学：建国精神、神道与皇道、儒教、诸宗教概论、公务论。

哲学：哲学原论、现代思潮、学问论。

地理学：地人论、地域论。

史学：历史理论、世界史论。

国家学：民族学、国民心理学、统计学、社会学、国家原论、国防论、民族协和论、东亚联合及国民团体论。

文学：国语及外国语、东西方古典。

武学：武道及武术论、战史、军战论、战略论及战术论。

实学：农学、工学大忌、医学大忌。

（3）分科

甲、政治科（科，相当于学院，但不分系）

一般科目：政治地理、政治史、政治思想史、政治原论、法律史、法律原论、法律思想史。

统合政治论：政治制度、外交政策、东亚政治等共7种。

保安政治论：军法、刑法、警察法、民事诉讼法、商事法、涉外法等共8种。

厚生政治论：厚生政策、农村政策、都市政策、土地政策、人口政策、家族政策、生计政策、保健政策、文化政策。

国际政治论：外交史、国际法、国际政治。

由统合政治论到国际政治论等共4类，俱以伪满及东亚为对象。

补充科目：选定经济、文教两科中之一定科目共通学习。

乙、经济科

一般科目：经济史、经济思想史、经济原论、经济地理、经济统计论。

国民经济泛论：经济组织论、经济制度、分配经济、财政经济、企业经营、计划经济论、经济国防论、东亚经济论。

国民经济各论：开拓论、农林论、矿工论、通运论、贸易论、配合论、金融论、汇兑论、保险论。

世界经济论：世界经济泛论、世界经济发展史。

补充科目：选政治、文教两科中之一定科目，共通学习。

丙、文教科

一般科目：文教史、经学、皇学、道德学、艺术论等共11种。

国民文化：满蒙文化、日本文化、中国与西域文化、印度与西亚文化、西洋中世与近世文化。

国民教育论：教育原论、教育方法论、教育行政论、教育心理学、学校经营论。

国民教化论：教化原论、教育政策论、教育事业论等6种。

世界文教论：世界文教等2种。

补充科目：政治、经济两科中之一定科目共通学习。

3、教学情况

伪建大的师资阵容大致是：名誉教授6名（中国人2，罗振玉和袁金铠），教授37名（中国人2，高起元和马冠标），副教授50名左右（中国人3，迟镜诚、李松五和柯纲安），讲师30名左右，外加几十名助手（助教）。在伪建大的中国教师，有爱国的，有死心塌地为敌人服务的。

前面说的那个马冠标是个汉奸，他是伪热河省省长，帮助日军进攻八路军，失败被免职后，来建大当教授，提起学问一窍不通。前面说的那个高起元（蒙族），他的诗文在国高语文教

科书里有两篇。自称当过溥仪的老师，平日长袍马褂，瓜皮小帽，厚底布鞋，宽边花镜，地道的清朝遗老。他仇视白话文，曾因我们不爱听他用八股的方式讲解古文大发牢骚说："你们不喜欢八股文,说明你们不知道八股文的奥妙！你们专喜欢白话文，白话文算是什么东西？贩夫走卒操之，引浆卖果者道之，何学之有？白话文只能写出：'两个白蝴蝶，双双飞上天，上也上不去，下也下不来！'一类的诗来。这是诗吗？狗屁！"于是连骂"狗屁"不已。副教授中柯纲安先生造诣深，教法好。诸子中《庄子》最不好讲，柯先生却把老、庄的思想体系，介绍得条理分明深入浅出，对《庄子》的构思巧妙、想象幻奇、词汇新颖，特别是浪漫主义色彩、寓言的构思精深及其对后世的影响，发挥得痛快淋漓，至今印象尚存。最使人讨厌的是无休止的日本语以及建国精神一类课，到这时，同学们大都在下面偷看禁书，而对于第二语学任何语种，都能刻苦钻研，孜孜以求。

建大哲学老师强调王阳明哲学的"知行合一"中的"行"。指出人格锻炼与素质养成"是行的出发点与总归趋"。把"行"也把"德"都置于优先地位，之所以不重视知，是因为殖民地实行的是愚民政策："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他们认为被压迫者"知识越多越反日"。因此殖民主义者在建大甚至提出"不贩卖知识"的口号。

伪建大没有体育课，如果谈到"德智体全面发展"，则是把各种训练权当体育锻炼。因而建大尽管拥有广阔校园，但无像样的体育场，也未开过像样的运动会。

伪建大奴化教育最明显、最突出地集中于史地课。其特点为：歪曲、篡改史实和史观的绝对反动。

建大开4门历史课：把世界史（实为欧美史，并且只讲古代）叫做《西洋史》，把中国史叫做《东洋史》，还有强调"万

世一系”吹嘘“民族优越”的《日本史》以及胡编乱造的所谓的《国史》(东北史)。

《国史》是从古肃慎始，目的在于证实东北地区自古就是独立国，今天还应是日帝卵翼下的“独立国”。胡说什么“东北是满、朝、蒙三族的天下”，“汉族是恃强侵入的外来民族”，“日俄战争时，日本为了邻邦满洲，宁肯赌国运而不顾”，“为帮助邻邦开发满洲，投巨资而不惜”，“九·一八”事变是因为“邻邦满洲为赤俄所侵吞，英美野心觊觎”，日本才“冒群疑而不避……”

在《日本史》讲到“明治维新”时，有意地联系30年后我国“戊戌变法”之失败，苦心孤诣地得出这样一个反动结论：“国家犹如生命，也有幼、青、壮、老、死（灭亡）阶段。日本处于青年时期，故朝气蓬勃，因此不但维新胜利，而且一战胜清，再战胜俄，三战胜德。……强国、大国皆为我所败，……今日再胜美、英，……无疑当可实现。”而中国“虽曾有历史上‘汉唐之盛’，但事逾千年，青壮年期已去，如今衰老垂死，暮气沉沉。故康、梁辈有心谋国，无力回天，以致国事日非，蹶而不振。”用以暗示：“衰老垂死”的中国，只好等“朝气蓬勃”的日本去结束他的生命了。

《东洋史》是以中国史代表东洋，教者山本副教授是个殖民者派头十足的人，对中国学生颇有不屑一顾的神气，其殖民主义观点比比皆是。他把民族英雄岳飞说成是“没有政治头脑，缺乏全局观念”的“一介武夫”，而对臭名昭著的秦桧却加以肯定，说他为中华民族做出了贡献。说秦桧虽为中国人所不喜欢，但他毕竟是一位政治家，他懂得全局，深谋远虑，看得更长远，所谓“识时务者为俊杰”者是也。果然，宋金议和，不但换来了百年和平，而且南北经济都得到了恢复与发展。公然颠倒是非，

颂扬起中华民族的败类来了。只有讲到民族英雄郑成功时，这位反动教授，不但无一贬语，而且颂扬有加。他不厌其烦地叙述我民族英雄郑成功与父决裂，坚决抗清，赶走红毛夷（可能是暗以荷兰人指美英人），可惜天不假年，只活了39岁……言下不胜惋惜。正在我们肃然静听，并对他居然也能"实事求是"地介绍"史实"并给以正确评价，从而正欲对他刮目相待时，副教授的真意图亮了出来。他郑重其事地提醒道"国姓爷（郑成功受隆武帝赐给明王朝国姓朱，日本人尊称他为"国姓爷"。）所以能有这样的崇高品质和彪炳功绩，不能不归功于他的日本血统（郑成功的母亲是日女田川氏）并且因为是在日本长大（实际是7岁回国），具有日本人的优良传统，才能够……"

地理课虽不同于历史课，但任课的伊藤副教授还是抓紧一切机会向学生进行奴化教育。讲课时，他总是严格分清敌、我、友，等差有别地给以褒贬，当然是牵强附会、生拉硬扯地进行的。但总是离不开美英及其盟国可恨，最终必败；法西斯德意日可爱，结果必胜。他还以反动的《地政学》观点给法西斯的侵略政策张目。他说："日本本土局处四岛，地狭人众，资源匮乏，海洋之国，近水文明，素有雄飞之志，绝不可局处一隅，因此必须以满洲为生命线。""意大利的'靴子'伸入地中海，地势险要，扼居要冲；古罗马文化武功大张，又是文艺复兴的发祥圣地，由它来制霸地中海，乃是天意民心之所归。""德意志（日耳曼）民族是优秀民族，但地处四战之地。如果不能东胜俄，西败法，必为所困。并非好战，实乃发展之所必需。"这位"学者"传授给学生的，是这套强盗逻辑。

4．"特别讲座"

（1）日本作家小林秀雄、林房雄先后来校讲授文学和文艺理论；

（2）日本名僧（忘其法号）来校讲“禅道”，即参禅、入定、悟道一类唯心的玄空哲理，最后，作为结论，纳入“惟神之道”；

（3）请合气武道（日本化了的中国武术）的日本名人来校传授技巧、招数；

（4）请伪满作家古丁（名徐长吉）来校讲文学；

（5）1943年请日本相扑（日本摔跤）的退休横纲（主将）来校传艺。此人身材高大，艺名天龙，曾在天皇御前（驾前）献过技。我塾“大个子”巴图巴雅尔（蒙族）与他对阵。天龙由于年老，可能在传艺时没有认真对待，竟被巴图摔了个仰巴叉，中国学生大声喝采。为了挽回声望，第二天天龙单捆巴图交锋，未及两回合，巴图便被摔倒。由于天龙的招数过狠，使巴图右臂脱臼，挣扎不起。此刻中国学生一拥而上，背起巴图直奔医务室。天龙面对空无一人的现场，只好搭讪着走开。

（6）也是1943年，校方请来协和会《青少年指导者》主编姜学潜来校讲演，全体中国学生参加。姜先生是爱国者（1944年被捕入狱，后来下落不明）。他主编的《青少年指导者》以“协和”号召中国青年团结，以做人号召青年爱国，建大生几乎按期购买，人手一册。他到场时，列座整齐的同学们，不是以日式的注目、挺胸向他致敬，而是起立和鼓掌，就像欢迎久别重逢的老朋友，这种场面在伪满是罕见的。姜先生讲的话至今记忆犹新，如：“听说大家都能苦读书，课内钻研以外，课外还能用心读好书，这条路算是走对了，我祝贺你们。青年人难得的是找到正路。要读下去，认真读些于国于民有利的东西，那就是力量。”（鼓掌、会场活跃）“叹苦、哭穷、求人谅解，是懦夫的行为，无用！要紧的是：咬紧牙关苦苦做人！”“大家不要以为生不逢辰，倒霉是事实，一时改变不了，在于你怎么看待？

这一段既然不可避免，你早出生20年，你儿子来承当，晚出生20年，老一辈来承当，倒不如自己来承担。对亲人也用得着自私吗？咱们‘满人’最大的缺点是自私。人人顾自己，谁去顾大家？”真是讲者有心，听者有意。

（三）生活

伪建大学生一律住宿，家住市内也不通读。这既是因为公费食宿，更是因为制度要求学生："过严格明朗之规律生活，以锻炼身心。"具体情况如下：

1. 繁琐的宗教仪式

建大生活的基本单位是“塾”，叫做“塾生活”。前期塾，一、二年级是平房，一栋房分为三部分：一端是寝室，按日文字母顺序排列铺位，入门处有两排枪架，每人一支“三八式”步枪（军训用），另一端是自习室，两排（四行）写字台，九盏电灯，够得上宽敞明亮。中间用十字走廊分为四个室。塾头室、盥洗室、厕所、物置室（日本名词，即仓库，每人一个柜，放随身物品），学生的行动以敲大鼓为号（只有上、下课用电铃），叫做“兴亚大鼓”，大鼓声闻几里以外，是名副其实的“大鼓”，中国学生私下叫它“坑亚暮鼓”。

建大一天的生活是这样的：早5点30分起床（冬季延一小时），盥洗15分钟，再闻鼓，由当番带队到操场集合——升旗、敬礼、向裕仁、溥仪所在方向遥拜。行礼如仪后，作建国体操，操毕解散，由当番带队跑步回塾，登床正坐（本是唐代坐式，日本保存下来，实际是跪坐，表示郑重），先齐念几遍“民族协和、王道乐土”的口头禅（中国学生私下叫“念咒”），然后闭目“默念”——考虑一日之计，末了听指导生或当番发表今日行事（日程），再去上早自习。7时早餐，伙食定量，每餐给铝制大碗一杯（日文，一碗）饭，小碗盛汤。早饭照例是苞米粥，午间

大米饭，晚饭或是大米掺高粱米，叫做“白高”，或是大米掺小豆叫做“红饭”，粗细粮间杂的原因是日系配给（供应量）的是全大米，“满系”是全粗粮。为示同甘共苦、“民族协和”，我们“同甘”，日系“共苦”才这样做的。这在各大学还是唯一的特殊（社会上，中国人吃大米犯法）。至于菜，每餐一小碗汤，早餐是土豆胡萝卜酱，午餐四人两盘菜，其中一个是荤菜，晚餐或荤汤或荤菜。在我入学之前，特别是30年代，比这好得多。

吃饭也有仪式。饭前要唱赞歌，由塾头领唱，颂扬天照大神（太阳女神），饭后也唱，再感谢丰收大神（农神）赐给食物。动箸、停箸听指挥，饭前要用日语说“拜领了！”饭后要说“太丰盛了。”1943年以后粮食短缺，每餐一大碗饭根本不够，尤其早饭一碗粥，总是半饥半饱的，但也还要说：“太丰盛了。”

白天，上午上课，下午训练，年级越高，训练递减，下午有时也上课。

晚饭后到熄灯前算是自由时间，也分两段，前段是自由支配，后段是自习时间，这时也可以到图书室借书阅读（原则上是一同自习）。到敲大鼓宣布自习完了，都要回到寝室，登床正坐，听塾头以下的“官”训示、总结然后闭目反省，检查一日的成败、得失（即经验教训），下翌日之决心。再闻大鼓响，宣布准备就寝，各自向家乡方向行大礼，对父母叩首问安。9点30分就寝，不许开夜车，早起则无限制。

2. 紧张的日式生活

建大规定用日语作为民族合塾的公用语言，生活方式也是日本式的。殖民者认为，让中国学生说日语，学日文书，过日式生活，久而久之，自然也就同化了。

殖民者对中国人惟一的慷慨是传授日语，不但认真教，并年年进行“语学检定”，合格者是工作人员，按级领津贴，生活

习惯也要你认真学，只要亦步亦趋，就是好学生。比如，每天的菜，有一半是日式的。“味噌汤（大酱汤）”实在难于享受，就是日本人奉为上品的“真在”（译音，以糖加盐熬小豆，掺以小片面饼，类似农村的疙瘩汤），中国人也吃不惯。不吃，饿得慌，吃长了，也就习惯了。

刚入建大，有些习惯使人吓一跳。如“闹塾”就是一例。日文叫“斯透目”，记得我入学刚一星期的一个夜里，突然电灯全部复明，闯进来一群上级生，有的敲着铁桶，有的挥舞竹剑，有的戴着鬼脸，有的化了怪装，上蹿下跳，呼号喊叫，活像群疯子，一进屋就把我们从被窝里拖出来，要我们同他们一起行动，于是我们只有穿个裤衩蹦跳起来，装着高兴得发了狂。直闹到筋疲力尽，才共唱塾歌象征团结，鼓掌欢呼表示尽兴，接着再到别塾去闹……这种“闹塾”在其他庆祝节日也不例外。还有一关，叫“试胆会”，这是有组织的。新生入学后，学校安排一个晚上，按塾先后集合，发表行经路线及指定挂名报号的地点，然后每隔5分钟出去一个人，一路上都是沟岔野岭，或是三岔路口，要求必须按路线走完，为此，在指定地点要挂名报号（有人在暗处记。这是模仿日本武士临阵报号，叫“纳挠力”）。当你走在昏暗处，有人突然高喊：“投降吧！”你必须怒骂一声，并喊“杀”三声，表示皇军宁肯玉碎（战死），也不降参（投降），当你走进空屋子，在室内昏暗的灯光下会看到青面红发，巨口獠牙，狰狞可怕的鬼怪，这时你要绕它一周，并向他报名挂号。最后，当你走进一个黑屋子，电灯会突然亮起来，三五个日本上级生手执竹剑、木枪向你冲来，你虽然徒手，也要作出反应：摆出冲锋架势，怒气冲冲高声大喊“杀”，才算合格。过不了这一关，在总结讲评时，就要受到学校的严厉批评和同学们的讥笑了。

建大很重视学生的健康，因为它是武士道训练的基础。学生每日必须洗澡（还提倡冷水浴），绝不许喝生水，但洗脸必须用凉水。小病到医务室，大病住院。医院设备齐全，病号饭质量好，护理、饮食与用药，中日学生无区别，并一律公费。

建大不重视田径、大小球类运动，用军事训练、各种武道如柔道等代替体育，认为这样“既能养成尚武精神，学得武勇技能，又锻炼了身体，一举数得”。作体操，除“建国体操”外，还有军事体操，如冲破天、摇地球、伏地挺身、伏虎等。另外，特别重视跑步，在尾高来校后，一切讲战斗化。这是扩大侵略战争时期的必然现象。

3. 战斗的集体活动

我在伪建大二年半，身历目击耳闻的有下例一些集体活动。

每年校庆纪念日（5月2日）、毕业式、新年，届时都要以塾为单位，在后期食堂举行文艺汇演。

在校内，尤其是在“勤劳奉仕”时举行营火晚会，点起篝火，奏起乐，边唱边舞，中国学生不善舞，由日朝两族学生垄断。还有个人表演。

一年一度举行武道年级对抗赛。主要比赛剑、柔两道，枪剑术，合气武道只作表演。

我记得三年来，我只参加一次校内运动会，声势不大也无像样的纪录，这同校方不重视有关。

我参加过两次市内大型武道表演大会，全校停课参加。其中一次是“南北满对抗赛”，我校武道教官八木是北满的主将，结果失败。另外市内举行马拉松赛，建大也参加，但从未开过市内或“全国”运动会。

后期毕业与前期修了，都要入营锻炼两星期，体验军队生活。1945年5月，我们六期生前期修了，到军官学校入营，未

到军校之前，军校校方就向全体宣布："建大学生中，有相当一部分人思想不良，来入营时，有老同学、同乡关系者，禁止与之接触。"为了夸耀军校的战斗化，不但要求军校学生行动迅速、准确、武勇，并加强了锻炼服从的嘴巴教育。届时被教育者要做好：双手掐腰、两脚叉开，既显示挨打时也武勇，又防备猛打时被人打倒。进行"教育"者，不是用巴掌，而是用拳击面颊，经常打得口角流血。军校老同学说："你们快滚吧！我们为你们多挨多少打。"

军校入营后，接着是两周的政治"实习"，分为社会调查与地方服务两种，我报了"满映宣抚队"，是跟随该队到热河，慰问进攻八路军的日、伪军。我们7个同学想去找八路军，没想走到大虎山，这个宣抚队奉命撤回，原因是"治安情况不允许"。

我入学后，每年暑期，都要勤劳奉仕。"勤劳奉仕"一词来自日语，"勤劳"是干苦力活，"奉仕"是作贡献，即无偿劳动。伪建大初期，只做过校内劳动也修过公路，但当时带自愿性质。1942年末，伪满公布《学生勤劳奉公令》，"勤劳奉仕"成为定制。这是敌伪垂死挣扎，强征人、财、物的一种手段。1943年到绥芬河的附近东宁修战备公路；1944年三赴（此前，上级生去过两次）黑河附近的山神府修战备公路；又回到吉林市北部的金珠站修公路；1945年先后到沈阳兵工厂和公主岭飞机工厂劳动。勤劳奉仕期间，因为是打乱年级重新混合编组，这给中国学生上下级的结识、交往造成机会。

为了"涵养武士道风格"和"适应临战体制的需要"，建大每年都要进行一次军事演习，时间一般地选在春夏之交，至少持续两天。最大的一次是一期生于1941进行的那次演习，一直"打"到吉林市，最后是乘火车回长春的，共费了一周的时间。我参加的1943年那次演习共进行了两天，上午8时半出发，每

人发三联空包子弹，携带机枪、掷弹筒，如临实战。开始后，一面搜索前进，一面不断发现新情况。一日之间，“两军”交战三次。晚间露天宿营，夜风袭人，大地为床，身下冰冷，本想起来跑步暖身，又怕“暴露目标”，苦苦熬了一夜。第二天又“强攻高地”，这是最后的一战，也是演习的最高潮。因为过度劳累，返校行军时，肩部隐隐作痛。回校后先洗热水澡，当晚伙食大改善，破格地给酒喝，然后放了一天假。

（四）控制、分化、拉拢

殖民者作贼心虚，难免草木皆兵。因而运用假协和进行软化、收买的同时就是严密控制和分化。作田侧重前者，尾高则侧重后者。

1. 虚饰视听

人们知道，日本国内各大学没有一点集会和结社的权利和学术言论的自由，在伪满不问可知，除了协和会，不许有任何公开的组织。建大的“塾务委员会”，并非学生自治组织，只不过做些塾头所不屑作而又必须作的一些服务性活动而已。

建大也有一个不定期的内部刊物，由二期生胡继权负责编辑，此人颇有文采，《新满洲》杂志上曾连载过他写的小说，笔名古梯。内部刊物的稿件由师生提供，但必须经塾务科审查通过后才能付印。它的内容，大都是歌功颂德，鼓吹战争为军国主义服务的东西。说它是御用刊物当是恰如其分。这是建大唯一的学生“喉舌”。

2. 刀光剑影

分化拉拢学生的是塾头。1943 年我考入建大后，我所在的十五塾的塾头新田伸二曾决定，全体塾生按姓氏顺序搬到塾头室同他长夜“谈心”。这事非同寻常，同学们自然警惕。据何润森（现名何倩，在北京社会科学院）说，新田和他谈心时毫不

掩饰地挑拨说："你是满人，满洲是满人的，皇帝也是满人，你才是满洲国的真正主人，你有特殊地位，也有特殊任务。现在，汉人对日本帝国帮助满人建立独立的新国家十分仇视，反满抗日，既抗日又反满，不正说明人家把我们和你们都当成敌人吗？咱们两族才是一家人呀！咱们不能让他们把"王道乐土"搅乱了。现在已经抓起来一大批，但还有不老少。你要多留心，有情况向我报告……"新田的花言巧语，并没有使何润森受骗上当。第二天，他就向同学们说："你们不知道，我是纯满人，老人姓赫舍里，改姓何。……新田知道我是满人，所以拉我叫我当小特务……"这件事教育了中国学生，大家共同商量好应对之策。轮到我，因为心中有底，所以很沉着。到了这天，新田满面春风，并给我指出一些我并不具备、莫名其妙的优点，我心里想：这叫做欲擒故纵。

接着他就让我讲讲入建大后的感想。我用半生不熟的日语，絮叨不休地把建大吹捧一番，他默然地听着。为了争取主动，我向他提出去日本旅行的要求。他看我想当官，就告诉我一个秘诀："要想当官就必须亲日。"接着，他问我的家庭情况，同塾的学生跟谁好？马维同是不是我的同乡（马维同是刚被逮捕不久的四期生）？至此，我心情开始紧张起来，表面上还装着漠不关心的样子说："马维同是富锦国高的，我是佳木斯的，我与他刚认识，我们之间相距100多公里……"新田可能感到从我这里再捞不到什么，"谈心"也就到此结束。我如释重负翌日撤回，暗中庆幸总算过了这一关。

建大是7个民族按固定比例入学的，是多民族汇集的学校。殖民者实行民族分化，汉族学生为了粉碎敌人的阴谋，平素对其他民族的同学注意团结交朋友。我和蒙族同学巴图巴雅尔是好朋友，我喜欢他那坦率的性格。他告诉我，一次新田拉拢他

说："清朝对蒙古人最好，日本国对蒙古人也好，入建大有照顾不是证明吗？日、蒙两族要能联合起来就好了……蒙族同学人少，汉族如果欺负你们，我给做主。"新田对十五塾实行民族分化，制造民族对立，其他塾头也是这样。他们的办法再多，但大多数同学都有警惕。个别少数虽有受骗上当的，但迟早终能觉悟过来。殖民者的算盘最后还是落空了。

再讲一个例子。大家知道，在伪建大，殖民者把学生分成"满系"（因为他们不准东北同胞称自己是中国人）和"日系"。朝鲜、台湾当时为日属殖民地，所以朝鲜和台湾学生也被划为"日系"。但殖民者这种笼络是很难生效的。比如一次中、日学生争论谁归"满系"和"日系"时，平时沉默寡言的台湾青年吕芳魁突然站起来，庄严地声明："我不是满系也不是日系，而是华系，是中华人民的子孙！"为了报效祖国，他两次跑去解放区。第一次在山海关被捕，第二次逃入关内后辗转各地，最后才到晋察冀解放区，参加了八路军，改名李子秀。不幸牺牲（解放后于张家口市烈士陵园树碑纪念）。李烈士是三期生，该期逃入关内参加抗战者前后共11人，建大像他这样投奔祖国者虽无精确统计，估计约在60～70人之间。

为了祖国

事物总是向对立面发展的，就像清末练新军为的是维护反动统治，结果武昌起义正是在新军中发生那样，伪建大殖民者的一厢情愿也被中国学生的爱国集体所否定。

（一）第一课

我是伪满三江省（今黑龙江省合江地区）佳木斯国高1942年的毕业生，和本班同学王希儒一起考中了建国大学的第一试。我们所以考建大，一是因它的待遇好，有出路；二因它是六年

制的“最高学府”，一定会学到不少的东西。不过，也听到建大出了不少思想犯，心想：抓思想犯也没啥要紧的，好好念书，不问政治，总不会不犯也抓。于是我们高高兴兴地去应第二次考试。

到建大后，四期生负责招待我们，晚饭两个炒菜一个汤、大米饭，当时对“满人”公开吃大米感到新奇，蹩脚的是吃饭之前要默祷，无人肯做。负责招待的四期学生刘万堂对大家说：“为什么不默祷？不要以为这是他们的规矩，咱们祖国也默祷，大家还是默祷吧！”这使应考学生受到很大震动。因为在大庭广众之中说“他们”“祖国”这些词，对于我们这些国高生来说不但陌生，简直是可怕。就寝时我小声对王希儒说：“果真是名不虚传啊！”王答说：“这家伙也真够大胆了！”

考上建大，全家为我高兴。入学后，我把中国的指导学生看成同日生一样是塾头的“坐探”，对他俩处处提防，不久，有一件事改变了我的看法。有一天，日系指导生佐野孝一郎去塾头新田家，“满系”指导生万兴治在晚饭后给我们讲去年抓思想犯的情况，他说：有的拒捕，被日本宪兵打昏，抬上囚车；有的被折磨，瘐死狱中。被抓去的16名建大学生，个个表现得非常勇敢。他越讲越起劲，我们越听越出神，以致竟无一人自习。这件事使我认识到伪建大的中国学生，并不像有些人认为的是一些贪图功名利禄、附敌为奴的无耻之辈。相反，他们是一群热血的青年，他们大多数是爱国的，身在“满洲”，心怀祖国。如我塾的第一任指导学生万兴治（三期生）经常告诉我们，爱国是建大中国学生的传统，一定继承下去，不能中断。第二任指导学生张玉林（二期生），为人和善而诚恳，总是以满腔热情对待塾生。他同万兴治一样：虚抓塾生活，实抓“满系”团结，督促同学多读祖国和进步的书。

为什么伪建大早期学生爱国热情那么高？以1938年5月入建大第一期的55名中国学生来说，他们都是旧制高小毕业的，有些人念过旧民国的初中，至少念完小学，有的并参加过那时的反日爱国运动；其次，他们年龄较大，是在全东北选拔出来的，学习基础好，除了人数少于日系（95名），文化素质旗鼓相当，自尊心强；再次，当时祖国正在抗战，抗联正处于活动高潮时期，前途充满希望。因此他们入学后，思想活跃，注意团结各少数民族的同学，暗中互相传看中国书、进步书，唱进步歌曲，他们主张："凡是日本同学能做到的我们也要做到。"他们互称"咱们人"，对亲日的"咱们人"，找个借口饱以老拳，并给以悔改机会。一期生是第一批指导学生，他们向下班生传授爱民族、反收买、反奴化的经验，并给指导学生留下了"虚抓塾生活，实抓满系团结"的好传统。

（二）团结一心

在建大，中国学生是团结一心的。在风雨同舟的条件下团结的核心是爱祖国，爱国有凝聚力，所以能够一条心，团结的程度，达到了同学之间不问相识与否，也不管是否了解，也不问政治倾向，只要是中国学生就能够谈心，并且是倾心相谈，无以顾忌，谁也不怀疑对方会不会愚弄自己或出卖自己。

在伪满各级学校里，根据等级观念，规定了下级生必须服从上级生，为的是从学生时代就养成"阶级服从"的习惯。下级生要向上级生敬礼，遇事听吩咐，上级生有权打下级生，不许反抗。只有在伪建大，中国学生的上级生从不打下级生，做到了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上下级生之间不论年龄只论年级，以年级代年龄，以大哥、老弟亲昵相称而不称呼姓名，大哥对老弟爱护，老弟自愿听大哥的和尊敬大哥。这种关系虽然带有封建帮会性质，但在敌伪统治下，它是一种联系的方法，是当时

反满抗日的需要，因此它有深厚的时代色彩。

因为中国学生一条心，所以一有消息，立即传开。1943年4月18日，日军联合舰队司令长官山本五十六战死，一个同学看到了报纸，大家三五成群地马上议论起来："山本为什么死在飞机上？""舰队是否被全歼了？"到晚间自由时间，议论得更加热烈了。一致认为：所罗门海战是日舰队的灭顶之灾，不被全歼也是溃不成军了。日本是海洋国家，制海权就是它的翅膀，如今被剪掉或打伤了，这个"鸟儿"寿命也不长了。这是刚刚入学一个半月，全塾中国学生就能够互不隐讳地大谈日本必败，说明了这个群体的团结。

这年9月，意大利向盟军投降了。同学们高兴得无法形容，甚至在日本同学面前，也无法掩饰自己的内心喜悦。为了痛痛快快地抒发欢欣鼓舞之情，我和同塾的两位同学买了冷食和酒，冒着下午旷课的风险，来到南湖公园的树下，举起酒瓶说："为法西斯阵线崩溃，抗战即将胜利，干杯！""咱们这是干瓶，一定干了！"我们都不会喝酒，如果干了瓶，也就都醉了。真是兴高采烈，乐不可支，甚至在草地上打滚，就像个小孩子，若非互相信赖，谁也不敢这样推心置腹。临走，把酒瓶一个个掷投到南湖里，说："日本的旗舰沉没了！""又是一只！"这一天，中国同学几乎都有纪念表示，我们同日系同学的情绪完全是两个极端。

（三）读祖国和进步的书

传书，是中国学生自发反抗奴化的一种形式。因为殖民者进行奴化教育主要是靠书本，中国学生也以书本对书本，让祖国的书占有阵地。传书的方式，一是老生利用同乡、同学、亲友等关系传给新生。我在建大入学的第二天晚上，突然一位一期生来找我，自我介绍叫刘象乾，又名刘太恒，富锦县人，我

的同乡。一阵寒暄之后话归正题，他告诉我“要好好团结同学，因为建大讲团结”，他把中国同学叫“咱们人”，要我多看一些有用的书，说罢，从怀里摸出周谷城著的《中国通史》上、下两卷书，问我：“喜欢看吗？”我只好连声说：“喜欢，喜欢！”“你看完后咱们唠唠，还可以再给你借。”又告诉我不必担心耽误课程，只要不犯纪律不旷课就降不了班。不爱听的课也可以不听，不过要好好保管，防备塾头翻书。他走后，我一时很惶惑，虽知这位上级生关心我，但我又怕万一被塾头翻去不但书念不成，还会有想不到的危险，到底应该怎么办？一时没得主意，我只好把书藏在写字台一头沉的底下，慢慢想好再说。

不料刘走后的翌日晚上，又一个素不相识的老乡来找我，自我介绍叫张宝善，依兰县人。谈话的口吻同刘象乾一样。不知哪位同学说了一句“老蒙古”，这位比我们只高一年的张大哥马上掉过脸来，严肃而略带笑容地说：“老弟，别这么说，蒙族也是咱们自己人嘛！对自己人不能有这种情绪啊！”看他那诚恳的样子，我很感动。临走，这位张大哥递给我一本《大众哲学》，这书我已“久仰大名”了，听说建大的学生看《大众哲学》的，不是被抓思想犯了吗？我赶忙声明已有了三本了，看完后我再到你那儿取。送走他，我又觉得很抱歉。

这几天，不只我应接不暇，其他新生也都从上级生那里得到不少进步的书。

从二年级起，我也能像帮过我的上级生那样向新生老乡讲“建大中国学生的爱国传统”，也能把书传给他们了。

第二个方式是有组织的，利用校方规定的上班生带下班生“兄弟塾”之规定，“合理合法”地传书。由后期传给前期三年级，再由三年级向下传下去。这种传书统称曰“读书会”。事实上并没有读书会的组织，但确有其事。

所传的书大致可分三类：一是：以周谷城、肖一山、李鼎声等人著的祖国历史。使中国学生了解我是中国人。第二，主要是20年代日本“思想自由”时代岩波文库版的书，其中河上肇、河合荣治郎著作居多。还有《资本论》、《布尔什维主义》，中文书有《大众哲学》、《马克思小传》、粗糙纸印的《新民主主义论》、《新哲学大纲》、《列宁传记》、《西行漫记》、《女兵》等。为了寻求左派著作，五期生陈杭（现名陈亢，驻马来西亚大使）等人到研究院把书弄到手，夜间分工抄下来传阅。第三是国民党的书，如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建国大纲》，还有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

当时看书的方式多种多样，比如，授课时如遇建国精神及日语等类课，就把一本外语书放在桌下，如果老师巡视，就把所看之禁书推到外语书的里边；在自习室看书，有人负责警戒（打更），通常由指导学生和塾当番担任。塾头进屋总是先到指导学生跟前，如果他不在，就由塾当番迎上去向他“汇报”一天的情况，大家听到塾头讲话，马上藏书、换书。等塾头巡视时，人人看的都是课本，并且装得很热心，他便满意地走了（日系指导生从不巡视）。至于最犯禁令的书，只有到南湖去看，那里人少树多，看书最安全。也有人周日到教室去，把门倒锁，如果有人开锁，就从地板的管道入口处由地下跑到另一个出口，走到另一个教室，可谓用心良苦，上述方式仅是就个人所知，可能还有其他方法。

校当局对中国学生的读书活动是早有察觉的，他们不搜全体却搜个人。一次是七期生陈煜武（现名陈坚，东北电力学院院长）的《大众哲学》被中岛塾头搜去了。为给陈以处分，他叫指导学生宋立生（现吉林财贸学院副教授）搜集陈的材料，宋给陈说了若干好话，中岛不听，坚持要报告塾务科。宋说：“在

塾里发现共产书，对塾头和指导生都不好，莫如严格教育，再看他的行动为好。”宋的这番话真的打动了中岛，最后由他自己草草处理了事。

另外一件也发生在1944年，被称为《真理报事件》。这件事的经过是这样的：我的上期生刘士泽（现辽宁省社会科学院中日关系研究员），他俄语学得好，当时学校研究院资料室藏有苏联的《真理报》。他想，要是能看它，了解一下苏联的情况该有多好。但一个殖民地的学生，要看这样的革命报纸，在殖民者的眼里，那是一种犯罪的行为。说也巧，就在这年（1944年）冬季的一天，下课后刘士泽在返回塾舍路经研究院时，突然发现资料室的门没有上锁，室内空无一人，他想：这是天赐良机，于是他悄悄走进去，一看玻璃书柜里有一大叠《真理报》，“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他急忙拿了几份赶快离开。然后找个隐蔽地方，兴奋而又紧张地翻译几篇该报的《社论》和苏德战争、中国抗日战争以及太平洋战争战况的报导，准备在同学中传看。由于麻痹大意，不久报纸便被塾头翻去，而他本人尚未发觉。后来在“刑鞫”之后，被塾头赶出了学校。殖民者明知道中国学生在课堂上经常偷看进步书，为什么只搜查个人而不搜查全体呢？一次，我问一期老大哥刘太恒：如果日本人下令全体空手退出教室，然后挨桌翻，岂不完全暴露？他笑道：“不会的，日本人不是不知道，而是不敢这样做，这叫做投鼠忌器。你看这是个什么学校？不是民族协和试验园地的最高学府吗？如果抓住中国学生都看中国书，怎样处理？如果不管又何必抓？如果上报，副总长咋办的学？即使不管总长而报告给关东军，关东军怎么处理？是全部逮捕还是关闭建大？这个影响他怎么承受？”他的话很现实。所以一直到八期都是这么看，从未公开抓过一次。

（四）学唱中国进步的歌

伪满流行歌曲可分两类：一是歌颂敌伪的亡国之音；一是消极颓废、淫秽下流的靡靡之音，也是亡国之音。传统的《苏武》、《黄族》等高尚气节的歌曲都不许唱，革命歌曲更不必说。但是，建大的中国学生却背地学唱祖国进步歌曲和革命歌曲，还有一部分国民党歌曲。如革命歌曲有《国际歌》、《义勇军进行曲》、《游击队之歌》……进步歌曲有《毕业歌》、《锄头歌》、《夜半歌声》、《开路先锋》、《苏武》、《黄族》、《满江红》、《蓬莱阁》……国民党歌曲有《国歌》、《总理纪念歌》等。这是同传书相伴而行的一项活动，每塾总有那么一两个人搜集这些歌曲再教给大家。进步的与传统歌曲能公开演唱，我入学时，"新生欢迎大会"上四、五期生演出了《毕业歌》、《开路先锋》、《满江红》，二期生戴励明身着工人装演出《开路先锋》，三期生刘承舜同一位蒙古族同学合唱《蓬莱阁》，歌词中有：甲午年土地削，甲辰年主权堕。甲午年是1894年中日战争，甲辰年是1904年为抢夺中国东北而进行的日俄战争，都同日帝有关。

（五）说中国话

在东北殖民地，尤其是在公共场合，只要会日语，就只准使用日人规定的"公共语言"——日语。但伪建大的中国指导学生发表事项时用的是中国话。塾头问："为啥不用日语？"答："说满语，能够传达得彻底，这是因为要彻底贯彻。"同塾日系学生也问我们："为啥互相谈话不用一句日语？"我们说："你们为什么不用一句'满语'？"日生说："汉语太难学了。"我们也说："日语太难学了。"大家都认为，中国人说中国话，不忘祖国历史，就不能亡国。

（六）和日本同学交朋友

在建大的日本同学，除少数反动者外，多数还是好的，他

们也是军国主义的受害者。

我塾龟山淳一，为人公正直率，性格开朗，同中国同学平等相处，后来他被强征入伍，葬身异域，中国同学无不为他惋惜。1945年初夏，在儿玉公园（现胜利公园）举行全市“欢送”各大学无辜日本青年强征入伍大会，这批人是年龄最轻的（各大学的日系学生这一次几乎征光了）。这一天，建大到场早，解散休息时，我与同期不同塾的秋田（可能名快次郎，本期有两个姓秋田的）同学相遇，他的妈妈扯着儿子的衣袖，叮嘱儿子要注意身体，只说了几句便泣不成声。秋田也哽咽着说：“刘君，我的学生生活难道就这样结束了吗？”老妈妈补充说：“还是你们幸福啊！”话虽简单，但其言也哀、其情可悯，这是饱受法西斯高压的日本人民反战情绪的曲折反映！

日本同学同我们天南海北来到一起，联席起居共同学习，有些和我们建立了深厚的友谊。1942年初，日本宪兵队对中国学生进行第一次逮捕时，有一位日本同学把自己事先听到的消息透露给中国同学，敦促他快逃走。事件发生后，中国同学发起募捐，送给入狱同学，一些日系同学也踊跃参加。在慰问狱中同学时，日本同学也派去代表，因此受到宪兵队狱吏的责骂，此情此义感人至深。这不只是同学间的情谊，也是同情与支持中国同学反帝爱国活动的表现。1944年夏，二期生为参加毕业实习活动，随塾训导石中广次到了热河。那里是八路军活动地区，敌我斗争激烈，石中这个法西斯野兽用杀俘虏考验中国学生的政治态度，他把一名俘虏（据说是一位资助八路军的农民）绑在木桩上，先向学生训话，要求用杀俘虏来表明“拥护剿共”和体现武士道精神。他先要中国学生执行，结果无人应命。石中恼羞成怒，又要求日系学生执行。他满以为一声令下必有应声而出者，出乎意料的是，还是没有一个人站出来。石中无法下

台，只有在破口大骂之后，自己去动手杀害我抗日志士。这是一次严峻考验，它不只表明日本青年学生对我民族的同情，也是他们对本国法西斯侵略者的屠杀别国人民的残暴行径的抗议。日本同学的正义行动使日本法西斯分子大伤脑筋，以致塾务科长青本大骂日系同学"忘本"，藤田松二教授大骂日本同学"堕落"。这些反动分子，哪里知道真正"忘本""堕落"的不是别人，正是他们自己。

伪建大的结束

1945年是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之年。这一年日帝投降在即，伪建大的命运也同日帝的命运一样：日落西山，黑云一片。由于强制征兵，使日本教师被征走五分之二，日本学生被征走五分之四以上，致使全校人数不及平时的二分之一；更为严重的是强征劳动力。伪满政权宣布："这次勤劳奉仕时间，直到大东亚圣战胜利为止。"这样就像征伪军那样，国兵漏当劳工，而且是无限期的。于是，七、八期生在校作农活，四、五、六期生到公主岭做工。作为学校，伪建大不只是瘫痪了，而且是只剩了个徒有虚名的外壳。

8月14日上午，在公主岭的四、五、六期生接到关东军第三课电令，要伪建大学生立即返回。同学们估计：一个可能是当炮灰；一个可能是集体屠杀。因此三十六计走为上计。到下午5点集合时缺员13名，出发后，一路上大家想的是什么时候逃和逃到哪里？到了第二天，逃得只剩下不到三分之一的人了。我同四期生路桀珂、王绍桀商议好，先逃到农安县伏龙泉我姑母家，到陶家屯再离队。带队的五十住看到人员所剩无几，连点名的勇气也没有了，只好等待听完广播再说，到了中午，从广播里我们听到的是日皇且哭且读的投降诏书。祖国光复了，日

本法西斯投降了。伪满洲国垮台了，东北3000万同胞回到祖国的怀抱，大家高兴得不知如何是好，每个人的两眼都滚动着泪花，呼吸也感到自由了。就在同学们的欢笑声中，这所经营了8年的殖民地大学——伪建大被送进了历史的垃圾堆。

附录：

“新八期”——1945年春，刚刚开学不久，建大校门的石礅上又挂起个新校牌——“国立新京师道大学”。伪文教部成立这所大学是为了培养国民高等学校的文科师资；原有的吉林市八百垄老师大专门培养理科师资；新京女师大培养女子国高的师资。由于没有校舍，伪国务院决定使用人少房子多的建大一部分校舍。由于占用建大校舍，借用建大的师资，使用建大的图书馆和教室，建大副总长军阀尾高又多了一个头衔——新京师大校长，建大教授重松博士任该校教头（教务长）。1945年3月15日，51名新生入学。

新京师大开学后，上级生给我们传来了话：“要把新师大同学当做自己的又一期新同学看待，一切按‘建大规矩’办，不可有丝毫歧视。”因此，前期生也称他们为“老弟”——像建大内部称呼一样，传书、教歌也同样进行了。他们原以为“在最高学府借地办学一定会受歧视”，“想不到处处是关怀和温暖”，他们也亲昵地称呼我们为“大哥”，双方和谐一致。甚至称之为“新八期”（因为1940年另收了一批“新三期”，他们比老三期晚入学。师大也比建大的八期生晚入学半月，此名由此而来）。但这个“新八期”，只存在了5个月就结束了。

（摘自《吉林市文史资料》第四辑）

回忆我到大同学院受训的经过

王稔五

1942年6月，我充当伪满洲国政府通化省通化县县长，10月初接到伪通化省公署的公函通知，命我在10月中旬某日赶到伪新京大同学院受训。通化省公署人事科长井上对我讲，中央国务院计划，要在本年度内对全国100余名县长，分三批在大同学院进行短期的（两个星期）轮流集训。时间虽然很短，总算你们这些县长和大同学院也发生了关系。这就是所谓之满洲国的中坚官吏，是必须要经过大同学院训练这一阶段的。我得命后做了一番准备，按照指定的日期，赶到伪新京南岭大同学院报到。第一批受训的共有48名伪满县长。

在第二天的开学典礼上，伪国务院总务厅次长王允卿和地方处、人事处的人前来参加。首先由大同学院院长井上（日军退伍的陆军中将），对我们这批前来受训的48名伪县长讲话。他概括地介绍了学院的沿革情况，说大同学院是属于国务院总务厅直接管理，是以养成和训练满洲国官公吏的唯一独特的教育机关，其目的既不同于一般的大学校专门注重学术，也不同于其他各部成立的训练所全力讲授业务。它是一个以满洲建国精神为主体、以推行满洲国策为内容，而对于满洲国中坚官吏，实行综合性训练和养成为目的的。他说，满洲事变之后，以于冲汉先生为中心，在奉天成立了地方自治指导部训练所，向各县派遣了指导员，而在大同元年3月，随着满洲国的建立，便废止了地方自治指导部，其事业乃由国务院的资政局所继承，训练

所迁移到新京的南岭。而在大同元年的6月，又将资政局的官制废止，其附设的训练所亦将解散，然而对于直接参与推行国策的官公吏，进行某种的养成和训练又为当务之急。因此，乃于大同元年7月，政府公布了大同学院的官制，当时收进学员将近百名，进行了4个月的训练。在当年的10月间，有大同学院的第一期毕业生在满洲国出现，分配在奉天、吉林、黑龙江各省和中央的各部院。接着他说什么，为了建设王道乐土，为了刷新旧恶的县制，使官公吏涵养为王道乐土而敢于英勇牺牲的根本精神，乃是本大同学院的教育方针。因此，大同学院的授业科目，有建国精神、军事训练、国文和日本语、满洲国策、邻邦事情以及地方视察和见学旅行等等。他说，为了训练学员养成一种服从纪律的精神，学院实行军队式的团体教练，并有马术、柔道、剑道和实弹射击，以养成学员们大无畏的勇气。随着国势的进展和为了满足国家的需要，大同学院采取了双管齐下的办法，一种是招考日本内地各大学的毕业生和具有同等学历者，不分其中、日国籍，合格者一律兼收，在本学院经过一年的养成和训练，然后交由政府机关选用，称第一部生；以能够理解日本语的现职"满洲人"官吏为条件，在本学院经过6个月的养成和训练，然后按照其各人的毕业成绩，由政府重新分配其职务，这一类的本学院则称之谓第二部生。几年来由本学院毕业的一部生和二部生，都发挥了它的积极作用。在中央各部院则有参事官、科长和事务官，在地方各省、市、县，则有参事官、副县长和县的科长。其中有很多的优秀官吏，今天都成为你们这些县长们的得力的助手，这是大家所公认的。接着他进一步说，现在政府为了使大同学院的精神，能够普遍地在各市、县的地方上开花结果，以便于更好的推行国策，国务院委嘱大同学院，要在本年内对全满的各县县长，进行短期的训

练，其目的就是要使各位县长，在大东亚圣战的鼓舞下，能够更深刻地体会到满洲建国的真精神，以便于在实际执行政策法令上不致迷失方向。为了使各位县长能够更明确地掌握国策，学院方面和政府当局，取得了紧密的联系，对于几项有关的重要法令，学院方面正在聘请各部主管的权威者给诸位做讲师，有什么疑问地方可以尽量提出来共同进行讨论。最后他说，尽管这次学习时间很短，但是我希望你们能够通过这次学习，今后要经常地和学院方面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大同学院方面是要把你们这些受训的县长当做第三部的毕业生来看待的，你们不会不满意吧。意思是说，能够在这个大同学院受训，应当感到光荣和大有出路。无怪乎当时的人们说，大同学院是伪满官吏的镀金炉，甚至有些人拿着大同学院的毕业证书，作为他充当伪官吏的护身符，一出门（大同学院毕业）就是高等官试补，再一步就是伪满的荐任官，接着就可以一帆风顺地当上科长或参事官，掌握部分的实权，成为敌伪政权的帮凶。从上面大同学院院长井上的讲话中，人们自然也能够体会到建国精神，明确掌握国策，其目的也正是要你认贼做父，甘为日本侵略者的附庸。

第三部生（伪县长们）训练内容，和第一、二部生相比，看来是有些不同。它早晨没有早操，晚间又没有自习，既没有所谓之军队式的团体教练，又没有柔道、剑道、马术和实弹射击。每天上、下午各有一堂课（二三个小时），都是有关各部门的负责者，来给讲述其所主管的法令和政策。其中有如伪国务院总务厅次长王允卿，前后两堂讲的是伪满洲国政府的组织法和人权保障法。他口念条文大谈其立法的精神，但是他自己也知道这纯粹是在瞎混。记得他曾这样说过：法是死的，人是活的，往往是同样的事件，而其在法的运用上，有时候也要因人而异，所

以有一句俗话说得好“定法不是法”。他举了一个例子说，你们大家都知道，我王允卿过去是个学法的，按规定学法的只能做个大司法官，而今天则不然，我也能做到一个一般的行政官，总务厅的混混。最近政府又决定派我为满洲国的驻日本国大使，因此我这个司法界出身的人员又做了政府的外交官，所以说这就叫做因人而异。他又接着说，按照国家组织法的规定，有立法院和监察院，但是事实上这两个院已早就不存在了。这也是因人而异的关系。国务院总务厅，并没有驾于各部之上的规定，但是事实上它又干预着各部的事情。所有这些也叫做因人而异。他又说，地方上的县长，按规定你们有一定的职权，但是如果你运用得不妥当，就往往要事倍而功半。因此说一切的事情，你都要先能通全大度，尔后才能运用自如，否则，只能与己不利，于事无益等等。当时我听到这位大人物的一番讲话，实在感到有些莫名其妙。

据说是为了要我们这些伪县长们更深刻地体会到满洲建国的真精神，大同学院特请了伪国务院总务厅的人事处长星子敏来给我们讲这一课。这一天星子敏趾高气扬地走进了课堂，他把日本国小学教科书上的迷信神话，当做他们日本国的历史来讲，从所谓天照大神的神话故事起，扯到日本皇室的万世一袭，从所谓八纮一宇的欺人鬼话扯到日满协和共存共荣。他说什么日本天皇是天照大神留下的神种，日本天皇应该受到东亚人民的尊重，说什么大东亚圣战是八纮一宇精神的体现，现在的满洲国就是大东亚共荣圈内各地的典范等等。在当时尽管这些伪县长们没有什么民族气节，但是对他鬼话连篇，我相信谁都会感觉到不耐烦，然而在表面上还都肃然不动毫无表情，一直听他叫唤了三个多钟头，直到他走后大家才松了一口气。我心里想，所讲之满洲的建国精神，在这一点上恐怕大家体会得更深。

在这个期间关东军司令部的参谋某中佐给我们讲了一堂大东亚战争和珍珠港的赫赫战果，他要大家相信日本陆、海、空三军的威力，动员满洲的一切资源，来完成圣战，建立大东亚共荣圈。

伪满协和会中央本部的实践部长何春魁也到学院讲协和会中央联合协议会的组织。他说什么宣德达情是协和会的使命，众议统裁是中央联合协议会的基本精神，各位县长兼任协和会的县本部长，也就是政府和协和会之间表里一体的体现。

此外，还有伪民生部劳务司的科长讲有关各市、县紧急供出劳工的事项，伪国民勤劳奉公局的半田局长讲关于国民勤劳奉公的法令，伪兴农部的司长吕作新讲有关兴农合作社和粮谷出荷的问题，伪民生部保健司讲述国民的卫生保健问题，伪经济部税务司讲述地方税征收问题，伪开拓总局讲述20年百万户的移民政策问题，伪国务院总务厅地方处讲述县、街、村地方自治问题等等。伪国务院总务厅地方处以东道主的地位（地方处在当时是全满各市、县最高的监督机关），曾和大同学院联合举办了几次受训伪县长的座谈会，在会上伪县长们提出了几项要求中央各关系机关加以注意的问题。记得其中有：一、关于各县兴农合作社职员的品德作风问题。二、关于加强对于勤劳奉公队大、中、小队长训练的问题。三、关于原住民和开拓民之间的和睦共处问题。四、关于紧急供出劳工的家庭生活照顾的问题。五、关于工、矿企业现场安全生产的问题。六、关于紧急供出劳工的劳动保护问题。七、关于劳工住宅区的环境卫生问题。八、关于地方风土病（通化地区的大骨节病、克山地区的黑死病，农安白城子地区的鼠疫病、热河地区的粗脖子病等）的医治问题。九、关于经济作物地区的居民粮食问题。十、关于南、北满县长的互相交流问题等等。对于这些问题，当时

有关方面解答得是很好，但是实际上并没有做到，这不过是走走形式而已。

所谓两个星期的训练，也不过转瞬之间就算过去，伪县长们欢欢喜喜地在“再见”声中各讨方便了。

伪满吉林师道大学的片断回忆

张国振

1943年2月我考入伪满师道大学二班（中文系），1945年8月日本投降时，我正读三年一期。由于日本法西斯这时节节败退，因此加强了对东北人民的掠夺和统治。那时我们名义上是大学生，而实际上是亡国奴。下面我讲一下这个时期伪师大情况：

几易校名和校址

日本帝国主义为长期统治中国，1934年8月成立伪满洲国高等师范学校。1940年在新京（长春）成立高师女子部。至1945年“八·一五”12年间，这所学校毕业生约2000名左右。校名改变二次：1934年8月至1938年底，四年半时间名叫高等师范学校（简称高师），有一期毕业生。1939年初至1941年末，改名为师道高等学校（简称师高），有三期毕业生。由1942年至1945年8月15日，又改叫师道大学（简称师大）。我是1943年初入学的，也是改名师大的第二年。

师大校址在吉林市西郊八百垄（冯家屯，现东北电力学院校址），占地面积约5平方里，是“九·一八”事变前张作相创

办的吉林大学旧址。学生们节假日上街买东西得步行5里多路到临江门，再行四五里才能到河南街、粮米行（现北京路）。

学校机构和教学情况

我于1943年春入师大时，校长日本人（当时叫学长）是阿部忠孝，几个月后阿部病死，以后添野信为校长。当时学校有教务科、总务科、学生科，科以下有股。除校长以外，斋藤茂（教历史的）权力最大，他还兼教务科长。各科、股长都是日本人（当时称日系），一般职员大部是中国人（当时称满系）。

全校学生共分9个班（系），一班是国民道德班（政治系），二班是中文系，三班是史地系，四班是数学系，五班是理化系，六班是博物系，七班是音乐系，八班是美术系，9班是体育系。三年毕业。因为各年级都分为九个班，这样全校就有27个班。每个班有学生三四十人，有班长一人，我们班的班长是梁国璋。各班全是男生，女生都在长春师大女子部。女子部归吉林师大本校领导，只不过单任一人作女子部主任，在长春作管理师生的工作，下设有分校式的各种行政、教学机构。

我们入学后，一直到第三学年，教我们班课的教师还记得有以下几人：教中文有陶明濬（外号叫陶圣人），他注释出版过《诗经》、《书经》、《易经》、《论语》等书，因而上课就讲这些书。讲《诗经》时，引用一些男女爱情的故事，不涉及政治方面的内容。离下课还有一二十分钟时，就由兜里掏出怀表看看，过了三五分钟再看看，一堂课得看五六次。铃一响，挟起一个黑皮包就走，等同学们站起来，他早已走出教室门口了。赵香墀教师，是个南方人，讲话多少带些江浙的口音。他讲清代文学，上课时经常引用些文学上的故事，同学们听得津津有味。周士升教师，是教我们书法的教师，他由“永字八法”讲起，常常

讲起他怎样给伪省长徐家桓代笔（就是代替写字），他说江沿宾宴楼（现在儿童医院楼，伪满时是个大饭店）上“东南第一家”那块横匾，名义上是徐家桓写的，实际是他代笔。教我们日语的教师是迟镜诚，他是伪商师第一期毕业生，日语很好，毕业后留校做教师。教英语的是谢中老师，他是留英的，在街里办过不少期英语及数学补习班，在教育界很有名望。迟教师、谢教师教课都比较认真。教我们教育学的是杨志裕，历史是北山（日系），心理学是高山（日系）。地理是李永藩，他上课开始讲几句日语，然后大部时间用汉语讲。给我班上军训课的是大山（日系），打学生是“家常便饭”。一上课就说：“我在中国（指关内）作战，杀过3000多中国人，你们这些小子不听话，我一样杀你们。”他老婆是学校打字员，长得年轻漂亮，因而我们背地叫大山为“大山龟”。

教其他班的教师现在记得的有日系：西垣久实（数学博士）、阿部襄（生物学博士）、斋藤茂（历史）、池田（美术）、酒井、高山、小林（体育、军训）、奥山、迫田、茂木。满系：万金声、马崇林、李国栋、王恩显、董清才、王迪光、郑臻等人。

我们上课没有固定教室，早晨用褥垫或书包夹着教材和笔记本，到各科指定的教室去上课，这堂课在东楼三室上，下堂课就可能到西楼四室上。全学年合班上课就在大教室，分班上课就在小教室。没课时可以到图书馆看书或回宿舍自习。

教师上课没进度，无计划。学生考试不发表分数，不排名次，没听说有降班的（留级生），但有因病休学而留级的。

我们班同学现在能记起的有：何书绅（现名禾果，辽宁科技出版社编辑）、刘有（现名刘友，辽阳市教育学院教育科学研究所讲师）、李世邦（现四平师范学院副教授）、梁中璋、梁维民、李汉超、彭守身、沈德华、刘靖宇、张立民、孙靖寰、赵

长宰、罗洪章、刘铁骨等。

奴化教育种种

1. 思想控制。日本帝国主义的教育方针是为他们的侵略战争服务的。因之经常向学生灌输："日满亲善"、"共存共荣"、"建设大东亚共荣圈"、"王道乐土"等等思想。因为从小学到中学到大学一直这样，所以使许多中学生不知道自己是中国人，只知道自己是"满洲国人"。我们这些大学生中只有个别人不知道，大多数是具有民族意识的。正因如此，学校对学生尤其对文科各班（系）学生控制非常严。在教学上从不讲中国历史，历史课只开满洲史（实际是东北地方史、满族史）和日本国史。对中国历史上的伟大人物、民族英雄，更是只字不提。教师上课，对国内、国际时事，真正做到了"莫谈国政"的地步。我们二班（中文系），只讲"五经"、"四书"和清代文学，至于秦汉、隋唐、宋元的文学一概不讲。中国的现代文学更是禁区。要抓住哪个同学公开看鲁迅的作品，那就是"思想犯"，轻则坐牢，重则杀头。

2. 军训。伪满中学、大学一律实行军事训练，以备补充兵源，更主要的是灌输"武士道绝对服从的精神"。师大有军训教师，如酒井、小林（军衔是中尉）、大山（上士），他们利用军训之机，对学生进行残酷折腾，动不动叫学生双手举枪（学校备有一些破旧枪支，无子弹，供军训用），双腿弯曲蹲着，在运动场上来回跳跃，有的同学跳不动了，瘫倒在地上时，军训教官就上前狠踢几脚，重打几拳。卧伏地上瞄准时，教官在学生身上走来走去，用皮鞋踢几脚，踹几下，打耳光，用刺刀背砍，那是经常的事。有一次军训下课，在向枪库送枪时，我动作稍慢一些，大山就用刺刀背把我肩膀砍了一个大坑，十多天不敢

扭动。1943年冬天，我们到乌拉街做野外行军训练，沿途走了两天，第一天晚上住在大屯，第二天傍晚到了乌拉街村。沿途啃着由学校带的冻成冰块的饭，回校后，发现自己患了痔疮。

3. 盲目服从。日本帝国主义为了培养学生盲目服从，由中学开始就实行上级生可以随便打下级生的制度。我们师大也这样做．学生见教师要行举手礼，下级生在校外见上级生也要行举手礼。年级区别很严，有一次周日我到街里去，在半路上光顾走路，没见到上年级生体育系的于某，他把我叫住，先用日语，后用中国话把我申斥一顿，这件事是发生在我入学后不多天，因而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年级区别的标志是在制服领口的一侧有年级的数字标志，一年是Ⅰ字，二年是Ⅱ字，三年是Ⅲ字，因而一见就知道是几年级同学。

4. 参拜神社。1944年以后，每天早上全校集合到运动场上，先前是背诵“国民训”，以后改为背诵“军人五训”。其内容有“军人，应忠诚于天皇陛下……”然后到运动场西南角“神社”前行礼参拜，最后解散回宿舍洗脸、吃早饭。每逢重要节日，由学校集队出发，顺公路步行10多公里，到东关大神社前（现在儿童公园内）行一个礼，拍三下手掌，然后解散。也有时行一个礼后再集队走回学校。为了参拜神社，学校停课是经常的。有时为了“祝愿”前方将士“打胜仗”，或前方士兵战死很多的时候，都要走到东关神社去祈祷。因而同学背地说：“大老远走来，到‘鸡架’（日语神社的谐音）前蹶蹶腚就拉倒了。”每来一次大家累得够受，还得以疲倦的身子走回学校。

5. 背诵诏书。每逢各种典礼仪式时，要先把诏书“毕恭毕敬”地宣读一遍（傀儡皇帝溥仪的诏书），真像对待古代皇帝圣旨那样，只差没有“三拜九叩”罢了，古代皇帝的圣旨只宣读一遍，而伪满诏书说不上要念几千遍，并且所有大、中、小学

学生都要背得“滚瓜烂熟”，我这六十多岁的人到现在还能背下些，可看出奴化教育的深刻。伪满开始头些年读的是所谓《即位诏书》（溥仪即傀儡皇帝位），溥仪称日本为“亲邦”，由这以后让我们称日本不是“友邦”，而是“亲邦”了。

6. 日语是“国语”。伪满时各级学校，连小学高年级都得上日语课，中学每周至少要上6～8节。大学许多科除用日语上课外，还得单上日语课4～6节。伪满规定“国语”（通用语言）是两种：一种“满语”（就是汉语）；另一种就是日语，师大入学考试，平时答卷，和教师讲话，课堂用语都得用日语。甚至不少学科中国教师给中国学生上课也得用日语讲。我们二班（中文系）学生没有一个是日本人或朝鲜族人，可是上普通教育学的杨志裕、上地理课的李永藩两位中国教师，上课时得用日语讲课，我们有不明白或听不懂的地方，提出来时，他们再用汉语再讲一下。在校内外，和日本人及朝鲜族同学谈话都得用日语，即或他们会说汉语也不许用汉语讲话。学校督促汉族同学互相用日语谈话。军训、体育课的口令完全用日语。这个时期，日本帝国主义已强迫朝鲜族人民和台湾人民完全改成日本姓名，这样好使他们忘掉祖国。

7. 监视学生。学校设数名舍监，大多数是日本教师。各寮（宿舍）设寮长，全校（也即全舍）设学年代表，都由日本人或朝鲜族学生担任。他们负责监视学生的思想和行动。每晚自习都在寝室内上（每室4人，设有课桌和椅子），舍监常来查看。每晚就寝前，要在走廊内站队，排列整齐，点名报数。然后等待舍监和最高学年代表（舍长）来到后，寮长向他们报告在籍人数、出席人数、缺席人数、缺席者姓名、原因等。完全用日语报告。舍监走后，才能解散回室就寝。在白天上课时间，有时舍监到各寝室查看一下，看看是否有反满抗日的文字、书刊。

8. 逮捕学生。日本帝国主义，由于军事上的失败，对东北人民的统治更加疯狂，以“经济犯”、“思想犯”之名义大批逮捕和屠杀人民。师大学生更是他们注意的重点。每到年末举行毕业典礼时，都要有几名同学“失踪”，实际是被日本宪兵队或特务机关逮捕走了。1943年年末的毕业典礼举行后，一位姓张的毕业同学，行李已经捆好放在宿舍内，可是一直到吃午饭后（毕业的会餐，要丰盛一些）仍不见踪影，同室的同学还不敢声张，只好暗中寻找。后来听说在毕业典礼结束后，这位姓张的同学刚一出正楼门，被两个人挟持到汽车上带走了。这是公开的逮捕。也有的同学说不上什么时候就“失踪”了，被逮捕的同学很少能够活着回来。据以后传闻，被捕的同学还有金宝环、王树森、李景超等人。

9. 勤劳奉仕队。伪满后期，把各大学学生编为“勤劳奉仕队”。“勤劳奉仕”就是义务劳动，又名“奉公队”。师大也是这样，学校有各种劳动，如：种菜、植树、搞环境卫生、修运动场等等。每年暑期还要到外地去劳动。

10. 防空演习。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日本搞防空演习是非常频繁的，甚至叫学生停课做演习。假空袭、假消防、假救护……有时一天演习好几次，也有时半夜起来演习。一次，美术教师池田因演习时开灯，被警察局拘留三天。拘留所内一些中国“犯人”，见池田没带行李（冬季），就主动给他棉衣、被子盖，吃饭时主动给他打饭。回来后他对同学们说：“在警察局拘留所内才是真正的‘日满亲善’。”

11. 国歌要唱日本国歌。每逢庆典或节日集会都要唱日本国国歌和伪满洲国国歌。日本国国歌名叫《君之代》，唱时都要唱日语原文。

学生生活

1. 服装。外衣和大衣、帽子由学校发给。外衣分正服和劳动服。正服就是制服，立领三个兜，是在节假日或集队外出时穿的。原高师时是好料子做成的，到了我入学后，就都是由纤维布做成的了。大衣是像麻袋似的粗糙呢子做成的军人大衣样式，帽子由四角帽改成"战斗帽"。帽上有师大珐琅校徽。劳动服在校内上课和劳动时穿，翻领、紧袖口。衣服、帽子一律是"国防色"（就是绿黄色）。听说高师时还发皮鞋，到了我们这时什么鞋也没有发。

2. 伙食。是公费，至于一个同学多少钱的伙食标准，我们从不知道，只知道学生科管理伙食。说学生伙食，不如说这是"舍粥场"。早晚是两顿苞米面做的稀糊糊，每人一碗（现在饭店装四两米饭那样的饭碗），午间是约二三两重的半个窝窝头。按月计算，每个人的粮食顶多不过10公斤。那时粮食不供给，多吃可以多买，可是学校为了省钱，特意少给饭吃。师大的饭厅在地下室，开饭时，铃一响就得赶快去，8个人坐在一个长条桌旁，去晚了分不到饭还要受责罚。等人到齐了，由学年代表或舍监发表通知或讲话，然后大家齐声说一句"我领受恩赐就要开吃了"，然后开始吃饭。吃饭时不许说话，更不许打闹，因饭少，三两口倒进肚内就起身回去。饭碗、筷子是自己的，用完自己带回。因为吃不饱，饭后就得到学校的小卖部或者冯家屯（出校门往西不远）去买煎饼。有的由家中拿点炒面，掺在苞米面糊糊里吞下肚去。我买不起白面做炒面，只好在家里把高粱米磨成细面，把它炒熟，买不到白糖（白糖是配给品），用盐面拌入炒面里拿到学校来（利用寒暑假回家时拿来），还不敢放到明显地方。如果寮长或舍监看到，立即没收扔掉。每逢周日同

学们到街内去吃一顿煎饼豆腐脑，或者去吃上几碗高粱米面的馇子（我一次可吃5大碗），这是最便宜的饭，也是我们最好的一次“享受”。

我入学后第一年，日系学生与满系（中国人——汉族、满族、蒙族、回族）学生同在食堂内吃饭，每月“满系”学生还可以吃到两三顿大米饭（量很少）。可是到了1944年，“日系”学生单坐一边，他们天天吃大米饭，而“满系”学生坐在另一边，天天吃苞米面糊糊或是窝窝头，一年到头也尝不到大米饭的滋味，这时在老百姓中发现吃大米饭就是“经济犯”，要治罪的。学校托辞说：“日系”学生说不上什么时候就要入伍当兵去，所以让他们单吃大米饭。“满系”学生虽然不敢公然提出反对，但在吃饭时都不断向“日系”学生“怒目而视”，最后“日系”学生每到吃饭时把饭分了拿回宿舍去吃。

由于吃不饱，饥饿难忍，很多人就偷着点电炉子做点什么。如被学校发现，那是要受到严厉惩罚的。但学生们不管这些，他们在街上买个电炉丝，回校后拣块红砖，刻成炉盘式的沟道，电炉丝放在里边接上电线，就可成为电炉子。使用时在门口放哨，使完后用纸包上放在厚书的套皮内，以此来蒙骗舍监等人。

3. 住宿。全校学生都得住宿，4个人一室，上下两层硬木板床，上层2人，下层2人。室内有课桌、衣柜、书架，白天上课之余或晚上就寝前都可到寝室来自习。洗脸盆、用具都得放置整整齐齐。床上只供给一个草垫子，被褥等物都是自备。草垫子是多年陈旧的，其中不知藏多少臭虫、虱子，校方对此不管不问。只有一次学校大搞卫生，原因是学校发现二楼东侧有两三个寝室，几批进去住宿的学生，都患了猩红热病。日本人怕传染到他们身上，才对所有寝室进行了彻底清扫。

永远忘不了“勤劳奉仕”

1. 修国境公路。我入学第一学年暑期（1943年7月），是到东宁县境内（现黑龙江省东宁县）去修中苏边境的“军备国道”（国防公路）。我们7月初在学校做了两天准备，每个人都穿劳动服，拿一床毯子或薄被。学校每人发一件一尺左右宽的黄布，中间剪成四五个豁口，缝在战斗帽的后面，以防蚊蠓。每人带上洗脸用具、饭盒（日军用的“猪腰子”式的饭盒）等物。出发那天由学校集队步行到火车站。队伍不按班，而是重新编成大队、中队、小队，各队长都由日本学生或朝鲜学生担任，有正有副。我们的大队长由宫城、桥场两个高年级同学担任。带领我们这队的教师有柚木和酒井等人。我们中队长有伊藤和清川两人，小队长叫森田。到了车站看见路两旁排列不少穿蓝制服上衣（大翻领）和蓝裙子的女同学，一打听才知道是师大（校址在长春）女子部同学来欢送我们的，这些女同学一直把我们送上火车，车开动才退出车站。这一列火车完全是运我们用的，就像对待日本关东军军用列车那样，每当走到各车站都有“国防妇人会”（日本人的妇女会）的成员接待我们，给我们送水、送饭（当时有规定，军用列车走过的地方，都由各地供应饭食和饮水）。列车由吉林经蛟河、敦化、延吉奔图们，由图们北上奔牡丹江行至东宁县道河村（小车站），共走了4天3宿（列车不是按正点运行，而是串空行进）。在道河下了火车没有停留就奔向原始森林地带，也是中苏边境地带（再向前没有公路了，这公路刚修完不久，沙土很新鲜）。在公路尽头小河边砍树、拉绳、挖沟把由道河抬来的帐篷搭起来。第二天就天始干活。先伐树，后挖掘沙石，顺着山间小溪在山腰开辟出一条公路来。最累的活是挖树根、搬大石头，既不用机械，也不用炸

药，完全用人工来干，我们简直成了“劳工”。听说我们进山时路过的那段公路，就是从各地抓来的劳工修成的。我们进山后，沿公路两旁有不少日军帐篷，可能是些修桥梁的工兵和守卫边界的警备兵。我们工地不远就有日军驻扎，也许这是监视我们的。

我们每天早晨4点钟起床，之后开始劳动（天刚亮），7点回帐篷吃饭，半个小时后再接着干，午间休息1小时，包括吃午饭时间在内，晚上10点收工。各级队长不劳动，只是在旁边监督、指挥，谁干得稍慢一点，或干得不对，或集合稍迟一步就棍打脚踢。山间木棍遍地都是，队长们随时可操起木棍打来。我们小队长森田，一只眼睛有“玻璃花”，我们背地叫他瞎眼驴，这小子最能打人，他身高才1.4米多，打耳光够不着高个同学的脸，他站在高台上或树桩上，把同学叫到跟前打耳光。我们中队一个叫张凤久的同学，因搬不动大树，被中队长几木棍子打得大口吐鲜血。

我们住的是圆形的帐篷，潮湿的地上，铺上一层小树枝，上面再铺上一层草，草上铺上毯子。我们每天就睡在这冰凉而又潮湿的地上。因为每天太劳累，所以一躺下就睡着了，不等睡熟又得起床了。

山间蚊蠓又多又厉害。尤其一种眼睛刚能看见的小蚊子，我们叫它“小咬”。这种蚊子叮人后，身上一片片起包，奇痒难忍。我们虽然有紧袖衣服，系腰带，打绑腿，头上帽子下面用毛巾包起脖子、脸，但也挡不住小咬钻进来，在身上，在脸上叮成一片片大包。我们队有个姓高的同学，被蚊子叮得脸全肿了，随后溃烂一片。山间的“瞎蠓”（学名叫牛虻）又大又多，白天蚊子不断，它也出来逞凶，叮到脸上、手上，顺它咬的伤口不断向外淌血。早晨、傍晚时刻，小咬像烟雾一样，一团团扑来，简

直使你防不胜防。

劳动量大，劳动时间长，还吃不饱饭。每顿一小碗大米饭，菜是一点点咸菜或咸鱼干，这只能是我饭量的六分之一，再加沉重的劳动，饥饿的程度更加大。每天都处于饥饿状态中。饿急了，利用间休时间，到小河边去拣点日军扔掉的明太鱼鱼头、鱼尾，或采点野菜生吃。午休时间长点，就用饭盒子煮点野菜吃。有一次叫我们四五个人到道河村去取工具，一进村我们每人就买几块大豆腐饱餐一顿。临走时，我偷偷地买了一斤饼干（细苞米面加点糖烤制而成）拿回工地来。晚饭后到离帐篷稍远一点地方偷着吃，正吃着听到小河对面有人哼哼。我问是谁？对方有气无力地回答是李世邦（现四平师范学院副教授），因为饿得难受，他正在河边摸黑找吃的东西呢。我隔着河扔给他几块饼干，他狼吞虎咽地吃下去了。以后他常说，多亏你那几块饼干，不然那天非饿昏不可。

随着公路不断向前延伸，工地离帐篷约有五六百米远了。一天，天下小雨，小队长命令我回住处取丁字镐，我顶着雨回到住处，发现大队长和带队教师住的帐篷门口放着剩下的半桶饭。我看帐篷内无人，急忙盛了一大碗躲在帐篷后面，三口两口吃下肚去，几分钟就吃了4大碗。虽然饱了一天，可是第二天就闹开肚子，第三天开始便血了。开始不给假，当我说是痢疾，队长怕传染不但给假，还送我到日本军帐篷的医务所去“住院”，经诊断是急性肠炎，住了12天院才回到工地去。12天的疾病折磨，我已面黄肌瘦，浑身无力，队长看我实在干不了重活就叫我干一点轻活——平整路面。

一次，我们在路边休息，远处走来一队人，走近一看，约有一二百人，全是赤身裸体，有的在肩上，有的在腰间，用麻绳系着破棉衣裤，有的扛着锹镐，有的抬着破席子，后面有几

个背枪的日本兵押着，他们每个人的身上、脸上，布满淌脓淌血的癞疮。这是由于浑身一丝不挂，而被蚊蠓叮咬所致，也许由于久睡在用破席搭成的“帐篷”中潮湿地上而生的。其中有几个人被人架着走路。这是轻病号，若是重病号早被日本人打死或推到山崖下摔死了。大家都知道，这是各地抓来的劳工。

我们进山后，带队的教师告诉我们，在山里无论见着什么人，包括日本军人，决不许与之交谈。因此当这些劳工在我们不远的地方坐下来休息时，我们也不敢和他们谈话，只见他们有不少人拿出一个窝窝头，然后到路旁摘些榆树叶子，塞在窝头眼内，连榆树叶子和窝窝头一同放在嘴内吃了起来。由此也看出了那些劳工和我们一样，都是吃不饱。过去在家乡传闻抓去的劳工，如何受迫害，过着非人的生活，十有八九回不来等等。今天才真正见到。当公路修到山的最顶点时，和对面修路队伍碰上了头，大家欢呼“万岁”，因而给这个山顶起名叫“万岁岭”。有的同学偷偷爬上树尖，向东方观望，已看到了苏联境内的乡村房屋。此处距中苏边境至多不过二三里地远。后来听说当我们由“万岁岭”往回撤走时，有两名日本学生，朝苏联方向走去，被国境线上的部队抓了回来，盘问时，他们说：因便溺落在返校的队伍的后头以致迷失方向。结果怎样就不清楚了。后来有的同学暗中议论，那两名日本学生是特意奔向苏联去的。可惜没走过去。

2. 制造酒石酸石灰。第三学年暑期（1945 年 7 月）开始，学校决定全校同学去做酒石酸石灰。先由博物系教师给我们讲解用途及制做方法。他们说，酒石酸是军用急需品，是制造雷达和潜水艇分解淡水用的必需品，当前“大东亚圣战”急需这种化学药品。我们做成酒石酸石灰，再运至别处精制成酒石酸。做法比较简单，就是用东北东部山区的山葡萄叶子，用大锅熬出

叶子水，再掺入石灰搅拌即成。

在校内学完制做方法后，我们就到磐石县城进行实地操作。最后，回到学校编队，分配到牡丹江省、吉林省、间岛省（今延边）、通化省的各县村，去指导制做酒石酸石灰。

我和20余名同学分配到敦化县，到了敦化又把我和一位一年级姓王的同学分配到额木村去。这时是7月下旬。收集葡萄叶子等项工作全由各村的“兴农组合”（即各地粮库）筹办。我们两个人到了额木村河西“兴农组合”报到，主任是朝鲜族，他不大会汉语，我们和他交谈都得用日语。这时农民被迫上山采集葡萄叶子，每户的任务量非常大。如果不及时交上，就要罚款、挨打、拘留。我们亲眼看到警察殴打交不上葡萄叶子的农民，警察、村长趁此机会又向农民大肆勒索。在第一批酒石酸石灰还没有完全制好时，8月8日，苏联已经对日宣战，苏联的飞机已在上空不断飞过，至此我们这个造酒石酸石灰的“工厂”也就解散了。8月15日，广播播送了天皇裕仁“无条件投降”的告臣民书。同学们跳了起来，欢呼祖国抗战胜利，欢呼东北光复。

（摘自《吉林市文史资料》第六辑）

“满铁”经营的奉天铁路学院

霍儒学

我是伪满时期“满铁”经营的铁路学院第七期毕业生。

“七·七”事变以前，该校正式名称是铁路学院，日本占北平以后，在北平又设立中央铁路学院（实质上也是满铁经营），

于是设在沈阳的便叫做奉天铁路学院。

1932年3月伪满洲国成立，日本立即以“委托经管”把全东北铁路交给“满铁”经营。奉天铁路学院经过半年多时间的筹建，于1933年2月开学。“九·一八”以前东北学制为四、二、三、三、四，学年由暑假开始，“九·一八”当时学校停学。1932年春季起，按日本方式，学年由春季开始，奉天铁路学院第一、二期生，基本上以高中毕业生为主，同时也招考一部分原东北大学未毕业又未随东北军进关的学生及一部分高中在校生、少数初中生。入学考试科目为数学、物理，外语作参考，不考化学（因和铁路业务关系不大），但体检严格。学校设在原东北大学工厂地址，又另建教学楼、宿舍、实验室、工场。在当时沈阳的三所大学（另外两所即南满医大、奉天农大）中占地面积最大。本科三年制，每期300人。这是“满铁”在东北设立的第三所高等院校（另外两所是南满医大、旅顺工大）。奉天铁路学院完全由“满铁”领导，与伪满洲国没有任何关系。它是伪满洲国成立后，最早开学的一所学校，是日本通过“满铁”推行大陆政策的一个组成部分。筹建之早，开课之快，非伪满其他大学所能比。人事安排，也不一般。初任院长为小林铁太郎，“七·七”事变后，到北平任中央铁路学院院长。继任院长为张恕，原张作霖的参谋长，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学院日常业务由副院长担当。我在校期间副院长为朝日直树，留美学生，与当时“满铁”总裁松冈洋右比较熟悉。

奉天铁路学院完全是日本式的。它根本不用伪满年号，满洲国假日不放假，寒假暑假很短（寒假包括春节在内只一周多），伪满政府规定的大学必修课，如建国精神等科目，也一概不设，从不唱伪满国歌，不升伪满国旗，不悬挂溥仪像，也不向伪帝宫遥拜，伪满建国10周年时各伪满大学都大肆庆祝，该

校视若罔闻。在思想教育、学科教育方面，也有自己的一套。

思想教育的中心是向学生灌输崇拜日本、绝对服从、不怕艰险的精神。学院并不设政治课，但在日常教学中、生活管理中随时进行思想教育工作。如：

早操。每天上课前有早操，全校按年级班级站成纵队，面向指挥台，各班由班长向军体教官报告人数；此时全体教师，必须在指挥台两侧面对学生排队、横站一列或两列，由军体教官，向副院长报告出席的教师数、学生数；随后一声令下，全体面向东京，遥拜日本天皇；接着由副院长训话。

读日本报纸。由二年生开始，每个学生每天发一份《朝日新闻》（学生版），上日语课时，由教师提问并记分。

参观。按教学计划参观鞍钢、抚顺煤矿（都由满铁经营）。这是必修课，参观后每个学生还要写观后感。有时也参观沈阳铁西的某些工厂，以显示日本的工业技术。

耐热训练一个多月。在大连海滨，进行野营训练谓之耐热训练。训练期间，早晚由副院长、教官讲日本精神、日本事情、世界形势，中午海水浴、登山或长途行军，到大连或旅顺参观日俄战迹，请日本军人讲“二〇三高地”之战和乃木大将的事迹。还参观大连码头、资源馆。此时正是伪满各大学校放暑假。耐热训练结束后，才放暑假一周。训练期间任课教师也参加。

毕业前到日本旅行两个月。去时由大连乘船，回时经由朝鲜。伪满大学也去日本旅行，但参观内容常不一样。奉天铁路学院学生参观由满铁东京支社安排，常得到日方特殊照顾，如一般学校不容易去的地方，也能参观，像日本的陆军士官学校、陆大、海军兵学校等。其目的是使学生知道日军训练严格、官兵素质高，战则必胜，而铁路业务是半军事性质，一旦有事，应像军队一样能胜任。参观军工厂、军舰，也是同样目的。

"满铁"总裁来学院视察检阅。每年一次，总裁由"满铁"上层官员陪同。先检阅分列式，再抽查一二个班上课情况（每次抽查必有日语课，有时总裁亲自与学生问答），最后集合在大礼堂训话。我在校期间松冈洋右曾来视察一次。

总之，思想教育，也就是奴化教育，无孔不入。

学科教育。本科分前期、后期，各为6个班，前期分为一、二、三、四、五、六班，同样都学日语、数学、物理、体育4科，日语每日3～4节，不用课本，不管入学前学了多少（有些学生入学前已有三等水平）一律由听、说开始，日语教师，都是专门受过训练的，标准音、纯洁日语。前几期的日语系主任是山口喜一郎，此人是日本对外国人进行日语教育的权威，最近日本出版的《大百科全书》记述了此人，他首创一套独特教学法，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美军曾采用过，效果较好。1933年以后伪满的一些大学，先后到铁路学院参观日语教学情况。伪汪精卫政权的一些大学也远道而来参观日语教学。现在日本国内的一些留学生预备校，也沿用此法，不同的是广泛应用了电化设备。1938年以后山口本人到北平去对中国人进行日语教育。

后期分成5种专业，仍是6个班。一、二班学铁路管理；三班学机车的制造、检查、修理、使用；四班学机车以外的各种车辆的制造、检查、使用；五班学建筑；六班学电气。一、二班也学一些机车概论。车辆概论，主要是知道它们的性能，更多的是铁路经营理论和法规、统计学，法规全用日语文言文记述。三、四、五、六班统称为技术科。技术科理论课、基础实习在本校，操作实习在奉天市（沈阳）各大机务段、车务段、工务段、电务段和铁路工厂进行，这些段、工厂的领导多半兼学院的技术课。一、二班在毕业前，到较大车站实习一个月到二个月。现场领导与教学人员经常互相交流，教学与实习结合得

很好，一般地说，调到学院的都是优秀的现场人员，并能得到晋升，待遇也好，还有到日本见习的机会。

学院始终重视日语。分配工作时，首先考虑日语水平。往沈阳、长春、哈尔滨、锦州、吉林、齐齐哈尔各大中心去的必须日语好，其次是体格好。因此，“满铁”每年都进行语学检定考试，对中国人考日语，对日本人考汉语、俄语。合格者按等级每月在工薪外另加语学津贴。学院学生每年必须参加语学考试。此外每年还进行体力检定。类似我们现行的达标测验。日语不及格、体力检定不及格的一般退学。

生活管理。一句话，日本式半军事化。如：人事、经费、教育计划都由“满铁”领导机关负担和审订。

每名学生供给校服（满铁中级——站长级——职工制服），实习服、食费（相当于解放初1949年沈阳市供给制中灶标准）、一切实习用书（包括上述《朝日新闻》），另外每月还发津贴。因此，只要星期日不在校外大吃大喝，每月都稍有余钱。

全部住宿。平日不准出校门一步，周日早饭后可外出，晚自习前必须回校。先由舍监点名，漏者受罚。每个年级同住一栋宿舍，宿舍分室，室有室长，每晚就寝前，由寮长（每个年级的一个宿舍都称为寮）陪同舍监点名（有时由三年级寮长代理）。晚自习在寝室内进行，因此上课前，下课后教学楼封闭。学生下课后也没有时间看其他书，技术各科忙于作数学题、物理题、制图；管理科日语课比技术科多，文言文法规有些需要背诵。因此虽然有图书馆，但没有人借阅。何况，就寝时间一到一律熄灯，起床前，不得私自活动。

伙食标准高。因为军体训练严格，所以伙食标准高于一般大学。如长途行军，徒步跑到北陵上体育课，每年一次绕北陵一周马拉松比赛，一次围剿野兔作战，一个多月耐热训练。平

日实习的体力消耗也很大，如向机车内投煤、大检修、土木工程实习的野外测量、搬运枕木等，这些训练使学生体格强于一般大学生。但住的条件不如一般大学，这是因为筹建时间只有半年多，更因为培养计划有一项是学生能耐苦，由于铁路业务比较苦，需要在学院养成适应不太舒适的环境。这在校训中有一条规定，叫“质实刚健”。

绝对服从。一、二年生在外出途中遇三年生必须举手敬礼。因为都穿校服，领章上有一、二、三年级的标识，又有学号（铜质阿拉伯数字），一看就知道是哪个年级、哪个班的学生，如不敬礼，上级生可当时训斥，甚至回校后叫到宿舍或舍监室训斥。头几期学生，假日外出去市内购物时，和其他校学生口角过，一人与他人口角，凡路遇的学院学生必须上前助阵，因此打过群仗，因体格好，常占优势，故市内一些学校称学院学生为“铁驴子”。肇事后由上级生向校领导，主要向舍监或军事教官如实报告，就没有事了。

通过这样的思想教育、生活管理，铁路学院确实为“满铁”培养出一批铁路骨干职工；这是“满铁”推行大陆政策的一部分。优秀的毕业生有的选到日本留学、见习，有的调到华北、华中的铁路院校任教。当时学校最高兴的是专修科（电报科）的一个毕业生的事迹。诺门罕事件时，苏军飞机大炸阿尔山火车、车站、铁路，使日伪军供给中断，当时阿尔山站长大石和这位铁路学院毕业的电报员，冒着生命危险死守电报机，及时发送了大量军事电报、铁路电报。事后受到上级嘉奖，站长大石被调到学院任三年级一班班主任，向全校介绍这位毕业生事迹。学院副院长常在全校大会上以此为题训话。“满铁”首脑也比较满意。铁路学院的工作也受到上级表扬。自1940年冬起，从来没有配过中国人的重要岗位也开始派学院毕业生了，如奉

天（沈阳）站售票室、货物处、奉天（沈阳）车务段、奉天到大连间的列车长也有中国人担当，我自己也是第一个给日本学生上课的中国人讲师，登上了铁路教习所（进修学校）的讲台。

日本人哪里知道，就在他们满意学院毕业生的表现之时，1941年12月30日全东北一齐搜捕的地下国民党员、北宁路党部关外段小组成员有3人是学院六、七期毕业生。1945年8月15日，有40年历史的“满铁”自消自灭了，奉天铁路学院也只留下一些废墟。

（摘自《长春文史资料》第十二辑）

伪满法学校

姚洪山

这个学校是“满洲国”司法部于康德元年（1934年）成立的。1938年改名为““政法大学”，是当时伪满政府所建立的几所特殊的高等学府之一。校址在满洲国首都新京（长春）南岭的“大同学院”的毗邻，是现代化的二层楼房，食堂、便所、盥漱室等都在室内。室外有一规模不大的运动场，设有网球、篮球。大学校东邻半里左右的地方，有从南岭通往新京车站的公共汽车站，到市内各马路游玩，可免徒步之苦，交通较为便利。

这个学校设立的目的，是专为巩固殖民统治培养维护侵略法权的司法人才，即未来的司法官（法院的审判官或检察厅的检察官）。共招生5期，每期为60名，春季始业。报考资格限于国高或同等学历的满系（满洲国人）男子，修业年限为3年，待遇是毕业后即任命为学习法官（委任一级），月俸100元，后改

为高等官试补，月俸为150元。在地方法院和检察厅学习一年后，参加高等官合格考试，合格后任命为候补法官（审判官、检察官），月俸为180元，较其他同等学校，在毕业后的待遇是高的。在学期间的待遇也比较优厚，是全官费，每月17元，服装寝具是借用，冬季呢料西服两套，毛毯两条，外衣、手套、棉鞋应有尽有。因为待遇高，毕业后又能做官，所以报考的是大有人在。录取名额很少，以致十有八九是要落第的。也有屡试不第的。康德元、2年，又招两期2年毕业的班级，计120名。把两年毕业的称为乙班，三年毕业的称为甲班。

学习课程：组织法（代替宪法），中国法制史、民法、刑法、商法、刑事诉讼法、行政法、国际公法、国际私法、经济学、英语、日语、体育。

课程担当者：组织法和行政法由藤崎朋清教授担任，法制史和伦理学由泷川政次郎教授（法学博士）担任，民法由西村义太郎教授担任，刑法由讲师司法部属官尾坂俊夫和副教授岩崎二郎分别担任，商法由讲师司法部理事官宇都宫担任，民事诉讼法由讲师新京地方法院次长森哲三、审判官米内担任，刑事诉讼法由程光明教授担任，国际公法由副教授林保太担任，国际私法由陈明德副教授担任，经济学由中根布鹏雄教授担任，英语由讲师外交部属官丁文蔚担任，日语由翻译官石川、高木等人担任，翻译由石川、高木、康成九、黄滨淮等人担任，体育由日本在乡军人（退伍军人）神宫司大佐担任。日文讲课时起初翻译后来直接听讲，课后阅读日、满文对照的讲义，没有课本，只有参考书，英文有课本名为"The lure of japen"（日本的魔力），日文课本为"日语读本"，体育为一般体操和日本剑术（木剑）。

配合学习的参考书籍，有自备的日本、中国的法律参考书，

。
但主要是图书馆的原文（日文）参考书，作者都是日本法学界名流、学者、博士等权威人士。如刑法权威者牧野博士和泉二新熊博士（日本大审院长），民法权威者我妻荣博士等人所著的刑法总论、分论和民法总法，鸠山秀夫的债权法等。

学习总的情况是终日埋头书案，国家大事，不听不问，民族仇恨，十分淡薄，思想封锁很严。所以即或有志之士想看一点进步书籍，也只能是望洋兴叹罢了。

在组织法内规定有：危害帝室罪和大不敬罪，就是凡有危害满洲帝国皇室或对皇帝有侮辱不敬行为者处罚。

在法院组织法中规定：法院审判官在审理民刑案件时，关于条文的适用，刑之量定等有独立权限，他人不得干予。实际上这是一纸空文，审判官在处理某一案件最后判决时，都必须经由省长（厅长或次长）的裁决和同意后，始得宣判，这叫什么裁判独立？

至于检察厅的检察官则不适用裁判独立的原则，而是适用检察一体的原则。事无巨细大小，在搜查、讯问、起诉与不起诉等问题上，都必须根据下级服从上级的原则，向上级首长（厅长、次长）请示，经批准后，才得处理。这种规定，是殖民地国家的人民对占领国绝对驯服的具体表现。

此外又规定：自从涉外法权——日本的领事裁判权撤废（康德4年）后，满洲国的司法机关，有独立审判“涉外事件”权力。可一旦受理这类案件时，“满系法官”不能处理，只有“日系法官”才能处理，这与治外法权撤废以前又有什么两样呢？

综上所述，从所学的课程内容、精神实质、教育目的和教育方法一系列的问题来看，不难理解，完全是侵略者对被侵略者一种奴化教育的具体表现。

在每期学生即将毕业前夕，照例去日本旅行，游览名山胜

水，参观司法机构、工厂、博物馆、军港、商港……通过这些活动，使学生更便于接受侵略者的文化，从思想上来麻痹和征服民族意识，培养崇日亲日的情感，借以加强所谓日满亲善的关系，毕业后更好地为傀儡政府即为日本帝国主义效劳。

当时学校的组织成员情况如下：

校长1人（先由司法部长左田正一担任、继由最高法院次长汲川德男兼任，再后来最高法院审判官简井雪郎担任）、主事1人（由西村义太郎担任）、学监1人（由前日本陆军大佐神宫司担任）、舍监1人（先后由河田等人担任）、事务官1人（由丸山担任），打字员、教授、译官若干人。

（一）学生的来源

甲班的学员绝大多数是来自于下级学校即普通高中、师范学校，少数是来自于同等学历的专业学校，部分是来自于其他高等学校或中小学校教员以及机关的在职公务员（职员）。乙班的学生百分之百都是在职的工作人员。不论甲班还是乙班，所有学员都是经过考试录取的，考试的方法是先笔试后口试，同时进行体格检查，三者合格之后方能录取。笔试科目有数学（包括几何、代数）、国文（作文）和日语三科。试题比较难，因此有屡试不第的，也有经过两次甚至三次应试才考中的。笔试的试场是分布于哈尔滨、新京（长春）和奉天（沈阳）三个大城市，应试的人数少则数百，多则上千，而入线名额为100。笔试及格者，然后集中到长春法校进行口试，口试科目和范围是极其广泛的，有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有些问题的性质是反动的，如问“俾斯麦、墨索里尼是什么样的人物，有什么事迹？”考试官和翻译官威风凛凛地坐于堂上分别向应试者发问，应试学生须立即回答。口试毕，马上进行身体检查，合格后用书面发榜通知。口试时要从笔试考中的人数中淘汰掉40名，最后录

取60名，取得入学资格。所有应试的旅费和食宿费等完全是应试学生自备，所以家境贫寒的学生参加这样的考试是相当困难的。

应试人数之多，录取名额之少，正是由于该校的在学期间每月津贴17元，毕业后月俸百元以上。从这一问题来看，也不难看出日本侵略者的险恶用心。

（二）学校生活

所有学员都过着集体生活，全部住校，在学校食宿。星期六晚上可以外泊（外宿），但必须办理外泊手续。校医深町是日本医学博士，兼该校法医学讲师，每周讲课一次，传授法医学知识。例如自伤、他伤、自杀、他杀或窒息死亡等现象的特征，以及有关指纹学等方面的知识。文娱活动方面，开展的很不好，表现沉闷。该校的文体活动比起当时的高师、工大、医大等同级学校是大为逊色的。学校首长即不重视，学员大部分也不好活动，有时间多半是穿着西服革履在校内外散步，游逛或坐在一起说说笑笑，去公园、看电影，不然就是埋头书案，死啃书本，背教条，这种情况是司空见惯的，当然这也是办学者所希望的。

法学校作为精神食粮的课外读物极端贫乏。没有阅览室，只有一个规模不大的图书馆，里边的藏书倒不少，并且精装的很多，有中文本、日文本。但都是中外古今的法律和经济书籍以及有关的参考书类。学校准备的刊物报纸，只有一般的报纸《中央公论》（日文）和《中央公报》几份，其余是一无所有。学员必须订阅的杂志刊物，有法曹杂志和最高法院判例，每月一本。前者是司法部刊出的，内容材料都是由部里各级负责人员提供的。全是有关司法的问题。后者是伪满最高法院刊发的民事或刑事方面的判决例，是弥补当时法律（六法全书）之不足

的一种特殊条文，对下级法院有拘束力，对学员来说是应该知道的。从表面上看，法学校似乎是一个自由的天地，正是因为当局对这所学校早已实行思想封锁了，切断进步书籍的来源，学员与外界接触的机会和条件又很少，再加上较优厚的物质待遇和毕业后的发展前途，就很容易消磨学员们的民族意志，而陶醉于物质名利之中了。这不能不说明日伪统治阶级统治手腕之高超。

（三）学员的思想动态及表现

如上所述，学员们的思想情况是比较平静的，但也不能说学员们心甘情愿的做亡国奴。兹将这样的事例略述如下：

1. 罢食

事情发生的原因是学生的伙食是由日本人饭村所成立的饭村食堂部来包办的。这个食堂部包伙的单位很多，凡是司法部及其所属机关和学校统由该部包办，外有其他几个部门也是由它来包伙。饭村极尽剥削克扣之能事，伙食管理人员和炊事员、厨师等人都很跋扈，态度很蛮横，有时甚至出言不逊。伙食费每人每月竟达八九元之多，根据当时的物价情况来看，所包的伙食，每人每月四五元左右就够了，计算起来，每人每月要被剥削四元左右。康德4年（1937年）的夏天正式发生了罢食运动，参加的学员是甲班第二期、第三期、第四期和乙班第二期共4个班，全体240余人，一致行动起来。直到第三天头上，才得到了令人满意的答复，食堂部和学校当局由让步到强硬，由强硬到屈服，终于答应了辞退饭村食堂部的包伙，由学员自行办理。

这次罢食的结果，达到了预期的目的获得了胜利。

2. 从“西安事变”来看学员的思想动态

康德3年（1936年）12月12日发生了轰动全国的“双十

二”事件，当时伪《满洲新闻》报纸上第一版以头号大字排版，标题为《国共又告分裂》。在无线电里也大肆广播。日本帝国主义在满洲的各级统治者，法学校所有校长、主事、学监和日系教授、助教、讲师、翻译、职员及其他勤杂人员都喜形于色，欢欣若狂。

后来西安事变并没有按照日本帝国主义所期待的进程发展下去，而是和平解决了，此刻该校所有日系工作人员大失所望。表情上不像以前那样幸灾乐祸的高兴了。但是恰恰相反，学生的心情却与以前大不相同了。转忧为喜，感到事件没有扩大，蒋介石被护送回南京，真是不幸中之大幸，中国不致于亡，东北的收复是还有希望的。这又一次说明了当时该校学生的爱国的进步的思想及其表现。

（四）贯彻奴化思想

当张鼓峰事件发生之后，学校的学监兼教授日人神宫司（前日本陆军大佐，当时是在乡军人）召集全校各班学生，在室外空地集合，进行训话。他当时神色慌张、大发雷霆、出言粗暴，颠倒是非地说：“诸君，你们知道吗？现在一个不幸的事件从天上掉下来了，就是现在突然发生的张鼓峰事件。我军在该地正式执行职务，一贯是忠于皇室，对邻国也一向讲求信义的，多年以来，日苏边防军从未发生任何不应有的军事冲突。此次苏军无理向我军挑衅进犯，纯系一种背信弃义的侵略行为，造成我军的伤亡事故，实属遗憾，苏联简直是看我软弱可欺，企图占领我满洲北部领土，扰害国境治安，这种行为是令人不能容忍的。大家要认清时局，随时准备行动。苏军如再胆敢进犯，必将给予严重的惩罚和打击。大家要知道，我军有足够力量打退苏军一切进犯的，要有必胜信念。”就这样的向学生灌输反苏亲日的反动思想，并训练养成复仇和好战的心理以及军国主义

精神。

在课程的学习方面，千方百计地鼓励和提倡学日语说日本话，其目的不外更便于传授和灌输奴化教育，使东北的人民逐渐忘掉祖国的文字和语言，模糊民族意识，从思想上精神上奴役中国人民，除加强学习日语课，增加自习钟点外，训练直接阅读日文讲义、日文法律参考书，直接用日语对话。在图书馆的藏书中，绝大部分是日文版，中文版书籍寥寥无几，培养和鼓励用日文写作的能力，例如在平时和期末的考试中，希望尽量用日文答卷。同样答案内容，日文答卷就能多得分数。以此促使学生用日文答卷。

(五) 日本见学（旅行参观）

甲、乙各班历届毕业生，在临毕业那年的春季或秋季，照例的要到日本旅行。所有旅费、食宿费、观光费等都由公家报销。旅行时间约在三周左右。旅行的主要目的，为的是显示日本的国威，夸耀日本的强盛和物质文明的进步。通过参观，使学生在思想深处更好地树立起崇日和亲日的感情。出发前先由校长甚至司法大臣进行一次讲话，阐明旅行的目的和政府的关怀，并作了关于旅行参观应注意的事项的具体指示。然后由日系教官、舍监或教授领队前往。从伪都新京（长春）出发乘火车经由朝鲜、再从釜山乘船直达下关。以后便先后在九州、四国、本州等工商业、科学文化发达之名城和名胜的风景区以及装备先进的军港进行参观。最后由神户乘船渡海到大连直接返校。返校后还要把参观的心得和观后感向未参观班级的全体同学报告传达，使他们积极向往。这里应该提到的一点是横须贺军事要塞本应保密，为什么能开放允许参观呢？主要是要借此炫耀其军威，同时看一些表面现象也无关紧要。另外在该军港口岸观看了陈列的日俄战绩——在旅顺口打捞上来的曾被俄军

击沉的“三笠舰”残骸。舰上有当年东乡元帅所坐的座位，舰板周围还有无数的枪眼，东乡就在这个舰上战死的。通过这个可以使学生在思想上认识到东乡元帅的与舰共存亡、为国捐躯的日本军人的品质和特点，以及所换来的重大代价，从而效仿所谓日本大和魂的武士道的精神。

（六）抽调现职法官学习

1. 定期住校学习

伪司法当局为进一步培养一批得力的现职法官，于康德3年上学期，在该校开办了人数不多的现职法官学习班。从长春、吉林、哈尔滨、沈阳、营口等大都市的高等、地方和区各级法院、检察厅抽调庭长、审判官、检察官20余人，集中在该校食宿，进行为时半年左右的学习。与该校学员在一起生活，分班学习。主要是自修学习，配合教授和讲师讲课，专门学习法律科学，以提高业务知识和办案能力。

2. 分批分期抽调讲习

康德3年(1936年)7月1日，伪满洲国的法律公布实施了。新法和旧中国的法律内容和精神有很大变化。为顺利地贯彻新的法制精神，司法当局特在该校开办刑事法和民事法讲习班，为期3个月。先后办了二三期，人数较多。学员是由伪满各地基层法院、检察院抽调的现职法官，不住校，走读听课，由司法部高等官、最高、高等或地方法院的司法官担当讲师。课程内容主要是讲解新法条文内容和它的优越性，以便领会新法刑法的精神实质及其解释，回到本机关认真的正确的去运用和执行。

上述两种情况，都是为更好的训练现职司法人员，使之成为统治阶级得心应手的工具，做伪满统治者的支柱，巩固伪国家的社会治安，这就是日伪政府创办法学校的真正目的。

奉天农业大学的创设

（日）宇田一　贾玉芹　译

大同2年，我应满洲国政府总务长官远藤柳作之邀来到满洲国。当时很多朋友都反对我离开研究室和学会，而我却凭着一股热情毅然决定应邀前往。由于当时确是怀着为满洲而死也在所不惜的心情，所以是举家赴任的。

到任后，首先拜会了政府要人。满人的高官们也在商定时间后一一回访。时至今日，我仍然为中国人的礼数周到而深受感动。当时来访的每个人都要说一些“大家认为先生是真正为了满洲的开发建设而来的，万分高兴”之类的奉承话。理由极其简单，据说是一般的日本人，只是带着一只旅行箱单身赴任，而我却偕带家属，甚至连家具都搬来了。由上述原因，我的第一个印象就是感到不虚此行。

其后，总务长官先后由大达、星野、武部三人担任，他们都是我高等学校以来的朋友，彼此间意气相投，工作很顺利，日子过得也愉快。

言归正传，远藤君对我说，满洲国的基础日趋巩固，准备开始成立大学，并要求我筹建农业大学。

我们谈到投机处，最后，我阐明了自己的观点。我认为满洲国的大学必须改变日本大学的办学方法。虽然是具体的名称问题，我认为不应是农科大学，而必须是农业大学。如果办农科大学，真可能会像日本那样，重视理论，脱离实际，满洲的农业大学学习理论应该是第二位的，首要任务是培养对实际有

用的有能力的指导人才，而且，我甚至认为农业的指导者，掌握农民的心理是首要的，所以不能招收日本学生，只收满人青年。曾几何时，我竟同满洲融为一体了。于是，以创建只招收满人学生的农业大学和完全由我组建教师队伍为条件，我接受建校任务。

到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确定大学的校址。虽有几处候补用地，但听说甲地是由满铁进入政府的人们提出的，乙地是从日本国内进入政府的人们、即文教部次长西山等人提出的。我认为，为了满洲国的发展，如果产生丑恶的派系之争，将出现不良的后果，因此，我另外物色用地，最后，决定在奉天市外塔湾的山冈上建设。

这里曾经是日俄战争时，乃木第三军艰苦战斗的古战场。在那里，有巍然屹立的舍利塔俯看奉天市街。

登上山冈，远眺南方，可望到抚顺，辽河一如往昔悠悠地闪烁在阳光下。北方则是一望千里连绵不断的平原，高粱已丰收在望。这块丘陵地正是作为教育场所的绝好地方。

正当我决心已定时，出现了反对的意见，有人说："在那样的高地上，能引水上山吗?"按道理我应该清楚地知道农业和水有不可分割的关系，这确实是我的疏忽。

我去关东州厅，走访了以"水神"而知名的清水本之助君，请他到现场查看土地。他说："长着很多柳树，看来没有担心水的必要，但如果榆树多了，首先必须考虑会不会出水。"他的声音至今犹在身边。

塔湾的山冈是榆树少而柳树多的丘陵。为了找到水，于是立即委托清水君动手掘井。据说，怕是要挖四五十米才能出水，不料挖到26米时，清澈的地下水便滚滚涌出，实在值得庆幸，是清水使我得救了。

用马达抽起地下水，可以充分满足校舍、畜舍、农场的需要，还可以为附近的农家提供生活用水。以后的校舍和宿舍的修建同挖井相比就轻松多了。转瞬之间，学校的外观已初具规模。由于全部实行住宿制，所以每年都增建宿舍。此外，畜舍、青饲料储藏室和苗圃等也都陆续建成。

我创建三重高等农林学校（现在的三重大学）的经验，在这里发挥了作用。同时，三重高农的中野教授和我在三重时的学生古君、高木君等，放弃在日本的重要位置，前来同我一起工作，使事业得以顺利开展。

后来，为了不使教师队伍形成“三重派”，決定委托内地各大学及专科学校，推荐适当的人选送来任教。因此，有幸集中了许多优秀的人才，使我不胜感激。

三四年以后，每年都有大批日本国内的大学教师前来考察，并给予了高度评价。我也为自身价值的体现而感到自豪。那时，桥本两位博士曾赞扬说：“原以为虽名为大学，实际上恐怕还不如国内的专科学校，但身临其境看过后，发现竟然如此出色。”我立即答道：“学校之所以有今天，全是由于有一支优秀的教师队伍。”

接着，根据中野教授的意见，在大学里，除农科外，又增设了兽医、畜产科，当时，有人认为应该设畜产科；也有人主张设畜产兽医科，而中野则认为在满洲没有兽医便不存在畜产。

同时，我按原定计划，这两个学科都只收满人学生，在教育内容方面日语和实习课占全部课程的大半。

因为当时在满洲只有这一所大学，许多大臣和简任官的子弟都前来入学。郑国务总理等也曾特意来为学生说情：“此人日语虽不甚好，请务必准许入学。”虽然我听说有权势人家的子弟往往认为干农活和饲养家畜是低贱的事。但是前来入学的青年

们，却能遵循大学的办学方针，很好的劳动和学习。

不久，文教部提出了希望允许日本学生入学的要求，然而，我坚持原来的意见，未改初衷。对此，也有人解释说可能是由于日本学生和满洲学生在学历上相差悬殊的缘故，而我并不这样认为。我担心的是如果在那些守纪律、讲礼貌的满人学生中混入日本学生，他们那些“永不整理床铺”，“边走路边行礼”的散漫作风，有可能使宿舍的纪律和文明行为遭到破坏。

不过，最后迫于为建筑和林业方面培养技术人才的需要，增设了农业土木科和林科，这两科只收日本人学生。于是，大连、奉天的名牌学校自不待言，新京、抚顺、安东等地的中学毕业生也都纷纷前来就学。学生课长对这些日本学生认真指导，严格要求，以便使他们成为满人学生的模范。幸而他们都能领会大学的方针，不仅使我最初的担心为杞人之忧，而且结出了民族协和之果。

然而，当学校开始进行军事训练，并逐步强化时，战争已步步走向失败。很多青年教职员和日籍学生们入伍战死或病死，令人无限惋惜，在此，让我衷心地祈祷他们的冥福。

以后，决定在哈尔滨也设立大学，我曾为选定建筑用地而奔走。还曾参与筹建奉天医科大学、奉天工业大学，并兼任过医大和工大的校长。虽然工作繁忙，几无宁日，但愉快的心情战胜了一切疲劳。

其次，在以牧教授为首的林科教师的努力下，在被认为不生长樱花的奉天，栽种了漂亮的樱花林荫树，到了春天，成为奉天人赏花的名胜。在以松野教授为首的农科教师的努力下，秋天为奉天人举行挖甘薯会餐。诸如此类，愉快的往事数不胜数。

（作者系原奉天农业大学校长，现为明治大学农学部教授）

九

伪满统治下的科技与医疗

伪大陆科学院工作的回忆

孙书棋*

我是1942年初从大学毕业的。毕业后就作为沈阳满洲关西油漆公司的研究生，在伪国务院直属的大陆科学院林产化学研究室搞委托研究的。

老实说，我乍到此院对它并不了解。虽然大陆科学院位于大学的对过，而且我又曾在此做过几个月的毕业实践，但我还是感到它很陌生，因它既不像一个机关，又不似一个大学，只是到了解放以后，看到一些资料并听到人们的讲述，经过反复思考，才逐渐对它有了一些认识。

大陆科学院当时是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东北地区进行经济侵略和资源掠夺的重要工具。我认为这个伪满最高科技权威机关有三个极为鲜明的特点：即内容的综合性、性质的掠夺性以及成员的排他性。

所谓综合性是指它决非一个事业机构，它实际上是一个研究总院，本身不仅拥有专业范围很广、综合性很强，甚至还包括很多技术科学范围，例如土木、建筑、机械、电力、燃烧等20多个直属研究所和3个附属工厂，而且还在哈尔滨设有分院，并在长春各处分设有卫生技术厂（即后来在长春近郊孟家屯发现的震惊世界的细菌杀人工厂的研究基地）、马疫研究所、兽疫研究所和地质研究所等研究机构。此外还有很多军事秘密

---

* 作者曾任中国科学院长春应化所所长，现已离休。

方面的研究，是我们不得而知的。显而易见，日本帝国主义是根据其侵华战争和掠夺资源的需要，不惜工本，并下大决心从日本内地抽调大批不同事业的科技骨干，以期综合性地解决东北地区经济、军事和资源方面的复杂问题，才决定成立了这个综合性的研究机构。

其侵略性或掠夺性的特点，则充分体现在所选定的研究课题上。例如1943年在其79项持续研究项目和37项所选课题中，绝大多数都是针对性强的同东北地区的资源利用和经济调查密切相关的应用性研究。而属于应用基础的却只占少数，这又足以说明他们当时的政治侵略和经济掠夺的用心不仅很明显而且又很急迫的。即使有些重要军事秘密研究未曾公开，我们无从了解，但从上述已公开的课题中，例如高级润滑油、高辛烷值汽油、飞机用材料、飞机发动机性能（特别是低温性能等，因当时大陆科学院内拥有一套亚洲温度最低可达－60℃进行汽车等耐寒试验的特殊低温试验室）、飞机场的土木工程、满洲型防毒面具以及城市防空等同军事有关的课题，同样也可看出，这些都是为备战和军需服务的。

我那时所从事的两项公司委托研究，实际也是公司为备战需要而不得不进行寻找代替品研究而进行的。即一项是用糠醛代替当时缺乏来源的甲醛试制糠醛树脂的研究。另一项是想用中国古传的用猪凝血涂纸制酒桶上以代替铁筒试制耐酒精容器的研究。这些研究除糠醛树脂申请上了两项专利外，并未见实际应用。

至于其人员的排他性的特点，则明显地体现在各个组织方面，例如在大陆科学院部研究室中的46名高级研究人员（指研究官和副研究官）中，有副研究官职称的中国人才只有4人，仅占9.1％。又如在其最高的科学审议委员会81名委员中，虽包括

35 名政府各部负责人，而中国人也只有2人作为傀儡参加。可见名为中国的科研机构，实际上的科技大权均被日本人所霸占。由此不难看出日本帝国主义垄断东北经济资源的野心。

我在光复前三年半一直在该院做公司委托的研究工作，平时同研究室的日人同事相处，特别感到这里并不像一个学术和民主气氛很浓厚的研究机构，既不召开室内学术会，也很少相互交流学术思想。而研究室主任又是唯一的研究官，他并不像一个学术权威，经常指导各个专题和讨论工作，却坐在办公室名副其实地当研究的官长，倒是经常到林场或造纸厂出差。据日人同事讲，那时的出差确是一件美差，不仅在外受到格外优待，且出差费也相当可观。对此研究室的人对他也确有不少非议。只有当你研究工作要出成果时，他才真正认真起来，把你叫去，问长问短。记得当我的两项糠醛树脂研究进展很快，要编写报告并申请专利时，他就特别卖力气，说三道四地"指导"没完，最后把他的名字签上去才算了事。

一般说来，大陆科学院那时的官职界限很分明。级别分简任、荐任、委任，职称则分研究官、副研究官、高等官试补、研究士。他们这种官衔很严格，上下级也很分明。这也体现出他们十足的军国主义教育传统。

那时我作为一个大学毕业的中国人能在伪满最高研究机构工作，的确不是一件易事，按道理收入应当不会太低，但实际上我的工资还是低微的。为了养活家口，不得不在晚上去教夜校，才得勉强糊口。当然在其他待遇上也不可能一视同仁。例如日人每月都有大米的特殊供应，而中国人则不然，不仅吃的粗粮，有时还不得不吃橡子面。那时对这些剥夺欺辱，我们只是敢怒不敢言而忍气吞声。但思想深处实是日夜盼望抗战胜利，有朝一日能将自己的科研知识和经验贡献给祖国的科学事业和

为人民服务上去。这也是我为什么解放后，国家在伪大陆科学院的旧址上成立工业研究所（即应化所的前身）后就立刻回到研究所，一心投到为恢复和修建新中国的科学事业上去的一个主要原因。因为我终于实现了梦寐以求的夙望。

胜利后，一部分日系科学家（包括原副院长志方益三、研究官织田三郎和吉村恂等人）仍留用在所里一个阶段，继续搞研究工作并取得一些成就。还如志方益三博士在党的教育下，思想进步很快，作为所的顾问夜以继日地忘我工作，本想长期留在中国继续他所专长的极谱（他是世界发明人之一）、纸浆和木材化学等研究工作，后来他也确在我国首先创建了极谱研究并由他的后继者卓有成功地坚持到目前，取得了国内外瞩目的新进展。后因对日人的留用政策所限才于1954年不得不返回日本。其他日系科学家也都于1952年前后陆续返回日本。

改革开放后，原大陆科学院的日人科学家也曾多次来东北和我所访问。他们看到解放后我国科学事业的突飞猛进感到震惊，认为自己过去工作过的地方（他们叫第二故乡）能有这样骤变都感到很欣慰。

我于1981、1984年赴日访问时，还有幸在神户和东京分别参加过他们召开的原大陆科学院同事恳亲会，不仅受到热情欢迎，而且还请我专门做了当前应化所发展现状的报告。他们听到解放后我所所发生的天翻地覆的变化，都很惊异和兴奋，问长问短，表现得极为亲切和关注。他们对我国的科学事业和党的科技政策有了进一步的理解，这对增进两国人民间的友谊和促进相互交流也是很有益的。

总之，我伪满期间在大陆科学院搞三四年研究工作的一些回忆，虽然不免有些苦涩和辛酸之感，但这段经历对我来说，确也是使我一生能始终致力于科研工作并为它献身几十年的重要

机缘。这种机缘同时也成了我后来所以能够同日本的学术界和科技界不断开展交流的一座桥梁，从这一点看来，似乎也还有一点苦尽甜来的回味。因此我认为这种机缘，还算幸运和有益的，同时我也衷心希望这座已经架起的友谊桥梁，能把中日两国人民两国科学家间的交谊和各项交流不断沟通和发展下去，那么这种回忆也就不会是徒劳而无益的了。

伪满洲国大陆科学院要览

郑　严　译

沿　革

众所周知，开发产业资源并促进发展，有赖于科学技术。当然，国家行政措施也要建立在科学研究的基础上。要开发满洲国的丰富资源，迅速改进落后产业的面貌，达到利国利民的目的，有识之士提议在政府各部局隶属的试验研究所之外，应设置专门的科学研究机构。日本理化学研究所长大河内正敏博士来满，会同原日本内阁资源局技师藤泽威雄与关东军及政府有关部局经月余的协商，提出了成熟的方案。政府内部经过慎重审议，于康德2年3月22日以敕令第18号公布了大陆科学院的组织编制。第一任大陆科学院长由原日本国道局长直木伦太郎博士兼任，并聘请大河内政敏、铃木梅太郎两博士任顾问。确定大陆科学院为国务院总理大臣直辖，以利用开发资源、培养技术人员、普及科学知识为目的的综合性研究机构。除从事科学院自选课题的研究之外，还接受委托和协助性的研究课题。

此后，专心致力于充实本院的组织力量，推动各项研究工

作前进。编印部分研究成果，向国内外广泛公布，从而为行政提供了参考，并为发展科学技术做出了贡献。但是直到康德5年(1938年)末，科学院新院舍落成之前，由于设施不完备，研究人员分散各地，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研究的发展，这是大陆科学院的过渡时期或准备阶段。伴随着国内产业的发展，科学院的研究部门亦逐步扩大。康德4年(1937年)1月，将原哈尔滨文物研究所划归本院管辖，并于同年2月，本院新增马疫研究处，承担马疫特别是马鼻疽和炭疽的检疫、预防及治疗方法的研究任务。翌年6月，院长更迭，迎来了新院长铃木梅太郎博士。

以前，由本院与满铁（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合作，共同实施了上、下水及污水处理研究的五年计划。康德4年(1937年)12月1日，随着附属地行政权的撤销，本院从满铁手中接收了铁道研究所上下水道研究室及污水处理试验所为本院的一部分，承担了城市及寒冷地带上下水道处理的调查研究任务。

另外，为了适应治外法权撤销后的新形势，又提出了将满铁试验研究机构移交给满洲国的议案。康德5年(1938年)3月31日，以敕令第42号公布了兽疫研究所及地质研究所的组织编制，其一切设施及所有人员均移交本院管辖。同年12月，为贯彻执行国内研究试验机构统一管理的方针，原隶属民生部的卫生技术厂也由本院接管。康德6年(1939年)3月，为了对建筑结构及其卫生保健等问题进行调查研究，设立了建筑研究室。同年3月，鉴于在满洲国亟待开展土壤肥料研究的迫切性，新设置了土壤研究室。

在短暂的期间内，大陆科学院各部门的业务范围迅速扩大，各种设施不断充实完备，进一步奠定了积极开展业务活动的基础，并取得了巨大成果。

大陆科学院下属研究机构概要：

哈尔滨分院

该分院历史悠久，前身为哈尔滨市俄罗斯学者私人聚会的各种学会，后借1932年庆祝中东铁路（东支铁道）成立25周年之际，合并为东方文物研究会。其后几经变迁，满洲国建国后，东省特别区改为北满特别区，该文物研究会也随之改为北满特别区文物研究所。康德2年（1935年）12月末，随着北满特别区公署的撤销，从康德3年（1936年）1月1日起，又改名为滨江省文物研究所，其后，为了统一管理国内研究机构和加强北满原有研究机构的职能，于康德4年（1937年）1月1日移交大陆科学院管辖，改名为大陆科学院哈尔滨分院。这样以前只是一个社会教育机构，划为本院领导后，发挥了北满第一线科学堡垒的作用。

马疫研究处

满洲国广泛流行马疫，尤其是马鼻疽和炭疽更为严重，灾害所及，阻碍了进一步开发马匹资源。这不仅不适应建国以来振兴农业的需要，从战略考虑，也是储备国防资源的紧迫问题。政府有鉴于此，从康德4年（1937年）2月18日公布了马疫研究处组织编制，与任命安达处长的同时，规定了马疫研究处的具体规模。

马疫研究处以研究检验马疫病源及其预防和治疗的方法为主要宗旨，以期扑灭马疫，为实行马政作出贡献。

根据这一宗旨，马疫研究处下设细菌、病理、化学、制剂等研究室，特别是以发明鼻疽的预防和治疗方法，研究生产对炭疽有效的疫苗和血清为目标。

康德7年（1940年）5月，为了研究马寄生虫病和其他害虫及其防治办法，又新增设了害虫研究室。

兽疫研究所

满蒙地方适合饲养家畜，饲养量很大。畜产品在满蒙经济占有重要地位。马匹也是这个地区的重要运输工具。却没设立任何防治家畜疾病的卫生机构，使可怕的家畜传染病和寄生虫病一年四季流行。家畜的疾病灾害如此严重，想推行家畜的改良增殖计划，只能是不切实际的幻想。满铁当局老早就筹划设立预防家畜传染病的机构，其后逐步具体化。于大正14年(1925年)10月1日，发表编制，同时委托北海道帝国大学农学博士葛西胜弥主持所务工作。

出乎预料，其后，兽疫研究所在科研工作中取得了好成绩，制造出计划中的牛疫、猪霍乱和炭疽的血清及防液、家禽霍乱血清、结核菌素、鼻疽检验液以及炭疽诊断用血清等十余种生物制品，并且从大正15年（1926年）5月起，又研制成狂犬病及（猪）疫预防液。同年5月11日，由关东厅正式取得了血清制品和销售的许可，业务日益扩大。随着撤销治外法权的新形势，提出了原满铁所属试验研究机构需合并于满洲国的提案，康德5年（1938年）3月31日，以第42号敕令公布兽疫调查所组织编制。这样兽疫研究所遂与地质调查所一起移交大陆科学院管辖。

地质调查所

明治40年（1907年）4月创立南满铁路株式会社，同时在矿业部地质课编制下，于抚顺煤矿设立了事务所。开始时专门从事抚顺煤矿的地质调查工作，以后由于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的编制变动，其所属各部、所也屡经变迁，但是该所承担的任务，始终是满蒙矿产地的地质调查研究及工业的基础调查工作；另一方面，作为此类业务的准备或基础调查，在全满洲范围内，普遍进行了系统的地质调查。

自该所建立30年以来，由于鞍山一带发现铁矿，对开发钢铁工业作出巨大贡献。此外，在满洲各地发现和调查了多种矿藏，还实地勘察了抚顺煤矿等3 000多个矿产区。其他如该所所做的一般地质调查及地质绘图等工作。这类贡献，特别是满洲事变后，带动了矿产的资源开发。由军部下达的地质矿产调查研究的委托任务迅速增加，该所的使命亦愈重大。在撤销治外法权的新形势下，根据“满铁试验研究机构移交给满洲国是适当的”议案，康德5年（1938年）3月31日，第43号敕令公布了地质调查所机构编制，于4月1日起和兽疫所一并移交给大陆科学院管辖。康德7年（1940年）5月，为了开发各种物理学探矿研究，设立了第四研究室。为了开展选矿研究，设立了第五研究室，从而扩充了新的业务领域并不断取得新成果。

卫生技术厂

满洲国地域辽阔，属于大陆性气候，由于蒙昧落后的风俗习惯，经常受到各种传染病的威胁，其中鼠疫和天花，虽然邻国已经绝迹，而满洲国每年时有发生。满洲各地长期流行几种地方病，严重影响着农村的发展和移民工作的进行，若放任自流，必将成为国运隆昌的一大障碍。为迅速扑灭这类恶性疫患，使人民安居乐业，决定设立卫生技术厂。康德元年（1934年）11月，公布其组织编制，确定为民政部大臣的直辖单位，任命现厂长阿部博士的同时，确定了技术厂的规模，选定新京西安大路为厂址，开始建筑新厂房。

康德2年(1935年)9月，技术厂厂部及部分附属工程竣工，同时加速配备各种器械仪器。康德3年（1936年）3月，各项生产准备工作都逐步就绪，开始投产。

如上所述，卫生技术厂原来隶属民政部，根据自然科学统一管理的方针，于康德5年（1938年）12月24日以第28号敕

令移交给大陆科学院统一管理。康德6年（1939年）12月，为扩充业务，开展一般细菌的血清学研究。以及制造预防液，增设了第四细菌血清研究室。次年5月，又新设立了地方病、传染病的病理研究室。

组织编制

第一条，大陆科学院隶属国务总理大臣管辖，负责以开发利用资源为目的的科学研究事项。

大陆科学院在不妨碍上述规定的条件下，可以接受资源开发利用及有益于产业开发或分析鉴定的一般委托。

第二条，大陆科学院配备下列职员：

院长：特任或简任（官）

研究官：23人　荐任（其中8人可为简任）

理事官：1人　荐任

事务官：4人　荐任

副研究官：28人　荐任

属官：28人　荐任

研究士：109人　委任

第三条，院长在国务总理大臣的指挥监督下统管院务，指挥监督所属职员，人员的升降赏罚须上报国务院，委任官以下职员自行确定。

第四条，研究官接受院长命令负责研究事务，理事官及事务官接受上级命令负责事务性工作，副研究官辅佐研究官从事研究工作，属官接受上级指挥从事事务性工作，研究士接受上级指挥从事研究工作。

第五条，大陆科学院分科由院长确定。

规　　程

大陆科学院研究委托规程康德5年（1938年）5月14日院令第44号规定：

第一条，凡报委托大陆科学院研究任务者，应按格式填写研究委托书，详细写明研究事项，送交大陆科学院长。

第二条，大陆科学院决定受理研究委托时，同时确定负责研究期限和费用连同其他必要事项一并通知委托者。

第三条，委托者接到上述通知时，应在一个月内交纳研究费，长期性研究课题，可以分批交纳。

第四条，凡在规定期限内不交纳研究费时，可取消委托。

第五条，已交纳的研究费一律不予退还，由于大陆科学院的原因不能进行研究时，应全部或部分退回研究费。

第六条，大陆科学院应向委托者交付研究结果报告书。

职员及分管事项

院长：农学博士铃木梅太郎

顾问：理化研究所长工学博士大河内政敏

参议：工学博士直木伦太郎

　　　工学博士丸泽常哉

院长研究室

1. 特殊问题的研究和调查：

主任研究官：　农学博士加藤二郎

研究官：　　　吉野荣吉（兼专卖总局技正）

副研究官：　　长岛长治（兼税务监督署技佐）

　　　　　　　小笠隆夫

　　　　　　　石渡达六郎

研究士：村上正齐

山本立

文屋猛

高等官试补：藤野公平

村井典男

科学审议委员会事务室

事务官：岗田丰

农业化学研究室

1. 关于制油原料化学萃取法的研究：(1) 满洲制油原料的化学萃取法调查；(2) 关于豆油新用途的研究；(3) 关于棉籽油精制加工的研究；(4) 关于蓖麻利用研究。

2. 关于燃料用酒精的研究：酒精特殊利用的研究。

3. 关于低温的研究：关于防止各种材料的低温度变化及化工燃料脂油类的不冻化研究。

4. 淀粉原料调查及利用的研究（与生物化学研究室和燃料研究室合作）：(1)以高粱或玉米为原料生产无水葡萄糖的研究；(2) 以高粱或玉米为原料生产乳酸的研究；(3) 关于生产淀粉一、二诱导体的研究。

5. 大豆蛋白质新用途的研究：关于以大豆蛋白为原料制造粘着剂的研究。

6. 关于利用加工乙炔的研究；关于人造橡胶的研究。

7. 关于人造树脂的化学研究（与林产化学研究室合作）。

8. 以满洲产含有戊聚糖的农产的废物为原料制造糠醛的研究。

主任研究官： 农学博士：丸山舍吉

研究官： 星原庆治（病休）

高尾修一

研究士：　　北代次郎

石田章一

楠濑薰（入伍）

大崎全兵卫

长谷川正来

高等官试补：　　石渡实

田村三郎（入伍）

林产化学研究室

1. 关于纤维及纤维素原料的研究；2. 关于纸浆和纸的研究；3. 关于木素及纸浆废液的研究；4. 关于天然树脂和合成树脂的研究；5. 关于粘接材料及粘接剂的研究。

主任研究官：　　福渡七郎

研究士：　　大田基

森田贞三

藤本一三

田中善雄

高等官试补：　　平田宗成

畜产化学研究室

1. 关于畜产品的研究；2. 羊毛理化学研究；3. 关于屠宰场副产品的研究；4. 关于皮革和毛皮的研究；5. 关于家畜饲料的研究。

主任研究官：　　农学博士齐藤道雄

副研究官：　　木冢静雄

水岛正秋

研究士：　　大杉三良

镇西宗茂

滕二明

古贺直三

渡边正敏

田中善雄

筱川健

生物化学研究室

1. 关于营养的研究；2. 关于食盐的研究；3. 油脂生物化学的研究；4. 生产营养剂的研究。

主任研究官： 农学博士川上行藏

研究官： 会田泰（兼专卖总局技正）

副研究官： 何芳陔

马 彰

研究士： 宫吉秀雄

青木一郎

土性研究室

1. 关于根瘤菌的研究；2. 关于固氮菌的研究；3. 关于碱性土壤的研究；4. 关于湿性土壤的研究；5. 关于硝土的研究；6. 关于肥料的研究。

主任研究官： 农学博士板野新夫

副研究官： 川濑金次郎

张宪武

荒川左千代（兼农事试验场技佐）

研究士： 内山淳

河野忠敬

安藏修（休职）

有机化学研究室

1. 关于生产鸦片和吗啡系列制剂的研究；2. 关于药用和香料植物的研究。

主任研究官：　理学博士有马纯三

研究官：　二宫　护

副研究官：　理学博士北川政夫

岩切三雄

林耀堂。

研究士：　养祖贞夫

二山弥七

无机化学研究室

1. 关于探矿、选矿和精炼的研究；2. 关于盐的精制及其副产品的研究；3. 关于窑业原料的研究；4. 关于满洲天然盐类的研究；5. 关于满洲产粘土类的研究；6. 关于含稀有元素矿物的研究；7. 满洲温泉矿泉的研究；8. 关于处理贫铁矿的研究。

主任研究官：　理学博士吉川恂

研究官：　织田三郎

副研究官：　山崎重明

研究士：　佐野荣

安纳林松

山田辛平

山本广明

中山三雄

电化学研究室

1. 关于电化学利用的研究；2. 关于碳化钙利用的研究；3. 关于铝的精炼研究；4. 耐寒蓄电池的研究。

主任研究官：　横山辰雄

研究官：　福渡七郎

研究士：　河津太直

杨藏

燃料研究室

1. 关于煤的液化研究；2. 满洲产煤煤质调查及其利用方法的研究；3. 关于合成高辛烷挥发油的研究；4. 关于合成高级润滑油的研究；5. 关于合成高级酒精的研究。

主任研究官：　沟下征

副研究官：　伊藤砚太郎

　　今村浩

研究士：　鹫尾三郎

　　福田稔

　　平尾孝四郎

高等官试补：　北冈隆吉

燃烧研究室

1. 关于燃烧方法的研究；2. 关于燃烧装置的研究；3. 关于燃料及其发热有效利用的研究。

主任研究官：　山崎喜一郎

研究士：　松田秀夫

冶金研究室

1. 关于硅素铁的研究；2. 耐寒钢铁的研究；3. 铝的冶炼法研究；4. 关于钢铁、冶金、金属材料的研究。

主任研究官：　工学博士田丸莞尔

副研究官：　林三树男

研究士：　森崎七磨

机械研究室

1. 关于内燃机运动机构的研究；2. 关于汽车、特别是代燃汽车的研究；3. 关于飞机发动机性能的研究；4. 关于飞机用材料的研究；5. 低温下机械材料的研究；6. 关于农耕机械的研究；7. 关于农畜产品加工机械的研究；8. 满洲土壤的理学研究；9.

关于采温、保温及采光的研究。

主任研究官：　工学博士线川勇吉
副研究官：　久保田重种
　　　　　　水谷寿
研究士：　外木有关
　　　　　野村明（入伍休职）

动力研究室

1. 关于利用风能的研究；2. 关于发展河川用船舶的研究；3. 关于农耕机械的研究；4. 关于木炭煤气生成机械的研究；5. 关于耐寒蓄电池的研究；6. 关于螺旋桨振动的研究；7. 关于小型风力发电装置的研究；8. 关于机器高速及运动状况的研究；9. 关于振动的电气音响学的研究。

主任研究官：　工学博士浅川勇（兼）
嘱托　木冈玉
副研究官：　吉田弥
研究士：　野泽典
　　　　　强　恒
　　　　　高木三
　　　　　平岛秀

上下水研究室

1. 关于下水处理的研究；2. 关于饮料水的研究；3. 关于工业用水的研究。

土木研究室

1. 满洲土壤的土木工学的研究；2. 关于混凝土的研究；3. 关于铺设道路的试验和研究；4. 利用满洲地产材料进行土木构筑及铺设道路的研究；5. 关于飞机场土木工学的研究；6. 各种材料的试验及鉴定；7. 流速计检定试验。

主任研究官：　照井隆三郎（兼交通部技正）

黑田重治

副研究官：　源川丰一郎（兼交通部技正）

河田喜代助

内藤利贞（兼开拓研究所副研究官）

雨中田参次（兼交通部技佐）

濑户一郎

研究士：　澄川义夫

赤泽常雄

大岛通治

中武绿（兼交通部技士）

矢野精一（入伍）

须藤尧

滕部泰次

建筑研究室

1. 关于烧砖的调查研究；2. 关于土坯的调查研究；3. 低标号水泥的调查研究；4. 关于建筑材料保温性能及保温材料的调查研究；5. 关于干式结构材料的调查研究；6. 关于防止建筑物冻害的调查研究；7. 砖瓦结构及砖瓦、铁筋、混凝土并用结构的调查研究；8. 关于自然通风及辅助通风法的调查研究；9. 关于火炕和俄式壁炉的调查研究；10. 关于冬季的太阳热及太阳光线对室内气温影响的调查研究；11. 关于建筑物冬季施工的调查研究；12. 关于工厂建筑的调查研究；13. 关于开拓区建筑物的调查研究；14. 关于俄人住宅的调查研究；15. 关于土结构建筑物的调查研究；16. 关于城市防空建筑的调查研究；17. 关于建筑材料规格的调查研究。

防毒研究室

1. 关于防毒材料的研究；2. 关于城市煤气防护的研究；3. 关于工厂、矿山化学灾害的研究。

理化学试验室

各种材料的理化学试验及鉴定。

主任研究官：　理学博士吉村恂（兼）

研究官：　织田三郎

研究士：　佐野荣

久保田光雄

小林俊男

早版京三郎

木材试验室

1. 木材及其他材料的物理化学试验；2. 关于生产胶合板等建筑材料的试验研究；3. 满洲产木材的材料试验及鉴定。

主任研究官：　福渡七郎（兼）

研究士：　太田基

樱井敏夫

平田稔夫

山本亮齐

低温试验室

关于低温的试验。

主任研究官：　理学博士吉村恂（兼）

研究士：　板恒八郎

横川政司

机械工作试验室

1. 试验研究用机器设计制造的研究；2. 关于机床性能的研究；3. 关于代燃汽车的调查及试制的研究；4. 关于农机具的研究。

主任研究官：　工学博士浅川勇吉

副研究官：　柴田料

研究士：　境野试次郎

齐藤源

望月

山本正

本院总务科

1. 负责文书、总务、会计及非其他室所分管的事务。

哈尔滨分院

1. 关于动物、植物、地质、经济及考古的调查研究；2. 博物馆、饲养场及植物园的管理工作。

占地及建筑物

大陆科学院

本院位于新京特别市即长春市大同大街最南端南岭附近，占地面积25万平方米。本院所属建筑物为19栋，康德2年（1935年）开始设计，为使设计完善，符合理想，多次改变设计方案，其中6栋于康德3年（1936年）7月上旬动工，至康德4年（1937年）1、2月竣工，其余13栋于康德5年（1938年）6月上旬动工，康德8年（1941年）5月末竣工。

本院污水处理试验所位于新京特别市东端东安屯第三区，占地面积600平方米，其东半部装设各种试验设备，其西半部设有污泥利用、处理的下水利用及其他研究设施。共有研究室、混合槽、药品处理槽、消化槽、粉碎机室等6栋。

哈尔滨分院

分院位于哈尔滨市南岗中央广场旁，租借哈尔滨铁路局一部分建筑物，设有博物馆、研究室及事务室等。

经　　费

本院建院开始后因厅舍、设备等均不完备，前三年处于筹建阶段，研究主力也多住在日本；康德4年（1937年）12月，厅舍竣工，驻日人员尽数撤回；从康德5年（1938年）起，科学研究经费编入特别会计，研究工作走上正轨，经费也比建立当时增加10倍多。各年度经费预算如下：

过去三年预算额（包括建设经费及临时性费用）

	合计
康德5年度：	1 806 642.00
康德6年度：	2 996 782.00
康德7年度：	2 803 093.00
过去三年间支出额	合计
康德5年度：	1 249 593.50
康德6年度：	2 103 340.29
康德7年度：	1 876 001.00
康德8年度支出预算：	合计
	2 733 456.00

业　　绩

出版物

本院各研究所成果，特别是拟向世界广泛发表的重要成果，以本院研究报告的名义随时出刊。其他1般研究及资料调查、讲演及本院业务概况报告，每年发行6次汇编。至康德8年6月末，发刊研究报告达5卷62册，汇编达5卷24册。

专利权

至康德8年6月末取得专利权项目如下（见表1）

表1

专利号	发 明 名 称	取得专利的时间	发明人	日本专利号
391	风车调速装置	康德3年11月6日	本冈玉树	
12753	音响风测器	康德7年3月2日	本冈玉树	
13145	罂粟种籽油鞣革法	康德7年7月2日	齐藤道雄	
14104	利用内燃机放热器冷却器供给温湿空气的装置	康德7年10月10日	本冈玉树	
14918	植物油脂漂白法	康德8年1月20日	二宫 护 立山弥七	
14950	耐寒手摇扬程泵	康德8年1月21日	本冈玉树	
14973	从杏仁中提取杏仁油和杏仁水的方法	康德8年2月4日	有马纯三 二宫 护	
14974	耐寒泵	康德8年2月4日	本冈玉树	
15147	用动植物混合酸酵液的兽皮制革软化脱灰法	康德8年3月3日	齐藤道雄 大彬三良	
15086	耐寒电动泵装置	康德8年2月20日	本冈玉树	
	不变性蛋白质制造法	昭和15年12月18日	二宫 护	140580
15694	以罂粟壳杏仁壳及其果蒸为原料制造含硅素少的活性炭的方法	昭和16年5月5日	有马纯三 二宫 护	143331

受理试验委托

过去三年间受理各项试验件数如下表：

年　度	康德5年	康德6年	康德7年
受理件数	2 231件	2 960件	3 844件

大陆科学院研究项目

（康德6、7、8、年度）

1. 制油原料化学成份及其利用加工的研究：(1) 满洲产制油原料的化学成份研究；(2) 关于豆油新用途的研究；(3) 棉籽油精制加工的研究；(4) 蓖麻利用的研究；(5) 利用蓖麻粒的研究；(6) 利用蛹油的研究。

2. 关于纤维及纤维素的研究：(1) 造纸和人绢浆料、原料的满洲木材化学研究；(2) 关于棉茎工业利用的研究（制造浆料等)；(3) 单宁材料的化学研究；(4) 以农作物杆茎（除棉茎外）为原料的浆料研究；(5) 以农产品为原料制造人造板；(6) 关于松节油及固形树脂的研究；(7) 蓖麻茎工业利用的研究；(8) 关于满洲产棉花纺织品价值的研究；(9) 关于棉绒企业的研究；(10) 阔叶树纸浆的研究；(11) 关于柞蚕的研究。

3. 鸦片、吗啡系列制剂的制法研究：(1) 关于科学鉴定鸦片质量的研究；(2) 满蒙各地产鸦片的研究；(3) 吗啡制剂的制法研究；(4) 关于罂粟栽培的作物学研究；(5) 喝大烟灰对人体的影响研究。

4. 燃料用酒精的研究：(1) 酒精原料及制法的研究；(2) 酒精特殊利用的研究。

5. 关于酒精饮料的研究，满洲民间制造的普通烧酒和酒精混合在卫生学以及科学上的比较。

6. 关于盐的精制利用的研究：(1) 呼伦贝尔湖池盐的精制利用法的研究；(2) 产盐方法的研究；(3) 卤水在经济上利用的方法研究。

7. 关于粮食加工利用的研究：(1) 关于牛、猪、羊及其他肉类的加工利用的研究；(2) 燕麦作为食品及酿造原料的研究；(3) 关于满洲农民标准营养食品的研究。

8. 关于畜产品的研究：(1) 蒙古乳制品的化学研究及改良研究；(2) 关于屠宰场副产品（兽骨及兽肠）的利用研究；(3) 从家畜饲料及营养学来研究产毛量及毛质的改良问题；(4) 关于牛、猪、羊的肉质研究。

9. 羊毛的理化学研究：蒙古土产羊毛的理化学研究。

10. 关于皮革及毛皮的研究：(1) 关于提高皮革原料质量的研究；(2) 关于毛皮加工利用的研究；(3) 满洲揉皮法的理化学研究；(4) 改良毛皮染色法的研究；(5) 关于改良种和纯种的猪皮利用价值的研究。

11. 关于家畜害虫的驱除研究：(1) 关于牛的营养和牛蝇危害的研究；(2) 关于除虫害的研究；(3) 牛蝇预防的研究。

12. 鱼类及毛皮用兽的研究：(1) 增产淡水鱼的研究；(2) 增产毛皮用兽的研究；(3) 利用第二松花江堰堤式水力发电的贮水库，增产淡水鱼类，并在水库周围周期性灌水区栽培有用植物的研究；(4) 关于养殖毛皮用兽的饲料学研究。

13. 关于豆科植物根瘤菌的研究。

14. 药用及香料植物的利用研究：(1) 艾类（山道平原料）、大黄（缓下剂）及其他药用植物的研究；(2) 玫瑰油原料蔷薇类各种唇形科植物及其他香料植物的研究。

15. 纤维用原料及其他有用植物的研究：(1)关于造林用树种的地理研究；(2) 纤维用原料植物的研究；(3) 单宁原料植物及其他一般工业用植物种类的研究；(4) 绘制满洲国植物自然分布图。

16. 关于谷类、蔬菜干燥及贮藏的研究。

17. 家畜饲料研究：蒙古野生牧草的饲料价值的研究。

18. 关于低温研究：(1)在低温试验室内诸材料及其结构的低温影响研究；(2) 防止诸材料在低温下变化及化工燃料脂油类不冻化的研究；(3) 低温凝结水泥的研究。

19. 关于下水处理的研究：低温下下水处理设备的研究。

20. 关于采温、保温及采光的研究：(1) 关于适应各种燃料的室内取暖设备的研究；(2) 关于排水、灌溉及饮水供应的研究。

21. 关于农用机械的研究：(1) 以木炭为燃料的拖拉机、发动机及耐寒泵等应用机械的研究；(2) 关于农耕用机械改良的研究。

22. 关于农畜产加工机械的研究：(1) 关于谷类精选机、干燥机的研究；(2) 高粱精白机的研究；(3) 酿造、制油、制酒等工业化必需的化学用机械的研究。

23. (原稿不清)

24. 关于木材的研究：(1)木材镜检下的结构及木材鉴定的研究；(2) 木材强弱试验的研究；(3) 以国产木材为原料生产胶合板的研究；(4) 关于枕木的研究。

25. 采矿、选矿及精炼的研究：(1) 关于砂金残渣的研究；(2) 用菱镁矿制造金属镁、镁化合物的研究。

26. 液化煤的研究：(1) 关于满洲产液化煤收回率的研究；(2) 适合国内企业化的煤炭液化法的研究。

27. 特殊土壤地带的研究：(1) 关于利用碱土地带的研究；(2) 关于利用湿土地带的研究。

28. 选定工业地点的调查研究：(1) 选定主要工业地点条件的研究；(2) 关于企业后备地的运输、动力、供应、给水、原料供给，劳动力来源等状况的调查。

29. 诸材料的理化学的试验及鉴定：(1) 化学试验；(2) 物理试验；(3) 矿物分析及鉴定。

30. 淀粉原料调查及利用的研究。

31. 关于大豆蛋白新用途的研究。

32. 关于乙炔利用加工的研究。

33. 关于电力化学利用的研究。

34. 关于内河船推进机的研究。

35. 国内军需资源及其他重要资源的生产、贮藏的方法合理化和制造方法优选的研究。

36. 关于军需资源以及其他重要资源的国内产代用品的研究。

37. 向国外输出的国产重要资源一旦有事时的利用方法的研究。

38. 满洲国土壤的土木工学的研究：(1) 满洲土壤特异性的研究；(2) 湿土的研究；(3) 黄土的研究；(4) 地基冻结的研究。

39. 满洲煤炭性能调查及各品种煤炭的科学使用法的研究。

40. 关于纸浆废液的研究。

41. 特殊用木材的研究。

42. 关于柞树的研究。

43. 人造树脂的化学研究。

44. 人造矿物的研究。

45. 满洲矿物的矿物学研究。

46. 满洲三大矿床的矿物性状研究。

47. 处理贫铁矿的研究。

48. 用矾土页岩制氧化铝的研究。

49. 精制铝的研究。

50. 耐寒蓄电池的研究。

51. 制造高级耐火材料的研究。

52. 硅素铁的研究。

53. 耐寒性钢铁及其他金属研究。

54. 生产蹄铁钉的研究。

55. 从空罐头盒回收废金属的研究。

56. 高辛烷、挥发油的制造研究。

57. 制造高级润滑油的研究。

58. 飞机发动机性能的研究。

59. 飞机用材料研究。

60. 试验研究用机器设计制造的研究。

61. 制订水泥规格的研究。

62. 关于混凝土的研究。

63. 关于沥青材料的试验研究。

64. 关于石材的调查及试验研究。

65. 铺设道路的研究。

66. 关于土木施工法的研究。

67. 根据不同材料对土木建筑及道路铺设的研究。

68. 飞机场的土木工学研究。

69. (原稿无)。

70. 关于岩山类矿物的新利用方法的研究：(1) 关于岩山

的研究；（2）关于矿物的研究。

71. 关于砖瓦类（红砖、黑砖、灰砖、土坯子等）的生产能力和提高质量的调查研究。

72. 建筑材料保温性能及保温材料的调查研究。

73. 干性结构材料的调查研究。

74. 建筑物的冬季施工方法研究。

75. 砖瓦结构和砖瓦、铁筋、混凝土并用结构的研究。

76. 防止建筑物冻裂的调查研究。

77. 自然通气法及辅助通气法的调查研究。

78. 火炕、俄式壁炉的调查研究。

79. 冬季太阳热及太阳光线的影响和利用的调查研究。

80. 关于降雨流失率的调查研究。

康德8年（1941）度新开始的研究项目：

1. 满洲产戊聚糖资源的调查及利用。

2. 铁钼合金的研究。

3. 镍铬合金线的代用品研究。

4. 代用燃料汽车的机器研究。

5. 汽车性能试验的研究。

6. 以水性瓦斯为原料的高级酒精合成的研究。

7. 火炉、俄式壁炉及其他家庭用燃烧器械的研究。

8. 制砖法的研究。

9. 燃烧劣质煤的研究。

10. 利用碳酸钙的研究。

11. 生产金属钙的研究。

12. 关于电极的研究。

13. 湿式冶炼的研究。

14. 满洲型防毒面具的研究。

15. 关于工业品规格的研究。

16. 烟叶及代用烟叶的研究。

17. 用菊芋制造果糖的研究。

18. 天然氮素资源、特别是硝的利用研究。

19. 土壤的调查研究。

20. 城市防空的调查研究。

21. 关于建筑研究工厂的研究。

22. 关于低标号水泥的研究。

23. 关于开拓团建筑物的研究。

24. 土壤结构的调查研究。

25. 下水污泥的研究。

26. 用促进污泥法处理下水的研究。

27. 下水结冰状况的研究。

28. 用灌溉方法处理下水的研究。

29. 新京市内排水的水质调查。

30. 水质试验。

31. 满洲各地地表水的调查。

32. 关于满洲高速用柴油的研究。

33. 以利用小麻籽为目的栽培的线麻的利用研究。

34. 关于木材防腐的研究。

35. 关于木材流送的研究。

36. 关于绸场设计的研究。

37. 雷害的调查研究。

（摘自伪满《大陆科学院要览》）

长春生物制品研究所

长春生物制品所史志办

1931年“九·一八”日本侵占东北，于1934年11月在长春成立卫生技术厂，主要任务是生产生物制品。该厂隶属于伪满民生部，于同年将哈尔滨原有之东北防疫处接收为卫生技术厂分厂，1936年开始制造细菌，血清学制品。为统一生产，将哈尔滨分厂合并，下设6个科，人员共68人。主要产品有：伤寒、霍乱、鼠疫、百日咳等菌苗、牛痘苗、狂犬病疫苗、白喉类毒素、猩红热预防液、口服伤寒、痢疾菌片以及诊断液、诊断血清等20余种。1938年移归大陆科学院管辖。1939年，将生产二层楼扩建为三层楼，新增设营养科学研究室、生活科学研究室、体力科学研究室、人口科学研究室，及药学研究室。1944年改名为厚生研究所。下设4部：传染病学部、厚生科学部、药学部、血清疫苗制造部。人员217名。1945年东北光复后，由苏联红军接管，10月4日交给地方管理，名为长春卫生技术厂。1946年4月16日，东北民主联军第一次进驻长春接管该厂，定名为东北卫生技术厂，5月21日将该厂一部分迁至佳木斯。1948年10月长春第二次解放后，又迁回长春。目前定名为卫生部长春生物制品研究所。

关于公主岭农事试验场

（日）末延武留　贾玉芹　译

“去参观能结米的树。”这是新京某日本人小学的一位老师说的话。他曾组织在满洲出生的日本儿童来公主岭农事试验场参观学习。

公主岭地区同平原不同，是呈波状的丘陵地带，是流经南满的辽河和流经北满的松花江之间的分水岭。据先辈们说，地名源自附近的公主陵，同时，又因是划分南北的分水岭，故取名为公主岭。

日俄战争后，日本接收中东路，交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经营。铁路经营主要是货物运输，但也从事农产品的品种改良，以谋求增产。大正2年（1913年）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公主岭农事试验场呱呱坠地、应运而生了。其后，经满铁经营25年，昭和13年（1938年）撤消治外法权的同时，将该场移交给满洲国，成为满洲国立公主岭农事试验场。其机构也曾历经变迁，当积雪初融的早春时节，曾在公主岭总场召开了为期数日的事业方案例会。

公主岭总场的职员中有150名日籍职员；场内耕地和农业部园圃共有70余町步（一町步99.2公亩）；畜产部的牧场实际上有400余町步，荷兰种奶牛和绵羊悠然自得地漫步其间。

记得当时为了在满洲人兴农系统中博得一席之地而从国内前来谋职的人们，当了解满洲农业概况时，首先要读公主岭农事试验场出版的《满洲农业》，或来场参观，还有许多人参加有

关满洲农业的短期学习。

在公主岭站下车，从车站出口前行约200米即可进入试验场内。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正门对面长达200米栽得整整齐齐的白杨树。

树种是白杨，俗称满洲白杨。是创建农试同时栽种的，到战争结束时已有35年树龄，它如实的记载了农事试验场的历史。据说这些树是战后作古的畜产部饲料作物科科长小佐井元吉在进入满铁时亲手栽种的。

主楼对面右侧的礼堂和标本室的建筑上，以公历年号1921年为建筑装饰，很有殖民地风格。从早春到秋季，满洲国内自不必说，从日本远道前来参观或视察的人也络绎不绝，由各科场员担任向导，节假日也络绎不绝。

此外，畜产部的产品，牛奶、黄油等也以低价在内部出售，这里看到穿着皮领大衣的人，无疑是农试职员，因为这是他们的特权服装。

蒙古烤肉也是公主岭的名产之一，因为公主岭可以提供所需的肉和蒙古锅。似乎还有从新京远道而来预订的，场员们举行各种会餐时都有这道菜，当庆祝播种或丰收时，大家去郊外，或在礼堂的屋顶上，远眺公主岭近郊，吃着蒙古烤肉，饮酒畅谈，直至深夜。

在历任场长中，有世界闻名的大豆育种家中本保三，曾成功地培育出满洲大豆“黄宝珠”。先生在任期间，外国人寄来的信，只写了“满洲中本保三收”，居然寄到了，足见其知名度之高。还有后来任哈尔滨农大校长的香村岱二先生和在食品化学方面荣获文化功劳勋二等的满田隆一先生。战争结束时的场长是从哈尔滨农试调来的突永一枝先生，当时的农产部长是田中定夫，经营部长是村越信夫，畜产部长是坪井清。

战争结束时，担任公主岭北区护场负责人的是帝国在乡军人公主岭北分会会长，种艺科的石川正宗。宣告投降的同时在种艺科的脱谷场上，全体人员流着悔恨的眼泪销毁了分会会旗和重要文件。

从伪满“新京”医科大学附属医院看伪满医疗机构

范作彭

伪满年间，长春（那时叫做新京）是伪满洲帝国的首都，设有4个市属医疗机构：新京特别市立第一医院、市立第三医院、市立第四医院、千早医院（即市立传染病院），计划中的第二医院至光复亦未建成。

第三、第四医院规模很小，只相当于一个中型的门诊部，当时规模最大、设备最好的便是市立第一医院，以后又称为“新京医科大学附属医院”。我自1942年春毕业于医科大学后就在该院供职，一直到光复。

沿革和一般概况

“新京特别市立第一医院”建立于伪满初期，地址在长春市中心地区平治街，建筑面积很大，是个“凹”字形的建筑物，正面是四层，两厢是三层，还有个相当大的地下室，八套病房，病床300张。门诊的日门诊量约500人次，办公室、礼堂、餐厅、厨房、洗衣房均容纳在这一个建筑物里。

建筑不久，吉林医学校改名为“新京医科大学”迁来长春，

这个医院即充作大学的实习医院，1940 年正式公布为大学附属医院。在正门处悬挂了两套牌匾，一块是“新京特别市立第一医院”，一块是“新京医科大学附属医院”。不过市民们仍旧习惯地沿用它的旧称呼。

我初来这个医院时，它已经过了多年来的陆续充实、改善，各科室规模已具，正在全盛时期。

医院首任院长是日本人山口清治博士，他是满洲医科大学毕业生，曾留学美国。“九·一八”事变当时为哈尔滨赤十字会医院院长，后又兼“新京医科大学”校长。我来该院时，山口已专任医科大学校长，免去院长职务。由外科医长入江义一继任院长。

1942 年当时，医院设有内科、外科、整形外科、小儿科、产妇科、眼科、耳鼻喉科、皮泌科、精神科、齿科、汉医科、物疗科、X 线科、药局、中央研究室、事务科，各诊疗科室各设医长（相当于科主任）1 名，除精神科外，医长均持有医学博士学位。各科室配有医员（相当于主治医师、住院医师）125 名，这些医生几乎全都是日本人。1942 年以前，正式任命的中国人医员只有 3 名，职位都不高，以后有 2 名被派到外县去了。日本医学界学派观念很深，院长是满洲医科大学出身，于是，医院从各科医长到医员几乎全是满洲医科大学毕业生，也可以这样讲：这个医院是满洲医科大学的天下。

医疗水平

论地位，论条件，医大附属医院是“国都、新都”最完善的医院，在全“满洲国”也是个数得着的医院。

论起医疗水平，和今天当然不能相比，就在那当时，和日本国内各大学医院也是远不能相比的。从人员数来看，作为大

学的附属医院也是远不相称的。先从内科说起吧，由于化验室工作只止于一般常规检查，它的水平可想而知。在处置方面，最高亦不外是人工气胸、腰椎穿刺、胸腹水穿刺等。外科手术停留在阑尾、疝气上，胃切除便是最大的手术了。医院无血库，大手术时输血的血源皆由患者亲友供给。没看到眼科和耳鼻喉科作过什么较大的手术，耳鼻喉科能作食管直达检查，那时还没有支气管镜。据说皮泌科作过一次肾摘除手术，作得也不够理想。我在院3年多，也只听说作过一次，膀胱镜检查只偶尔一作。产妇科可作子宫摘出术。化验室叫作中央研究室，血清瓦氏反应、村田氏反应、肥达氏反应、伤寒菌培养等是最高的检验，属于生化方面的检查从来没有开展。连最普通的血清N·P·N值的测定都不能。日常工作范围只止于一般的常规化验，对门诊患者除检尿外，不作任何化验检查，所以化验室里虽只配备1名化验员和1名十几岁的儿童助手，工作也不是很忙的。X光科只作一般照像、透视和深部治疗。也作肾盂和胆囊摄影，不过极少。

“新京医科大学附属医院”的医疗水平大致如此。

不过，在那时治疗面广泛的抗菌素还未登场，最高级的治疗药品不过是磺胺属的suefapgridine，诊断又不能多依靠化验检查，因之诊断和治疗疾病比今天困难得多，要凭丰富的经验和细心观察，有时还需要大胆的判断力。

病志的记载是简单的，从今天看来完全不合要求，甚至令人感到可笑。我曾看到有一个时期的病志只记了个诊断病名，下面便是一套处方。病史和诊察所见只字未提，院长亲自诊察的病志也是如此。在医院里嗅不到学术空气。我在这里工作3年，只举行过一次非正式的学术报告会，从来没有过病案讨论，也没有组织过什么学习。

日本人的天下

前面讲过，这个医院从院长到各科医生都是日本人，还不仅如此，各科室和各病房的护士长均是日本人，护士的绝大多数是日本人，事务科长和事务人员均是日本人，连门卫、司机、小卖店主人也都是日本人。那么，中国人在医院里都担任些什么工作呢？护士里有少数中国人（1942 年时约有 10 名），再就是所有的厨师和勤杂人员。但是厨师头和勤杂头还是日本人。一句话：这个医院可说是完全由日本人组成的医院。服务的对象呢？当然也是日本人，关于这一点以后还要详述。

医院里的中国人医生

走进当时的医大附属医院，会发现各科室里，中国人医生比日本医生多，其实这几乎全是“新京医科大学”毕业了的自费实习医生。

在 1943 年以前，伪满政府对大学毕业生尚未施行统一分配制度，他们可以自由选择职业，因之每年都有不少新出校门的医生，为了提高个人的技术能力，投到医院来作实习医生。从实习医生生活里最能反映出当时医疗界中不合理的一面。从医科大学毕了业，志愿作实习医生的人要自己提出申请，兼教授的各科医长照例要问：你准备实习多久？同学们都认为将年限说得长些总比短些好，因为这样既能表示自己的决心和对实习的热望，也会得到医长的重视，因之大家多是申请 3 年、5 年，个别的还提出要实习 10 年。医长们的回答总不外是：“啊呀！还是不提那么长的好，顶多你能呆上两年。”事实也的确是这样，用不到两年，实习医生们便陆续地离开医院他去了。为什么呢？这里包含了许多原因：首先，医院对学习医生不给任何待遇，一

切生活费全由个人自理，又不供给宿舍，他们只好长期地居住在旅店里，吃小馆子过生活，负担很重，日子久了自然要有一定的困难；二来，教授和日本医员们对学习医生漫不关心，在技术方面很少作系统的指导，在院里实习过了一年就会感到再继续呆下去也不过仍是如此；三是“不顺气”，受医长和日本医员的气，受日本护士们的气，令人难以忍受。

也有少数在医院坚持较久的中国人实习医生，这多是家中贴补得起，日本话好，和医长、日本医员私人关系搞得密切，实习成绩较为突出，受到医长的青睐认为是“有造就”的人。这时医长会推荐你，由医院按月发给若干生活费，数目不定，少则15元，多则20～30元，年限再久者可得60～70元，但这并不等于正式任职采用，只是一种津贴性质而已（那时规定：公立医院正式任命之大学新毕业医师每月工资为150元）。能熬到接受津贴的人是极少数的，他必须是平日一贯服从、小心翼翼，凡是日本医员们不愿作的工作都要毫不嫌弃地接受过来，业余时间还须替医长和日本医员们作一些有关生活的琐事。如：替他们修修园圃，修理狗窝，搬搬家或充当黑市购买员，买东西最好还是不要钱。即使这样，能领到津贴的人在实习医生之间仍不失为众人羡慕的对象，大家皆叫他为“大师兄”。这些大师兄们对下级实习生的态度也不够好，他们总爱摆起一副高傲自大的架子。

这些实习医生的学习生活又是怎样的呢？

尽管各科室有些不同，总地来说，实习医生的处境大致是相同的。譬如在内科，午前的工作多是在日本医员桌前帮他抄抄处方，午后没有事就随便溜溜达达，或到病房帮助护士打打药针。学习过了一年可以给你一两名住院病人，不外是胸膜炎、结核性腹膜炎等“太平疾病”。假如你能坚持到两年以上，就有

机会升进到医长诊察桌的横顶替他们作诊疗记录了。这是内科实习医生的最高席位，也是公认为最便于个人学习和提高的职位，但是一般很难获得，因为那个席位始终有比你高年的实习医生占据着，他不离开医院，那就永远轮不到你。况且，你如果不具备一定的水平也真的不能胜任，因为医长是边诊察，边用德语喃喃地述说检查结果，用药方面也只有概略地指给一个方向，让你来替他斟酌处理。他还为了加快速度常将两三个病人同时进行诊察，看过五六个病人后才一起指示如何用药，这就要求记录人必须高度集中注意力，常会因记载遗漏、张冠李戴而受到斥责。坐在内科医长桥本博士身旁作记录的人，永远不许吃蒜，他最厌恶大蒜的气味，即使是昨夜吃了蒜，他也会将你撵走的。

在外科，干得再好也只能升进为手术医生的第二把助手，他们从来不肯撒手将手术交给实习医生执刀来作。外科实习医生的经常工作便是坐在处置室里换药作着今天护士们所作的工作。

产妇科医长是个脾气古怪的人，实习医生来到科室必须先派到检尿室里工作。有一个实习医生在检尿室里一连检了3个多月的尿，什么也没看到，什么也没学到。他腻得很，一天他去请求医长："老师，我干了3个月的检尿啦，已经非常熟练，是否把我调换一下，让我干点别的？"这时他得到了一个意外的回答："3个月就着急了吗？我年轻时大学毕业后在医院里检了一年多尿哩！好好认真地再干下去！"这个实习大夫没敢再说别的，只得老老实实地再去检尿。过了些天，医长找了他说："你现在可以学点别的了，你可以利用检尿的余暇，向护士要点缝合线练习打扣结……把袜子脱下来，就在你的大脚趾上练！"

其他各科室的情况均大致如此，实习医生很少有人管，很

少有人督促，更没有人教给你。连本国人的大师兄对大家也是冷冰冰的，学习就全凭自己用心观看，不懂便找书本，最好少问。

靠自费实习，时间稍长都会在经济上感到压力，不得不找些兼职来作，有的担任几个小学校的校医，还有人将医师执照出租给私人开业医来取得生活费。

因为附属医院是日本人的天下，几乎没有人敢奢望能在附属医院里作个正式任命的医员。我到这个医院来时，只在耳鼻喉科里有一名中国人医员，他是资格最老的大师兄了。他是经过5年的刻苦坚持才被正式采用的。

说起来，还是我们这一期毕业生最幸运，我在1942毕业时便以高等文官考试及格的条件，和几个同学一起被安排“有俸学习”一年，期满后被任命为医官，作为附属医院的正式医员了。为什么我们几个能获到这样前所未有的待遇呢？这是太平洋战争的“天时”所造成的。在附属医院里作个正式医员，对中国人医生来说真是“荣幸”之至，比起自费实习医生要好得多了。但是工作也很不好作，同室里的日本医生都比你职位高，要时时注意搞好关系。令人气愤的便是久居我国东北的日本护士，她们瞧不起中国人，日本医员呼之则应诺连声，中国医员对之则呼唤不灵。对策只有一法投其所好，常买点零食给她们吃吃。

最难对付的便是X光室、药局和事务科，这里的日本人高傲得很，中国医员去联系任何一项工作都是不睬不理，每次如不赔上几句小心，什么事也办不通。

中国病人的遭遇

那时，称居住在东北四省的中国人为“满洲国人”，也称为

"满系"。"满系"的人在自己的国土上是低一级的国民，不仅在政治上、经济上受到欺侮和压迫，连治病的权利都给剥夺掉了。

正如前述那样，附属医院是日本人的医院——医生是日本人，护士是日本人，诊疗对象也是日本人。"满系"百姓来看病根本不受欢迎，到处受白眼，受责难。中国人患病宁可多花几个钱到私人医院去，也不愿进这个医科大学附属医院。但有时患了急重病症，私人医院解决不了，还只好到这里来，卫生条件恶劣的农民和劳动者（那时叫作"苦力"）是最不受欢迎的人。因为他们衣衫褴褛、肮脏、有臭气、满身虱子，还都是重患。这样的病人抬到诊室里来，日本医生一看便皱了眉，急忙掏出口罩带上。有一种"高级满系"，他们是受欢迎的，医长们常亲自给他们诊察。中国人到医院来诊病，第一个困难便是不懂日本话，自从有了中国人实习医生，他们在中间充担了翻译，情况有了改善，但病人们又多不懂诊病手续，以致各处乱撞。

令人愤慨的是有些中国人护士的行为，这里的中国人护士全是日语顶呱呱的，她们平时不大讲中国话，喊中国人姓名时也用日语，弄得病人不知她在喊谁，中国病人交款取药都成问题。取了药也不知怎样服法，因为坐在窗口上收款、投药的也全是日本人。

日本医生根本不愿给"满系"看病，内科医长桥本博士更具有代表性，他最怕虱子，给中国人诊病时一向都是远远地用听诊器在病人胸上触弄两下便算完事。还时常"好意"地告诉我们："虱子！他有虱子！传染上斑疹伤寒可不得了！"还时常问："为什么满洲人都生虱子？你有虱子没有？"虱子的问题不断地在威胁着他，为此在内科里不得不另外开辟了一个"满系诊室"，桌、椅都是破旧的，专门给中国人诊病，还正式采用了一名中国人医员，以后因为闹意见，这个医员被他挤跑了。从

此在内科门诊上日本医生就不再给中国人诊病了。在不得已情况下请他们给会会诊也是极勉强的。有时护士弄错病志，误将中国人病志送到桥本医长处，他也必定将病人领到“满系诊室”，目的是怕落下虱子。

中国人想住院是件大难事。“高级满系”可入日系病室，但这也是极少见的，在内科来说至少也得是个县长身份才行。各病房里均抽出一两个房间作为“满系病室”，因为如果不这样作，则对一些从外县或农村抬了来的急重病人无法应付。“满系病室”和日本人病室待遇不同，医院不借给被褥，须自己携带。“满系”病人多来自农村，再自带被褥，病室里当然要杂乱、肮脏，陪住的家属又多抽吸旱烟。

医药费虽比私人开业医便宜，但长期住院仍是一笔很大的开销。穷苦的劳动人民怎能负担得起？假如你患的是较罕见的疾病还算走运，可以作为“学用患者”充当讲课的标本，免收一切费用。但是要签署一份书面合同，同意一切试验治疗，死后尸体要交由医院解剖。这是将病人视为试验动物，在死前便将尸体购买下来。从合同的条件来看，也是极残酷无情的。如果非罕见病例者拖欠了医药费怎么处理呢？方法很简单：行李作抵押，将病人驱逐出去。

日本人住院倒是极方便的，病室整洁、光线也好。我知道有个日本女病人，因患慢性疾病在医院里住了8年，直到光复后日本人完全撤离医院时才出院。

医大在校学生的临床实习

附属医院是“新京医科大学”的实习基地，它每年都必须接受一批医科大学四年级的学生来院作临床实习。学生被分为若干个小组到科室里去，每组五六人或七八人不等，大约每月

轮换一次科室。

1941年以前，学生完全是中国人，1942年以后就混有约半数的日本学生了。名义上叫作“实习”，其实称之为“参观”亦不为过，因为没有专人负责作实际的指导。各科室所采取的形式是同样的：先生看病，学生旁观。先生很少以所诊察的病人为例给学生们进行讲解，即或讲点什么，也只是三言两语——“看到了没有？这是个瘘孔。”这并不是因为先生们太忙，主要的原因是医院的日本医生们视实习学生为累赘。另外患者多是养尊处优的日本人。不愿意给那些他们认为是“低级国民”的“满系”学生作实习对象。只有在偶尔遇到“满系”患者时，实习学生才能大家围上去进行试听或试触。常了就自然养成这样一套风气：开诊后，学生们便如呆鸡般地伫立在日本医生的背后，旁观他的工作，因实习工作腻得很，两腿酸痛，同学们常找机会溜到诊室外面去吸烟或者闲谈。

皮泌科医长特别好提问学生。来了患者便要问东问西。没有临床经验的学生们当然很难作出正确的回答，答错了他就要讽刺几句。也不教给怎样答才算正确，顶多再补充一句：回去查查书看！对学生进行提问本来是好事，但他问得紧，只问不讲，因此同学们都躲着他。内科医长有时也提问学生，学生答错了时，他总是冷笑着说：“是那样的吗？”还有的教师，你若向他提出一个问题，他总要反问你几个，弄得大家以后再也不敢请教了。

同学们最感到苦恼的便是到耳鼻喉科。因为耳、鼻孔洞很小，除了诊察医师本人外，别人什么也看不到。齿科也是大家最不喜欢去的科室。距离近了，医生们嫌你碍事；远远地站在一旁，他们又说你站在那里会起到什么作用。有的医生在地板上划了一个圈，让学生站在圈 里观看。

各科室里的大师兄是本国人，理应在学习上给大家多作一些帮助，不知因为什么，他们也都不愿接近实习学生——也许是在那冰冷的环境里呆得时间过久，将正常人应有的热情早已失掉了吧。

我在学生时代的实习生活也是这样度过的。觉得只在外科和皮泌科实习时有些收获，因为来到这两个科室的病人，他们的病变多生在身体的表面，“旁观”便能收到效果。其他科室因为不让触动病人，几乎没有学到什么。造成这样结果的基本原因便是学校本身对学生的实习就没有重视。伪满时期的大学和今天的大学是无法相比的。但是也恰好说明这一点：在那时想学到一点技术是多么艰难！

医院的工作制度和方法

看惯了今天我们的医院，再回忆起那时的“新京医大附属医院”，会感到这个医院的工作制度和方法是非常特殊的，甚至想不通他们那时为什么要那样搞。

其实在伪满时期，不仅是这个医院，其他日本人设立的较大的医院也大多如此。从今天看来，这套工作法在各方面的效果显然都是不高的，同时也给病人带来了许多不便或恶劣的影响。细想来，这也并不奇怪，问题倒不在于这是几十年前的医院，基本因素系于社会的制度——社会制度不同，决定了服务的方向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1. 一座纯牌的“官”立医院

这是一座名副其实的官立医院。医生都属于政府官吏，荐任三等以上的医生在官衔上统名之为“医官”。医官们一身官气，这不仅是对待“满系”病人，对日本本国人也是同样。日本人一向尊敬医生，进入诊室来首先要鞠躬致敬，这也助长了医生

们的官僚气。走进医院，觉察不到为病人服务的气氛。在大楼里就没有一项服务性的设施，连块路标都没有，从来也没贴过一张卫生宣传画。相反的，却将医院各科室的阵容用长约两丈的黑漆牌匾在最触目的地区公布出来。像似剧院在作广告。从以下各项具体事例里，也可以感到这个医院是官气十足的。

2. 半日门诊制

医院的门诊只在午前开放半日，午后便将挂号窗口关闭起来，因为没有“急诊室”，所以除了“极”特殊的急诊以外是绝对不受理的。也许是因为这个制度行得很久，市民们早已印入脑中，到了午后全楼门诊几乎没有来访者。那么，午后的时间留着作什么呢?

3. 医院的午后

在规定上，医生们午后的工作也是很多的：要查看住院病人，要作手术或特殊处置，要往诊，要给住院病人作常规化验检查……医院是实行门诊病房一贯制，即门诊和病房是一套人马，人人出门诊；除医长以外，人人皆管病床。一般每名医生负担病床数不超过10张。各种外科手术，一律约在午后，但也不是每天都有。较大的手术留在每周两次的手术日里来作，比较知名的内科、儿科医生在午后一定要往诊。往诊量是很大的，他们常在夜间7、8点钟才能回家。往诊量这么大，一般人来接往诊是不会被接受的。必须是有一定的人情、面子或是在社会上有地位的人才能请得去。日本患者也是同样。医院化验室不代替医生作血液常规检查，这需要医生亲自去作。但医员们多委托实习医生代作。那么，没有担当病床和不往诊的医生们或实习医生们作什么呢？没有固定的要求，可以自便。

有一点应该在这里说明一下：医生的往诊和手术是和医院对半分款的，也就是医院要将收入了的往诊费和手术费拿出半

额付给出诊的医生。这在医生们来说是笔很大的收入。譬如内科和儿科的医长每天常有7～8个往诊，每次往诊费是5元，他每月从医院提取的往诊费往往超过他的工薪，患者额外的赠与还不算（患家常把装入现款的信封偷偷地装入医生的往诊包里）。那时的外科手术费很高，一个手术日起码要作4～5个大手术，当然也是一笔可观的收入。这也可算是当时医疗制度里的特点。

4. 隔日门诊

大部分的科室均是将医员分作两个组，每天交替出门诊，也就是每名医生在一周中出3次门诊就可以了，每次还是半天。非门诊日作些什么呢？没有具体规定。有的科室是大查房，有的科室要作X光透视。总之，不一定是人人有工作可作。

5. 门诊见闻

院长、医长也和一般医员一样，隔日出一次门诊，这应该算是医院唯一的优点，他们专诊察初诊病人。8点上班，开诊时间没有一定，往往拖到8点以后，因为已经成为惯例，病人都静静地等候着，从来没有人提过意见。

以内科为例：开诊时至少要有两三名高年实习医生和一名护士来侍候。在医长的背后照例要站立大群医大实习学生。

诊室的秩序由护士维持得非常好，她在适当的时间将病人引进室内，在诊察前几分钟让病人脱好衣服准备着。实习医生的工作便是记录诊察所见和抄写处方。病志的内诊事项早由实习学生记好，医长用不着执笔写一个字，护士立在身旁，当医长听完病时她就把听诊器接了过去，用时再递过来。医长一伸手，她就知道这是要打诊锤或手电筒。

内科医长桥本的诊察速度是惊人的，他在午前不到3个小时之间能诊察60多个病人。因此他必须要求一个能干的实习医

师作他的第一助手。门诊上一般不作化验，但对初诊患者，诊察时一定要检尿。当日不作透视，医生不必为等候化验、透视结果而耗费时间。门诊量不大，全院才每日400～500人次，所以看不到站大排或拥挤现象。

药费并不按品种一一计价，而是简单地分作几个等级来收费。收费标准比私人开医便宜。

6. *病房见闻*

前面已经谈过，病房主要是供日本人患者使用，只拨出极少数的房间用来收容“满系”患者，待遇上也有所不同。

日本人病室也不是一律平等的，它分作4个等级：一、二、三等，还有个特等室。

按照日本医院的规矩，护士只是医生的助手，不为病人作服务性的工作，也没有护理员。真正从事护理工作的人是一群叫作“付添人”的日本老太太，她们长期居住在医院里专门服侍病人，由病人付给报酬。付添人也分等级，有的专服侍一个人，有的服侍两个人，还有同时服侍四五个病人的，收费当然各不相同。这些老太太们长年专职作着这一工作，早已通过锻炼成为护理专家了。病人在入、出院时还要照例付给她们一些小费。病人为了得到较好的照顾，还得向病房护士施些小惠，到夜间时，值班的护士常会收到病家赠送的糖果或糕点等。主治的医生也时常接到患家的礼物。大家见惯，没有人认为奇怪。

住院的患者比较自由，亲友可随时前来探视，并无限制。但是日本人在这方面很自觉，探病者不在病室中吸烟和大声喧嚷，也不坐得时间过久。

内服药品不由护士按次投给，而是将两三天的药品一起交给患者本人，让他按指定方法自行服用。医长每周大查房2次，这叫作“大过诊”。医长过诊是病房的大事，护士长给拿听诊器，

一个护士端着一盘常用器具，一个护士立在病室门外逐门挪移洗手盆，高年实习医生作记录，还跟随着许多实习医生和学生。大过诊的方式是一个病人不漏，不过，进行速度是迅速的。如内科桥本医长的“大过诊”，六七十个住院病人只消两个小时便可查完，如此走马观花的查房所起到的作用也只是“问候”而已。

值得着重提出的是，我在这个医院的内科供职3年，没有听说病房发生过任何较大的差错，从来就没有打错针的现象。是由于制度完善吗？不！我还没有看到这个医院的任何书面制度。病房里根本没有什么吩咐簿，医生的医嘱只是口头上一讲，护士记到黑板上便不会有错。说起来，日本护士的质量确是高的，仔细、认真、工作负责，她们的头脑里早有固定的成套工作制度。这个制度是各医院共通的，走到哪里都能适用。

7. *护士的生活*

日本护士的工作质量所以那样高，因为有两个原因：一是她们全是“科班”出身，都经过了正式护士学校的学习，持有执照，而且均在大医院里受过了严格的训练；另一个原因是，日本的医院，在护士的生活方面要求很严，首要一条便是不许结婚，结婚就得退职；第二条，护士必须住在医院的“寮（集体宿舍）里，遵守“寮规”（寮规的主要一条便是不许外宿，每夜点名）。基本功学得好，技术水平高没有家室之累，工作时不致分散精神，因之保证了工作的质量。

她们怎样处理婚姻问题呢？当然，年轻者还是准备找到对象结婚，作为自己的归宿。那些年纪大的多是寡妇或是被遗弃者，还有一些便是丧失结婚信心的老处女，她们已很少有再结婚的可能。各科室或病房的主任护士都是40岁开外的老护士，总护士长是个50多岁的老寡妇了。总护士长兼“寮长”，她非常

严厉，切实地掌握“寮规”，管理着护士们的生活。

医院不能采用有丈夫和有孩子的护士，未婚者结了婚便要从医院开除出去。因此，医院不得不早期地准备好护士的后备力量。那时，每个较大的医院都必须自己办一个护士学校。若不然便得不到人员的补充。“新京医大附属医院”建院不久即自己设立了一个护士学校，学生多是日本人，是从日本内地招来的。护士学校采取半工半读制度。学生们午前分配到各科室去工作，午后上课，2年毕业。在学时间由医院供给食宿和部分服装，还每月给津贴10元左右。毕业后发给伪满政府正式护士“免许”证，由本院采用为正式护士。入学时要填写保证书：保证毕业后在本院工作两年，如期限未满离去时，由保证人负责包赔院方损失（学生阶段的食宿等费）。这个保证书的主要目的在于限制工作期间内结婚。

下面再谈一下中国人护士的情况：

起初，只有极少数的中国女孩子进入了这个护士学校。在1940年以前出校者仅10人左右，以后，因为战争时期到日本内地招生有困难，自1941年起才不得不就地取材，较多地招取中国学生。招生一向在内部进行，考生要具有这样的条件：一、必须是日本话好；二、年龄不超过17岁。日本话讲得呱呱的女孩子在长春是不多的，于是总护士长不得不每年去旅顺招生一次，因为旅顺沦陷较早，那里的小学生日语程度好一些。1941年以后，每年招取中国学生10余人。学生们的半日工作作什么呢？第一年里扫除是最主要的工作，其次便是传递病志、搓棉球、洗纱布等。第二年便和正式护士同时进行操作了。中国护士和学生也必须居住“寮”内，尽管当时的日“满”系主食配给品种不同，这个医院却一直是同样供给。我想这大概是揩了病人的油。

太平洋战争越持续下去，医院里的日本人医生越少，到后来竟无人给她们经常讲课。同时，护士方面也是人手不足，学生学期未满即开始从事一般护士工作。这样就更没有时间上课了。因之，中国护士和日本老护士的技术水平相差得很悬殊。中国人护士在工作方面也常受到日本护士的欺压，肮脏、艰苦的工作总是交给中国护士来干。

毕业后2年内不得结婚，中国人护士很难作到这一点。因为环境里有大量的实习医生和大学实习生，容貌较好的护士很快地便找到了恋爱的对象，再不然便是在工作期限内怀了孕。医院也只好忍痛让她离去。以后医院当局学乖了，在招生时有意地选择容貌丑陋者录取。

医院对护士的服装要求较严。从帽子到鞋袜完全是白的，不许露出杂色内衣。帽子上附有标识，可以区分护士的等级。

日本护士对医生非常尊敬，有礼貌，即使在走廊里碰见了医生，也必是低头让路问安，说话时一定要使用敬语，但对中国人医生就不是那样，不是不理睬，便是顶撞，态度非常不好。新从日本内地到来的日本护士就好得多，但过了一年以后也要逐渐地变了样。

再有便是科室里的一切劳动，如扫除等工作完全由护士负担，医生们一向不伸手。因为日本男人在家庭里也不作这样的工作。每周大扫除时，护士长便要喊了："先生们！请回去吧，我们要大扫除了。"

8. 逍遥的夜班值宿

这个医院无急诊室，所以午后和夜间根本不受理一切门诊。夜间除内科、儿科有自己的值宿医生以外，其他各科共同设一名值宿医生，为的是照看住院病人。

前面谈过，日本的护士质量较高，患者的一般要求和某些

偶发现象，她们都能很好地自行处理，用不着找医生，患者也轻易不敢提出找医生的要求。只有病人死亡时则医生必须到场，验明确实死亡，护士好作下一步的处理。

这个值宿根本无事可作。因为医长和年龄较大的医生都不参加值宿，我们每月能轮到两次。每次的值宿都是非常开心的，我们很少一个人单独值宿，总是约会两三名医生一同住在值宿室里，买几瓶酒和些菜肴，一直喝到半夜，往往尽醉方休。

太平洋战争与中国人医生的抬头

1942年以后，太平洋上的战局越来越对日本不利，作为战争后方基地的伪满洲国也呈现了紧张状态，种种“战时体制”的作法迅速地渗入了医院。和其他机关一样，早会后向皇宫、帝宫遥拜，午间的默祷，被当作每日的行事固定了下来。还要我们学习空袭下急救措施。日本医员比我们苦些，他们全是待命的在乡军人，要随时听候命令入伍出征。为了作好准备和表示决心，早已一个个剪光了头发，每天午间集合在正门前进行军事训练和比剑术。那时，医生是不戴工作帽的，从是否留发便可以分出这是日本人还是中国人。

我来到这个医院的第二年，即1943年，医院的内部情况有了很大的转变，许多的日本医员陆续地应征从军去了。造成医院医生不足，从他处调派也不可能，因为各处皆是同样的闹着人荒。这对中国实习医生来说，算是来了好机会。医院在这一年里正式采用了不少的中国人医员，内科就采用了4名(连我本人在内)，其他各科也分别采用了一些人，药局也采用了几名中国人药剂师，事务科里也新来了一些中国职员。因为医院要将这些人当作力量使用，对中国人的态度也比过去有了好转。事实上，中国人职工增多了，尽管在团结上还不够好，但也自然

地形成了一种势力。科室间联系工作比过去方便得多，不必再低声小心地“恳求”日本人了。

战局形势正在逐步“恶化”，这在日本人医生和职员人数的一再减少上看得出来。经常有被征的医生和职员到科室里来告别。医长总是一派正经地祝他早日胜利归来。而我们则在内心说：又去一个送死鬼。应征出征的人并不一定是年轻人。有一个医大的讲师年龄已接近40岁，还是个特号近视眼，他常玩笑地对大家讲：“我不能去当兵，假如征到我的头上，日本早就垮了。”但是后来他也接到了召集令。

针对这种现状，医院的对策便是重用中国人医员。1944年起，部分的医员便破格地“升进”到给日本病人诊病的地位上来了。事前，医长对我们讲：“这回要将你们当作日本人看待了，要小心，认真地工作，将来是大有前途的……”在他觉得这是“高看”、“提拔”，因为日本人夸你某个中国人工作能力高时常说“这个人和日系差不多”，但在我们听来并不愉快，往往令人啼笑皆非。

让中国人医生给门诊和病房的日本病人诊疗，在这个医院里是史无前例的。在医长来说，也是个大胆的尝试。我们虽然“受宠若惊”，但也存在着许多顾虑。给日本人治病是好事？还是坏事？好的一面是，这等于“高升”，是医长给自己作过了一次技术鉴定，认为已具有一定水平，自己过去的功夫没有白费，但是今后便要离开那个可怜的“满系病室”，给日本人服务去了，又感到舍不得离开；另一方面，给日本人诊病终归不是从心所愿，又怕日本病人不好对付，万一出了什么问题会不会给你扣上这样或那样的帽子。

同一的现象不仅在内科，其他科室也是一样，许多中国人医员纷纷被提高工作职位，去从事较为重要的工作，换句话来

说便是：大家得到重用了。自此以后，中国人在医院里的势力范围有所扩大，日本人们也不再说“满系”没有用了。由于势力的扩大，过去不敢作的事也敢作了，不敢提的事也敢提了。过去，日本医员有休息室，而中国人在诊疗余暇只得坐在诊察室里，经提出后，医院给解决了休息室。我们大胆提出应该成立中国人病房，要求干净点、像个样子的中国人病房。医院答应给予考虑。但是又迟迟不予办理，经过了几次的斗争，医院终于将精神科病房腾出来作为中国人病房拨给内科使用。尽管这是个简易房，但总比过去又脏、又臭的“满系病室”好得多了。许多我们一向十分讨厌的日本老护士，因为战局不利，纷纷辞职归国；但是从日本内地偏偏又有一批被空袭吓破了胆的日本护士来到了医院，她们没有瞧不起中国人的思想，使我们感到顺气得多。这也算“天从人愿”。

总之，1943 年以后这个医院从内部里有了很大的转变，中国人医生在这里总算比过去吃得开了。中国人来院治病也比过去情况好了一些。但是医院里总的制度、工作方法并未改变；医院的行政领导仍然完全是日本人，还没有中国人能参加进去。

1943 年以后，伪满出现了严重的物资缺乏，但是这个医院的药品贮备是惊人的，所以除了高级“磺胺”以外，在光复前从未感到用药困难。奇缺的仅是那些包药纸和投药瓶之类的东西。在不得已情况下为了节约纸张，将一天的粉剂包成一个包，让病人回去自己分作 3 次服用。水药瓶子要病人自备，没有瓶子便不给水药，有些患家甚至拿汽水瓶和饭碗来取药。

食堂里的主食也逐渐恶化，米饭里掺入大量的窝瓜，护士们因为长期吃窝瓜，皮肤都染成黄色，和生了黄疸病似的。

医院如何推动工作

在我供职的3年中，没看到医院采取什么特殊的措施来推动工作。医院的管理干部很少，院长只一个人（以后改为两个人），并不脱产，他的诊疗工作一点也不少于其他医生。医院里再也没有其他的管理干部，当然更没有管理门诊和病房的办公室，担当行政工作的事务科是个为医疗服务的单位。它不能管理医疗，只作些财会、总务、庶务等工作。而这事务科的工作人员又是很少的，他们集中在一个较大的房间里办公，房间的一侧便是对外挂号、收款的窗口。

据我所知，院长的主要精力和时间还是忙于诊疗。好像院长一职倒是他的兼务。医院只每周一次地召开医长会议，每回的时间又很短，会议决定了什么，医长从来没有向大家传达过。护士长也从来不开会，我们呢？每年只在元旦的那一天参加一次庆祝酒会，此外，再也没有什么其他的会。科室里从来也没有过业务讨论会。

是什么力量在维持着工作的正常进行呢?我是这样认为的：1. 日本的医院有其传统的工作方式，它早已当作“不行文的法律”被固定下来，永久不变。工作人员又都是经过这种传统方式训练出来的，各岗位上的人都知道自己应该作什么、必须作到什么程度，也知道应该怎样去作。2. 伪满政府职员每年有两次“赏与金”，每次的金额略等于本人1～2个月的工资。具体数字除依照本人工资等级外，医院里还要参考医长的意见，而医长的意见那只有决定于平时对你的印象了。如果工作得再好些，还可得到不公开的“特别赏与”。我觉得“赏与金”在起着一定的作用。

医院的工作总是顺水推舟按照经验办事，从来没提出过什

么“改进”和“提高”的要求。好像工作已经做到了家。总之，医院是墨守成规的。是僵化了的。工作方法永久停留在那老一套上。工作当中是不是存在问题呢？当然很多。从前面的记载中便能了解大概。以下再将管理工作方面的问题谈一下，不过，这些在当时可能均已见惯，不认为是什么问题。

管理工作上的漏洞

以仅少的管理人员掌理这么大的医院，作了那么多的工作，固然是它的优点。但是，各方面的漏洞是层出不穷的，医院的物品保管制度是很松弛的，1943年后虽一再大喊节约，但没有人理会，浪费现象仍很严重。各科室里均有一个“职员”两字的印章，开了处方不管是否自己服用盖上了这个印章便一律免费。各科室里的纱布材料，药品没有数，发到科室里来便已算消耗，大家随便使用，随便拿（只能说是“拿”，不算“偷”），仅护士们每月个人使用的棉花纱布恐怕不少于100磅，送给亲友的还不算，药局人员以葡萄糖注射液当水喝，许多护士偷盗药品卖入黑市，连食堂的碗盘都往外偷。

以上只是一般极常见的小事。还有一些比较严重、在今天看来属于违法的事，也在公开或半公开的形式下进行着。如：夜班的时候，几个护士便将新发下的上等白斜纹被套私分了（这当然是日本护士领头）。更奇怪的是，她们用来作成洁白的小外套，公然地穿在身上，毫不忌惮。更令人诧异的是麻醉药品随意使用，毫无管理制度，有的医师（日本人）盗用成瘾，亦不作追究，医长反采取庇护态度，不让声张。

门诊使用的处方笺事前早已盖好各医师的印章，大量地散放在诊察桌上，谁用都可以。医生每个人都交出一个图章，留在科室护士长处备用，这些图章就放在桌上的一个木匣里，无

人看管。休假诊断书无何规定，医生可以随便开，从来没有任何单位前来照会。这些情况，医院当然是知道的，只是装作不见而已。

小野寺院长的到来和内科的分裂

伪满民政部技监、日本人太平博士是当时伪满医务人员的最高统帅，他为加强“首都”的医疗机构，特地从日本国内聘请九州帝国大学医学部教授小野寺直助博士到这个医院来。这个小野寺是以“小野寺压痛点”闻名于日本的消化系统病专家，是个年纪65，童颜白发的老独身。他先为医院的顾问，以后任命为院长，原来的院长入江义一改为副院长。

小野寺院长给人的印象和其他日本人不一样，也许是新从日本到来的缘故，还没有瞧不起中国人的言语和态度。他喜欢接近青年人，常和他们说说笑笑。和内科桥本医长大不相同，桥本最讨厌大蒜的气味，而他偏偏总在衣袋里装着一些蒜瓣，在食堂里逢人就给，并推奖它的美味和好处；桥本总嫌中国人脏，而他常让中国医生领他到黑市小馆里吃东西，甚至到最低级的市场里去吃油炸糕。因此有相当多的人喜欢他。

内科桥本医长可不喜欢他，因为他作了院长以后，从九州帝大调来了几名内科医生，这明显是要和桥本作对，要和“满大”学派作对。果然，这两批人马展开了强烈的竞争，在无法调和下，终于将内科切为两半，成立了两个内科：一个是桥本内科，一个是冈谷内科（冈谷博士是小野寺的弟子），中国医员和实习医生也随着分为两半。于是对台戏公然地开幕了。两个内科互不协作，甚至敌对，互相瞧不起。桥本医长就公然对我讲：“别看小野寺是九大教授，他不懂得满洲的疾病。如要懂得，还需5年。”冈谷内科的医生们则说：“正是内科力量薄弱，才让

我们来加强的。”

日本人之间因地位、势力、学派等问题发生冲突、磨擦，是容易理解的，问题是两个内科里的中国人医生——桥本内科以我为首，冈谷内科以张康医生为首的中国人医员和实习医生也形成了两派，针锋相对起来，争夺床位，争夺门诊病人，甚至互相讽刺、诽谤，不择手段地在病人间树立威信。此间的冲突一直延续到光复以后（光复当时，日本人全部撤出，医院由我们接管下来，内科还是分为两个，我和张康离开这个医院以后才合并起来）。现在回忆起真乃无味已极。

中国医生和中国病人之间

各科室大同小异，这段里只讲讲内科里的有关情况。

中国医生对本国病人的态度也不尽一样；有的人耐心、和霭，同情本国病人的悲惨处境，遇事热心相助；也有的人和日本人一样，厌恶本国病人，态度不好，问话也不回答，反说病人无知、混球。这两种都是极端的，大多数的人还是对有钱的、有知识的、服装整洁的人态度较好，对那些穷苦的劳动人（农民、“苦力”）就不耐烦了。不管怎说，这是个大医院，店大一向就要压客，又是官医院，自然要添上三分官气，虽然如此，比日本医生还是好得多。

1943年以后，医院里的中国医员和实习医生的作风大有改变，这和社会经济情况直接发生关系。那时，全“满洲国”物资极度缺乏，黑市泛滥，虽有一定的“配给”，但是无内线的人就很难以“公定价格”买到所需的物品。由于药品也出现了黑市，私人医院不得不暗自抬高药费，致使大量患者拥到价格低廉、药品充足的官立医院里来，门诊压力增大，是大家所不喜欢的。行贿在当时已是社会上公开的风气，不论你办点什么事，

不托个人情、不送点礼，就休想办得通。那些从事黑市的生意人、经常吃贿靠勒索肥起来的人到医院来诊病，顺便便把他的经验以实际行动传播下来。歪风席卷着医院，医生们经常有人请吃酒、下馆子、打麻将、甚至吸鸦片，医生的家里则堆积了总也吃不完的米、面、鸡蛋，喝不尽的酒。过去曾被另眼看待的公务员现在吃不开了，代替他们的是各种的商人、烧锅和饭店的经理人、经纪人和跑车板的黑行商、警察特务们，他们成为医院的贵宾。

由于客观情况有利于发财致富，有的医生还不满足于现状，他们利用官医院和黑市药费的差价大肆往诊看病，接受患家的赠与。如放一次腹水官价是1元，而他就接受患家100元，他们的收入往往十倍于本人的工资。有的患家不知当时医疗界中的奥妙，接回了医生瞧病并没赠送贿金，下次再接医生时就失灵了。当患家再三恳求时，有的医生竟正颜地说："你是真糊涂是假糊涂？你这样接大夫，方法对吗？上次你省了××元药费，你知道不？"

医生的堕落还不仅如此，诊断书也是一项交易。在当时，这个医院的诊断书具有莫大功能。可缓期兵役检查，可免除"勤劳奉仕"，可避免被挑劳工，可换取自宅吸食鸦片说明，可以用来辞职。当然，利用自己职权保护本国同胞是件好事，但其出发点并不在此，完全是为了报酬。这些现象是半公开的，几乎人人如此，只是程度不同。整个社会上也是如此，并不奇怪，这也预示了伪满政府已面临崩溃。受苦难的人呢？仍是那些穷苦的老百姓。

光复前后

1945年8月的一天夜里，伪满国都"新京"突然遭到苏联

空军少数飞机的空袭。同时苏联宣战，迅速突破伪满洲国境防线，迫使日本关东军放下武器。

早在苏联红军尚未进驻长春以前，医院的医生们均将家属集中到医院里，他们整天都围绕着一个大型的无线电倾听着消息。一些人则仿佛世界末日到来般地喝着酒。医院开始准备解散，每个人发给12个月的工资。随后，市公署又发给退职金，我当时共领了8 000多元，相当于3年的工资总额，这是伪满政府公开表示已经彻底垮台了。

苏联红军到来后，医院很快由临时市公署派原“新京市第四医院”院长张继有伙同我们原有的中国医务人员接管了医院。接管仪式是在三楼礼堂进行的，日本人自院长以下全体参加了仪式，他们也都在旧中国国旗前规规矩矩地行了礼。会后，原事务科长代表全体日本职工提出了几项要求，最主要的是：

1. 保证原有日本人职工的生活，不使一个人失业。

2. 原有医院住院病人仍留院治疗。

新院长答应了他们的要求，开始着手恢复工作。

内科的原护士长过去一贯对中国医生和中国病人态度生硬，这回变得非常有礼貌，她将“满系诊室”重新收拾一番，还在墙壁上略施点缀，向我们说：“这回该换换屋子啦，这个屋子将来就留给日本人看病！”桥本医长也说：“我过去苛责大家了，请多原谅我，援助我。好在我曾是你们的老师。”最令人作呕的是那个叫作中根的医员，这个人心地狡猾，狭隘，没有人喜欢他，因为我是当时的负责人，他为了表示好感向我说：“病房里的日本人听说范大夫负责内科，全非常高兴，让我来致以祝贺。病人们都说，早就看得出来，范大夫是个了不起的人物。”他这套虚伪的赞词令人又好气，又好笑。

那时，治安情况很不好，街上每天都打死人，不是中国人

打死日本人，便是日本人打死中国人。在医院里，中国人和日本人两头怕，互不相信。许多日本人身边带着武器，还有人将手榴弹运进医院里来；另一方面日本人和朝鲜员工则乘机大肆盗运药品和备品。中国警备人员太少，无法遏止。于是医院决定驱逐所有的日本人。那时日本人虽然败北，但心目中还是没瞧起中国人，认为你们也不过就是过去的“满系”，现在神气个啥？同时，他们多藏有武器，人数也比中国人多，所以驱逐他们离开医院是有困难的。我们早已探知，他们最怕的是“八路军”，于是医院便假称八路军要进驻医院，限他们24小时内全部撤出，如果留在这里，将来有何不幸，医院无法保障。方法果然灵得很，不出几个小时，所有的日本职工和住院病人全部离开医院。多少年来渴望的一天终于到来，医院是我们自己的了。

事后的经历表明，国民党到来以后医院弄得狼狈不堪，甚至冬天烧不起暖气，滴水成冰。虽然有一个时期作了“长春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但解放前几个月因无力维持，原有医生纷纷他去，不得不移交军方，改作“五四后方医院”。

日本侵略东北时期对待中医的情况

彭静山

我是在“九·一八”事变头一年开始行医的，14年的时间我都在沈阳。日本侵略者对我国东北的政治、经济、军事、科学文化等等都有一套完整的统治方案，当然，对中医也不能例外。

停止考试自趋减少而终至消灭中医

“九·一八”事变以前，由于传统的学医方法，中医是从师承、家传、自学三个途径而传下来。师承的方法，一种是设私塾，教医书；一种是开药铺行医卖药，收徒弟；家传是由老年中医，把自己的经验教给子孙，或者一直传几代。世代相传的医生更为人民所信仰。自学则多半是没落的文人，在旧社会，求官不成，其他工作找不到，不得已自己钻研医书，终竟成为医生。总之，不论是用什么方法学来的，因为没有公立的中医学校（沈阳同善堂曾附设中西医学校，是中西兼学，毕业后可以凭证书行医。办了些年就停办了），所以学成以后，必须经过当地卫生主管部门考试及格发给中医师证书（或叫行医执照），才准许开业。沈阳和各县都是由警察局卫生科管理中医考试，后来沈阳市政公所成立，就归市政公所的卫生科管理。各县的考试日期不一定，或一年一次，或数年一次，根据当地学医的人数多少而决定，录取的名额也不限制，只要及格，就发给证书。有一年开原县考试，报名的有100多名，一次就录取了70名，也就是一下子就增加了70名中医。沈阳市则是固定的两个月考试一次，但录取名额也不限制，及格的就给中医师证书，可以自己开业，或到药铺坐堂行医。因此，每隔两月就能产生一批中医，通常是十几名或多至几十名不等。这是“九·一八”以前的中医师考试情况。

等到“九·一八”事变的第二年，还考过两次，以后就停止了考试。事变前旧中国的考试方法是聘请最有威信的两名老中医兼任医官，拟题笔试监场、亲自口述、判卷直到决定录取为止。事变后的考试，改医官制为委员制，委员多至20余人，分科负责。人多了，但是考试的水平降低了，最后，干脆不再考

试。学医的人刻苦钻研了五六年，有的10年以上，到头来不能参加考试，无法取得中医资格，一年一年的盼望考期，结果等了几年，一点希望也没有了，只好把医书卖掉，改行做其他的职业，以谋衣食。因此，有六七年的光景，中医后继无人，我那时是已经快到30岁的中年医生，但是在同业之中，我竟成为年龄最小的青年医生。

强迫中医学习西医

日本侵略者停止考试的目的，是企图消灭中医。但是，中医的数量还是很大，一时半时是消灭不完的。所以，又想起奴役利用的办法，在各地开设训练班，迫使中医参加训练，学习简单的解剖生理知识、常用西药的性能和注射方法。最后，就是用征调的办法，向各地征调中医去当所谓的“劳工医”。向各地指定名额，每月还发给几十元工资，生活待遇比劳工稍好一点，工作是给劳工治病，实际也就等于虚设。因为不是谁有病就随便治，而是日本人许可治才能治的。去当“劳工医”的都是青年中医，初行医收入少，去了每月可以得到些收入以求糊口，就顾不得苦了。老年中医，由于体力关系无法去，因此，各地接到供应劳工的任务，多半由比较年轻而业务不佳的中医去，老年中医或酌与补助。日本人则只要有人去就算达到目的，中医当“劳工医”就成为一种任务。

颁布“汉医法”

日本侵略者，对中医在人民的保健与延续方面起到的作用以及人民对中医的信仰，全不去理会。至于几千年来遗留下来的宝贵的中医文化遗产，在日本人的眼睛里更属于一文不值。伪民生部竟然要下令取消中医。有人提出意见，说日本也有汉方

医学（日本称中医学叫汉方医学，或皇汉医学，称中医为汉医），并且有一定的疗效。中医究竟有用没用，还是应该考验一下，如果真的确实没有用处再取消也不为迟。因此，聘请沈阳名医马二琴先生（名英麟，爱古琴成癖，自号二琴，为沈阳有名中医，现为沈阳医学院副教授）去到伪新京（长春）粹华医院应诊。马先生初起不愿意去，后来日本人再三催促，威逼利诱，马先生怕对自己不利，只好硬着头皮去。在粹华医院二个多月，有一人患腹膜炎，日本外科医长、某博士（名字记不清了）认为束手无策，只有剖腹手术，但吉凶不保，病人不同意手术，疼痛难忍，日夜呼嚎。后经马先生用金银花、龙胆草、公英、地丁等中药治愈。日本医生大为惊奇，伪民生部又研究再三，认为中医还有用处，暂时留一留再说。遂颁布汉医法，改中医叫“汉医”，称“中药”叫“汉药”。又恢复了考试制度。并且进一步实行文化侵略，想把中医的学术精华也掠夺过去，于是在长春设立“东方医学研究所”，购置了大量中医书籍，安排一些研究人员，还招了一班学生。半年以后，日本投降，这班学生，都转入中国医科大学（即现在的沈阳医学院），成为一个班。

我所了解的伪满九台医务界概况

张占富

一、伪满时九台县一直到1934年尚无一家公立医院。县一级管理单位更谈不到，只是在县警务科内设卫生系，负责对全

县个体营业医务人员进行有关管理。个体医务人员多为中医，西医较少。这其中有的开一设备简陋之诊所，而更多的人是在农村走街串屯，类似现在的往诊。乡间农民一旦患有重病也多不到县城就医。一是生活困苦无钱投医治疗；二是即使到县城由于医疗技术落后，设备简陋而束手无策，也只好坐以待毙。大多数村民和县城居民一旦不幸染疾，只有听天由命，重病只有挺着等死。

1936年九台县公署才正式设立县立病院。其规模很小，大约有病床50张，医务人员10余名。一个日本内科医生任院长。外科医生有陈东起、李银堂，妇科有张惠芳，均为南满医科大学毕业生，医疗水平尚可。医疗对象主要是能付得起医药费的殷实人家。一般家庭平民百姓生病也还是望而却步。每日门诊大约40～50人。所说的医疗水平尚可是相对而言，实际上由于受条件限制，至多也只能做切除阑尾炎手术。当时医院也受警务科卫生系领导，我记得当时有个叫于翰书的负责过一段时间。由于换人十分频繁，其他人记不真切了，不过医院的顶头上司都是警务科或警察署的警察官。

当时医药费十分昂贵。例如患普通重感冒医治一次大约费用1～2元伪“国币。”这些钱在当时能买10～20尺布，或1～2斗高粱米。有些人受人雇佣，每月佣金4元，如果看一次重感冒就得付出半个月的劳动收入！

卫生条件更差。根本没有消毒灭菌设备，小手术就在土炕上做，感染与否一概不问，生死由天，所以医疗效果不佳。正像俗语所说：“死马当做活马医。”

二、伪满后期，开始在九台筹建一所“国立病院”（地址即今省结核病院）设计规模较大。但直到伪满垮台时，其土建工程虽已基本完成，医疗设施尚未齐备，人员亦未配齐，没能正

式开业。

另外，伪满后期还有一家由日本人开设的顺天病院，是当时“新京”的顺天病院在九台分设的。地址在今县医院东侧。设有住院部，约有20来张床位，分设内、外、妇等科，医务人员中有日本人，也有中国人。在当时也算是九台街一家大医院了。

这时个人诊所有十几家。比较有名的有刘多三（现白求恩医大教授）开设的普济医院，规模不大，护理杂务均由自家人担任，并无外人。还有耀晨医院，为刘耀晨所开设。还有我开设的永生医院，杨九如的九如医院，许树仁的树仁医院，孙华西的华西医院等等。以上均为内科诊所，由于资金不足，当时开业十分困难。缺设备（即便是最基本的），缺药品，有时因患者急需一种药，便在诊后持药方去长春药房采购，回来立即使用。大多是现买现用，没有储备。当时所用西药全部依赖进口，伪满时根本谈不到制药工业。

三、传染病的防治工作主要由县警务科及所属各署、所过问，他们出面主持召集个体营业医生尽义务，给居民注射预防针、种牛痘，主要预防天花、伤寒、痢疾。预防注射多在夏季进行，药由官方提供，免费注射。警察部门按户籍指定注射地点，集中注射预防，官方医院不尽此义务。

四、当时伪县公署管理医务的机构是警务科保安股卫生系，负责检查发放医务许可，查核医生资格，卫生防疫也由该机构管理。没有专设的卫生行政机构。

五、光复前这段时间县立病院院长一直由日本人担任。医院主要有内、外、妇三科。医生皆为西医，无中医。医院主要岗位均为日本人占据。他们大多是日本医学专科学校的毕业生。十几名医务人员中日本人大约3～4名，中国人5～6名。有关公务、劳务概不受理，均由个体开业者承担。手术能做阑尾炎切

除、剖腹产、截肢等，其他稍复杂的均不能做。

六、乡村的医疗条件十分落后，根本谈不上有什么机构。农民有小病挺着，到严重时只能等死。另外迷信严重，医疗上没条件，丧失信心就跳神，愚弄自己，自欺欺人，最后不免一死。在农村没有西药，只有少数中医个人开业。有急症重病患到县里都解决不了，何况乡间！生了病只好自认倒霉，听命由天。

七、对医务人员根本没有培训。中医可以师承祖业，或走街串乡尚有些许自由；西医必须持有医师证件，并得到批准，才可开业，否则没有资格从事医务，不准开业。

八、中药，有中药铺卖；西药，私人开业者按需要去长春市购进，日本药居多。县立病院药品由上边调拨。对药品没有什么严格管理，也没有制度、法规。中药由民间自由交易；西药到西药房采购，即使是麻醉品（吗啡等）也毫无限制，给钱就卖。致使许多人用毒品成瘾，弄得倾家荡产流落失所，最后暴尸于街头，景象凄惨。

（摘自《九台文史资料》第一辑）

日伪统治下的中药行业

崔镇国

自从“九·一八”事变以后，东北一切都操纵在日本帝国主义手里。当时中药行业是一个不被重视的行业，全长春（新京）市共有药店127户，其中较大的只有四五家，有的还兼营其他行业，如“世一堂”兼营百货茶叶干果等，“德庆钰”兼营茶叶，“义和谦”则以中医坐堂为主，“兴顺诚”、“锦和庆”兼营

小型批发，争取低价多销，专售下等药材。那时有几家西药房比较活跃，大部分是经营日本药，也有一小部分德国药和上海药。比较起来药的销售量不多，价格贵，一般市民对治疗不太重视，实际能治起病的人不多，因传染病、花柳病和吸毒而死的人每天都有所闻，不可计算。当时还有少数日本人信任中医，乐于中医治病，伪皇宫一些伪官吏大部用中药治病，所以一个时期中药质量力求整洁，在经营上也力图扩充。北京“达仁堂”为了供应伪宫内府人员用药，特在长春三道街口设立分号，直接由北京天津来药，成药丸片都相当讲究，不过价格较高，一般当地雇主不多。其它各药店当时进货地大部分是关内祁州(安国县)，以后是营口，伪满后期这两个主办药材集散的市场也逐渐萧条，大概是因为那里交通不便，买卖药材的人越来越少了。天津、沈阳药材市场比较繁荣起来。

自从“七·七”事变以后，物资逐渐缺乏，统制也步步加严。中药材也像其他物资一样，日渐缺乏，大部药材从山海关进口，川、广、云、贵产的药材由于交通不便，加以出入关的限制，便显得奇缺，因此价格一再上涨，有的竟涨了10～20倍，比其他物价涨的还多。伪康德5年又成立汉药统制组合，是个中央组合，受伪民生部管辖，一直条条下来，从中央到省市县组合来管理药商。这个中央统制组合是由日本人主持，由于外汇关系各药店不能单独进货，相继又成立满洲汉药贸易株式会社，是全东北大部份药商投资，由这个会社一手包办，去人从关内采购药材，在天津上海等地设有办事处，其中有一中国人主事叫孟庆恩(理事)，由他们向伪经济部请求外汇在外采购，货到以后作表向中央统制组合报告，然后按其进货数量加上各项费用和一定利润再分配给各基层组合，再按投资多少分配比例分配给各药商，实际不能满足供应。中央组合和贸易会社都由日

本人主持一切，中国人只担任名誉理事等职。那时长春市地方汉药组合长是秦庆芝、赵子钧等，是选出的。

因当时药材奇缺，日本人也用中药粗制滥造西药在市场销售，中药也出现很多代用品，如洋川芎、洋砂仁、土大黄、当归等。由于价格限制，兼货源缺乏，大部分成药质量都降低很多，不再使用较缺价高的细贵药材投料，对人民生命和身体健康是没有人重视的。药商为了牟利也有卖假药的，如以“黑白丝”（牛羊角）充犀牛角、羚羊角卖，价稍低廉，实际是骗人，不能治病，还耽误治病。还有专门配制假药的用“寸冬心”等做藏红花，用松香樟脑等做血竭冰片，在硃砂里掺砂子（染成红色），还有卖“一根条”的专门从大药店里买配药剩下来的药渣子，再用蜂蜜配成丸药，卖啥药就打上啥戳顶啥药去卖。伪满时虽然表面上是限制，实际则无人过问，偶尔有人检举，用钱贿赂贿赂就没事了。旧社会的黑暗真是随时随地都存在着，有钱有势的好办事，日伪警宪特务等说你“犯法”借口就能捕人刑讯。

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把人民所有财物都压榨出去供应战争需要，除了苛捐杂税以外，强迫人民捐献、储蓄、献铜献铁，强征人民服劳役，把人民弄得非常贫困，简直喘不过气来。

中药业也是一天比一天萧条，表面上看去还一样的拉着药架子，实际里边大部分是空的，不过中药利润较高，能有买卖就能维持生活，当时从业人员不多，很多是家眷铺，所以荒的很少。业者胆大的或与伪官方有联系的可以高价卖货，一般胆小的就不敢高价去卖，怕当经济犯，不得已而遵守七二五停价令，不但没有利润还要亏本，那时卖出去就买不进来，币值一天比一天贬值，物价天天上涨，人民生活水平就一天比一天下降。中药业虽然处在奄奄一息状态中，伪政府限制还很严，新

开业的不发给许可证（营业执照），有的药店维持不了的把货物铺店和字号许可一起兑出去，除商品铺垫外，许可也要兑钱。接业者为了暂时生存，也就情愿经营朝不保夕的买卖。伪满后期残存的小工商业户，都处在风雨飘摇的命运中，街上呈现一片荒凉景象，市民都面色灰暗，衣服褴褛，已将临绝境了。